插图本

从小到大说日本

一部彻底解密日本的百科全书

刘德秦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从小到大说日本

一部彻底解密日本的百科全书

插图本

刘德秦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小到大说日本/刘德秦著.—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12-3861-3
Ⅰ.①从… Ⅱ.①刘… Ⅲ.①民族性—研究—日本
Ⅳ.①C955.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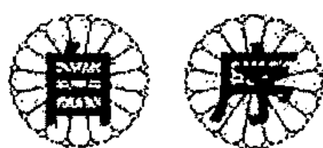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1811号

策划编辑 张永超
责任编辑 张永椿
责任出版 刘 喆
封面设计 [illegible]

书　　名 从小到大说日本
Congxiao Daoda Shuo Riben

作　　者 刘德秦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电　　话 010-65265919(直销) 010-65265923(发行)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25.5印张
字　　数 6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9月第一版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861-3
定　　价 36.80元



复杂的事情往往很简单,关键在于能否深入思考,发现其中的规律。比如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了,想到了万有引力;阿基米德洗澡,通过人在水里感觉到身体轻了,最终向世界贡献了浮力的理论。

与中国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同,日本的统治自古以来都是“密室政治”“阴谋政治”,他们喜欢玩“保密”,不希望“外人”看明白。

在日本公司工作,假如某一天公司的女秘书提醒你头发长了,要剪了,这时你必须意识到,它是上司的命令,因为日本人不喜欢多管闲事。“家长”总喜欢躲在阴暗处观察事态发展,上司不出面,他用使眼色或暗示的方式,让部下出面达到他的目的。女秘书让你剪发你不当回事,那么上司就会用“声东击西”的方式,让你感受到他无处不在。女秘书不再给你倒茶,周围的人开始疏远或故意跟你作对,让你不舒服。

日常生活中对“琐事”的方式、方法,常常会被移接到处理国家大事之中。日本自五十年代吉田茂签定之时起,就对《日美安全条约》中的部分内容不满,吉田茂看到自己无法在谈判桌上谈出自己满意的内容,就找来社会党人,让他们出来反对。不久前下台的鸠山,实际上也是继承了岸信介等的一贯作法,他借用“民意”的榔头去打美国,实际上只是条约中有日本满意的部分。

“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跟你闹”,麦克阿瑟说日本人还像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这个说对了一半的结论,错在他没看明白成年人怎么会像孩子般乱闹。

由女秘书出面提醒你去剪头发,仅仅是上司安排了一个让你容易接受的角色出来传达,它是为方便上司达到目的,而不是为了给被传达者带来恩惠。日本政坛上首相之更换,好似安排女秘书去提醒他人剪发,今天安排“亲美”的小泉一郎,明天安排“亲中”的菅直人,这些人物轮换登场“对外”,都是背后有人指使,当判断无法达到目的时,或者换一个更捣乱的,或者换一另个更容易让你接受的,换来换去,都是为了方便自己达到目的。

不了解日本人喜欢“声东击西”以及善于精心策划“阴谋”,就无法理解七十年

代日本政坛的“洛克希德”、八十年代的“里库路特”以及九十年代“佐川急便”，将政坛上的“黑将军”级人物牵连进去，目的在于造成一时的“政局不稳”，并非真正要铲除腐败。“里库路特”事件中涉案的宫泽、小渕、森喜郎等，后来都先后当上了首相，宇野也“涉案”，但他照当首相，而他下台的原因却是“女性丑闻”。

因篇幅关系，花二十年时间观察并且思考的日本，只能浓缩在本书的十二章中，笔者对读者的最大期待是：认真思考受日本影响的近代中国；因日本参与的整个世界。对该书的诠释将在今后不断推出，敬请期待。

是为自序。

刘德秦

2010.7

目录

第一章 从奥姆看日本人

电视台中止既定节目，转播实况，东京又出大事了——重光葵对麦克阿瑟说，“如果美国要强行推行军票制度，那么日本政府今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大逆事件”究竟是人为制造还是真有其事，“虎之门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陆军大尉安藤辉三说：“天皇出卖了我们……”

第二章 美国人眼中的日本人

中国是本家，日本仅是分店——中国善待日本，却没有得到日本的善报——约翰睡了田中的媳妇，可田中却要去抢夺张三的老婆——鹿鸣馆谄媚强者，日本女子被“外夷”搂抱跳舞——忠于丰臣秀吉的德川家康将秀吉家族赶尽杀绝……



第三章　等级森严的岛国

裸的交往——没有等级观念无法就座入席，甚至无法开口说话——身体庞大是为了生活——新人必须让自己变成"泡菜"——晚上睡觉时，不能脚朝大矶——天皇向麦克阿瑟深度鞠躬——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任人摆布——皇太子"请美国人当家教是为了奉承美国人"……

第四章　像城池一样坚硬的传统思想

实力领主画地为牢——哈里斯一语中的，"他们是地球上最善于说谎的人"——日本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凡事不涉及自己的利益时，日本人就会"装"睡着——北条时宗斩杀元朝使节，忽必烈震怒，元军跨海东征……



第五章　从宗教仪式看日本政治

神舆本身就是“欺骗”，在瞬间展示辉煌——足利尊（高）为一个字发动流血战争，后醍醐天皇被抬起又被撂下——“小名”织田信长横空出世，以下克上，天皇唯命是从——数代天皇沦为傀儡，强藩攘夷拖幕府下水——末代将军大政奉还，皇室独大……

第六章　先天不足的“立宪政治”

国会大厦只是摆设，三人各占大厦一席之地——时势造英雄，武士养子之子终成明治宪法之父——山县、松方相继辞职，伊藤博文一手遮天——日本一方面支持中国“反帝”，另一方面积极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桂太郎挑起日俄战争，朝鲜成为日本“囊中之物”……

第七章　明治宪法孕育的"畸形儿"

芥川自嘲是侏儒，"桃太郎"走向破灭；明治时代日本崛起，伊藤博文被刺身亡——"一战"让"桃太郎"满载而归，挑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已经准备好了——政府鼓励国民都当"桃太郎"，侵华战争中的历任内阁，将亚太地区变成修罗场……

第八章　日本政坛中的"大扫除"

无论在何处，"只要敲打就会出灰尘"——日本首相的政坛魔咒——首相被相继"敲打"下台，日本政坛到底怎么了——政党内部矛盾激烈，吉田茂七年后终被赶下首相宝座……

第九章　“表演”的日本政治

黑衣，是最要“视而不见”的要素，又是最不能“忽视”的角色——推翻东条内阁，二战期间日本表演的“和平”闹剧——讨好苏联，离间同盟国，斯大林不上当，日本法西斯因表演加速灭亡——战后日本进行民主表演，麦克阿瑟和他的美国成了日本死抱的大腿……

第十章　批发市场式的日本政坛

灯红酒绿的银座与鱼类批发市场共存，这就是日本——麦克阿瑟“各打五十大板”，第一届吉田内阁总辞职——世界希望日本成为永久中立国，吉田政府强烈反对驻日美军撤出日本——政治任务被分头包销，日本抱紧美国的大腿……

第十一章 “洗脑”（せんのう）——战后的关键词

对战争表达忏悔的老兵在国内备受欺凌——他们曾经是“无犯罪意识集团”中的一员，忏悔后日本民众则称之为“被洗了脑”——日本士兵杀人练胆——日本战俘悔恨难当——敌人在本能寺里……

第十二章 日本人的“谎言”

奥姆发言人说谎面不改色，一切为了维护“组织利益”——日本人的守时观念，“精确得像一台精密的瑞士时钟”——美国国务卿赫尔勃然大怒，“在这个星球上竟然有像日本这样的、可以撒出如此弥天大谎的国家”——苏联人准确地把握住了日本人的行为特点，而美国人则以为“机器不会撒谎”，“珍珠港”的那天成为了美国国耻日……

结束语

第一章 从奥姆看日本人



东京地铁里的毒气

1995 年 3 月 20 日，笔者所在的大学仍是假期。已事先与指导教授约好，请他这天指导我的博士论文。与往常同样，我一大早就起了床，匆匆吃完早餐将孩子送到保育园，回家后就忙着打印论文稿，同时，我习惯地打开了电视机。这时发现，所有电视台均终止了预定播出的节目，都在不约而同地进行实况播报，电视画面下方，滚动字幕不断播出最新消息：东京地铁内发现不明气体，很多人身体不适，不过所有地铁依然正常行驶。

镜头时常定格在东京都内的一个地铁出口处，从直升机上拍摄的画面上可见，在地铁站出口处外，冰冷的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男女老少，还不断有人从地铁出口中被抬出。日本的上班族素以整洁和守时闻名，而这次他们或席地而坐，或躺倒地上，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救援，看不到有人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离开，或去打电话通知家人、单位，一切表明，他们受害不轻。

在日本，只有出现重大事件或事故时，电视台才会中止既定节目，转播实况。当日的实况报道让我有一种预感：东京又出大事了。

从电视画面上还可以看到，警察、消防、医护人员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增援，维护秩序、抢救并运送伤员等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可是无论警方还是嗅觉灵敏的新闻记者，均对事故原因没有道出个所以然。从电视上得知进出东京的地铁仍在

正点运行，故我仍按原计划于9时左右离开了家，去学校见导师。

选择9时出门，就是为了避开上班高峰时间。此时的车站及地铁车厢内与往日没有什么两样，乘客不多，车厢内安静、平和。我家住川崎，学校在驹场(东京涩谷附近)，东京的涩谷车站是必经的中转站，须先出地铁上到地面，然后换乘地上电车，与郊外车站的平和气氛不同，涩谷车站内外一片杀气。

从高架站台向外望去，只见涩谷车站外的地面广场上，停满了蓝白相间、警灯闪烁的警车，红色的消防车和白色的救护车也一字排开，准备随时救人。车站内外到处是身着制服或便衣的警察。

日语中，"便衣警察"叫"私服警官"。"私服"指不穿"公家"的工作制服，穿自己的平民百姓衣服。警官不穿制服而换上平民服装，目的在于混迹于百姓之中不易被发现，便于他们开展"工作"[1]，可日本的警察太敬业，即便他们装扮百姓也"装不像"，他们的"外包装"与行为举止严重不符，矛盾的表象总将他们的身份暴露。

车站内平日里总有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们身背一个大袋并不时埋头翻腾车站里的垃圾箱，每当发现所需物品，他们就立刻会将其收入自己背着的大袋之中。可今天这些人全无踪影，埋头翻看垃圾箱的，竟然是西装革履的"体面人物"，他们只翻不拣。还有一些人，电车进了站，他们也不急于进入车厢，而是站在站台上东张西望，待一列电车车门关闭驶离站台后，他们又将目光转向另外一列电车。即将开行的电车上，正对入口的座位处也坐着身体壮硕的人，他用鹰一般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匆匆赶车的乘客。日本人常常自嘲患有"视线恐怖症"，即便是熟人之间闲谈，说话时也尽可能避免与对方视线碰撞。陌生人之间就更会竭力回避对方视线，偶尔双方目光相遇，日本人也会像触了电似的，瞬间将视线转移。电车里，很多人要么闭目养神，要么盯着车内悬挂着的广告，要么看书、看报，总之，将目光固定在某个事物上，避免与他人视线碰撞。而今天的站台上、车厢内，不但有人不断地盯着他人看，而且还在车厢内来回走动盯着人看。坐在正对车厢门位置上的人，盯着每个进入车厢的乘客，可在即将发车的铃响之后，他又突然从座位上弹起，跳出车厢回到站台，接着再钻进另外一辆待发车的车厢。

这就是"矛盾的日本人"。警察想装扮成平民，可又太敬业，一下就露出破绽，暴露出他们是有备而来、负有使命的"工作人员"身份。或许当日情况特别紧急，"便衣警察"对自己今天是"私服警官"已全然不顾了。

下午再次经过涩谷回家，看见车站内外恢复了往时的嘈杂，车站外面的马路上，依然有很多不同目的的人物向过往行人派发各种宣传品，其中还有身着兰色衣服的奥姆真理教成员。因为对这种场面已经太习以为常，也就没有在意，只顾埋头

“空中悬浮”的麻原彰晃

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3人死亡及约6300人受伤。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虽然在第一时间被日本警方缉拿归案，但由于麻原及奥姆真理教的背景异常复杂，使得这个虽已被判死刑的家伙迄今尚未被正法。



赶路回家。当天感到有些头痛，喉咙很干，眼睛不适，但根本没有将这些症状与当天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

晚上回家再打开电视看才得知，上述症状或许与东京地铁内的“不明气体”有关。因地铁四通八达，“不明气体”会沿着隧道跑，虽然它在流动过程中会不断被稀释，无法致人于死地，但仍会令人不适。还有，当日中午在涩谷警察云集，据说是因为有人报警，说在车站内发现了可疑物品。因该地人流密集，所以来了很多警察，从天上、地上、地下，展开了立体搜查以防不测，最后证明是一场虚惊。

3月20日，震惊世界的奥姆真理教地铁内投毒事件就这样悄然地拉开了帷幕，从此开始，东京到处草木皆兵，直到后来教祖麻原被捕，“奥姆真理教”一直是电视中的主角，每天不同电视台的不同节目几乎都有奥姆成员作为嘉宾出演，没有任何电视剧、电影会比“奥姆真理教”更惊心动魄、曲折离奇、出人意料。好似中国的章回小说，有关“奥姆真理教”的节目内容每天更新，相互联贯又自成一体，高潮迭起，悬念不断。盲人教祖麻原本人也频频出现在电视上，实际上，与其说麻原是电视节目中的一个角色，不如说他是所有一切的总导演，他的弟子们每天在东京乃至日本各地制造各种事端；为追踪这些层出不穷的事件，各大电视台及采访记者疲于奔命。

笔者最初是在“看热闹”，忽然某日“看出了门道”，突然顿悟：原来他们是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人！

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的诸多谜团，往往百思不得其解，这下“奥姆真理教”突然给了我揭开谜底的钥匙，以前的疑惑顿时豁然！



装糊涂的日本人

什么都“不知道”的教主 /////////

麻原被逮捕后，隔三差五地有检察官对他进行讯问。每次他都盘腿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据说他的双目近乎失明，但仍有一只眼睛可以模糊看到，每当他低头闭目时，无人知道他究竟是在偷窥审讯他的检察官，还是真的什么也看不见、只靠耳朵感觉他身边的世界，总之，这个据说可以预测人类吉凶的“大师”，现在却连自己身上明天将会发生什么都无法预测。问他什么他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一概不理。

某日检察官再次问他，是否知道他的信徒参与了地铁内投毒。同样的问题检察官已经重复问过无数次了，可这次麻原突然开口回答检察官的提问。

麻原：你有几个部下？

检察官：我有两三个。

麻原：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

检察官：不十分了解。

麻原：你有两三个部下你都不知道他们每天干什么，我有那么多弟子，他们每天干什么我怎么会知道？

麻原突然开口令检察官兴奋，而麻原开口与检察官应酬，反让检察官陷入了麻原的圈套。麻原对这次问答结果似乎非常得意，再次回到原来不做声的状态。

威胁美国占领军的“武器” /////////

“不知道”（しらない）在日语中是个多义词。

首先，它是“知道”（しる）的反义词，“知道”的否定式就是“不知道”。

“知道”与“领有、负责”同源，后者义为：某个范围内的所有事物都归自己掌控。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意思：（1）统治、治理国家；（2）占有、领有土地；（3）人与物单独属于自己；（4）照顾妻子、情人。

东京都的最高行政领导人就是东京“都知事”；地方的最高行政首脑就是“县

知事”。

“知道”的含义有：(1) 理解事物的内容；(2) 可以分辨事物；(3) 认识、了解；(4) 能预见到、推测到；(5) 经历过；(6) 与某一事物有关、相涉。

否定用法的意思为：(1) 不理解、不知道；(2) 无法预见；(3) 不曾经历过；(4) 没有参与、无关；(5) 与己无关都是“不知道”。

因“我不知道”有“我不负责、不再担责任”的意思，因此它可转用于“威胁”“警告他人”。意为：“我明明知道，但是我‘装’不知道，我会放任事件发展。”比如A家的孩子经常受其他孩子欺负，这时A家长警告欺负人者：“如果你往后再欺负我的孩子，那么今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咯。”

这时的“不知道”就是一种警告，它的意思是：“我通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我警告你，如果你今后仍继续原来的行为，无视我对你的警告，那么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与我无关，我再也不管了。”

“再也不管”实际上就是“我对今后一切概不负责”，“我本人不再出面，但一定会有更强有力的人出来收拾残局”的意思。换言之，今后将会出现一个我明明知道但是我“装不知道”的局面，现在是口头警告，今后将不再有语言，只有行动了。你必须对今后发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你应该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中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代表签署了投降书。美国占领军决定从次日开始对日本实施军事管制，美军已经完成了包括发行军票在内的所有准备。美军在日本发行货币，意味着战败政府将失去赏罚权。用货币去购买武士生命，让武士充当杀手蛮干，这是日本统治者千百年来乐此不疲的惯用手段，不掌握货币就无法找到卖命者，为此，战败内阁成员紧急与美国占领军交涉。9月3日早晨，外务大臣重光葵，也就是前一天拖着一条残腿，依靠拐棍摇摇晃晃爬上美国军舰，代表日本政府签署了谁都不愿意签署的投降书的政府代表，匆忙赶到横滨去见麦克阿瑟，重光称，“如果美国要强制推行军票制度，那么日本政府今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时的“我不知道”就是“今后所有的事都你们自己去管吧”。重光同时强调：日本还有300万军人尚未复员解散。两句话加起来就是：今后你们美军自己看着办吧，300多万未复员军人可不是省油的灯。

麦克阿瑟对重光“我们不知道”的发言非常愤怒，认为这是战败国威胁战胜国。

麻原说“我不知道”，既可理解为“我没参与”，还可解释为“你们等着瞧吧”。





推卸责任的借口 //////////

“知道”最初起源于“统治”“控制”，因此它是“领主”的常用词汇，它的否定形“不知道”有“我没有参与”（不“关知”）之义。多义使它成为日本各级领导人使用起来最方便的一句台词。威胁他人时可以用;推卸责任、“装糊涂”时同样可以用。

“不知道”用于事后表达时，最方便逃避责任，将应负责任粉饰为一种遗憾，“我知道，但我无法控制局面，我没办法管”；或者“假如我知道真实情况，事态就不会这样无法收拾”。这时“我不知道”有“真不知道”与“装不知道”两种解释，无论上述哪种解释，“我知道就可以控制局势”的前提是:一切都在我严密控制之下，因此，“我不知道”只能是“装不知道”，威胁时是“我不管了”，推卸责任时是“下面人应负责”。

1862年8月21日，萨摩藩武士在横滨生麦杀死了来日本旅游的英国人。这是萨摩藩故意挑起事端，用擅自“攘夷”让幕府陷入危机的事件。

这次久光离开萨摩前往江户，表现出了历代大名从未有过的豪迈。首先，他率兵进入京都属严重违规，可幕府对此也无可奈何;其次，他要求京都朝廷派遣代表与他一同前往江户，此事也如愿以偿。还有，他提议为“安政大狱”中受到处罚的德川庆喜、松平庆永“平反”。幕府虽然勉强但最终同意让庆喜出任“将军后见”[2]，庆永出任“政治总裁”。“外样”并且还不是藩主大名的久光可以对幕府“指手画脚”，幕府竟然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让久光倍感扬眉吐气。要知道200多年来，从来都是“外样”对德川家幕府事事说“哈伊”。

当大队人马走到现在的横滨市郊的生麦时，偶遇从上海及香港来日本旅行的四名英国商人。四人骑着马，停在路边观望久光的队伍。这时，从久光队伍中冲出两个武士，挥刀砍向毫无防备的英国人，英国人在慌忙逃跑的过程中，一个落马后被立刻砍死，另外两个受重伤逃离，唯一的一个女性无恙。

事件发生后，英国要求幕府赔偿10万英镑，萨摩赔偿25000英镑，还要求捉拿凶手并加以惩处。对于英国方面提出的要求，萨摩方面的回答极具日本特色:

事件绝对不是针对外国人的，比如说，日本人如果遇到大名队列不礼让的话，将会被护卫武士格杀勿论。外国人“不了解”日本习俗，如果“了解”日本文化，依照日本的惯用做法行事，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惨剧。“生麦事件”与其他个别武士袭击外国人的事件性质不同，护卫武士杀人并不因为对象是外国人，而是有人对大名队伍无礼。它不是“攘夷事件”，仅仅是一个偶发的不幸事件。[3]

无论是幕府还是萨摩藩，先批评英国“不知道”日本的习俗，然后各自都用自己“不知道”来搪塞。“不知道”究竟是说“我没指使”还是说“我没干预”，这些都属“不知道”所涵盖的范围。在日本，当下属“出事”时，上司不惩罚就是指使；不制止就是鼓励。“部下”从“上司”的眼神中就可以“以心传心”。武士讲道理就是胡搅蛮缠；他人对武士讲道理，武士会认为你“黔驴技穷”。

对于英国提出的要求，幕府最初以“将军及幕府重要领导全不在江户，现在无法回答”为由敷衍，但到 1863 年 5 月 9 日，突然以负责外国事务的小笠原长行个人“独断”的方式，依照英国要求赔付了 10 万英镑。5 月 10 日(1863 年公历 6 月 25 日)，是幕府、诸藩国及朝廷决定的共同攘夷最后期限日。此后长州藩向停泊在下关水域的美国商船突然开炮。

幕府用“我不知道”，也就是“我再也不管了”的[4]方式，让“外夷”直接去找下级藩国。为久光担任护卫、当时就在队伍中的松方正义，在他后来的自传中回忆道：“当时久光正在轿子中，我将情况通报给他后，他将佩刀上的安全栓拔掉，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样，态度非常从容自若”。

《萨摩海军史》则记录：“当得知英国军舰要来萨摩报复的时候，久光将砍杀英国人的两个武士唤至自己面前说：你们俩杀死了英国人，这次他们前来寻仇报复，你们必须勇敢杀敌，把他们的军舰抢下来，展示藩威。现将捕获英军军舰的大任交给你们两个勇士去完成”。

收到幕府的赔偿金之后，原本在江户湾集结，准备攻击幕府的 12 艘英国军舰转向萨摩藩，7 月，英国军舰进入鹿儿岛湾。战斗仅进行了半天，萨摩遭受重大损失。日本武士对强者的态度非常现实，看到打不过对手就立刻投降并鞠躬，英国军舰撤退。9 月，萨摩从幕府那里“借钱”支付了赔偿，在谈判桌上，萨摩要求英国谈判代表为萨摩购买英国军舰斡旋。谁能把武士的脑袋按下去，武士就会对谁说“哈伊”。

日本是个“严格管理”的“纵向”的国家，“上”对“下”的行为，默认就是鼓励。日本武士只信服“强弱”以及由此导致的“胜败”。日常生活中，两个小孩打架，偏心的日本家长通常会躲在远处偷窥，看到自己孩子能打赢，家长就悄然离开现场，一付“我不知道”的态度；相反，看到自己孩子被痛打，家长立刻出来阻止，突然变成“我知道”。这时的“知道”是“我参与”“我制止”，家长出来是为了避免自己孩子“吃亏”的“干预”。

“罗生门”式的日本政治

1915年，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罗生门》，1921年发表了《树林中》。二战结束后，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将芥川的小说合二为一，将《树林中》的内容嫁接到《罗生门》名下，出品了名为《罗生门》的改编电影，该片于1950年公演，1951年获得第1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第24届奥斯卡荣誉奖(最佳外语片)。

影片的头尾是几个人在“罗生门”下避雨，其间谈论发生在“树林中”的一桩凶杀案。樵夫向“捕快”报告，他在树林中发现了一具死尸，围绕死者的死因，相关人员被捕归案后各有不同的说法。

强盗多襄丸对自己杀人劫色供认不讳。据他交代：“先谎称树林中有财宝，以此将一对夫妻中的武士丈夫诱骗到偏离了大道的树林中，趁武士集中精力搜寻并不存在的财宝之时，我突然将武士打翻在地，然后将其捆绑，并将树叶塞在他嘴巴里，让他无法叫喊，接着我又将妻子骗到丈夫面前，将其奸污。我最初并不想杀人，只想占有漂亮的妻子，可后来该女子死命哀求，说当着丈夫的面被奸污已无脸做人，她只能跟一个人走，让我们两个男人决斗。我遂为武士松绑，然后我们俩开始用大刀厮杀，经过30多个回合的厮杀，武士男人因武功不如我而死在我手下，再去找那女子？她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而武士妻子真砂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在丈夫面前被强暴后，强盗逃离了现场，我用短刀将捆绑丈夫的绳子割断，可他那极度蔑视我的目光让我无法容忍，我决定杀了他再自杀，与丈夫一起离开人世。我用一把短刀将丈夫刺死，后尝试用刀刺、投水等各种方式自杀，可几次都没死成。羞辱啊！”

这时，死去武士的灵魂复活，借助女巫之口说：“强盗凌辱了妻子后，对她花言巧语，说跟他走可以保证她荣华富贵，这时真砂竟然相信了强盗。真砂提出跟强盗走之前要将我杀掉，趁强盗犹豫，真砂突然跑走了，强盗去追也没追上，强盗转身回来，割断了捆绑我的绳索，然后溜之大吉，我觉得耻辱，拣起真砂留下的短刀，一刀刺入了自己的胸膛。这时我看见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将短刀拔出，我因此断气。”

武士说自己自觉“耻辱”而“愤然自杀”，而妻子真砂则说“我杀死了他”，强盗却说“武士败在我手下”。

一时间真假难辨，不知他们三人中哪个人的话是真话。第一个在丛林中“发现”尸体并通报给当局的是樵夫，虽然樵夫以通报人身份声称自己事后到达现场，可他实际上是揭穿谎言的关键人物，但他也没有说出真相。之所以隐瞒真相，是因为他

将现场留下的短刀据为己有，说他是“趁火打劫者”也不为过。包括死去的武士在内，每个诉说“真相”的人，实际上都是“说谎者”。他们在美化自己的同时，将自己丑陋、卑鄙的一面掩盖。

黑泽明将芥川小说《树林中》中的“真假难辨”故事，移接到雨中的“罗生门”[5]下，有三个人一边在罗生门下避雨，一边说论“树林中”事件。这时忽然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三人中的一人跑去看的同时，开始剥下这个被遗弃的婴儿身上的衣服，樵夫良心发现，喝住了抢夺者，而抢夺者反唇相讥樵夫是个伪善者，因为樵夫在慷慨陈述他看到的树林中事件过程中，无意中暴露出他本人实际上偷拿了刺入武士胸上的短刀，而这加速了武士断气。被指责的樵夫面带羞愧，但他仍毅然抱着婴儿离开了“雨过天晴”的“罗生门”。

黑泽明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获奖，毫无疑问，首先是因为芥川的《罗生门》《树林中》写得好；其次是黑泽明将其改编、用视觉图像将文字的小说演绎得好。如果说明治后日本崛起让整个世界认识了日本的话，那么全世界对日本认识，概而言之就是“掠夺”与“谎言”。为了将自己的强盗行径正当化，日本统治者一直在编造各种谎言，欺骗本国国民和全世界，“liar”（说谎者）成了日本统治者的代名词。与其说国际社会高度评价黑泽明的电影艺术，不如说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了来自日本社会内部的深沉反抗，也就是说，在日本统治者高调欺骗全世界之时，日本国内依然存在像芥川龙之介那样的深刻的思想者、文学家，他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揭露日本社会中存在的“谎言问题”。

如今，大部分人只知道电影“罗生门”，而且它已经成为“真假难辨”的代名词。而在芥川的小说中，《罗生门》介绍将“以强凌弱”正当化的强盗；《树林中》描写“密林”并非是阻隔真相的障碍。

尽管日本因二战投降使强盗行为受到制止，可“究竟谁说的是真话？”这一“罗生门”问题至今仍在困扰日本。小说家、电影人，所有人都期待着带走“真相”的樵夫能够早日“重返人间”。

《树林中》向世人推开了一扇了解日本社会特点的窗户：透露出来的内容往往是谎言。

电影中的四个相关人物，人人都慷慨激昂，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将谎言编造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每个“大言不惭”的故事，都将自己美化成为“英雄”，“谎言”就存在于细节中。对外披露越详尽的部分，往往就越是谎言充斥的部分，这是透露者为了掩盖真相，有意将外界注意力吸引开的欺骗伎俩。偏离关键的“废话”极多，而涉及核心、能够几个字就说清楚的部分却简单带过，甚至根本只字不提。



在日本近、现代史中，“天皇制”就是最大的“罗生门”故事。

日本最早的古书是《古事记》和《日本书记》，分别成书于公元712和720年。在此之前有关日本的记录都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中，虽然公元前后中国典籍中记录的日本历史客观公正并有说服力，可日本人并不愿意承认或接受。有关“天皇制”以及“三种神器”的记录，就出现在日本的两部史书之中。

话说一对姐弟伫立在天浮桥上，将长矛插入大海，搅动后将长矛提起，矛尖处滴下来的盐水干燥后就变成了日本岛。姐弟俩随后降临到盐水滴出的陆地上，近亲结婚后生育出了山川草木，然后又生下众多子孙。姐姐是天照大神，弟弟是暴风神素盏鸣尊。弟弟要争夺姐姐的权力，天照大神因此躲进了山洞，从此天昏地暗，800万众神商量如何将天照大神请出来，他们在洞前的神树上悬挂了“玉”与“神镜”，然后在洞外起舞吸引天照大神，呆在洞里的天照大神听到外面热闹，禁不住露出头来想看个究竟，没想到被守候在洞外的一个神一把拽了出来，此后岛上重见光明。暴风神素盏鸣尊后被流放到岛根的出云，他在那里杀死了祸民的大蛇，从蛇尾中获得了“宝剑”，他将“宝剑”献给了天照大神，天照大神自此具有了“三种神器”。依靠能给岛国带来光明的独到能力，天照女日神获得了位居于800万众神之上的“大神”地位，这是她支配岛国的“合理”依据，而她的子孙则通过继承神器，拥有对日本继续支配的权力。

“玉”是神玺的起源，“铜镜”是天皇与天帝沟通的神物，而“剑”则是武力统治

浮世绘——日本的始神天照大神

日本是一个多神且不乏神话的国家，这样就使得日本人的精神信仰实际上处于松散状态。代表着天皇始祖的神祇天照大神出现后，以太阳神为万神之长的地位，成为日本民族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神。也正是这样，才让对天皇的那份盲目崇拜一直延续到了近代。



的象征。史书中说“神器”与天皇须臾不离，可后来又说第10代天皇将“剑”移到热田神宫，宫内只留下复制品。第12代天皇携“剑”东征，后天皇被大火围困，他挥“剑”斩草脱身。据说此后“剑”一直被安放在名古屋的热田神殿中，可这个神殿后来被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焚毁，“剑”早已变成了一块金属疙瘩。

“玉”原本最轻又好携带，一直在天皇身边，可后来“源平”[6]武家争夺天下，平家劫持了安德天皇，据说为了躲避源家的抢夺，年幼的天皇在1185年抱着宝箱投海，与“玉”同归于尽。可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安德天皇本人的确沉入了海底，可装“钩玉”的箱子浮在海面上，被追兵拿获。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箱子，或许发现了箱子里空空如也，最后不得不找了块“石头”充当替代品。

“神镜”从天皇身边移开后就安放在伊势神宫中，第10代天皇——崇神天皇将它转移到大和；第11代天皇再转回到伊势。在天皇身边的那个“铜镜”是复制品，可神宫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火灾，公元960年、1005年、1040年都发生过大火，按理说“神镜”早应在火灾中变成了金属块。

日本宣布投降后，如何安置“神器”让皇室伤透了脑筋，为防止占领军看到“真器”，宫内省总务局长加藤进提议加造“神器”，通过“以假乱真”带来“乱以真假”“以乱真假”的效果。

总之，“神器”的来历、去向、最终结果，都是“罗生门”问题。岂止“神器”，围绕与天皇有关的一切都是“罗生门”问题。透露给外界的，都是“真假难辨”需要“樵夫”来说明真相的问题。

祭祀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中有一幅壁画，壁画中的一个画面是明治天皇1883年探视病危的岩仓具视。壁画上明治天皇站立在病榻侧，岩仓拜伏在病榻上。

有好事者为这个场景配上了以下对白：

明治天皇：“具视，怎么样？”

拜伏在病榻上的岩仓：“哈伊、哈伊。”

“怎么样？”在此时是一个双关语，既可以解释为明治天皇关心岩仓病情的探视问候；还可以因为语调上升表示一种轻蔑：“怎么样？看我们究竟谁可以笑到最后？”

显然，编造对白者选择的是后一个解释：我笑到了最后！岩仓浑身颤抖，在不断的“哈伊”声中气绝身亡。

能为壁画配上如此对白绝非偶然，它实际上反映了幕末到明治之初的、有关天皇的“罗生门”故事。

岩仓具视出身于京都的下级贵族家庭，在建立新政府中过程中，他立过“大

功”，而他的“大功”恰恰建立在“大恶”“大奸”之上。萨、长武士认为孝明天皇是他们推翻德川家幕府的障碍，希望将他“除去”，岩仓利用他妹妹在孝明天皇身边工作之便利，暗杀了孝明天皇，岩仓因这一功劳在新政府中获得了高官地位。

明治天皇与岩仓之间有杀父之仇，可从成败角度而言，孝明天皇不空出位子，明治天皇也就无法即位。岩仓切断了孝明天皇与末代将军庆喜之间的联系，同时成为萨、长武士与新天皇之间联系的桥梁。孝明天皇的死因是明治天皇的难言之隐，同时也是他的前车之鉴。孝明天皇的死因和明治天皇究竟有多大权力，这些都属于“罗生门”问题。

对外透露的有关大正天皇的内容，除了说他有特强的生育能力、给明治天皇[7]生育了四个健壮的孙子之外，其他内容多是负面的。

他“整天追逐女色，皇室的记录簿都很难记录他每日的行踪”；虽然身体强健，但儿时曾患过脑膜炎，即位后就开始发作。他会经常骑自行车在院子里乱转，常会从行宫里跑到街上，元老、首相、重臣来向他汇报工作时，他会将桌上的香烟抓起一把说：“你辛苦了，请抽烟吧。”他会无缘无故发脾气，用马鞭抽打侍从；在检阅军队时，会突然从检阅台上跑下来，打开士兵的行囊，看里面究竟装了什么。1915年议会开会的仪式上，他将诏书卷成圆筒状当单筒望远镜用，对着议员和前来观礼的外国使节张望。

“异常行为”究竟与“大脑有毛病”有关，还是他不相信任何人的“怪异行为”与他觉得身边的人都在“欺骗”存在因果关系？一切都要等“樵夫”来。[8]

明治天皇在位时间长达44年，大正天皇因此迟迟不能即位。与明治天皇16岁即位相比，大正天皇33岁登基。一个年富力强又知道一切的天皇即位，肯定会与操纵者之间爆发冲突，最后结果只能以胜者公开的内容为准。从历史上看，大正天皇“病情加重”是与皇太子的成长同步的。皇太子裕仁1914年离开学习院，进入皇宫内的“皇家学问所”学习，1921年刚满20岁时出任摄政，五年之后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正式成为昭和天皇。

大正天皇总在远离东京的别墅中“休息”；明治天皇常在乡间靠骑马“发泄精力”，唯独昭和天皇与祖父、父亲不同，介绍昭和天皇的内容，也是一个公式化的内容。战前说他是“新时代的太阳”，能为日本带来曙光；战败后的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走路不稳、说话吐词不清”的“小老头”，20世纪50年代后介绍他是“勤奋的生物学者”。

他打学生时代起，就严守每天早晨6时起床的习惯，直到正式成为天皇时为止，每天学习都排得满满的。父辈只学习如何作和歌、汉诗，而他所受教育是如何当君

王，尤其侧重学习陆、海军的知识，从如何使用各种枪支到整个军队如何编制、运作，假期还到各兵工厂、陆海军基地、军营里视察。

1926年底结束摄政即位后，昭和天皇从离宫搬入皇宫，每天的生活非常有规律:6点左右起床，刮脸穿衣，接着向安放祖宗牌位的伊势神宫方向祷告，早饭前会坚持散步，7点准时与夫人良子皇后共进早餐。吃的也很朴素，有麦片、鸡蛋、熏肉、烤面包等。早餐后就开始阅读当天的报纸，接着召见内大臣、也就是他的政治顾问。昭和天皇最初的内大臣是牧野伸显，他是明治一新功臣、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于1935年底以身体健康不佳为由辞去内大臣职务。

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是昭和天皇公务最繁忙的时候，中午12点半短暂用餐并休息，接着就是不断地接见各路大臣。他是海、陆军大元帅，对军务非常关心。下午2-4点锻炼身体，主要是打高尔夫球，4点开始沐浴，此后再开始在公文上盖章，6点之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吃晚饭，然后轻松地看些书。

昭和天皇之下，每个人物都是来找他“论功行赏”的，他们“追逐名利”，唯独昭和天皇是一个衣食无忧的超脱人物，这样一个人物，如此忙碌究竟是为了什么？日本战败投降原本是破解“罗生门”的大好时机，可昭和天皇后来却说：干预朝政仅仅只有三次，一次是1929年斥责首相田中义一，还有一次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再有一次就是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其他都是在臣子决定上“盖章同意”。

1926年底昭和天皇即位，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后者召集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他向昭和天皇提出了著名的《田中奏折》，据说该“奏折”是牧野伸显有意泄露出去的。牧野的接任者是木户幸一，后者是另外一个“明治功臣”、长州藩的木户孝允的孙子。岩仓的后代中没人成为大正、昭和天皇的重臣，牧野虽是，但他后来被少壮军人视为昭和时代的“岩仓”。至少公开的历史内容表明，明治天皇从未对“忠臣”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发过脾气，可昭和天皇1926年登基后不久，就对首相田中大发雷霆，而且一发脾气就将内阁推翻。

以前是“忠臣”杀“天子”，大正时代天皇在位九年，五届内阁中有两个首相死亡，桂的死因可疑；原敬被暗杀。裕仁自1921年底出任摄政后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时为止，十一任首相中有七人死亡，包括大正天皇与臣子的死因问题等，都属于“罗生门”问题。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即位，日本史书将这一时期规定为“大正民主运动时代”，标志是开始了政党政治，压制天皇专制的“天皇机关说”也应时而出。可到了1935年，“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9]2月18日在贵族院会议上公开指责“天皇机关说”，说它“亵渎国体”“紊乱国宪”。在昭和时代“鞭”明治、大正之交时代的



“尸”。后来检察机关传讯“天皇机关说”的提出者美浓部达吉，内务省禁止销售他的书，他不得不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后，还被右翼分子枪击负重伤。

1932 年“五•一五事件”后，《信浓每日新闻》甚至刊载了这样一篇文章：[10]

大白天，枪杀了一国之首相。让行凶者在京城徘徊的人物，竟然可以作为继任内阁首相窃笑。

凶手出自该“责任人”的管辖之下，而该人物竟然连“对不起”都不说一句，他竟然继续对组建继任内阁指手画脚。

这种空前绝后的不可思议，日本国民竟然不觉奇怪，没有比日本更混乱的国家了。

连大臣的脑袋都不保，国民的脑袋还有什么可说？国民的脑袋只能是庭院中的西瓜或萝卜。

1932 年 5 月 15 日，犬养首相在光天化日下被海军将校枪杀，继任首相竟然是行凶者的上司——海军大将斋藤实。[11]

内大臣牧野 1935 年底辞职，1936 年再次爆发更大规模的“清君侧”的军事政变，牧野险些被枪杀，昭和天皇称这次事件是在他的制止之下终结的。

不但昭和时代的上述几个重要事件是“罗生门”式的“糊涂账”，而且昭和天皇在战后的说明让上述事件愈发“糊涂”，甚至连昭和天皇拜访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时的谈话，也至今仍是“罗生门”问题。

透露出来的、有关昭和天皇的内容是：他严守一夫一妻制，没有像祖父那样一夫五妾，也没有像父辈那样无所事事，他是一个对生物学孜孜追求的科学家。可勤奋及道德榜样之宣传，对破解如何发动了那场战争的“罗生门”疑惑并无任何帮助。自从裕仁即位后，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死了那么多人，祸乱了半个地球，世人期待昭和天皇当个“樵夫”，将



海军大将、第 30 任日本首相斋藤实

首相被暗杀，继任者是刺客的上司，这其中的“罗生门”真相到底如何？只能借用 1994 年美国辛普森杀妻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真相说明，可在战争结束后的40余年中，他继续在位，但最终将真相带入了坟墓。

“罗生门”问题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大逆事件”究竟是人为制造还是真有其事？“虎之门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12] 整个世界都在等待日本的“樵夫”。

过了河就把桥拆了

村井秀夫——一头“卸磨驴”

村井秀夫（1958-1995）1977年考入大阪大学理学部，本科毕业后直升研究生，毕业时进入日本“一流”企业“神户制钢”。其间他结婚成家，过着“一流大公司”普通职员的平静生活。可他对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现状不满，从最初被麻原的所谓“超能力”吸引，到1987年最终加入“奥姆真理教”。

“沙林”于1939年由纳粹科学家首先研制出来。麻原组建“奥姆”后不久，就在自己的基地内建立了工厂和实验室，自己生产枪支和生化武器。麻原用“论功行赏”引诱年轻人，为了吸引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远藤诚一加入“奥姆”，麻原为他建立了一个以远藤命名的实验室，远藤在该实验室中合成出了“沙林”毒气并因此升任奥姆的“厚生大臣”，远藤是制毒者，而幕后积极推动并且直接指挥的，则是“科学技术厅大臣”村井秀夫。

1995年3月20日，“奥姆”在东京地铁中散布毒气，3月22日开始，日本警察对“奥姆”的几个重要据点同时展开大规模搜查。1995年4月23日，村井与其他几个在东京的“高官”受命前往山梨县上九一色村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后，一反大家一起返回的常态，村井一个人被落到了最后头。下午8时左右，当他匆匆赶回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教团东京总本部时，一个在入口处守候已久的青年突然从手提箱中抽出一把利刀，迎面冲向村井，对准他的腹部就是一阵乱捅，被捅倒的村井立刻被送往东京都广尾医院，次日（24日），医院宣布村井因抢救无效于零时23分死亡，死因是“出血性休克引发急性循环不畅”。

1960年10月，在日本东京日比谷公会堂，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浅沼稻次郎（1898-1960）正在主席台上演讲，一个17岁的青年突然冲向主席台，在众目睽



睽之下，手持利刀将浅沼刺杀。

1985年6月18日，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亿日元的日本丰田商事会长永野一男（1952-1985），也是在众多电视台、报社记者在场的情况下，被冲入室内的两名凶手用利刀刺死。

几宗离奇事件的类似之处在于：这些刺杀都发生在警察的严密警戒之下。

“奥姆真理教”因被警察搜查，东京总本部附近一带早就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现场除了警察、便衣警察以及衣袖上戴有报社、电视台袖章的记者之外，一般人几乎没有可能进入现场，而杀人凶手却可以。从后来回放的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杀手早早地进入了现场。好几个“奥姆”的重要干部均先后从外面回来并从他面前走过，可他都毫无杀意，直到村井到来，他才毫不犹豫地手握利刃奔他而去。可见他对要杀谁目标明确，另一方面，让村井一个人迟迟而归，似乎就是为了让“下手人”有机会“下手”。[13]

村井加入“奥姆”之后，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既是主谋又是主犯，因此属于“奥姆”的重要“防护对象”，另一方面，警察也知道他是揭开“奥姆”秘密的重要人物。可他不但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被刺，而且送进医院之后竟然不治身亡。依照当时的医疗技术，一般的刀伤不可能抢救不过来，日本警察让村井死在医院里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事件发生后，“奥姆”的广报部长[14]上祐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村井在弥留之际说：“一定是犹大干的。”上祐称他是在救护车上听到村井讲这句话的。村井的遗言表明，村井判断凶犯来自“奥姆”内部，他被自己人（犹大）所杀无非是为了灭口。

据29岁的韩国籍日本人徐裕行交代，他受人指使前来杀村井。警察事后发布消息称，徐属于一个名为“神州士卫馆”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直到这次事件爆发后才首次被知晓。警方称该组织从属一个名为“羽根组”的黑社会组织，而“羽根组”又是日本著名的黑社会“山口组”的下级机构。在审判徐裕行的法庭上，他供述受“羽根组”若头[15]的指使行凶，而后者矢口否认，最后法庭判处徐裕行有期徒刑12年，“若头”无罪。法庭完全采信了若头“没有指使徐裕行杀死村井”的一面之词，对这样一起重大杀人案件，在许多事情还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轻易地结案了。

“奥姆”对待这个“功臣”的手段也非常奇特。4月24日开始，教团将事件发生现场变成了一个舞场，由教团中的年轻男女接连10天在此翩翩起舞，据说他们要用这种方式纪念死去的村井。村井说凶犯来自自己内部；而教团要用行动洗刷自己，除了谁也看不明白的跳舞祭奠外，“奥姆”还立刻发行了一本名为《巨圣殒没！悲剧天才科学家村井秀夫》的纪念漫画专集，它用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表彰、赞

美村井的所谓“科学功绩”。

任何社会都存在底层，可日本的有钱人往往要利用底层之贫困，用突然给他们一大笔钱、购买他们未来的方式，让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去铤而走险。任务完成且没有败露的话，被收买的“杀手”就可获得足够终身享乐的酬劳；失败或败露，该人物则将作为赌注的身体赔掉，自杀或坐牢。

“一新”后成为新政府领导人的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最初都是作为“下手人”出道的，曾支持过孙中山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也是从日本政府那里领取活动经费的“下手人”。每次领到活动经费后，就以妓院为据点，在那里解决吃喝、肉欲问题，然后开始活动。

无论战前还是战后，“下手人”都是贫穷的年轻人，他们甘当“下手人”的动机十分单纯，都是为了“迅速脱贫”，他们只管“收钱”后“下手”，只有雇主才会对象及动机都明确，这些通常会在事后宣布“下手人”所属中流露出来。事发后通常会有人主动宣布“下手人”属于某个团体或组织，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传所属，一方面通报“下手人”是“独断”杀人，另一方面说明他为组织“献身”，让他个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将所属集团的追求透露出去，以此恐吓、威胁其他人。[16]

坂本龙马，你知道的太多了 //////////

1867年11月14日夜，在京都的一个旅馆中，土佐藩士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被杀。这天正好是坂本龙马33岁生日。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曾积极参与萨摩、长州反对德川幕府的活动，是促成“萨长同盟”及将军庆喜“大政奉还”的功臣，在日本走向何方的歧路上，他俩却倒在了暗杀者手下。许多证据表明，“下手人”并非受雇于幕府，而是受萨摩藩指使。坂本与中冈知道萨、长两藩内部机密太多，在“武力推翻幕府”还是与将军组成联合政府的选择面前，他们反对爆发内战，因此遭到“武力倒幕”派的仇视。

坂本龙马1835年出生于土佐藩，该藩位于现在的四国，属高知县。在“黑船”1853年进入江户湾的3个月前，1853年3月，年仅19岁的坂本龙马离开故乡来到江户，此行目的是为了进行剑术交流。与“一新”中的其他下级武士相比，他家的俸禄一年有161石之多，其零头比西乡、大久保两家的总和还多。他不顾藩主颁布的“节俭令”，前往江户时没有按规定穿草鞋，而是穿着木制的拖鞋。到达江户之后，他住在江户的土佐藩邸[17]，刚安顿下来没多久，“黑船”现身于江户湾，连他这样的外来访客也被幕府临时紧急招募，按照幕府的命令，他在品川执行警备任务，

同时开始在这里紧急修建炮台。

佩里离开江户后，幕府要求各藩提出应对“外夷”对策。土佐藩藩主山内丰信向幕府要钱购买轮船、枪炮，同时要求取消“参勤交替”[18]，以减轻藩国的经济负担。1854年6月，坂本从江户返回故乡土佐，11月4日，日本遭遇东海道地震，11月5日，坂本的故乡土佐发生地震，两次地震都达到了8级。根据史料记载，江户、土佐的死亡人数分别是2000和1000多人。次年（1855年、安政二年），江户再次遭遇江户大地震，这次7级地震造成了4000多人死亡。日本人认为“外夷”到来引发了天灾，多重打击让整个日本笼罩在一片惶恐之中。

1854-1856年的两年间，坂本一直呆在土佐。这时他听到了中浜万次郎的故事。中浜万次郎也是土佐藩人，1841年随父亲出海捕鱼时遭遇海难，被美国捕鲸船救起后被带到美国。在那里，中浜万次郎接受了美国教育及航海训练，1851年回国，他带回了让藩主以及幕府震惊的外国的消息。

1861年8月，土佐勤王党在江户诞生，1862年后，坂本脱离土佐藩成为浪人。依照幕府规定，脱藩属于重罪，家庭成员必须连坐，住房、财产都要被没收，可他宣布脱藩后并未受到处罚。可见他宣布脱藩只是为了避免连累本藩，实际上是作为土佐藩的在外耳目活动。脱藩后不久，他就获得了松平庆永[19]的接见，通过松平的介绍，坂本转投胜海舟门下。胜海舟于1860年曾作为遣美使节船的舰长到过美国，亲眼目睹了美国的强大。他反对贸然与“外夷开战”。原准备刺杀胜海舟的坂本，从积极主张“攘夷”变为折服胜海舟的思想，他开始在胜海舟手下学习航海，其间还曾见到过将军德川家茂。在家茂的认可下，1863年4月，幕府决定成立海军操练所。该操练所于1864年2月竣工，可八个月后的10月份就解散了。在海军操练所期间，他结识了西乡隆盛[20]。

1864年10月，幕府解散了胜海舟主持的海军操练所，萨摩藩看中了坂本会驾驶汽船的一技之长，依照萨摩藩实际领导小松带刀的指示，西乡让坂本穿上萨摩藩藩士的服装，发型也改变成萨摩藩藩士的式样，先后藏身于萨摩在大阪、京都的藩邸中。

1864年底幕府发动了首次“征讨长州战役”，号称动用了15万人的兵力，最终以长州投降、象征性地自己处罚了几个人物收场。1865年4月，坂本在西乡的带领下前往萨摩藩。江户时代，幕府严令禁止各藩国之间相互来往，藩国为了自保，不准其他藩国人士进入自己的藩国，相互来往也只限于在藩国交界的关卡处见面交谈。此次西乡带坂本进入萨摩藩，显然是发现了他的“有用性”。5月，萨摩藩得知幕府将再次进攻长州，他们立刻将消息泄露给长州，同时，决定再次帮助长州。幕

府攻打长州，双方相互消耗对萨摩有利无弊，萨摩最怕长州放弃与幕府对抗。长州藩为了保全自我，追切需要用现代武器装备自己。以前萨、长两藩是冤家对头，坂本这时成为撮合两藩的中间人，他与另一个土佐藩出身、同样以浪人身份在长州藩活动的中冈慎太郎联系，说服萨、长捐弃前嫌。萨摩在长崎成立了名为“龟山社中”的公司，坂本是社长，该公司的最大生意是将以萨摩名义购买的武器运往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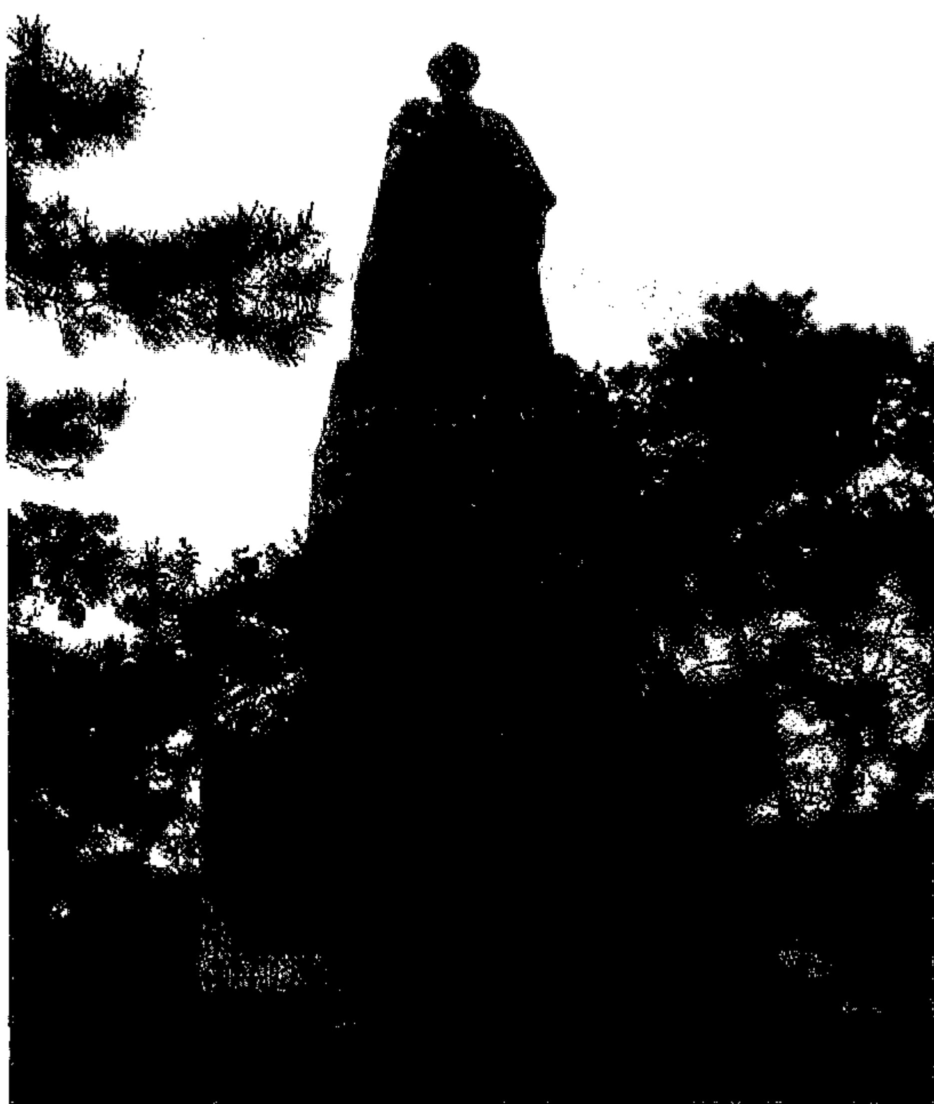
1865年底到1866年初，坂本再次从长崎来到京都。为了让长州下定决心与幕府对抗，在坂本的再次积极撮合下，萨摩与长州签署了“萨长盟约”。[21] 萨摩藩代表是西乡隆盛和萨摩藩家老小松带刀，长州藩代表是木户孝允。见证人是浪人坂本龙马。[22]

在这个盟约的背面，坂本龙马作为见证人写下了背书，“神明为证，无论发生何事，一定守约”。

可在该盟约签署的次日，“下手人”来到坂本在京都的藏身处，若没有长州派遣的警卫奋不顾身地保护，加之坂本有把手枪，他必死无疑。萨摩藩邸收容了受伤的坂本及他的女友龙。经小松同意，西乡2月让坂本带着龙，双双登上前往鹿儿岛的轮船，西乡与小松带刀也同船返回。带上未婚妻乘船海上旅行，在鹿儿岛享受温泉、美食的招待，武士的人生犹如樱花绽放，尽享人间欢乐之后就是凋零之时。1866年6月幕府军开始进攻长州，坂本离开鹿儿岛出征。他率领的“龟山社中”摇身一变成为了“海援队”，他出任队长，在下关参与了针对幕府军的海战，获得大胜。

8月家茂将军去世，年底孝明天皇去世，庆喜也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将军。

经过1864年、1866年两次征讨长州，幕府在藩国中的威信低落。土佐藩主山内丰信、福井藩主松平，都希望建立一个既能避



位于日本桂滨的坂本龙马铜像

坂本龙马为明治一新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后人誉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其后却因政见不同被暗杀于京都。卸磨杀驴这一套，对当时的日本政坛来说，已经不罕见了。

免内战，又有别于以前幕府的新的政治体制，以克服内、外危机。1858年山内也曾受到过处罚，他再也不希望幕府高高在上拥有绝对强权，同时也不希望看到内战再次爆发，他寄希望于新将军“大政奉还”，以此安抚萨、长两藩。1867年4月，坂本恢复了藩籍，藩主山内的主张当然会影响坂本龙马。而这也正是坂本悲剧的起点。

为了迫使将军庆喜“大政奉还”，坂本亲自给将军写恐吓信，警告他若不将“大政奉还”，他将刺杀将军。1867年10月13日，德川庆喜同意“大政奉还”并于次日通报给了天皇。可萨、长并未就此止步，10月14日，岩仓具视等伪造了天皇要求萨、长出兵讨伐幕府的密令，萨、长藩士拿着伪造命令返回各自藩国带兵。

作为“大政奉还”的中间调停与穿线人，他对将军不愿意组建“联合政府”，情愿将日本带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倍感愤怒；而当将军为了避免战争下决心归还大权，他转而对将军仰慕。在将军“大政奉还”之后，坂本公开表示敬佩将军，表示“誓为此公舍命”。

将军希望通过“大政奉还”之退却，换取倒幕派放弃“武力讨幕”，在此基础上组建“联合政府”。萨、长不满足于将军的“大政奉还”，他们要武力推翻德川幕府，而坂本希望建立“联合政府”，双方意见冲突，结果“樱花凋落”的时候到了。

11月15日夜晚，中冈慎太郎与坂本一起，在京都的秘密寓所中被人刺杀身亡。

那些利用与被利用的家伙们

日本警视厅高级警官宫胁磊介与有田芳生[23]在电视上有过以下一段对话。

宫胁：“奥姆真理教”不单有枪等常规武器，还有A、B、C武器。A是指核武器，B是生物、细菌武器，C是化学武器。这次仅仅使用了他们武器库中的C武器“沙林”毒气。如果“奥姆真理教”研究出来了核武器、细菌武器，并用这些武器攻击霞关、丸之内、大手町、皇宫、日本桥、兜町[24]等目标的话，首相及内阁成员、国会议员、中央官厅官僚等，都会被打死。新闻单位、证券交易所将遭到破坏，电车也将停驶。

有田：日本的中枢将完全陷入瘫痪。

宫胁：是的。“奥姆真理教”后来完全变成了一个吸金筒，为了达到聚财目的，他们决定获取大量杀伤武器。外国谍报机关肯定想利用他们。

有田:如何利用他们呢?

宫胁:如果我是第三国谍报机关头目的话,我会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比如说将他们吸纳的财富搞过来,或者反过来给他们提供资金,以此控制该团体,让其为我所用。

有田:最坏的结果将是什么样的?

宫胁:秘密探明该集团所准备的"最终战争"在日本爆发的准确时间,提前在日本近海举行军事演习,一旦日本国内出现混乱,立刻以人道援助为名在日本登陆。派出空降部队救助受害者,镇压反抗团体,最终将日本控制在自己手中。[25]

与日本存在敌对关系的某个国家或者集团,他们在日本国内扶植反政府的"奥姆",利用"奥姆"在日本国内制造事端,让"奥姆"集团成为自己的"第五纵队"。该敌对国家或集团事先与"奥姆"精心策划并联络好,埋伏在日本四周,奥姆在日本国内作为内部策应,两者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日本政府。

而上述这些"阴谋"与"利用",都是近代史中日本支持朝鲜开化党、中国的反满清势力、满蒙独立、各路军阀的惯用手段。

1867 年 8 月 30 日,坂本龙马与其他同伙议论"假如将军不将权力归还给天皇,尊皇派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时提议:"我将利用基督教煽动人心、制造混乱的同时,推翻幕府。"

后来西乡隆盛就在将军的老巢江户制造混乱,在将军焦头烂额之时一举将幕府推翻。

成了"奥姆"保护伞的日本警察 //////////

日本人在介绍很多事件时有一个特点:喜欢"去精存粗",将许多无关紧要的内容描述得详之又详,而同时将核心内容摘除,"奥姆真理教"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

"奥姆真理教"中的二号人物早川纪代秀告诫世人:"个别事件的总和并不构成奥姆的全部。仅仅将单个事件堆砌在一起,就会得出麻原这个奇人率领了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实施了包括杀人在内的一系列连续犯罪的结论,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1982 年,麻原因"违反药品管理法"被捕,并被克以 20 万日元的罚款。1985 年,他组织"奥姆神仙会",1987 年改为"奥姆真理教"。1989 年 8 月 25 日,东京都认定该组织为"特殊宗教法人"。[26]

1989年，横滨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坂本堤受理了一起民事诉讼案，坂本律师决定为"奥姆"受害人充当辩护律师，10月，"奥姆"的法律顾问要求坂本律师撤诉，遭到坂本律师拒绝，麻原因此下令杀死坂本律师。麻原认为，开庭审理会影响"奥姆"的声誉，而"奥姆"正准备参加1990年2月开始的众议院议员全国大选。麻原下达命令后，11月4日晚，"奥姆"中的六个重要骨干前往坂本律师家附近守侯，入夜之后，他们潜入坂本律师家，将他们一家三口窒息杀害。众凶犯将三具尸体搬离现场，分别埋在了不同地方。直到1995年9月，根据被逮捕凶犯的交代，遗体才被找到。

事件发生后，坂本律师的母亲(也是律师)请求日本警察介入调查，可警察的态度出人意料地敷衍。他们时而宣称坂本律师与他人有经济纠纷，时而说坂本律师携巨款潜逃，而对律师事务所提供的重要线索置之不理。律师事务所认为，坂本律师接手了"奥姆真理教"的案子，该案与他失踪存在明显因果关系。

尽管现在知道"奥姆"是元凶，可疑惑不仅没有解消反而更加加深了。警察对没有认真搜查的一个说辞是：该律师事务所曾接手过警察滥捕无辜的案件；神奈川警察非法窃听日本共产党干部私人电话案件，几个诉讼给警察脸上抹了黑，警察因此在调查坂本律师失踪案时没有尽力。

在坂本家楼下住着卡车司机一家人，自从坂本律师全家失踪后，这个司机一家也人间蒸发，据说至今仍然找不到。还有证言表明，事发当晚有人听到了一个女性叫："坂本律师！坂本律师！"

六名凶犯前往实施犯罪前得到了麻原的所谓预言："上天会帮助你们进入没有上锁的室内的。"凶犯到达后，坂本律师家果然当晚没有上锁，令罪犯们轻易地进入了坂本律师家。身为法律工作者的坂本律师，不会疏忽到晚上睡觉不上门锁的地步。

究竟什么人在协助凶犯，为他们实施犯罪提供便利呢？

1994年6月27日晚到28日晨，在长野县的松本市北深志住宅区，发生了沙林毒气袭击平民的恶性事件。共造成7死660人伤。令人不解的是，6月28日事件发生，可长野县警察到7月3日才公布调查结果，警察宣布造成大量死伤的元凶是神经毒气沙林。警察公布的发现时间比实际受害发生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也就是说，警察在接到报警电话后的两个小时中在忙别的，没有出警，等毒气将人全部放倒并挥发干净之后，警察才赶到现场。还有，警察宣布的事件重要参考人是第一个报警的河野义行。

事件发生后，警方对河野家进行搜查，扣押了布满灰尘，几十年都没有人动过的瓶瓶罐罐作为物证，掌握第一手资料的警方最清楚，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河野家中，仅凭这些失效药水，无论如何合成不出沙林毒气。如果说河野是毒气制造者，

那么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首先应该他本人中毒而死，现在河野本人没事，距离他家有相当距离的居民反倒有大量死伤，这些从常识上判断都荒唐。况且当晚的风向记录表明，河野家处在风向下方，他在自己家“合成毒药”没出过门，毒气怎可能逆风散布到他家的上方？

松本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之后，立刻有专家指出：利用农药无法制造出沙林。有人当时就向警察提供线索，报告事发当日下午有一辆可疑货车停在出事地点附近，还有人指出这次袭击针对的对象不是一般百姓，而是住在法官宿舍内的法官。对于这些重要线索，警察置之不顾。

媒体一直沿着警察发布消息的方向报道。警方称，河野本人被抬上救护车之后对医护人员说：在调和除草剂时突然冒出了烟雾，结果造成自己及家人中毒。

日本某著名周刊也发表文章为警察推波助澜，一再渲染河野在自己家中配制农药，警方从他家搜出了重要物证。

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现场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迄今仍疑点重重，警方利用奥姆真理教的目的是什么？又是谁在阻挠警方的正常调查？媒体的推波助澜让事实真相更显迷茫。究竟是谁在幕后充当着操控者的角色？一切都等待着“樵夫”现身回答。



电视台则邀请大学教授作为特约评论员在电视上讲评，由他来介绍配制除草剂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合成出神经毒气沙林。一个神奈川大学经济学部的经济学教授，不评论他擅长的经济，反以他中学时代喜欢化学的经历为资本，大谈、特谈合成化学制品过程中的各种可能，他评论说农药转化成为"沙林"的可能性极大。高中时代的化学知识竟是他评论如此重大刑事案件的基础，究竟是日本的化工专家都"集体失踪"？还是众多媒体有意要封杀化工专家声音？这些至今仍是一个谜。总之，专家不上台，伪专家却通过媒体大放厥词。经济学教授与警察、媒体联手混淆视听。1995 年 3 月 22 日，日本警察对"奥姆"多个据点展开同时大规模搜查，发现了"奥姆"的制毒工厂以及大量化工原料，更重要的是后来抓获了制毒、散布毒气的真凶。

虽说河野的冤案在此后被洗雪，可真相大白后的长野县警察的举动更令人不解。他们向河野道歉时称，案发后不久就已发现调查案件方向错误，可觉得纠正错误会影响警察士气及声誉，因此就"将错就错"。

1995 年 3 月 30 日，就在对奥姆犯罪开始全面搜查的八天之后，日本警察中的最高领导人、日本警察厅长官国松孝次在早晨离家准备前往办公室的时候遭到枪击，身中三枪。据日本方面公布的调查线索，在现场发现了与朝鲜、韩国相关的物证。一枚朝鲜的纪念章以及 10 元韩国硬币。1996 年 5 月，日本警方宣布逮捕了一名前警察，据说是他向警察厅长官开了枪，可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将他释放。2004 年 7 月，该人再次被逮捕，后来又再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

在对"奥姆"进行调查的关键时期，遭到枪击的国松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岗位，究竟是谁要让他离开关键岗位，阻挠调查"奥姆"真相呢？如果是奥姆成员行凶，那么将视线引向朝鲜的动机何在？

日本警察宣称，他们是在 1995 年 3 月 22 日开始搜查"奥姆"大本营之后，才发现奥姆有枪炮、生化武器制造工厂，而对以前一而再、再而三的"疏忽"与"偶然"，让奥姆在警察眼皮底下发展壮大之事只字不提。实际上，自从"奥姆"被认定为宗教法人之后，"奥姆"就一直是众矢之的，很多民众投诉并且向警察揭发他们的异常举动，可日本警察的反应超"迟钝"，一直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被当枪使的"浪人" //////////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对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下令：关东军要在 1932 年春策划"满洲独立"，希望将外国人的目光



吸引开，要他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板垣给了他两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田中与金璧辉[27]在上海密谋，再向上海日商筹集了10万日元，收买流氓，自己制造了一起伤害日本人事件。[28]

上海是世界第六大商阜，是欧美各国在华投资集中的地方。在这里制造事端，便于迅速得知欧美的反应。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日莲宗山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三名信徒路过马玉山路，经过抵制日货著名的"三友实业社"附近时，突然遭到田中隆吉雇佣的暴徒袭击，三人受伤，不久日本方面宣布，水上秀雄因伤势过重死亡。19日，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田中乘机扩大事态，指使日本人到处闹事，放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纺织厂，打死租界华捕一人，伤两人。在上海的日本人乘机造势，开始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派遣军队，行使自卫权，保卫日本侨民。村井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市长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等。日本军人警告说：如果没获得满意答复，就要"自由行动"。犬养内阁开始强硬，日本军队开始在上海集结。1月28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完毕，日本军人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夜晚11时日军发动进攻。"一•二八"爆发。当时闸北守军是广东的第十九路军，军人奋力反抗，日本军队进攻受阻。日军与以往一样，一边谎称不扩大，以瓦解中国军队斗志，一边增兵，2月，日本军队不断增加，战争规模扩大。

日本国内持反对意见者，都在后来遭到袭击。内大臣牧野反对的理由是：上海与满洲搅和在一起，会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他怕日本既失去了满洲又在上海无法脱身。另外一个反对者是藏相高桥是清，他的理由是：没有足够军费。[29]同时在中国东北以及长江流域的上海挑起战争，令日本的国际信誉下降，无法在国际上筹到钱，日本无法支持三个月。他们并不反对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只是觉得自己钱不够，实力不足。

高桥曾经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为日本筹集到大量海外资金。明明是日本要进行一场有限战争，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却要用"吓退"方式，他威胁陆军来了会将上海打个稀巴烂，因此一定要给日本一个面子，日本"漂亮出兵"，中国"漂亮退兵"。结果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撤离战场，"淞沪会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日本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与1928年济南出兵时一样，什么赔偿也没有，日本退兵就算是对中国的照顾。



昭和天皇借刀杀人

1936年2月26日凌晨4时,日本东京爆发了有上千名军人参加的“二•二六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暴动军人错将海军出身的首相的妻弟当成首相打死,结果冈田首相幸免。前首相——时任宫内大臣的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被打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30]被击伤,元老西园寺(87岁)和前内大臣牧野伸显逃过一劫,而陆军大臣、宪兵队长等,不是叛乱军人攻击的对象。内务大臣在如此重要时刻失踪,事件发生不久就出现在皇宫中并立刻被昭和天皇任命为代理首相。

冈田的秘书、同时还是他女婿的迫水住在首相官邸附近,事件发生后他迅速赶到现场并准备将首相救出,早上10时,他将首相还活着的消息通报给了昭和天皇,尽管如此,迫水依然没有办法将日本的首相、前海军大将救出。他请求内大臣联系派兵,内大臣回答:“军人们只听他们上司的,现在他们究竟听谁的也搞不清楚。”

等到中午,不少人前来官邸吊唁“前首相”,迫水乘机偷偷对海军大臣大角说:“我将告诉你一个重大消息,如果你不同意我提的建议,就当没听到我说过这件事。”迫水告诉他冈田首相还活着,恳请海军派部队来将前海军大将、现任首相从首相官邸中护送出去。

大角满脸困惑地回答道:“我什么也没听到。”[31]然后立刻离开了现场。

昭和天皇明知冈田首相还活着,可他仍任命内务大臣后藤为代理首相,迫水再找到代理首相请求他派警察将冈田护送到皇宫,而后藤代理首相反对冈田见天皇,同时称“警察没有能力护送冈田去皇宫”。

相当于幕府“大老”的冈田,到了2月27日凌晨才从首相官邸被偷偷送出。临时政府27日白天开会,28日早晨,临时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命令,要求武装政变部队返回军营,此后冈田才得以进宫谒见天皇。29日早晨电台播放天皇致军人的通告,当日下午军人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军营。

1936年2月26日晚7时,日本广播电台播发了东京警备司令部颁布的命令:(1)从本日下午3时起,对第一师团下达战时警备命令;(2)为了保证上述目的之实现,第一师团应保卫重要设施,维护社会治安;(3)目前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民众应安心从事各自的工作。

日本国民通过晚上7时的晚间新闻,才首次从官方那里正式获得东京爆发了某个事件的消息。

次日,报纸开始公开部分事件真相。

《东京日日新闻》[32]昭和十一年2月27日[33]星期四

二月二十六日晚八时五十分，陆军省发布如下消息：本日早晨五时左右，部分青年军官袭击了下列场所：

首相官邸，冈田首相死亡

斋藤内大臣私邸，内大臣死亡

渡边教育总监私邸，教育总监死亡

牧野前内大臣宿舍（汤河原伊藤屋旅馆），牧野伯爵情况不明

铃木侍从长官邸，侍从长重伤

高桥大藏大臣私邸，大藏大臣负伤东京朝日新闻社

东京朝日新闻社

发动此次袭击的青年军官们发表声明称：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在内外危急的重大关头，剪除天皇身边破坏国体（天皇制）的元老、重臣、财阀、军阀、官僚及政党中的元凶，明正义，护国体，开创新纪元”。

28日（星期五）《东京日日新闻》朝刊

二十七日下午四时，戒严司令第一号公告：

一、戒严司令部的军队，包括近卫师团以及平时驻扎在东京以外地区的部队，已于昨26日接到上京命令，并且于26日夜晚到达东京。

二、当前东京市内局势平稳，与往常没有大的变化

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四十分，戒严司令部第二号公告：

戒严司令于27日向警视总监以及宪兵司令就有关与军事相关的警察事务发布如下命令：（1）严禁举行相关集会，在报章上发布相关消息。（2）严禁转手枪支、弹药。

29日（星期六）《东京日日新闻》朝刊

二十八日戒严司令部第三号公告：

（1）26日晨起袭击各目标的数百人的骚乱部队现聚集在麹町、永田町附近，戒严司令部已经对此采取了适当的措施；（2）戒严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奉天皇命令行动，现军纪严明、士气旺盛；（3）东京市内除了麹町、永田町附近一小部分占领地区外，都非常平静，全国局势也未见任何异常。

政党、财界静观，贵族院方面、官僚、政党、财界等除了静观之外无计可施，他们



仅仅在注视军部方面如何维护东京治安。

29日(星期六)《东京日日新闻》号外

戒严司令部告示第二号(早晨六时发布):

本司令依据戒严令第十四条,将坚决镇压在麴町区出现的军事占领,由于该地区地域狭小,为了保证周边地区不被殃及,特此公告官民,希望各位理解出兵目的,保持平静。

戒严司令　香椎浩平

3月1日(星期日)《东京日日新闻》朝刊

川岛陆军大臣29日发布如下声明:

在京城,这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叛乱,紊乱了军队秩序,破坏了安宁并让天皇不安,因此发布戒严布告。上述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以及军队的声誉,在昭和盛世留下了污点。这些人让人痛恨。一切均由本人未能尽责所致,痛感责任重大。

军部对应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27日确定占领军为叛乱军,28日决定镇压,29结束。这次军事行动向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日本军队内部激流涌动,而政府、财界、元老等,除了袖手旁观外无能为力,只有昭和天皇能够控制局势,他一声令下,狂暴的军人就老老实实地收兵回营了。疯狂开场,平静结束。

告诉国民的内容,就是报纸上发布的内容。后来的历史研究,又告诉国民一些新的背景。

26日早晨,政变部队中的一个小队占领了陆军大臣官邸,官邸与陆军省、总参谋部同在一个区域内。叛军只枪杀了一个陆军将领——教育总监渡边,因为他以前明确表示赞成"天皇只属于国家中的一个机关"的观点,军人们用军事行动回敬"天皇机关说"。

叛军进入了陆军大臣官邸并且将陆军大臣"控制住",但并没未伤其毫毛,同时向他提交了"起义军配置图""本次军事行动理由书""要望书"等三份书面文件。他们向陆军大臣汇报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成果:将冈田、铃木、斋藤三位海军大将击毙。[34]政变军人要求陆军大臣进宫向天皇报告。在"军事行动理由书"中,叛乱军人说明了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理由一:日本的天皇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好的制度;二,现在这种国体被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所破坏;因此,也就是理由三,青年军官们采取了这次"清君侧"的行动,他们要求天皇颁布"昭和维新"大

诏，让明治宪法中规定的“天皇拥有绝对大权”名副其实。

叛乱军人之间的口令，也能充分反映他们对“昭和维新”的期待，“尊皇，讨奸”。

川岛似乎是在办公室坐等叛乱军官的报告，他接报后立刻前往皇宫，向天皇报告外界发生的一切。

根据格鲁的介绍，在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期间，日本一高级人士曾经讲过以下一段话：日本有一个举国一致的主张，即我们一定要扩张。但对向何处扩张则有两派意见：一个是大陆派，一个是海洋派。目前大陆派占上风。恐怕今后几年也还会是这样。但是一旦这方面受到阻碍或者挫折，那么……[35]

1931年、1937年、1941年日本对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刚好印证了上述一席话。

日本军部对1936年12月31日期满的伦敦条约非常关注，此后将进入无条约时代，而满洲建设需要有一个时间，至少要五年。当时日、美之间的海军力量差距并不悬殊，因此，日本不太担心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受到美国的出兵干预，日本要提早5年行动，为今后的日美对抗以及南进做准备。1931年这一时间就是依据上述思想而选定的。[36]

1932年5月15日，海军军人枪杀了文人首相犬养毅，此后的两届次内阁，首相都是海军大将，先斋藤实，然后冈田。此安排是要海军扮演“亲美的自由主义者”，既要消化吞并的中国东北，又要为下一步“南进”进行战争准备。五年到了，陆军果然“卸磨杀驴”，军事行动中枪杀的“奸臣”，都是针对性非常明确的人物。

尽管内务大臣也被叛乱军人列为袭击对象，可内务大臣竟然没有住在官邸，叛军没有能够找到他，天皇倒在第一时间找到了他，任命他为临时首相。

事件发生之后的26日，叛乱军队被称为“维新部队”；而到了27日，风向发生变化，他们变成了“叛乱部队”，东京警备司令部也变成了戒严司令部。军事行动后，叛乱军人期待天皇下达“昭和维新大诏”，天皇命令终于在28日下达了，可内容却是要让他们返回兵营。此前曾有神秘人物向叛军将领保证，行动后一定会得到天皇昭示。叛乱军后来被判处死刑，罪名是未经天皇许可，动用天皇的军队。被判处死刑的军官们认为自己被卑鄙地出卖，被陆军高层欺骗。他们最初坚信天皇、陆军会支持他们，站在他们一边。

28日天皇下达镇压命令后，叛乱军官仍希望与陆军大臣川岛见面，可川岛再也不露面，接见他们的是石原莞尔[37]，他告诉叛军头目们：天皇命令不能更改，你们如果不自行撤回军营就选择自杀吧。

天上的行动则更加诡谲。29日反复用大喇叭劝军人返回军营，同时让军官与士兵分离，士兵回到军营，军官在陆相官邸集合。叛乱军人的上司要他们自杀。天上除了飞机撒传单外，还用气球高悬劝叛军返回兵营的标语。

1936年2月27日

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昨晚宴会时，有人打电话给我们的仆人，说斋藤（实）一离开我们使馆，就请通知他们。后来我们查了电话号码，查出那是本区的警察分局。该局或已得到什么特别警告，也可能仅仅是例行的防备，多半是后者。[38]

3月1日

日本政府向叛军广播，用飞机向首相官邸和山王酒店场地上撒传单，用氢气球悬起一条长幡，内容都是说天皇号召士兵返回营房，回去即可得到宽恕，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因想到他们不服从天皇命令而正在流泪，对抗拒命令者格杀勿论。[39]

依正常逻辑，陆军在东京制造了震惊全日本乃至整个世界的军事行动，此时的陆军，既失去天皇的信任，又得罪了海军、政府政党，国会早就对军人放肆，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暗杀政府首脑不满了。陆军应该“缩成一团”才合情合理，可历史事实却是：“陆军再次承担起了组建新内阁的重任。”也就是说，只有陆军的傀儡才能够出任首相。陆军边干坏事边“主宰大局”。3月2日，元老西园寺推荐近卫出任继任首相，两天之后的4日，近卫以健康不佳为理由拒绝。后天皇指名广田弘毅出任首相，广田之所以能够被军人接受，是因为广田是彻头彻尾的陆军的傀儡。陆军推举他的交换条件是：上台后要满足陆军的预算要求。

格鲁从广田完成的任务上，看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广田上台后，1937-1938年的陆军预算高达七亿，比1936-1937年的五亿多出了两亿。”可他仍然称赞广田是“稳健派”。

陆军不单安排首相人选，而且对该届内阁的“寿命”都有明确的规定。

绝密，有关组阁的意见 三月九日 于病床 片仓少佐

本届内阁的首要任务为处理当前时局，时间以半年为准。[40]

根据战后的一些揭露，“二•二六事件”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日本宪兵及警察当局对此早就有所探知，可每当将这些情报报告给“上面”之后，都被上级“化小”了。根据“内务省警保局——昭和十一年中社会状况”的报告，早在2月18日，

警察当局就获得了军官们将要进行军事行动的情报。他们得知军官们频繁聚会，商量袭击重臣西园寺以及牧野。

东京宪兵队特高课长福本龟治在战后出版了《秘录二·二六事件真相史》[41]，作者在该书称："宪兵队获得了各种情报，进行了综合分析后感觉事关重大，因此立刻向上级汇报，要求提前警备，但是，苦心进言被笑杀。"[42]

根据福本的介绍，2月15日之后，宪兵队本部看到局势越来越紧迫，从全国各地招调了300名增援宪兵来东京，还制定了"紧急警备计划方案"，可当时宪兵司令"生病"，代理司令称陆军反对该方案，结果将该方案搁置。此后，再制订了一个与前者相矛盾的"缩小警备计划方案"，此方案再次提交给上级后，最终获得了许可。2月25日，宪兵司令部以陆军大臣发布命令的方式，从日本各地召集了50名增援宪兵。他们于2月25日早晨到达东京。他们既不熟悉东京的地理情况，更不知道要他们来东京究竟是干什么，到了事件发生那天，他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43]

"二·二六事件"向内外炫示了昭和天皇的能力，他有足够手段对付"过激派"。昭和天皇一方面鼓励他们"处于临界状态"，另一方面再让陆军去"拆除引信"，这次政变既对外展示了天皇属于"稳健派"，还让所有人认清了"明治宪法"。

要推动"昭和维新"的政变军人，后来发现自己被"牺牲抛弃"，叛乱军中领导人之一的陆军大尉安藤辉三说："天皇出卖了我们。"

---

[1] 日语中的"工作"，意为"执行特殊任务"。

[2] 新设官职，"监护人、职务代行人"之意。

[3] 毛利敏彦著《大久保利通》中公新书 第50页。

[4] 萨摩藩人（1825–1924），一新后在新政府中任高官，曾出任过首相。

[5] 详见第七章。

[6] 参考第二章第四节。

[7] 明治天皇有5个妃子，生了15个孩子，但11个早逝，只有一个儿子成活，就是后来的大正天皇。

[8] 据说近卫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这缘于他儿时的经历，他刚生下来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此后他一直以为，养育他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可后来他发现这是一个谎言。或许他的亲生母亲"因病去世"本身都是谎言。他从此"怀疑一切"。

[9] 退役陆军中将。

[10] 转引《昭和史中的瞬间》（上）朝日月刊编 第139页，见1932年5月20日《信浓每日新闻》。



[11] 1946年东京审判时，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在作为检方证人时曾说："我当时是父亲秘书，父亲在拜谒天皇时'曾直接要求天皇命令陆军退出满洲，但后来没有达到目的'。"转引自赫伯特·比克斯著 王丽萍 孙盛萍译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 第449页。

[12] 1923年12月27日，摄政裕仁出席国会开幕式，上午10点45分经过虎之门公园时，难波大助用拐杖式手枪袭击了他。该凶器是伊藤博文生前送给难波父亲的礼物，难波家属长州藩。支持天皇的反对派密谋暗杀长州重镇山县，而长州藩青年则要刺杀未来天皇。而且行刺发生在萨摩出身的山本执政期间。裕仁在一个月后的1924年1月26日举行婚礼，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又有朝鲜人向皇宫投掷了手榴弹，可没有爆炸。近代史上，朝鲜并没有将这次袭击看成象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在上海投弹刺杀白川义则那么壮烈。

[13] "下手人"，日语为"杀手"之意。

[14] 日语中的"广报"是"广为播报"的意思，相当于中文的"宣传"。

[15] "若头"为第二号人物之意。

[16] 徐裕行杀人前突然有了钱，他打电话将他的情人约入情人旅馆，狂欢之后去"执行任务"。

[17]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知县驻东京事务所的客房。

[18] 参照第四章"参勤交替"制度。

[19] 号春岳、德川家康的女婿家，与水户同样，对自家没有掌握幕府实权不满。

[20] 萨摩藩士，一新功臣。

[21] 由于后来两藩联合推翻了幕府，该条约被美化为"萨长同盟"，实际上，从当时的"协约"内容上看，根本没有萨摩与长州订立攻守同盟的内容，萨摩要将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22] 密约内容见第四章。

[23] 有田是对奥姆一直进行追踪报道的自由撰稿人。

[24] 霞关是日本政府机构、大手町是世界级私营企业总部、兜町是日本证券公司集中的地方。

[25] 有田芳生著 《有田芳生之对决—奥姆真理教》 朝日新闻社 第172—173页。

[26] 麻原预言的"世界末日""最终战争"之时，刚好是中国香港"97回归"之时；而奥姆投毒事件恰好发生在社会党人执政时期，当年刚好是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日本发生的一切，均不能以"偶然巧合"而简单地下结论。1989后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巨变，"奥姆"在此时大肆扩张并进入中国、苏联以及德国。"奥姆"在国外扩张之时，也是"奥姆"在日本国内走向疯狂之时。必须从大的国际背景下思考"奥姆"，而这也正是问题的核心。

[27] 善耆之女，被川岛浪速收养，又名川岛芳子。

[28] 田中隆吉《上海事变是这样发动的》。《知性》杂志增刊《未公开的昭和史》第182—183页。

[29] 石原莞尔认为："若筹集不到55亿日元，对中国之战无法打下去。"《现代史资料》卷9，第305—306页。

[30] 海军大将，日本投降时的首相。

[31] 日语中"不知道""没听说"都是"我不想参与"的意思。

[32] 现在《每日新闻》的前身。

[33] 1936年2月27日。

[34] 后证实冈田活着，铃木海军大将、侍从长身受重伤没死，只有前首相斋藤、现任内大臣遇袭身亡。

[35] 格鲁著《使日十年 · 1936年4月25日日记》、商务印书馆。日本自1895年甲午战争后就向菲律宾等地扩张，美国怕威胁到自己的利益，鼓励日本向大陆扩张。日本抓住美国的弱点，总是用"否则就向海洋扩张"，以换取美国支持日本在中国大陆扩张。沙俄在"三国干涉"时称，日本是个岛国，应该向海洋扩张。

[36] 田中隆吉著《被审判的历史》新风社 第17页。

[37] 反对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但是曾积极策划"九 · 一八"的人物。

[38] 25日晚美国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招待"亲美的自由主义者"，铃木侍从长也应邀出席。

[39] 格鲁著《使日十年》 商务印书馆 第181页。

[40] 松泽哲成、铃木正节著 《二 · 二六与青年将校》 三一书房 第249页。

[41] 日本放送协会 1988年。

[42] 转引高桥正卫著《二 · 二六事件》中公新书 第35页。

[43] 同上书，第43页。

第二章 美国人眼中的日本人



"纸上谈兵"的《菊与刀》

社会上流行一本名为《菊与刀》的日本研究专著,它出自美国社会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之手。

《菊与刀》问世于 1947 年,作者本尼迪克特既不会日语,在出书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也不曾去过日本。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该研究成果违背了社会文化人类学者一贯主张的、要"用脚步丈量异文化"的治学原则。而无法亲临日本进行"田野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异文化比较研究",实在是一种无奈的结果。据作者介绍:"开始着手研究日本的起因是日美之间爆发了战争。"也就是说,开始研究并非来自作者的学术冲动,它来自政府的"定单","目的在于将美日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迅速结束以及战后对日本实施占领。"

受到无法亲临日本体验又要尽快提出成果等条件限制,文化人类学者不得不"闭门造车"。从未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以当时禁闭在美国集中营中的日本人为对象,同时参阅日本的书刊、电影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在种族、文化、思想及行为方式上,与美国不同的日本。

用"盲人摸象"的手法向西方介绍日本,本尼迪克特也非第一人,最早用上述手法介绍日本的是 13 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口述的《东方见闻录》中,日本被描绘成为"黄金之岛":"位于中国东方的大岛名日本,岛上有大量黄金,因为大



《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这本书原是受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而事实上，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政策多以它为蓝本。

陆商人不曾在该岛登陆，所以没有人将黄金从该岛带出岛外。”[1]

马可波罗讲述的日本，是让当时西方航海家们垂涎的日本财富；本尼迪克特介绍的日本，是让整个世界头痛的好战日本。她将重点放在岛国武士为什么黩武上。她主张西方是基督教文明，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罪文化”，相反，日本受佛教、中国儒教影响，在此土壤中产生了“耻文化”，它是日本社会一切行为的原动力。

二战后，日本学者森山树三郎出版了《“名”与“耻”的文化》[2] 一书，他否定“日本文化是‘耻’文化”，他认为：“‘耻文化’是中国文化。”

“本尼迪克特女士认为，‘耻’属于日本文化。但是，从文化的见地上而言，‘耻’的本家是中国，日本只不过是分店而已。”“中国是一个重名分的国家。”“‘耻’这个词，频频出现在中国孔子的‘论语’中。”

作者认为：“重名”思想在中国很流行，甚至在儒教基础上产生了以“重名”为内容的“名教”，中国以丧失名誉为“耻”，“名”就是“名声”“名誉”，日本受中国影响，结果才有了“名”与“耻”的观念。

他用“中国是本家；日本仅是分店”的简单比喻，说明了东方文化是一个整体，对比日本时应该首先区分“本源”和“分支”。[3]

以耻为传统的日本文化

本尼迪克特在构筑其日本人论的过程中，运用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中通行的“模式”手法，以一个关键词为突破口，由它牵引出诸多不同的文化侧面，换言之，



建立两个不同的框架，然后在各自文化中寻找内容，充填入不同框架之中。然而，正如日本学者指摘的那样，说明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可成一家之言，可将它们看成是日本与西方的差异则非常牵强。她将“耻”这个东方普遍存在的观念，混同为日本人独有的行为基础。若要将日本与西方进行比较，首先必须将日本从东方中独立出来，分清孰为东方普遍的，孰为日本独有的。通俗地说，日本与东方诸国是骨肉相连的一个整体，若要对比日本与西方之不同，首先必须明确骨是骨，肉是肉，没有进行拆分就将西方和日本进行比较，结果只能是不伦不类的西方与东方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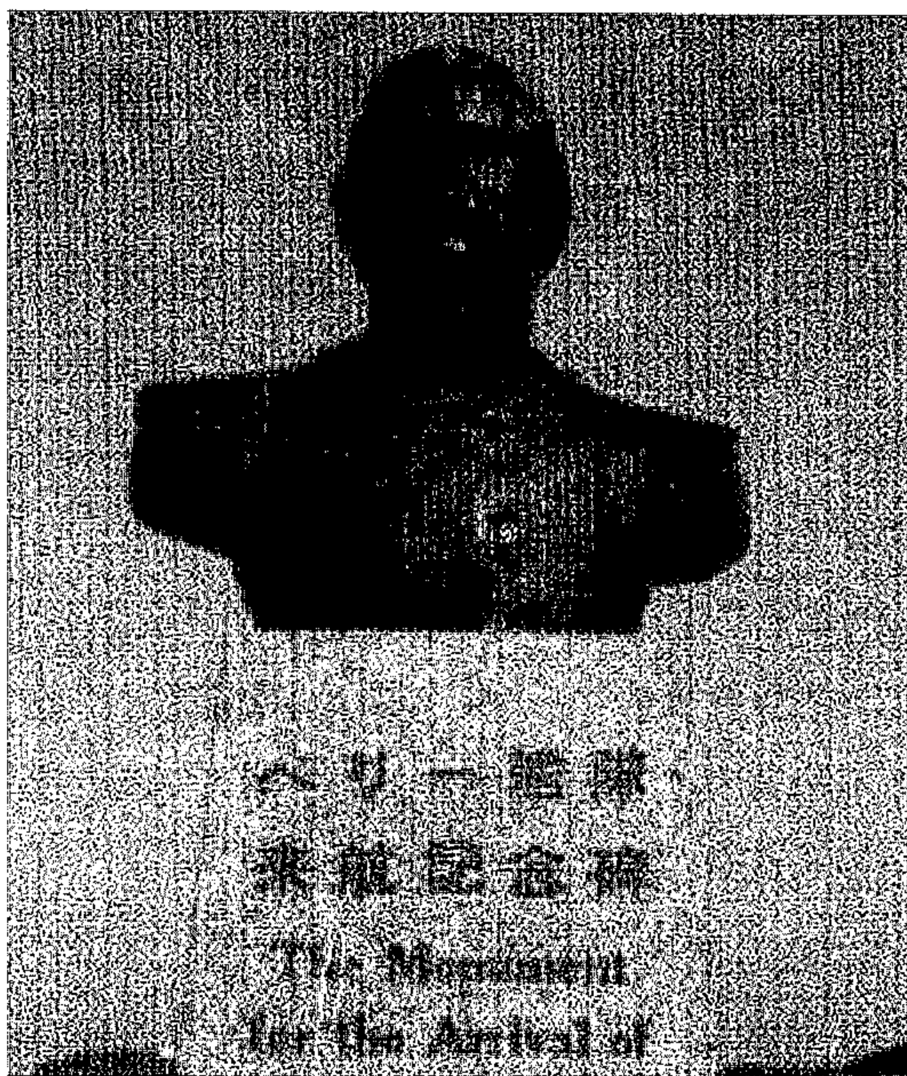
光荣的“言行不一” /////////

日本横须贺市的浦贺，有一个纪念佩里1853年登陆的纪念碑。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引发日、美相互宣战，横须贺市的日本“右翼”团体认为，日本打败了美国，终于“扬眉吐气”了，“佩里登陆纪念碑”耸立原处是“日本的耻辱”，提出要将其推倒。此事通报给了当时的县知事后，他同意他们将其推倒，还在原址上再建了一个“国民精神振奋碑”，碑上刻写了日本国家主义学者德富苏峰的撰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初参与推倒“佩里登陆纪念碑”的右翼分子突然开始担心，美国人来了会处罚参与者，或许还会迁怒于日本一般百姓，他们前往县政府紧急磋商对策，县政府官员当即决定，由政府出钱，将“国民精神振奋碑”推倒，恢复“佩里登陆纪念碑”。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在夜间紧急抢建，赶在美军到来之前将“佩里登陆纪念碑”重新竖立在原址上。

人们通常认为：行为是最好的心声。日本人当初建立纪念碑，动机应该是颂扬佩里以及他所代表的美国。可1945年8月之匆忙重建表明，将同一纪念碑建了推倒，推倒了再重建，折腾纪念碑不是跟纪念碑本身过不去，而是为了取悦美国，“跟美国套近乎。”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认为已将英、美打翻在地，初战就重创美国海军，这让日本有一种扬眉吐气的“雪耻”感，这种情感立刻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将“佩里纪念碑”推倒。推倒表明：当初修建纪念碑是一种“言不由衷”，并非日本真心想褒扬美国，纪念佩里。以前“美强日弱”，美国是日本要利用及怀柔的对象，因此不得不向美国“谄媚”，它是“耻”。如今战胜了美国，彻底“雪耻”，当然要将纪念碑当成耻辱标志推倒，为了铭记“雪耻”，在原址上建立“国民精神纪念碑”。最初建纪念碑，明知是“耻”还是要建，它是“伪”；去“伪”并再建一个“国民精神纪念碑”才是“真”。“佩里登陆纪念碑”属“违心而建”是“建前”[4]；“国民精神纪念碑”是真情表露，反



佩里登陆纪念碑

为一个入侵者树碑立传，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但日本人却这么做了。不是他们不知道“耻辱”二字应为何意，而是要为了讨好强者。

映了“本心”。推倒“伪”表明彻底释放怨气，通过此举宣泄长期的压抑。

没想到“好景不常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国民精神纪念碑”在原址上不利于“日美友好”，日本人认为应该赶快恢复原状，也就是说，又得开始“套近乎”了，必须回到原来的“假象”上。“国民精神纪念碑”只存在了短暂的三年，可这种“折腾”本身，恰恰名副其实地表现出“日本的国民精神”。中国与日本都使用汉字，可同一个“耻”字，承载的内涵完全不同。日本弱小在“下”时，喜用表示臣服的态度“套近乎”，说敬语、鞠大躬，将“上”伺候得舒舒服服，让你找不出不满，让“上”放弃指责、惩罚“下”。可乖巧是“建前”；此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感觉耻辱”，希望有朝一日“反仆为主”。在日本，只有“居上坐大”者才有资格和能力表露真情，也就是说，只有“实力者”才能“放纵”自己。

按照中国儒教对“耻”的解释，“言行不一”是损害自己名誉的行为，“不诚”属于“耻”。可儒家的这一传统定义在日本酿出了“日本味”，日本“言行不一”不是“耻”，“口是心非”是生存技巧。

横须贺有“佩里登陆纪念碑”，而距此地不远的厚木美军基地内还有一个“麦克阿瑟铜像”，前者是“日本开国纪念碑”，后者是“日本民主之父”纪念碑，同为美国人，不同于不同时代、用不同方式登陆日本。从屈辱程度来说，麦克阿瑟登陆日本让日本蒙羞程度最深。佩里没向幕府宣战，日本也没有打败仗、投降，佩里与幕府签署完了条约就离开了，而麦克阿瑟让日本签署完了投降书还不走，还率领了40万美国占领军在日本驻扎下来了，这是日本最感觉耻辱的时候，可恰恰它又是日本最要向美国“套近乎”歌颂友谊的时候。“右翼”连夜赶工将推倒了的“佩里纪念碑”重新竖立起来还觉得不够，后又再建“麦克阿瑟纪念碑”[5]，赞美他是“日本民主之父”。

说日本人不辩"真伪"是虚言，可在对待"真伪"的问题上，他们的确比中国人"更深沉"。日本武士的"美德"之一就是："喜怒不形于色"，"忍"是美德。汉字的"忍"是"刀在心上"，而武士对"忍"的最直观认识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不流露真情就是"忍"。日本对强者恭顺是"耻"，而"耻"必须深藏于心，不能外露。表露真实情感属"诚"（まごころ），可它是"不忍"。也就是说，"真""伪""耻""忍"等都与实力挂钩，"弱""下"时就必须"忍"，"真情"不能在自己弱小时流露出来。"忍"中包含了"伪"，可这种"伪"是"无奈"，不是"耻"。

对日本人而言，凡事都有"建前"与"本音"之分，说"建前"是"伪"毕竟不十分确切，因此日本人说"建前"是"义理"，它是有"名"无"实"的、大致存在。"忍"可将"真""伪"同时包裹起来，让强者"不辨真伪"自己才安全。"谄媚""套近乎"都属于"伪"，可遇到对手强大时就必须"忍"，"忍"是武士的"迷彩服"。

通过"忍"将"耻"深藏于心，"刀"顶着"心"，既疼又危险，它要求人"谨言慎行"，言谈举止不可有逾越，过分会致死。在"纵向社会"的日本，"不忍"会暴露自我，属鲁莽、愚蠢行为。"诚"招损；而"伪"受益。"谄媚""巴结"都是"虚名"，一切要以能否最终获得实利来衡量损益，在"迷彩服"包裹下逐渐"变大""变强"，颠覆了纵向关系中的"强弱""大小"后才有资格流露真情。好似打败美国后的一段时间，让美国人对自己说敬语，鞠大躬，那时才不要"忍"了。

"伪"从一般程度的"佯装不知"到"讨好、取悦对方"。"谄媚""取悦"属于麻痹对手的计谋，目的在于"趋利避害"，纪念碑竖在地面是"表"，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是"裹"，"表"是"忍"；"裹"是包裹着的"耻"。佩里及麦克阿瑟纪念碑至今仍在原地竖立，根本原因是今天的日本政府仍强调"日美关系是日本对外关系的机轴"。日本的石原慎太郎仅仅是"不忍"的代表，他要时不时的"表露真情"。他批评日本的新宪法"是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是对日本的阉割。日本要修宪成为'普通国家'"。

每当日本强调日、美关系紧密时，日本一定要从近代的佩里到现代的麦克阿瑟，恭维个遍；而当日本要对美国发泄怨气的时候，这两个人物也脱不了干系，会立刻被日本人"倒吊起来打"，所有让日本蒙羞的事，都堆到他俩头上。日本人能在这两个极端中摇摆，也是因为要将压在内心深处的"耻"强忍着不让流露出来太痛苦了，偶尔也得释放一下。日本人凡事要"竖"着想，认为无法在他人之上，要"忍"就是"耻"，"忍"是控制自己"建前"与"本音"的阀门。

“口是心非”与道德无关 //////////

“耻”这一情感因被“忍”包裹住，如果当事人自己不将外皮拆除，外人往往很难把握。日本人认可“表里不一”，它不是“耻”，口头上所说与内心所想，常常相互矛盾，甚至完全相反，因此，对于日本人的外在言行，不能仅凭常识轻信。

1858年，岩濑忠震代表幕府与佩里签署了“安政条约”，签约前他向大老井伊直弼报告：“屈服于英、法武威之下（签署条约）是奇耻大辱”；可不答应两国，“恐会有40余艘战舰从中国驶往日本，与外夷立刻签署条约乃不得已之举。”

报告属“内密”，里面说的是真心话。为了向“外夷”表露自己的不满，幕府曾在暗地里鼓励并支持“攘夷志士”。幕府官员只想着自己对外夷“表里不一”，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攘夷志士”实际上对幕府也“表里不一”，后来发现那些积极主张“攘夷”者，实际上是要为幕府制造麻烦的“倒幕”分子，在幕府察觉局面失控时已经晚了，那些“攘夷”分子摇身一变成了“倒幕派”，他们“攘夷”是“伪”；“倒幕”是“真”。指责幕府屈服于“外夷”是“耻辱”的武士，后来都摇身一变，变成向“外夷”保证坚决维护“外夷利益”，严厉镇压国内“攘夷”的新政府成员。

1869年2月，新政府领导人岩仓具视上书称：“现在外国军队可以在我国港口登陆，在居留地内违反我国法律，最终也是由外国领事审理，此乃皇国之奇耻大辱。”用“内密报告”的方式以及报告中提及的“耻”的内容，新政府领导人与幕府官员一样。

1858年的“安政条约”第十三条规定：“在条约签署后的171个月之后（相当于1872年7月14日之后），若想修订条约，双方政府可在一年前通知对方，然后开始修约谈判。”

发现这一条款的新政府如获至宝，为了表现出新政府不同于“软弱”的旧幕府，新政府于1871年11月向外派遣了庞大的“修约使节团”，准备依据这一条款开始对外修约谈判。一行的首站是美国，1872年1月21日到达华盛顿，2月3日即开始预备谈判。美国国务卿费舍尔在谈判桌上提出“全权委任状”问题，也就是说，谈判代表们是否获得了日本天皇的授权。使节团得知没有“委任状”无法展开谈判，4日即刻决定，派遣伊藤博文与大久保利通返回日本拿委任状。后者立刻返回日本，而前者在美国继续谈判。

大久保与伊藤回到日本后，立刻要求留守的外务卿副岛种臣出具委任状，而副岛以外交谈判必须经由外务卿领导的外务省主持为由，拒绝出具委任状，他主张赴外使节团只有收集信息之权，没有实际交涉权，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大久保拿出最

后杀手锏:"如果再不出具委任状,本人只好自杀谢罪。"副岛看到不给"委任状"会闹出人命,便息事宁人地出具了"委任状",大久保与伊藤遂立刻返回美国。

在美国的日本谈判代表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撤销治外法权,日本应有权决定开放港口及外国人居留地。美方不但一口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还不算,还提出了美方的"修约"提案:外国船只可驶入日本的所有港口。

双方都主张"修约",可各自内容相差十万八千里,使节团看到无法按照日本的意愿修改条约,因此他们对委任状也不再期待,他们不等伊藤、大久保返回,径直离美赴英了。6 月 17 日,匆匆赶回美国的伊藤及大久保得知谈判已终止,他们不得不转赴欧洲大陆,携带已经失去意义的委任状去追赶使节团。

对于使节团有辱最初使命,木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彼之所欲者尽与,我之所欲者皆无,其中苦心与遗憾只有吞泪……余等百余日之苦心,派两人专程往返,进行了各种商议,五千里海上,三千里陆地,一切皆徒劳。[6]

眼泪吞到肚子里都要忍着不能流露,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此乃莫大耻辱;可对外的公开回应却是另外一种"理直气壮"。对于修约使节团外出那么久,花了那么多钱没有完成使命,使节团用"日本人不善强权,儒教讲究温和有礼"来回应。

与赴欧美使节团在修约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日本与中国清政府于 1871 年 7 月签署了《天津修好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具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保证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这是当时日本与外国签署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

中国善待日本,丝毫没有让日本"蒙羞",可日本并不赞美中国的"善举",中国后来也没有得到日本的任何"善报"。

"恃强凌弱"才是王道

1870 年,日本派出柳原前光来华要求定约。日本提出要求与列强利益均沾,定约问题一时没有进展。1871 年 7 月,中日双方最终在天津签署了《天津修好条规》(18 条)和《通商章程》(33 条)并约定在两年后换约。中日之间签署的条约,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首个相互平等的对外条约,领事裁判、协定关税都是相互平等的。这个条约签署后,谈判专使伊达宗城回国后遭到责难,他被迫辞职。柳原于 1872 年 5 月再次来中国,提出要修改条约。李鸿章以"条约刚订立,还没换约哪里来更改之理?更改应该在换约之后"为由,拒绝"修改"。李鸿章喜欢引经据典向武士讲道理,

而日本武士总是装出“我明白了”的样子。

1872 年 9 月，正是日本使节团外访、西乡当政时。西乡政府谎称明治天皇亲政，要琉球王子及部分官员来日本庆贺。琉球使臣如约而至，可西乡政府用刀枪迎接不明真相的琉球使节。与“废藩置县”时用刀枪威逼各藩主签署“同意誓约书”同样，西乡在迎接琉球使臣时向他们突然宣布：“天皇封琉球王尚泰为日本藩王。”次年，又宣布琉球归内务省管辖，琉球必须给大藏省交税。一纸文字，就将这个存在了 500 年的独立国家变成了日本的一个县。

1873 年 4 月，日本再派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天津“换约”。“换约”是假，看中国清政府对日本吞并琉球一事反应是真。

1871 年 11 月 27 日，66 名到中国朝贡及贸易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不得已在台湾登陆躲避，其间与当地人发生冲突，54 人被杀，12 人幸免。幸存者后被当地官员送往台湾府，经台湾府再送到福州，闽浙总督后将他们礼送回琉球。这事原本已妥结，并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可西乡领导的政府决定要利用这个事件挑起事端。

以“换文、祝同治帝大婚”为名来天津的副岛，不在天津见李鸿章，而是直接去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副岛只字不谈“换约”，他谈琉球问题，谈两年前琉球人在台湾被杀的事情。称日本要为两年前在台湾被杀的琉球人主持正义。北京总理衙门将他们“请回”天津，李鸿章一如既往向日本武士宣讲“孔孟之道”，在他看来，“出兵”只是日本人口头上说说而已。

1874 年，“一新”政府派遣海军将领桦山资纪和水野遵到台湾调查地形，同时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参议大隈重信为“番地事务局长官”，为出兵做准备。1874 年 5 月 7 日，西乡从道率领 3000 日军在台湾登陆。

日本害怕清政府用兵阻止入侵台湾军，1874 年 5 月 6 日，再派柳原前光作为驻华公使来华。此时此刻来中国，无非是想摸到清政府的底牌。他向清政府“说明”出兵原因：要捕杀杀害琉球人凶手，如有杀死日本“义士”者，中国清政府要对此负责。也就是说，日本出兵是因为中国清政府没有管束好自己的国民，中国没有尽到“负责任大国”的义务。

在天津的柳原前光[7]信誓旦旦地向李鸿章保证：日本一没有向中国递交“宣战书”，二还有“友好使节”在中国，出兵台湾仅仅是个别日本武士的“侠义”举动。日本转过身来对欧美宣称：日本出兵得到了中国清政府的许可，清政府没有武力阻止就是明证。

5 月 14 日，李鸿章派沈葆桢到台湾“观察”。6 月 14 日，沈葆桢从马尾港出发，

为了有一个第三者作旁证，李鸿章特推荐了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法国人同行，俩人 17 日到达台湾。中国当时在台湾驻扎的军队多达一万人，日本军队无论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没有清军强大。

沈葆桢通过观察发现，日军登陆后杀人、放火，但因水土不服，病死的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日本看到中国只派遣观察员赴台，中国驻军并没有出击，庆幸冒险成功的同时，却为如何撤兵大伤脑筋。西乡从道与沈葆桢谈判，要求中国负担军费，也就是说，日本来台湾杀人放火，费用要中国负担。西乡从道开出 210 万两的金额。看到在台湾谈判无法获得任何结果，9 月 1 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天津。沈葆桢从台湾发回电报称：日本现在想撤兵，中国应此时迅速出兵打击日本，可将入侵者赶出台湾，同时还顺便保护了琉球。

大久保见到李鸿章时称：自己作为日本代表亲自前来，表明了日本的"诚意"。他不会告诉李鸿章，"一新"政府当时内外交困才派他来处理棘手的撤兵问题。在李鸿章看来，既然日本想退兵，而且给点钱就可让日本退兵，这比自己出兵围剿更便宜。大久保拿出"一新"时瓦解幕府军的老手段，"黄种人之间战争只会让白种人渔翁得利"，让李鸿章从"大国领导人高度"考虑问题。强调日本人讲求"面子"，中国是"面子"的输出国，不给他"面子"致使谈判破裂，他只能在天津"剖腹"。明明是日本打不下去，对琉球、对中国没有任何"仁义"和"诚信"，也一点都不给中国"面子"，可大久保却要中国有"大国风度"。

大久保来中国前曾向政府要求"宣战权"，也就是说，当他看到谈判无法达到目的时，他可动用"向中国宣战"的威胁手段。李鸿章觉得，假如日本"议和代表"死在中国，会造成"大国不仁义"的恶劣印象，既然"大国送小礼"可以实现"和为贵"的崇高理想，对于大久保开出的200万两，李鸿章砍价降到了50万两。抚恤金10万，另外 40 万作为收购日军留在台湾的工程费用，李鸿章对自己的能力颇为满意。10 月 31 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北京专条》。[8]

英国人宓吉[9]得悉《北京专条》后说："一个决定了中国死亡的交易，等于在向全世界做广告，这里有个富庶的国家，愿意出钱但不愿意打仗。"当时的英国驻日公使也说："英国可以从中国的怯弱中学到一些东西，那就是清政府惧怕战争，今后有事，只消拿战争来威胁即可。"

1875 年光绪皇帝即位。日本谎称清政府已经承认琉球国民为日本属民，任命松田道之为琉球处分官，下令琉球从此使用日本年号，不准再"入贡"清政府，不准派遣使者庆贺清帝即位，命令国王立刻前往东京。1876 年 7 月 7 日，松田到达琉球首府首里。这时突然有消息说清政府的军舰来琉球，松田慌忙撤离了琉球。

1877年何如璋出使日本，清政府下令要他调查、交涉。同年，琉球派使臣来中国请李鸿章解救琉球。清政府继续给何如璋下指令，仍是让他给日本"讲道理"。1878年5月，何如璋上书李鸿章：中国应向日本表明态度，用兵力示威解决琉球问题。根据他的调查，日本国库并不充足，军械等都是从国外采购，只有三万人左右的常备陆军，海军只有4000人，军舰只有15艘。如果日本与中国发生冲突，日本首先由内部崩溃。他警告李鸿章："对日本不要抱任何和平幻想。"[10]

看到中国没有出兵保护琉球的意图，琉球使臣请英、美解救对方也没有回应，日本遂于1879年1月，再次派遣松田前往琉球首府首里，他威胁国王2月3日为最后回答日，最后期限过去一个半月后的3月27日，他率领30余名官员，60余名警察、400名陆军军人，向琉球国王宣读了一份以日本大政大臣三条实美名义签署的通告："废藩改名冲绳县，县府设在首里"。4月5日，日本任命锅岛直彬为冲绳县长，给了琉球国王20万日本公债、侯爵称号，并"准许国王继续住在王府中"。

1879年5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李鸿章再请他向日本讲"道理"。7

蜡像——李鸿章与已卸任的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会晤

李鸿章请格兰特就琉球问题对日本武士"讲道理"，此举只表明他们对日本武士无知。武士打仗，就是为了增加人口和土地，武士似鹈鹕，吞下的"鱼"，不扼住脖子是不会吐出来的。



月格兰特抵达日本，当他向日本领导人谈及琉球问题时，伊藤博文诡辩称：首先，清政府认可 1874 年日本出兵台湾属“出兵代剿”，其次，出钱本身说明，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日本对琉球的行为属“废藩置县”的“改革”。

新政府中的领导人，比任何国家以及个人都清楚琉球国的历史，他们积极参与了整个阴谋的策划直至实施，他们不以“吞并弱国”为“耻”，不以公然撒谎为“耻”。武士对“坦荡荡”的“君子风度”不感兴趣，“抢夺”不受到惩罚就会助长“抢夺”。

对朝鲜无需知廉耻

1869 年初，平定日本全国的“一新”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木户孝允（长州）就向岩仓建议“征朝”。当时他主张“征朝”的公开理由是：（1）要他们对日本无礼服罪；（2）对外宣扬日本国威。[11]

在北海道盘踞的幕府海军投降后，皇宫里为此举行庆祝宴会。宴会上，黑田清隆（萨摩藩）开始吹嘘萨摩藩在新政府诞生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12]听后揶揄道：“都是自家人打自家人，此时争论功劳大小无任何意义，能战胜外国人才叫军队强，为日本立了功。”

萨摩藩在“一新”过程中出兵最多，自恃贡献最大，长州藩总用“不能恃才专权”反抗。木户提出“征朝宣扬国威”，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对外战争消耗藩兵力量。1869 年 6 月，木户、大村益次郎再次就上述问题与岩仓、大久保等展开争论。

通过对外用兵消耗对手，第一提案人是幕末时期的幕府老中板仓胜静，1861 年（文久元年）他曾向将军提出：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国内又存在反对幕府的藩国，幕府应“转内讧为外征，将士气移至海外”，只消下令让二、三强藩出兵外国，幕府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达到削弱强藩的目的。他甚至连出现最坏结局时的幕府对策都考虑好了：“战况不利时，让他们逃回日本国内即可。”[13]

1868 年 11 月，当政府的“官军”与德川家的“贼军”还在相互消耗的时候，西乡就率领萨摩藩的藩兵返回了家乡鹿儿岛。

1869 年 1 月，木户、大久保等密谋策动各自的藩主，以萨、长、土、肥四藩藩主联名的形式，将“版籍”（土地与人民）主动归还给天皇，在以上四藩藩主的带动下，其余 260 余个藩的藩主，先后“版籍奉还”。恢复“王土王民”标志着新生国家以天皇

为中心,可藩主们“自愿奉还版籍”给天皇仅仅停留在名义上,因为前藩主们同时被天皇任命为“藩知事”,他们依然在自己领地上行使职权。在前藩主们仍然是藩知事的情况下,财政、军队依然牢牢地掌控在前藩主的藩知事手中,藩阀政府并没有实际控制藩国。

1870年,木户再度提出“征朝”,同时继续遭到萨摩藩的坚决反对,萨摩藩出身的武士横山正太郎[14]因此在“集议院”门前剖腹自杀。

1869年3月,西乡从道[15]与山县有朋一起赴欧美考察军事,1870年7月回国,10月西乡从道返回家乡,催促在家乡“休息”的隆盛尽快重返政府。1870年11月25日,政府采纳了西乡从道的建议,12月,岩仓作为天皇特使亲赴萨摩、长州,同时,大久保、木户也分别回到了自己的藩国。此行表面上是邀请藩主岛津久光、毛利敬亲回东京,但实际上是要完成另外一个大动作。

久光称病不回东京,西乡作为他的代理前往。1871年1月,西乡向天皇提交“献亲兵”方案:“要向朝廷献兵一万余人,让他们成为禁卫军。”庞大的军队,战时是资本,和平时就是沉重的负担。萨摩藩的军队最庞大,负担也最沉重,西乡的“提议”实际上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献兵”可让“藩兵”变成国家军队,减轻萨摩藩财政负担的同时,萨摩藩还可将政府、天皇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获得天皇“许可”后,他返回鹿儿岛将5000萨摩藩军人带到东京。此后,长州、土佐两藩的军队也相继到达东京。通过“领兵返乡”再到“献兵中央”,西乡将听命于自己,但用国费供养的、总数达一万多人的“国家军队”组建了起来。

以军队为后盾,西乡开始对有名无实的“版籍奉还”进行改革。[16]

1871年7月14日,西乡等重演1867年12月7日“小御所会议”中的一幕。他以天皇名义召集在京的藩知事(前藩主)开会,56个在京的藩知事们接到在皇宫开会的通知后,按时进入了会场,宣布会议开始的话音刚落,接着就立刻宣读天皇大诏“废藩置县”,西乡等随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文件,命令与会的“前藩主”们当场签字同意,会场外有重兵把守,没有一个藩主敢反抗。“版籍奉还”耗时6个月,而“废藩置县”则在失去藩兵保护的藩主们“自愿签署”的名义下瞬间完成。[17]

西乡等新政府领导人承诺,将对前藩主们进行巨额经济补偿,可后来称国库匮乏,当初承诺的补偿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新的、大幅削减方案,萨摩藩的岛津久光就首先跳出来反对。1872年5月他上书天皇,痛斥政府不守信用并要求罢免西乡的职务。1873年开始,日本各地爆发了反对新政府的连续暴乱。6月17日在福冈爆发的暴动,参与者多达30万人。他们袭击政府机构,到处放火、打砸抢。暴动立刻波及到全国的其他地区,鸟取、香川、京都等地,到处都有反政府的暴动。



面对日本国内出现的危机，缓和国内矛盾，消除对立，原本应是西乡为首的留守政府的当务之急，可他们策划的化解手段竟然是在国外制造事端，西乡重拾“希冀将内乱之心转移到海外”一招。

1869年、1870年木户提出“征朝”，当时西乡竭力反对；三年之后，当初的反对者变成了积极推动者。

1871年开始，中国因为沙俄占领中国伊犁与沙俄冲突，日本希望在中国无暇顾及之时也能有所收获，1873年副岛种臣来中国，他在北京与沙俄公使会见，同时也与美国公使交换了“征朝”意见。1873年6-7月间，日本国内突然出现了朝鲜对日本“无礼”的叫嚣。

出访欧美的使节团，任务是“修约”，可最后变成了考察，日本多个领导人在日记上说欧美羞辱了日本。对来中国谈“修约”的日本使节，中国以礼相待，可结果却是日本的挑衅不断升级。两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日本看到对方强大。中、朝两个国家，既是日本的近邻，又是日本的恩人，对日本没有丝毫无礼言行，可日本偏偏要对中、朝“惩罚无礼”，“宣扬国威”。

西乡隆盛向政府提议：派他作为大使前往朝鲜，出使理由是“签署修好条约”。

浮世绘——《征朝论之图》

刚刚完成了日本国内“下克上”的武士，就积极地踏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此时的日本受自身实力所限，只能在东亚范围内进行侵略行径。这时的它还无力征伐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只能对实力偏弱的朝鲜半岛采取进攻。至于那些反对的声音，只不过是考虑到自己力有未逮，而从未考虑过与朝鲜继续和平相处下去。



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决定事关重大,须等出访团回来决定"为由表示反对,可其他所有参议都一致同意。双方争执不下,三条不得不紧急要求出访团成员回国,外游中的两个人物为此提前回国,5 月 26 日大久保到达,7 月 23 日木户到达。

他们俩均反对西乡作为政府代表前往朝鲜,而西乡固执己见,在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待岩仓等回国后再议。

岩仓等人回国后,留守成员与外游归来者一起开会,会议的最后结论依然是:暂不派遣。会议讨论的内容与结论是"不派遣使节";而不同意派遣使节的理由却是"现在不能对朝鲜发动战争"。派遣使节与发动战争究竟是如何挂钩的呢?西乡给板垣退助的信中给出了答案:

我们决不能现在立刻就向朝鲜宣战,开战之事必须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从国际法中找出对朝宣战的理由不是没有可能,但国内外谁都知道,这是无中生有。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必须向所有人表明,我们并不想战争,我们只是批评朝鲜没有善待近邻。我们要谴责对方无礼,以此表明我们是敬友厚邦的国家。我们为亲善而派遣专使,对方此时一定会有轻侮(对我使节)之举,直至将我使臣杀害。这时,国内舆论就不会再沉默,一定会因此沸腾,全国的人都会一致主张出兵讨伐朝鲜,事情到此,派兵讨伐朝鲜就不存在任何疑问,也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了。

与 20 年前到访日本的佩里相比,日本武士的"谋略"的确更"高明"。美国直截了当要求日本提供加水、加煤的落脚点,日本若不答应则兵戎相见。日本则是派遣"亲善使节",到达"友邦"后事事找茬,有意激怒对方,派遣使节是为发动战争制造借口。中日近代史上,许多中国的人物,不是死在日本"友人"派来专程"治病"的医生手中,就是死在日本人"宴请"的"美食"之后,儒教强调"以礼相待";日本是"以礼相害"。[18]

欺软怕硬的外交政策 //////////

自 1870 年开始,外务卿副岛就与沙俄就划界问题进行谈判。日本主张库页岛属于日本,因双方见解分歧大,明治政府遂将谈判改为秘密进行。到了 1873 年 9 月,谈判大致有了结果,日本放弃了最初要求领有库页岛的主张,日本获得千岛群岛,沙俄获得库页岛。对于这一"交换",外务省的一个官员、同时也是谈判代表的丸山作乐表示反对,理由是:库页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用日本领土库页岛交换千岛群岛,



等于拿自己的东西跟自己交换，实际上将库页岛白送给了沙俄。

开始议论出兵朝鲜之后，立刻有人对出兵朝鲜的军费问题提出质疑。担任对俄谈判的副岛提议：将库页岛出售给沙俄，以这笔钱作为出兵朝鲜的军费。

日俄条约签署前，岩仓曾试图寻求英国帮助，宣称如果沙俄不同意将库页岛"归还"日本，日本将不惜一战，沙俄让日本"蒙羞"，让新政府倍感"耻辱"。英国大使回答：连东京的保卫、治安都搞不好，有可能向俄国宣战吗？

对于向沙俄宣战，西乡隆盛是这样对岩仓表示的：沙俄有什么可怕？在我眼里，一旦发生战争，沙俄、朝鲜都是敌国，无强弱之分。沙俄虽然实力在朝鲜之上，但大军必须穿越几千里的西伯利亚，他们悬军万里，长途奔袭；而我军则迎敌而上，根本不必担心无法战胜沙俄。

1875年5月《日俄条约》签署后，丸山身穿白衣，头戴斗笠，专程提着灯笼前往外务省抗议。他到处宣传："明治新政府太黑暗，白天都要打灯笼。在这样一个即将灭亡的国家走路，必须白天提着白纸灯笼才行。"他坚持要求政府对沙俄强硬，可政府看到沙俄强大，认为丸山之举只会给政府添乱，最后将他免职。相反，有人提出对弱小的琉球、朝鲜作恶，政府就立刻变成帮凶，支持并怂恿挑衅者。武士对人是"见碟下菜"，羞辱了日本，可只要对方强，他们依然可以"和颜悦色"；反之，如果对方弱小，不管以前对日本有多少恩惠，不管是否真羞辱了日本，日本仍是一个"欺"字。明明自己欺负别人，还要强词夺理说别人欺负了自己。

1873年10月"征朝"问题被搁置后，主张"征朝"的五名参议辞职离开政府，1874年2月4日佐贺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暴动，领导人是刚退出政府的江藤新平，暴乱者曾一度占领了佐贺县政府。为了防止在鹿儿岛的西乡也加入其中，政府紧急派遣岛津返回鹿儿岛劝阻。2月6日，政府通过了出兵台湾的计划，3月1日暴动刚被镇压，4月就准备按原计划出兵台湾，西乡派出295人支援。

木户反对"征台"，4月17日辞职。10天后的4月27日，第一批"征台"军人出发。5月，岛津要求推动"征台"的大久保、大隈辞职。9月，大久保亲自到中国谈判，原本抱着若谈判不成就剖腹自杀的大久保，万没想到李鸿章会送他大礼，对台出兵不但获得了"义举"之"美名"，还得到了40万两的"赔偿金"。中国的便宜最好捞，这反而鼓励了日本继续向中国挑衅。

1875年1月木户、板垣重新回到政府。1875年5月，日本与沙俄签署了《千岛、桦太（库页岛）交换条约》。5月25日，日本"云扬舰"驶入釜山港并开炮。

日朝之间的血泪往事 //////////



1392年，李成桂（高祖）灭高丽继承了王位，新国号为“朝鲜”，定国都为“汉阳”，它就是现在的“汉城”。新王、新国号、新都确立后，国王立即向中国派遣使臣，希望获得承认。中国自三国时代以来就一直与朝鲜保持友好关系。当时与中国有国交的国家，中国都将其看成“朝贡国”，这仅仅是确立一种宗藩关系，中国并不干涉该国内政，他们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

丰臣秀吉控制日本后，1592年他派遣16万大军进攻朝鲜。[19] 日本的突然袭击让和平的朝鲜措手不及，丰臣军曾一度占领了汉城，后来朝鲜军民开始抵抗，中国援军也同时加入，在李舜臣将军的率领下，朝鲜终于打败了入侵的丰臣军。1593年开始和谈未果，1597年丰臣再派10多万大军攻朝，出兵让丰臣军元气大伤，让德川家康捡到了便宜。1598年丰臣死在日本，家康向朝鲜宣称：发动战争是秀吉干的，其间德川家没有投入一兵一卒，此后愿与朝鲜友好并撤兵。朝鲜因丰臣军入侵而遭受了巨大人员、财产损失。1600年德川家康主政之后，朝鲜方面向家康提出要先送国书给朝鲜，然后将破坏王陵的犯人引渡到朝鲜，结果家康送上了几个死囚。1607年，一个由400多人组成的朝鲜大使节团访问日本，1609年缔结了《己酉条约》。该条约规定，今后双方贸易只通过对马藩进行，日本船舶只能进出釜山一港，在釜山设立倭馆，日本人只限在釜山市内活动，不准日本人进入朝鲜内陆。到明治为止，釜山是日本人在朝鲜的唯一落脚点。朝鲜之所以要对日本作如此规定，真正原因是不相信日本人。入侵朝鲜的秀吉军队，是沿着当年室町时代日本使节前往汉城的道路进入的，朝鲜人因此决定，今后国内一切不能对日本人开放。

1868年明治新政府诞生，12月，新政府通过对马藩向朝鲜送去国书，国书中有“皇上登极，亲裁万机”的字句，对朝鲜事事都是命令口气，什么“皇”“敕”等。在朝鲜看来，只有中国才是“皇”，其他国家，包括自己都是“国王”，日本这样不符合规矩。同时，朝鲜对新政府非常警惕，因为日本国内要出兵朝鲜的叫嚣一直不绝于耳。1870年明治政府派遣使臣到朝鲜，在釜山呆了一年多，直到1871年底才返回日本。

1871年，日本协助美国在朝鲜制造事端。5月，由5艘战舰组成、载有650名军人的美国船队从长崎出发，此次出兵是要对1866年美国“厦门号”军舰在朝鲜被烧毁之事实施报复，同时要朝鲜开国。江华岛变成了战场，在朝鲜军人奋勇反抗面前，7月，美国人不得不撤军，军人分别撤回到了中国及日本。

1871年是朝鲜进入多事之秋的开始。这一年，大院君的儿媳闵妃刚满20岁并首次怀孕生子，11月8日产下一男婴，可两天后病死，这件事对急于获得地位的闵



妃打击很大。在朝鲜，闵妃的丈夫李熙名为国王，但权力掌握在他父亲大院君李是应手中。1873年10月25日，朝鲜的崔益铉上书国王，弹劾大院君。11月3日，他再次上书，要求大院君隐退，国王亲政。理由是国王已经年满21岁，早已成人。11月5日，国王颁布亲政布告，此后大院君搬出王宫。12月10日王宫内突然起火，火灾原因是有人在闵妃的寝殿里安装了炸弹，犯人据说是大院君的佣人，这次事件更加加深了父子之间的猜疑。1874年2月，闵妃再次生产，她给这个男孩起名为"坧"，在这个值得庆贺时候，又一个不利的传闻传入了闵妃的耳中。说中国不看重正室、侧室，只讲究先后，中国不想承认闵妃的儿子当国王，会让李熙与妃子之间生的儿子[20]当继承人。据日本史书记载，朝鲜皇室主动找到驻扎在釜山的日本代表花房义质，希望日本向清政府说情。作为交换，朝鲜愿意和日本开始开国谈判。

闵妃派使臣与日本人交往的事情被大院君知道，联络人后来受到处罚。1875年朝鲜派使者前往北京，提出认可闵妃的儿子为国王继承人，北京同意。1880年，完和突然死去，据说是被闵妃派人毒死的，真相不明。

1874年11月，闵妃最信赖的表哥在家中打开一个送来的小箱子时，里面的爆炸物爆炸，他立刻被炸死，闵妃仍怀疑与大院君有关。1875年底，大院君的哥哥家再遇火灾。怀疑目光再次集中到大院君身上。[21]

1874年底，日本侵台军队刚刚撤回日本，1875年日本就转向北方的朝鲜。日本派往朝鲜的代表广津弘信向政府提议："依然采用老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建议派遣一、两艘军舰以测量为名向朝鲜示威。"用军舰推动"谈判"的建议被政府采纳，"云扬号"是一艘长州从英国买来的245吨的炮舰，1875年5月它与其他两艘军舰一起驶入了釜山港。7月该舰驶回长崎，9月该舰再次离开长崎进入江华岛。江华岛是进入汉城的要塞，日舰以要获取淡水为由放下了小船，朝鲜发炮警告，小船后来被安全回收上"云扬号"，日本方面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可日本以受到攻击为名，开始向朝鲜炮台开炮，随后日本军人登陆，放火烧毁房屋，造成30多名朝鲜军民死伤，9月28日"云扬号"返回长崎。

《公爵山县有朋传》中记载"一切均按照原计划实施"。

而《西乡隆盛语录》中，他是这样评述这次行动的（1875年10月8日）：

与朝鲜的交往持续了数百年，一新之后，两国间再生隔阂，谈判也进行了五、六年。这次终于到了最后关头。（略）即便要发动战争，也应先向对方通告，对方在知道来意之后开炮的话，那属于敌对行为。但是，没有向对方进行任何通告就开炮。（略）我国所采取的态度，一直是轻视对方。因为对方向我方开炮，所以我们也只能

应战，这种说法与迄今为止的交往不符，是天理难容的羞耻行为。



1873年西乡曾要求政府派自己去朝鲜，1874年大久保利通要求政府派他去中国，1875年木户要求政府派他去朝鲜。临近出发的11月13日，木户突发脑溢血，大久保利通推荐萨摩出身的黑田清隆与长州出身的井上馨分别作为正副使前往。

1876年1月6日日本船队出发。日本当时所能派遣的舰只非常有限，由6艘船组成的舰队因船速不一样而无法组成编队同行，结果只好分头各自行动，约好在途中约定地点会合。率领的所谓军队，也仅有仪仗兵51人，军人211人。

会谈一开始，日本方面诈称还有4000军人不久将到来，要求朝鲜"准备宿舍"；会场内在谈判，会场外的军舰在不断开炮，日本人称这是为了庆祝日本的"纪元节"[22]。最初约定谈判进行三天，可谈判刚一开始，日本方面就拿出事先写好的文件要朝鲜签字，黑田与井上威胁道：不答应日本提出的条件，就化朝鲜为焦土。最后期限拖过了10多天，也没见日本有进一步行动。日本要清政府调解，实际上就是要清政府压迫朝鲜，好似大久保到北京谈判要找英国压迫李鸿章。在清政府的压力下，朝鲜后来与日本签署了首个对外条约，它同时是日本首个对外的不平等条约。[23]

佩里来日本让日本签署条约，日本人认为是耻辱；日本对朝鲜之举比当年佩里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却为自己的"外交胜利"雀跃。寺岛外务卿对美国驻日本公使称：向朝鲜派遣全权代表团是"效仿当年佩里将军之故智，促进朝鲜和平开国"。

日本一方面派遣使节团赴欧美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却要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自己的友邦。一方面称列强让自己蒙羞；另一方面将"迫使友邦就范"视为"弘扬国威"。英国公使在向本国政府的报告书中写道："《江华条约》与1858年的《日英条约》非常相似。"

依照常理，谁让武士"蒙羞"，武士就应该找谁去"雪耻"。约翰睡了田中的媳妇，可他却要去抢夺张三的老婆。日本武士对强者"送礼"，对弱者"抢夺"，《江华岛条约》与半年前日本与沙俄签署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81年10月，日本驻英国公使森有礼向英国外相提出"取消领事裁判权"，称此举侵犯了日本的国家主权，英国外务大臣格兰威尔反诘道：日本与朝鲜签署的条约，其中就有自主领事裁判权。



不值钱的尊严

1866年12月，中冈慎太郎[24]就如何与“外夷”交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某之攘夷策，在于今日深结外夷。既云结交，当为涕出妻吴之意，其尤为亲切者，于妻吴两字颇可玩味。由此而可向海外诸国派出书生，或雇佣外国人开发国产，断然大举开国。如此可立即建立武备，操练兵丁，以讨伐搅乱名分道理而入侵之强暴外贼。”

“涕出妻吴”原为《孟子》中的一个故事。说齐国为了避免遭受吴国的入侵，齐国国王景公便将自己的女儿嫁至吴国。吉田松阴在其《讲孟余话》中以“齐景公流涕嫁女于吴，此辈以一时之权术为保国之良策，犹梦中亦不知人间之羞耻”为例，强调讨好、谄媚外夷是奇耻大辱。他强调，日本对“外夷”绝对不能用讨好、巴结的手段。

可被吉田松阴唾弃的“谄媚”，后来竟被自诩为他的高足的长州武士反复使用。

1871年11月新政府“修约”使节团启程，井上馨作为大藏卿留守，后因预算分配问题与法务卿江藤闹翻，他辞去了政府职务。

1876年1月井上馨主动请缨去朝鲜，因胁迫朝鲜签署《江华岛条约》有功，回国后他向政府提出赴欧美“考察”获得批准，1876年他作为新政府高官出国，不单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巨额经济资助，还获准携带妻小。

在美国小住两个多月后井上前往英国，已经41岁的井上开始与其他年轻的日本留学生一起学习英语、经济。后来他又去德国、法国，1878年7月，他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欧美考察返回日本，此前日本刚刚结束了“西南战争”（1877)。回国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工部卿”，后又兼任“外务卿”。一年之后的1879年(明治十二年)10月，井上被任命为“修改条约委员会委员长”，以前没有解决的修约问题，再次作为“悬案”摆在了他的面前。井上公开表示：外交就是“演戏”，需要“时而愤怒；时而温言”，对待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要巧妙运用上述两种手段交替演出”。

中国儒教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仁”，孔子将“仁”说解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虽然也说自己经受了儒教的洗礼，可在“纵向”的日本社会，中国的“仁”被改变成为日本式的“己所不欲，必施于弱小”。

新政府领导人认为：外国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日本，一是关税不能自主。也就是说，制定进出口关税，日本人说了不算，外国人说了算，一进一出，日本的经济利益受到重大损害。还有就是“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日本犯罪，日本无权处罚

外国人，必须由外国领事来充当法官，由他来判断本国国民是否犯罪。即便认定为犯罪，应该如何治罪也是外国领事说了算。外国领事往往偏袒自己的国民，这让很多犯罪的外国人没有受到应有惩罚。

一新政府领导人最初希望解决关税自主问题，1871 年就派出了庞大代表团，最后无功而返，修约谈判的舞台此后转移到了日本国内。

1875 年 11 月开始，外务卿寺岛忠则开始与列强谈判，他主要着眼于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关税自主。英、法、德听到日本新政府要收回关税自主权，立刻断然拒绝，初次谈判立刻以失败告终，寺岛因此辞职。

1879 年井上馨出任外务卿，他的任务依然是修改条约，关税自主涉及利益，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列强不比朝鲜、琉球这样的弱小对手，用威胁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对列强强硬，日本又怕激怒对方，井上因此改变方向与方法。井上馨将修改条约的重点转向废除“领事裁判权”，对于另外一个关税问题，他提出要修改税率。

1880 年(明治十三年)，日本再次向英国提出修改条约草案，立刻遭到英国的拒绝。

1880 年 11 月 3 日，新政府领导人组织了日本近代史上的首次舞会[25]，这一天是明治天皇的生日[26]。在寄宿学生一个月包吃、包住只要四日元的年代，这次舞会的接待费用高达 2660 多日元。也就是说，相当于 600 多个学生在东京生活一个月的费用，一个晚上就被消耗在“娱乐外国人”上。[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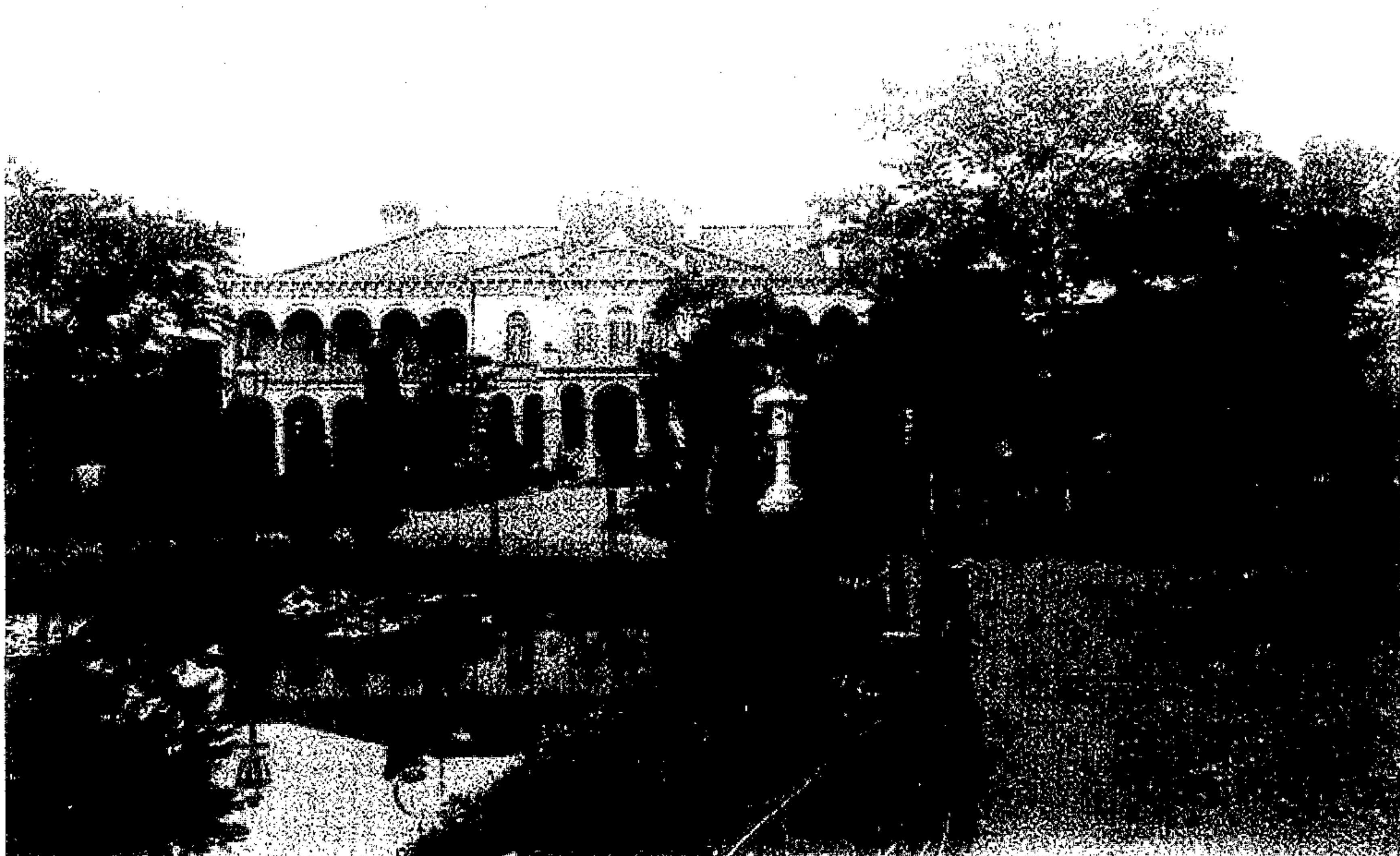
在井上馨的积极建议并推动下，1880 年底日本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建设一个专门接待欧美人，与他们亲近的“文明设施”。该设施于 1881 年(明治十四年)1 月动工，1883 年(十六年)7 月落成，耗资 14 万日元。

该设施被命名为“鹿鸣馆”，它取自中国《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命名者是井上妻子武子的前夫。新政府领导人要让“羞辱”了自己的列强使节，在东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井上馨希望用轻歌曼舞“软化”列强态度，对弱者要“威压”；对强者则用“奉承”“谄媚”手段，愉悦强手会让自己易于达到目的。

连在公开场合与陌生异性说话都会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年代，让日本女子被“外夷”搂抱跳舞更属大逆不道，况且几乎无人知道何谓“交谊舞”，更不知该如何踩舞步。为了赶在“鹿鸣馆”正式开馆迎客时能够有日本女子陪伴“外夷”跳舞，井上专门聘请在东京从事专家服务同时又是跳舞高手的外国人，请他们先教会日本女子跳舞。

1883 年 11 月 28 日“鹿鸣馆”正式开馆迎客。

1884 年 11 月 3 日的“天长节”，是接待人数最多的一次，当晚该馆接待人数多



鹿鸣馆

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方针的指引下，鹿鸣馆成了日本近代欧化主义的象征，不但开日本人穿西服、跳交谊舞的先河，还成了日本社交界的启蒙，洋楼本身也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一道风景。但在西洋人眼里，鹿鸣馆还是有些滑稽，他们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模仿，甚至讽刺它是"东施效颦"、"公开的大闹剧"。

达1300多人。一个月之后朝鲜爆发了"甲申事变"，受日本支持的金玉均等模仿日本"一新"，用最野蛮的手段在朝鲜"推行文明"，与1882年"壬午事变"后同样，1884年日本对朝鲜继续实施高压政策，其间的外务卿就是井上馨。

"鹿鸣馆"是新政府领导人向列强表示"谦逊"的舞台，新政府领导人要让自己成为"最模范的学生"，着洋服、吃洋食、与洋人相拥跳舞，学得惟妙惟肖，天下只有先生对不努力的学生动怒，从没有先生惩罚认真学习的学生的事例。日本领导人白天在修约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夜晚则"耳鬓厮磨"，井上馨要用温柔日本女子"软化"剽悍洋人的"坏脾气"。

1885年"天长节"，外务卿井上馨主持了庆祝天皇生日的宴会，法国海军军人皮埃尔洛蒂应邀出席了招待会，皮埃尔洛蒂出生于法国，加入海军之后到过许多殖民地国家。他于1885年（明治十八年）7月8日来到日本长崎，去了中国一趟之后再返回日本。10月11日来到横滨，一个月后出席了在鹿鸣馆举行的舞会。

事后，他将自己的经历写进了《江户舞会》这篇纪实小说中。[28]

为了便于居住在横滨的外国人参加晚上的晚宴，横滨特意为此开出专列，晚上八点三十分，专列从横滨站出发，一小时后达到东京新桥，从那里再换乘人力车去鹿鸣馆，凌晨一点，从新桥开出的专列再将参加舞会的外国人送回横滨。

……走出新桥车站，正在对如何前往（鹿鸣馆）犹豫之时，好似专门守候我们许久的人力车，突然向我们飞奔过来。“人力车夫”日语叫作“人马”，以人当马的意思，是人拉人的飞奔者。他们全身黑色装束，像乌鸦般围在我们四周，顷刻间我们因被他们包围而顿感身边昏暗下来。他们拉着人力车跳跃、吆喝，相互冲撞，好似一群恶魔的后代，挡住我们的去路。

…… “鹿鸣馆” 内外的庭院中，高高低低地挂满了各种灯笼，在瓦斯灯照耀下，大门口上方的“鹿鸣馆”牌匾格外醒目。“鹿鸣馆”内满是各种旗帜、菊花、绿色植物、鲜花、盆景等，遍布楼上、楼下的装饰让来宾目不暇接。井上和夫人身着晚礼服站在门前的台阶上，作为东道主迎候每位来宾。

……铺着台布的餐桌上摆满了银餐具，还有蘑菇炖鸡肉、油炸土豆泥、鲑鱼、三明治、冰淇淋等，食品之丰盛程度绝不亚于巴黎的上流舞会。美国与日本的水果，金字塔般地装在精巧的篮子中，香槟酒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上等货。[29]

……在江户出席“鹿鸣馆”的舞会，与身着巴黎流行服装的日本女性在一起跳舞，而且还是化装舞会，让人倍感滑稽与奇特。

“鹿鸣馆”内是不亚于巴黎的奢华；馆外是人当畜生的“人马”，“鹿明馆”这栋建筑是“文明”与“落后”的分水岭，内、外完全是两重天。“鹿鸣馆”里面是“人上人”，他们享受“文明”，外面是“人下人”，他们提供服务。“上流社会”男女动员，政府高官与他们的家属一起，为取悦“外夷”同吃共舞；“鹿鸣馆”外，“人马”希望舞会能够早点结束，为了能够拉上客人，他们在寒风中苦苦等待，他们是政府收取“进步税”的对象。

井上后将修约谈判由公开转为秘密。外国人提出领事裁判权的理由有二，一：东方国家法律不健全，与西方的法律不同；二：东方国家的官吏定罪，随意性非常强，他们会作出不利于西方人的判决。对此井上主张“西方是先生，日本是学生”，强调日本现在正积极向西方学习，不仅法律，所有一切都要向西方看齐。至于第二个理由，好似可以与“外夷”在一个殿堂中一起相拥跳舞那样，日本人可以让外国人参与到审判之中，日本准备任用外国人出任法官、检察官，大家一起共事，以此消除列强担心的偏袒问题。井上的解决方案似乎略有进展，可日本外界得知后一致反对，井上遂成为攻击对象，结果政府解除了他的职务。

鹿鸣馆所起作用并没有新政府领导人期待的那么高，在井上馨被解除职务之后不久，“鹿鸣馆”内舞会的灯光也随之熄灭了。

1887年底（明治二十年）开始，大隈出任外相并继续与外国人谈判修约，1889年2月明治新政府颁布新宪法，同年10月18日，大隈出席完内阁会议乘马车回家途中，遇到“玄洋社”成员的炸弹袭击，大隈右腿被炸伤，后来不得不截肢。投掷炸弹的来岛恒喜在袭击后剖腹自杀。这次袭击，一让列强知道日本国内对不平等条约多么不满；二让大隈丢了一次人。因为他一直作为政府反对派，不断指责政府软弱，结果政府让他出马“修约”，可他依然无法推进一步。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鹿鸣馆”转用做“华族会馆”，1893年陆奥宗光接任外相后决定向西方国家展示一下“日本是文明强国”。日本周边的近邻，跳舞、吃饭没份；轮到日本显示“威严”时就被当成“证据”[30]。日本要通过对“弱国”动武，向列强表现自己之“强”。也就是说，不敢向列强逞强，但要对列强暗示，假如日本拿这些兵器对付强国，那么将会是“国家剖腹”。

1894年3月开始，日本政府利用金玉均在上海被杀事件在国内大造舆论，国内反对派指责政府“软弱外交”，有要求“修改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的；还有要“惩罚中国对日本无礼”的，日本私下向英国表示，武士刀绝不会对准英国，而是要“帮助朝鲜独立”，此后的1894年7月16日，日、英双方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约定五年之后废除“领事裁判权”，日本有自定关税的权利。英国外相金伯利在签约的祝酒仪式上致辞说：“对日本来说，此条约之性质远远胜于日本打败清帝国之大军。”实际上直到1911年，日本才完全恢复了“关税自主权”。

条约签署的次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在朝鲜对中国清政府军开战，在英国看来，中、日之间的战争或许可以让狂热的日本降点温，他们没有想到清政府、北洋海军会那么不堪一击。

1940年，日本人干脆将“鹿鸣馆”彻底拆除，看着它曾“款待嘉宾”但一无所获都“感觉耻辱”，昭和时代用枪炮“款待外夷”。

并不矛盾的忠诚与背叛

在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的时代，日、美之间正在进行太平洋战争。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人只忠于天皇。”[31]“即便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日本人也

无法最终变成美国人，他们也不会效忠于美国。”受这一见解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所有居住在本国的日本人通通关进了集中营。本尼迪克特是在日本人集中营里完成了她的“田野访问”。

她在书中为“忠诚”专辟一章。该章以日本人所共知的一个小学生课文开头。

八公是只可爱的小狗，它出生后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在主人家受到子女般的疼爱，此后，它那弱小的身体也强壮了起来。主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它总陪送到车站，傍晚下班回家时，八公又去车站迎接主人。

不久主人去世了，八公也许不知道，它每天都去寻找主人。照例到那个车站，每当电车到站，它就注视人群中有没有它的主人。

岁月就这样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但仍然可以看到那已经长大、衰老的八公，它每天在车站前寻找着主人。[32]

在东京涩谷车站前的小广场上，有一尊专门为“忠犬八公”塑造的铜像。为“八公”塑造铜像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过往行人有一个约会的地标；也不是因为狗的主人有钱，可以为自己死去的宠物狗专门在繁华街市上竖立一个纪念碑，为狗立碑的是东京都政府，目的在于让所有学过这一小学课本的日本人都有一种实际感受。政府希望通过它警示活人：狗都能如此忠诚，人岂能不如狗？

“忠”是儒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随儒家哲学传入日本并进入日本统治者的视野。德川家在江户设立幕府之后，历代德川家将军尤其强调“忠”。日本的统治阶级在不同时代、不同侧重地引进儒教中的不同内容，如此肢解引进是因为，统治阶级只将儒教中有利于自己支配统治的内容剜走。

“忠诚”与“背叛”，是对同一内容的两种表现，德川时代最强调“忠诚”。江户时代的创始人德川家康一生中经历过多次沉浮，看到了战国时代中太多的“不忠”与“背叛”，它是日本“下克上”时的永恒主题。为了保证德川家的统治能够持续长久，防止出现“不忠”，德川幕府将“忠”的故事反复演绎，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赞美“忠”；鞭挞“背叛”。

日本没有引进儒家的“易姓革命”，但日本并不缺少“改朝换代”，日本的“改朝换代”极具日本特色。日本用“架空”的方式，让存在变得有名无实。贵族“架空”天皇，武士“架空”贵族，“一新”后藩士“架空”藩主。

在日语中，“背叛”用“裏切”这两个汉字表示，日语读（うらぎり）。它通过一个具体行为，非常形象地表现出“背叛”这个词的内涵。“表裏”是一对反义词，“表”



是正面，"裹"是背面、反面。日语"忠"这个词，写汉字为"真心"，"一心不二"就是"忠"。

"切"是武士最常用的战斗手段，武士间相互厮杀就是用刀对砍。"裹切"表示从自己同伴的身后用刀砍他。武士的作战方式是：先各自通报家门，高声宣告己方的家世以及历代战功，双方都准备好之后开始交战。在这种交锋中，失败者输在能力与坏运气上，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死在武艺高强者刀下，是一种荣耀，相反，偷袭最无耻的行为，在对手没有准备或者没有准备好之前，就突然抽刀砍向对方，它是卑怯、没有勇气的卑鄙行为。[33] 更为武士所不齿的是：当自己同伴奋勇杀敌时，某人突然抽刀，不是加入帮助自己同伴，而是从自己同伴的背后，砍向集中精力杀敌的他，这种"从背后刀砍自己人"就是"裹切"，翻译成中文就是"背叛"。日语这个词造得非常形象，武士战斗是相互用刀对砍，这种格斗方式最讲究集团作战，乘对手不备杀伤力都非常大，"从背后砍向自己人"危害就更加不可估量。从日本历史上看，历次改朝换代都由"背叛"导致，结果是"背叛者"得"天下"，虽然"背叛"是"污名"，是最"不名誉"的行为，可现实收获却是最大的。

在日本历史上，许多武士、武将最初都是以"全身心追随"的"忠诚"面目出现，看到时机对自己有利时，他们就会"舍名取实"，宁愿留"污名"也要"从背后砍同伴"，用"背叛"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背后砍"是武士的历史污点，可武士更看中结果，达到目的至上，"从背后砍"才有奇迹发生。

在背叛中进行的改朝换代

公元 645 年，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与中臣镰足（后来的藤原镰足）联合起来发动政变，该政变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大化革新"。

中大兄皇子利用小贵族中臣镰足（后来的藤原家），杀死了"架空"天皇家的大贵族苏我入鹿，从此夺回了天皇家对国家的控制权。对中臣镰足来说，他是"提着脑袋"追随中大兄皇子，假如军事政变失败，具有相当实力的大贵族苏我入鹿，必将中大兄皇子以及"背叛"的中臣镰足杀死无疑。军事政变成功，冒险"效忠"成为了索要"恩给"[34] 的依据，天皇赐中臣镰足改姓"藤原"，而"藤原家"也因奋勇杀死架空天皇家的大贵族苏我入鹿，从原来的小贵族摇身一变，成为替代苏我家族、辅助天皇家执政的显赫家族。

可"忠诚者"总是无法"鞠躬尽瘁"，最初帮助天皇家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任务结束之后，藤原家成为后来的最大"背叛者"。自"大化革新"后到平安时代前期（794-1192）的 200 多年时间里，藤原家始终以辅佐天皇家执政的"忠臣"面目出

现，而实际上，天皇家完全被“架空”，“尽忠”被“背叛”彻底掏空。圣德太子时代，圣德太子的姑母是天皇，他本人是“摄政”。精神领袖与实际把持国政者都来自天皇家族。此后，一切发生了改变，大权被藤原家夺走。

“摄政”一词来自于中国的《史记》。“成王既功，周公摄政”。“关白”一词来自《汉书霍光传》：“诸事皆先关白光（霍光），然后奏御天子。”858年，藤原良房最先成为“摄政”。藤原家采取的手段是：在天皇年幼时，把藤原家的女儿嫁给天皇，然后以天皇年幼为名，由藤原家统率百官，总揽朝政。天皇成人之后，总揽朝政的藤原家更名为“关白”，对成人天皇的控制依然如故。差异仅在“摄政”与“关白”这两个“名”的称谓上，“实”都是架空天皇，由藤原家主宰国家大权。

“摄关政治”由此成为日本政坛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它最初指起源于平安时代、由藤原家族控制朝政的一种政治体制，后来泛指所有“架空某个领导人，背后有实际操纵者的‘傀儡政治’”。凡存在操纵与被操纵的政治体制，都是“摄关政治”。藤原家为了保证自己家族对天皇的绝对控制，他们不断废、立天皇，不断将自己家的女儿嫁给天皇，让自己女儿成为皇妃，天皇成为藤原家的女婿或孙女婿，藤原家则永远是天皇的岳父或者外祖父。

无论“摄政”还是“关白”政治体制，天皇一直处于“儿皇帝”地位的事实没有改变。“外戚专权”造成“主从关系”名存实亡；而“架空”则让“忠诚”“名实”分离。现实政治中，“效忠”天皇的“臣下”，实际上是“天皇”的“皇上”。天皇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可自己又没有实力驱逐藤原家，因此只能寻找并依赖表示愿意“效忠”自己的



浮世绘——日本天皇的后宫生活

摄关政治的出现，让日本天皇成为了被“架空”的国家首脑。至于实权，则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而且这也不是一时或个别现象，这种天皇为傀儡的政治体制，一直延续到昭和时代。在政治上无所事事的天皇，也就只能在后宫发泄他的精力了。

“臣下”，帮助自己恢复地位，颠覆“颠覆者”。另一方面，对藤原家不满的贵族与武士，也以藤原家架空天皇为由聚集在天皇周围，他们想推翻藤原家自己上。

藤原家的权力在藤原道长、赖通父子的时代达到顶峰。1074 年赖通死去之后，白河天皇为了与外戚掌权的“摄关政治”抗衡，开始推行“院政”[36]。他将皇位让给年仅七岁的善仁亲王，也就是后来的崛河天皇，白河天皇自称“上皇”。1107 年崛河天皇去世，他又让自己的孙子，年仅四岁的宗仁亲王即位，他就是后来的鸟羽天皇。天皇成年之后，白河上皇迫其退位，再让自己的曾孙显仁即位，他就是后来的崇德天皇。1129 年，扶植了四代天皇，而实际上为了方便自己操纵的白河上皇去世。爷爷死了，做孙子的鸟羽上皇觉得自己出头的时代到来了。他 20 岁时被爷爷赶下台，现在爷爷死了，他要以爷爷为榜样，他开始决定天皇的安排。1141 年，他迫使自己的儿子，年仅 22 岁的崇德天皇退位，让他另外一个儿子体仁就任天皇(近卫天皇)，后者出任天皇时年仅两岁。1155 年，近卫天皇 16 岁时去世，鸟羽上皇再选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雅仁亲王即位，他就是后白河天皇。

“院政”的出现，就是为了反抗藤原家独揽朝政。1156 年 7 月(保元元年)鸟羽法皇(上皇、天皇出家后称法皇)去世，退位的崇德天皇与在位的后白河天皇之间，为了争夺皇位而展开了一场厮杀。

武士最初称“侍”，意为效忠天皇、听命于贵族的地方警察。他们原为贵族家的旁支，在京都没有那么多官位安排、消化这些人，地方上又需要很多人员监管天皇以及贵族家的财产，他们就从京城被派往地方，最初的工作是替中央贵族看管地方财产。圣德太子学习中国，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让全日本的田地都归属于天皇家，中央官僚是藤原家，地方官吏、负责收租的是“武士”，由他们实际管理生产者－农民。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管理地方的“侍”在“公田”之外开垦出许多“私田”，他们从原来的吃皇粮者变成了地主。

崇德天皇一方的贵族是藤原忠实、赖长父子，“效忠”他们的武士是源为义、为朝父子。后白河天皇一方，贵族是藤原忠通，他是忠实的儿子、赖长的哥哥，忠通从地方上请来武士平清盛、源义朝。皇室之间争夺皇位，贵族之间争夺对天皇的控制权，武士之间争夺“效忠”对象，一切都要通过战争来见分晓。

“保元之乱”崇德天皇败北，后白河天皇一方战胜，支持后白河天皇的武士付出了巨大代价，源义朝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源为义，流放了自己的弟弟源为朝；平清盛则战胜了自己的叔叔平忠正。

在源义朝和平清盛这两个地方豪强的支持下，后白河天皇最终获胜，“架空”天皇的藤原家时代结束了。战胜后立刻面临如何分配胜利果实的问题，原本齐心协

力支持天皇的源氏与平氏之间发生了对立。他们为“表忠”来到京都，进京后不愿再听藤原家指挥，恰好皇室也想踢开压在自己头上的藤原家，天皇家与武家一拍即合，贵族藤原家出局，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直接向天皇表“忠”的武士，在驱逐了藤原家之后，丝毫没有再返回地方的意思，他们要填补藤原家退出政治舞台后的权力真空。“保元之乱”因此成为地方武士进入京都这一政治舞台的标志。

三年后的1159年(平治元年)，原本一同“效忠”后白河天皇的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再次为“争宠”开战。对武士来说，这次战争又是争夺对后白河天皇控制权的战争，后白河天皇也希望武士之间厮杀相互削弱，自己最终“渔翁得利”。“上”对“下”的要求是“忠”；而“下”对“上”则要求作为回报的“恩”。这个“恩”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恩情”，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恩给”是升官与赏钱。源义朝认为自己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因此要求最多的回报。天皇对此不满，他弃源家转平家，借助平家来抗衡源家。源义朝无法达到目的，源平从向天皇争宠到相互猜疑，最终“盟友”转变为“仇敌”，源义朝与平清盛之间爆发战争。

来自“西国”的武士头领平清盛最终获得胜利。在后来的“论功行赏”中，天皇让平清盛升官，1160年他晋升为“正三位”，成为武士中的首任公卿。让武士变成贵族，同时也是天皇压制藤原家的一种政治阴谋。两年后的1162年，平清盛再晋升为“从二位”，1166年升任“正二位”，出任“内大臣”。1167年升任“从一位”，跳过“左、右大臣”，出任“太政大臣”。“太政大臣”是辅助天皇的最高职位，以往这个职位世代都是由藤原家的贵族出任，武士出身者任此职，平清盛是第一个。

后白河上皇既要利用平清盛打击“架空”天皇家的世袭贵族藤原家；还要他打击向自己讨要报酬的武将源义朝。所有对手都被击退后，天皇开始为如何对付平清盛头痛了。平清盛欲取代藤原家，开始新的“摄关政治”。贵族“架空”天皇结束了，武士“架空”天皇继续接力。平清盛从最初“效忠”到公然“背叛”。“忠”是“下”的行为，平清盛已经居“上”，因此他要将天皇“倒悬”，让天皇“效忠”他。平清盛以藤原家为榜样，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天皇，他本人把持朝政，用掌控“赏罚权”的方法，建立新的“效忠”体系。后白河天皇对此不满，他就废黜后白河天皇，另立天皇。他后来让自己的外孙为新天皇，也就是安德天皇。“效忠”者“从背后砍向天皇”。

1177年、1179年，先后出现了两次后白河上皇积极参与、密谋推翻平清盛的战争。1179年，平清盛最终软禁了后白河法皇。

1160年被平家打败后，源义朝开始逃亡，在他逃亡的路上，一个以前一直对他“真心”的部下“背叛”，“从背后砍一刀”的结果，源义朝被杀身亡。

源义朝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源赖朝，另一个名源义经，先后成了平清盛





浮世绘——《义经鞍马山图》

正文中所提到的源义经为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出身于河内源氏的武士。父亲源义朝在平治之乱中为平清盛所败后，源义经在7岁时被送到京都鞍马寺学习。及长，源义经与兄长源赖朝一起举兵讨伐平家，在著名的战役源平合战中战功彪炳，威名显赫。但也因功高震主为源赖朝所猜忌，最终兄弟反目成仇。源赖朝得到后白河法皇的院宣后，在全国发布通缉命令追捕义经。义经在走投无路之下再度投靠藤原秀衡，可怜的义经最后在高馆自尽。由于其生涯富有传奇与悲剧的色彩，源义经为已经成日本人所爱戴的悲剧英雄之一。

的俘虏。平清盛看在以前"盟友"的份上，没有将源义朝的两个儿子杀死，而是将他们分别流放，一个流放到北方的一个寺院，另一个流放到日本东部。

在向天皇家"效忠"、杀入京都并驱逐天皇政治对手藤原家的过程中，源家的功劳丝毫不亚于平家，此后非但没有分享到任何胜利果实，反而被平家杀得七零八落，家破人亡。对于这样的结局，源氏的后裔当然不甘心。而他们是源家后代的身份，也成为后来反平家武士揭竿而起、聚集在源家一边的"大义名分"。源家后代隐忍生活的20年，同时也是平家架空天皇家的20年，还是平家由盛转衰的20年。

"平治之乱"的20年后，1180年，被软禁的后白河法皇之二子以仁王，企图解救被软禁的父亲，再次组织了针对平家的军事政变，可举兵后不久他就被平家军队镇压并处死。以仁王在1180年4月被杀，而以仁王向全国武士发出征讨平家的呼吁，却成为反平家武士们汇集并且叛乱的旗帜，他们攻击平氏对天皇家"不忠"，是"背叛者"，他们以"效忠天皇"为名举兵。经过20年磨难的源赖朝也于8月举兵，开始与平家公然对抗。

1181年平清盛死去，清盛的儿子宗盛挟持安德天皇逃离京都，后白河法皇则被丢在了京都。法皇指责宗盛是"叛逆贼军"，下令源家军队讨伐平家。一夜之间，源

家由“贼臣”变成“忠臣”。“忠臣”与“贼臣”的界限仅仅是天皇的一句话。天皇对“臣子”的手段，任何时候都是扶植一个，冷落另一个。源赖朝的堂弟源义仲率先攻入京都，天皇认为他提出的“返恩”要求过高，后白河法皇就表现出更亲近源赖朝。义仲后来攻击法皇住所，将他逮捕并软禁，他再次要求法皇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1184)，虽然义仲如愿以偿，但追随他进入京都的武士们看到无法通过义仲获得满意的回报，许多部下弃他而去。

对于法皇来说，他非常了解武士们的欲求，只要武士中不乏希望通过天皇获得“恩给”的人，愿对天皇“奉公”的武士就会不绝于后。天皇利用自己手中的“委任大权”，不服从自己者就冷落；同时对另外一个“热情”。天皇对义仲不满，他就私下联系义经。义仲与赖朝之间的矛盾激化。义仲也曾暗自派人与平家联系，希望联合对抗赖朝，但遭到拒绝。

义经接到法皇命令后，率兵攻入京都，义仲想挟持法皇逃离京都，但没有成功，义经战胜了义仲，义仲战败身亡。堂兄弟之间的同根相煎刚结束，义经与同父异母兄弟赖朝之间的同根相煎再次开始。1185年平家灭亡，义经与赖朝之间公然爆发战争。法皇再次坐山观虎斗。

源义经致书其兄，痛陈与兄长的血肉之情，而这些无法打动源赖朝，义经不得不开始逃亡，后来走投无路，在杀死妻儿之后自杀。

源赖朝平定了全国之后，1190年首次前往京都。源家为获得天下失去了众多亲人，唯一得益者是后白河法皇，1192年后白河法皇去世，赖朝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将军”称号。赖朝不再模仿平家通过嫁女儿给天皇的方式，在京都“架空”天皇，他在远离京都的东国设立镰仓幕府，源赖朝让天皇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委托他领导国家。源赖朝向包括京都在内的全国各地派遣效忠他的部下，在地方上建立起听命于幕府的地方政权。以前推行“皇土、皇民”政策，一切财富以天皇名义进行再分配；现在武家直接控制全国的收入，皇室、贵族受制于镰仓幕府，将军掌握了赏罚权，由将军主持“论功行赏”。

据史书记载，有一个武士为了向源赖朝表忠，杀死了密谋反抗源赖朝的领主，事后他提着前领主的首级向源赖朝请功，而源赖朝给这位“表忠”武士的“恩给”是将他斩首。理由是：犯上作乱是最大的不忠，对这类“从背后砍杀主人”的“效忠者”绝对不能信任。

自镰仓幕府开始，日本进入了长达800年的武士时代，直至今日，日本社会中出现的一切，都可以在武士时代找到“原型”。“忠诚”与“背叛”在这800年中被反复锤炼，最终演化为日本独特的部分。

德川家康，忠臣还是叛将？

德川家康(1542-1616)是江户幕府的初代将军。

德川家康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多地经历了“忠诚”与“背叛”。家康的祖父松平清康，年仅25岁时被家臣“从背后砍了一刀”，背叛者名阿部弥七郎，他原是清康的忠实部下。清康的儿子、也就是家康的父亲松平广忠，当时只有10岁。

松平家的领地名三河，它与织田信长的世袭领地尾张比邻，在日本最终的统治者没有胜出之前，这里一直处于战乱状态。广忠因年幼无法继承父业，且家族内部又争夺权力相互厮杀，广忠不得不流落他乡。后来广忠投靠今川家(室町足利的后裔)，而他的妻哥家效忠于织田家，当今川家与织田家之间爆发争夺领地的战争时，广忠的家庭也被“忠诚”无情地分割为二。在竹千代[36]1岁10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离开父亲松平广忠。为了向今川家表忠，松平广忠赶走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尽管这样，今川家仍然不相信广忠的忠诚，今川家要求让竹千代作为人质寄养在自己家。竹千代六岁时，在对长辈之间为何不断战争？父母为何离异？为何抛弃幼小的他？等还没有概念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自己家。在被送往今川家的途中，竹千代的外祖父将他劫持走，最终他没能按计划前往今川家，而被掳进了向织田家表忠的母亲家。在这里，他认识了比他年长八岁的织田信长。

在今川家与织田家征战的过程中，家康爷爷的命运同样降临在了家康父亲身上。广忠24岁那年，他被部下岩松八弥“从背后砍了一刀”。广忠十岁时经历了父亲被杀；而竹千代八岁经历了父亲被杀。“忠诚”与“背叛”，对家康来说是血淋淋的悲剧。

父亲广忠死后，今川家与织田家交换人质，年仅八岁的竹千代被再次交换回今川家，此后直到19岁，竹千代一直在今川家渡过。今川家是当时关中一带较有实力的大名，竹千代再次作为人质在今川义元家里生活了12年。在他16岁的时候，领主今川义元将侄女许配给竹千代为妻，这同时也是笼络松平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女子与竹千代育有一子。为了永远铭记今川家的恩情，竹千代改名为松平元康。“元”取自今川义元中的最后一个字；而“康”来自他祖父“清康”中的最后一个字。

1560年，27岁的尾张小领主织田信长，偷袭了在桶狭间休息的今川义元，今川义元军号称25000人，没想到败在了只有3000人的织田军手中。

今川家战败，松平元康不知所从。妻子是今川家人，自己也积极参与了今川义元与织田信长之间的战争，现在今川义元战败身亡，从“尽忠”的武士伦理来说，他要么选择为主人复仇，继续作战；要么追随自己的主人同赴黄泉剖腹自杀。可松平

元康选择了逃离战场，他回到了松平家的世袭领地冈崎。义元死了，他遂将名字中的“元”字去掉，改“元”为“家”，最后索性连姓也改了，不再姓“松平”，改姓“德川”，名“家康”。

织田信长战胜了今川义元之后，主动找到刚20岁的德川家康，要求结盟。虽然战胜了今川，可织田信长争夺天下的道路上对手还很多，今川家的亲家武田家就是其中之一。德川家康因与今川家关系密切，极有可能投靠武田家。从战略上考虑，策反德川家康“背叛”今川家，对织田家今后战胜武田家有重大意义，织田信长因此提出要与德川家康结盟。与织田家联盟，与其说让德川家康面临着“忠”的考验，不如说要经受“忠”的煎熬，因为家康娶今川家女子为妻，在今川家又生活了12年，如果投奔织田家，从此要背上“背叛今川家”的沉重十字架，尽管如此，德川家康还是最终选择了织田。德川家康这时才见到了一直追随织田家的亲生母亲，此时她已经改嫁。

织田当时28岁，德川20岁，而武田信玄已经41岁，武田更加老奸巨猾，他不会看中年青且没有实力的德川家康，这或许是德川家康选择织田信长的理由。为了让同盟更加稳固，织田信长将自己的女儿德姬许配给了德川家康的儿子（当时两人都年仅九岁），为了纪念俩家同盟，家康的儿子改名为“松平信康”，从织田信长名字中拿一“信”字，从德川家康名字中取一“康”字。家康与信长，既是同盟又是儿女亲家。同盟让德川家康从“背叛今川家”的咒语中解放出来，此后，他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将今川家的领地收入自己囊中。

“背叛”与武士所推崇的“忠诚”似乎格格不入，但是，在“名”与“实”的选择面前，武士首先选择现实利益。

松平信康与德姬结婚并一起生活之后，德姬与婆婆不和，德姬遂向自己父亲织田信长告恶状，告丈夫与婆婆“通敌”。婆婆是今川家女儿，今川家与武田家又有姻亲关系，此时织田信长的主要对手就是武田信玄，织田信长仅凭女儿的一面之词就信以为真，认定自己的女婿松平信康有“通敌”之嫌，他向德川家康下令，处死他们母子俩。这原本是家庭内部的婆媳间纠纷，没想到织田信长竟下令要家康处死母子两人。

是杀死妻儿？还是“从背后砍死”织田信长？与织田同盟了18年之久的家康，最终选择了维持同盟。“表忠”与“忍”是同义词，家康命令手下将妻子处死，让亲生儿子剖腹自杀（1576），当年德川家康38岁。家康父母为向不同主人表“忠”，当年忍痛离婚；轮到德川家康当父亲时，没想到悲剧重演，而且更加惨痛，为了向织田信长表“忠”，德川家康不得不冷酷地下令杀死自己的至亲，亲情要让位给“忠诚”。

1582年6月2日，京都发生了“本能寺之变”，明智光秀突然“从背后砍死”了织田信长和他的长子信忠。此时德川家康正带领一群亲信在京都附近的大阪一带游历，得知并且确认了织田父子被杀之后，家康时而说要立刻前往京都“救主”；时而说要“表忠”剖腹自杀，可这些都是测试手下是否“忠诚”于自己的表演。听到亲信们苦谏“应迅速返回自己领地”时，德川家康喜出望外地“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他们昼夜兼程，返回到自己老根据地。

丰臣秀吉杀死了背叛织田信长的明智光秀，织田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以为，父亲死了，父亲的“忠臣”们会拥立自己，可不久后发现，丰臣秀吉根本没有“鞠躬尽瘁”的想法。丰臣秀吉表面上拥立织田的第三个儿子，不久就将其冷落并抛弃，丰臣开始拥立织田的长孙为织田“统一大业”的继承人，而此时，织田信长的长孙还是个婴儿。丰臣的举动是“司马昭之心”。

信雄杀死了据说与秀吉暗通款曲的三个家老，然后投靠德川家康，希望德川家康帮助他继承父业，实现当上日本新一代霸主的梦想。而德川家康庇护织田信雄，仅仅是想获得自己是织田家的“忠臣”之“名”，同时将信雄作为与秀吉交换的一张牌。

“纵向地位”没有确立之前必有一争，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两个最具实力的人物最终爆发了冲突。短兵相接之后，丰臣秀吉选择与德川家康议和(1584)。秀吉以自己没有儿子为由，一定要收养德川家康的一个儿子为“养子”。当年家康让儿子改名“信康”并娶了织田女儿做儿媳妇；这次他让自己11岁的二儿子“於义丸”当人质，将他送入了秀吉居住的大阪城。於义丸在“秀吉”与“家康”中各取一个字，改名“秀康”。[37]

为了进一步笼络德川家康，两年后的1586年，也就是德川家康45岁那年，丰臣秀吉再让自己已经嫁人并育有一子的亲妹妹旭姬与前任丈夫离婚，改嫁给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为了表示对丰臣的“忠诚”，爽快地接受了丰臣秀吉已经44岁的妹妹，从此成为了丰臣秀吉的“妹夫”。日本当时的普遍结婚年龄是15岁，而这桩婚姻超出了正常结婚年龄30年。一方“强授”；另一方“欣然接受”，德川家康对“忠”表现出一种超人的“忍耐”，结婚四年后，“新娘”离开了人世。

为了让德川家康能够离开领地，安心前来京都向自己表示臣服，丰臣以母亲想与妹妹一起生活为由，将母亲送往家康的领地三河。在确认秀吉不会“从背后砍一刀”后，家康终于同意前往京都，“忠”变成了作秀的“演戏”。

织田死后，德川家康加快了扩张自己领地的步伐。他与北条家结盟，将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了北条氏直。丰臣秀吉确立了在日本的统治地位后，要求北条交出领地，北条拒绝服从。丰臣让德川家康“劝”北条服从。是牺牲“亲家”北条还是追随

秀吉，德川家康再次面临选择。从“盟友”的角度而言，北条家与丰臣秀吉现在都是德川家康的亲戚，可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只有永远的对手，没有永远的友谊与亲情，顾此就必然失彼，德川家康最终选择的依据是“实力至上”。从实力上来说，北条家明显劣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将“小”“切了抛弃”。他亲自写信给北条父子，劝他们服从丰臣秀吉，同时威胁，若不听劝，就将女儿督姬还回来。这实际上是向北条家发出“绝交信号”。北条父子拒绝对丰臣称臣，德川家康遂与丰臣秀吉一起，向北条家发动进攻。

这一仗结束后，秀吉借“论功行赏”之名，下令织田信长的儿子织田信雄与德川家康离开各自世代经营的领地，同时“转封”给他们更大的领地。表面上领地面积增大了，可实际上是为了削弱他们。交通要道、旱涝保收的关中地区要交给丰臣的亲信，而将他们俩发配到更加偏远的地方。让他们离开各自经营了几代人的世袭领地，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各自世袭领地上集聚力量，对丰臣家天下构成威胁。织田信雄拒绝服从命令，而德川家康选择了服从。他离开了世袭领地“关中”，前往新领地关东江户。而织田信雄因不服从命令，被丰臣秀吉没收原来的领地并流放。

德川家康以“忠臣”面目出现在丰臣秀吉面前。丰臣秀吉要德川家康提供劳役，德川家康就放下自己建设中的江户城，拿钱、带人欣然从命；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德川家康同样出人、出钱，德川家康的臣服态度，改变了丰臣对他的看法，从当初的疑心到后来放心，家康成为丰臣政权中的长老级人物。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随着儿子丰臣秀赖的出生，秀吉与外甥秀次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秀次当时是“关白”，而秀吉希望今后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最后秀吉逼迫秀次自杀。秀次死后，秀吉要求自己的家臣联名签署“血盟书”[38]。将“永不背叛丰臣家、对丰臣秀赖永远‘真心’[39]、坚持集体辅助原则”等宣誓内容写在纸上，然后签上各自姓名，再割破手指，在各自的签名上按上带指血的手印。

德川家康不但宣誓，写了血书，而且还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了秀赖，他与丰臣家可以说“亲上加亲”。他是丰臣秀吉的妹夫，秀吉是他儿子的义父，他又是秀吉的长辈，因为他孙女是秀吉的儿媳。

丰臣秀吉出身卑微，因找不到出身“武家”的家谱，他打消了出任将军的念头。为了让自己的血统变高贵，他让世袭贵族藤原家收养他为“义子”。他表面推崇“万世一系”的天皇家，实际上要建立丰臣家天下。他让天皇任命他为“摄政”，后以“关白”名义“辅助天皇”统治。1592年、1597年，他分别两次向朝鲜派兵，希望征服朝鲜，但都以失败告终。丰臣心力憔悴，终于在1598年7月大病不起，临死前，他将各家臣招至自己病床前，让他们将各自的“血盟书”交给家康等保管。丰臣秀吉在去世

前确立了"五大老"的"集体领导体制",让他们保证今后扶持秀赖(1593-1615),直到他可以完全亲政为止。这是他临死前的唯一一个心病,他不久后死去,时年62岁。

宣誓、写血书、联姻、直至杀亲人投靠,为了表示"忠",家康能干的都干了。这些都属于"忍",为了有朝一日让自己"变大"。简直就像等着秀吉死,"表演忠"才能结束那样,秀吉刚死半年,家康就立刻违背"誓约",开始政治联姻。

丰臣在世时(1595)制定了"五条誓约",其中第五条为"不能擅自联姻",在武士看来,"结盟"是发起攻击前的准备,而"联姻"仅仅是给"联盟"冠以美名。家康与四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名联姻,其他大老因此指责家康"违约不忠",家康用战争来回敬他们。1600年,也就是秀吉死去后的第二年,德川家康以"维护秀赖统治"为名,讨伐"谋反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战争中,秀赖出黄金两万两,大米两万石,家康出兵。

"关原之战"德川家大胜,此后他废止了秀吉生前确立的"五大老"集体辅助秀赖的体制。

1603年,家康消灭了其他对手,他被天皇任命为"将军"。秀吉的儿子秀赖当时只有10岁,他生活在大阪城内。家康只当了两年将军,1605年把"将军"位转给了自己的儿子秀忠,此举实际上是通知秀赖母子俩,丰臣家别想再接近统治大权了。

德川家康75岁去世。在他死去的前一年,他决心除去自己最后的一个心病,要将秀吉家斩草除根。1614年,家康下令向他的孙女婿发起进攻,他派兵围困秀赖居住的大阪城,用炮轰、火攻的方式,最终迫使秀赖于1615年自杀。

中国的"忠",内容并不复杂,起点也非常低,能够"始终如一""表里如一"就是"忠"。"一妻不侍二夫""一臣不仕两君",要终身不渝,而且为了"忠"可以不惜生命。而在日本,"忠"与"忍"是同义词,它存在于"上下""强弱"关系确立之后。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就要"下克上","忠"就会转换为"背叛"。



丰臣秀吉的铠甲(仿制品)

坚固的铠甲保护不了丰臣秀吉家族的政治地位;忠诚与背叛在这个铠甲背后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没有往日的朋友,只有眼下的利益,日本民族的这一特性被丰臣与德康家族相继彰显。

与中国“手掌”“手背”要“表里如一”相反，日本的“效忠”与“背叛”是“手掌”“手背”关系，伸出“手掌”时，“手掌”挡住了“手背”，给别人只看一面。力量对比决定自己“表忠”还是“背叛”，当判断对方是“上”，处于“强”的地位时，就“隐忍”表“忠”，使用最敬语，鞠大躬表示臣服。

---

[1] 青木一夫译《东方见闻录》校仓书房。马可波罗夸张称：屋顶、宫中道路、床榻、窗框都是黄金制成的。

[2] 森山树三郎著《“名”与“耻”的文化》(1971) 讲谈社 第3页。

[3] 日本学者批评她“以偏概全”，比如说看到皇军好战就说日本人都好战（津田左右吉）；日本不但有绝对权力，还有“下克上”。（和辻哲郎）

[4] 参照第十二章。“虚伪”之意。

[5] 现在有人大骂美国和麦克阿瑟，否定远东审判，日本战后新宪法，指责它是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

[6] 转引自芝原拓自著《世界史中的明治维新》岩波书店 第146页。

[7] 日语中，“忍者”意为“间谍”，可以若无其事地不流露真情，并将从对手的那里侦察到的情况传递回去。

[8] 1874年从李鸿章那里得了便宜的大久保，回国后要继续“立功”，他向政府提出“意见书”，要在琉球问题再进一步：“今通过与清国之谈判，彼承认我征番地为‘义举’，并出银两抚恤受害难民，虽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仍难说两国分界业已判然，为将来计，期望明治政府借机断绝琉球与清国之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1875年松田携政府令到琉球。

[9] 宓吉（Michie Alexamder,1833—1902）英国人，后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同时又是李鸿章的顾问，著有《阿礼国传》等书。转引自（英）约翰·濮兰德著、张启耀译《李鸿章传》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24页。

[10] 中国人认为“乘人之危”不是“君子风度”。1877年是“一新政府”面临危局的年份，日本国内爆发反对政府的“西南战争”。

[11] 《木户孝允日记》第一卷 明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旧历）。日本人认为欺弱可扬威。

[12] 长州藩士（1825—1869），1869年遇刺身亡。

[13 家永三郎等编《近代日本之争点》每日新闻社 第205页。

[14] 后来的文部大臣森有礼的哥哥。

[15] 西乡隆盛的弟弟。

[16] 参照第四章。

[17] 这些都是1867年法国人向德川庆喜提出的改革建议中的内容。

[18] 日本历次对外发动战争前，都是先派代表“热烈谈判”，当日本“遗憾”地宣布“和谈破裂”之

时，日本已经不宣而战。武士所谓的“保护”，就是持刀站立在“被保护者”身旁，“保护”与“可随时加害”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19] “文禄之役”。

[20] 妃子名李尚宫，生的儿子名完和。

[21] 1873年8月17日到10月15日，日本国内就是否派遣西乡出使朝鲜一事出现争论，朝鲜国内事件频发与日本不无关系。

[22] 神武天皇即位纪念日。

[23] 日本模仿法国在越南对待中国清政府，在与朝鲜签署条约中的第一条是：“朝鲜是自主之邦”。1858年英、法联军迫使清政府签署《天津条约》，后再次逼近北京，1860年签署北京条约。此后英、法联军帮助清政府围剿太平军，1862年法国与清政府签署《第一次西贡条约》，让南部的三个省“独立”，实际上使其变成法国的殖民地。1874年《第二次西贡条约》，让越南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1875年清政府提出越南是中国的朝贡国，不承认法国上述条约。同年2月，英国在缅甸越境进入云南，中英之间风云再起，英国驻北京大使回国，威胁要对中国行使武力，“江华岛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24] 中冈慎太郎（1838年—1867年）土佐藩藩士，最初参加土佐“勤王党”，后积极推动萨、长联合。1867年，在京都与坂本龙马一起被暗杀。

[25] 井上有过成功经验，1864年8月5日“四国联合舰队”炮击长州，长州立刻投降，接着举行了联欢会，井上亲自张罗，给四国军舰送去鸡、鱼、蔬菜、水果。“每个送货的小船都装得满满的。”

[26] 明治天皇生日，天长节，11月3日。

[27] 参考富田仁著《鹿鸣馆》白水社。

[28] 皮埃尔洛蒂著 村上菊一郎译《日本的秋天·江户的舞会》平凡社。

[29] 同上书。

[30] 陆奥在甲午战争前称，要通过这次战争让英、美知道，日本是亚洲强国，是推动并维护欧美的利益的“侍”。

[31] 1920、1921、1924、1925年，曾多次出现过日、美关系危机。日本宣称要对美发动战争。

[32] 《菊与刀》商务印书馆 第69页。

[33] 指挥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就曾说过：“在敌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杀死对方，这是武士所不耻的行为。”但口头上说与实际行动是两回事，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必须为它让路。

[34] “下”给“上”干活叫“奉公”，作为交换，“下”向“上”请求“返恩”，要求“恩给”，“返恩”与“恩给”，都指物质利益。

[35] 在自家庭院而不是皇宫里办公。1086年—1221年。

[36] 后来的德川家康。

[37] 后秀吉得子秀赖，秀吉让秀康继承结成家的姓与领地，改名结成秀康。关原之战后，他恢复松平姓，为福井藩主。

[38] 日语为“血判”。

[39] 一心不二、忠诚。

第三章 等级森严的岛国



温泉里的小社会

笔者就读于日本某国立大学，学校有面向本校所有成员开放的休养所。听说有一个休养所在静冈县海边，那里同时还有温泉且价廉舒适，遂利用暑假带全家前往。休养所建在一个山坳里，两栋钢筋水泥的楼房被竹林和杂树林环绕，远离了东京的喧嚣，这里真可谓是世外桃源。休养所内备有自行车，来这里小住的人可以骑着它到附近转悠。入住当日就借了两辆自行车，一家人沿着山路下到大路，朝海边方向骑去。途中发现了一个温泉，妻小选择了一个对外营业的；而笔者则选择了一个刚在路边发现的简易澡堂。路边有栋孤零零的大房子，简易屋顶及用木版钉成的墙壁缝隙处向外冒着热气，面对马路的门上钉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刻着“汤”字。木门边上还挂着一个投币箱，它是日本自助式服务的标志。笔者将自行车停到了路边，向钱盒中丢入 100 日元后，拉开门走了进去。

这是个男女共浴的大众温泉澡堂。在很多早期的介绍日本的游记里，游记作者们都会将“混浴”作为日本独特景观加以介绍，它令很多游客慕名而至，他们来日本一定要洗“混浴”；到海边看“海女”下海捞鲍鱼[1]。“混浴”作为观光项目现在已经基本绝迹，而这个温泉应是供附近村民洗浴、由他们共同出资兴建的，所谓浴室，也就是在泉眼四周围起了板子并在上面加盖了一个防雨顶棚的简易房。只有在乡村，日本传统的浴室还顽强地存在着。

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闯入，刚刚还是有说有笑的老人们都暂时停止了说笑，我明显感觉到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审视着我这个外来者。我赶忙脱掉衣裤，将它挂在了板壁的钉子上，在池边舀起池中温泉水淋浴了一下身体之后，随即踏进了温泉池。因为是夏天，我离开休养所时学习日本人，在脖子上绑了一条毛巾，没想到这条毛巾刚好在洗温泉时派上了用场。我再次模仿日本人泡温泉时的样，进入温泉池前用毛巾遮住下体，进入温泉池的瞬间再迅速将毛巾放到头顶上。当我向老人们鞠了一个躬，示意我也准备进池子泡澡时，他们很有礼貌地挪动了一下身体，表示为我挪出一个空间接纳我。当我在温泉池中坐定后，刚才还鸦雀无声的老人们，重新恢复到我推门进入时的状态。我戴眼镜，刚进温泉时镜片被热气搞蒙，在池中用水清洗重新戴上后，我开始透过镜片悄悄地观察周围的浴客。我发现自己是其中唯一一个年轻人，其他老人年纪都应该在六七十岁左右。

日语中有一个词叫“裸的交往”[2]，温泉中的情景正是这一现实的生动写照。“裸的交往”，日语的意思是将自己的本来面目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在没有装饰、不再顾及任何身份、等级差异下的纯真交往。

在温泉里，每个人都是娘肚子里出来时的本来面目，再也没有长幼、上下，甚至男女之分，日本社会等级森严，男尊女卑，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如何用敬语，鞠什么程度的躬；“裸的交往”则是去除一切约束与拘束的人际交往，它不带任何功利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应是日本人追求的、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

无论是坐在温泉池沿还是浸泡在温泉池内的老年男女，一切都是纯真的自然流露，他们无忧无虑地说笑着，相互之间全无任何敌意，这里也看不到丝毫的等级差异。

中国人说日本，总喜欢用“同文同种”说事，“黑头发、黄皮肤、用汉字”等，实际上这些都是外表，好似人体上包裹的外衣，说中、日本质不同或者“小同大异”才更加准确。

与赤身裸体的男女混浴不同，在日本“艺妓”的世界，一切都被彻底包裹。用里三层、外三层的“和服”包裹身体；用厚厚的白粉将裸露在和服之外的肉体覆盖。“艺妓”每次出场前，往往花费数小时化妆，眼眉、樱桃小嘴、头发等各部位都是人工刻意修饰的结果。为了提升她们的“附加价值”，艺妓馆要投入大量时间及金钱，将她们的作态、言谈举止、歌舞弹唱都变成商品，外在的一切都是“给别人看的”的“豪华外包装”，它不是“裸”，“裸”是“真”，而“包装”是“伪”。

对日本社会的男性来说，能够出入艺妓馆是身份、地位的标志，通常只有权贵才有能力为他所喜爱的艺妓赎身[3]，这种行为多被描绘成“英雄救美”关爱弱者的

豪迈。艺妓华贵的外包装，是用“尊”掩盖“卑”，有钱客人来此冶游是为了追求“裸的交往”，“高贵”与“低贱”在去除外包装后平等，双方再次变成娘肚子里出来时的模样。

同为“裸的交往”，庶民与权贵内容都不一样。

休养所里只有一栋三层的钢筋水泥楼可供住宿。入住后发现，笔者一家被安排在一间面积最大、景观及朝向最好的日式房间中。我们一家成了这里的客人；而其他的“后辈”们则成了我们的“服务员”。之所以享受如此“待遇”是因为，学校休养所每到假期都会被“学部生”[4]占领，分属不同俱乐部的本科生们，通常会利用假期在这里集中宿营。或许是学校的传统，或许是学校为了减少人工费，总之，休养所内没有专职服务员，来此集中宿营的俱乐部学生，既是服务员又是管理员。收拾打扫房间、换洗被褥、清扫庭院、准备三餐等，都是他们的工作。笔者与学部生之间的差别仅在笔者年长，是攻读博士课程的“学长”，这些成为笔者坐享服务的资本。每到吃饭前都有“后辈”专门上楼请我们一家人下楼用餐；吃完饭后我们只管拍屁股走人就行。饭前、饭后的准备、收拾，都是“后辈”们的事。本科生们每晚都要召开反省会，要对发现的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对比中国，往往不知为什么开会？开会为了什么？“后辈”们作息时间严格，几乎看不到他们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从早到晚都是集体活动。一切都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这里看不到中国的“班主任”，也没有“辅导员”，“领导”是自发组织的俱乐部中的高年级学生，如果说在温泉看到的是一种平和与平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无拘的横向关系的话，那么这里完全像军队，高效运转以及秩序，完全建立在一种“纵向”基础之上。

入住当日晚饭后，笔者下到大厅想找本杂志，这时学部生们正在召开反省会，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声音，循着声音看过去，只见一个领导模样的“先辈”怒气冲冲地站着，他身边坐着一个在默默地流泪的“后辈”，显然是“先辈”打了“后辈”。其他与会同学都分别把目光固定在各自找到的一个焦点上，沉默地等待着进入下一个阶段。

这间大学号称是培养日本精英的摇篮，在日本以竞争倍率最高闻名，每个入学的学生，在家乡都是各自家庭、他所在高中以及该地区的荣耀。可进入了同一个“场”之后，一切都要重新洗牌，“轻重”“上下”都要以先来后到决定。这里一方面标榜能力至上，另一方面却要按照先来后到确定等级；一方面追求思想自由，可行动上要求对“先辈”高度服从。在这里，笔者亲眼看到了日本社会中最顽固存在的部分——“纵向关系”。这里看不到温泉中的“裸的交往”，更像军队，不单等级森严，



而且还武斗气氛浓厚。

在日本人看来，没有“纵向”，就好似失去经线牵引的纬线会胡乱缠绕在一起一样，没有等级就是“混乱”“无秩序”，重新排列等级之时就是“下克上”之时。

笔者在北京读书时，指导教授之一曾是中根千枝的高足，当时他向讨论班同学们讲授中根千枝的《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国学生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课后留下的记忆只有“纵向社会”等几个关键词，直到去了日本生活之后才发现，一切果真如中国成语所说的那样：“百闻不如一见”，只有深入到日本社会之中，看到并体验了日本人的真实生活，才能感悟到中根千枝把握住了日本社会的脉络，许多人看日本只看到万花筒般变换的无限花样，而中根千枝却告诉你万花筒中有几棱镜，变化只是镜子中看到的彩纸滚动。

“集团”“纵向”“秩序”，批判者说它是封建残余；赞美者咏叹它是日本社会高速运转的保证。

以大压小的国度

日本社会中“内”与“外”的意识异常强烈，当将这种感觉极端化时，在同一社会中会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极端人际关系结构，似乎“内”以外的人都不是自己同类的人类。比如同一个人物，遇到陌生人时，为抢座位可以将他人推搡开；遇到了熟人，尤其是在遇到了自己的上司时，无论他当时有多劳累，他都一定要坚持让位子给这个上司，这在日本是一个很常见的滑稽现象。[5]

中根千枝还指出：“日本人从走上社会时开始，就会让自己牢固地依附于雇佣他的集团。强力归属有助于该人物在社会上确立地位。随之俱生的就是：对本集团的忠诚及对他集团的敌视。”

“集团”是日本社会的关键词之一。围绕这一关键词，形成了一个相关的“词族”。比如“团”“阀”“族”“丸”等。“团”有“团地”“团交”“公团”“社团”“团块政治”“暴力团”；“阀”有“财阀”“学阀”“藩阀”“闺阀”“军阀”；“族”有“暴走族”“窗边族”“社用族”“竹笋族”“太阳族”“一族郎党”等。

在日本，中根千枝指摘的现象随处可见，有“集团”就一定会有“内”“外”；而“集

团”内部必定存在“上”“下”。“集团”与“纵向”好似空气和雨水，渗透在日本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它是日本社会运作的引擎。在日本，只要有两个人，立刻就会遭遇一个现实问题：谁应该向谁鞠躬？鞠躬应鞠到什么程度？说什么样的敬语？相互陌生并分属不同集团，他们就会互不相让地抢占座位；相反，一个人抢占座位，抢到座位是为了让给另外一个人坐，从俩人之间说话的态度、使用的言辞、谈吐内容的多寡，旁观者立刻就能明确两者的关系。在中国，两人是“俩”，人与人的关系是“仁”，彬彬有礼，长幼有序是“君子”的行为准则，它不以集团内外为界限。集团内一套，集团外另一套，双重标准是“表里不一”的小人行为。“下”对“长”之“敬”，或“长”具有“威”，不来自“上”对“下”的“压”；而来自“上”的严格的自我约束以及对下之“慈”。日本则不同，集团内讲究“威压”；集团之间同样用力量说话，“大”就是权威。

同一集团是一种表现，非同一集团又是另外一种表现，对于这种不同表现，并非是一个表里不一、双重标准就能够简单总结的。每当日本的百货店开门迎客时，百货店的“总支配人”[6] 总会带领部下站成一排，向步入百货店的所有客人鞠大躬，使用最高的敬语。对他集团成员鞠大躬、行大礼，这种“异常”表明，集团内外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存在“接点”。尽管分属不同集团，但存在利益上的“纵向”关系。为了让本集团获得利益，让来客“掏腰包”，包括总支配人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对顾客用敬语、鞠大躬。此时的顾客，用眼角余光回扫一下就已算够有礼貌的了，有的人嘴里念念有词地说句什么或者什么也不说就昂首挺胸，扬长进店，这里存在集团之间的“纵向关系”。百货店集团对消费者集团



浮世绘——《凝固》

这一幅明显带有漫画风格的浮世绘深刻地揭露出了日本社会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赤身者代表着日本社会的平民阶层，身着盔甲者则是代表着武士一级，而让武士都能为之臣服下跪的大手，则是代表着幕府一族。领主好似富士山，巨大的身体高大得都看不到顶，“大手”中的一个指头就跟一个武士一般大。





浮世绘——迎接丈夫的女子

上对下的威严，下对上的尊敬，构成了日本当代社会中人际交往的等级制度。即使是在家庭生活中，妻子跪迎归来的丈夫是必须遵守的传统。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以鞠躬来代替这种跪拜了。

用敬语并鞠大躬，它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前提之上。对未来或许能给本集团带来潜在利益的集团或成员，总支配人等甘愿转换角色，主动成为“下”，同时让所有进店客人都有“高高在上”的感觉。“顾客就是上帝”的经营理念，在日本是通过角色转换，用“敬语”和“鞠躬”体现出来的。总支配人“低”;顾客“高”，“下”用言行将“上”伺候得舒舒服服，让客人有“帝王”般的感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反仆为主”。用敬语和鞠躬换取客人解开钱袋，把他们腰包中的钱掏出来才是“实”，才算“赢”。“舍名取实”就是指上述情况。在无法分辨对方的消费潜力之前，只好将所有人都一律看成是“大客户”“高端消费者”。在日本，“接客业”的“三种神器”是：鞠躬、敬语加微笑。日本服务行业将此视为获利的重要手段，有的服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提供上述三种服务。[7]

集团的“内外”“上下”“尊卑”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物质动因，“利益”是纽带。同一集团内，“下”对“上”使用敬语、鞠大躬，也是受利益驱动；非同一集团，使用敬语、鞠大躬，就更是利益使然。

对本集团的上司毕恭毕敬，彬彬有礼，一切基于当前以及未来的利益。除了为本集团“立功”之外，对“上司”言行的恭敬与否，也是“下”在工作中受到关照和获得机会的重要参照。从人的本能上来说，谁都不愿意“言不由衷”，希望“人人平等”，可在日本这样一个“纵向(たて)社会”，“趋利避祸”是必然选择。“上”是“强”，他掌握赏罚大权，想“上”必须是“从奴隶到将军”。

上电车时抢在上司之前冲入，抢占到位子后自己不坐给上司坐，这些都属于“尊”。日本人内心时刻存在抢座位，不向任何人鞠躬，不必使用敬语，一切按照“实力至上”行事的武士道准则，或者说，“强弱、大小”准则才是“最高准则”，言行上“敬”与“不敬”不是抛弃“最高准则”，而是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一种“让步”，它是

“权宜之计”。

无利可图而又资源充足时，好似电车可以提供足够座位时那样，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你坐你的；我坐我的。而当资源有限，也就是当座位无法保证所有人落座时，能够先冲入车厢并抢占到座位的身强力壮者胜，讲“礼”是因为存在利益关系。

表面上的言行，取决于背后的“有利”“无利”原则。不充分考虑“损益”“得失”就匆忙行动，在日本人看来是“无铁炮”[8]。无论是本集团内还是集团与集团之间，如何言行都包含了充分的“打算”[9]。当计算到对方无利可图时，“下克上”“背叛”（うらぎり），“翻转身睡觉”（ねがえり）[10]，“砍了抛弃”（きりすてる）等，什么手段都不觉为过；反之，认为有利可图时，言行上也立刻表现出来，使用敬语，鞠大躬，伺候得你“无微不至”。用日语来说就是：“你感觉到哪痒，就会伸手去帮你抓痒”，让你感觉无法找出理由拒绝对方。

日本人慷慨使用敬语和鞠躬时，往往是在观察、了解对方之时。当判断对方于己无利，就会把“三种神器”收起来。它同时意味着，主动使用“三种神器”时，一定是有求于对方之时。“授”（さずける）与“受”（うける）互为表里，任何东西都不是“白给”的。

中根千枝生长在中国，二战日本投降后，她随父母回到日本。同时见证并比较中日两国文化之差异，使她敏锐地感受到中日两国间的“小同大异”。与中国相比，日本社会最独特的部分之一，无疑应该是“集团”“纵向”“内外”“强弱”。作者认为，日本的等级观念不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而改变，“日本是个没有等级意识就无法生活的国家”。[11]“没有等级观念无法就座入席，甚至无法开口说话（使用敬语程度，发言的顺序，话语量多寡等，均能充分反映个人的不同地位）。”

请坚决变大 //////////

在日语中，恐怕没有比“がんばる”更能形象反映日本特色的日语词了。日本人见面后分手时，多用“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来鼓励对方。“がん”是“顽”，意为“坚决”；“はる”是“扩大”“变大”“膨胀”之意，在处于“下”“小”就不舒服的日本，“请坚决变大吧”就变成了临别赠言，它表示期待你发展，祝福你未来美好，而“美好”就是“变大”“变强”“变上”。

“がんばる”（坚决变大），小到个人，中到集团，大至国家，它都适用，它是日本社会变化的“原动力”。围绕这个关键词，产生了一个推崇“大”的相关词族。比如“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大本营”“大东亚战争”“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政翼赞会”等。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流国家”“一流企业”“一流大学”“一流人才”等。

推崇“大“，争当“一流”，这似乎成为日本人压倒一切的目标。“大”与“小”，“上”与“下”是对概念，“下”有“下端”[12]“下積”[13]“下女”[14]“下手”[15]等，都是负面意义的关联词。说一个人“变小了”（小さくっている），就是“他蔫了”，“不再敢吭气了”。警告并批评一个人时说：你“态度大”(傲慢)。谦虚是“腰低”；而傲慢是“鼻子高”。 一方面鼓励“变大”；另一方面还要遏止“变大”，这是因为，“变大”必然伴随“下克上”，这时会发生秩序会紊乱。

在日本人看来，无论是集团还是个人，只有“大”才安全，才有资格流露真实情感。

搞学问的地方有“一流大学”，接下来就是“二流”“三流”；搞生产的单位有“一流会社”，国家有“一流国家”，个人有“一流人物”，“系列”“等级”无处不在。“一流”要主导；“二流”“三流”只能追随、服从。20 世纪初的“一流国家”是英国，日本就要死抱英国；二战后转变为美国，日本依旧死抱美国。将所有“横着的东西竖着摆”，日本人不这样就不安心。“耻”在“纵向”中改变了内涵；“长幼有序”在“强”“弱”中变质，处于“下”“弱”地位者，活该受欺负，日本人认为“弱者”无能，弱者是“弱虫”[16]，因为他没有“坚决变大”。

每天用“鞠躬”、使“敬语”，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它们来反复确认“上下”“强弱”，它是“秩序”的外在表象，缺失意味着每个日本人都“昂首挺胸”，它是颠覆“纵向”的海啸与地震。

竹下内阁时，日本政府向全国的 3268 个市、町、村，每个行政单位赠送一亿日元。在高度集权的日本，这是地方首次在用钱上有自主权。摆脱了官僚的高压、日本大企业的控制及干预，原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可各“小”单位在拿了这笔钱自主使用时，却又结实地表现了一次“日本特色”。“小”单位拿到“大”钱，日本人的“崇大”心理就在无意识中流露了出来。在日本人心目中，“小”是平庸，容易被忘却且无安全感，只有“大”而且要“最大”才能给他人造成心理及视觉冲击，日本人的“崇大”心理，让许多町村不约而同地用这笔钱干“最大”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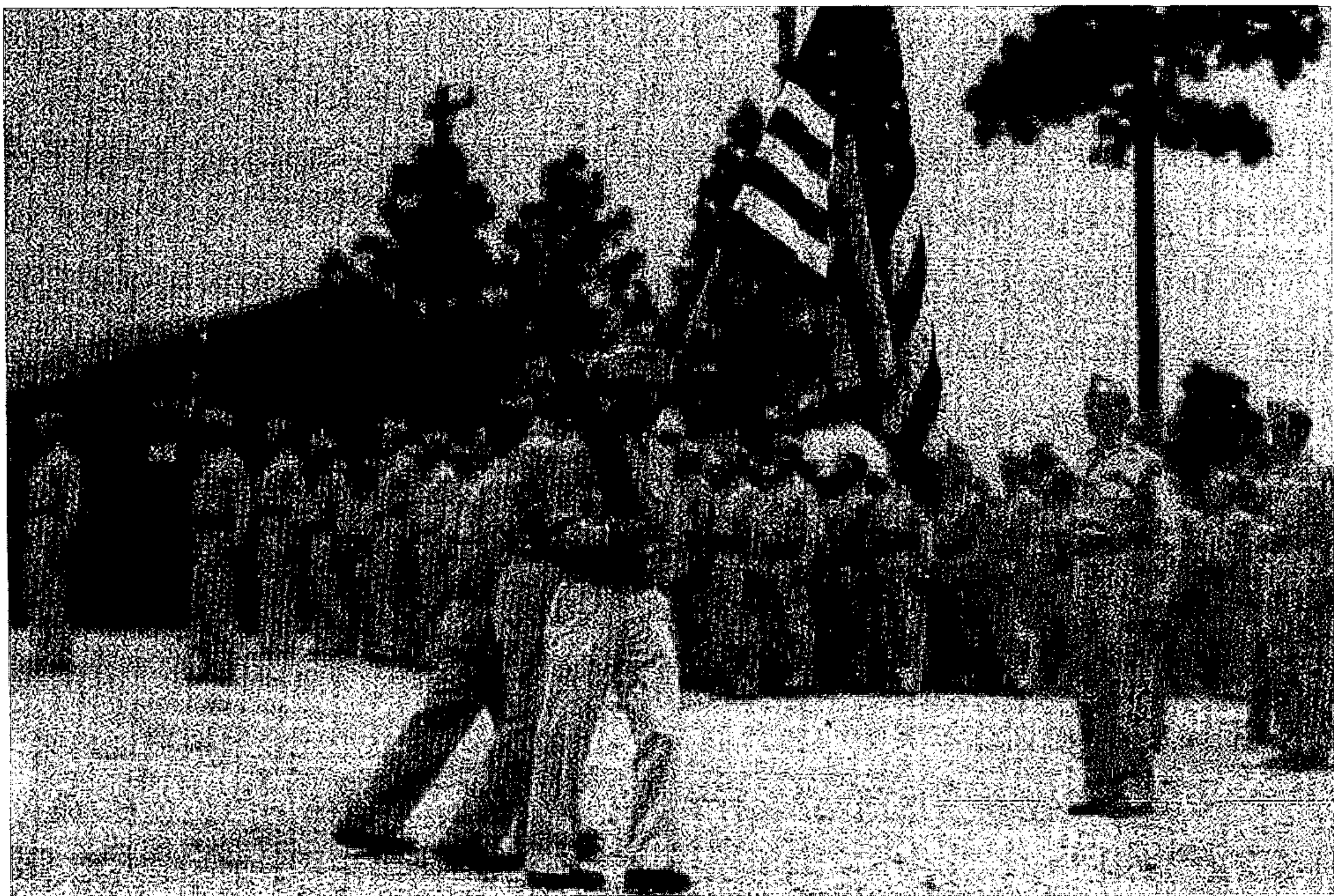
熊本县的一个村，建设了“日本最长”的上山石梯，共有 3333 个台阶。还有一个村兴建了“日本最大”的水车，“日本最大”的饭锅(直径六米，可煮三万份米饭)，“日本最大”的鼓，“世界最大”的沙漏，“世界上最长”的海边长凳。兵库县津名町用这些钱买来黄金，铸成“世界上最大”的金锭。决定建造“最大”属于投资对路，因为这一判断建立在对日本群体的普遍认识之上，后来的确“最大者”吸引来众多日本观光客，他们专程来参观“最大”。[17]

“小”则意味着受气、挨欺。

1989年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破裂，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可1989年“山一证券”、1990年“大和证券”、1991年“野村证券”，都针对“大户”，先后私下实施了“补偿经济损失”对策。一些在上述证券公司开户并进行大额交易的“大户”，因股价下跌而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了巨额亏损，证券公司为了拉住这些“大客户”，或者说希望这些“大客户”继续在股市上交易，以造成股市交易活跃、成交金额大的假象，就将自己的部分营利转让给在交易中受到损失的部分“大户”，而且只对“大户”私下进行“损失补偿”。许多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可证券公司让他们自认倒霉，同在证券公司开户并且委托交易，证券公司对“大”“小”客户采取双重标准。日本的“大公司”，完全抛弃了“童叟无欺”的“诚信”原则，他们依据“客户”的“大小”来“看人打卦”。中、小投资者相信大公司的实力和诚信，因此才选择了这些世界级的大证券公司并且通过他们进行投资活动，没想到他们恰恰被这些自己盲目迷信的大公司“背后砍一刀”，大公司对“大户”保；对中、小投资者“杀了抛弃”。中、小投资者成为了“大”的牺牲品。

二战后接受美军训练的日本自卫队

日本的崇“大”之道可谓精深。二战之后，面对美国占领军，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反感与不甘，反而像对待本国人、甚至以更高的礼遇对待这些占领者。这就是他们的趋向“大”的一种体现。



人有等级，集团与集团之间同样存在“大小”“上下”之分。大集团中的“下”可以超越小集团中的“上”。加入集团是因为身不由己，而加入哪个集团，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封建时代是“世袭”，一切受之于父母。只有出现“下克上”时才可能通过“论功行赏”颠覆“世袭”。当代社会，学历、资格是加入某一特定集团的通行证，有它才可以跨越门槛进入“场”，此后“坚决变大”的依据主要是“战功”。

中根千枝所在的“场”，是日本吸收西方知识的最前沿，可“纵向”在这里顽固地存在，并且成为了培养“资格”，建立新等级秩序的“大本营”。

日本人称“相扑”是“国技”，它是一个能充分反映日本纵向特点的集团。这种竞技没有级别差别，但内部等级森严。所谓没有“差别”是指：它不同于其他的一些竞技项目，比如西方的拳击运动。拳击首先要依据运动员的体重分级，不同体重的运动员被分在不同的组别中竞技。“相扑”这一竞技运动没有重、轻量级之分，不论体重、块头，一切都以场上的角力结果为准。而“相扑”内部的森严等级是说：进入“相扑部屋”[18]的先后时间，是首次进行纵向排列的依据，先入者是“先辈”，后入者是“后辈”，同时进入者是“同期”，今后靠实际战功打破“纵向秩序”。

相扑比赛一般在日本时间下午 2 时开始，晚上 6 时结束，级别越高的力士越后出场，观众的逐渐增加与角力激烈程度是同步的，在 5 点左右的时候，观众席上基本上要来的都来了，这时的比赛也开始白热化。日本的相扑比赛通常在很短时间内决出胜负，败者先退场，而胜者则留在场上，等着拿奖金。胜败完全是阴阳两重天，出场时双方都是抬头挺胸，傲然视物，双方相互用眼睛“瞪”对方，要用气势“压胜”，它属于对决的一部分。可一旦战败，败下阵者退场时的表情通常是悔恨黯然。胜者不单可以获得巨额奖金，而且退场时会获得观众的喝彩，那种豪迈对经历了胜负的相扑选手来说，感受相当深刻。

胜利立刻转换为利益，胜越多，奖金越丰厚。当然，这些奖金也不能力士一人独拿，要先拿回自己的相扑训练营，由这里的“头”进行再分配。入营之初以入营先后决定“纵向秩序”，此后依照战功来改变等级。中国儒教进入了日本这个岛国之后，武士国家在其中增添了武士的“武斗”内容。战功给相扑训练营这一集团带来利益和荣誉，个人战功越大，训练营的收获也就越多，该人物在营中的地位随之上升，同期或先辈对此纵向秩序改变不会有任何怨言，因为大家都成为了“受益者”。刚进相扑训练营的“新人”因为没有技术，属于“学艺”阶段，短期内立功上升的可能性也不大。随着训练年头的增加，“同期”之间的作战能力差异会很快显现出来，“战功”不同，回到训练营内的“论功行赏”也截然不同。胜者拿回的奖金多，成为训练营的“支柱”。

功勋卓著的相扑手可以住单间，而低级的则几个人一间。后者除了同样要参加训练外，还要承担相扑馆内外的诸多杂务。他们要早起晚睡，训练开始前为高级选手做各种准备；训练结束后他们还要清理场地。吃饭时他们要主动帮厨、洗碗，休息时要为盆池放洗澡水，待高级别选手先洗完后，他们才能进浴室洗澡，而且最后打扫浴室也是他们的工作。有时还要为高级选手"跑腿"，外出购物、取送包裹等。总之，级别越低的力士杂务越多；级别越高的特权越大。即便是同期，功劳大者也要享受同期提供的服务；无功者只能提供服务。这时，纵使相扑训练营没请你卷铺盖走人，可作为个人已经很难再继续呆下去了。环境迫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进退"。每个相扑训练营都以能够培养出最高水平的选手——"大关"而自豪。训练营若出了"大关"，不光相扑训练营获得的实际利益增加，而且随着名气增大，训练营可以吸引更多的新人加入，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相扑力士与相扑训练营，是一个利益紧密结合的共同体。力士兴营；训练营栽培、扶植力士。对有功且能为训练营带来名利的力士，训练营为他操持一切，力士不必为琐事分心，他只要全身心投入自己的训练，考虑如何战胜对手就行。

级别高低，连写姓名时字体的大小、粗细都不同，"大小""胜负"强烈地压迫着相扑选手们，摆脱重压的途径似乎只有一条：坚决变大。因为比赛没有体重限制，显然，比赛时块头大者优势明显。为了在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与刻苦训练同时进行的另外一个内功就是：尽快让自己"肥大"起来。相扑力士都希望自己体重能在短期内上升，很多相扑选手为了使自己尽快肥胖起来，拼命吃，吃完了就睡，结果个个体形硕大。身体"肥大"也成为"坚决变大"中的一项。



浮世绘——相扑选手

为了让自己变"大"，相扑选手需要采用很多极端方式让身体变得"肥硕"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没有体重限制的比赛中占据优势。日本这个民族也是这样，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迅速变"大"，在没有国土面积大小以及自然资源贫富等限制的国际社会中，本身并不具备优势的日本也只能采取包括侵略他国在内的若干极端方法，以使其拥有足够高的国际地位。



日本著名的相扑选手小锦，是一个来自美国夏威夷的高个子选手，初到日本时是个瘦高个。成名后开始追求一个日本的著名女模特，女模特以追求T台上瘦为卖点；而小锦却追求在"土俵"上肥胖，追求名利上两者相同；可在对身体条件的要求上，两者截然相反。据报载，小锦看中了该女模特后立刻展开了猛烈的追求，而女方以及女方家人却迟迟不答应，理由就是俩人太不般配。小锦是体重250多公斤的巨汉，而女模特身高虽高，但体重只有50公斤上下，俩人体型相差悬殊。据说最终打动女模特芳心的是小锦电话里的一朴素话语："身体庞大是为了生活。"

谁说不是呢？女模特拼命追求"瘦"；相扑选手拼命让自己身体"变大"，不都是"为了生活"的"坚决变大"吗？找到了心灵上的共鸣点，体型差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泡菜缸与人 //////////

无论中国还是朝鲜、日本，东方民族都有吃"泡菜"的习惯。"泡菜"日语写"渍物"。"渍"这个汉字，日语做动词时读"つける"。"つける"最初的本义是将某物强制按入水中，后专用在将蔬菜强力压入液体中。充分压制"泡菜"的目的在于：防止蔬菜裸露在液体之外，避免其与空气接触而腐烂变质。保证上述目的实现的简单做法是：置巨石于蔬菜之上。

"つける"还可以与其他动词一起，组合生成复合动词，表示强制。腌制泡菜的行为以及"つける"这个动词，形象地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压制"。

日语中"重"是"おもい"，压在蔬菜之上的巨石日本写"重石"，读"おもし"。"重"与"大"，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集团好似一个巨大的、隔绝内外的、密闭的泡菜缸，坚实的外壳让"内"无法"逃逸"，屈居底下的是新鲜蔬菜，上面再压以"重石"。新鲜蔬菜有"轻""小""弱"（若、わかい、よわい）的特点，"重石"要将"向外伸张、生气勃勃"压制掉。新鲜蔬菜很饱满，有一种向上伸张的欲望与势头，而腌泡菜，就是要将这些饱满的新鲜菜中的活力消除掉，将它们体内的水分挤压出去，让它们委曲、缩小，按照菜缸的要求重塑。

"重""大"在"上"，它要在菜缸里强压出秩序。"泡菜"与"重石"关系几乎就是日本人与集团之间关系的化身。"新"就是"下"，意味着"不见天日""无法抬头"，对来自"上"的重压只能"逆来顺受"，一切都不容伸张，泡菜人物必须"躬身低头"，"上"是绝对存在，不能也无法抗争。

"若"等于"新"，"新人"进入不同集团，就好似新鲜蔬菜被胡乱塞进泡菜缸里，

只能选择“顺从”，在“重石”的高压下，蓬勃伸张的枝叶，茁壮的枝干，都被压成疲塌、皱蔫的泡菜。不能抱怨“盐水多寡”，也不能怪罪“重石高压”，更无法逃出“菜缸”之外，进入了菜缸，就要抛弃张扬的自我，丢掉个性，最终变成集团统一调味的“工厂化”泡菜，在“重压”之下融为一体，亲密无间。日本人必须习惯这种泡菜坛子式的集团，脱离了泡菜缸，不压别人也不被别人压，看似不错，但脱离了“缸”就是“浮浪”，漂浮意味着变质或死亡。日语中“强制”是“しつける”，它的名词形“しつけ”，前者是“调教”，后者是“礼仪”的意思。

笔者曾在日本川崎小住，家边上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印刷厂，每天早上送女儿去幼儿园，印刷厂门前是必经之路。日本从四月份开始新的财政年度，所以，新生此时入学，刚毕业的大学生从此成为“新人”（社会人）。无论学生时代将头发染成什么颜色，穿什么样的奇装异服，从成为“社会人”这一天开始，他们必须用深色西装将自己包裹起来，抛弃学生时代对自由奔放的怀恋及向往，让自己变成“泡菜”。

女儿在幼儿园成为了“先辈”之时，印刷厂门前也呈现出新景象。每天早上，只见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早早地站在工场大门外的院子里，迎候每一个前来上班的“先辈”。一看就知道他是“新人”，他的工作是向所有“先辈”鞠躬，用敬语高声问候。每来一个职员，这位新人就赶忙打起精神，伸直腰板之后，向来者鞠躬并用敬语问候。新套装，敬语加鞠躬，行为发生的先后以及应对者的态度，都告诉你“纵向”与“秩序”正在建立之中。“先辈”衣着随意，回应语言简慢。“新人”老远看到人过来，就一丝不苟地深度鞠躬，直到“先辈”从身边走过，消失在工厂的入口处，此后他才会恢复到原来的直立状态。4 月份同时又是日本春雨连绵的季节，雨天无疑为“新人”的“送迎”增加了工作量。雨天他撑伞站在老地方，这时自己开车来上班的人比往常多，新人一看到有车要进入停车场，会立刻迎上去引导汽车进入，待汽车停好之后，他再跑到车门旁为“先辈”拉开车门，撑伞为“先辈”遮雨，自己却淋在雨中，接着一直撑伞将“先辈”送入建筑物中。下班时早上的一幕重新上演，因为晚上加班的人较多，这可苦了“新人”，他要等到大部分人回家之后才能收工。“新人”对每个过往的“先辈”一边鞠躬一边高喊：“你辛苦了。”这种“学艺”持续了一个月。

倒霉透顶的新人 /////////

日本人有在樱花树下喝酒聚会的习惯，4 月份是大学生走上新工作岗位的季节，同时也是樱花盛开的时节。东京的上野樱树很多，每到下班后总有很多公司职

员来此欢宴。为了确保晚宴能在树下顺利举行，必须有人提前到樱花树下铺席子占位子，由于每个单位都或多或少地有“新人”加入，因此，提前到树下铺席子，占位子等天黑的人，通常都是身着新西装的“新人”。白天太阳高悬时，树下只有前来占位的“新人”，此时他可以睡觉、晒太阳，傍晚时分他开始忙碌，为晚上聚餐做各种准备，随着夜幕的降临，“先辈”的到来，调教“新人”，让他们学习“礼节”的课堂也正式开始上课了。

“若”（新）就是“弱”。“先辈”为了在“新人”面前树立“威严”，往往要先给“弱者”一个“下马威”。有时还乘机将自己受压制的怨气发泄到“新人”身上。“先辈”不是照顾“新人”，而是选择“若”为捉弄、欺负的对象。在“迎新会”上，“上”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灌酒”。

1992年1月，日本体育大学柔道俱乐部，一个刚参加完“成人式”的年满20岁的青年，在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上被“先辈”灌酒，他一口气喝下了一立升的日本酒，不久，该年轻人不省人事，在他成年的那一天告别了人世。

1995年4月，在三井物产的公司宿舍，刚刚毕业踏上社会，进入日本著名企业三井物产的M青年，被“先辈”强行灌酒而酒精中毒死亡。

M青年（牧野拓之）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律系，4月刚进入三井物产。4月8日晚，位于东京府中市的三井物产第二府中宿舍，举行了迎接新人入住的“欢迎会”。

可容纳40人的宿舍食堂里，先辈15人，新人8人隔桌而坐。坐成一排的新人必须一个接一个地一口气喝完优胜纪念杯中的一满杯酒。[19] 优胜纪念杯能装下四大瓶啤酒，约三立升。M青年第三个喝，可他的酒里被掺入了一瓶威士忌，在他一口气将优胜杯中的酒喝完之后，立刻昏迷倒地。同伴们七手八脚地将他拖到洗手间，想让他吐出来，可这时他已不省人事，甚至无法呕吐出来。继M青年之后的第四个人，也是喝了一大杯之后就倒地不醒了。M青年后被紧急送往医院，可因酒精中毒过量，最终撒手人寰。

“新人”刚参加工作就死在了公司，对此三井物产的会长表示：“用灌酒方式迎新，是日本任何一家企业、任何一所大学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该会长看来，只是喝死了人这个结果不好，对灌酒迎新方式本身，他不想更多提及，更不会承担责任，因为它是“日本传统”。

灌酒的“先辈”，既是组织者又是压制者。“后辈”明知“先辈”在欺负自己，但既不拒绝更不反抗，他们采取“忍”的“服从”态度，用“恭顺”抬高“先辈”。在日语中，敬语和自谦语是同时并存的。前者通过“敬”提升对方；后者之“谦”是通过降低自我的方法维护对方之“尊”。让对方“高”，日语用“もちあげる”这个专门词来表述。也

就是说,"高"来自有人主动推举,如果"后辈"不愿意让"先辈"高,就是不给"先辈""面子",伤害其"尊"。"若""新"并非"弱",可为了给"先辈"面子,让先辈风光,"新人"就"忍声吞气"地表示服从。M青年等明知酒太多,且酒中混入了烈酒,可他们没有一个人反抗,他们都选择服从,"乖乖地"或者说"勇敢地""一口气喝下"。

三井物产的一位职员事后表示:灌酒的目的就是要去除新人的锐气。"先辈"要通过这种强制告诉"新人",要想加入我们这个集团,被我们接纳,首先必须先学会"服从"。"先辈"要在"后辈"面前树立威严,而此时对于新人来说,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机会,他们要表现出极度的"忍耐"与"服从",此时"先辈"要"后辈"下地狱也得下。

在日本人的上述行为里,"他杀"还是"自杀"变成了一个界线模糊的问题。恶性结果的发生,显然是"先辈"的掺酒行为所致,可是,无论是"灌酒"的"先辈"还是"被灌酒"的"后辈",谁都不曾想过喝完了这种"混合酒"会致命,他们都知道此酒非同一般,但至多认为:喝完了会倒地不醒,相当于一种惩罚。在"被灌者"表现服从,"灌酒者"表现威严中,一个鲜活的生命终结了。在日本,这种迎新灌酒只有"先辈"感觉快乐,是一种近乎虐待的折磨。对"后辈"来说,使用敬语和鞠大躬还远不足够,必须要接受"先辈"的病态"祝福",在迎新会上,不但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烈酒,同时还准备好了装呕吐物的大桶,灌酒前就准备好了让你呕吐,就是要让"后辈"忍受"进出"的折磨。

反正"新人"也不敢反抗,直接拿鞭子、棍子抽打更能"杀新人威风",可日本"先辈"却要在祝酒迎新的美名下,用"折磨""虐待"手段让新人"变小",警告他们不能"态度大"。

中国儒家讲究"长幼秩序",可"威严"绝对不会建立在"强权"与"高压"之上,中国不是要求"下"先要怎样,而是先对"长"有要求,他首先必须"慈",对"幼小""慈爱"才是"谦谦君子"。

"小"日本的大不幸 //////////

1994年11月27日,爱知县初中二年级学生大河内清辉在自家后院的柿子树上上吊自杀。母亲发现儿子自杀后,急于想知道儿子自杀的动机。在儿子的书桌里,母亲发现了儿子写给她的遗书,遗书中详细描绘了同学如何欺侮、虐待他,他由于不堪忍受而自杀。



大河内在遗书中写道：

有四个同学经常向我勒索钱财。今天，我再也没钱给他们了，即便今后能够活着也……所以……很想能和大家一起幸福地活着。我很悲痛，从小学6年级开始就一直被欺负，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被同学勒索钱财，进入初二后，他们问我要的就更多了。在放假之前，最多的时候是6万日元，少的时候也有3、4万。最近又拿走了4万日元，17号他们再要4万日元，我无法拒绝他们，真是无奈。

尽管我很想活下去，但是……怎么说呢？我为什么会成为他们言听计从的人呢？有一次他们带我去河边，我想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就在这时，他们将我推倒在水里，把我头按在水中，我无法呼吸，挣扎着抬头大喊救命。他们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还继续把我往水里按，这样反复了大约四次，从此我开始惧怕他们。特别恐怖的是矢作河，水深的地方好像有5-6米。最近我被带到河的A处，又被他们按在水里，一旦逃跑，他们就紧紧地抓住我的腿往河里拖，因为脚踩不到底，我非常害怕。没人帮我，从那时起，我只好事事听他们的了。

我经常被他们斥责，给他们当跑腿使，他们经常逼我干很难完成的事，我真丢人。头发也是他们逼我染的，可爸爸却认为是我自己要那么干的。20号又要给他们钱，我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妈妈，对不起。[20]

大河内自杀一事被媒体大肆报道后，日本人似乎这时开始才有所惊醒：发生在年青一代人身上的“欺虐”，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日本政府此后专门成立了“欺负人对策阁僚会议”，日本文部省也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学校关注学校内外发生



浮世绘——《将军与武士》

“小”对“大”的态度，无论是在战场上、官场上、职场上还是在家庭中，都要求无条件服从。即使“大”的意见是错误的，作为“小”的一方来说，也不能有任何异议，哪怕要用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作为代价。

的各种“欺负人、虐待同学”事件。此类事件在日本社会中屡禁不绝，日本的法院、警察、社会工作者、学校、政府、家庭等，可以说相关的部门都介入了，都希望遏制这种恶习，可根治这一痼疾几乎没有可能。有关这类事件的报道总是不绝于后，笔者的孩子在保育园也常受欺负。

只因大河内这次留下了遗书，受欺负的事实才部分为人所知，实际上，在日本有很多人自杀，他们死前什么也没留下，对于他们的死因也只能猜测。日本社会对“欺负人”“被欺负”麻木到冷漠，他们通常不同情受害者，也不会谴责加害者。

据事后了解，大河内交往的圈子也是一个小集团。它是社会上形形色色集团的复制。集团中的A同学被称作“社长”，他以当集团的“头”为荣，在他之下有看他眼神下命令的“干部”，还有服从命令干具体活的“干事”，最底层的就是包括大河内在内的几个同学。大河内地位最低，属跑腿听差的仆人角色。

记者曾对该校的同学进行采访，问他们是否与“社长”来往，一个男同学回答说：“A同学并不讨厌，不过他的想法有时很极端。因为我们主张平等。”

“社长”对集团中的等级是这样解释的：“至于我，一直处在最高的地位，感觉等级社会真好。不过，从上面掉下来就会成为最底层。”

对于“你为什么会想到在同学圈子中建立等级关系？”这一提问，A同学略加思考后回答：“没有等级就感到恐惧。在平等的社会里，存在着随时会被同伴抛弃的不安。”[21]

何等令人震惊的坦白，有谁能想像它竟然出自一个初中学生之口！他们尚未走上社会，可“等级”“上下”已经因为每日耳濡目染，深深扎根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集团无处不在，每个集团都存在严格的上下等级，居“上”者威风凛凛；屈“下”者则是出气筒，杂役、奴仆、听差跑腿。牺牲者总是“下”，“上”是头，他只负责发号施令，“头”只要使一个眼神，干部就会心领神会，去为“上”张罗。一旦处于“下”的地位，那么就无法摆脱被欺负的悲惨命运。改变现状不是脱离躲避，因为哪个集团都一样，与其到新集团再从零开始，不如咬牙强“忍”，不断鼓励自己“坚决变大”，终极目标是有朝一日让自己坐到“头”的交椅上。

日本社会中的效率与秩序，很多都是以暴力及牺牲为代价的。森严等级，严厉约束，是集团有效运转的保证，平等意味着散伙、无序。



“头”和“脚”的差别

吉田茂的得意门生、上世纪60年代曾出任总理大臣的池田勇人曾说:“晚上睡觉时,不能脚朝大矶。”

为什么不能“脚对大矶?”对着皇宫、国会议事堂又会怎样?

池田勇人睡觉时都要头朝大矶的理由在于:大矶住着一位池田要“表敬”的人物。睡觉时脚朝大矶意味着“不敬”。二战日本投降后,吉田茂开始出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出任首相期间,大力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务实官僚,这些人中后来有不少人出任首相,池田也是其中的一个。吉田茂在海边的大矶建有别墅,从政前及离开政坛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在池田看来,正是由于吉田的大力栽培,他池田才有60年代出任总理大臣的机会。出于对“恩人”的感激,他在睡觉时也要“头朝恩人”。在日本人看来,“脚“是人体中的“最下”,“下”同时意味着“肮脏”,用“臭脚”对着“上”,对着恩人,属于“不敬”。日语中“最低”[22]是骂人话,日本人骂人常用“最低”“脏”“臭”表示,这种观念与中国不同。

江户时代,幕府开始禁止天主教,为了辨别哪个特定个人是“洋教信徒”,当时的长崎奉行(幕府派驻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水野守信,想出了一个只有日本人才能想得出来的识别方法。他先下令让人在铜板或木板中刻上圣母玛利亚或耶稣像,然后将刻着圣像的板子放在地上,让日本人赤脚在上面踩。这时会出现两类人:一类是对用脚踩踏无所谓的,还有一类是拒绝踩踏的。无疑,拒绝踩踏者就是信徒。“踏绘”是日本的“所罗门的智慧”,它产生的基础是日本人的“洁秽”观。对信徒们来说,圣母、耶稣是“圣主”,不单语言上要用敬语,行为上更不容玷污。脚又臭又脏,岂能践踏在“圣像”上?也正是抓住了日本人亲疏与洁秽联动心理,幕府官员才想出了这一招。信徒不会用脚踩踏圣像,抗命拒绝表明他们就是信徒。

有“洁癖”的“神社”与“寺院”

在日本,“肮脏”与“邪恶”是同义词。“不洁”就是“丑恶”;“污秽”必需远离。当代日本的日用品生产厂家,为了迎合众多日本人的“洁癖”,在很多商品上贴上“抗菌用品”的商标。市场上出售“抗菌袜”“抗菌服”“抗菌餐具”“抗菌文具”“抗

菌玩具”，还有“抗菌家具”“抗菌家电”“抗菌乐器”，甚至还有“抗菌银行存单”“抗菌纸币”。

日本人在“自我夸赞”时，总喜欢以宗教为例。为了说明日本人爱好和平，日本人常说日本不曾有过宗教战争。与日本人相反，无论欧洲还是中东，历史上都有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为了夸赞日本人“宽容”，日本人喜欢说他们对所有宗教都采取“柔软”态度，接纳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既有佛教，还有基督教等。

仅凭这些能否说明日本人“热爱和平”，对异教“宽容”暂且不论，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日本人对宗教也要进行“纵向排列”。依照日本“内”上“外”下的习性，看看日本人在不同时间出入不同的宗教场所，在不同场所进行的不同活动，众人就可以对孰上孰下略知一二了。

与“内”=“上”“外”=“下”相对应的是“内洁”“外秽”。日本的“神道”与喜庆有关；而外来的佛教与丧葬相涉。

日本人送旧在“寺院”，迎接新年在“神社”。在“寺院”听完除旧的钟声之后，接着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神社，在那里“参拜”，祈求神的庇护，保佑新的一年万事平安。人从生到死，出生是“喜”；辞世是“灾”。新生命诞生，父母要抱孩子去神社，孩子过“七、五、三节”，是跨越人生的几个重要门槛，这时同样是去“神社”。孩子长大过“成人式”结婚，还是要去神社。只有命归黄泉之时才去“寺院”。人死了，“寺院”负责收尸，承担为死人净身的工作。和尚为死者超度，念经让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堂。同样，“寺院”中建有墓地，僧侣与死者共处一地，是死灵的陪伴者。

凡与“死”“鬼”有关的其他的一些节日，比如“盂兰盆节”等要去寺院。“内”是“洁”与“吉”；“外”



浮世绘——《钟馗梦中捉鬼图》

浮世绘大师月冈芳年笔下的鬼王钟馗高高在上，威风凛凛。虽然鬼王的相貌难以恭维，但其气势却足以威慑世间恶鬼。而其身旁的小鬼则萎靡在地，一眼即可看出其猥琐之态。这就是日本“洁上秽下”传统的一种直观体现。

是“秽”及“凶”。

“洁”“喜”是神道，“秽”“凶”是佛教。

对于“洁”“秽”，神社用区别“内外”的方式加以限制。

进入神社前必须净身，不可将污秽带入神社内。在“延喜式”[23]中，对“血”的忌讳有明确规定。宫女怀孕，必须在散斋之前退出。有月事(月经)者，祭祀前一日退至宿庐，不得上殿。古代日本人在远离住房的地方设立产房、月经房，让生产、来月经之女子退避在专门设立的房间中。这种行为的根源，来自“血是污秽之物”的信仰。因为“血”是“污秽”之物，为了避免让家庭内部成员染上“污秽”，“带血”成员要与家庭成员分别居住，日本有些神社甚至不准女性进入。

日本人称“死”为“黑不净”。寺院从事葬丧，从事与“黑”有关的事宜。一般人死了葬在寺院，而死后灵魂能够继续“变大”“上升”者，牌位才会放入神社，他们死后变成了保护后人的“鬼神”。神社与寺院，在分工上表现出“高低尊卑”，纵向差异通过服装颜色、称谓表现出来。寺院僧侣的服装为黑或灰色；而神社的神职人员叫“神官”，他们的服装，女为红色，男为白色。

进入神社前通常要在神社入口的盥洗处洗手、漱口，然后才进去，洗手象征着清洁自我的身心。日本有句成语叫“洗足”，也就是“洗脚”的意思。“洗脚”不是通常中国人认为的“泡脚解乏”，而是“脱离黑社会组织”的意思，同样意思之表述，中国是“金盆洗手”，中国用“洗手不干”表示“去除恶习”；而在日本，“坏事”“污秽之事”是与“脚”“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再干“坏事”“脏事”就变成了“洗足”。

日本人对“不洁”非常忌讳，最忌讳“死”。如果一个人家中有人逝去，该家族的成员不可去亲朋好友家访问，以免将“污秽”“不洁”(吉)带入其他人家。“死”是“黑”“脏”“臭”。尸体也不能从正门抬出，必须走“后门”。

猫嫌狗厌的“贱民” /////////

以前的日本人认为，接触血液的人是“肮脏之人”，因此，从事皮革加工，处理动物死尸的人，在他们看来是“秽多”(えた)，“脏多者是贱民”。因为他们“秽多”，所以他们不能与“无秽”或者“少秽”的“洁人”居住在一起，统治者在士、农、工、商居住地之外的地方，为他们专辟一所，限制他们出入。除了“秽多”之外，与它近义的另外一个词是“非人”，“非人”原本是佛教用语，也就是“人”的反义词。

在日本的《多闻院日记》中，记载了大概是日本最早的“贱民歧视”。里面将住在奈良北边的般若寺山坡上以及奈良西边的油坡上一带的居住者，称为“坡上的家伙”。



浮世绘——《京都繁荣图》

这幅图描绘的是江户时代的京都。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熙熙攘攘的人群，纵横林立的商铺，锣鼓喧天的戏台，无不彰显着一个大都市的繁华景象。而在这个繁华的背后，却是“贱民”们所流下来的汗与血。

在中世[24]，这些人主要从事刷墙、砌灶、挖井、建造庭院、架桥等土建工作，他们属于有技术的外来移民。由于他们是外来者，没有土地，因此被有耕地的原住民歧视。

在京都，从事土木建筑的工人同样被视为“贱民”。他们住在贺茂川的河边上，因住在河边，他们被称为“河边的人”。他们从事挖沟、打土垒、修建土墙、挖井等工作。

这些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多来自朝鲜半岛，或者是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大陆的外来移民及他们的子孙。对于先住民而言，后者是外来者，“外”就是“新”，“新”就是“下”。外来移民没有土地，他们只能居住在荒弃地带。原住民为了避开“不洁”，避免将动物尸体等埋在自己的土地内，就将它们丢弃到公共土地的河川上，期待雨季或洪水到来时能将它们冲到下游，流入大海，而住在河川上的新移民也不得不与这些“不洁”为伍。外来移民有技术，他们从事的工作许多是原住民无法完成的技术性工作，先住民的优越感有时通过嫉妒表现出来。他们疏远外来移民，不给外来移民同等的地位，将他们放在“下”的位置上，他们的“有用性”让他们被歧视地接纳。

“河边儿的人”善四郎，据说受到足利义政将军的青睐，将军命令他前往奈良的兴福寺，去参观那里的庭园布局，可寺院拒绝他入内，理由是“没有让贱民入内的先例”。从事刷墙工作的人地位低，若是贱民则不允许进入皇宫，可如果不让他们进入皇宫，刷漆的工作又没有人来完成。京都朝廷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最终给这些“贱民”封官，抬高他们的地位。给他们封的官是“属官”，从此之后，木匠、漆匠就开始被称为“左官”。木匠、漆匠等是通过兴建宫城，从以前的贱民地位上升为“左官”的。

在等级社会的日本，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处于“下”的集团。外来的、被排斥的人，不得不结成一个新的集团，他们从事“上”不愿意从事、不屑从事的职业。这个集团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社会对他们有某种需求。

战国时代，“大名”们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在他们自己领地内建造“城”，假如没有这些有一技之长的“贱民”，作为战国时代象征的“城”就无法出现并存在。丰臣秀吉实施“兵农分离”政策，收缴天下兵器，强化了等级制度。进入江户时代之后，等级制度再进一步，“士农工商”地位世袭，职业世袭。

明治一新后，在法律上废除了“士农工商”这一等级制度，但是，取而代之的是皇族、华族、士族、平民百姓等新的身份等级制度。明治时代，“贱民”依然被强制居住在指定的区域。由于受到歧视，他们在出入他人居所时，不能从一般人正常出入的门户进出。

1986 年 10 月，大阪四天王寺院内发生了一起流浪汉遭袭事件。流浪汉被人在近距离内用气枪射击，面部受伤。警方调查后发现，对流浪汉开枪射击取乐的是两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

1983 年 2 月，横滨也发生过类似事件，睡在公园及地下街道中的流浪汉接连遭受袭击，结果三人死亡。

被警察逮捕的中学生们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可他们并无强烈的犯罪感。在他们眼里，流浪汉的生命并不宝贵，流浪汉“肮脏”，属于“非人”。对脏东西就应该像丢垃圾一样处理掉。流浪汉多为社会失意者，只因他们的衣着以及身上的气味，他们就成为被歧视、欺侮的对象。中学生们并不了解这些失意者背后发生的故事，仅凭他们的外表就将他们从自己的同类中划分出去。日本社会简单地将“洁”=“上”“秽”=“下”作为普遍价值观推行，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让中学生们自认为自己是“洁”，为“上”；流浪汉为“秽”，是“下”，“下”最终成为牺牲品，而他们的行为是“保护洁净”。

“上”与“下”只是相对的，优越感只存在于相对认识之中。但等级制度养成了对“上”恭卑，对“下”优越的“见人打卦”习性，对“上”有怨言、不满也不敢发作，只能用“忍”的方式自我克服，而对“上”之“忍”，进而转化为视“下”为出气筒，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在“下”身上。

流浪汉被欺侮，是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们离家出走后“彻底自由”。在日本，脱离集团同时意味着失去了集团的保护，他们沦为弱者，最终竟成为了中学生的“靶子”。为了自身安全，有一些离家出走的人，他们后来又加入了另外一个强有力的集团。



乞讨的老兵

照片上的这位乞丐老人原本是一名士兵。日本战败了，保护他的军队也已不复存在，新政府尤其想在此时与"军国主义政府"划清界限，老兵只能沦落到了"秽"的地步。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乞丐，而所谓的老兵的资历，只不过是用来博取人们同情的资本罢了。

暴力团——一个够"浪"的组织

脱离组织、被集团抛弃的人就是"流氓"。被藩国抛弃的武士叫"浪士"，当年没有考上大学，脱离了高中生集团、同时又没有被大学接纳的学生叫"浪人"，流浪汉叫"浮浪者"，意为随波逐流、漂泊不定的浮萍式人物。一个人无论主动脱离集团，还是被集团抛弃，结果都是"浮浪"，它意味着危险，有些人因此加入另一个集团。

集团抛弃某个人，在日本被视为一种严厉的惩罚，宗教团体抛弃某人称"破门"。"破门"是宗教用语，表示断绝以往的师弟关系，将某人赶出山门之外。同样的事例用在民间就是"追放"。"追"是"赶出集团"，"放"就是"流放"。"追放"意味着该集团对某个特定个人关闭，将他排除在外。类似处罚早在江户时代就存在，当时对庶民的处罚分"重追放""中追放""轻追放"三种。"追放"就是剥夺他们的庶民身份，将他们降为"非人"。依据罪责轻重，限制被追放者居住的区域。罪行越



重，被追放者的流放地就越偏远。

古代，京都的别称叫“上方”，后来德川家将军主政，前往江户叫“上行”（登），而离开则称“下行”。与“上”之间的物理距离，也是等级社会中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被集团“追放”之人最终沦为流浪汉，成为无依无助的“漂泊”者，为了保护自己，这些被抛弃者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集团，这个集团中的纪律、行规更为严厉，该集团专干他人不愿意从事的行当，它们是干“污秽事”的“暴力团”。“暴力团”专干违法的“黑事”，尽管世界各地都存在各种不同种类的“黑社会组织”，可像日本这样公然合法存在的“暴力团”仍属罕见。

“暴力团成员，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来自被社会抛弃的、受到歧视的阶层。”[25]

“暴力团”成员被称为“逸物”。“逸物”来自动词“逸”（はぐれる），意为“与大伙走失的人”。当“逸”与其他动词组成复合动词时，表示“失去某种机会”。

“暴力团”又被称为“极道”，所谓“极道”就是相对“一般道”而言的“极端道”。“极端”指该集团从事“极端工作”；集团内部存在“极端纪律”，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以及集团的运作方式，在这个集团中走向“极端化”。

在“暴力团”中，“纵向关系”用普通家庭中的称谓来表示。“亲分”（おやぶん、爸爸身份）就是“头儿”，“子分”（こぶん、儿子身份）就是“小子”，后者是抛头露面干活的“伙计”。这种垂直关系还可以用身体中的不同部位来表示。“头”（おや）就是“暴力团”中的“老大”，而“身内”（みうち、身体中的一部分）就是“胳膊、腿”。“头”是中枢指挥，同时也是重要保护对象，而胳膊腿则是接受指令去行动的一个器官。为了“头”，任何时候都可以牺牲身体中的某一部位。这也是黑帮犯罪败露时，让“下”去顶罪的思想基础。在“暴力团”中，“子分”“身内”是行动机关，一旦“头”下令，相当于“胳膊”“腿”的“组员”必须立刻开始行动。败露时也绝不泄露组织内部的任何机密，情愿坐牢也不出卖组织及同伙，这些都属常人无法想像并且不能完成的“极端行为”。

对于日本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并且存在“暴力团”，日本最大的“暴力团”－“山口组”的常年法律顾问山之内幸夫是这样说明的。

第一，“暴力团”成员多为社会所疏远的人，他们是放弃了自己通常的人生观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形成于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中。

第二，“暴力团”成员的收入虽然大部分可以看成是违法收入，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取之于社会上的某种需要。

第三，这个组织具有强大的获取财富、权力的能力，而且他们的组织非常严密。[26]

对于“暴力团”究竟从事什么行当？如何生存？对“暴力团”组织结构十分熟悉的高山登久太郎是这样介绍的。

暴力团也是一个企业，它依靠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订单生存。换言之，他们从事其他企业不乐意接受，但是存在社会需求的业务，从政治家到一般百姓都是他们的客户。[27]

……有权人是无可救药的，政治家们在背地里干什么我知道的太多了，如果我将他们都揭出来的话，那将会引发暴动。

的确，“暴力团”从事邪恶行当，这些我不否认，我也在反省。但是，要利用我们企业的政治家，他们更坏、更奸猾。[28]

在“暴力团”看来，社会上没有“洁”“秽”之分，所谓“洁”，尤其是上层社会追求的“洁”，实际上是因为有人替他们干了“脏”事，他们被粉饰为“洁”。道貌岸然的“干净人”将“脏事”外包，表面上“干净”的人实际上最“不干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认为“暴力团”才最干净。他认为“暴力团”成员“最坦荡”，首先，他们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专干别人不愿干的事的人；其次，他们任何时候都坚守诚信：（1）任何时候都不出卖委托人；（2）一旦拿钱接受了委托，“暴力团”一定会为委托人达到目的。

对“暴力团”而言，他们是“极端道”，只要有人愿意出钱，他们就可以去杀人放火。“杀人放火”对他们而言不是犯罪，也不违反良心。是否违反良心、属于犯罪，判断应该由委托人下，他们只负责“接单”与“销单”。接受了委托就是一项使命，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他们从事的行当，正是因为有人委托才成立。假如没有委托人，或者说社会上所有人都依照自己的良心、公认的道德准则、法律规定去行事的话，“暴力团”就失去了生财之道。“暴力团”宣称他们不虚伪，理由在于他们敢于公开承认自己专门从事违法勾当，也就是说，这一“企业”公然标榜他们的业务属违法行为。他们跟警察玩“猫捉耗子”的游戏，在他们看来，警察只是一个比他们“强”的集团，是“国家暴力团”。假如警察抓到了他们，他们就去坐牢；没有抓到就逍遥法外。“暴力团”认为：他们的委托人是“伪善者”，想干脏事又不自己动手。“暴力团”明码标价，“暴力团”的客户名单中，许多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们是连事后承认的勇气都没有的“肮脏分子”。

“暴力团”的委托人来自各个行业，业务也五花八门，贱业、贱人、干贱事。委托人中既有政治家、大资本家，还有每天与他们斗争的警察。作为社会正义代表的执法者，警察也委托“暴力团”犯罪，也就是说，猫有时候也跟老鼠打得火热[29]，“洁”

与“秽”，“违法”与“合法”，“正义”与“邪恶”，仅仅是手心、手背问题，是一个整体的两面。

竹下登在参加日本自民党总裁竞选前，他乘车前往有“黑将军”之称的田中角荣的府邸，可他这次吃了一个闭门羹。对他来说，田中角荣是他政治角逐场上的“亲分”（おやぶん）。竹下登原属田中派，自从田中角荣因“洛克西德贿赂事件”辞去总理大臣职务之后，竹下登就自立门户，公然背叛了“黑将军”。竹下登想早日坐上总理大臣的宝座，可“黑将军”对他背叛怒不可遏，田中角荣要在背后为他制造障碍。

就在竹下登准备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右翼组织“皇民党”的宣传车开始出现在东京街头。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地播放着：“大家一起推举伟大的政治家竹下登先生担任新首相吧。快让竹下登政权诞生吧。竹下登先生是诚实、廉洁的政治家啊！”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上述内容，显然是要丢竹下登的人。当时的日本自民党总裁中曾根康弘，以“一个要当总理大臣的人，竟然连街头上的‘右翼’宣传都无法阻止”为由，拒绝提名竹下登为继任总裁候选人。

日夜都梦想着要早日当上总理大臣的竹下登，为了获得前任自民党总裁中曾根康弘的支持与提名，下决心要平息“右翼”的街头宣传。竹下登派代表与“皇民党”谈判，恳请他们不要在街头上继续鼓噪了。“皇民党”因此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竹下登与“右翼”领导人会见，称“右翼”领导人希望“与竹下登先生握手”；二要竹下登亲临田中角荣府邸赔不是。前一要求被代理人拒绝，称竹下登不打算会见“右翼”领导人。对于另外一个条件，竹下登答应了，可他后来违约没有去。“右翼”皇民党提出的两个条件，等于竹下登一个都没实现。“右翼”团体骂他不守信用，再次开始了街头的“反宣传”。

竹下登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前往田中角荣家。对竹下登而言，位于东京目白的田中角荣家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自从战后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从地方来到东京后，他就加入了田中军团，30 多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出入田中家，这次是他跟田中闹翻后的首次“表敬访问”[30]。可当他乘车来到田中角荣家时，“黑将军”[31]故意让竹下丢人，田中角荣将大门紧闭，不允许他入内，拒绝见客，竹下登在田中角荣家门前吃了一个闭门羹。[32]

为了阻止“右翼团体”不断地街头“捧杀”，竹下登决定找暴力团“摆平”。日本最大的“暴力团”组织“稻川会”会长提出要五亿日元可“摆平”，竹下登令手下从“佐川急便”拿来五亿现金转交给“稻川会”会长，通过他与皇民党谈判，最终皇民党停止了街头“捧杀”活动。[33]两周后，1987 年 10 月 20 日，中曾根康弘提名竹下登为继任总裁候选人。

“暴力团”对政治家“肮脏别人”“干净自己”的虚伪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社会上“最讲义气的勇敢人士”。按照他们的逻辑，给他人住宅送个炸弹与送个快递没有太大差异，他们只为委托人“代行任务”，委托他们干“脏事”的人实际上“最脏”，他们为了要自己“干净”，不允许自己有“污点”“丑闻”，他们就花钱请“脏人”干“脏事”。道貌岸然的委托人，只因为有钱就“外包脏事”，此时他们已经明确知道该事是自己不想沾手的“脏事”。

高山登久太郎指出：

造就我们“暴力团”的是自民党。60年代“安保暴动”时，自民党吩咐我们“肮脏的事你们去干”。他们让我们与全学联正面冲突，当时出于以毒攻毒的考虑，自民党政府承认我们的存在。可是，政府现在以治安问题有变化为由，欲将我们斩除掉。[34]

……我以前曾经用日本刀砍过共产党的委员长，我和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冤仇，“暴力团”与共产党，本来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既无恩仇，又无任何关系。为什么我会用日本刀砍他们呢？因为有人指示让我去砍，还称是为了国家。他们说：让共产党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是为了日本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我到现在都没有把他们的姓名暴露出来。[35]

……明治、大正、昭和，不光是军部，政界、财界都极大地利用过我们“暴力团”。

军部利用我们运输煤炭、修建机场等，同时还让我们充当特务机关的要员。政界除了院外活动，还为镇压“左翼”，积极参与并组建“右翼”团体。财界利用我们破坏“左翼”工会的罢工，同意“暴力团”在煤矿、建筑工地上经营食堂，俗称饭摊。为了镇压农民，“暴力团”也曾被动员利用过，而且我们也积极地参加了。

历代黑龙会的重要成员

黑帮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群地痞无赖，他们中的许多人亦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下排右二）亦是黑龙会的成员之一。正是这些在政治、经济上有呼风唤雨能力者的加入，才使黑帮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力。





战后，政治家、警方对我们的利用一直持续到昭和 38 年(1963)。其中，在“三池劳资”冲突时，他们利用“暴力团”制造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在第一次“安保斗争”时，“暴力团”成员被大量动员，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些时候，我们都曾奋不顾身地帮助过政府。

现在是“经济暴力团”，有人利用我们回收债务，清理倒闭企业，放高利贷，调解交通事故，驱赶房客，出席股东大会等。我们清理出来的土地，最后的买主都是大企业。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利用“暴力团”而肥的，都是世界级企业，一流企业。[36]

当今日本“暴力团”从事的主要行当有：清理地盘、收债、经营赌场、色情行业、贩毒、杀人等。开发商为了开发房地产项目，首先要清理地盘。因土地属私有财产，开发商与土地所有者往往会因为土地转让无法达成协议，无法进行有更大商业价值的开发。为此，开发商求助于“暴力团”。“暴力团”在接受委托之后，为了将住户赶走，先是派人上门口头劝告，如果上述手段不奏效他们就开始威胁，进而破坏、放火，直到将住户赶走。

“暴力团”还接受委托，出席股东大会。

日本的上市企业，每年都要召开股东大会，经营者须在会上向股东通报公司的经营以及损益等情况。经营者向股东报告公司的经营状况，原本是经营者的一种义务，可是，经营者时常会向股东通报假情况，让股东无法通过股东大会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因此，股东委托“暴力团”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出席股东大会，受人之托专门参加股东大会的人叫“总会屋”，他们在股东大会上对经营者提出刁钻问题，让经营者难堪。

股东大会是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博弈。股东委托“总会屋”参加股东大会，目的是挑经营者的刺；而经营者为了让股东大会圆满结束，也会雇佣“暴力团”参加股东大会。后者是为了让股东大会能够在掌声中迅速结束。很多时候股东大会都是在“大家鼓掌”声中迅速结束。能在大家鼓掌中顺利结束，往往是“暴力团”在背后积极参与、活动的结果。据日本社团法人“商事法务研究会”1995 年的统计，约 2300 家上市企业的股东大会，平均所花时间只有 32 分钟，许多股东大会甚至一个提问也没有。

某一公司董事说：“像这样‘大家鼓掌’的股东大会，毫无疑问是背后‘摆平’的结果。”

企业经营者是如何将股东大会导演成“大家鼓掌”的大会呢？经营者让公司的职员、或者直接雇请“暴力团”成员冒充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他们人多势众，真正

的股东一开始发言，他们就起哄捣乱，为了让股东大会能在大家拍手中尽快结束，经营者报告一结束，他们就高叫“没意见”，“明白了”，用这种手段淹没、压制股东的声音。“大家鼓掌”是“表面文章”，它“干净”“畅顺”是因为事先有“裏工作”（うらこうさく、背后私下交易）。这里表现出“明”与“暗”，“表面”与“背后”的两面，“干净”与“肮脏”早已在深处环流。

经营者与“暴力团”之间的利益交换方式也很简单。经营者将企业内的清洁工作、垃圾处理、拆除废弃建筑等工作承包给“暴力团”。企业与“暴力团”之间的交易表面上“合理”“合法”。比如，“暴力团”向企业“出售”各种物品，从绘画到摆设的观赏树木、发行的所谓杂志。这些杂志几乎没有任何阅读价值，上面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报章、杂志上复印下来的，企业的经营者高价从“暴力团”手中订购这类没有任何阅读价值的杂志。

向强者鞠躬

1944年6月开始，美军对日本占领的塞班岛发起进攻。登陆之前，美军先对塞班岛实施了空中打击。组织轰炸塞班岛的是韩塞少将，他的指导思想是要“精确打击”，也就是将轰炸锁定在军事目标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殃及民用设施。美军攻占了塞班岛后，美国换上了鲁梅少将，让他接任美国空军第21师轰炸司令。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后，日本军机多次对中国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人口密集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问题。日本军队对美军发动攻击也多采取偷袭、夜袭等手段，甚至用伪装的红十字船运送军人、武器，基于上述理由，美国起用了对德国汉堡进行地毯式轰炸有功的鲁梅，鲁梅的指导思想是：日本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仅仅对大的军工厂实施轰炸，无法摧毁日本的军工生产能力，鲁梅因此改变轰炸方针，将他在汉堡实施过的地毯式轰炸转用到了日本本土。1945年3月9日夜，从塞班岛起飞的334架B29轰炸机，将总重量2000吨的燃烧弹投在了东京，这次轰炸瞬间造成10万人丧身火海。日本的军国主义领导人曾叫嚣：“即便让东京化作‘焦土’也要抗战到底。”这次美军轰炸果真将东京变成了“焦土”，两周后昭和天皇视察了完全成为废墟的东京，这次轰炸造成的实际伤亡人数超过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可昭和天皇为保存“国体”，依然号召将战争继续下去，要日本全体国民“玉碎”。[37]

1964年，鲁梅已经官至美国空军总参谋长，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授予他一等旭日大绶章，表彰他“战后协助日本建立航空自卫队”。

向强者鞠躬，对弱者欺负，无论对个人还是集团，日本人都不忘这一“处世法则”。鲁梅以及他所属的美国，向日本空投了燃烧弹、原子弹，美国彻底打败了日本，日本因此向强国“鞠躬”。明知鲁梅组织了对东京的大轰炸，为了避免有人以他组织实施了“地毯式轰炸”而表示反对，日本就表彰他“帮助组建航空自卫队”。日本祸害中、朝50年，丰臣秀吉的子孙依然像当年丰臣军在朝鲜烧杀掠抢时那样，战败了，撤回日本本土就算是对亚洲兄弟的照顾，别说没有一分钱赔偿，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二战日本投降后，对战争期间造成3000万中国人死亡，6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日本仅说句“对不起”就算结束了。二战后日本也向中国投降，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蒋介石呼吁国民“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让在中国的200万日本人轻轻松松、平平安安地就返回了日本，日本也没向蒋介石发过一枚奖章。

日本战争期间给周边国家以及国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伤害，一个战败国，现在还要跟中国、俄罗斯、朝鲜争夺领土。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进步，战后中国发展缓慢，日本人依然用中国人“劣等”，日本人“优秀”来作为答案。日本在对待中、美两个国家时，态度截然不同。应对中国等受害国支付赔偿时就赖账说没钱；可对支付美军驻扎费从来不含糊，20世纪50年代每年1亿多美元，现在每年50亿美元。

天皇也有落魄时 //////////

1945年9月27日9时50分，昭和天皇身穿晨礼服，头戴大礼帽，离开皇宫首次拜访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皇后让陪同者抱上一大束鲜花，这是皇后为了赠送给麦克阿瑟夫人，特命手下从新宿御苑的温室里采摘来的。关于是否要赠送鲜花，宫内还为此进行过争论，后来怀柔者的意见占了上风，据说这样能给战胜国一个好印象。三个月前，“英、美”还是“鬼畜”，现在相互应酬已经不是用枪炮，而是天皇亲自送鲜花。

1891年，沙俄皇太子环游世界途经日本访问，其间一名担任守卫工作的日本警察，突然抽刀砍向沙俄皇太子尼古拉。日本惧怕沙俄因此向日本宣战，竭力安抚皇太子。明治天皇后来亲自前往尼古拉入住的旅馆，向他道歉并一直将他送上停泊在神户港中的俄国巡洋舰。因当时俄国实力远大于日本，日本方面非常担心明治天皇上了船就被扣留。这次昭和天皇亲自前往占领军控制区拜会麦克阿瑟，日本

也非常担心美国是否乘机拘捕昭和天皇。9月20日，藤田侍从长为此专门去打了前站，在确定美方没有扣押天皇的意图之后，终于安排了这次拜会。与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隆重举行日本投降仪式不同，这次访问是“以私人身份”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以前昭和天皇外出都是“巡幸”，从未有过“上”去主动见“下”。这次天皇要屈驾登门拜访，而且是对“外夷”进行“表敬访问”，它本身表明“上下”关系已经发生根本逆转。美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麦克阿瑟成为了昭和天皇的“上司”，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下”去见“上”也属情理之中，可这种“上下”“强弱”转变属于“高度机密”，不能让日本国民知道。

为了保密，昭和天皇选择了轻车从简的方法，将警卫人员减少到最低，御用车也没有用，昭和天皇乘一辆黑色轿车前往美国大使馆。这次也是天皇的车首次遇到红灯停下，因为没有通知交警，当昭和天皇乘坐的黑色轿车遇红灯停车时，市内电车还从车旁驶过。黑色轿车没有从正门进入美国大使馆，而是沿着美方指定的路线进入。沿上坡路到达美国大使馆门前时，手持步枪的卫兵示意停车，天皇下车后，步行进入建筑物。这时翻译还在后面的汽车里，侍从急忙跑到后面将翻译叫来。美国方面有人出来迎接，天皇每看到一个人就郑重行礼。麦克阿瑟没系领带，穿着开领军用衫，在会客室的门前等候。谁也没有注意到，麦克阿瑟的夫人金麦克阿瑟和儿子阿萨，在约定“绝对不许出声”的保证下，躲在帷幕的后面偷偷观望“现人神”。看到天皇进入，麦克阿瑟迎上去与昭和天皇打招呼并用手拍天皇的肩膀，天皇向他深度鞠躬。

开始约定只谈15分钟，以往“行幸”对时间有严格规定，可这次毕竟不同。实际会见比原计划延长了20分钟，一共35分钟。离别时，麦克阿瑟从会客室送天皇到大厅，他再次伸出手来与天皇握手，天皇再次郑重地鞠躬行礼。28日凌晨，东久迩政府得知当日的报纸将刊载昭和天皇访问麦克阿瑟的消息并同时配发两人的合影，政府立刻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并紧急下令，禁止当日报纸发行。占领军得知此事后，立刻以命令形式发出通告，下令解除“禁止发行令”，要求“撤销对新闻及通讯自由的一切限制”。

在日本，连地名都有“纵向”的“上下”之分，去东京是“上”东京；离开东京是“下”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更不用说了。对谁应该访问谁，穿戴应该如何，会见时谁应该在休息室等待，这些都依据“纵向”有严格规定。天皇见人是“上”接见“下”，这时，“下”必须穿好礼服前往皇宫，在规定时间到达后，须先在休息室等候接见，侍从到时会将来访者带入专门房间“谒见”天皇，来者向天皇行最敬礼，讲最高敬语，天皇则用几句话回应。而这次报道会将“纵向关系”这一天机泄露，昭和天皇

亲往麦克阿瑟办公地，尽管没有出现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的投降仪式上，可亲自去美国的地盘就等于去投降了。公开照片就更要不得了：麦克阿瑟身着便装；天皇身穿大礼服，麦克阿瑟双手叉腰“稍息”；昭和天皇“立正”，对“纵向”敏感的日本人，一看这张照片就会明白一切，照片犹如美国投向日本的第三颗原子弹。

会见时的谈话内容至今仍属高度机密。1963 年的《麦克阿瑟回忆录》中说：“天皇非常紧张，他接受敬烟时两手有些颤抖，自己曾努力设法安慰他，但天皇说战争的一切责任都在他自己，他为接受联合国的裁决才来到这里。”

在美国人的安排下，1946 年 1 月 1 日昭和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昭和天皇向日本国民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这与麦克阿瑟妻小在帷幕后看到的事实相符。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美军认为，天皇是个“戴眼镜、近视又驼背的小老头”，一个平凡、普通的人而已。

1946 年 2 月 19 日，天皇进行了战后首次出巡。与战前不同，天皇不能再乘坐带有菊花徽章的皇室专车了，沿途的警卫级别也已大大降低，以前天皇出巡，每隔几米就站一个警察，所有看到天皇车队的人，必须行最敬礼或匍匐在地上致敬，不允许任何人从高处俯视天皇。这时昭和天皇已经发表了“人间宣言”，美军要用对待正常人的方式对待他，这样更能说明日本发生了转变。

昭和天皇到达访问地点后，天皇立刻变成美军记者任意摆布的道具，他们对着昭和天皇大喊：“往这边走，脸朝那边。”有时还推他、拉他，很多照相机、摄影机同时对准天皇。就在天皇即将结束当天的出访准备返回时，几十名前来担任警戒的美国兵要一睹天皇尊容，有人甚至爬上了车头，还有人从车窗伸手进去要求与天皇握手。占领军是胜利者，天皇也无可奈何。[38]

……天皇多次被推搡，有的往这边拉，有的往那边拉，像玩具一样推拉得不像样子。但他全不在意，一点也没有厌烦的样子，一味任人摆布。担任警卫的侍卫想：“为了日本的复兴，为了国民，他在忍其所忍。”

几个月前昭和天皇摆布他人，还曾经希望成为世界的领导人，“变大”没有成功，反而“变小”了，到了“任人摆布”的地步，日本人对此的反应是：“天皇在忍。”[39]好似当年德川家康之对织田信长。



裕仁天皇与麦克阿瑟的合影

天皇本应是日本民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祇。但二战之后，天皇便从“神界”跌落“凡间”。面对着趾高气扬的美国占领军总司令，裕仁也只能无奈地将自己置之以“下”的地位。力量决定“上下”，日本被美国推出了“土俵”，这让麦克阿瑟成为了日本的“太上皇”。

“鸡米”皇太子

1946 年 3 月 5 日，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詹姆斯司徒达多校长为团长，由 20 多人组成的美国教育使节团一行来到日本。总司令部认为：只有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才能促进日本的民主化，特邀教育代表团到访日本。3 月 27 日下午，天皇在皇宫接见了该代表团，会见时昭和天皇突然对团长提出：“想给皇太子请一位美国家庭教师。”

昭和天皇的这一要求让美国代表团大吃一惊，后来他们决定满足天皇的要求。代表团回国后，司徒达多推荐了两名女性候选人，他将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寄给了日本宫内省，以供选择，宫内省最终选择了勃古宁夫人。勃古宁夫人 40 多岁，丈夫是大学教师，他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勃宁古夫人在美国基督教教友派的福利团体中工作。10 月，她离开美国来到日本。她的年薪为 2000 美元，而当时美国同龄的女公务员的年薪只有 300 美元。

在明治宪法颁布前，藩阀政府先制定了《皇族身位令》，其中第十七条规定：“皇太子、皇太孙满 10 岁时，任陆军及海军武官。”昭和天皇出生在明治天皇在位时，11 周岁那年，他作为皇太子被任命为陆海军少尉。

昭和二十年（1945）3 月，日本陆军内部文件写明：皇太子任少尉，出任近卫步兵第一联队队副，历届皇太子出任近卫步兵第一联队队副已经成为惯例。为此，还在营地内给皇太子专门搭建了一个白木的站立平台。

1946 年皇太子 12 岁，昭和天皇 10 岁时起开始单独学习帝王学，因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皇太子不能再当军官并在专门为他设立的学问所里单独学习了。

皇太子与一般贵族子女同样，进入“学习院”[40]学习。勃古宁夫人到达日本后，开始担任皇太子所在班的英语教师。日本为她专门配备了女助手、专职司机及几个佣人，安排她住在一栋被美军一度没收后又返还的豪宅里，家具也都是皇室专门定做的高级家具，皇室的侍从说：“她的生活水准高于皇族。”作为皇太子的家庭教师，她在日本一共工作了三年。她卸任回国后，皇室也表达了一些对她的不满，“从未想过学一点日本文化和日语”“直到今天，她仍依靠《皇太子之窗》的版税生活”。

勃古宁夫人初到学习院上英文课时，为了方便记忆，首先给班里的每个日本孩子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她给皇太子起的名字是“鸡米”，虽然皇太子最初曾说：“我是皇太子”，但后来还是接受了“鸡米”这个美国名字。除了在课堂上教授英文之外，勃古宁夫人还到皇太子的临时公馆，给他单独授课一个小时。宫内省不放心皇太子一人学习，又请了一个女监在旁边跟随。宫内大臣石渡庄太郎在皇室记事簿上写道：“请美国人当家教是为了奉承美国人。”

从1945年10月中旬起，芝高轮的“光轮阁”就变成了二战后的“鹿鸣馆”。“光轮阁”是昭和天皇的弟弟——高松宫的官邸，高松宫曾出任过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参谋长)，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经常在官邸举行晚宴，招待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高级军

为驻日美军提供服务的日本慰安妇

令驻日美军惊讶的是，日本全国上下对占领军的态度出奇地“友善”。当时的日本内务省甚至还专门为占领军建立了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RAA协会)，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先后在这个机构中从事过服务的日本女性达7万人之多。据一位曾在里面“工作”过的女子回忆，最高峰时，她一天曾接待过55个美国大兵。



官。每次招待10人左右，不邀请军官们的妻子，但是高松宫妃每次都要出来接待。餐桌上的高级菜肴与酒类即使在外国也难见到，麦克阿瑟的高级副官菲拉兹准将、副参谋长威路比少将等，都出席过在这里举行的晚宴，针对一般美军官兵有政府主办的“慰安所”；对高级军官则有“艺妓”，日本要上下齐动员，伺候好美军的“上下”。

昭和时代，日本每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日本国内的行政机关都会随之更名一次，“九•一八”之后设立了“满洲事务局”，“七七”之后扩大为“兴亚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名为“大东亚省”，也就是说，整个东亚都归日本内阁中的一个省管辖。各国都要建立祭祀天照大神的神社，满洲国皇帝溥仪将“神道”定为“国教”，1940年他第二次去日本访问，主要任务是将“神器”的复制品带回满洲国分祭，每天早上要对东京“遥拜”。

战败了，日本从“上”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尽管如此，昭和天皇既没有转信大慈大悲的东方佛教；也没有选择“四海皆兄弟”的伊斯兰教，他选择了麦克阿瑟笃信的基督教。天皇夫妇成为了基督教徒，古老的皇宫中传出了“赞美诗”的歌声。天皇夫妇请基督教徒进宫为自己以及子女进讲《圣经》，以前总穿大元帅服的昭和天皇也开始穿西装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过，一切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终止了。1951年4月，麦克阿瑟被免职并离开日本回国，同年9月日本在美国签署了《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美国人一走，神道长老昭和天皇就对《圣经》说再见了，这一年进讲也取消了，天皇夫妇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中断了7年后的首次。

麦克阿瑟本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他来说，能够把福音普及到异邦乃是神圣无比的使命。他同时认为，由于日本战败，造成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一片空白，这正是向日本人传播福音的绝好机会，他向来日本布道的美国基督教人士提供从车船票到通讯手段等各种方便，从1945年到1951年，美国派驻日本的牧师就多达2500人，发放《圣经》约1000万部。可从结果上来看，战前日本的基督教徒（新教）人数约10万人，麦克阿瑟1951年离开日本时全日本的信徒人数也仍然是这么多，只是天主教徒增加了五万人左右。[41]

---

[1] 专门下海捞鲍鱼的中年女性，有时一丝不挂，有时只穿白色长衣，但白衣入水后透明，仍近乎赤裸。

[2] 裸的交往（はだかのつきあい）：没有遮拦，不讲究任何礼节的真实交往。

[3] 明治新政府中很多高官的妻子都是前艺妓。号称"平民宰相"的原敬，曾与几个朋友相约去艺妓馆冶游，他们相互约定，今后谁先当首相谁就赎出一名艺妓，或许当初谁也不曾想过能够出任首相，只将这句话当成"酒后之言"，没想到原敬后来真当上了首相，结果他践约赎出了一名艺妓并娶他为妻。

[4] 本科生。

[5] 中根千枝著 《纵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讲谈社 第47页。

[6] 中文中的"总经理"。

[7] 据日本《周刊现代》杂志统计，车站上的剪票员，每天平均鞠躬2132次，银座百货店的电梯女服务员每天平均2560次。有的商店为了表现特色，专门购买机器人为顾客鞠躬。

[8] 無鉄砲（むてっぽう），卤莽、不慎重，对方有枪你还往前冲，都不怕被枪打。

[9] 打算（ださん），充分考虑，仔细权衡。

[10] 睡觉都有主从，翻身不理就是冷落，这里指"背叛"的意思。

[11] 中根千枝著《纵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讲谈社 第82页。

[12] 下っ端（したっぱ），垫底的。

[13] 下積み（したづみ），底层受压的。

[14] 下女（げじょ），女佣。

[15] 下手（へた），笨拙。

[16] 弱虫（よわむし），日语为"没骨气的人"的意思。

[17] 《AERA》1992年10月27日。

[18] 由退役相扑选手开设的训练营。

[19] 褒奖比赛优胜的纪念杯很大，通常相扑运动员优胜获奖时，有用优胜纪念杯喝酒庆功的习惯。

[20] 1994年12月5日《每日新闻》。

[21] 每日新闻社社会部编 《总体采访：欺负人事件》 （1995年） 第69—70页。

[22] 最低（さいてい），日语中"最低"是骂人话，表示"最差劲"的意思。

[23] 平安时代中期（公元905年、延喜五年）由醍醐天皇下令编纂的一套律令条文。对礼仪等有详尽的规定，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文献。

[24] 日本史通常将12世纪末镰仓幕府建立后到16世纪室町幕府灭亡时为止的时期称"中世"。

[25] 猪野健治著《暴力团与日本人》现代书馆。

[26] 山之内幸夫著《山口法律顾问之手记》 《文艺春秋》1984年11月，第400页。

[27] 高山登久太郎著《警钟》人民社 第168页。

[28] 高山登久太郎著《警钟》人民社 第209页。

[29] 日本警察为了自己立功，收买黑社会将枪支故意事先存放入某一地点的储物柜中，然后警察去收缴。

[30] 礼节性访问之意。

[31] 日本有一种名为"文乐"的艺术，相当于中国的木偶戏。木偶戏，顾名思义，是一种由人控制、通过人为操纵人工制造的木偶进行演出的一种戏剧形式。日本的"文乐"是否受到中国的影响不清楚，但日本"文乐"控制木偶的方法有其特点。通常情况下操纵木偶的人都要隐身，或在木偶之下操纵木偶；或像中国传统的皮影，人在上面拉动木偶，此举是为了让观众可以更集中精力于

木偶的表演上，观众只看到木偶在灵活表演。日本的“文乐”同样由人操纵，但日本不用幕将操纵者遮掩起来，日本让操纵者身穿黑衣，头戴黑头套，操纵者与木偶同时出现在舞台上。观众可以看到操纵者在操纵木偶，穿黑衣服旨在告诉观众：要视而不见，就当他不存在。“黑将军”指“操纵他人的幕后大人物”。

[32 “佐川急便“政治捐款事件被揭露之后，以上经纬才为世人所知。有国会议员在国会质询中问：“为何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访问田中角荣家？背后有什么政治家交易？”竹下登否认与“右翼”有任何交易，强调那次访问仅仅是“礼节性拜访”。

[33] 如果“佐川急便”的五亿日元政治捐款事件后来没有被揭发出来，那么竹下登花钱买通“暴力团”，利用“暴力团”平息自己竞选障碍之事可能永远无法见天日。表面上的“平静”实际上来自“水面下”的“运动”。

[34] 高山登久太郎著《警钟》人民社 第49页。

[35] 同上书、第57页。

[36] 同上书、第130页。

[37] 日语中，“玉”指天皇。

[38] 加濑英明著《日本天皇投降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250页。

[39] 1960年艾森豪威尔访问日本前夕，美国驻日本大使先期到达东京，前往抗议的日本人包围了他的汽车，有人爬上汽车，此后日本警察才出现并驱赶走了人群，日本与美国这时打了个平手。

[40] 最初专门为贵族子女设立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贯制学堂。

[41] 参考袖井林二郎著《麦克阿瑟的二千日》中央公论社。

第四章 像城池一样坚硬的传统思想



殿守给自己建的"碉堡"

日本京都模仿中国隋唐时的洛阳和长安而建。整个京都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中轴，分为东、西两京。东京仿照中国的洛阳城，西京模仿中国的长安城。与中国的古都同样，京城的最深、后部是皇宫，宫城之外是皇城，这里汇集了各种衙署，相当于现在东京的"霞关"，是中央政府部门的办公之地。皇城之外是都城，主要是供官吏和居民居住。这种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建筑风格与理念。与皇室有皇室文化一样，日本的武士阶级也有自己的文化。随着日本社会中的实际统治者由皇室、贵族转变为武士阶级，武士阶级将他们对等级制度的独到认识及见解，贯穿在他们的治国理念以及城市建筑中。建筑是凝固的思想，思想决定了建筑的样式、格局，而建筑作为一种符号又再现并反映了建筑者的思想。

中国的城为四方形，城的四周有护城河环绕，主干道纵横全城将城划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大道为东西南北向，它的尽头就是出入城的四个城门。作为"家长"的统治者与子民都住在这个城里。城外的护城河构成护城的第一道屏障，进入或接近城门，首先必须通过吊桥或旱桥，为了城内的安全，每天夜晚关闭城门，收起吊桥。在护城河内侧建有城墙，高大厚实的城墙与护城河的沟壑形成高低差，城因此难攻易守。城墙是保护都城的第二道防线。

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后，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地方上的实力领主画地为牢，他们

分别在自己的领地中建“城”。地方“大名”自建的城，用今天的话来说，其首要功能是供自己居住的大宅。正因为是战国时代，大名为自己盖的大宅，首先是一个封闭的堡垒，它没有将自己的子民包括在内，仅仅是以领主一家为中心的城堡。好似欧洲贵族的城堡建立在陡峭的山上一样，日本的“大名”们也多将他们的“城”建筑在丘陵上。与建筑在平原上的方方正正的京城不同，“城”充分利用了丘陵地势，自然天险成为第一道防线。“城”的正面或背面，或是天然河道，或有人工挖成的“濠”。日本的“城”通常只有两个入口，一个正门，另一个是紧急逃生的出口。“城”的正门是与外界连接的通道，进“城”必须先跨越河道或壕沟。人工挖掘的“壕”是水沟，尽管“濠”也是护城的一道屏障，但它与中国的护城河不同，它并非环城围绕相通，它仅仅在城的某个侧面，或正面或背面出现，构成局部屏障，它更多考虑是要建立一个人工开阔地，让“城”以及“城墙”在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外。从“城”的唯一进出口入城之后，城内之中还套着城，一道城墙有一个城门，而且墙是逐级而上的。

从城内防守的角度来看，“城”的最中心叫“本丸”。“本”就是“根本”“核心”“关键”之意；“丸”是“团子”，它是“环绕一周”的围墙。从地势上来说，“本丸”就是“城”中地势最高的一个区域，它被最里面的一道围墙环绕，“城”的灵魂，也就是领主家的住宅就建筑在“本丸”里。“本丸”里有整个城中最高大、结实的建筑“天守”。“天守”的最顶端名“天守阁”。“天守”又叫“殿守”，意为“殿主的居所”。“城”的主人是“殿样”，“殿守”顾名思义，是为了“守护殿主”而建，只有领主能够居住在“殿守”里，他也是“天守阁”中的唯一主人。领主的家人居住在“本丸”之内，“本丸”之外是“二丸”区域，也就是第二道围墙围绕的地区，它比“本丸”低一层，这个区域供领主的“家老”及贴身保镖居住，再往外是“三丸”，地势又低一层，“三丸”环绕的区域内居住着保卫“殿主”的武士们，“足轻”[1]居住在城外。

从“城”外进攻时，由于“城”本身依山而建，高位者居高、居内；低位者住低、居外。一旦爆发战争，最先卷入战火的是“城”外人员，要想攻“城”，首先必须攻克外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距离“本丸”越远的，就是最先要牺牲的。领主“大名”高高在“上”，“城”就是以他为中心而建，他可以自上而下地出入任何区域，而“下”想登“城”则没有那么容易，必须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丸”，每个“丸”都有门，都有武士把守，与领主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及个人地位的高低，都能透过“登城”时所能达到的高度表现出来，越能进入“高”“深”的人，也就是地位越高，身处中枢的人。一个藩国中的最顶尖人物就是现实生活中居住在最高点的人物。“城”的主人居住在“天守阁”中，他可以从高点俯视所有人，而所有人只能对他仰视。他在天守阁可将整个“城”中的每个角落一览无余，可以看到自己的部下及领地内的人员活动，日常生





浮世绘——《优雅的女性》

町为街市，町人，指居住在城下的街市中的人。他们主要是商人及工匠。他们没有土地，只能世代从事工商业。虽然在士农工商的等级中他们位居最低，与农民及武士在获取财富上存在手段不同，但他们凭借经商的有利地位，占有了财富，少数町人的财力甚至高过部分武士及大名。自江户时代的中期开始，长期的和平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町人文化。他们拥有自我管理的自治权。这幅浮世绘，便是町人文化的代表之作。

活中他也要求"下"必须告知自己心里所想的一切；而"下"对"上"，除了他的"侧近之外"，其他人永远对他捉摸不透。遇到战争，"殿主"会一步一步地退到"殿守"内，最后退到"殿守阁"中，只有在所有部下都牺牲后，才轮到领主与"城"共存亡。在武士死守的时候，"殿主"还可以利用"逃生口"，从后门逃出城外。

亲疏远近、轻重生死，都能通过地势高低一目了然。"城下"对"天守"，说话要用"敬语"，行为要鞠大躬；而"殿守"对"城下"，"殿守"是"主"，"城下"是"从"，上内下外。"殿守"分发口粮，掌握赏罚大权，他让"所有人有饭吃"。

"城外"就是"城下"，城下形成的街市叫"城下町"。"城下町"中的主要居民是"平民"，有商人和工人，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居住在城中的领主和武士，换言之，他们靠领主为生，领主的消费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城"中的领主与武士，加上"城下町"中的商人和工匠，再有居住在距"城"更远、耕作"名田"的农民，这样的"士、农、工、商"组合构成了一个藩国。"名田"意为"属于领主名下的田"，领主的田让农民耕种，收获则按一定的比例分成，领主从收缴的大米中拿出一部分，再分配给保卫藩国的武士。藩国中所有人的地位都是世袭的，领主家世代出领主，武士的子女世代保卫领主，而农、工、商也世代从事自己的职业。"城"这一建筑符号，充分再现了日本社会的"纵向"本质，"纵向社会"中的一切也都能从"城"中找到影子。



日本的政治堡垒

德川家康的大半生都是在“坚决变大”中度过的，他的经历告诉他：武士时刻都有“坚决变大”的“膨胀欲”，“小名”总想变成“大名”；“大名”希望变成“大大名”。“大名”的实质就是占有更多的“名田”与人口，“变大”与“得失”密不可分，占有更多人口及土地就“变大”；失去就是“变小”，而“小”就是“弱”和“下”。

追求“变大”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战争的“胜败”决定“得失”及“上下”“大小”，“强弱”为最终结果。“大”意味着安全；“小”则是危险与屈从。“绝对大”没有出现之时，就是“纵向秩序”尚未完全确立之时，是“上下”关系紊乱的混战时代。“秩序”来自“纵向关系”之确立。战国时代是人人争取“变大”的天下大乱之时，“下克上”造成秩序紊乱，“和平时代”是因为“大”成功地压制了“群雄”。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都经历了由“小”变“大”的过程，既是战国时代的亲历者，又是参与及推动者，而最终扫荡所有对手并确立统治的是德川家康。为了确保德川家统治能够“万世不易”，德川家康不单修筑了牢不可破的江户城，还将造“城”理念再次运用到确保德川家世袭统治的政治制度建设上。“幕藩体制”就是要保证德川家族永远“最大”的政治体制。与“本丸”之外有“二丸”“三丸”多道防线同样，为维护德川家世袭统治，德川家康在政治体制建设上，也设置了多重的“制度防线”。

坐待来访的幕府 //////////

任何人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他以往的经验，德川家康也不例外。德川家康在江户时代之初建立的所有制度，都与他年轻时的经验密不可分。他经历过太多的背叛以及战争的胜败，这些后来都转化成为他维护统治的构想，换言之，他创造出的新制度，都来自对以往教训总结的基础之上，他欲将所有他认为可能的制度漏洞都堵上。

从六岁起，德川家康就被动地卷入了长辈们争夺领地的不断的战争中。他先后做过不同人家的人质，亲身经历过多次政治联姻，“效忠”与“背叛”贯穿于他的一生。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都属“不诚”的“非君子”言行，可恰恰这些却是他能够生存下来的秘诀。他可以说是一个最没有节操的人，可

与成功相比，“节操”仅仅是个“虚名”。对武士来说，谁能将对手的首级提在自己手中最重要，被砍下头者没有发言权，德川家康的生存智慧就是“奸猾”。

口头发誓、写血书保证、为了表示服从甚至杀死自己的妻小，德川家康能干，其他人也同样能干。德川家康因此不相信这些“口头上”“表面上”的“君子言行”，他要“舍名取实”。德川家幕府建立后，他下令所有藩国的领主本人要定期在江户居住，而他们的家属则必须长期在江户长期居住。幕府无法时刻盯住藩主，但藩主的家属就在幕府的眼皮底下，武士刀就搁在各藩主妻小的脖子上，一旦地方大名有谋反迹象，就杀了他们全家。“扣押人质”才是“宣誓”，“写血书”的真正“背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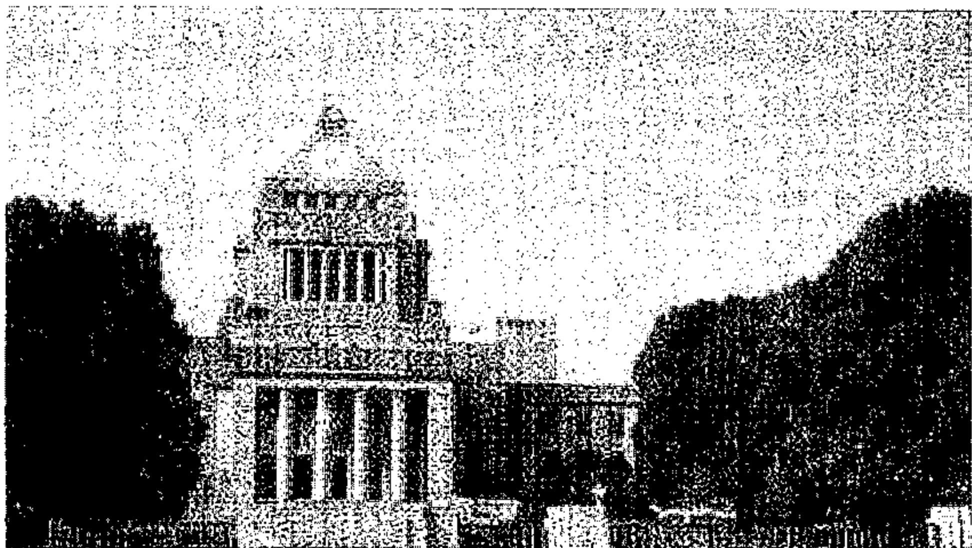
为了掩盖刀架在脖子上的血腥，领主写书面保证，幕府认可，显得温情。新将军继位时，藩主向新将军提交书面保证服从，将军向各藩国领主颁发领地证书，承认藩国大名的领地以及他对该领地的统治支配，新将军与藩主之间重新确认“主从关系”。藩国中的新领主继位时，新大名也要向将军通报并要获得将军的同意和认可。将军可以通过“转封”“削藩”直至没收领地的手段控制“大名”。将军的主要处罚方式是使其“变小”，而德川家的绝对“大”地位，是实施“赏罚”的保证。

弱枝强干的制度 /////////

保证德川家幕府绝对“大”的相应手段是让藩国“变小”。德川家康深知“变”不利于自己统治，为了保证“不变”，德川家康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家族例外，规定所有成员的地位世袭。“忠诚”的回报是对现在以及未来地位的充分保证。打天下时，德川家康按武士的“论功行赏”原则激励追随者；得天下后，他将“论功行赏”世袭化。有血缘关系的“大名”是“亲藩”，分给他们的领地要么面积最大；要么处于交通要道，“亲藩”对江户形成拱卫之势。

对于没有血缘关系、但从德川家康祖父的年代开始就一直追随德川家、忠心耿耿地辅佐德川家康的家臣，家康封他们为“谱代”大名，他们的领地仅次于有血缘关系的“亲藩”。他们的后代也继续世代充当德川家的家臣，辅助德川家支配统治。“最下”“最小”，同时也是“最弱”的领主是“外样大名”。“外样”顾名思义，既无血缘又无亲缘，德川家康打天下时，他们曾是战争对手，当德川家康在全日本的绝对“大”地位确立之后，这些大名才向德川家康“称臣”表“归顺”，他们属于“降将”，是“外人”。

“外样”属于“地远心自偏”的藩国，属严加防范的“大名”。将军通过“削封”及“转封”，让亲的“变大”“变近”；疏的“变小”“变远”，接到“转封”命令的“外样



日本国会大厦

日本的近代化改革，部分得益于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这三位维新人士。从国会大厦内的铜像便可看出其地位之重要。二战结束之前，这座大厦及里面人物的后继者均被冷落，天皇与五巨头在皇宫中决定日本的一切。

大名”，必须乖乖地离开自己的世袭领地，迁徙到偏远、贫瘠的地方。德川家是所有藩国中的“横纲”[2]，而“外样”则是“小字辈”，他们领地小、人少、无法聚财。财力、物力、人力不成比例，自然就不会出现“下克上”，哪有小孩敢去挑战“横纲”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德川家康将整个日本变成了“江户城”，最远、最外就是最小、最弱；最近、最内就是最高、最大。

当幕府发现藩国钱袋饱满的时候，幕府就让想方设法削弱之，或让藩国为幕府提供无偿劳役，或让他们捐款修建庙宇、公路等，此举让藩国很难积聚财富，相反，幕府则财大气粗。领主的家属被扣押在江户要支出，领主每年率领大队人马定期访问江户要支出，两部分相加再提供无偿劳役，令藩国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祖辈传承的禁锢 //////////

领主要求武士“喜怒不能形于色。”而这一要求同时又让领主很难把握武士内心的真实想法。武士对领主，是“下”对“上”；“弱”对“强”，这时事事都是“哈伊”。可当武士低头弯腰鞠躬时，他们的眼睛却丝毫没有闲着，他们擅长用余光“察言观色”。中文的“看人打卦”，日语用“看对方脚下”[3]来表述。无法改变“强弱”时就“忍”；一有了机会就要“下克上”“坚决变大”。最初武士“兵农不分”，闲时种田，战时打仗，而战争的动机与目的就是争夺田产。

为了遏止武士的“变大”欲，丰臣统治时期颁布了“刀狩令”，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家康接手实施统治后，强化了“兵农”分离。他要求在农民与武士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要么当武士，要么当世袭农民，当武士者从此脱离农村，他们不再拥有土地，住在将军城下专司防卫。领主依据武士之等级，分配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大米。与土地无缘的武士来到领主的城下生活（一个领主只能有一个城），每天除了习武之外，其他时间就用来学习认字、简单的算术等，不但武士的身份世袭，武士的等级、在军队中担当的任务也是世袭。家康用提供终生保证换取武士去除“坚决变大”。



“铸剑为犁”带来了和平，可世袭让所有人感觉厌倦，和平与“论功行赏”相克，堵塞了时刻想“变大”的武士的上升通道。

一旦武士违反了领主的意志，领主就断其口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再给他发工资，让他失业。武士去农村没有土地；想加入商人的行列也因商人世袭无法找到位置，被领主抛弃的武士就沦为“浪人”。领主决定了武士的生死，因此，他们只能用说“哈伊”表示“忠诚”。武士身份世袭，这让武士不得不非常注重“家名”，领主常以身份可让下一代继承为条件，命令武士自杀或者对敌手发动自杀式攻击。没有武士勇敢到不惧怕死的程度，武士选择死是因为无奈。领主命令武士行动，他不去也是死路一条。与其被废为“浪人”，后代也代失去武士身份，不如服从领主命令去冒险。冒险成功了，可以在“论功行赏”中上升一步；失败了，一死了之，身后事由领主负责。

商人也同样，他们以家为单位居住在城下，居住地及职业世袭不变，“某某屋”这一名称就反映了江户时代生意人家的特征。从事的产业世代相传比血缘关系更重要，为了让家业持久延续，没有儿子继承就会收养义子作为继承人。

幕府可放火，藩国禁点灯 //////////

战国时代，“联姻”是消除政治对手、化敌为友的重要手段之一，“联姻”可以迅速“变大”。德川家康本人就多次通过“联姻”扩充实力。他自己的“变大”手段，同时也是他要着重防范的要点。

德川家幕府建立后，家康严令禁止藩国之间、藩国与京都朝廷之间交往，相互通婚更属严禁之列。家康有意制造藩国之间相互敌视、猜疑，藩国之间对话，必须通过幕府这个传声筒，藩主只知有将军而不知有邻国。

杜绝了藩国之间联合还不足够，还要防止藩国与外国联合。

织田信长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时代迅速“变大”，原因之一就是他充分利用了从外国传入日本的先进火枪。对幕府来说，藩国同外国势力联合与藩国之间联合同样危险，它会对幕府的“独大”地位构成威胁。为了防止藩国与外国势力勾结，利用外来财力、物力对抗幕府，德川家康要根绝藩国与外国间的任何往来。经过三代将军的努力，幕府完成了严密的“锁国体制”，幕府严禁藩国制造大船，无大船则无法远航，让藩国出不去。同时，还不准外国船只进入日本海域，闯入者会被立刻驱赶离开。日本人不能出国，试图出国或出国返回者，被捉到后不是流放就是处死。

“锁国”并非是与外国断绝一切往来，“锁国”仅仅是“只准幕府放火，不准藩国

点灯”式的行为，幕府可以与外国之间进行贸易，也就是说，所有对外贸易只能通过幕府进行。长崎是德川幕府指定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幕府独家垄断与中、朝、荷兰的贸易。荷兰商人被限制居住在长崎的一个孤岛上，对外只有一个通道，他们只能与幕府代表接触。幕府垄断对外贸易的首要目的，依然是要保证经济上“独大”，垄断贸易是为了获得垄断利润。

为了保证德川家的绝对经济优势，幕府直接控制了江户、京都、大阪这三大货物集散地，在这三大都会进行的所有商贸活动，幕府都要抽头。幕府还控制矿山，拥有金、银、铜矿，垄断全国流通的铸币权。

家康的治国手段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要保证自己绝对“大”的同时，让对手“小”。假如对方“大”，那么或“肢解”或挑动其内部“自坏”或引入一个更“大”的对手，让他们相互消耗，总之，要想方设法让对方“小”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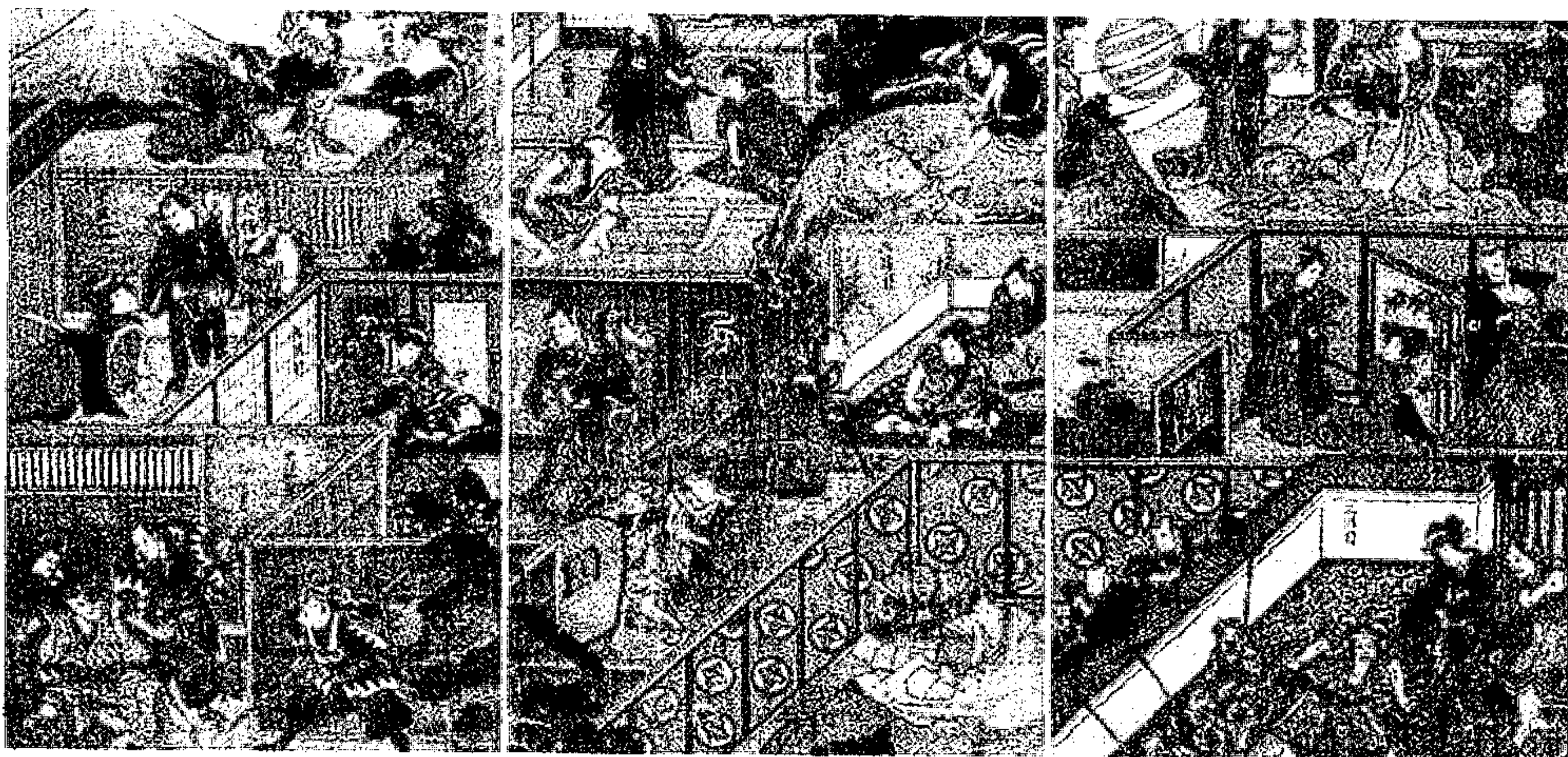
无法修补的漏洞 //////////

硬件方面，家康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坚固的江户城；软件方面，他建立了严密的政治制度。对藩国的防范，严密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或许是他预见到了未来，或许是历史有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对自己最担心的领域实施了最严密的防范，可恰恰是他精心打造的锁链，两百年后却成为最终断送德川家统治的首个链条。简而言之，倒幕派正是沿着德川家康重点布防的防线攻上来的。

在家康打天下时的战国时代，日本各地藩国林立。如果逐一消灭对手再称霸日本的话，平定全日本付出代价将会太大；时间也会更长，家康继承了织田等的方式，选择了“大小共存”。只要有领主向他“称臣”，他就依然让其存活。也就是说，只要承认德川家“上”，藩国“下”，确立这一“主从关系”即可。藩国领主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统治，领主可以决定依照什么比例，从他管辖的农民那里收取粮食；领主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藩札”。藩内行政、人事任免，只要不威胁到幕府，幕府一概不过问。这种“高度自治”实际上又是一种变相的冷漠，幕府只关心藩国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让藩国在人口、领地、财富等方面无法超越自己，任藩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只有幕府对藩国提出各种要求，而无藩国依赖幕府之可能。

幕藩体制看似万无一失，可一个陈腐的故事，实际上反映出幕藩体制中存在的“忠诚”漏洞。

1701 年，在一次幕府组织的宴会上，一个名叫浅野长矩的藩主与幕府的典礼官吉良义央发生了冲突，浅野拔刀将吉良砍伤，尽管吉良义央仅受轻伤，可吉良是幕



浮世绘——歌舞伎《四十七武士夜袭》

这就是“四十七武士”的故事。300多年前的元禄年间,赤穗藩藩主浅野刺伤了当时的权臣吉良侯,在遭到将军德川纲吉的训斥后自杀而死,连藩也被取消。为此,浅野手下的47名武士发誓要为主君报仇。随后,他们杀死了吉良,并将他的首级带到浅野的墓前祭奠。最后,他们并没有逃跑,而是在将军的命令下全部切腹自尽。47武士被誉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并且被编为《忠臣藏》而广为流传。

府官员。浅野虽是一藩之主,但地位仍在幕府官员之下,他的行为属于“下克上”,幕府命令他剖腹自杀。浅野死后,他的领地被没收,豢养的武士也从此沦为“浪人”,“浪人”武士为了给藩主报仇,他们闯入了吉良义央的家,他们要求吉良义央剖腹谢罪,遭到拒绝后,武士们将他杀死并将吉良的首级放在了自己藩主的墓前。

对于如何处置这些“下克上”武士,幕府处于两难境地。幕府一方面灌输“下”对“上”要绝对“忠”,强化手段是严惩“下克上”。领主浅野刀砍幕府官员属于“下克上”,幕府为了维护纲纪,已经对他进行了严惩。可浅野豢养的武士竟然重复“下克上”行为,甚至将幕府官员吉良杀死。这里暴露出了幕藩体制中的一个漏洞,“浪士”们“下克上”是为了“尽忠”,或者说他们要“尽忠”只能“下克上”。对于藩国武士来说,幕府好似天上的浮云,他们从未从幕府那里获得过一粒大米,他们世代从自己藩主那里领取“俸禄米”,“主君”死了,他们即刻沦为浪人,他们此时不行动,领主豢养武士失去了意义,他们对领主是直接忠。不为领主报仇就是“不忠”,可为领主“尽忠”,同时又构成了对幕府之“不忠”。“浪士”对幕府,仅仅是因为领主对其称臣而属“间接忠”。“直接忠”与“间接忠”此时无法两全,幕府最终也不得不选择一个矛盾处置来掩盖自己的尴尬,既要严惩“下克上”,还要大力表彰“忠”,尤其要通

过这次事件表现幕府具有最终决定权。

幕府下令"浪士"自杀，作为交换，给自杀武士一个"名分"：他们是忠于自己主君的"忠勇"武士。他们历尽艰难为"主君"复仇值得赞颂；但违反幕规"下克上"不容饶恕，幕府编造了一个他们完成了"直接忠"后又迅速向幕府自首的故事，宣传"小忠"服从了"大忠"，以维护幕府的绝对权威。

幕府"赐"他们自杀，47 名武士"爽快服从"，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歌舞伎《忠臣藏》，轰轰烈烈地演绎了一个"尽忠"的"两全"故事。可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两全"实际上是一个血腥故事：小藩国用 48 条命才换来了幕府官员的一条命，是一个典型的以大欺小的"不对等交换"。与其说"四十七浪士"对幕府"尽忠"而自杀，不如说当时"幕强藩弱"，幕府有足够力量压制"下克上"，幕府捞到了"实"，而藩国只得到"空名"。一旦幕、藩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藩国武士绝对不会答应此等徒有虚名的交易。幕末时期的萨摩、长州藩的武士就上演了一场与上述结果完全相反的大戏，它引发了另外一个"戏剧性"结果："下克上"成功，幕府被推翻。这一切也同时说明：《忠臣藏》宣传的"两全理想"并未对武士产生丝毫影响。

"黑船"自美国来

1853 年 4 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军舰首先来到琉球首府那霸，离开琉球后于 6 月 3 日进入东京湾，他将携带的美国总统国书交给了幕府代表，12 日离开，约定次年再来日本获得答复。7 月，沙俄普奇金率领的舰队也来到长崎，也向日本提出了类似要求。幕府将美国国书翻译成日文，征集各大名的意见。

这一征求意见非同小可，250 个藩国，每个藩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任何一个藩国反馈的意见，都首先站在有利于自己的立场上，没有藩国会为幕府着想。武士擅长"表里不一"，有些藩国的意见，不但夹杂了自私的动机，更要命的是，有的藩国给幕府开出的处方明明是"毒药"，可还要冠以"蜜糖"美名。几个"外样"强藩，就是为了让幕府走衰，他们提出的意见是"坚决攘夷"。

200 多年来，德川幕府何时、为了何事征求过藩国的意见？换言之，假如没有外夷到来，幕府依然会是老样子，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借"外夷"到来的光，藩国才被幕府重视。以前被冷落，如今被重视，这同时暴露出幕府的弱点。幕府没有办

法了，此时才想起来要"团结藩国"。"攘夷"需要钱，费用如何分担？军舰是移动的，不在江户登陆，说不准跑到哪个小藩国登陆，藩国一无能力，二不清楚为谁"攘夷"，若触犯了自己的利益，不得已死拼一下也属无奈，可为了幕府去"攘夷"太划不来！不动枪炮就没有花销，立刻投降可能是最好的选择。200 年来幕府冷落藩国，不到火烧眉毛，幕府绝对不会想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藩国。幕府这时想让他们齐心协力，与幕府共度国难，完全是一厢情愿。

"黑船"到来之时，幕府老中是阿部正弘。对于如何应对"外夷"，表面上他主张广开言路，让诸藩积极提出建议，而私下里幕府的对策是："机密之事不能让藩士们知道，只能让他们在可以推测到的范围内无所顾忌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水户藩属"亲藩"[4]，为了防范因争夺将军位而自家内部骨肉相残，德川家康规定这个家系的后代不能出任将军。换言之，德川家康的严格家规，断送了这个家族的将军梦。同是家康的子孙，水户藩世代不能出将军，这让水户藩非常不满。水户藩从第二代藩主光圀开始，就因为自家子孙无法当上将军，他开始支持日本的"国学"。国学主张：日本是皇国，天皇制是日本的根本制度。将军家仅仅是一个篡权者。

水户藩对幕府心存不满而且有传统，水户藩的举动多被幕府怀疑。1841 年藩主德川齐昭建立"弘道馆"，引入西方兵制并将自己藩内的大钟熔化铸造大炮，建立炮队，幕府因此认为他另有图谋，下令他隐居。1844 年到 1849 年，齐昭隐居 5 年。齐昭抱怨，自己身为"御三家"之一，可"实际上有名无实，待遇与'外样'大名同样"，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主宰幕政。

1853 年 7 月，水户藩主德川齐昭被任命为负责海防的幕政参与。

外夷到来让他重出江湖，齐昭提出的对策是"诓骗"（たぶらかす）。"对于外夷的要求，五年、十年都不要给予明确的答复"。[5] 一切让人联想起镰仓时代幕府对待元史的手段。

诸多意见中，齐昭提出的意见之所以被接受，部分是因为他的"拖延、诓骗"战术属于"稳健策略"，不会像"攘夷"那样立刻引发战争，也没有完全听从外夷那样的屈从，"诓骗拖延"因此被幕府采纳。

通过美国提交的国书幕府了解到，美国对日本的要求是：希望日本成为淡水、煤炭补给地，还希望与日本开展贸易。幕府明白，完全拒绝"外夷"的要求势必会带来战争、割地；不完全拒绝并有条件地拖延让步，可以赢得时间。待幕府有足够力量抗衡外夷时，说"Yes"或"No"都可以自主决定。幕府现已没有"锁国时代"那样的力量，可将外夷"驱赶"出日本海域。

打不过就“去死”

如果说“诓骗、拖延”是一种“战略”的话，那么这种“战略”必须通过某种“战术”才可以实现。幕府采用的“战术”之一是“死人”。佩里离开日本后不久，幕府宣布将军家庆去世。

到达时间	离开时间	到达外国人	日本国内状况
1853.6.3	1853.6.12	佩里	离开十天后，日本宣布将军家庆去世（63岁）
1854.1.16	1854.6.2 耗时四个月	佩里	1857年6月，老中阿部正弘去世（38岁）
1856.7.2	1858.6.19 耗时两年	哈里斯	1858年7月，将军家定去世（35岁）

佩里舰队6月离开日本，三个月后的1853年9月，幕府通过长崎“出岛”里的荷兰东印度总督转告佩里：“将军家庆（1793-1853，61岁）6月去世，希望延期回答国书中提出的问题。”幕府要用这个“不幸消息”阻止佩里舰队再次来日本。家庆临终前安排水户藩主齐昭之子过继给一桥家，改名“庆喜”。庆喜名字中的“庆”就来自“家庆”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另外一个候选人是“庆福”，两个候选人代表幕府两种对策。

佩里并不因为日本有“不幸消息”就却步，他离开日本后也没有返回美国，在香港休整了一段时间后，1854年1月16日，他春节没过就迫不及待地再率由7艘舰船组成的舰队重返江户。佩里的舰队第二次出现在江户湾上后，为了拖延时间，幕府方面仅仅为决定在何地进行双边谈判，就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6]

3月3日签署完毕条约后，佩里离开江户去下田，6月2日离开日本。日本从此开放函馆（北海道）以及下田（静冈）两个港口。而通商仍与以往一样，只能在长崎进行。

依据1854年的《和亲友好条约》，1856年，美国向日本派出了首任外交官哈里斯。7月2日，哈里斯搭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下田，与三年前“黑船”初到时的惊慌失措相比，幕府起初对这艘美国军舰的到来并没当回事，可是，船上下来一个名为哈里斯的人，他自称是美国政府派驻日本的首任总领事，要求幕府提供居所，这一要求对幕府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和亲友好条约》中有：“双方政府中的一方认为有必要时可派遣使节”，哈里斯依据这一条要求登陆；可日本为了拒绝哈里斯，强调条约中写明“只有在双方政府都认为有必要时”才派遣使节。纠缠文字解释对搭乘军舰前来的美国人不管用，哈里斯坚持要乘军舰去江户，直接会晤将军。幕府方



面最终同意哈里斯登陆并且居住，地点就在距离江户还有相当距离的开放口岸之一——下田。

哈里斯登陆之后，美国军舰驶离了日本。没有了军舰，幕府就继续用“拖延、诓骗”手法对付哈里斯。幕府下令：“与哈里斯的所有交涉都在下田进行，一切由下田奉行接洽。”幕府高官从不露面，对于哈里斯提出要去江户见将军的要求，下田奉行也从来不置可否，哈里斯通过下田奉行多次致信将军、幕府，可一切都如石沉大海。哈里斯对幕府官员的评价是：“他们是地球上最善于说谎的人。”

幕府一方面继续拖延，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谈判，了解美国方面究竟想要日本怎样。经过一年的谈判，1857 年 5 月 26 日，哈里斯与幕府代表之间草签了《下田协约》。而这个协约，与美国要求的通商还有相当距离。哈里斯要求继续进行通商谈判，同时要求幕府同意他前往江户，他要将美国总统的国书直接递交给日本的最高领导人。

不久之后的 6 月 17 日，幕府再次向哈里斯通报“不幸消息”：幕府老中阿部正弘（1819-1857，38 岁）去世[7]。在外夷到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继将军家庆去世之后，幕府第一高官去世。幕府再次用这个理由拖延：负责受理国书的最高领导人去世了，而且日本没有将军直接接见外国代表的先例。

阿部的继任，是被齐昭讥讽为“洋奴”的老中堀田正笃。他于 1855 年 10 月被任命为首席老中，官位在阿部之上，这是他第二次出任老中职务。

佩里不在乎将军去世，哈里斯也不管老中死去，美国人顽强地按照自己的决定推进。1857 年 7 月 20 日，有一艘美国军舰偶然经过日本，哈里斯决定，要抓住这次军舰到来的机会完成任务。他计划乘军舰直接去江户，会见将军并递交国书。下田奉行火速将此消息通报幕府。以齐昭为首的反对派坚决反对哈里斯进入江户，认为将军接见外夷是“幕府的耻辱”。可不同意哈里斯来，万一他硬要乘军舰来，接下来就只有武力拒绝一条路了，齐昭等反对派又下不了这个决心。1857 年 2 月，驻长崎的荷兰商人曾以中国爆发“亚罗事件”最后导致英法联军向中国宣战的事例警告日本：不要因为小事与外国轻开战端。

在这种情况下，老中堀田决定：再次有限度地退让拖延。毕竟让步可以回避战争。幕府通过下田奉行转告哈里斯：幕府同意他来，但不能乘军舰走水陆，只准许他陆路进入江户。哈里斯于是放弃乘军舰前往江户的计划，按照幕府的安排，10 月 7 日离开下田，14 日陆路到达江户，哈里斯于 21 日进入江户城。在这里，他首次见到了日本的“大君”，向他提交了美国总统的亲笔信。他见到的日本最高领导人－将军家定，“竟然是歪着头，走路不稳，回答问题语无伦次的人物。”[8]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和亲友好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比幕府还“强大”的对手出现，让藩国抓住了推翻德川家幕府的机会。

26日，哈里斯与堀田会晤，他向幕府中的最高行政领导人介绍了日本周边发生的变化。堀田答应尽快答复美国提出的要求，此后，哈里斯离开江户返回下田。一个多月过去了，幕府方面依然没有任何回音。为此哈里斯要求再次会见堀田，他搭乘美国顺道而来的军舰来到江户，堀田这次不得不指定代表与哈里斯开始了谈判。

还是有点用的天皇

在此后一个月的谈判过程中，虽然幕府谈判代表曾表露过要向美国宣战，但最终还是基本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

1857年12月29、30两天，幕府先后向“亲藩”“外样”等诸大名通告了准备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以及条约内容。此时有一大名向幕府提出了一个建议：何尝不让京都的天皇作为条约的最终批准人呢？幕府听到这一提案后突然眼睛一亮，幕府负责谈判，签约要等天皇批准，齐昭的拖延战术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借口，这成为幕府的又一个新战术。1854年幕府与佩里之间签署条约时，幕府根本没有事先通报京都朝廷，只是事后告知。

1858年1月4日，参与条约谈判的幕府官员通知哈里斯：由幕府负责谈判的条约，需经京都的“精神天皇”许可，在哈里斯的一再坚持下，双方同意延期60天。

哈里斯这时才首次听到：日本除了将军之外还有天皇。哈里斯对天皇出现的第一个疑问是：假如天皇不批准那又怎么办？经过近两年漫长谈判才走到签约这一步，一旦遭天皇否决，那么好容易才达成的协议岂不又变成了一张废纸？对于哈里斯的疑问，据哈里斯日记中记载，幕府官员是这样回答的：“天皇是一个既无财力又

没实权而且不受国民尊重的没有价值的人物。”

幕府官员的“安慰”显然是为了打消哈里斯的疑虑，然而，这一回答非但没有让哈里斯释怀，反而更让他觉得幕府官员不可信任。哈里斯想：既然天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那么为什么将军同意了，还要再获得天皇的批准呢？以前谈判、签署条约时，从未有任何人提起过天皇。

哈里斯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幕府官员告诉我说，派往京都的使节定会成功地获得天皇的许可，一旦对外宣布已经获得了天皇的许可，那么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将自然平息。即便是最极力反对条约的人，只要一听到天皇已经许可，都会表现出：“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服从吧。”可这种说法与日本人平时对待天皇的态度完全矛盾。日本人在平时谈到这位君主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不屑的态度。[9]

老中堀田向哈里斯约定 60 天内回答，1858 年 3 月 5 日为最后期限。堀田 2 月 5 日到达京都。3 月 1 日，也就是最后期限的四天前，堀田从京都转给哈里斯一封信称：“自己无法在规定日期内返回江户，希望谅解。”

现任首席“老中”亲自出使京都，这是自江户幕府成立以来首次。老中堀田作为幕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去京都，真实意图并非像他本人向哈里斯解释的那样：去获得天皇的许可，而是让天皇不批准条约。它是改头换面的“诓骗、拖延”战术，幕府无法拒绝就抬出天皇来拒绝，幕府然后再以天皇不同意为由继续拖延。

堀田给京都的贵族及天皇带来了总计三万两的金钱与各种礼物。[10] 自德川幕府建立以来，天皇凡事要看幕府脸色，从未有过幕府决定要待天皇批准的先例。送厚礼给天皇，而且还是老中本人亲自送上门来，可见外夷到来不仅让藩国受到幕府重视，还惠及到了被冷落多年的京都朝廷。可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的“征夷大将军”都顶不住的事，让“手无缚鸡之力”的天皇与贵族去顶，朝廷即便不得不服从幕府命令，内心也仍战战兢兢。老中堀田在京都滞留时间长达三个月。京都方面惧怕由自己出面拒绝会引来外夷进攻的杀身之祸，因此对幕府开出交换条件：不能让兵库成为开放港口，今后幕府要派兵进驻京都，保卫京都以及附近地区的安全。

天皇向幕府提条件也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约定的最后期限 3 月 5 日，哈里斯再次从下田水陆前往江户，堀田呆在京都不回来，哈里斯空等一个月后返回下田。

再狡猾也斗不过美国佬 //////////



4月20日堀田回到江户，三天后的4月23日，幕府任命井伊直弼为新任“大老”。“大老”官在“老中”之上，它是一个在危难时刻才会任命的官职。

堀田24日接见了哈里斯，果然不出哈里斯之所料，堀田以天皇没有同意为由，再次要求哈里斯延期。哈里斯同意再延长三个月，7月27日为最后期限。

哈里斯从江户返回下田之后，恰好美国军舰“密西西比号”于6月13日驶入了下田港，同时带来英、法联军在中国战胜了清军、迫使中国清政府签署了《天津条约》(1858年6月)的消息。哈里斯遂要求美国军舰“波哈丹号”护送他返回横滨。6月17日约见幕府官员时，哈里斯故意将英、法联军打败中国之事透露给幕府官员，并称英、法联军可能随后到达日本，届时他愿意从中调解。如果幕府不现在立刻签署条约，英、法联军到来后的条件可能会更加苛刻。负责海防与外国事务的岩濑忠震将这一消息转达给了井伊，井伊听后依然命令他尽可能与哈里斯周旋，岩濑忠震不得不向井伊再确认：是否在所有手段用尽，无法再周旋之时可以签署条约？井伊回答：不得已时也只好签署了。

原本签署条约的“最后期限”是7月27日，可哈里斯带来的“震惊消息”让幕府最终放弃了“诓骗拖延”战术，于6月19日提前签署了条约。在美国军舰上签署完毕条约之后，哈里斯离开日本，开始了他漫长的休假，而日本国内则从此乱成了一锅粥。

“攘夷”这个葫芦里的秘密

早在德川家康平定日本前的战国时代，地处西南的萨摩藩[11]，领地远比德川家康的大，随着德川家康在“下克上”时代从“下”爬到“上”，德川家从“小名”壮大成为“大名”，并最终成为了“大大名”的将军，萨摩藩也相对德川家变成了“小名”。

用对德川家称臣的方式，萨摩藩保住了自己的藩，但领地被削减，同时还被排列到藩国中的最下一挡——“外样”大名。萨摩藩距离江户遥远，德川幕府让小藩国“死不了、活不好”的态度，让这个地处偏远的藩国处于苟活状态。

因多次违约，江户、京都、大阪的银号都拒绝继续放贷，借新钱还老账的方法已



经无法继续，大米无法按时发放，岁末的赠与也仅仅停留在账簿上，无法用现金兑现。这些甚至影响到了与幕府的经济往来，连去江户"参觐交替"的旅费都无法筹集，最后只好无奈地呆在本地。[12]

这就是19世纪初的萨摩藩的经济状况。

1820年，萨摩藩累计负债高达500万两。假如以年利七分计，每年仅利息就高达35万两。而19世纪初，萨摩藩的年收仅有10万两，年收甚至不够还利息。不少藩实施"四公六民"政策，也就是说，农民的收成与藩主按"四六"分成，藩主"四成"，农民"六成"，而萨摩藩竟然达到"八公二民"，农民只能获得实际收成中的二成，苛政的原因之一就是萨摩藩财政太困难。

1827年，萨摩藩起用调所广乡（52岁）实施财政改革。为了能继续借到钱，他首先制定了还款计划，依据该计划，每年归还两万两。也就是说，即便该计划得以顺利实施，500万两的藩债，也需要250年才能还清。

萨摩藩地处九州，"地远心自偏"的地理劣势，同时又是"天高将军远"的地理优势。临近萨摩但属于琉球的大岛、喜界岛、德之岛，气候适应种植甘蔗，为了获取利润高的蔗糖，萨摩藩不允许该岛种植其他作物，对人口、土地进行严格普查，从甘蔗种植到收割、榨糖都进行严密控制，对没有按规定面积种植、收割并制糖的农家，都处以酷刑，直至砍头。种植者私自售卖，自己消费，储藏甘蔗都属违法。甚至连用手指尖蘸糖放在自己口中都要受到鞭挞，小孩吃甘蔗也要受处罚。

萨摩藩每年从三个岛收获砂糖1000多万斤，加上从琉球收购的部分，总计达1600多万斤，这些砂糖均被运往大阪销售。从1830年开始的10年间，共有一亿两千万斤砂糖运往大阪，金额高达235万两，平均每年23万5000千两。

"萨摩藩垄断了砂糖贸易、琉球贸易，到了1850年才有了200万两的流动资金，50万两的库存，藩国内以及大阪的仓库中才有了相当的大米库存。"

"毋庸讳言，此后直到明治一新时为止的庞大的军事费用，都是来自砂糖的垄断贸易。"[13]

除了蔗糖这个巨大财源之外，另外一个财源来自通过琉球进行的"对外"贸易。

1844年法国军舰来到琉球，次年英国军舰再来。法、英要求琉球结束锁国，与法、英通商。琉球本身的消费人口有限，琉球开国，实际上是让它成为对日本贸易的中转站，而萨摩藩则是琉球进入日本的首站。萨摩财源再增加走私贸易一项，这让萨摩藩经济短期内从"大负变成大富"。

走私破坏了德川家的"垄断贸易"，1848年江户幕府追究责任，调所不得不自

杀。1849年,幕府要求萨摩藩主岛津齐兴承担责任下台。1851年,齐兴的儿子齐彬在43岁时出任新藩主。

长州藩是现在日本的山口县,位于本州岛最南端。藩主毛利,原居住地是濑户内海沿岸的广岛,在德川家康获得天下的关键战役——“关原之战”时,毛利家属德川家康的敌对方——丰臣家,是西军主帅。据说德川家康与他约定,要他在战争中消极应战,今后会让他继续保留领地,在西军与德川家康的东军作战期间,毛利依照承诺消极应战,可家康“关原之战”胜利后,将以前的约定抛在了脑后,将毛利家“削藩”“转封”。毛利家不得不从世袭领地广岛搬迁到濒临日本海的“荻”,此后,收入减少了一半多,每年只有36万多石。虽然是长、防两州的藩主,但在所有诸侯中,毛利家已沦为一个中等藩主。长州藩与萨摩藩同属“外样”,是幕府冷漠对待的藩国,因地处偏远,200多年来一直深受经济落后的困扰。直到天保(1830-1843)开始,与萨摩同样,受走私贸易之惠,经济状况才开始好转。

下关是日本海沿岸各藩国进出大阪的重要中转口岸,内贸要经过下关海峡进入濑户内海去大阪;外贸则可通过这里直接与外国人交易。下关建有供货物进出的仓库以及围绕进出口而设立的钱庄,贸易集散地之地利,让长州获得巨大利益。此前,长崎一直是幕府对外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一旦幕府开国,把江户变成通商口岸,贸易集散地势必东移,这会对长州的经济地位造成重大打击。长州当然不愿意让自己口中的肥肉被幕府夺走,可幕府处于“说一不二”的绝对大地位,让这些小藩国不敢公然与幕府唱反调。在这种现实面前,反对幕府开国,必须要有“大义名分”才行,它既要具备“冠冕堂皇”的“利他”之名,还要能够掩盖藩国的“利己”之实。

谁有进出口港,谁就能获得财富,幕府开国等于断了萨、长藩的财路,因此,这些藩对幕府开国有强烈危机感。200多年来的幕藩纵向统治,让各藩国习惯于独守一方,除了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务之外,藩国对幕府的决定多采取顺从态度,换言之,当出现某个藩国极力反对某项幕府决定时,一定是因为幕府侵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外在理由徒有其表。

态度坚决的萨摩藩 //////////

与京都朝廷中的天皇、贵族,江户幕府中的将军、“老中”等相比,地处西南的萨摩、长州藩等,对“外夷”的了解远比前者深刻。如果说幕府初遇外夷而感到恐慌始于1853年的话,那么早在9年之前,1844年法国军舰要求琉球开国之时,萨摩藩就已经历过这种恐慌了。对萨摩来说,“外夷”到来非但没给萨摩藩带来伤害,反而使



萨摩藩通过走私贸易获利颇丰。

1851年齐彬出任藩主，他继承了父亲的“锁国属下策，主动开国通商属于上策”的藩国方针。他43岁时才接替父亲出任藩主，而更迭藩主本身就是幕府高压的结果，子承父业也是为了应付幕府。幕府高压让萨摩藩更加警惕，在与幕府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必须“韬光养晦”，“面从腹背”。

萨摩藩财政困难时，德川家幕府听之任之，采取的是“一切皆与己无关”的冷漠态度，幕府不会给藩国提供任何帮助，更不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可当藩国财政状况好转时，幕府则会立刻转变态度，幕府认为有钱就有可能“谋反”，因此要千方百计地削弱之。也就是说，藩国“变小”“变细”幕府则“不知道”；“变大”“变粗”则立刻找上门来。对藩国来说，他们最怕幕府要求增加“交纳金”，要求提供无偿劳役。

在幕藩体制下，藩国是幕府的复制；幕府是藩国的放大。每个藩都处于“自活”状态，藩财政的好坏，直接涉及到藩中的每个成员。武士希望藩主给自己的“俸禄米”能够足额、按时发放；农民谁也不希望回到“八公二民”的时代，自幕府高压萨摩之后，萨摩藩从内部高层到下级武士都受到波及，藩国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武士自发组织了“精忠组”，准备为了维护藩国利益随时牺牲。

口头上说一套，背后行动另一套，无论德川家康还是丰臣秀吉，没有一个武士会向比他们强大的“对手”说真话。鞠大躬，说“哈伊”表示顺从，是自我保护的手段。齐彬明知无法“锁国”，也不应“锁国”，但他向幕府及朝廷提出的建议是：坚决锁国；



江户时代的第一代萨摩藩藩主岛津忠恒

萨摩藩，藩主岛津氏，位于九州西南部（今天鹿儿岛县的北半部）。江户时期，萨摩藩位于日本四岛的最西，与幕府的关系极为不睦。由于其靠海，所以率先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中逐渐发展壮大，被称为强藩。幕末时期，萨摩藩等强藩组成倒幕联盟，主张废除幕府，还政于天皇。所以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权后，日本内阁的大多数阁员均出身于萨摩藩。

他深知"夷不可攘",但他强烈主张:"坚决攘夷"。"杀君马者道旁儿",为幕府的勇气喝彩,鼓励幕府与"外夷"消耗,这样才能使幕府"变小",幕府"变小"自己才安全,给幕府制造一个对手,至少可以将幕府的注意力吸引开。日本这个民族,凡事不涉及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就会"装"睡着了。

齐彬接任藩主后,利用父亲时代积累的财富,在藩内建立"集成馆",在这里制造船舶、枪炮、各种化学制品、西药、煤气灯等。从 1860 年到 1867 年,萨摩藩共购入外国船 17 艘,其中绝大部分是汽船,在所有藩国中,萨摩藩拥有的汽船数最多。1865 年,萨摩藩在长崎购买的舰船费用高达 37 万 9000 美元,而幕府以及其他藩国购买的总数也才 69 万 9500 美元。在京都新建的藩邸也比其他藩大数倍,萨摩藩同时还在京都买入大块土地。

欲维护家族荣耀的水户藩 //////////

走一步时已经想到下一步,凡事需要双保险,这是包括德川家在内的日本人的一贯作风。1853 年 6 月,在幕府宣布第十二代将军家庆去世之时,幕府及将军已对后事有了双保险安排。第十三代将军是家定,据说是一个"先天有病"的智障人士。在幕府面临空前外来危机之时,按理说应该选强有力的继承人以应对危局,可在众多候选人中,继任将军家定竟然是个"身体不好,没有后代"的人物,显然,他只是一个过渡性人选,家庆在世时就对继任者有安排。他同时安排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庆福,还有一个是庆喜。他们都从"家庆"名字中获得了一个"庆"字。[14]

对幕府来说,维护德川家的世袭统治,远比将军出自德川家子孙中的哪个家系更加重要。可对水户藩主齐昭来说,水户藩能够出一个将军,却是他们等待了 200 多年的梦想。虽然他们也是德川家康的子孙,可水户藩世代没有出过将军,时代荏苒,德川家的后裔越来越庞大,它同时意味着水户藩距离将军主家系也越来越远,水户藩中出一个将军的梦想也越来越渺茫。在外夷到来的空前危急时刻,水户藩主齐昭的儿子庆喜过继给了一桥家,水户藩终于向将军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而能否最终出任将军,恰恰与幕府的对外方针纠合在了一起。

幕府考虑的是德川家天下的得失;齐昭思考的是水户藩的荣耀。齐昭最初准备用老祖宗的手段,发动战争将外夷打出日本领海之外,他属于强硬派。家定是过渡性人物,庆福与庆喜,两个人物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对外方针。1857 年 6 月,幕府宣布老中阿部正弘去世,一个月后,齐昭被免去幕政参与的职务,这一切表明,齐昭已经失去了幕府的信任,他的"诓骗、拖延"对策已经破产,齐昭从此更加"激进",



他提出要“坚决攘夷”。

想让自己儿子当将军，可它属不能公开吆喝的内容，齐昭对幕府之不满，实际上是对自己儿子无法当将军不满。换言之，主张强硬只是要让自己儿子能够当上将军，至于是否真对外夷开战，等儿子当上将军之后决定也不晚。

看到形势不利就要“忍”，这是德川家康的“生存智慧”，外夷现在实力明显强过幕府，硬顶无异于“拿鸡蛋去碰石头”。回避战争，它也是宣布家庆去世时曾经思考过的问题，让庆福更名为家茂并出任将军，就是为了避免战争。1853 年，庆福 7 岁、庆喜 16 岁。1858 年庆福出任将军时年仅 12 岁。前任将军“智障”无法自己主政；而继任将军“年幼”需要他人辅政，两任将军的共同点在于：德川家天下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幕政面临危机的时刻，越要忠诚老中们集体议政。

对于德川幕府，不但“外样”的岛津、毛利家有 250 年之不满，“亲藩”的水户藩同样也有 250 年的不满，虽然各有各的不满，可相同在于他们都要用“大义名分”将“一己之私”掩盖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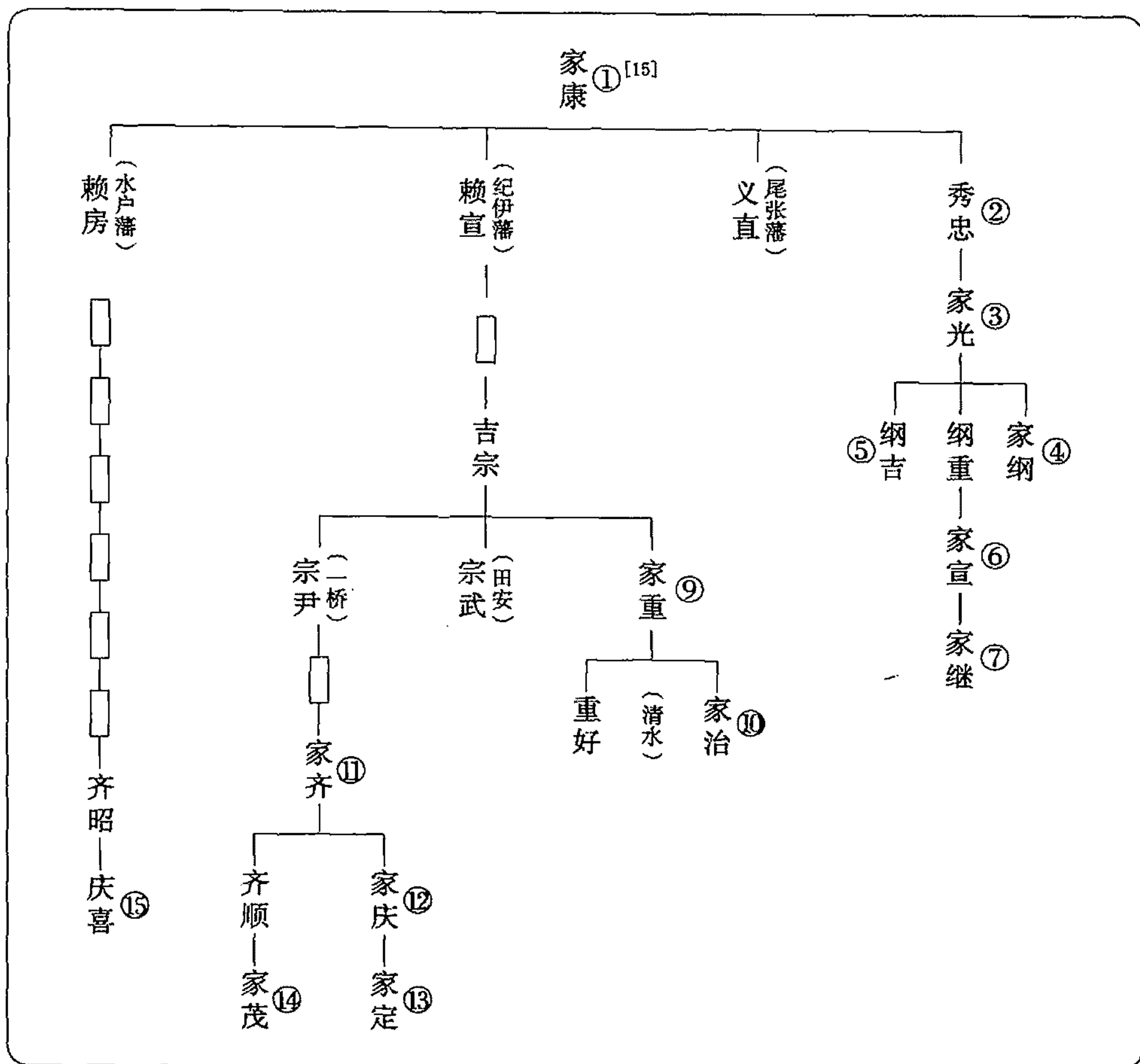
国耻未雪乱先起萧墙 //////////

1858 年 6 月 22 日，大老井伊召集在江户的大名开会，他通报了与美国签约之事，说明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同时宣布免除堀田正睦的老中职务。

6 月 24 日，以齐昭为首的德川家的几个亲藩大名共五人，一起闯入江户城（水户、尾张、越前藩主），要求幕府推迟宣布庆福（后来的家茂）为新任将军的消息。此前一天，过继给一桥家的庆喜（21 岁）已经将井伊痛斥了一顿。依照幕府的规定，除了规定的登城日之外，地方藩主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进入江户城，这次几个“亲藩”大名突然闯入江户城乱闹，属于破坏“纵向秩序”的严重违规行为。可在这几个“亲藩”领主看来，井伊虽是“大老”，可他只是世代辅佐德川家的管家，用今天的话来说，井伊是德川家董事会雇来的“总经理”，而齐昭等是德川家康的子孙，是直接继承家康遗产的“董事”，这次联合行动属于“主人”对“管家”发泄不满。

井伊并没有理会这几个亲藩的吵闹，6 月 25 日，也就是齐昭等突然闯入江户城的次日，他公布了庆福为继任将军的决定。7 月 5 日宣布对幕府政策提出异议的几个亲藩大名的处罚决定，7 月 6 日宣布将军家定去世（35 岁）。[16]

幕府放弃“攘夷”而“开国”，部分“外样”及“亲藩”都不满意，可“同一葫芦里装的是不同的药”。1858 年井伊与“外夷”签署条约[17]，250 多个藩国中的绝大多数藩国都是“事不关己”的“无所谓”态度，也接受了幕府“实属无奈”的解释，唯独



德川幕府世系图

萨摩等几个藩表示出强烈不满，萨摩藩主岛津齐彬频繁活动，主张“破约攘夷”，同时竭力支持庆喜出任将军。[18]

萨摩藩士日下部伊三次在京都煽动贵族与天皇，要求朝廷直接向水户藩发布“攘夷令”。8月8日，朝廷终于向水户藩发出了“攘夷密令”。10日，也向幕府发出了大致同样内容的密令。这是自德川家康幕藩体制确立以来，朝廷首次直接向幕府及藩国发出命令。9月2日，京都朝廷内的“攘夷派”逼迫亲幕府的九条尚忠辞去关白职务。

井伊在危急时刻刚刚出任“大老”，违规事件就接连发生，先是“亲藩”发难；接着是“外样”与京都朝廷联合，“下克上”苗头开始显现，依照德川家康制定的规矩，严禁藩国与京都的“公家”有任何来往。在幕府面临严重外来危机之时，亲藩、外样，不是与幕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而是事事与幕府唱对台戏，幕府因此采取严厉镇

压措施。

一个月后的9月5日，幕府逮捕了萨摩藩士，它标志着“安政大狱”开始。

德川庆喜	一桥家主	隐居反省	
德川庆胜	尾张藩主	隐居反省	
松平庆永	越前藩主	隐居反省	
德川齐昭	前水户藩主	永远隐居	庆喜的父亲

幕府在处罚上依然表现出明显的“亲疏远近”，“亲藩”闹得最厉害，可处罚不重；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样”及级别低的武士严厉。

安岛带刀	水户藩家老	剖腹自杀
茅根伊予之介	水户藩士	死刑
鹈饲吉右卫门	水户藩士	死刑
鹈饲幸吉	水户藩士	死刑
占泽太夫	水户藩士	流放

面对幕府的严厉镇压，京都朝廷战栗了，立刻转向迎合幕府。10月19日，恢复了九条尚忠的关白职务，此前对家茂出任第14代将军一事一直拖延，拒不承认，这次于24日宣布承认。12月30日天皇发布命令，称签署条约属不得已，朝廷表示理解。

朝廷还对“违规公卿”进行自我处罚，次年2月20日，朝廷宣布革去左右大臣等四名高官的职，同时命令他们出家。

1858年“安政大狱”开始前，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于8月突然去世，49岁，据说是幕府“赐他自杀”。临死前，他将藩主的位子交给了久光之子义雄，而实际上的掌权者是义雄的父亲久光，久光与齐彬是同父异母兄弟。

在短短的10年间，萨摩藩已因幕府高压更换了两个藩主，齐彬1851年继承了父亲的藩主位，在位仅七年。

内部内争的前世今生

源氏家族内部的“自坏”[19] //////////

源赖朝在镰仓设立幕府前后，源氏家族内部经历了多次血腥的争权厮杀。

在源平之战开始之初，源赖朝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日本东部，他要先建立一个稳

固的根据地，而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源义经则忙于在京都前线与平氏家族作战，源义经战功卓著，进入京都之后，后白河法皇故意亲近义经，疏远赖朝。他对源义经升官许愿，造成源家“兄弟阋于墙”。源赖朝不满天皇“赏识弟弟”，逼迫源义经自杀。源赖朝因此获得对天皇不敬、对亲兄弟不仁的“恶名”。

源赖朝获得全胜并在镰仓建立幕府后，一直支持他的岳父、北条一家开始觊觎权力，1199 年 1 月源赖朝坠马而死，时年 52 岁，他的长子源赖家继任第二代将军。可出任将军后不久，他就与自己的外公、出任“执权”的北条时政之间发生冲突。源赖家希望自己乳母、同时又是自己岳母的比企家族出任“执权”，夺回被自己外祖父北条时政掌握的权力，但此计划暴露，最终他本人被迫出家，比企家族被杀。赖家在伊豆修禅寺幽禁期间，一日洗澡时遇袭身亡，究竟是谁要杀死赖家至今仍然是个谜。

源赖朝与妻子北条政子之间育有两子，长子赖家是第二代将军，次子名实朝，哥哥被暗杀之后，次子源实朝接任第三代将军。外祖父北条时政在驱逐第二代将军赖家之后，希望自己后妻(牧方)的女婿(平贺朝雅)出任将军，这一举动遭到了他亲生女儿以及儿子的激烈反对。他女儿是赖家、实朝的亲生母亲北条政子，此前她曾经帮助过父亲驱逐赖家，这次她决心支持二儿子实朝。北条政子的弟弟、也就是北条时政的儿子，是镰仓幕府的第二代“执权”，后来姐弟俩联手行动，将他们的父亲及时政的后妻流放，夺回了权力，最终政子的二儿子实朝出任第三代将军。

对于源家与北条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另外一个追随源赖朝的“御家人”三浦家看得真切，在源家与北条家的争斗中，三浦家一直站在源家一边。第三代将军产生后，三浦家的有用性进一步降低，该家族将目光对准了另外一个人，此人既是“贵种”；又对三浦家的对手心存不满，推举“弱者”有利于让他对自己“报恩”，三浦家希望获得在幕府中的发言权。

赖家出任第二代将军后，与岳父一家联合反对外公，后赖家一方失败，将军原配的比企家族成员悉数被杀，而赖家与侧房之间生育的儿子以及侧房一家都安然无恙，赖家被杀时，他的二儿子公晓(儿时名善哉)只有五岁[20]，公晓后被祖母北条政子抚养成人。公晓听到的一些传闻，都是有关三代将军实朝为夺权杀死他父亲的内容，他对叔叔恨之入骨。公晓长大后到京都的寺院中修行，返回镰仓后，他 18 岁时出任源氏家族神社八幡宫的“别当”(长官)，实朝无后，传闻北条政子正在为此事与京都贵族商量，希望从皇室中找到一个继任将军。将军从此不再是源家后代而是外来人，这些传闻让公晓倍感愤怒。此时三浦家族的态度暧昧，他们标榜世代忠于源家，他们既对北条家不满，同时也对第三代将军实朝不满，他们暗示会全



力支持公晓。1219年正月，将军实朝28岁，公晓19岁，将军前来参拜八幡宫，公晓利用夜色，突然抽刀刺杀了第三代将军、叔叔实朝，接着又挥刀砍向另外一个他认为是北条义时的人[21]。不知是有人事先向他泄露了消息；还是偶然的巧合，北条义时在参拜神社之前，突然称“有事”，取消了参拜，公晓所杀对象成为北条义时的“替死鬼”。

公晓误认为三浦家会帮他实现将军梦，甚至期待他举兵站在自己一边，可还没等到他跑到三浦家，三浦派来的家臣就将公晓杀死在了半路上。据说是因为三浦义村知道公晓没能同时杀死将军与执权，为了灭口而杀死了公晓。三浦究竟是“事后英雄”，还是“事前英雄”，是谁向北条家告了密？这些都不得而知，可唯一让后人看到的现实是：北条家成为源家“自坏”的最大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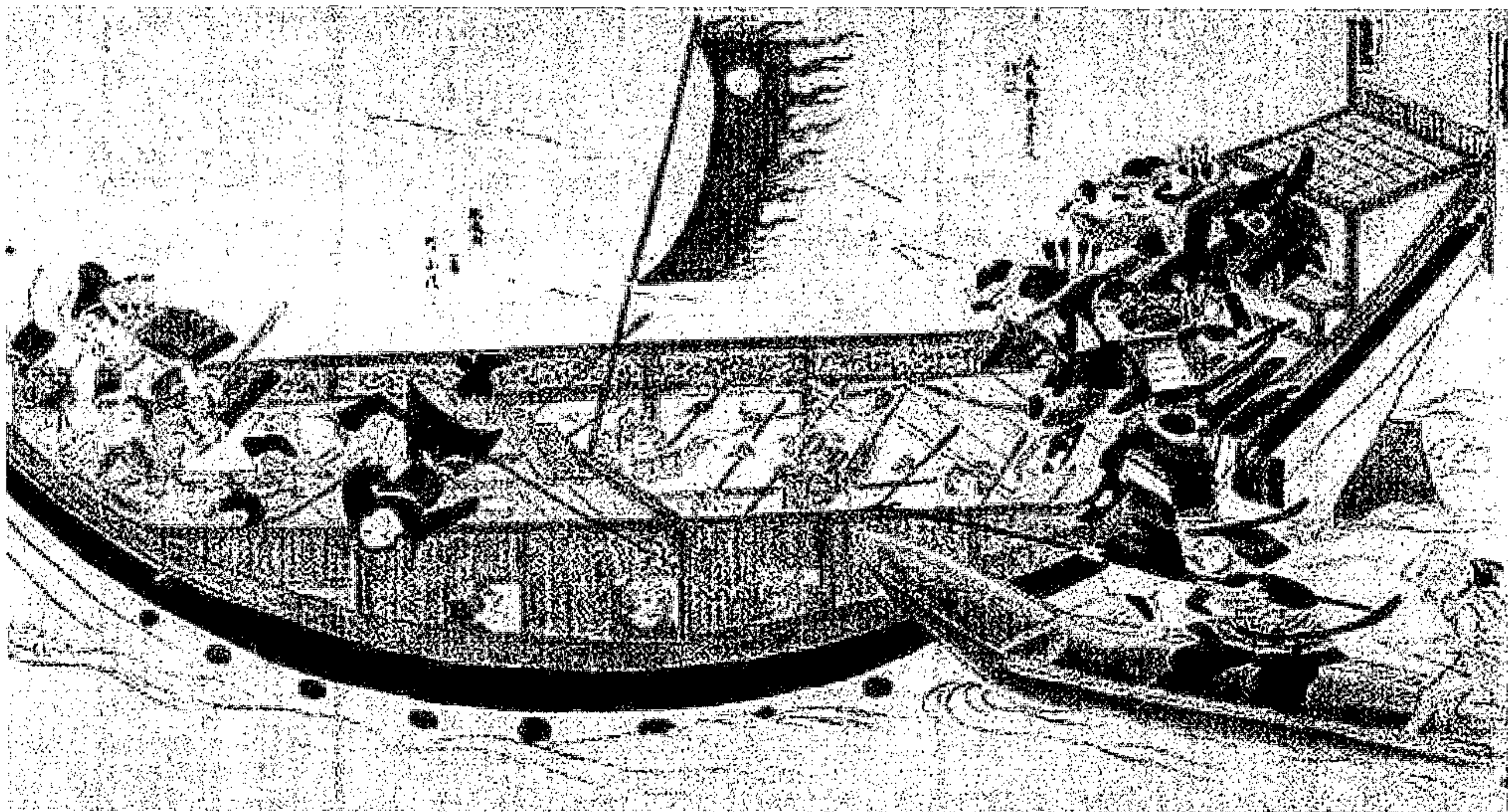
此后赖朝子孙无一存活，将军家后继无人，北条家彻底掌握了幕府中实权。北条家找来与源家有血缘关系的左大臣藤原道家的儿子藤原赖经出任镰仓幕府第四代将军，他当时年仅两岁，而这时幕府的实际领导人是北条时政的儿子，第二代“执权”北条义时。

后鸟羽上皇认为镰仓幕府内部“自坏”严重，这是天皇家乘机翻身的大好时机，刚好不少“御家人”对源家、北条家不满，他们聚集在天皇周围，1221年5月15日，支持天皇的武士杀死了京都守护[22]，他们号召全国武士举兵反抗北条义时。是选择京都的“公家”还是镰仓的“武家”，武士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而且“御家人”选择有实力的。作为首任将军赖朝的妻子，北条政子亲自召集“御家人”开会，呼吁“武家”团结，共同对付“公家”。关东武士此后同仇敌忾，北条义时迅速集结19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京都，一个月后攻陷京都。这次战乱史称“承久之乱”，支持朝廷的武士、贵族均被处死。后鸟羽上皇被流放到隐岐岛，顺德上皇被流放到佐渡，土御门上皇被流放到土佐。

这次战争之后，属于京都朝廷的大片土地被收缴，分给了进攻京都有功的“御家人”。幕府在京都新设“六波罗府”，北条家的人出任“六波罗探题”，监管朝廷。“承久之乱”是皇室、贵族联合武士反对幕府的最后一场战争，直到1867年“一新”时为止，再也没有朝廷与武士联手反对幕府的战争了。

一场没有“恩赏”的奇怪战争 //////////

1853年佩里率领“黑船”闯入日本，这次“外夷”到来首先让人想起13世纪蒙古人进攻日本。



浮世绘——《蒙古袭来绘卷》(局部)

“元日战争”之后，肥后武士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请人绘制了《蒙古袭来绘卷》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元军此次东征作战失败的很大原因在于台风来袭。因此，日本人便将这次台风称之为“神风”，二战时期的“神风”敢死队正是依此得名。

126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派遣使节，通过高丽人送国书给日本。1268年再派使节携带国书前往日本，国书被送到镰仓幕府，当时的“执权”是年仅18岁的北条时宗。他看完国书后将其转给了京都朝廷。这时的日本，既有京都朝廷，还有镰仓幕府将军，幕府中还有掌握实权的“执权”，三重统治势力同时存在意味着：外来者到访究竟应该找哪个统治者谈事？假如因为拒绝引发了战争，那么又应该由谁来组织抵抗？对外战争必然伴随庞大的经费支出，三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人、财、物应如何分摊，由谁出面组织。

京都朝廷接到国书后立刻开始讨论，据说讨论持续了几天几夜之久，当时正值天皇准备庆祝五十大寿，此后中止了所有准备活动，京都上自天皇下到朝臣贵族，每天到神社祈祷。

“执权”北条下令接待来使，安排其住在九州的太宰府中，暗中严令要设法阻止其北上，“执权”对付来使的手段是：用不置可否的办法将来使要求“拖黄”。

日本这个民族，回答要“慎重考虑”就是拒绝，而大陆使节从未经历过日本这种“面从腹背”。“执权”的手下一方面热情地酒肉相待，另一方面对来使提出的实

际要求却从不给予明确答复。北条暗地里下令积极备战，命令九州的御家人构筑阵地，作为备战的资金支持，免除了镇西九国和山阴四国的年贡，同时下令禁止庄园收取钱粮。当然，这些还可以看成是借外敌到来之名削弱京都朝廷的举措。因为原本属于京都朝廷的年贡都被“用于备战”，这让京都朝廷经济上陷入困境。

蒙古使者在太宰府空等了五个月无功而返，1271 年、1273 年，忽必烈又两次派秘书监赵良弼出使，可结局依旧是被迫滞留在太宰府。武士的判断是：只要大兵不到，我不理你，你也无法奈何我。

1271 年忽必烈建都北京，此前对日本花费了许多时间和金钱，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1274 年他下令军队前往。他下令高丽建造大船，十个月内建造大型船 300 艘、中型 300 艘、小型补给船 300 艘，共 900 艘。忽必烈认为只要大兵压境，日本将会改变态度。

1274 年 10 月 3 日，由蒙、汉、高丽三支部队组成的三万联军从朝鲜开进日本。5 日占领对马，14 日占领壹岐，19 日进入博多湾，20 日晨开始登陆九州。日本武士没有见过元军的石弩、火药、射程远的箭，日军大败，夜晚遁入太宰府。元军没有在陆地上过夜，而是回到了船上，没想到当晚来了台风，船只在暴风中相互碰撞，有不少散了架，13500 余人淹死，元军撤退。日本称这次战役为“文永之役”。

“文永之役”是日本侥幸胜利，可消息传到京都及镰仓后，朝廷、幕府无不为“神佑日本”雀跃。为了防备蒙古人再来，北条时宗下令增强本州岛西部的防卫。在博多湾沿岸修筑石头壁垒，该壁垒高约两米，底部厚三米，面向大海部分陡峭，为了方便马匹以及人员上下，面内陆部分为斜坡，该壁垒长达 20 多公里。此工程由藤原经资指挥建造，当地大名须按领地面积多少分担劳役，工程耗时五年，1280 年完成。第二次元朝大军到来时它曾发挥过一定作用。

忽必烈接到的消息是日本已经臣服，1275 年他再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这次使节一到达就被“护送”至镰仓，有了上次的“战胜”经历，北条立刻表现出“英雄气概”，他下令将 30 多名使节斩首，高丽船员被赶回高丽。

1280 年忽必烈得知自己的使节被杀后震怒，他下令进攻日本，次年军队出征。由汉军、蒙军、高丽军组成东路军，合计四万人，从朝鲜进攻日本。另一路从江南征集，号称 10 万人，有战船 3500 艘，从庆元（今宁波）定海出发，两军计划 6 月 15 日在壹岐会师。元军甚至准备了农具，准备登陆之后屯田。5 月 3 日东路军进攻对马，5 月 26 日进攻壹岐岛，而他们没有按约在此等候南路军，东路军开始进攻博多湾，这时发现日本方面已进行了充分的防卫准备，修起了石墙。后来元军改变登陆



地点，想从志贺岛登陆，但是没有成功。当东路军退回壹岐岛与江南军会师后，8月1日又来台风，结果舰船大损，元军分头撤退，没有返回船上的登陆军则被日本武士斩杀，日本人将这次战役称为“弘安之役”。

两次战斗，对手都来自大陆，与以往内战可以从败将手中夺取土地奖赏给有功武士不同，这次战胜没有土地可分。对于没有获得报酬的牺牲，武士称其为“犬死”[23]。武士拼命的前提是必须要获得“返恩”，也就是“恩给”，没有赏钱、土地，武士死了是“白死”。古代武士结束战斗后，一定要清点敌人的首级，以此作为杀敌证据向领主“请赏”。这次战争结束后武士们向幕府请求“恩给”，可幕府并没给多少“返恩”，这也是武士嫉恨北条家，后来推翻镰仓幕府的远因。

一个名为竹崎季长的武士，他卖掉马鞍，从家乡熊本出发，步行到镰仓去请赏。不知他是否真正有战功，可幕府视他为代表，赐予他一匹骏马，任命他为一个庄园的守护。日本著名的国宝“蒙古袭来绘卷”就是竹崎季长请人画的，以记录他的功劳。虽然很多武士后来去幕府“请赏”，可真正获得酬劳的只有120人，其他人都没有获得任何奖赏。

战争前“执权”向各国武士发出“异国征伐令”，“御家人”向将军报告自己可以动员的武士及武器数量。一个“御家人”上报的清单为：“85岁一人，不能行走；65岁一人，有弓箭以及其他武器；40岁一人，有弓箭和武器、马、一名随从。38岁一人，有弓箭、铠甲、马、其他武器。19岁一人，有弓箭、其他武器、两名随从。全体人员恭候指令，愿为驱使。”

愿意为幕府“卖命”的武士，几乎都是没有战斗力的人物。在财富的多寡取决于壮丁人数多少的当时，没有“御家人”愿意让自家壮丁死在战场，保留壮丁就是保护财富，除非幕府对“御家人”管辖的武士有精确的统计，或者针对牺牲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否则没有一个“御家人”会愿意派遣自己的壮丁为幕府打仗。

人的任何行为都与以前的经验密不可分，日本人更是如此，他们是“循规蹈矩”的民族。江户末期黑船到来，当年镰仓幕府遇到的问题重现，北条执权使用过的手段被江户幕府借鉴；当年令镰仓幕府头痛的人、财、物分摊问题，同样困扰着德川家幕府。原来大海是天堑，可对机动的“黑船”来说，大海变成了通道，日本四面临海让“外夷”从哪里登陆都有可能，幕府一方面是全日本的主宰，可地方上又存在相对独立的藩国，藩国不愿意为了幕府与外国爆发战争。



[1] “足轻”，不穿鞋，腿上没有护膝的最下级武士。

[2] 相扑中的最强者。

[3] 足元（下）を見る”（あしもとをみる），出地位；看脚的位移，判断对方将采取什么行动。该成语表达“要充分把握有利时机”之意。

[4] 德川家康的子孙，领地就在江户边上，现在的茨城县。

[5] 转引远山茂树著 《明治维新》 岩波全书 99页。

[6] 让人联想起日本社会党在国会中对付自民党的“牛步对策”。

[7] 是否真去世了也不清楚。

[8] 日本人喜欢将最高领导人的一切保密，比如丰臣秀吉的儿子秀赖，只有极少数人见过他。

[9] 远山茂树著《明治维新与现代》岩波新书 第116页，转引自《哈里斯日本滞留记》。

[10] 日本人在自己遇到空前麻烦时才送大礼。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前，与重庆的蒋介石谈判，预备送香港；与苏联谈判，计划送南库页岛。这又是日本喜欢霸占财物的理由，财富越多，与他人交换时本钱才越大。日本人不轻易放弃，放弃是为了更大获取。

[11] 现鹿儿岛县，位于九州岛。

[12] 圭室缔成著《西乡隆盛》岩波新书 第15页。

[13] 同上书，第15页。

[14] 当将军时再改成“家”。

[15] 图表中数字为德川家将军序号。

[16] 不是将军死了之后让继承人继承，而是先安排好、公开宣布了继承人之后，将军再“去世”。

[17] 继美国之后，英、法、荷等也参照美国的条约，签署了同样内容的条约。因在“安政”年，故称“安政五条约”。

[18] 可与“自坏”一节比较。

[19] 相当于中文的“借刀杀人”，让对立的双方自相残杀，自己得利。与中国另外一个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相近。

[20] 赖家与比企家女儿之间生有长子源一幡，北条政子怕他继承第三代将军位，将他杀死。

[21] 第二代“执权”，北条政子的弟弟，也就是公晓的舅姥爷。

[22] 在京都监管朝廷的“驻军”。

[23] 冤枉死。武士战死时必须找到见证人，方便死后家属去领赏。

第五章 从宗教仪式看日本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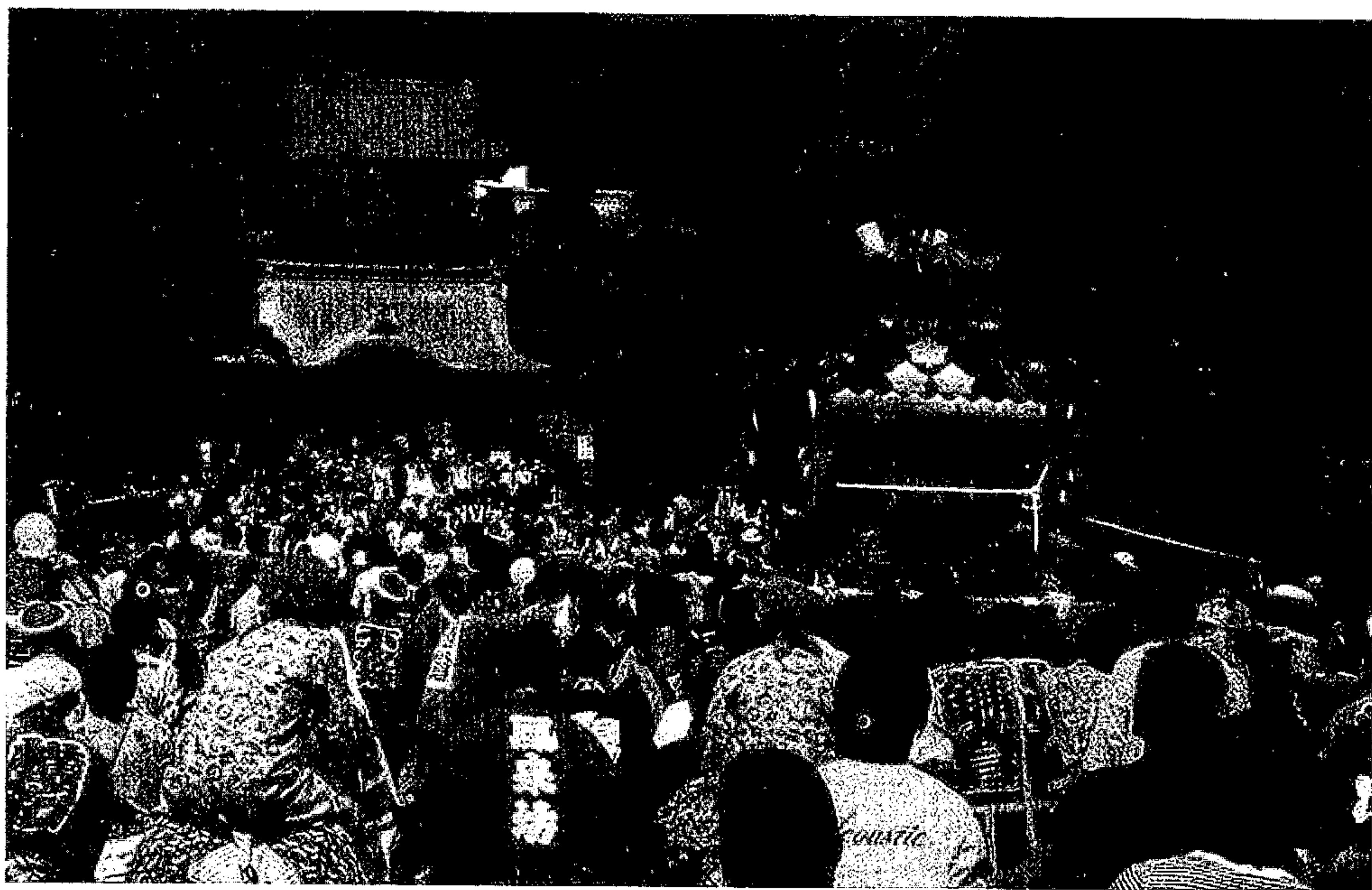
见不得光的神舆

许多介绍日本的书籍，都会无一例外地介绍日本各地的祭祀活动。如今的日本，祭祀活动已经演变成为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观光项目。更多时候地方政府成为了主导者，为了振兴经济、吸引游客，由地方政府出面牵头宣传、组织祭祀活动。

祭祀活动原本来自日本的民间信仰，在日本的全国各地，一年四季都有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组织者最初多为神社，神社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神社需要吸引更多的信徒，以保证香火更旺、收入更多；而信徒则希望自己的灵魂有所皈依，乞求神灵能够保佑自己及家人并带来利益。这种信仰原本非常朴素，它包括祝、娱、祈等几大部分，祝，就是对神说好话，颂扬并赞美神；娱就是演节目给神看，让神高兴；祈，就是祈求神保佑安康，风调雨顺。民间信仰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带来社会分工，部落中出现专门事神的神职人员，神官们在为他们专门建立的活动场所——神社工作。在“官尊民卑”的封建社会，从“神官”这个称谓上也可以看出，神职人员的地位高出一般人。神官以维持神社、从事相关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从事其他劳动的信徒，因相信万物有灵，愿从自己的所得当中拿出一部分钱物，进行“灵”与“物”的交换，支持从事精神活动的神官及神社。在日本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针对各种不同对象、规模不等的神社。

日本的神社大都没有围墙，显著标志就是入口处有一个石牌坊，神社内有一个





抬神舆

神舆中空无一物，分量很轻，一两个人"抬"它都绰绰有余，可现实却是有很多人"抬"，而且累得他们汗流浃背，俨然神舆沉重异常。"抬"者要让观众相信，有神坐在里面，神舆异常沉重。一切完全是"表演"，通俗地说，是"装出来的"。

被树木围绕的孤零零的神殿，任何一个路人都可以轻松进出。入口处通常有一个盥洗池，进入神社前要求"净"与"静"，前者是"净身"，后者是"静心"。现在进入神社已经没有以往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但参拜者大都在进入之前，在盥洗池处洗手、漱口，然后进入神社院内。在神殿前，参拜者击掌合十，闭目低头向神祈祝，希望神能够保佑自己以及家人。

日本的神社名目繁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多少神，就有多少供奉这些神灵的神社。有保佑母子生育平安的"顺产之神"；有专门保佑健康的"成长之神"；还有"交通安全之神""防火之神""生意兴隆之神"（每个大百货店的屋顶天台上都供奉着该神）"学问之神"等。

普通人生前是人，死后变成了鬼；只有部落、集团中的个别英雄人物，死了之后会因生前不同寻常而变成神。该人物上升到"尊"的地位，他的灵魂可以保佑子孙。为这样的人物建立神社，一是为了纪念该人物，还有通过对他供奉、祭拜，祈求他保佑后世，趋利避害。平安时期的著名学者菅原道真，生前有过不少著述，后世将他

视为学问之神，在京都和东京，都有专门供奉他的神社。希望顺利通过考试的年轻人，考试前一般都会去该神社参拜，祈求神保佑自己考上心仪的大学。在东京涩谷建有明治神宫，这里祭祀着明治天皇及皇后，死灵栖息地也因死者变成神而成为了神社。每年大年初一(现在是日本的元旦)，不少日本人前往明治神宫参拜迎接新年，祈求神保佑一年平安。

除了上述信徒自发、轻松的个人行为之外，为吸引更多人参与，神社方面也会定期组织活动，这就是祭祀活动，它也是神社获得收益的最好时机。著名神社通常都会组织大型活动，好似仓库中的货物要定期拿出来晾晒、避免发霉那样，神社也要将自己供奉的神，在某个特定时间从神社中请出，让它在神社附近的街道上溜达一趟。

在日语中，“抬”（かつぐ）是一个极具日本特色的词。

“抬”（かつぐ）的第一个意思，也是它最基本的意思。“将一个物件扛在肩膀上。”“抬”神舆就是最具体的实例。

第二个意思是：“推举某个人或物于自己之上，将某个人推举至某个高位。”换言之，某人或物可以身居高位，原因在于被他人、被位居于下的人抬。

第三个意思是：“信迷信。”“抬”与迷信原本“风马牛不相及”，而在日语中，“抬”可以引申出“信迷信”。了解了“抬神舆”的行为，就能够发现两者相关的理由何在。“抬”的具体物件是“神舆”，“神舆”本身是个实在的器物，它看得见、摸得着，而“神舆”里面有“神”，则完全是口头编造出来的“神话”。里面明明“空空荡荡”，就因为用帘子遮挡了起来，观众就“必须相信”里面有神。“抬神舆”这个具体行为就这样跟“信迷信”联系了起来，“信其有”变成了心理上的强迫。

第四个意思强调了“信迷信”的贬义侧面。是“愚弄、欺骗”的意思。它常作为被动态使用，义为“被结结实实地骗了一次”，“完全被欺骗了”。“信迷信”信到走火入魔，如痴如醉，全然不顾那是人为编造出的谎言，结果“上当受骗”。明知那些都是“虚构”，还要信以为真，这属于自愿上当受骗。

第五个意思是：“诱拐妇女。”用甜言蜜语“捧”女性，奉承、抬举，实际上是陷阱。

中国的词，不少是动名词，这种情况日本也不例外，日语通过词尾变化表示不同词性。“祭”（まつる）是动词，“まつり”是一个名词。动词指“祭祀”这一行为；名词表示“祭祀活动”本身。“祭祀活动”内容丰富，而“抬神舆”出行是核心，“祭祀活动”的规模与“抬”者及观众成正比，神社越有名，财力越雄厚，祭祀活动的规模越大，“抬”神舆者的人数和观众也就越多。

“祭”还与其他动词组合，构成“まつりあげる”“たてまつる”等复合动词。

前者从“推崇”“奉承、吹捧”之义中引申出“无视本人的意愿，一定要将该人物安置在上、高的位置”的意义。后者是“捧上”，表示“仅仅在形式、表面上给予高位”的意思。相对“抬”的人来说，神舆又是可悲、软弱、被动、无法左右周围而被他人操纵的身不由己者。“抬”者可以联合起来，他们决定“抬”的时间、行进方向，而被抬者不情愿也无法改变，它有“牺牲品”的含义。对于仅仅在表面上给予某个对象高位，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质，日本更通俗的一个词是“架空”。

回忆一下日本祭祀活动时万人空巷的情景吧。高声呼喊着号子的“抬神舆”者，明明神舆中空无一物，分量很轻，一两个人“抬”它都绰绰有余，可现实却是有很多人“抬”，而且累得他们汗流浃背，俨然神舆沉重异常。“抬”者要让观众相信，有神坐在里面，神舆异常沉重。“抬”者一方面要表现出“我们很累”，另一方面又拒绝并排斥观众帮手，一切完全是“表演”，通俗地说，是“装出来的”。抬者作秀与神社鼓吹，两者缺一不可。组织者要对“抬”者下足工夫，让“抬”者使足气力“抬”，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华丽的神舆上，吸引到头缠毛巾、身上只有一块兜裆布的“抬”者身上，同时让他们忘却“神舆之中空荡荡”。神长什么模样，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信其有则有，信其无则无”，它本身就是“欺骗”。

不但存在是“假”，“高贵”也同样是“假”。别看神舆被“抬”出来时风光，金碧辉煌，一尘不染，一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可实际上在神社内的大部分时间里，神舆是个长期被冷落的对象，长时间布满尘埃，长满了蜘蛛网，而这些只有神社的神官知道，出于利益的考虑，神官绝对不会将这些秘密泄露，好似没有人要将神舆小窗口上的锦帘掀起，让观众看里面其实空空如也那样，对外宣传时，神官只讲神舆风光的一面。过多的暴露会失去威严；隔离密封，在有限时间里展示瞬间辉煌，有利于保证神性，编造神话。隔绝，让它充满神秘以及魅力。

“抬”出来的日本政治

一个字引发的政治内波 //////////

在日语中，“祭事”“奉事”写汉字“政”，也就是说，统治就是“祭事”“奉事”。“表演”（えんしゅつ）、“吸引看客”就是“政治”。

武家统治的800年间，天皇就是被摞在京都皇居中的“神舆”。将军大权在握，

想抬哪个人物为天皇，就抬哪个人物。一切完全取决于将军的意志。“暗杀”“废帝”“架空”等是家常便饭，有关天皇的悲惨故事数不胜数。

日本历史上，任何一个表示愿意“抬”他人的人，背后都暗藏着利己的动机，以“利他”的名义出现，实际上是想操纵一个傀儡。“抬人统治”贯穿于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整个历史中。日本国内，从平安时代到明治时代的历代天皇；国外，从朝鲜的国王到中国的溥仪、南京的汪精卫，都是扶植傀儡并在背后操纵，这是日本式统治的一个特点。日本人认为，“名”是“空”和“虚”，只有“实”才是“真”。

1199年，镰仓幕府的开创者、首任将军源赖朝意外坠马而死，他18岁的儿子继任将军，但不久他就被“抬”了起来，他母亲的家族北条家，象已往藤原家“架空”天皇那样“抬”将军家，北条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将军，自己当将军的岳父或外祖父，设立一个名为“执权”新官职。“执权”总揽幕府大权，它是武士幕府时代的“摄政、关白政治”。

1274、1281年，蒙古人连续两次派大兵进攻日本，但两次进攻都被吹袭日本的台风化险为夷。日本人将这两次保佑日本的台风称为“神风”，认为是神助日本。尽管蒙古军队两次进攻都没能最终在日本登陆，但镰仓幕府不得不派遣大兵到九州守备，这让幕府陷入了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中。

看到武家幕府岌岌可危，后醍醐天皇想利用这次幕府危机复权。后醍醐天皇决定让他儿子出任皇位继承人，控制镰仓幕府的北条家对此极为愤怒，因为决定继任天皇的大权，不在天皇家，而由镰仓幕府说了算。它必须由“执权”来决定，后醍醐天皇之举是“下克上”。1331年，北条家派足利高(尊)率兵进入京都镇压。在逃离京都的路上，后醍醐天皇遇到了后来被描绘成“武士道”中的“忠诚典范”——楠木正成。这个既不属于镰仓的武家，又与京都的天皇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物，一直被看成为“野郎武士”，也就是来历不明的“流浪汉武士”，只因为大权旁落的后醍醐天皇很难遇到一个“表忠”的人物，见到楠木好似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后醍醐天皇立刻对他封官许愿。

在接见了楠木正成后不久，后醍醐天皇被他的追随者出卖，他被俘并押解至京都监禁，不久后又被流放到本州西海岸75公里之外的隐岐小岛，镰仓幕府则从皇室另外一支中选出了新天皇。

1333年春，后醍醐天皇从流放小岛上逃离，随后设立了临时朝廷。为了防止后醍醐天皇重新登基，镰仓幕府再次派出了讨伐部队，足利高(尊)被任命为征讨军将领，足利高(尊)作为镰仓幕府的领军人物出征，完全是因为他深受幕府“执权”北条的信赖。

室町幕府(1336-1573)的创立者名足利高(尊),足利是姓,高(尊)是他的名。同一个人物有高(尊)两个名字并不奇怪,奇就奇在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效忠"与"背叛"的故事。不同的名字来自对不同主人之"表忠",他将"背叛"与"效忠"演绎到极致。

北条家的首任"执权"是北条时政,足利高(尊)时代的"执权"名"北条高时",为了表示对北条高时的"忠诚",原名足利太郎的他,成人时从"执权"高时名字中取一"高"字,从此他名足利高(尊),他的妻子是镰仓幕府高官北条守时的妹妹。

1333年,足利高(尊)到了京都附近之后,没有按原计划镇压天皇家,而是掉转武士刀,攻击了镰仓幕府设置在京都、用于监视天皇的"六波罗探题"。他举旗反叛的公开理由是:不满北条家"架空"源家。足利高(尊)"抬"源家;公然反对"北条家"。足利高(尊)的另外一个亲戚新田义贞也乘机率兵进攻镰仓,迫使当时的"执权"——北条高时(1303-1333)自杀。镰仓幕府覆灭。

足利高(尊)"背叛"了"背叛者",可他并没有扶植源家后代当将军,而是转向后醍醐天皇表忠。足利高(尊)因背叛北条家,"抬"后醍醐天皇重返京都并助天皇亲政有功,后醍醐天皇主持"论功行赏"时,给这个"叛将"奖励了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后醍醐天皇名"尊治",他将其中一个字给了足利高(尊),足利高(尊)从此更名为足利尊(高)。对足利尊(高)而言,不同的"名"代表着不同的"实",从原来忠于北条家到"从背后砍一刀",再到"抬"后醍醐天皇。以前与北条家"一身同体",后来对天皇家"一心不二"。

足利尊(高)扛着"背叛"的"污名",从天皇那里仅获得一个不能吃喝的"尊"字。难道仅为从天皇那里获得一个字,就动用军队,发动流血战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傻瓜!对足利尊(高)来说,如果他不按照武士的规矩,对追随他"抬"天皇的叛乱武士"论功行赏",他也将被"下克上"。"抬"源家"背叛"北条家,出卖、背叛一个;投靠、效忠另一个,一切都是为了当将军,成为日本新的实际支配者。对他而言,名字从"高"改到"尊",既不浪漫,也不是为了避凶图吉。后醍醐天皇,他付出的仅仅是名字中的一个字,用一个字就换回了失去多年的皇权,天底下岂有这般便宜捡?后醍醐天皇除了世袭的天皇血统之外,既没有自己率兵平定日本的能力,也找不到愿意追随他的武士,他梦想回到圣德太子的"皇土、皇民"时代,而保证这些实现的只有天皇家的"高贵血统"以及"天照大神"创造日本的神话。

后醍醐天皇坐稳之后,开始了所谓"建武新政",他不希望再有藤原家、平家和源家,更不希望让足利尊(高)来"抬"自己,为了保住自家江山,后醍醐天皇任命他儿子护良亲王出任"征夷大将军",同时下令足利尊(高)的弟弟足利直义陪伴新将

军进驻镰仓。看到梦寐以求的将军称号被皇子夺走，足利尊(高)决心将“抬起的天皇”重重地摔在地上。

有实力的武士，是将“和战”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武士。护良亲王进入镰仓之后，北条家的后裔开始反攻镰仓。足利尊(高)的弟弟足利直义乘乱杀死护良亲王(1335 年 7 月)，而身在京都的足利尊(高)，也找到了绝好的出兵理由，他率部离开京都，杀回镰仓。后醍醐天皇明知自己的亲生儿子、新一代征夷大将军死在足利家的阴谋之中，可对此也无可奈何。尽管他“不批准”足利尊(高)离开京都，可在足利尊(高)眼里，他不认可的天皇“敕令”就是一张废纸。足利尊(高)带兵回到镰仓并在镰仓安营扎寨，他向后醍醐天皇示威，不获将军头衔不罢休。后醍醐天皇指责足利尊(高)是“逆臣”，再派足利尊(高)的亲戚，当年一起与足利家携手推翻镰仓幕府的新田义贞赴镰仓讨伐，出人意料的是，新田义贞意外“败北”。后醍醐天皇想打“忠诚”牌，可武士们对“忠诚”的认识是：必须有“返恩”。“奉公”与“恩给”，是“忠诚”这一货币的两面，没有令他们满意的“赏”，他们凭什么为天皇打仗？

后醍醐天皇再派楠木正成增援新田义贞，1336 年 7 月 5 日，“保皇军”与“倒皇军”展开激战，就在战斗激烈进行之时，保皇的新田义贞突然撤出战场，让楠木正成与足利尊(高)单独交战，楠木寡不敌众，后带领几个随从剖腹自杀。败将楠木，从此获得了“忠臣”之名，可他获得的“忠臣”美名，完全建立在他死前的表现上。他真正具有“抬”天皇之实力后，是否会步足利尊(高)的后尘“挟天子令诸侯”，这一切都是未知数。他刚刚开始“奉公”，甚至还没来得及索要“恩给”就“牺牲”了。后世所谓“忠诚的楠木”，实际上是指终身无力将天皇“抬”出来的楠木正成，无法暴露真实面目的楠木正成。

足利尊(高)再次重返京都时，他已经更换了一个“神舆”来“抬”。1336 年 6 月，足利尊(高)将光严上皇“抬”入京都。11 月，足利尊(高)下令后醍醐天皇将象征皇权的“三种神器”转交给光严上皇的弟弟光明天皇，足利尊(高)同年在京都边上的室町设立室町幕府。两年之后，光明天皇授予足利高尊(高)“征夷大将军”称号(1338 年 8 月)。

经过五年的战乱，整个日本都陷入了争权者带来的苦难之中，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没实力者靠边站。足利尊(高)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将军职位；只有血统与权威的后醍醐天皇被打入冷宫。后醍醐天皇交出“神器”一个月之后，不甘心自己被足利尊(高)抛弃，1336 年 12 月逃离京都，在距离京都以南 90 公里外的吉野，与此前新田义贞拥立的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恒良亲王汇合，在这个山沟里建立了“南朝政

府”。他宣称交给北朝政权的“神器”是赝品，“真品”仍在自己手中，以此作为“合法”天皇的依据。1339年8月15日，也就是足利尊(高)就任将军的一年之后，后醍醐天皇离奇死去，去世的前一天，他将“南朝”政权交给了另外一个儿子义良亲王(后来的村上天皇)。此后，“南朝”军队曾四次夺回京都，但最终都被“北朝”军队打败。南北对立50年之后，在山沟里的“南朝”还是最终归并到了京都的“北朝”。

足利尊(高)的亲弟弟足利直义，最初积极帮助足利尊(高)夺取天下，两兄弟后因利益问题相互厮杀，足利尊(高)毒死了自己的亲弟弟足利直义。而足利直义和他的养子——足利尊(高)的亲生儿子，他们选择“南朝”，反对足利尊(高)“架空”的“北朝”，图谋将军位是真；“效忠”于“南朝”天皇是“假”。

1392年，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结束了“南朝”的统治。

据说“北朝”的将军欺骗“南朝”的天皇，以今后让两支天皇轮流登基作为条件，诱骗“南朝”天皇回归“北朝”。对只有“真神器”的“南朝”天皇家来说，将军答应可以让南北两支轮流当天皇，总一直呆在吉野的山沟里好。对将军来说，神社中多出了一副“神舆”，“抬”哪个出来兜风，决定权在将军。“南朝”同意了足利家将军的安排，回归了“北朝”，可不知何故，将军此后从未兑现过自己的承诺，或许是因为“南朝”也欺骗了将军，他们并没有带回来“真神器”。

进入明治时代后，南朝、北朝究竟谁是正统，这曾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因“北朝”属于被将军“抬”的傀儡政权，从天皇家拒绝被“抬”，一直与将军抗衡的角度来说，“南朝”绝对应是正统，他们敢于与强权的“武家”斗，50年都没有屈服。可明治天皇属于“北朝”天皇家的后裔，属傀儡政权的子孙，而将此问题揭露出来的，竟然是明治、大正之交的“忠臣”桂太郎，他不给皇室面子的举动，或许与他后来突然暴毙有关。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该问题再次引发争议。战后因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国内有人提议昭和天皇退位，就在讨论昭和天皇是否应该退位的时候，一个人自称是“南朝”天皇家的后裔，他说自己是纯粹的“南朝”天皇的子孙，现任昭和天皇应该退位，而他这个正统的“南朝”天皇家子孙应该被“扶正”。这一“自暴身世”让美军一时摸不到头脑，昭和天皇已经为战争责任、是否退位问题焦头烂额了，现在又多出了一个人物搅局，他要颠覆“万世一系”，而且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抬”自己。后来没有人“抬”他，“南朝”天皇即位一事也就无疾而终了。

专门抬人的织田信长 //////////



室町时代末期开始，由于足利将军家已经无力控制地方局势，日本进入了“下克上”的时代。秩序紊乱，“强者为王”，是这个年代的特征。更多的土地及人口意味着更多财富；而只有先确保更多的财富才能够建立起更牢固的“城”，有了更大且更牢固的“城”，人与财富才有安全保证。对土地、人口的争夺，演变为对生存、安全的追求。“小名”要变成“大名”；“大名”想要变成“大大名”，相互吞噬让战争连绵不绝，对富有膨胀欲的领主来说，这是一个能让自己“变大”的、危险与机会并存的时代。

织田信长(1532-1582)是尾张地区(今名古屋地区)一个小领主的儿子。父亲去世后，他率领一班人马加入到了扩张领地的争霸战中。战国时代，日本各地到处都是独立的小国。1543年，来自中国的葡萄牙人在九州以南的种子岛登陆，他们带来了火枪，当地居民买下了这种新式武器后，立刻开始了仿制，全日本的大小领主，为了能够在争夺天下的战斗中占上风，都争相购买这种威力强大的新武器。

“小名”[1]织田信长，年轻且野心勃勃，为了在战乱中不被对手吃掉，他引进了新式武器并大胆采用了新的作战方法。尽管他手下人并不多，但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织田迅速取得了胜利。

与织田信长争夺天下的一个武士名松永久秀，他被认为是日本“下克上”中的典型人物。为了能够“变大”，他先杀死了自己的“主家”，使自己从下级武士变成了“大名”(领主)。此后他“抬”足利家的另一个后裔为将军，1546年，他要求天皇委任足利义辉(1536-1565)为十三代将军。可后来松永又对他“抬”起的将军不满，他再将自己“抬”出的十三代将军义辉杀死。

1568年，有“效忠”武士“抬”出足利义荣(1538-1568)，让他出任第十四代将军。同年，织田信长对有人“抬”义荣”当将军不满，他“抬”出了第十三代将军的弟弟——足利义昭(1537-1597)为第十四代将军。而此前义昭已经出家当了和尚。

1568年，织田信长表示愿意“效忠”义昭，支持他出任将军。织田信长率领军队进入京都，要求天皇下令，委任他“抬”的足利义昭当将军。南北朝之后，京都的天皇以及贵族已经彻底失去了复权的欲望，实力派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织田是当时最大的实力人物，他让京都朝廷任命义昭出任将军，除了从命之外，朝廷没有其他选择。义荣此时已经逃离京都，最后病死在出逃的路上。

织田信长为了打消他人对他“效忠”义昭的怀疑，专门在京都二条为将军改建了将军府邸，它就是今天的“二条城”。义昭被信长“抬”出之前已经是相信“万事



皆空”的“出家人”，被“抬”上将军位之后依然是“秃头将军”，既没有他可以指挥的军队，也没有作为财源的领地，有的只是将军后裔这一光环，身上流淌着足利将军家的血液。织田有实力没有名分；义昭有名分没有实力，两者刚好互补，这同时也是他们最终分手的原因。实力决定“上”“下”，无实力者不能为“上”，只能当傀儡，“被抬”就是“被架空”，以他作为欺骗道具。织田给将军修建二条城“表忠”，实际上好似将神请进了“神舆”，义昭对“被架空”不满，打算以自己的血统为招牌，召集一班人马为自己效力，“秃头将军”想学后醍醐天皇的样，结果不言自明。

织田信长最初“抬”义昭出任将军，足利义昭(1537-1597)就叫织田信长为“御父”(おんちち)，尽管织田信长(1534-1582)只比他年长三岁。战国时代的地方“大名”要“抬”某个人物，无非是想借用该人物做招牌，“抬”就是“欺骗”。任何一个足利家的后裔，都有可能成为被争“抬”的对象，“大名”们争着要“抬”足利家后裔为将军，实际上是要自己号令天下。足利家后裔被“抬”起的同时，就被“架空”成了傀儡，就面临生命危险。在“下克上”的时代，武士想“抬”谁就“抬”谁，想“撂”谁就“撂”谁。对争夺天下的松永久秀、织田信长等实力“大名”来说，“抬”哪个人为“将军”，仅仅是他们争霸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最初“抬”义昭的是朝仓义景，朝仓义景最先将义昭迎入自己的领地，准备由他出面将义昭“抬”出，重建“室町幕府”，可他本人实力不如织田信长，“抬”义昭的活最终被织田抢走。1568年，织田拥立义昭去京都当将军，五年之后的1573年，织田撂开义昭，室町幕府灭亡。

1559年，只有26岁的织田信长首次前往京都，向将军、朝廷表忠，此时的他仅是一个乡下的“小名”，别说京都的将军、天皇，就是幕府、朝廷中的小官僚也根本不把织田放在眼里。在动乱的年代，出入京都的“大名”“小名”犹如“过江之鲫”，比织田领地大、实力强的领主多得是，“热脸碰上冷屁股”的经历让织田颇受刺激，京都的冷遇告诉他，京都只认“大物”。[2]

今川义元，自称是足利将军家的后裔，关东一带是他们的世袭领地，为了让京都的将军承认他在关东地区的霸主地位，他率领大军前往京都。1560年织田只有27岁，他率领三千人的军队，偷袭了号称二万五千人马的今川军，这次偷袭成功不仅让织田信长名声大振，而且增强了织田称霸日本的野心，他从此开始了蛇吞象的扩张战争。八年(1568)后他再赴京都时，朝廷追着他屁股后面要给他官。

织田信长让天皇委任足立义昭为新任将军，天皇就立刻从命，同时，天皇还不忘讨好地问织田信长，说准备给他个“副将军”的头衔，也可以委任他为“管领”，这是为控制足利义昭将军而设立的新官职。京都对待织田的态度，与八年前截然不

同。次年的1569年3月，正亲町天皇再次派遣使者游说织田出任“副将军”一职，织田对此甚至都懒得回答，织田要通过此举向全日本表示：我织田乃全日本的真正支配者也。

天皇的封官许愿是“马后炮”，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天皇只要愿意，可以对任何人封官许愿，可对没有实力者的封官许愿，有名无实，封了也白搭。战国时代，地方豪强们相互厮杀，参与厮杀中的任何一方，只埋头于战争、战胜。天皇好似他们“相扑”中的裁判，他只向最终的获胜者举牌。战国时代中，天皇先后向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举牌，认可他们是号令天下的统治者。

1578年，织田辞去了“右大臣兼右大将”的官职，他提出的辞职理由是，“天下尚未统一”。1579年，他纳正亲町天皇的皇子诚仁亲王为自己的“犹子”（义子）。昔日尾张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名”，在“下克上”的天下大乱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爬上了号令日本的地位，连“万世一系”的天皇家也要巴结、讨好他，权贵争相以当他的儿子为荣。对现任天皇来说，只有依附信长，被他们“抬”，自己的儿子诚仁亲王才有可能成为继任天皇，反之，即便是天皇的儿子，血统“纯正”，也可能无法即位。乡下武士成为未来天皇的养父，这种事情发生在“重名”的日本看似荒唐，可它反映出日本人的“实力至上”信仰，只要有了“实力”，不愁找不到作为外壳的“名”。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实力决定一切”。织田信长在本能寺遭遇杀身之祸后，亲王失去了“义父”，没有义父“抬”的诚仁亲王，最终确实没能当上天皇。

在粉碎了佛教徒的挑战后，织田再次凯旋回到自己的领地安土城。1582年，天皇再次派遣使者来到安土城。这次天皇同时送给织田三个官衔供他挑选，分别是“关白”“太政大臣”“征夷大将军”，可织田一个也没选。此时织田在全日本已没有竞争对手，对于自己应该以什么“名目”号令天下，织田信长似乎还没有想好，就在织田准备建立自己帝国的时候，一个表面“效忠”他；但最终背叛他的人物出现了。1582年6月1日晚，织田信长夜宿京都本能寺，出征的部下明智光秀突然率兵折回京都，“从背后砍”织田。

明智光秀背叛的唯一战果就是将自己曾经表示效忠的主人织田信长杀死，结束了织田家统治日本的可能，而他希望自己一统天下的梦想仅仅持续了11天，丰臣秀吉此后班师回京，他杀死了明智光秀。

把天皇“抬”成傀儡

“争抬”天皇的第一回合 //////////

1853年“黑船”到访日本，幕府采用了不激怒“外夷”的“诓骗”战略。为了“诓骗”，幕府先后使用了“拖延”“死人”“抬出天皇”等“战术”。1858年幕府将天皇“抬”出，实际上是更换了一种“拖延”战术而已。幕府老中亲自前往京都安排，为了说服京都朝廷出面阻挡，幕府一方面撒钱，另一方面恐吓，软硬兼施才将一切安排妥当，可江户方面已因局势变化太快而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幕府谈判代表从哈里斯那里得知：在中国的英、法联军可能会转攻日本，在幕府看来，连强大的中国都不敌英、法，日本就更不可能与对方角力了。强弱决定态度，突然转变是因为危难当头。经过两年的谈判，幕府已经大致摸清了美国方面的要求，充其量是要日本开放几个口岸，签约也暂时不会让幕府有什么大损失，有限退让可以赢得时间，幕府因此决定立刻签约。天皇原本就是作为“拖延、诓骗”的道具“抬”出来的，这时将天皇“弃之不用”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

可日本“换人换政策”的传统，偏偏与对外政策及幕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搅和在了一起，水户藩能否出将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幕府的“对外政策”，采用有限退让的对外政策，水户藩出将军的梦想将无法实现。对水户藩来说，再等200年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在庆喜出任将军与“攘夷”连动的前提下，水户藩坚决主张“攘夷”。“外样”则从能为幕府制造强敌的角度支持“攘夷”，能让亲藩与幕府之间“自坏”，无论结果怎样，“外样”都是赢家。“外样”强藩与水户联合，他们不敢直接向幕府提出对外宣战，因此他们要“抬天皇”。幕府“抬天皇”是要拖延；而水户与“外样”强藩“抬天皇”则是要战争，依然是“同一葫芦里面装了不同药”。天皇答应了幕府，但也不敢得罪亲藩，后来虽以天皇名义下达了“攘夷令”，可当命令真正发出后，“亲藩”与“外样”强藩谁都没行动。

战争是谁的事？为了谁？镰仓幕府时代京都朝廷尚拥有大片土地，若为朝廷打仗，那么朝廷必须拿钱，武士可以通过京都朝廷免除税赋的方式获得财政援助，可在德川家当将军的江户时代，天皇年收仅三万石，德川家800万石，德川幕府是天皇家的近300倍，让没钱的朝廷图下开战命令，谁会听?！水户藩也只是“亲藩”，



又没当上将军，无论是水户还是“外样”强藩，谁都不会为了幕府自掏腰包去打仗，他们只希望外来的“大物”来消耗本国的“大物”幕府。

在日本，“利用”与“轻视”是互为表里的。利用者想利用天皇命令时，伪造的也可以说是真的；不想执行时，真的也可以说是伪造的。为了利用天皇，他们要天皇成为橡皮图章，他们自己提议，胁迫天皇在上面盖章，这就变成天皇“敕令”了。1858年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策动天皇下达“攘夷令”，幕府知道“攘夷令”背后的主谋是水户及萨、长藩，天皇仅仅是陀螺，谁抽打的狠，他就朝那个方向旋转。可毕竟这些都是严重违反幕府规定的行为，大老此时不制止就是鼓励与支持，大老决定严惩，但处罚违规者时仍“网开一面”，处罚了亲藩水户及强藩，放过了京都皇室。

1858年第一回合争“抬”天皇，以幕府胜利而告终。

为了杜绝强藩再次伺机与朝廷联合，幕府决定利用自己绝对大的地位拉拢朝廷。当年家康消除竞争对手的手段之一就是“联姻”，与1858年用“银弹”打倒皇室同样，这次幕府提议“公武联姻”，幕府不允许皇室说“不”。

仁孝天皇共育有七男八女，15个子女中成人的只有三人，孝明天皇、和宫及淑子内亲王。和宫是他最小的女儿，他们都是同父异母兄妹。（将军家齐有70多个子女）天皇女儿的夫婿通常来自京都世袭贵族，如果这些人家中没有合适的男子，她们多数终身不嫁，和宫六岁时就被许配给了17岁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

1858年“安政大狱”后，以大老井伊为首的幕府就开始私下密谋“公武合体”。好似让家茂出任将军是为了强化幕府统治那样，为家茂找一个夫人，而且要找天皇家的女儿为夫人，同样不是将军本人的意志，而是幕府的意志。1860年井伊遇刺身亡后，老中要求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继续向孝明天皇提出此事。

孝明天皇最初对联姻迟疑，毕竟让将军成为天皇的妹夫是前所未有的。谋士岩仓具视这时向天皇建议：“接受幕府提出的‘公武合体’，作为交换条件，幕府必须承诺‘攘夷’。”“先下令让幕府废除条约，如果幕府真心服从的话，朝廷可以考虑将天皇的妹妹嫁给将军”。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再次将“攘夷”和盘端出，并使其成为同意联姻的先决条件。

为保证“联姻”计划得以顺利完成，幕府同意“今后7、8年或10年内，依据形势与外国交涉，或废约、或攘夷，两者选择其一。在此年限之内，如果外国有违背条约、危及国制情况发生时，一定坚决攘夷。”幕府不想主动挑起对外战争，若外国真正动武，幕府也会死拼一下。

破坏“联姻”的传闻开始甚嚣尘上：“将军要把天皇妹妹当人质扣押在江户，目的在于压制京都朝廷”；“江户边上的横滨有很多‘外夷’，皇族随时有可能受到侵



害";"天皇答应这门亲事是因为受到了公卿们的蛊惑,而蛊惑的公卿们则是因为收受了幕府的贿赂。"[3] 新娘前往江户途中,也流传有浪士要将她杀死的谣言,幕府不得不调动大量人马加强保安。

这桩联姻从 1859 年开始筹划准备直到 1862 年真正实现,其间经过了三年时间,三年期间日本国内又先后发生了几件大事。1860 年 3 月,临危出任幕府大老的井伊直弼遇刺身亡,袭击者是水户藩武士外加一个萨摩追随者,参与武士在行刺活动实施前都领取了"奖金"。据说井伊事先已获得了消息,但是他依然要"死谏",他要通过自己牺牲让德川家明白,究竟谁才最忠于德川家,可他的死并没有让德川家从内部的"自坏"中惊醒,他死后被枭首,被指责为"大奸"[4]。

1862 年老中安藤再次遭遇暗杀,这次仍由水户藩武士负责实施,长州藩武士作为"观察员"同行,据说长州保证,一旦刺杀者从现场逃离,长州将负责收容他们。

针对幕府推动"公武合体",反对派竭力要将他们的内容掺和进去。自 1858 年幕府老中首次进京之后,千年的寂静古都从此不再平静。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初就担心藩国与外敌联合;藩国与朝廷联合,幕府要竭力防止的事情这时都来了。领开港之先是美国,但 1861 年起美国爆发南北战争,从此英国成为日本外交主导。

1862 年,幕府派代表团前往英国,要求推迟两港(兵库、新泻)两都(江户、大阪)开港,幕府举出的理由是国内大名强烈反对。英国认为,继续压迫面临困境的幕府,会导致幕府崩溃,进而失去可以控制局面的政府。英国因此改变态度,签署了同意延期5年开港的《伦敦备忘录》。而后来发生的事件,让英国觉得幕府在"诓骗"自己。

1862 年 3 月 16 日,岛津久光率领 1000 多名藩兵离开萨摩。这次出藩前往江户的理由是:1860 年藩主茂久(他的儿子)首次前往江户"参勤交替",途中接到樱田门事件——大老井伊遇刺的消息,结果走到半途返回了萨摩藩。此后由于幕府多次催促,这次久光作为藩主代表前往。

1862 年正月,久光先派遣大久保前往京都为自己打前站,大久保向贵族近卫转达了久光的意见。(1) 反对公武合体,因为这将使天皇的妹妹成为德川家的人质;(2) 京都朝廷没有自己的军队,考虑到外夷到来后京都治安状况恶化,希望近卫向天皇提出,让久光率领藩兵进京保卫天皇;(3) 天皇下令让庆喜出任将军后见(监护人),松平庆永出任大老。

久光本人仅仅是藩主的父亲,既无官职又无相应的地位,他对幕政发号施令完全是"下克上"。他有意见完全可以由他本人直接向江户幕府提出,可他要通过天皇之口向幕府提意见,这与"安政大狱"前萨摩藩士策动京都朝廷同出一辙。近卫听到大久保转达的久光的要求后大惊失色,惊呼这会引发第二次"安政大狱",他立

刻拒绝道:"纵使(久光)率领千军万马来京都保卫天皇也万难从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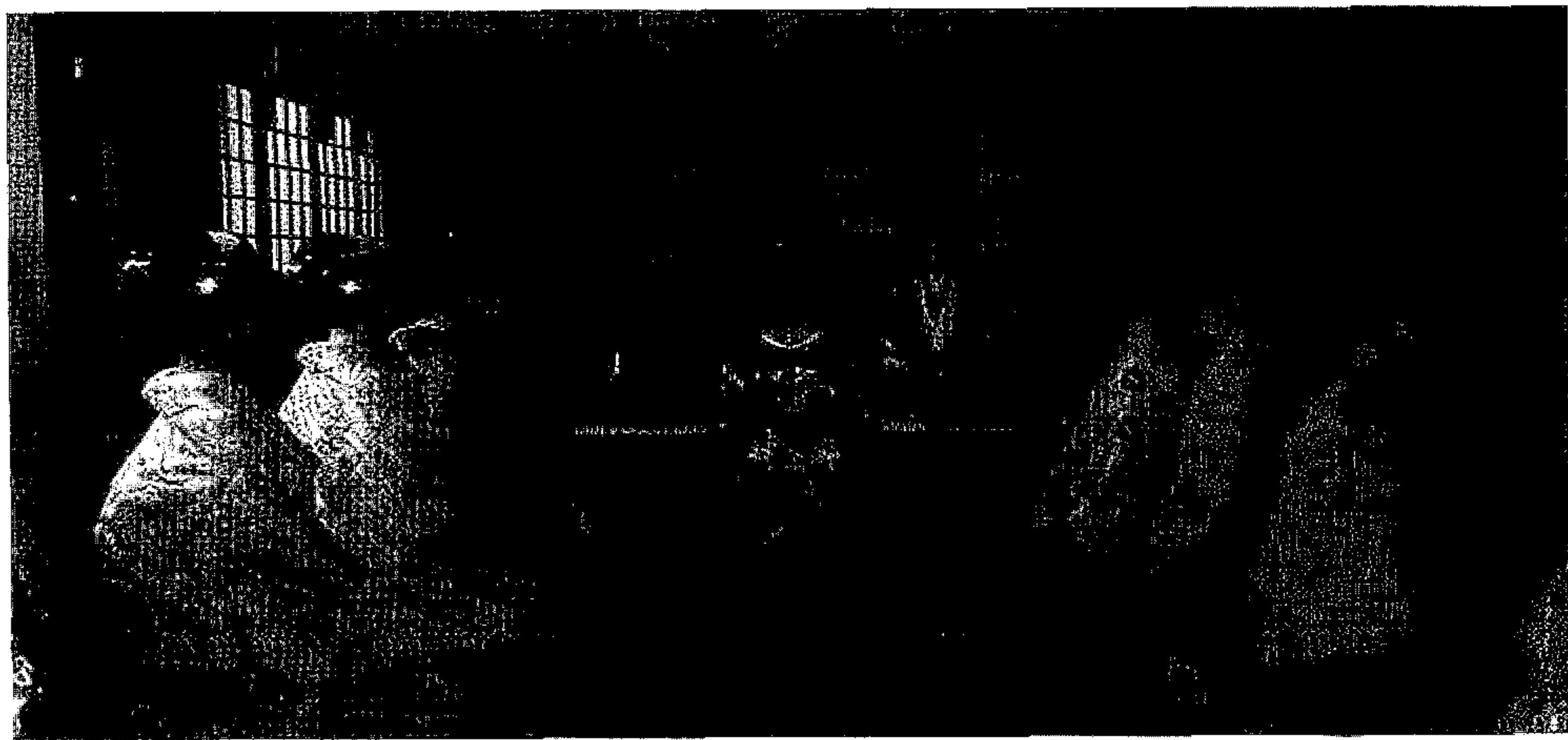
对于近卫不听话或者说不配合,久光自然可以找到他的方法。朝廷不同意藩兵前来京都维护治安,萨摩藩就先在京都制造混乱。久光派遣刚刚解除流放不久的西乡前往京都,京都早就聚集了不少对幕府心怀不满、处处想为幕府制造麻烦的浪士。他们听说久光率大军离开了鹿儿岛,同时,他们获得的有关久光的消息是:"久光准备武力倒幕"。在京都汇集的各路浪士因此各个摩拳擦掌,他们期待1858年"攘夷"局面重现。

1862年1月,江户刚刚发生了水户藩武士行刺老中安藤信睦的事件,京都皇室要钱没钱;要兵无兵,对武士来说,在京都杀人比江户容易多了。江户派驻京都的代表以及亲幕府的官员,都在暗杀名单上有名,到处都是某人将被刺杀的传闻,久光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前往江户"觐见将军",京都并非必经之地,而且他出行前宣布的目的与后来的实际行动也截然不同,可他就是要"言行不一",无论如何不能将自己"想给幕府制造敌人"想"倒幕"的真实想法暴露出来。

他率兵进入京都需要理由,4月23日,久光派兵前往萨摩藩驻京都的寺田屋(相当于萨摩藩驻京都办事处),镇压了聚集在那里的武士,事后公布的理由是:过激武士计划在京都搞暗杀。久光派去镇压的一队人马将九名"过激武士"杀死,其余的押解回萨摩。为了配合久光出行,以前萨摩向幕府通报已经死亡了的西乡都能活过来,为了达到推翻幕府的目的,让本藩几个武士牺牲又算什么!

蜡像——日本天皇后宫

与中国一样,皇室的子女都要通过联姻来达到强强联合的目的。从实质上说,这也不过是一种交易。不仅仅是东方政治如此操作,古欧洲、乃至当今欧洲仍利用联姻来维护优越地位。



久光以京都为舞台实施"自作自演"[5],这让京都朝廷再也找不到拒绝久光率兵进京的理由,而且还要感谢他。"寺田屋事件"是京都朝廷转变态度的分水岭。最初朝廷拒绝他率兵入京,此后主动要求他率兵入京,请求他维护治安。看到久光对"暴乱者"严厉镇压,幕府也不再追究。

久光率兵入京的第一个目的达到后,他让大久保再向近卫提出新要求。大久保找到岩仓具视,根据大久保的授意,岩仓向近卫提出三项建议。(1)命令将军来京都共商"攘夷大计";(2)任命沿海五大藩主(萨、长、土佐、仙台、加贺)为"五大老"参与幕政;(3)让庆喜出任将军后见,松平庆永出任大老,进行幕政改革。

对于久光提出的建议,朝廷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久光让京都恢复了"平静"。

久光要求以朝廷名义将上述意见"下达"给幕府,而久光则"护送"携带上述"敕命"的"天皇特使"前往江户。"敕命"完全是久光意见之复制,久光支持庆喜,实际上是前任藩主齐彬政策的继续,萨摩藩巧妙地利用了水户藩希望庆喜出任将军的野心,"外样"巴不得德川家内部"自己打自己"。1866年底庆喜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将军后,久光立刻用战争手段"迎接"新将军。

久光率领的大队人马到达江户后,幕府并不理会所谓"朝廷要求",萨摩藩因此再次用老手段。大久保有意向"天皇特使"流露,如果幕府不答应上述要求,他将"与幕府老中同归于尽。"天皇特使大原重德立刻将此消息透露给两个老中,据大久保日记记载:"老中得知后面色如灰,立刻接受了朝廷的建议"。

萨摩藩提出"强藩"参与幕府政治,就是要给德川家独大的政治体制中打入一个楔子。德川家康只要"亲藩"执政,"谱代"辅政,"外样"只有说"哈伊"的份。200多年来一直如此,这次"外样"要充分利用"外夷"到来这一幕府危机,扩大自己的发言权。

长州藩领主毛利敬亲也不甘寂寞,他于7月2日到达京都,向朝廷提出要"破约攘夷"。与久光相同,他也护送朝廷特使三条实美携带"即刻攘夷"的"朝廷命令"前往江户。

从京都到江户,一切都按照久光写好的脚本上演,这让久光非常得意。在返回的路上,他不忘为幕府再造一个麻烦。

1862年8月21日,在久光一行返乡的途中,在横滨附近的生麦,久光的随从以"外国人对大名队伍非礼"为由,刀砍前来日本观光的英国商人,造成一死两伤。假如久光真要"攘夷",何必只杀一、两个英国来的观光客?而且地点也非要选择在江户边上的横滨?九州的长崎就在萨摩藩边上,那里常年有许多外国人居住,真要杀外国人,萨摩藩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地利之便,向那里的外国人发动大规模的、经过

充分准备的进攻。

挑起与“外夷“之间的冲突，就是要给幕府制造麻烦。萨摩、长州要将积压了近200年的、对德川家的怨气发泄出来。他们揶揄将军名为“征夷大将军”，现在“外夷”真到了日本家门口，可将军家竟然“睡着了”。他们想让“外夷”来消耗幕府。

1862年4月，幕府向上海派出商船“千岁丸”，同时命令各藩国派代表一同前往，此行的实际目的是要调查外夷实力。长州藩派遣藩士高杉晋作，萨摩藩派遣了五代友厚。从上海回来后，他们深知“外夷”实力远高于幕府，可高杉的“攘夷”热情反而更加高涨。1862年11月，他参与了在横滨袭击外国人的活动，12月，他参与了火烧英国驻日本使馆的行动。对于“攘夷”，高杉于1862年8月对木户孝允如是说：“丝毫没有与外国人争论是非曲直的意思，真实的想法是要与幕府争论是非曲直。”[6]

1865年，五代友厚、寺岛宗则等受萨摩藩派遣秘密前往英国。在英国他们会见了奥利芬特，前英国驻日本公使阿礼国的秘书。寺岛宗则在他的《自著履历》一书中介绍了他与奥利芬特的谈话内容。

余与此人谈及日本外交之事，劝其向英国政府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善意说明，略谓我国与外国缔结条约者虽系幕府，然当今诸藩欲褫夺其权，而使京都之帝室恢复权力，故诸藩士频繁阻挠外交，为使外人知幕威之不振，曾杀戮俄人、袭击英国公使，作出其他不稳之行动，此皆为对幕府之背叛。加之，日本国物产丰饶之地虽多

浮世绘——《生麦事件》

表面上，“生麦事件”是萨摩藩“攘夷”之的行为，但其深层动机显然是要把幕府拖上战车，他们是要借“外夷”之火，火烧卧榻上的将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萨摩藩正是利用外来力量来达到消耗德川幕府实力的目的。



在各藩，然各藩不得自由贸易，故外人亦难广泛进行大规模贸易。由此，英国政府亦应协助将日本之政权转归皇室。唯有当皇室成为批准条约之主体时，因与诸藩所反逆之幕府缔结条约而造成异议，始能不似今日。此实为内外两全其美之解决案。当前与幕府所缔之条约，并非与日本之真主所定，故不可能长久保持而有益于两国。云云。

与其说萨、长两藩“倒行逆施”，不如说他们对幕府“口是心非”。

第二回合继续上演 //////////

1863年2月3日，将军家茂离开江户前往京都。将军赴京都，这是自第三代将军家光之后230年来的首次。早在将军出发之前，“将军后见”庆喜已先期到达京都。将军到达京都时，迎接他们的是室町时代的足利将军的木制头像被枭首事件。

在室町时代的足利将军眼里，天皇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用这个将军自己的话说：“如果说天皇是必须存在的话，那么用木头雕、用铁来铸，怎么样的天皇都能造出来，而只要是活着的天皇，就应该将他们流放。”

足利尊将军死后，后人将他葬在以他的法名命名的等持院中，该寺院后来成为足利家的家族神社，其中供奉了足利家历代将军的木像，在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到达京都时，有三尊足利家将军的木像的头被砍掉，挂在京都河滩的竹竿上，头像旁还立了诅咒将军的牌子。所谓“勤王武士”要“扬”天皇；“抑”将军，“抬”神舆是为了让自己出场。

参与枭首的“浪士”[7]后来被捕，“一新”成功后他们在新政府中任要职。枭首向将军传递了一个信息，德川家与足利家同样，都是对朝廷“伪忠”的篡权者。足利与德川两个将军家族，分别先后设立了室町及江户幕府，从“抬”天皇的角度而言，两者都是“背叛”与“下克上”时代的产物。被德川家压制了200多年藩国，渴望“下克上”的战国时代重现，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变大”。看到将军家来“抬天皇”，他们就跳出来要“争抬”。幕府方面派驻京都的守护被杀，死者的手、头、耳等被割下来并被分别抛入支持幕府的公卿住宅。主张“攘夷”的公卿集体上朝请愿，要求朝廷获得幕府“坚决攘夷”的保证。这次在京都要求“攘夷”的声浪远高过1858年。

“攘夷派”声称：将军口头答应“攘夷”没有用，也就是说，“七、八年后”那种暧昧承诺不行，必须立刻明确从近期的何年、何月开始，否则就不能让他安全返回江户，“志士”计划在京都或返回江户途中暗杀他。此后以朝廷名义，发布了1863年

5月10日为“攘夷最后期限”的命令。1858年幕府说“攘夷”但没有动真的,“公武合体”原本是为了切断倒幕派与京都朝廷之间的联系,没想到1863年之后,“攘夷”问题反比1858年时还进一步。

将军家茂以“商讨攘夷”为由来到京都,而对于“攘夷”,无论是京都朝廷还是幕府、强藩,谁都没有具体建议或方案。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攘夷”的头等大事是费用以及兵力分摊问题。蒙古军进攻日本时,地方“御家人”虽向镰仓幕府表忠,表示坚决服从幕府“抗击外敌”命令,可提出的作战人员名单却是“老弱病残”,派出人员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领钱的。这次也同样,土佐藩刚说“攘夷”就向幕府要求钱物。与1274年“文永之役”前同样,京都皇室与贵族的战争准备就只有祈祷及参拜神社。日本古代著名作家纪贯之曾说过:“不用气力可以惊天动地的只有‘和歌’”。天皇就会咏“和歌”,他能够调遣、使唤的千军万马就是“汉字”。

在祈求神灵保佑的队列中,天皇乘大轿,贵族乘马车,将军因为是护卫者,只能骑马。京都重新上演了一次平安时代的“纵向”大戏。一行人向祖先报告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祈求神灵保佑对外夷开战必胜。一队人马1863年3月11日前往加茂神社,4月11日前往石清水神社。原计划将军一同前往,但有谣传“浪士”将在途中暗杀将军,因此将军称病,当日没有随天皇前往。代理将军、也就是将军“后见”(监护人)一桥庆喜,在石清水神社门前即将举行授受“攘夷”的节刀仪式前,也称自己腹痛,离开了现场。

1863年5月10日是幕府向朝廷保证的最后攘夷期限日,在此前一天的5月9日,幕府突然向外国公使宣布封锁港口,同时,按照英国的要求,将10万英镑作为“生麦事件”的赔款赔付给了英国。5月17日,在江户湾中的法国军舰上,幕府代表与英、法公使之间展开谈判。日方提出要借用英、法军舰,只用于运送幕府军前往京都,出兵目的是镇压京都的“攘夷”分子[8],但被英、法拒绝。

5月23日晚,长州藩利用夜色,偷袭了停泊在下关海面上的美国商船。23日、26日,再次分别炮击了法国军舰、荷兰商船。5月底,1500多人的幕府军队在大阪登陆,而这些军队到达大阪后,既没有“攘夷”,也没有镇压“攘夷”派。6月1日、5日,美、法军舰先后向长州的军舰及炮台开火,长州两艘军舰被击沉,还有一艘被击伤,炮台被摧毁,火炮及炮弹都被法国陆战队员丢进了大海,他们仅有的家当即刻“赔”光了。

1863年7月2日,集结在鹿儿岛海域的英国军舰向萨摩藩炮台开火,由于台风的到来,自然力帮了萨摩藩一点忙,但萨摩藩炮台以及城内外都遭到英国军舰的猛烈炮击。萨摩藩立刻投降并答应开始谈判,英国舰队于7月4日撤返横滨。

1863年6月、7月,长州、萨摩先后与外夷直接交火,躲在一旁观看的幕府希望

自己成为最终赢家，强藩如果能打败外夷，他们就乘胜“收拾残局”；打不过，他们仍然可以“收拾残局”，让“外夷”与“强藩”相互消耗一下对幕府也无不利。可美、法对长州的报复性炮击，长州只有挨打的份，英国打萨摩也实际上仅仅进行了半天。

只有在京都的武士懵里懵懂，仍积极策动孝明天皇“亲征”，1863年8月13日天皇下诏“亲征攘夷”，而他本人的具体行动仍是去大和“行幸”，去神武天皇陵墓、春日神社参拜，接着准备去伊势神宫向祖先报告。外夷用的是真枪实弹，天皇用的是口中祝词，临到真要打仗时天皇开始不安，他知道仅仅到神社走一圈无法将“外夷”驱赶走，他坚持“亲征也是委任统治”。8月15日议论“亲征”，可两天后的8月17日深夜，萨摩及会津藩兵联合起来把守住进出皇宫的九个大门，此后召集朝廷会议，决定“延期攘夷”。19日早晨，主张并积极参与“攘夷”的三条实美等七个公卿，在长州藩兵的护送下，和平撤离京都前往长州，长州变成“攘夷”者的避难所。

围绕“攘夷”，幕府与“外样”强藩争“抬”天皇，天皇左右摇摆，可最终仍是倾向幕府。

强藩“撂”神舆 //////////

天皇委身于一方，必然会激怒相互争斗中的另外一方，而他仅仅是“神舆”中的一个物件。经过1863年7月的“萨英战争”，萨摩深知双方力量差距太大，可他们对强者鞠躬的同时，对幕府的攻势丝毫没有放缓。

11月1日，萨摩谈判代表同意向英国支付25000英镑，同时称自己没有钱，提出要幕府先垫付，这一要求立刻遭到幕府拒绝。萨摩藩代表大久保威胁道：如果幕府不垫付，他们将杀死英国的谈判代表。“生麦事件”已经闹出了大麻烦，倘若萨摩藩武士再杀英国谈判代表，幕府将更加难以应付，幕府决定立刻付钱“消灾”。在谈判桌上，萨摩藩还向英国人提出了一个让对方目瞪口呆的请求：购买英国军舰。英国人担心萨摩用从英国买来的军舰继续“攘夷”，可对方回答：将用于防备来自幕府的进攻。

1863年底，久光再次率领1500名藩兵前往京都，他向朝廷以及将军提出如下建议。(1)幕府权威日益低落，已经无法独自统治日本。(2)朝廷没钱、没兵，更无野心，当然也没有统治日本的能力。(3)因此要召集强藩会议。让天皇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实权则必须掌握在雄藩与幕府一起组成的联合政府中。

“外样”且是“攘夷”败将的他，发言当然无人理会，这次会议无果而终。随着1863年8月18日后天皇坚定地站在最强大的幕府一边，京都的形势再次发生了逆



被争相"抬"的孝明天皇

在幕府与强藩之间或明或暗的斗争中，本来被世人认为是"既无财力又没实权而且不受国民尊重的没有价值"的天皇成了争抢的陀螺。被两股势力争相抽打的孝明天皇，从最初的左右为难的尴尬者，最终成为被除掉的牺牲品。由此可见，他的地位的确似足利将军所说的那样，"没有天皇可以用木头雕一个，或者用铁铸造一个"。他仅仅是一个摆设。

转。此前这里是为幕府"制造麻烦"武士"为所欲为"的场所；此后则"攘夷"武士成为追捕对象，对幕府效忠的"新选组"到处捕杀"攘夷浪士"。

另一方面，就在长州向美国军舰开炮的前一日，长州藩武士伊藤博文等一行5人登上了英国船。虽然现在的史书中称他们前往英国是为了学习航海，了解英国情况，可从武士一贯的战争手法上来看，这五个长州武士行前从藩主那里拿到了每人1000两的金钱，这应是藩主"购买"他们生命的代价，他们去英国是准备在"敌后"制造混乱，他们已经做好了死在异乡的准备。离开日本后的头一站是上海，当他们看到停泊在上海港内的外国军舰时就想，仅这些军舰开往日本就会将日本彻底打败。加上后来在英国的所见所闻，更坚定了他们放弃充当"人柱"[9]的念头。据说他们1864年初从《泰晤士报》上看到英国准备进攻长州，井上和伊藤决定返回。1864年6月10日在横滨登陆后，他们立刻与英国使馆方面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充当说客，劝说长州藩主投降。英国方面派军舰专程送他们俩人到长州传递文书。当他们向藩主等说明对手如何强大、长州藩抵抗等于"鸡蛋碰石头"时，藩内最终决定通过他俩向英军要求推迟进攻。

1863年6月，美国、法国军舰单独短暂炮击都让长州吃到大苦头，这次将有"四国联合舰队"一起来讨伐长州，长州深知自己不是对手。长州藩主派他儿子和三条实美等前往京都，书面理由是"丑虏计划威胁京都，我们父子打算保卫京都"，而实际上却是希望借助朝廷以及幕府的力量，让自己免受"强虏"攻击。

此时京都朝廷只顾自保，根本不理会长州代表，京都城大门紧闭，长州代表甚至城都进不去。1864年7月15日，强行要进入京都抢夺天皇的长州藩兵与幕府派去保卫京都朝廷的军队之间爆发激战，虽然战斗仅进行了一天，但损失巨大，千年



古都立刻陷入火海之中，古都内28000多间民居被毁，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一直烧到7月18日。孝明天皇之子、也就是后来的明治天皇，当时年仅12岁，他被落入院内的炸弹震昏，这次战斗是三年后抢夺天皇的预演。而这次长州军人炮轰京都，正好成为幕府"征讨"长州的口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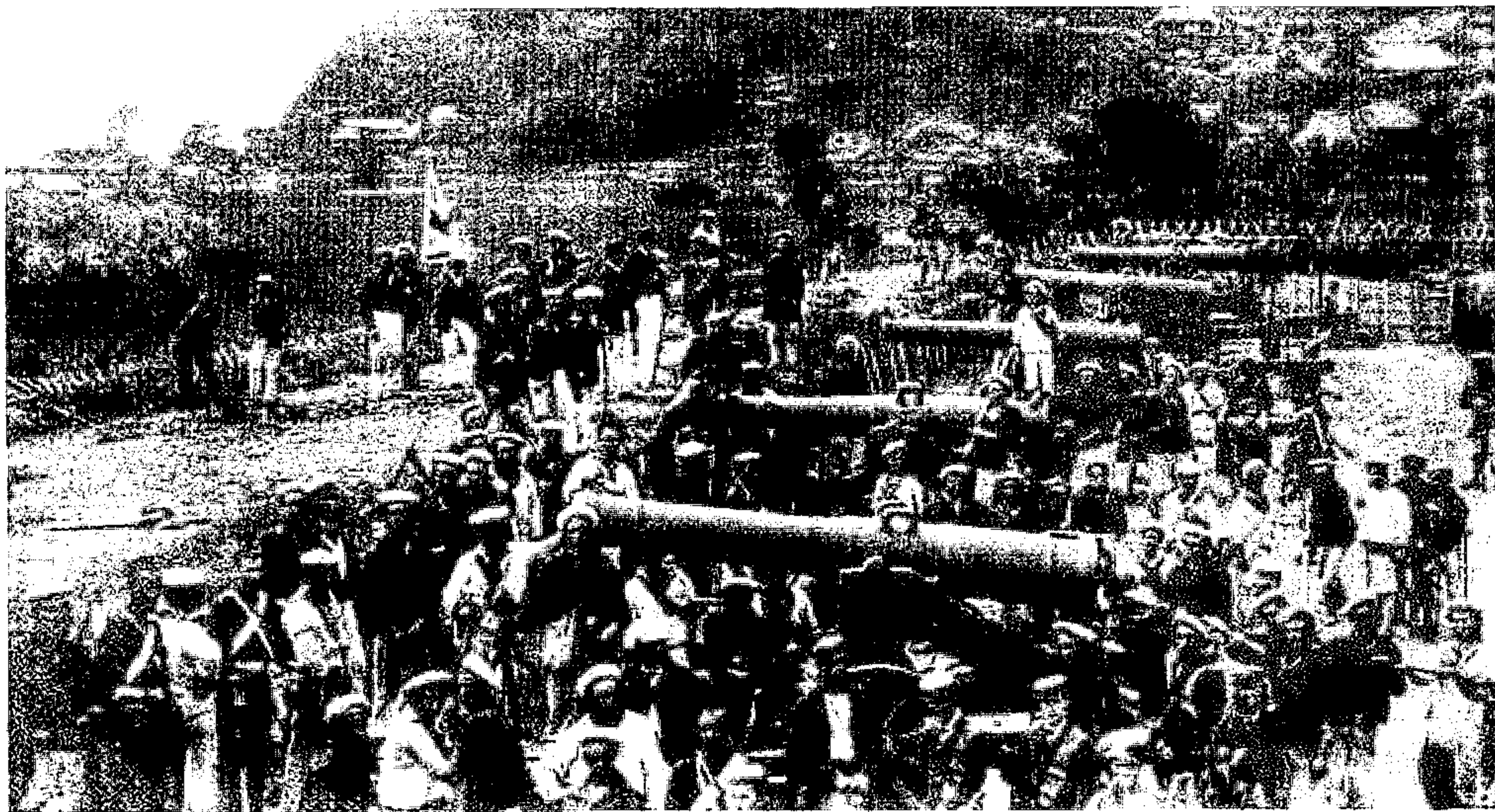
7月24日，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驶离横滨港。该舰队由17艘军舰，5000多名官兵组成。舰队驶离横滨港的三天之前，幕府宣布"讨伐"长州；而实际进攻则是在"四国舰队"结束对长州进攻的三个月之后。

从8月5日到8日，"四国联合舰队"沿着下关海峡，摧毁了沿岸的长州炮台，8日开始谈判，翻译是曾向长州传递信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长州藩谈判代表称：所有的攘夷活动都来自幕府命令，长州仅仅是忠实执行幕府命令。为了证明此言不假，还出示了三封幕府、朝廷的书面"攘夷命令"为证。

经过1863年7月的"萨英战争"及1864年8月的"四国联合舰队"炮击长州，战后的两次谈判，"萨、长"都异口同声地说："攘夷"是服从幕府命令，也就是说，对"外夷"发动战争非自己主动，而是被幕府逼迫，他们仅仅是"忠实"服从命令的武士，"外夷"认为幕府"诓骗"自己。以前"外夷"提出要开港，幕府以"国内反对势力强大"为由，要求延期，可在与幕府所说的"攘夷强藩"萨、长接触后发现，他们不但主动提

老照片——1864年"四国联合舰队"占领日本下关

长州之战之于日本的意义并非是丧权辱国，而是倒幕派拖垮德川幕府计划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通过这场战争，倒幕派成功地将幕府推上了战争的风口浪尖，并借用外夷之手，让幕府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为下一步的倒幕运动做好了充分准备。



出要让自己领地成为“通商口岸”，而且公然揭发“攘夷”是幕府命令。在他们看来，幕府强调的“反对势力”，实际上是幕府在背后指使，一切都是幕府组织的一场“演出”。“列强”因此认为幕府是“撒谎者”，口头说“和亲通商”，暗中拖延还不算，甚至还发布“攘夷命令”。他们向长州提出高达30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知道300万美金数额巨大，而提出这一要求的实际目的，是要迫使幕府同意开港。

萨摩、长州当初强烈要求“攘夷”，目的是要给幕府制造敌人。这与刚跟“外夷”交火就立刻投降一点都不矛盾。有强者支持自己“开港”，他们再也不要担心幕府干涉了。1858年萨、长竭力反对开港，是怕幕府独占开港之利，现在可借列强之力让自己藩国成为通商口岸，等于让以前自己私下、暗中开港公开、合法化。不少藩国觉得日本不久将再次进入“战国时代”，都在私下购买武器，囤积战争物资，这让西南强藩获利大增。最初积极推动幕府“锁国、攘夷”的是萨、长；现在“开国”、“亲外夷”还是萨、长。他们甚至摆出幕府不同意，他们就割据、分治的架势。

对于幕府来说，明知“强藩”在捣乱，可他们“有苦说不出”，幕府内有水户藩拖后腿；外有“外夷”与“强藩”联合。“强藩”想借“外夷”力量消耗幕府；而幕府实际上也想利用“列强”削弱“强藩”。幕府的态度是：既然你们要“攘夷”，那么你们就自己直接去跟他们打吧，可没想到两次战争萨、长刚打就投降，不但幕府期待的消耗目的没有达到，自己还被强藩“引火烧身”，“强藩”将幕府给“卖了”。依照日本的“纵向”体制，“下”必须是先要牺牲的对象，作为“忠”的一环，“下”一旦发现自己行动会危及“上”，应该主动“挺身而出”充当“人柱”，将所有责任揽下，甚至不惜“剖腹”为“上”顶罪。可两次战争之后，两个强藩立刻变成“海参”，把幕府当“内脏”抛给了“外夷”。长州之战后，外夷开出了天价“赔偿金”，让坚持一致对外的幕府反变成债主。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不得不向“外夷”及“藩国”同时表示一下态度。幕府要打“长州”给“外夷”看，对外表示自己要严惩“攘夷”派；对内镇压“制造麻烦分子”，恢复幕藩的“纵向秩序”。

可此时已非18世纪，萨、长再也不可能变成“四十七浪士”。家康最担心出现“下克上”，不准藩国有钱、严禁藩国与外来势力联合、禁止藩国之间、藩国与朝廷之间联合等，所有禁令都崩溃了。幕府面临要么“上克下”，要么“下克上”的选择。幕府组成了有30个藩国参加的“征长军”，定于1864年11月18日发动总攻击。表面积极追随幕府“征长”的萨摩藩，对幕府这次出兵继续玩弄“面从腹背”，明支持；暗拆台。西乡以“内战”让外夷得利为由，让长州藩的三个家老剖腹自杀承担责任，“第一次征长”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各怀鬼胎的萨长两藩

1864年底，英国驻日本前公使阿礼国回国，他在报告中指摘幕府“明里和亲，背地积极支持攘夷”，而萨、长藩与顽固的幕府不同。这一报告决定了继任驻日本公使巴夏礼对幕府政策发生改变。在中国，英、法曾经联合支持清政府，围剿太平天国。在日本的问题上，法国采用在中国实施过的方法，全力支持幕府；英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英国支持萨、长藩。

巴夏礼在长崎登陆后，1865年5月10日转道下关，与木户、井上馨见面，巴夏礼表示，如果幕府继续坚持锁国，英国将支持主张开国、与外国友好的地方大名。他向长州出示了准备向幕府提出的三项要求。

法国于1864年底开始支持幕府，向幕府提供了240万美元的军事贷款。在开国、开港的问题上，英、法意见是一致的，两者分歧在于对待幕府以及强藩的手法上。法国向将军建议，幕府若要维持下去，必须对地方反叛大名进行坚决镇压。法国主张建立中央政府的建议，后来都被明治新政府实施。

有了法国的支持，幕府决心“恢复秩序”。1865年正月，幕府任命了新的老中，幕府下令重新开始自1862年起延缓执行的参勤交替制度。[10]

1865年5月，将军家茂再次离开江户前往大阪，下令已经提出了“谢罪状”的长州藩主前来大阪，可藩主称病拒绝前往。对于长州挑战幕府权威的行为，将军只有出兵镇压一条路了。

1858年《安政条约》前，堀田到京都活动要求天皇出面拒绝签约，天皇遂向幕府提出不能让兵库开港的要求[11]，可后来《安政条约》突然签署，幕府对天皇的保证也随之作废。1858年的《安政条约》规定，自1863年1月1日起，应开放兵库、大阪为口岸。1860年“公武合体”时天皇重提以前要求，不希望“外夷”出现在京都边上，1862年，幕府派遣使节前往欧洲，要求推迟开放兵库、新潟及大阪、江户。列强同意延期到1868年1月1日，作为交换条件，幕府要降低进口税率。

1864年8月“四国联合舰队”进攻长州后，“列强”提出了30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四国代表”同时提出可以放弃三分之二的赔偿，作为交换条件，幕府必须接受四国的三条要求。第一，提前开放兵库港，第二，天皇批准“安政条约”，第三，进口税一律降低5%。[12]

因将军以及幕府中的主要首脑都在大阪，1865年9月16日，四国代表分乘军舰到达兵库海面，17日，巴夏礼向幕府提出了曾经出示给萨、长看过的上述三条要求，要求7天内答复，否则直接去京都找天皇，幕府方面要求延期到26日答复。

因300万美元数额巨大，幕府老中阿部正外与松前崇广已同意开放兵库，可此时幕府内部再次出现权力斗争。庆喜主张：没有经过天皇的许可必然会导致国内混乱，他主张如此重要条约必须要经天皇同意。接着他以朝廷命令形式，下令处罚“擅自同意开港”的两个老中。朝廷29日命令幕府高官剖腹自杀。

将军家茂10月1日称：如不批准条约，他将辞去将军职返回江户。

庆喜再出面挽留住准备打道回府的家茂将军，英国再次提出警告，10月4日在小御所召开了将军等一起参加的朝廷会议，主角依然是庆喜。庆喜要求朝廷批准条约，而幕府方面知道，如果将兵库开港问题提出，朝廷肯定不愿意批准，因此将这个问题搁置，只要求批准《安政条约》。会议从下午6时开始直到深夜依然没有结果，庆喜主张幕府有权决定一切，要天皇在幕府同意的条约上盖章许可，这仅仅是庆喜希望自己主宰幕府的手段。庆喜威胁朝廷道：“假如不批准条约，一旦外国向日本宣战，武家无力阻止，京都一带将立刻变成火海，别说皇室的安泰，就连伊势神宫也将化为灰烬，必须立刻同意”。天皇无兵，庆喜称不批准就无法保证安全，到了5日晚上8时，皇室终于发出批准条约的文书。

一切都是庆喜在唱主角，兵库开港问题暂时被搁置，但这个问题只是暂时被推迟到了1868年1月1日。

“公武合体”的谢幕 //////////

让藩国之间相互隔绝、猜疑并敌视，这是幕府保证自己独大的手段。1863年8月18日京都政变，幕府军在大阪按兵不动，善于察言观色的萨摩就已转向“追随幕府”，将长州驱逐出京都。长州因此痛恨萨摩并对萨摩船只开火。

在1864年11月幕府军第一次征讨长州时，幕府征长军参谋西乡“明打暗帮忙”。幕府军攻到长州，长州就立刻表示恭顺；可幕府军前脚撤离，长州的强硬派后脚就“武装政变”成功。这也是幕府不得不决定再次征讨长州的远因。得知幕府计划“第二次征长”后，萨摩藩一方面公开表示反对，同时暗中对长州藩提供实际支持。

萨、长利用德川家“自坏”，为幕府制造“外夷”对手，在幕府为如何收尾焦头烂额之时，萨、长两藩的武士一分钟也没有闲着，他们开始准备“武力倒幕”。长州藩决定购买西方的先进武器，萨摩藩立刻决定为长州购买武器及运输提供方便。



行动是最真实的语言，共同的敌人是幕府，双方彼此都心照不宣。1865 年夏，长州花费 92400 两银子，购买了米涅枪 4300 支，谷倍尔枪 3000 支，总共装了 31 辆大车。武器交由坂本龙马主持的“龟山社中”[13] 负责运输，大量军火被运入了长州藩，井上馨、伊藤博文等还亲自前往萨摩致谢。

1866 年正月 22 日，在京都的萨摩藩邸，萨摩藩代表小松带刀、西乡隆盛，在坂本龙马的见证下，与长州藩代表木户孝允签定了针对幕府的军事同盟条约。

萨长密约由六条主要内容构成。

(1) 一旦长州与幕府之间爆发战争，萨摩将立刻向京都增兵两千，与原来已经在京都的驻军会合，控制京都、大阪。

(2) 当战争朝有利于长州的方向发展时，萨摩立刻出面向朝廷斡旋，尽力解救长州。

(3) 即便战事对长州不利，在一年半载内长州也不会被彻底击溃，萨摩将在长州抵抗期间，尽各种努力帮助长州。

(4) 如果幕府与长州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萨摩将向朝廷呼吁，为长州申冤。

(5) 假如为长州藩所进行的努力受到了来自一桥、会津、桑名等藩国妨碍的话，萨摩藩将不惜与其决战

(6) 在长州冤罪被洗刷之时，双方齐心协力，为恢复皇国威信而努力。

就在签约的次日，不知是巧合还是幕府获得了消息，幕府宣布了对长州的处罚决定，削减长州的收入 10 万石，藩主父子禁闭反省。可宣布结果只停留在纸上，没有军队镇压作为保证，长州对这些通告根本不与理会。而从萨、长密约的内容上看，协约更似用文书对实际行动的确认，因为萨摩已在具体实施其中的(2)(3)(4)条款了。

幕府方面，1865 年 5 月开始吆喝“第二次征长”，可到了 1866 年 6 月 7 日才发兵进攻，其间经过了一年时间，开战 10 天后英国公使访问萨摩，公然表示对强藩的支持。好似战国时代，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兵力的多寡那样，幕府征讨长州，并不因为德川幕府兵力上占优势就能获胜。一方是已经被宣布削藩的长州；另一方是响应幕府号召临时组成的各藩混合军，胜败对双方来说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假如长州藩战败，上自领主下到武士，可能会到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步，自古以来“哀兵必胜”，长州背水一战，反而激发出无限斗志。相反，幕府联军一开始就没有斗志，会津藩士在进攻开始前写信给藩主报告情况说：“各藩兵都忙于购买回家的礼物，

根本没有战意。”他们只想早日结束战斗返乡，两军从士气到武器装备、战争爆发前的训练准备、对地理的了解差异等，都存在巨大差异，战果当然不言自明。

1853年以来，每次幕府转换战术，标志都是宣布领导人去世，这次也不例外。幕府军在前线吃了败仗，结果将军家茂于1866年7月20日死在了大阪城中，时年21岁，据说家茂是被毒死的。8月21日，庆喜以将军去世为由宣布休战，12月15日，庆喜被任命为新将军，10天之后孝明天皇死去。对于水户藩来说，二百年来希望本藩出一个将军的梦想终于成真，可等待新将军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一边是对德川家积压了200多年怨气的藩国，另一边是虎视眈眈的外夷，庆喜的将军位席不暇暖，一年后就黯然宣布退位，水户藩出身的将军最终成为了德川家天下的掘墓人，德川家内部“自坏”让强藩抓住了机会。

“公武合体”随着家茂将军和孝明天皇的双双辞世而宣告终结，内战终止，外夷那边也安静了，按理说新将军可以与藩国坐在一起共商大计了，何况一直以来强藩都支持庆喜。庆喜接任将军后踌躇满志，立刻制定了改革计划，甚至有人帮他草拟了宪法[13]，长州的木户甚至惊呼“家康又回来了”，家康再现意味着持续200多年的德川家幕府独大的地位继续持续下去，假如为了这一目的，强藩从一开始就会事事对幕府说“哈伊”，不会跟幕府唱反调。

1867年10月8日，萨摩、长州、安艺三藩的代表会聚，决定组成讨幕同盟。次日(9日)，大久保(利通)将此消息传达给了岩仓，倒幕武士要利用天皇命令“举兵”。岩仓找到中山忠能，他是年仅15岁的幼小天皇的外祖父。除了几个不惜牺牲也要坚决“变大”的公卿外，甚至天皇的摄政也不知道岩仓等策划的阴谋。

德川庆喜14日提出“大政奉还”；同一天岩仓等炮制出一纸假的天皇的“讨幕令”。拿到假“讨幕令”之后，萨摩的大久保、长州的广泽真臣即刻返回各自藩国，他们据此将藩兵带到京都。朝廷15日许可“大政奉还”，并向全国大名发出上京命令，准备召开“诸侯会议”，但是，全国260多个藩，直到12月9日政变发生时为止，到京都并准备参加会议的藩国只有10多个。

10月17日，将军宣布辞去职务。27日，皇室将他的辞呈退回，理由是重大事宜要等诸侯会议讨论，朝廷继续委托将军统治。将军“大政奉还”；皇室用“王政复古”回应，这些“名”上的往来应酬都是“虚”，战争才能决定最后的“实”。

1865年5月幕府老中下令萨摩藩出兵进攻长州，萨摩拒绝；这次不请自到，开会没人来，来的人是来打仗的。萨摩藩主茂久率领10000多名藩兵进入京都。长州也同样，以前将军多次下令要藩主前来，可藩主称病不出，这次家老率领2500藩兵进入大阪郊外的西宫，在京都一带，萨、长两军的兵力多达15000人。有了军队



作后盾，萨、长两藩这次要撇开将军，自己主持召开会议。12 月 9 日，早上将皇宫卫队全部换成萨、长军人，晚上在宫内召开“小御所会议”，与会者都在萨、长藩兵的严密“保护”下。

在“小御所会议”上，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反对把将军排除在会议之外，在会场外守侯的西乡递给中途休会出来的岩仓一把短刀，要他在山内表示坚决反对时将他刺死。后藤象二郎得知后急忙将容堂带离会场。结果“辞官纳地”作为天皇对庆喜的处分命令发表。

要求庆喜“变小”的毕竟只有萨、长两个藩，庆喜的回应是：既然要让皇室“变大”，那么每个藩都应该按比例将土地归还给朝廷。为了回避战争，庆喜三天后离开了京都二条城。萨、长武士，不将自己带来的赌本输光，是不会离开赌桌下台的，他们一方面邀请将军来京都开会，另一方面放话要在他来京都时刺杀他。这也是后来庆喜没有亲自率兵前往京都的原因之一。

“倒幕”与“佐幕”，已经不是通过对话可以谈妥的问题，萨长藩武士并不希望和平，和平对他们来说是“无机可乘”，只有战胜才有可能“变大”，战败了他们可以“一死了之”。

西乡在江户安排了“敌后别动队”，以相乐总三为总裁的浪士队，从 12 月开始在将军的老巢杀人越货，12 月 23 日早晨，江户城的外城被人放火烧毁，传说是萨摩藩找人干的，25 日早晨，幕府军队包围了萨摩藩邸，放火将其烧毁。

1868 年 1 月 3 日，大久保致信岩仓，要求立刻开战。也就是说，争论的结果必须由战争划上句号。假如当初将军也认识到退让只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的话，他早就应该放弃争论与退让，用战争来决定一切。“大政奉还”前倒幕派手中的牌仅仅是暗杀。庆喜“大政奉还”退让，萨、长武士的回应是“伪造天皇命令带兵进京”，“倒幕派”继续增加赌博筹码。

德川庆喜在 1868 年 1 月 1 日向驻扎在大阪的幕府军队发出命令，要他们前往京都扫荡萨、长军。就在大久保提出上述意见书的同一天，1 月 3 日下午五时，鸟羽、伏见之战终于打响了。要求进入京都的幕府军与事先守侯在此的萨、长军队冲突，鸟羽、伏见是进入京都的必经之路，幕府军要前进，倒幕军阻挠，一场混战从此开始，幕府军有 15000 人，而倒幕军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一，5000 人，倒幕军高举谁也不认识的“锦旗”[14]，谎称自己是获得天皇批准的“正义之师”，一边痛击幕府军，一边用“误会”来瓦解幕府军斗志，4 日凌晨时幕府军退却。

前方在战斗，朝廷内部也在进行逃跑的准备。天皇的凤辇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幕府军战胜，那么强藩将把天皇转移，显然，这是准备与幕府分治对抗。除了大

的凤辇用于吸引目标之外，还有小轿，天皇将身着女装，逃向山阴方面。[15]

"鸟羽、伏见之战"后，在京都的各路诸侯要求双方避免接触，回避内战。1月6日，将军借着夜幕，登上了幕府军舰，离开大阪城返回了江户。将军前脚撤离大阪；萨、长武士后脚跟进并以"新政府"名义发号施令。

1月7日，新政府在"追讨庆喜令"中称：庆喜是"朝廷敌人"，所有支持幕府者必将遭到"严惩"。10日宣布剥夺德川庆喜、会津、桑名以及27个藩主的官位。同时要求其他藩国要向朝廷提交"勤王宣誓"，获得了他们的宣誓之后，再于11日命令他们率兵前往京都。14日，向全国宣布所有德川领地都归朝廷所有，当年的贡税减半，上一年度尚未交纳的也同样。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东征军大总督。

明治维新中的鸟羽、伏见之战

反德川家幕府者用家康的手段对付他的子孙。只要能打败对手，一切都可以不择手段。假锦旗，将突然袭击说成是"误会"，为瓦解对方战斗意志，故意散布"避免让外夷渔利"的谎言而让幕府军退兵等等，而自己则在缓过劲来之后发起新一轮的猛攻。这些作战手法，在此后的日本对外战争中不断被复制。





天皇被“抬”出

“鸟羽、伏见之战”后，将军召见外国人使节时称：自己是合法政府，而萨、长藩是发动政变的叛乱军。1月3日他警告外国人，不得向叛乱方提供军火。1月6日再发通告，要求兵库、大阪居留地内的外国人要自我保护。[16]

倒幕派1月9日任命了嘉彰亲王为外国事务总裁以及外国事务官，虽然皇室成员是事务官，而背后的操纵者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1868年1月11日，接受新政府命令负责执行西宫地区警备任务的备前藩藩兵2000人在途经神户时，前方有外国人走过，军人向外国人开火并追杀入外国人居留地，后与守卫外国公使馆的英、法、美的外国卫队交火，外国使馆紧急下令让海军陆战队登陆，扣留5艘日本船只并要求日本方面对此表态。

这次袭击外国人的规模以及激烈程度都超过1862年“生麦事件”，当时萨摩藩武士造成一死两伤，幕府后来的态度是推委。然而这次则完全不一样，“新政府”立刻派遣使节向英国公使说明情况，决定派遣特使并持天皇命令，接受外国人提出的所有条件。1月15日天皇特使亲往神户，他携带的天皇敕书中，特别强调天皇亲自裁决内外事务，天皇保证履行所有对外条约，对袭击外国人事件表示道歉并对此事件完全负责，将对外条约条文中的外交主体，由原来的“大君”（将军）改为天皇。

天皇敕书中签署的日期是1月10日，而事件发生于该文件签署的次日1月11日，特使1月15日才携带此文书见外国代表。据说是伊藤博文发现了签署时间有误。经他提醒，一新政府遂将签署的1月10日改为事件发生之后的1月13日。

先动武后赔礼，这是日本武士经常使用的一种“积极推动手段”。1891年日本警察刀砍沙俄皇太子，1895年有人持枪袭击李鸿章，1964年年轻刺客刀捅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都是同样套路，最后将袭击者定义为“疯汉”，袭击发生之后日本上自政府下到一般百姓，全体“谴责”过错，用安慰、道歉表示“诚意”。日本喜欢用“整体好个别坏”[17]来与外部集团打交道，用“快速反应”来表示“上”完全有能力压制“下”，一切尽在掌控当中，与这样的“强势”保持交往才有广阔前景。

1月25日，在英国公使巴夏礼的斡旋下，英、美、法、荷、德、意等六国组成的外交团体宣布保持中立，“外夷”不认可幕府指责的“新政府”为“叛乱军”，将双方看成是“交战团体”，庆喜领导的幕府失去了合法政府地位。根据这一决定，原本应该交付幕府使用的军舰也没有交给幕府方，这无疑帮了“倒幕派”一个大忙。



2月14日，为了向外国表明天皇政权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外国事务总督会见外国驻日使节，要求外国使节亲自前往京都会见天皇，法国公使拒绝。但不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与法国公使拒绝有关，次日再次发生了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而且对象是法国人。

2月15日，土佐藩兵袭击了在大阪湾一带进行海岸线测量的法国士兵，法国军人11死5伤。法国公使对此异常愤怒，要求严惩土佐藩责任人并要求赔偿15万美元。其他一些国家的使节也因此将会见天皇行程推迟。这似乎又是一次考验新政府如何应对对外危机的机会，新政府反应神速且态度果断，表明将无条件满足法国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2月22日，宣布对20名土佐藩士执行死刑，法国大校亲临刑场观察"剖腹"执行情况，但因场面过于血腥，法国大校在执行到第11人时要求中止。外交代表以及土佐藩主亲自前往法国公使处，道歉的同时将赔偿金交给了法国公使。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向"外夷"表明天皇政府的对外友好，将彻底杜绝排外主义并以强有力的严惩作为保证。

新政府的"良好表现"让外国使节不再有理由拒绝前往京都会见天皇，2月30日，法国、荷兰两国公使前往京都拜会天皇，这也是天皇第一次与外国人见面。法国公使第一个被引见，为了表示与将军之不同，一切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天皇左右有人手捧神器，朝廷的三条、岩仓、中山忠能等高官在两旁侍立。公使在新任命的外国事务官的带领下，穿过宫门，这时乐队开始奏乐。公使前行后见到日本天皇。

天皇下问："贵国皇帝身体健康吗？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从今天开始，希望两国邦交日益亲睦，永远不变。"安排第一个接见法国公使，大概也是考虑到刚刚发生的事件吧。

法国公使回答：这是贵国与各国至诚相交的头一天，请允许我代表我国皇帝，祈愿陛下以及贵国幸福与繁荣。

接见完毕，法国公使退下。

接着是荷兰公使，问答也大致相同。

而另外一个准备拜见天皇的英国公使，在从下榻地点前往皇宫的途中，再次遭遇两名"暴汉"的袭击，有10名卫兵负伤。英国公使带两名秘书，50名英国骑兵，日本有肥后藩兵300多人护卫。不但京都本地人来看热闹，大阪、奈良、神户等地的人也赶来看热闹，以至造成交通拥堵。大队人马行进时，从路边突然跳出两个武士摸样的人，向队列前面的护卫骑兵挥刀乱砍，而这似乎给了日本的护卫武士一个机会。萨摩武士中井弘、土佐藩士后藤象二郎恰好就在边上，他们今天的工作是担当英国公使的入宫向导。他俩杀向两个刺客，最终将一名刺客的首级砍下，送给巴夏礼过目，还有一个被生擒。护卫藩兵似乎接到了命令一般，在旁边发呆观望，将



机会让给了前两个日本武士。该事件导致当日会见无法进行，改到3月3日，据说是应巴夏礼的要求，另外一个生擒武士也被处死。

3月3日，英国公使拜见了天皇，同日再叫法国、荷兰公使前来，会见仪式结束后还对今后事宜交换了意见。

新政府接受了英国方面提出的严惩伤害外国人者的要求，3月4日再次公布《五条誓文》，包括天皇在内的公卿、诸侯等，对神发誓，保证遵守《五条誓文》中的对外方针：宣扬国威，开国和亲。

《五条誓文》是向内外表示政府的决心，而此后公布的《五榜揭示》，则是对内的要求。其中的第四款专门涉及对外问题：依据万国公法，禁止伤害外国人生命。

曾经积极主张"攘夷"的武士，在夺得政权之后，立刻来了一个大转变，一反以往"锁国攘夷"的态度，要开国和亲，或者说要推行以往自己坚决反对的政策。

"倒幕派"一要通过袭击外国人事件创造与外国代表接触的契机；还要向外夷表现出自己与幕府截然不同的反应。倒幕派要表现出自己的效率以及诚意。立刻向外夷赔礼、表示接受外夷提出的一切要求，还保证今后一定履行条约，保证外国人的安全。

如果以上行为是新政府有意安排的演出，制造的阴谋的话，那么这几个"牺牲打"对新政府被外国人承认问题上显得相当重要。

皇室"独大"

德川家康的防御手段，最大特点就是保证自己在财富上"独大"，财富多到所有对手联合起来也无法超越，这时不愁找不到人为自己打仗，对手看到德川家强大也自然会放弃挑战。对德川家等级社会深恶痛绝的福泽谕吉都认为：有钱不但可以买到武士为自己打仗，还可以收买文人充当吹鼓手。[18]

1881年10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罢免大隈重信的参议职务，12日天皇颁布诏书，宣布将于1890年召集国会。反对派认为"挟天子令诸侯"是封建残余，希望借助西方的宪法，彻底革除日本具有千百年历史传统的"抬"、"架空"这一傀儡政治，可藩阀在多方比较之后发现，西方存在既可以堵住反对派嘴巴，又方便自己继续"架空"天皇的宪法[19]。

1882年3月，伊藤博文前往欧洲考察宪政，历时一年多。出发前一个月，1882年2月，岩仓具视提出"扩大皇室财产"建议。目的在于"皇室岁入足以支付官吏薪俸和陆海军费"，"保证皇权不受国会、政党牵制"。

1882年，天皇所有的土地仅为1110町步，到了1886年，立刻膨胀为3.1574万

町步，增长了30倍，到了1889年宪法颁布之前达到112.9048万町步。

除了土地，1882年底到1883年初，日本政府将自己在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日本邮船公司占总股数50%的官股，市值860万日元的财产转移到天皇名下[20]。天皇瞬间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财富占有者。天皇家的财富渗透入所有重要领域，任何人想发小财，首先必须让天皇家发大财。相反，不成为追随者，就先断你财路。日本的统治方式，至今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天皇名下拥有大量财产，而这些财产实际上又由“辅弼天皇的官僚”藩阀所控制，天皇家成为明治时代的德川家，而藩阀则成为明治时代的“老中”，军队、财政、人事等大权都在藩阀手中，他们以天皇臣子名义发号施令，追随者赏，反对者罚。

1885年，伊藤博文废除“太政官”制度，创设内阁制，“总理大臣”为各大臣的总管；“首相”意为各省之相中的首席，内阁直属天皇。宫内事务也是皇室事务，它从国务中独立出去，宫内设“内大臣”一职，三条实美成为首任内大臣。天皇名义上权力更大了，可他必须要在内阁的“辅弼”之下参与国务，首届首相是伊藤博文。“藩阀”称自己是天皇的“屏藩”，通俗地说，就是阻隔天皇与他人接触的人墙。“抬”神舆的队伍拒绝“外人”加入。

日语中有一个“つんぼさじき”的词，“つんぼ”是“聋子”之义，“さじき”指江户时代的戏院中距离舞台最远的观众席。在“聋子席位”上看戏，只能看到周围观众的反应，但无法知道舞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悲欢，该词最常用的形态是作为被动态使用，当说“你被搁置在‘聋子席位’上”时，就是指“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知，仅仅是一个无法看到真实的旁观者”。藩阀对付明治天皇的手法，就是将他放在“聋子席位”上。

一般人无法见到天皇还不算，即便能见到天皇，谈话时间、内容都必须经过安插在天皇身边的侍从审查，待他们了解了来者的目的、要求之后，经他们许可，访问者才能与天皇见面。由于见面访问时间被严格控制，天皇很难在短时间内了解外界发生的复杂情况，即便知道，他的意见也要通过身边的“传声筒”过滤，藩阀对明治天皇封锁消息，藩阀想让天皇知道什么他才有可能知道什么，不想让他知道，他则无法知道。天皇会见来访者时，总有侍从在旁边“侍立”。

松方正义出身于萨摩藩，曾两次组成松方内阁，既是公爵又是元老，属于明治天皇身边的“侧近”高官，可每次他遇到明治天皇时，无论明治天皇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以“我回去后认真考虑再回答”作答。一次明治天皇问：“你有几个孩子？”松方回答：“我考虑考虑再回答。”[21]

[1] ″小名″是小领主，″大名″是大领主。

[2] ″大物″（おおもの）是日语，翻译成中文为：大人物、重要人物。

[3] 人们忽视了为皇室支招的岩仓，不知他的提议是否是因为收受了萨摩的贿赂。

[4] 明治天皇死去时，长州出身的乃木将军为明治天皇剖腹自杀殉死，对他殉死之原因，另外一种说法是说他不满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架空”天皇，他们表面说“忠”，而实际上将明治天皇禁闭在深宫之中，加上两个儿子在日俄战争中死去，因此他也要“死谏”，告诉世人，他才是真“忠”。

[5] ″自作自演″（じさくじえん）是一个日语词，表示自己制造事端，比如自己点火烧自己家，然后栽赃到一个事先已经计划好的人头上。“自作”是为自己此后的“自演”，也就是行动制造借口。无论是东京的奥姆真理教，还是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天津的驻屯军，都会自己制造事端，然后以该事件为借口行动。近代史上所有事件，都可以在“一新”中找到榜样。

[6] “一新”后的历史记载中，只宣传伊藤博文等是“现实主义者”，看到“外夷强大”，深知“夷不可攘”，只字不提幕府方面同样是“现实主义者”。幕府看到对手强大，因此才放弃“攘夷”与“诓骗”，开始“鞠躬、说敬语”。而长州方面不赞成“攘夷”，支持幕府“开国”的藩士反被刺杀。

[7] 许多武士行动前，为了避免给本藩惹上麻烦，先宣布“脱藩”当“浪士”，背后支持者看形势决定自己如何出牌。对方强硬，支持者就说“与己无关”，对方软弱，支持者就高调宣传。

[8] 有一艺妓曾向幕府建议，让幕府军人以慰问为名混上“外夷”军舰，然后乘机抢夺并占领军舰。

[9] 武士中的“自杀式袭击者”。武士从领主那获得“恩给”，回报是“献出生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奋勇杀敌死；另一种是不给领主“添麻烦”死，后者为自己承担责任，先宣布脱藩，或事后自己承担责任“自杀”。无论哪种牺牲，如果无人见证就是“犬死”，要人见证的目的是：据此向领主索要“赏金”。

[10] 以前久光曾以“参勤交替制度”加重了藩国负担，为准备攘夷，藩国要恢复财力为由，建议取消。这次幕府提出恢复表明：幕府要继续将藩国牢牢地控制住。

[11] 神户距离京都很近，皇室生怕外夷在自己身边出现，同时还提出要幕府派兵保护京都，以防外夷闯入。

[12] 长州武士向英国建议，要四国一定要在开放兵库问题上对幕府施压；同时又向朝廷出招：绝对不能同意幕府开放兵库的请求。

[13] ″海援队″的前身，表面上是独立商社，可实际是由萨摩藩支持。

[14] 一新政府后来推行的政治，都是依据庆喜描绘的蓝图实施的。

[15] 实际上这是倒幕军在战争前私下自己制作的。

[16] 日本是这样的国家，同一件事可以用相矛盾的表述。比如说“保护”，它的另一面就是“监视”。1931年东北“九·一八”之后，溥仪收到日本友人送来的鲜花和水果篮，可里面藏的却是手榴弹。日本人要“偷运”他去东北，可在他乘坐的汽艇上暗藏了几大桶汽油，准备万一事件败露时，将汽油桶点燃。对他的保护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日方“保护者”说要护送他去日本，可最后的结果却是将他转交给了苏联。平源之战，南北朝时代，都出现过抢夺天皇、抢夺神器的战争，江户末期也不例外。

[17] 参考芝原拓自著《世界史中的明治维新》 岩波新书 第69—70页。

[18] 1941年12月对美宣战，当时东条坏吉田茂好；对中国，1958年岸信介坏石桥湛山、松村谦三好。这时是“大坏小好”。

[19] 他的确可以说是启蒙思想家，因为他的上述言论比1951年吉田茂雇请美军保卫日本早100年。

[20] 详细参照第六章。

[21] 渡边几治郎著《辅弼明治天皇的人们》千仓出版社 第241页。

第六章 先天不足的“立宪政治”



三个人的国会大厦

日语中的“永田町”，相当于中国的“中南海”，英国的“唐宁街”。人们习惯用各自国家政治首脑的办公地，替代称谓各国的政治。日本的国会大厦、议员会馆、首相官邸，都集中在东京的千代田区永田町一带，因此，永田町成为了“政治中心”的代名词。

日本现在的首都是“东京”，之前是德川家设立幕府的所在地，名“江户”。“一新”前，历代天皇都一直居住在“京都”，“一新”后，萨、长藩武士们“挟天子令诸侯”，他们要求天皇从“京都”迁往“江户”，相对“京都”而言，新“京城”位于“京都”之东，遂将“江户”改名为“东京”。

1920年开始，日本政府在东京的永田町修建国会大厦，16年后的1936年竣工。国会大厦是当时日本最高的西式建筑。该建筑呈“山”字形，中间最高，达九层，两边对称的两个尖顶四层。国会大厦的中央大厅呈正方形，四个角落各有一个台座，台座对称；可台座上面的人物不对称。四个台座，只有三个上面有铜像，还有一个台座上面是空的。三个台座上的铜塑人物分别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据国会内的工作人员解释，之所以一个台座空着是因为，对于究竟应该将明治时代的哪个政治家作为宪政奠基人摆放到台座上，日本人内部存在争议，最后只好为三位争议不大人物塑像。

日本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设了国会，国会大厦于1936年（昭和十一年）建成，此时的日本，别说国会，就连政府也已成为军部的傀儡，国会大厦自建成后开始使用，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一直都只是一个摆设。国会大厦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是在日本新宪法颁布之后。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上述三个人物推动了日本的立宪以及开设国会，明治时代的理想直到昭和时代都是空壳建筑，新宪法颁布之后，君主立宪以及该国会大厦才在美国人手中真正得以"名副其实"。

三个人物同处一个空间、在一个平面上各自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偶然的建筑布局恰恰反映了他们生前的状况。明治时代，围绕制定明治宪法、开设国会，这三个人物在国会内外一直都是冤家对头，互成倚角；可一遇到对外问题，相互对立的三个人物可以立刻联合，形成铁的三角同盟。明治时代的"对外帝国主义"政策，正是以上述三个人物为中心展开的。

三个人物分别出身于不同的藩国，不同出自决定了他们在新政府中的不同地位。天皇主要是被萨、长藩出身的武士"抬"起来的，这些人要成为天皇的"屏藩"，"架空"天皇的同时，不准许他人接近天皇，"挟天子令诸侯"就是要将其他人排除在圈子之外，反对派不甘心仅仅成为旁观的看客，他们不断向萨、长藩阀挑战，他们的目标是：即便他们自己一时无法直接"抬"，天皇，至少也要对谁能"抬"，何时、如何"抬"天皇制定出一个规则。"被架空"的明治天皇也希望与反对派携手，压制藩阀专权。日本的国会及宪法，就是在这种对立斗争中产生的。

板垣、大隈、伊藤，作为无言的塑像时，在国会大厦内仅是相互对视，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可在明治时代，他们俩是被伊藤玩弄于掌股之上的"小"和"外"，他们俩主张立宪并且反对藩阀，是在他们被藩阀清除出政府之后，也就是说，他们与伊藤为首的藩阀斗，不是为民争利，而是为己争利。他们寄希望于"立宪"，想通过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加入到"抬"天皇的队列中去，没想到伊藤可以让宪法变成有名无实的空壳，在这种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用维护天皇专权的方式，反对藩阀专权，"架空"天皇。

为了维护"藩阀专制"，藩阀用制造外来危机的方法避开反对派的锋芒。在执政者制造的民族危机面前，"一起干才是日本人"的思维，变成了反对派的枷锁，藩阀抓住了他们不反对对外发动战争的弱点，每次日本国内出现权力斗争，他们就制造外来危机，而此时反藩阀派一定是将自己扮演成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家，积极参与并"同流合污"。反对派与藩阀的分分合合，最终将日本变成了"强盗国家"，"文明开化"结出了掠夺侵略的恶果。他们将整个国家带入战争的深渊，但没有看到日本最终彻底失败的悲惨结局。他们的塑像至今仍能够存在于日本国会大厦内



本身说明，他们的阴魂在这栋建筑中依然不散，换言之，当今日本政治家中依然有他们的基因。当代政治中出现的各种病状，都可以从这三个人物身上找到病根。

藩阀与反对派

“明治六年政变”与板垣退助

1871年7月14日，西乡等通过“政变”完成了“废藩置县”，废藩置县后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正院”，由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参议西乡（萨摩）、木户（长州）、板垣（土佐）、大隈（肥前）六人组成，这是“萨、长、土、肥”的联合政权。

1871年11月12日，“修约使节团”出行，代表团临行前与留守政府之间进行了12项约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1）重大决策及实施都必须等代表团回来后协商决定；（2）不能有重大人事变动。

西乡不理睬上述约定，“使节团”一出国，他就对人事进行了重大调整。增选了后藤象二郎（土）、大木乔任（肥前）、江藤新平（肥前）、副岛种臣（肥前）等四人为参议。

1873年9月13日岩仓等回国，他对重大人事变动以及由他们作出的决定不满，在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左大臣三条因担忧过度精神错乱。右大臣岩仓否决了西乡提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西乡（萨）、板垣（土）、后藤（土）、副岛（肥）、江藤（肥）等参议辞职离开政府，留守政府中只有原参议大隈一人仍留在政府中。围绕是否出兵朝鲜而导致的新政府内部的“政争”，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1874年1月，板垣与其他三个前参议（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一起共八人，向政府提议设立“民选议院”，理由是：“当今的政权，上无皇室，下无人民，只有‘有司’专权。”“有司”指以国家、天皇名义发号施令的藩阀官僚，下野之前，这些人也曾是“有司”中的一员，现在他们离开了政府，突然间想起了“人民”与“民权”，他们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反对那些把持政府的人。

江藤签署“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后就返回了佐贺，他接着成为了反对明治政府的武装叛乱的领导人。暴动后被镇压，江藤被杀。1874年1月，板垣退助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政党，该政党名为“爱国公党”，意指藩阀政府是“朋党”“私党”。

在岩仓率领“修约使节团”出访欧美期间，土佐藩藩士武市熊吉曾在1873年被派往中国东北、朝鲜，侦察两国情况，为日后日本出兵作准备。可出兵计划后因

岩仓具视等人反对而流产，无法出兵意味着他无法立功。岩仓因"一新"中"立功"而在新政府中获得高官地位，现在他阻止他人立功则造成武市等人的不满，武市熊吉决定刺杀岩仓具视。1874年1月14日晚9时多，岩仓从皇宫中饭后返家，途中遇到埋伏守候的武市熊吉等9人的袭击，岩仓利用夜幕跳进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武市熊吉因与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同属土佐藩，岩仓因此怀疑板垣是幕后指使者，板垣不得不解散"爱国公党"返乡，在土佐，他另外组建"立志社"。

1875年1月，由已经成为商人的井上馨出面，召集了"大阪会议"，木户、板垣、后藤等下野者都被召集参加，会后，木户[1]与板垣恢复了参议职务。

1875年9月20日，日本"云扬舰"闯入朝鲜水域，日本挑起事端，制造了"江华岛事件"。两年前主张过"征韩"的板垣，看到政府再次回到了自己原来主张的路线上，此时要求严惩朝鲜。

"明治十四年政变"与大隈重信 //////////

1877年，西乡领导了针对新政府的"西南战争"，后兵败自杀，木户也于同年死去，1878年大久保被刺杀，至此，一新政府中的"三杰"先后辞世。"肥前"出身的大隈开始向"萨、长藩阀"挑战。

大隈重信（1838-1922）是被"萨、长藩阀"清除出政府的最后一个重要人物，也是"萨、长、土、肥"联合政府自他终结的标志人物。大隈与江藤同藩，1874年，江藤欲用武力挑战"萨、长藩阀"政府，此时大隈没有参加，他站在了"萨、长"一边；1877年西乡领导了"西南战争"，大隈依然主张严厉镇压。

1879年12月开始，新政府宣布开始调查，准备立宪。一年之后，政府以"立宪为时过早，希望时机成熟后再考虑"为由，终止了该计划。

1881年3月，大隈在有栖川宫的鼓励下，提交了他的"立宪方案"。大隈提议采用英国式"君主立宪"，在1882年底选出议员，1883年召集国会。这是继1877年西乡领导的"武装"挑战以来，对新政府发动的又一次制度挑战。

大隈叮嘱有栖川宫将制宪密奏直接交给明治天皇，有栖川宫将它透露给了"亲皇室"的岩仓。伊藤博文得知此事之后，6月27日，他通过太政官三条实美，"借阅"了已经转交给天皇的大隈建议。然后于7月1日、2日，分别给三条、岩仓写信，信中主张："急进论太意外，伊藤无法苟同"。这封以"辞职书"为名的信，实际上是要岩仓等表态，究竟选择"大隈"还是"萨、长"。他在信中同时要求天皇表明态度。

1881年7月，藩阀政府内又发生了贱卖国有资产给私人的丑闻。

北海道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2]，通过太政官向天皇提交了一个申请，要求将北

海道的国有资产处理给私人。在此之前的10年间，政府向北海道共投入1400万元的巨资，建设了铁路、矿山、工厂等，而在黑田的申请报告中，计划以38万元的价格，免息并分30年还清的"优惠"条件，将其转让给商人五代友厚[3]。围绕是否应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转让，有栖川宫与大隈坚决反对。黑田原计划与大隈等随天皇外出巡行，黑田以天皇不同意他就不随行要挟，明治天皇最终在出发前同意(7月30日)。接着，黑田以该申请已获天皇认可为由，8月1日发布正式公告。

外界得知这一"贱卖"后，立刻开始谴责"萨、长"。以这次先威逼天皇表态，然后再利用天皇权威压制反对意见的事件为契机，日本朝野上下爆发了针对"萨、长藩阀政府"的猛烈抨击。这次全国性的反对运动，被认为是大隈与福泽谕吉、后藤象二郎、板垣等反藩阀的民权运动家联合的结果。

1881年11月11日，明治天皇及有栖川宫左大臣，大隈、大木、黑田三位参议、松方内务卿、大山(岩)陆军卿等总共1000多人，刚刚结束了72天的东北、北海道巡行回到东京。

此前岩仓在京都养病，藩阀人物要求他同意将大隈清除。他虽没有正面回应，但他以迎接天皇返京为由返回东京，10月5日与伊藤博文会面后，知道藩阀们已下定决心要清除大隈，此后他突然转变态度，转向完全追随藩阀。

天皇回到东京当日，就参加了藩阀们在深夜召集的"御前会议"。岩仓在会上提议将大隈清除出政府，理由是他在搞阴谋。明治天皇问："诸卿称大隈在搞阴谋，他身为参议，他搞阴谋非同小可，不知有什么证据？"以能言善辩闻名的岩仓顿时语塞，可他立刻转过神来说："说到证据，这可是件复杂的事情，不过请相信萨、长说的话，让他们来处理这件事。现在批评大隈的人不止萨、长，还有要求'中道政治'的佐佐木高行[4]，大家都这么认为。"

天皇沉默了一阵后说："你们都这么说，那么将大隈免除也属不得已，可他也是身居要职的参议，你们谁去向他宣布呢？"

伊藤立刻自告奋勇地答道："我去。"

深夜1时，他与西乡从道急驰大隈家，向他宣布大隈缺席的会议结果。

大隈同意辞职，但是一定要亲自向天皇递交辞呈。次日他去皇宫递交辞呈，可皇宫门口被士兵严守，根本不放他进入。[5]他接着再去有栖川宫府邸，同样吃了一个闭门羹。

御前会议同时讨论了开拓使问题。

天皇问参议黑田："开拓使问题如何打算？"

黑田回答："只要决定了免除大隈的职务，开拓使问题随便怎么决定都可以。"

天皇说:“这是什么意思?免除大隈职务与开拓使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岩仓抢过话题回答说:“这是黑田说话有误,黑田的意思是,开拓使的问题完全由圣上决定。”[6]

也就是说,大隈问题天皇必须听藩阀的;而开拓使问题藩阀可以听天皇的。

这一天,东京进入了戒严体制,军警均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政府发布了天皇签署的告示:“九年后的明治二十三年开设国会”,同时还发布了罢免大隈职务的政府公告。几天之后,与大隈有关的政府官员也相继被清除。尽管大隈在返回东京之前已经获得消息,岩仓、伊藤等藩阀人物准备对他开刀,而大隈寄希望于天皇出面干预,但是最后结果表明,一切都按照藩阀的计划实现了。

大隈晚年在回忆录中称:“因为我们思想上准备不足,没想到局势变化那么快,一切犹如山顶上滚下巨石。我们最大的失误在于:认为民心在我们一方,低估了萨、长,低估了军人。”

11 月 12 日政府发表另一公告:终止将北海道国有资产出售给私人。

板垣 9 月离开自己故乡土佐,一路参加集会,宣传“民权”,10 月组建“立宪自由党”并出任总裁,就在他进京途中遇到了“明治十四年政变”。1882 年 4 月 6 日,板垣遭到一个日本青年的袭击,当时他胸中两刀。板垣伤愈后,经不住后藤象二郎的多次劝说而决定出国游历。他的出国经费实际上来自藩阀人物井上馨,井上以延长三井作为陆军省指定军火代理商三年为条件,让三井出资两万美元给板垣出国,而他领导的“自由党”也从此分裂。

1882 年 3 月,大隈组建了以他为总理的“立宪改进党”。虽然都主张“民权”,但两个政党从成立之初就存在方针政策、参与人员、背后支持者的不同。大隈领导的政党,背后支持者是三菱财阀,参与者多是被藩阀清除出政府、希望有朝一日重返政府的前政府官员。

一新之后,萨、长藩阀为了标榜“公议政治”,将大隈、板垣等作为点缀拉入政府,明治 6 年与 14 年,日本国内政坛爆发两次政变,每次都有一个人物被赶出藩阀政府,而每次政变之后都必然伴随一次对外扩张侵略的高潮。1882 年朝鲜爆发“壬午政变”,岩仓具视将此视为怀柔大隈与板垣的大好时机。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反对派与藩阀之间再次和解。

1884 年 9 月 9 日,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以及自由党干事小林樟雄等访问了法国驻日本大使,他们以帮助法国另辟中国北方战场为由,希望法国向他们借款 100 万美元,用以支持朝鲜的“独立”。[7] 在法国的历史档案中有 9 月 9 日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来找法驻日本大使要求提供借款的记录。1884 年,在日本国内反对藩阀



政府的自由党、改进党成员都先后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中法战争”中国危难之时，在朝鲜削弱清政府的势力。[8]

“明治宪法”之父

经过“明治十四年政变”，萨、长藩阀完全控制了政府，伊藤博文从藩阀领导人中脱颖而出。

伊藤博文(1841-1909)出身低微，最初连自己的姓都没有。他父亲成为长州藩武士伊藤家的养子之后，伊藤博文因跟随父亲当“小长工”才获得了“伊藤”的姓。正如《伊藤博文时代》的作者久米正雄所说：“如果他早生十年，或许他只是萩城的一个农夫，平安平凡地度过一生。如果他迟生 10 年，恐怕他不过做了长州派的一个幕僚，只留名于明治政府的一隅罢了。”[9] 不早不晚，时代造英雄。长州开始派遣藩士出藩积极活动之年，正好是伊藤博文可以充当“杀手”的最佳年龄段。在日本，“上”总要找无知的下层青年，以可以让他“暴富”“变大”为诱饵，鼓励他们去充当“下手人”。

每外出执行一次“任务”，伊藤博文的财富及地位就上升一次，1868 年“一新”成功时，他年仅 28 岁。

模仿西方国家制定宪法，美国也是可选择国家之一，美国没有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对幕府世袭的等级制度深恶痛绝的萨、长下级武士，曾将美国人人平等视为理想典范。[10] 可当他们通过“论功行赏”居“上”之后，他们开始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地位。

当伊藤博文看到依据普鲁士宪法制定的草案时，他拍着大腿高喊：“就是它，就是它，这就是日本要学的宪法。”他认为：美国的共和宪法不适合日本这个“君主国家”；英国的“君主立宪”主权在议会和内阁，这在日本也很难推行。

萨、长藩推翻幕府，使用的手段是“抬”天皇，众武士中既没有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那样的实力人物，也没有能与领主相抗衡的财力与家名，只有借助“万世一系”的天皇神话，让他们“上”可压制以前的藩主、贵族，“下”可用统一国家的旗号吸引追随者。萨、长藩阀成为“屏藩”，实际上就是让天皇与世隔绝，便于他们摆布天皇。反对派攻击他们“挟天子令诸侯”是封建残余，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宪法来明确君主

以及政府的权限，藩阀们避免与反对派直接冲突，而是让“西方文明”有名无实，用阉割的宪法让反对派达不到目的。

1882年3月，伊藤赴欧洲考察德国宪法，1883年夏回国。

1884年颁布“华族令”，以确保华族日后可以成为“上议院”的候选人。

1885年12月22日，伊藤博文改革日本政府机构，废除太政官制度，设立内阁制，他本人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内阁中的大臣几乎都来自萨摩、长州藩，三条实美被任命为内大臣，“常侍辅弼”天皇，伊藤与三条调换位置表明，天皇及贵族从权力舞台上引退。

1887年，伊藤与他的几个亲信开始秘密起草宪法。当时有意见认为，既然是国民的宪法，那么就应该从各府县中选出一名代表，一起参与宪法的审议；还有意见认为，应该先开设议会，让宪法在议会的监督以及审议下产生，这些不利于藩阀的制宪意见，伊藤博文等人当然不会采纳。

一切都是在绝密之中，由伊藤率领一个小组悄悄地进行。

1887年12月25日，藩阀政府突然颁布《治安条例》，以危险分子必须远离皇宫为由，将570名反藩阀人士从东京赶了出去。

为了避开元老院审理由他主持制定的宪法，1888年伊藤组建枢密院，他出任首任枢密院议长。枢密院中的12名成员都由他负责选出。他离开政府内阁转任枢密院议长时，将内阁首相大权转交给萨摩藩的黑田清隆。伊藤以当年的德川家康为榜样，为藩阀政府设置了多重防线。

1889年2月11日，日本颁布《明治宪法》，同年12月，山县内阁成立。

1890年，伊藤出任首届贵族院议长。

在《明治宪法》中，内阁与陆、海军是对等的两个机构，天皇位居文武部门及官员之上。《明治宪法》保证天皇享有无限权利，可在实际运作中，藩阀政府以“不能事事烦劳天皇”为名，让天皇“君临而不统治”。内阁的产生是“举荐制”，它不对国会和国民选出的议员负责。众议院议员由民选产生，他们代表选民的利益，而贵族院代表300多个有华族、贵族身份的人。贵族院对众议院的决议有否决权，议会只能参与预算以及法律的起草与审议，而最终能否成为法律，必须经过枢密院（天皇的咨询机关）的审议，报经天皇认可后方可成为法律。枢密院不提交给天皇，天皇无法要求。天皇有权以紧急法令等形式，颁布、制定法律，这些都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内阁负责提交预算，议会只能审议，即便预算在议会上无法获得通过，上一年度的预算继续有效。天皇是海陆军大元帅，军队直接对天皇负责，不受内阁以及议会的控制。

《明治宪法》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来的新的宗教”，藩阀们设置好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阻止反藩阀势力接近天皇，“万世一系”的古老神话披上了“文明开化”的外衣，两者一体构成了《明治宪法》。没有反对派以及民众参与制定，制定好之后也没有经过任何讨论，仅仅是伊藤决定模仿《普鲁士宪法》，设防好之后抛出来就强制国民接受。反对派最终只获得了“立宪”空名，换言之，藩阀用立宪、开设国会堵住了反对派的嘴，而藩阀依据《明治宪法》，更加牢固地将天皇控制在自己手中。《宪法》也可以“偷梁换柱”，外国有如此方便、可以让藩阀“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宪法》，这实在让藩阀高兴不已。

《明治宪法》规定，武官以现役军人身份加入内阁，可他们不对首相负责。简而言之，军人的上级是天皇而不是首相，首相仅仅是诸大臣中的首席，他无权管理陆、海军大臣。文武官员是天皇的左、右手。左手不可支配右手，右手也不会听从左手，左右手都听命于天皇。[11]

伊藤博文自称是日本的“俾斯麦”，但是，明治天皇的权力根本无法与德国皇帝相比，德皇可以免去“俾斯麦”的职务，而日本是明治天皇听伊藤博文的。伊藤不但不允许天皇亲政，而且坚决阻止并反对天皇亲政。《明治宪法》中“天皇总揽大权”仅仅停留在文字上。

对于藩阀政府送给国民的“进步礼物”，德国医生贝鲁茨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道：“11 日是宪法公布的日子，东京全市的热烈场面难以言表。到处都搭建了庆祝门，同时还有游行庆祝。而滑稽的是，谁也不知道宪法本身的内容。”

在大阪的中江兆民写道“通读一遍，唯有苦笑”。“赐予国民的宪法究竟为何物？未见其实就为其名所醉倒，我国的国民为何会愚昧到如此程度？”

藩阀们则大肆宣扬：“我国成为亚洲首个立宪国家。”

1890 年到 1895 年的政府与国会 //////////

从明治十八年开始实施内阁制度以来直到四十五年（1912 年，明治时代结束），一共有 17、8 届内阁，总理大臣都是萨、长出身。除了萨、长之外，只有大隈与西园寺是例外。但大隈是佐贺人，而西园寺是五摄家之一的贵族出身，他们也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在整个明治年间，我们国家的所有总理大臣都出自藩阀、门阀，没有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可以登上总理大臣的宝座。

大正之后，内阁开始发生变化，作为萨、长人独占内阁的明治时代的遗风，只有桂太郎、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其中田中不是作为长州人当上首

相，而是作为政党领袖出任首相的。作为萨长人出任首相的，只有桂、山本、寺内。[12]

内阁	国会	政府党与反对党	大选情况
山县内阁（长州）	第一次国会（1890年11月25日召集，1891年3月8日闭会）	8000万预算削减一成	首次国会，山县强忍着没有解散
松方正义（萨摩）1891.5.6-1892.7.30	第二次国会（1891年11月26日）召集，12月26日解散。第三次于大选结束后的5月2日到6月15日	预算遭到反对，首次解散，第三次国会召集后，国会内依然没有达成一致，天皇下诏化解，松方后辞职	国会议员经历第二次大选。
伊藤博文（长州）1892.8.8-1896.8.30	第四次国会（1892年11月29日）	预算8375万日元，军费1680万。天皇下诏，政府党与反对党平息争论	这次没有解散，反对派以接受天皇意见退却
	1893年底第五次 1894年6月第六次 1894年9月第七次	1893年底解散一次 1894年6月再次解散国会	首次战争中的大选，唯一一次在东京以外的地方召开国会。

国会开设之后，反藩阀的舞台转移到了国会内。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存在内部权力斗争及危机，日本国内也始终存在藩阀专权与反对独裁的运动，可唯一令人不可思议或者说日本人之奇特在于：每当两者权力斗争出现危机时，藩阀想出的遏制反对派的手段，是不断地对外挑起事端。而藩阀的这一手段也相当奏效，藩阀只要一制造出外来危机，日本国内的争斗就会立刻平息，日本国内可以在“举国一致”的口号下迅速平静下来，藩阀与反对派之间此时结盟，达到“城内和平”。

自从西乡希望用战争手段推翻政权失败之后，反对派就放弃了用武力推翻藩阀政府。议会开设后，反对派以国会为战场，向萨、长藩阀挑战。开设国会必须先有国会议员，明治二十三年（1890）7 月 1 日，日本开始了历史上首次全国大选。这次议员选举就是为召开国会而进行的准备。首次议员选举并没有遇到很多麻烦，政府宣称“颁布宪法”是“国家盛事”，如果国会也能顺利召集，那么藩阀们将“又立新功”。

首次国会开始时的首相是藩阀的头面人物山县有朋，他在首届国会上就遭遇了来自国内反对派的强大压力。

“第一次国会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12 月 25 日召集。针对政府提出的预算案，反对派提出了修正案。当时的预算总额为 8000 万日元，反对派提出削减 800 万。”[13]也就是说，要减少百分之十。

反对派提出“节约经费，修养民力”，反对山县提出的大规模扩军。山县最后用

收买议员的方法，将800万变成了减少650万。即使这样，也是对藩阀政府的沉重打击。山县认为:国会严重妨碍了国政。

因为是首次召集国会，山县下决心要忍耐挺过去，不能解散国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届国会才得以“善终”。山县在第一次国会闭会后，辞去了首相职务。国会议员中江兆民看到议员能够轻易就被收买，以自己酒精中毒为由，辞去了国会议员的职务。

政府的预算越多，萨、长藩阀支配起来就越方便；而军费越多，回流入萨、长藩阀口袋里的回扣也就越多。既要让这个新生阶层迅速致富，又不能说是为了自己，对外宣传是“一切为了国家。”藩阀制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假想敌”，散布耸人听闻的“威胁论”，以便让庞大军费案更容易获得通过。日本今天“金权政治”的病根，实际上就是明治时代的藩阀人物留下的，至今仍没有治愈或好转的迹象，而且朝恶化方向发展。

松方内阁与第二次、第三次国会

山县觉得反对派让他头痛，可他辞去首相职务后又不能出现职位空缺，元老为此召开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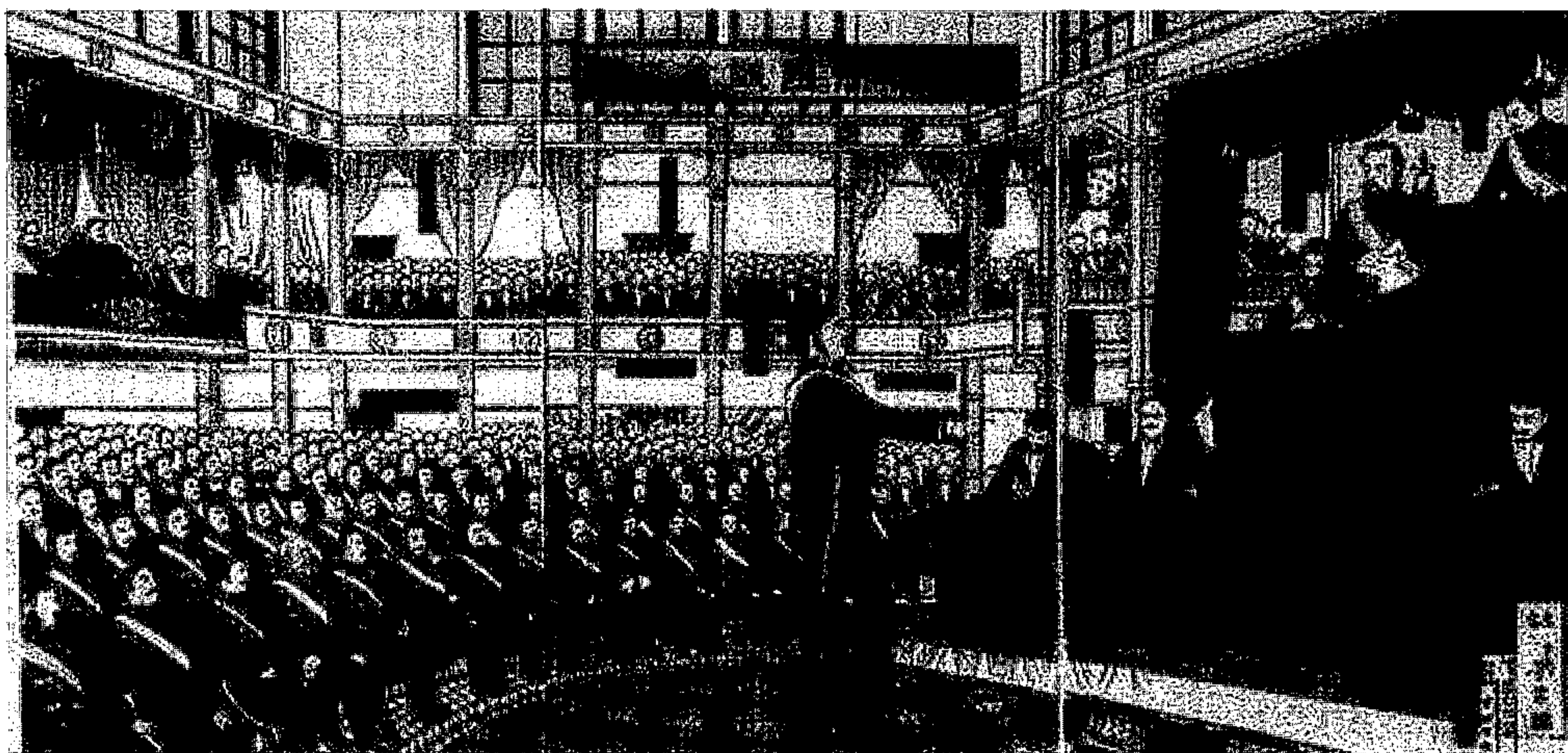
1891年，藩阀的幕后人物黑田(清隆)与井上(馨)两人会谈认为，两藩要加强团结，只有这样才可以抵御反对派的挑战，对外一致的具体手段之一为:“今后用轮流坐庄的方式决定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各大臣的人选。”[14]

萨、长两藩阀用私下“协商”的方式制造内阁，决定首相以及大臣人选，这种做法日文叫“谈合”，是“私下协商、做交易”的意思。

首届内阁首相是伊藤(长)，接着是黑田(萨)，下来是山县(长)，再接下来该轮到萨摩了。黑田与西乡(从道)都不愿意出任首相，最终轮到了松方正义。萨、长同盟，再次刺激了反对派。

1889年，外相大隈因修改条约问题被炸断了腿，天皇坚持要他出任枢密院顾问，他坚辞不就，理由是伤未痊愈，即便痊愈也是残废，无法胜任。可天皇不同意，称不必每天上班都可以。1890年首次国会召集之后，他领导的改进党与板垣领导的自由党商定，要在议会内共同反对执政的藩阀。藩阀得知后，决心将大隈从枢密院中清除出去。藩阀派大木乔任劝他辞官，而且理由必须是“身体不好”。[15]遭大隈拒绝后，藩阀政府遂将他罢免。

第二次国会就在这种状况下召开了。山县内阁在首届国会上曾保证:“裁减冗



浮世绘——首届日本国会会议

首届日本国会召开,它是萨、长藩阀向反对派妥协的产物,此后每当藩阀遇到内政危机,他们就利用制造外来危机的方式,达到"举国一致"。结果日本在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员,节省经费",这次松方内阁一开会就宣布减少了60万的人工费支出。针对反对派联合起来反对藩阀政府,松方内阁中的海相桦山资纪(萨摩藩)公开回应称:"'一新'以来,克服种种内外困境,领导帝国走上现在道路的是谁?正是社会上所说的萨、长政府,'一新'大业之所以能够成功,都是萨、长的功劳。迄今为止,保证诸位生命财产安全的非萨、长莫属。"[16] 他将"论功行赏"理论公然搬入了议会发言中,他要将藩阀政府合理、合法化。

反对派坚持要与第一次国会一样,削减800万预算。

因双方意见尖锐对立,预算案审议无法继续进行下去。12月25日,松方传达天皇诏敕,宣布解散国会。

藩阀政府通过解散国会可以使国会议员瞬间失去资格,让他们重新回到疲于奔命的大选中,即便一部分人幸运重新当选又回到国会,可藩阀内阁依然以逸待劳地在国会中等着当选者回来。国会议员辛苦,而藩阀官僚无伤。政府不对国会负责;国会以及民选议员对内阁成员、政府,没有任何有效的制约手段。藩阀政府摆出:你们跟政府作对是自讨苦吃的架势,这就是伊藤博文制定的、明治宪法下的国会。

松方向天皇提出要求下诏解散国会,理由是"很多捣乱分子当选为国会议员",天皇在下昭同时叮嘱:希望重新大选时"让良民当选国会议员"。松方将支持政府的议员定义为"良民";反对藩阀政府的就是"暴民"。"一新"时,站在德川家一边、



反对天皇的就是“朝敌”（朝廷的敌人）、“贼军”。

内相品川弥二郎对外发表谈话称：“解散议会是陛下谴责旧议员，他们若再次参选，就违背了陛下的意愿”。

尾崎行雄是这样回忆第二次全国大选的：

在纪州等地，人们认为我们是反叛者，既不给我们提供住宿，也不借给我们演说会场。好容易才开成的演讲会，政府雇佣的流氓就挥刀冲入会场，警察也事先与他们商量好，当我们找警察时，警察称无法取缔这些流氓，命令我们立刻散会。政府雇佣流氓、地痞，动用刀枪，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对我们进行威胁。夜晚我们总算找到住处，刚睡下，就有人用长矛从房外捅进来。

某日，我要去志摩参加演讲会，接到通报称有暴徒在路口埋伏等着袭击我。怎么办？我们一行在惊恐中前往，果然，一帮穿着和服的人手持刀枪在那里等着我们。而我们手无寸铁。但当我们通过了那个路口时，什么都没有发生。

听说他们将在我们返回时行动，为此，我们决定将他们驱散，我们找了些打野猪的猎人，他们手持猎枪，当对方看到有人护卫我们时，立刻作鸟兽散。

伊势这个地方，原本民风淳朴，即便有人来打你，但决不会有人来杀你。他们不杀人，但是杀动物。我的竞选参谋也是向我提供住所的房东，就因为他接待我，政府雇来的流氓就把用竹子穿透的鲜血淋淋的猪头挂在了他们店的门口，房东因此经营受影响，不知该怎么办。

协助我竞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殴打，致使他们不敢帮助我。

板垣的家乡最恶劣，那里是自由党的发祥地高知县。警察与暴徒勾结，蹂躏民党的选区。或拔刀包围候选人的家，或高呼口号，穿鞋闯入候选人家的内室。民党中也不乏血气方刚的自由党人，他们对此没有默视。结果选区变成了战场，流血冲突不断。

政府发现仅仅动用警察不够，就进而出动宪兵，调动军队。名为镇压骚乱，实际上是为了镇压民党。动用天皇的军队驱散地方民众，用刀枪威逼家乡父老。不但使用刀枪，甚至动用大炮，烧毁民房。最后造成 10 人死亡，66 人受伤。

投票当日，警察、雇佣来的流氓、暴徒，变本加厉，不少人不得不投政府党人一票。有的人为了免遭暴力侵害只好弃权。在第二选区，由于暴徒抢夺投票箱，最后不得不重新投票。

大隈的家乡佐贺县是改进党的根据地，这里也比高知好不到哪去。警察部长亲自指挥警察，唆使流氓、暴徒迫害选民。对不投政府党人票的选民，公然用凶器

攻击之。为此，民党士族也用刀回应，结果爆发流血冲突。

民党抓到暴徒后扭送警署，警察根本不与理睬，反而指责民党。被押送警署的暴徒看到警察之后，反倒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表情，他们对警察说："我是帮政府干活的。"这里宪兵也来了，军队也来了，死亡 8 人，负伤 92 人。

在第三选区，在法定投票日无法进行投票，最后只好延期，有三分之二的选民弃权。这些事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警察竟然亲自上阵，走街串巷威胁投票人：必须投票给哪个人，不能投票给哪个人。郡市町村，那里的警察、郡的官员、市町村的官员全部出动，都为政府党拉票，办公地点根本见不到他们的人影。镇压言论，贿赂选民，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政府党的运动员，因为有政府包庇，挥刀放枪，烧房伤人，使尽了一切罪恶手段阻止民党候选人当选。

政府后来公布的选举过程中的死伤人数为：死 25 人，受伤 388 人，这是政府后来的统计数字，而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

公然干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政府党能够在国会中获得过半席位。这是日本宪政史上的一大污点。此后的选举，贿选、收买投票人变得更加隐蔽。

选民支持反对派，即使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规也会受到生命财产的威胁；而支持政府党即便干了坏事也平安无事，还能获得金钱作为奖励。明明是政府在选举中不公，他们反而倒打一耙称："政党与选民毒害了宪政。"选举中的罪恶，甚至还进入了国会。暴力活动在国会内也时有发生，民选议员在国会内被暴徒袭击也很常见，有的国会议员甚至头裹绷带出席国会。"[17]

警察将钱放进自己制服中的口袋，公然对参加投票的人说："投票给反对党，就立刻将你抓起来，投政府党，马上就给这个（口袋中的金钱）你。"[18]

对许多百姓来说，金钱比政治信仰、未来更重要。道德水准因此失衡。藩阀有了钱，更加会收买社会底层，只要给他们少许钱，他们就会对反对派议员施暴，直至暗杀。

内相品川事后称："第二次国会因为有暴徒捣乱，竟敢挑战天皇权力，因此天皇下令解散。在进行选举期间，我作为内务大臣，如果让这些暴徒再次当选的话，国家的安全将无法保证，为了清除暴徒，选出忠良之士，我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干预了选举。不但以前如此，今后如果出现同样情况，我还将继续干预选举。"

政府党内部也出现了争论，萨摩藩领导人指责长州藩伊藤制定的宪法不好；而长州人则攻讦萨摩人运用法律失当。伊藤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品川也被迫辞职。第三次国会刚一召集，反对派就提出了弹劾政府案。这一提案立刻在众议院、贵族院获得通过。内阁面临解散众议院还是全体总辞职的选择。松方以"国务大臣获得



至尊（天皇）的信任任其职，不应被议会的决议左右，轻易言进退”。既不总辞职，也不解散国会。奏请休会七天。当反对派质疑休会的理由时，松方回答：“国会休会大权在天皇，政府没有必要对国会进行说明。”

拖延了两个多月后，松方辞职了事。

伊藤博文与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国会 //////////

接任松方的是第二次伊藤内阁，内阁中的成员多是“一新”中的所谓“功臣”，因此该内阁又号称“元勋内阁”，它是藩阀人物的大汇集。（1892.8.8-1896.8.30）

第四次国会于1892年11月29日召集，就在国会召集前的两天，11月27日，伊藤博文乘坐的人力车与皇族马车相撞，伊藤博文以受伤养病为由，让另外一个藩阀人物——内务大臣井上馨代理首相职务。

内阁提出了1893年的预算案，总额为8375万元的年度预算，海军军费就用去了1680万。内阁主张，扩张海军是“急中之急”。国会内的反对派认为：“节俭经费，修养民力”应该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反对将大量预算用在扩军上，他们提出要削减880万。

藩阀专权，是指藩阀人物出任政府各部门的高官，控制了政府。反对派为民选议员，他们反对藩阀，只能是在一年一度的国会上，针对审议的预算发难。反对派要求政府对自己提出的预算案进行说明，其中之一就是为什么要编制庞大的海军预算。

1893年1月16日，国会经过短暂休会后重开，所有大臣到场，井上临时首相强调：“为了维护东洋和平，扩张海军为绝对必须。况且宪法第六十七条对预算有明确规定，政府对于反对派提出的动议无法接受。”

预算案的审议因为双方意见尖锐对立，预算案审议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反对派提出：(1) 内阁总辞职；(2) 解散众议院。井上为了瓦解反对派，利用天皇下诏，下令暂时休会15天。

2月7日，伊藤博文头裹绷带出席议会，同时解除了井上的临时代理首相职务，伊藤博文表示，如果反对派提出弹劾政府的上奏案，他将解散国会。

面对伊藤博文的恐吓，反对派依然提出表决，结果以103票对181票，反对派提出的上奏案获得通过。2月8日，众议院议长星亨将上奏案提交给天皇。就在上奏案提交天皇的同一天，伊藤提交了解散众议院的上奏，但是天皇没有同意。

2月10日天皇下诏。天皇在诏书中称：“旷日持久的国会内争论于国家不利，国防之议缓一日，误百年，朕从此节省内廷费用，今后的六年间，每年拿出30万，同时命令政府官员将其俸禄的十分之一上缴国家，用于造舰，朕希望内阁与议会齐心

协力。”

藩阀、伊藤要扩张海军，最终变成了明治天皇的命令，第四次议会最后于1893年3月结束。开会之初争论激烈，而诏书出现之后趋于平静。预算最终只削减了272万。

1893年底，第五次国会召集，审议1894年度预算。

1893年底，英国驻日本使馆的牧师遭遇日本人袭击，日本警察在旁边观望不管，英国因此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第二次伊藤内阁利用这次危机，于1893年年底乘机解散了第五次议会。伊藤让所有国会议员“失业下岗”，他没有采用松方政府那样的、出现冲突后才解散的手段。

1894年3月1日，日本进行了第三次国会议员的全国大选[19]。众议院中的过半议席依然被反对派获得。伊藤希望通过解散议会压制反对派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令“藩阀政府”陷入更深困境。“藩阀政府”迫切需要找出新的、更能够吸引国内视线的内容。

5月15日，经过大选之后的第六次议会召开，反对派谴责政府解散第五次议会，要求建立“责任内阁”，要求政府必须对议会负责。此议案以五票之差遭到了否决，可仅有五票的微弱优势，让“藩阀政府”惊恐万分。5月31日，反对派提出弹劾内阁案，以139票对153票获得通过，刚解散并重开的议会，面临“再次解散”还是“内阁总辞职”的危机。

6月2日，“藩阀”政府再度解散国会，宣布9月1日开始再次举行全国大选。同日向朝鲜出兵，5日进入“大本营体制”。日本尚未宣战，但国家已经进入了战时体制。8月1日宣战。第四次全国大选是在日本的对外战争中进行的。9月18到20日，广岛市民到处悬挂国旗、灯笼，用三天时间庆祝平壤大捷，9月22日，第七次国会在广岛的大本营举行，这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次在东京以外的地方召开国会。政府提出要1亿5千万的军事预算，这是以往年度预算的两倍，反对派没有任何反对，预算案迅速顺利通过。藩阀政府通过对外战争冒险达到举国一致的目的终于实现。

1893年底、1894年初，半年时间内，伊藤竟然先后两次解散国会，如果没有甲午战争这一军事冒险，而且这次战争日本战胜，最终结果必将是萨、长藩阀政府被反对派推翻。1895年3月，第八次国会召集，中国的谈判代表此时已经到达日本，政府依然提出一亿日元的军事预算，这个预算案也迅速通过。1896年的1月9日，第九次国会召集，这次国会上，反对派提出了弹劾政府的“闵妃事件”

1895年到1900年的政府与国会

议会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让藩阀头痛呢？“到明治三十年(1897)为止，政府总是少数派，反对党也就是当时的民党，又叫在野党，政府党叫执政党，又叫吏党，吏党在选举中总是失利，这种情况自明治三十年开始逆转”。[20]

在1896年2月4日的第九次议会上，预算案顺利获得通过，而且这次预算的“陆海军军费占政府总预算的44%”，也就是说，国家预算的几乎一半，都用在了陆海军的扩张上。

战争期间出现过短暂的举国一致体制，战争结束后不久，国会内的角力再次开始。1896年度的预算通过后，伊藤将政权交出，实际上是还给了萨摩。1892年7月，反对派从外部将松方内阁推翻；这次伊藤再将政权还给松方，1896年9月，“第二次松方内阁”成立。

1897年12月25日国会开始，政府刚开始宣读预算案，反对派就突然提出对现内阁不信任，松方立刻拿出已事先经准备好的诏书，宣布解散国会。松方解散国会后，立刻进宫，向天皇提出辞呈。

这次解散国会，神秘又不可思议。首先，假如松方领导的政府真想与反对派一决高低的话，他可以解散国会。其次，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他可以总辞职，不必又解散国会又辞职。既解散国会又同时辞职，这是明治宪法、战后宪法下唯一仅见的一例。

1898年1月12日，第三次伊藤内阁成立，五个月后，伊藤又迫不及待地将权力交给了大隈以及板垣组成的联合政府。从松方辞职时的矛盾做法就隐约可以预见，伊藤内阁是一个临时的短命内阁，伊藤匆匆忙忙上，又匆匆忙忙下，其中原因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1898年的“宪政党内阁”

1898年1月12日，第三次伊藤内阁成立。

伊藤接手政权之后，于1898年5月18日召集第十二次国会。会议一开始，反对派就联合一致，否决了政府的预算案、地租增税案。伊藤时而下令休会，时而延



岩仓使节团的组成成员

岩仓使节团出访是明治初年的一次重大对外活动，对日本建立近代体制、推行一系列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照片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仓岩具视、山口尚芳、木户孝允。

长会期，并且暗示将解散国会。使尽手段，最终也没有能够让预算案通过，6月10日，他再次拿出天皇诏敕，宣布解散国会。1893年、1894年之交曾经在一年之内两次解散国会，1897年、1898年之交再次出现同样情况。

"甲午战争"后，日本从清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战争赔款"，发动战争者成为"桃太郎"[21]。"藩阀"与反对派，原本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经过甲午战争的"举国一致、精诚团结"，两者从此同流合污，反对派不反对"明治倭寇"，因为他们可以为国家带来财富。此后藩阀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集中在如何分配"意外之财"上。

日本国会内的主要议题是"战后经营"，"富国强兵"。藩阀政府以担心中国复仇为由，继续要求增加军费。日本一直对列强叫嚣要瓜分、肢解中国，与列强一起干坏事，一可以避开中国的反日锋芒，还可以同多个列强一起压在中国身上，让中国无法翻身。1898年起，帝国主义开始了在中国的瓜分狂潮，德国租借胶州湾，沙俄租借大连湾，英国租借威海卫，法国租借广州湾。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日本藩



阀政府煽动并积极参与，日本此时提出“保全中国论”，而希望保全的地点是台湾对面的福建。日本在等待时机。

在中国与欧洲列强的矛盾空前激化之时，日本打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号，表面同情中国，实际上每个动作都想将中国堕入深渊。

中国人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坚船利炮”也会败给日本，就全盘否定了“洋务运动”，接着要从改变政治制度上为中国找出路。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百日维新”始于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止于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前后约百日。对于“戊戌政变”发生原因，中国国内有多种说法，但有中国学者认为：“伊藤博文来华加剧了两派之间的猜疑，最终导致冲突”，该论点有相当说服力。[22]

维新派中有人向光绪皇帝建议，要伊藤博文来充当改革顾问，光绪皇帝决定 9 月 20 日会见伊藤博文，19 日，慈禧太后匆匆从颐和园赶回故宫，据说 20 日光绪皇帝与伊藤博文会见时，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中国方面的另外一个见解是：慈禧太后匆忙返回故宫，是因为 18 日看到了杨崇伊的一份密奏。[23]

日本“宪政党”产生并且立刻组建了“非藩阀”政府，如果它是反“藩阀”派不断斗争的胜利成果的话，它应是日本宪政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而反藩阀人士对此却高兴不起来，奇就奇在日本史学家对这次“反对党”的“进步”与“胜利”也讳莫如深。

据日本史书记载，积极推动大隈、板垣两个反藩阀政党联合的，竟然是在朝鲜支持金玉均，在中国支持孙中山的平冈浩太郎。[24] 根据尾崎回忆：“平冈君没有什么学问，对于什么是立宪政治他也并不清楚。”“他是大陆浪人的领导人，日清战争中他发了大财。”[25]

积极推动日本向大陆扩张的平冈浩太郎，让两党中的关键人物于 6 月 7 日在他家聚会并见面，平冈浩太郎提仪：“自由、进步两党应该联合组成一个大党，进而获得政权。”[26] 他成了两党合并的中间人。

议会 6 月 10 日解散，大隈与板垣向解散后的前国会议员报告两党联合，要求他们同意。11 日两党开会讨论平冈的提议，接着立刻开始起草联合宣言及纲领，决定新党党名为“宪政党”，12 日公布的党纲，其内容是 1882 年（明治十五年）“立宪改进党”成立之初公布的党纲内容。自由党代表访问大隈，进步党代表访问板垣，6 月 16 日召开“民党合同同志大恳亲会”。日本自从开设国会以来，藩阀最惧怕两党联合，或恐吓，或收买，用尽各种卑鄙手段，就是要分化、瓦解他们联合，可这次则十分反常，藩阀政府不但主动鼓励两党联合，还将政权“让”给了他们。在野的两个

政党，从前相互仇视，相互攻讦，一夜之间竟“化干戈为玉帛”，6 月 21 日，大隈与板垣各自解散了自己的政党，22 日立刻临时拼凑出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新党“宪政党”，“宪政党”在国会内拥有 200 多个议席。

作为回应，伊藤博文于 24 日召开元老会议，商议将政权移交给大隈、板垣。山县一直仇视反对派，为了对付反对派，他曾威胁要终止宪法。这天的会议在桂的陆军大臣官邸举行，桂发言道：“不容赘言，我们必须全力进行好战后经营。伊藤首相的决心让人遗憾，首先，应该下定决心将战后经营进行下去。如果该方案行不通，那么作为第二个对策，元老们应全部出动组建内阁。这时，我本人将从大臣的位置上退到次官位置，让大山大将出任陆军大臣。让各元老出任大臣，少壮的年轻人出任次官，各行其责，民党丝毫不足畏。为了保证战后经营目标之实现，民党向我们挑战多少次，我们就解散国会多少次，即便最后终止宪法，也要保证完成战后经营。”[27]

连桂这样的藩阀中坚分子竟然也不知道伊藤这次究竟想玩什么把戏。这也是

马关条约谈判中的李鸿章

甲午一战，让清廷的海军精锐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让中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的惨重代价。李鸿章是中国的德川庆喜。打仗前没有准备，战争爆发后没有斗志。说日本是蕞尔小国，但只过了一把嘴瘾，既没想到让北洋水师出海进攻日本本土，又丝毫没有“国破山河在”，要与日本打持久战的想法。只想赶快“花钱消灾”。让四万万中国人，每人赔半两银子给“鬼子”。





日本社会中的一个特点，“上”要知道“下”的一切，包括脑子里想的，可“上”不让“下”知道自己的任何想法及行动理由。

6月25日，伊藤奏请召开“御前会议”，“伊藤请辞的同时，推荐大隈、板垣为继任人选。当晚，伊藤将两人叫到自己的官邸，向他们灌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对于伊藤等人的安排，板垣表示无法理解：“伊藤首相突然辞职实在意外。在野两党现已合并并且发表了政纲，可这仅仅是一个粗略的纲要，对于将来如何展开国务，具体应该怎样实施，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商议。我与大隈本人也仅仅只在宴会上见过一面，两党合并极为仓促，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基础。如果大隈希望出任新内阁首相的话，我们自由党都可以交给大隈，而我本人此时的真实愿望是隐居起来不从政。”

大隈也不解地说：“提出辞呈之前，也应该向我们说明一下其中的真实原因吧。或许首相有什么想法、打算，一个在立宪政治中功勋卓著、开今日风气之先的人物，马上就可以看到政党内阁组建了，但突然提出要辞去首相职务，无论对你本人还是对国家，都是重大损失。”[28]

6月27日，两个反对派巨头被招入皇宫，天皇下令道：“伊藤博文已经提出辞呈，我本人已经准许，现命令你等组织新内阁。国家内政外务，不可一天没有政府，尔等相商，立刻组织新内阁。”

6月30日，首届政党内阁，由反对派隈、板组成的联合内阁成立。（1898.6.30-1898.10.31）

大隈与板垣，两个人曾是冤家对头，瞬间组成“宪政党”，瞬间获得领导权。对于在野多年，一直期待能打倒藩阀政府获得政权的反对派来说，这是意外的惊喜，同时也让人惊喜的意外。对事事要防范反对派的藩阀来说，将大权拱手交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以前仅仅是以大臣席位作为诱饵瓦解反对派，而藩阀这次竟将总理大臣席位都拱手送上，尽管如此，日夜期盼总理大臣宝座的大隈却实在高兴不起来，主要原因不是拼凑政党、组建内阁太匆忙，而是在任职期间实在窝囊，完全是被玩弄的傀儡首相。首先，大隈与板垣没有任何组阁的心理准备，一切都是在藩阀的安排下进行的。藩阀让冤家对头立刻变成盟友，他们就立刻合并两党；伊藤让他们当“首相”，他们就必须立刻“接权”；后来山县让他们“下台”立刻交出政权，他们也必须服从，不容任何迟疑。

连明治天皇都可以被藩阀玩弄于掌股之上，隈、板俩人就更不在话下了。伊藤让权伊始，藩阀就先给新政府领导人来一个下马威。伊藤内阁中的海、陆军大臣拒

绝留任，也不推荐新人选，假如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新内阁将无法产生。“藩阀”给隈、板内阁“下马威”的同时，并没有将路堵死，还给他们留下了一个通道，他们让天皇下达命令，挽留前内阁的陆、海军大臣桂太郎和西乡从道。天皇下诏之后，两个人物以“从命”方式，在新内阁中担任陆、海军大臣。“藩阀”充分利用《明治宪法》中天皇是军队最高统帅的条文，让军队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次内阁是以两个军人服从天皇命令“成全”的，他们不对首相负责，只对天皇负责。进入昭和时代后，军人就用这种手段控制政府。

第六次大选于1898年8月10日进行，宪政党获得了300个议席中的243个。议会中的多数党获得组阁权并执政，这种方式真正开始运作是在二战之后，在当时无法起任何作用，换言之，“宪政党”内阁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政治阴谋，“成也藩阀，毁也藩阀”。 桂与西乡留在政府内，他们两个分别支持自由党与进步党。所谓“支持”，实际上就是挑拨离间。“桂每到内阁开会之前，常叫板垣单独于一室，秘密协商，一看就知道，他是要唆使自由派，让两派之间的内讧更加激烈”。[29]

大隈领导的进步党，成员多是从藩阀政府中被清除出去的人物，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重返政府。桂与西乡抓住“宪政党内阁”随时都会对立或分歧的弱点，表面“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实际上极尽破坏、挑拨之能事。“参与”就是破坏、阻挠；“不参与”就是认为与“藩阀”没有直接利害，任他们相互内讧。

以往历届内阁，明明是“藩阀”内阁，而内阁却每每要标榜“超然”，超越“党朋之争”，一心为国。在“宪政党”内阁中，留任的军人就更加要表现出自己“超然于党争”之外。他们不隶属于政党，当然更不隶属于“政党内阁”，他们加入内阁的理由是：服从天皇命令。实际上，从内阁成立之初起，他们就以监视内阁的君临面目出现。首先，只要他们拒绝出任内阁大臣，这届内阁就无法组成；其次，他们可以用辞职等手段制造内阁意见不统一，随时推翻内阁。

“宪政党”内阁的首相，表面上是大隈，内务相是板垣，可他们甚至连召集内阁会议都困难，在他们主持的内阁会议上，“催生”该内阁的“志士”“策士”们，身着睡衣就可以闯入内阁会议室，公然对内阁的议题、方针发表自己的意见，痛骂他们不满意的大臣。

桂是山县安插在内阁中的耳目，同时又是山县的传声筒，没有山县同意，任何事情都无法实现，大隈凡事必须首先征求桂的意见。

内阁成立之初，外务大臣由大隈兼任，板垣推荐星亨，星亨因此辞去驻美大使职务，返回国内准备上任，但大隈“请示”了桂之后，桂要大隈“继续兼任”。文部大臣尾崎在帝国教育会上演讲称“共和制度不适合日本”，这本是“吹捧”日本的“君

主立宪”，可此演讲立刻被“歪曲”，成为攻击这届内阁的口实。

桂为此专门向大隈“献策”，称此问题已在日本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贵族院还有可能因此追究内阁责任，这样下去将会危及内阁，他建议首相大隈向尾崎发出劝告，尾崎本人亲自前往皇宫中“赔罪”，这样可以避免内阁危机。

为了保全内阁，不知是计的大隈决定按照桂的“指引”行事。9月6日，尾崎前往皇宫向天皇“谢罪”，回来的路上去桂的官邸，通告已经依照桂的指示“谢罪”以及过程，而桂此时“反戈一击”，桂称尾崎是在“诡辩”。此后问题非但没有平息，反而越闹越大。到了10月22日，天皇身边的侍从长、侍从干事都找到桂，向他征求今后应该如何处置的意见。为此内阁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尾崎辞职后，应该由谁接任文部大臣。西乡与桂当日不出席会议，次日开会讨论时，桂一方面指责首相大隈没有充分听取其他内阁成员的意见，另一方面批评他优柔寡断，选人难产。板垣因此提议：“西乡海军大臣兼任如何？如果西乡不行，那么桂本人兼任如何？”将了桂一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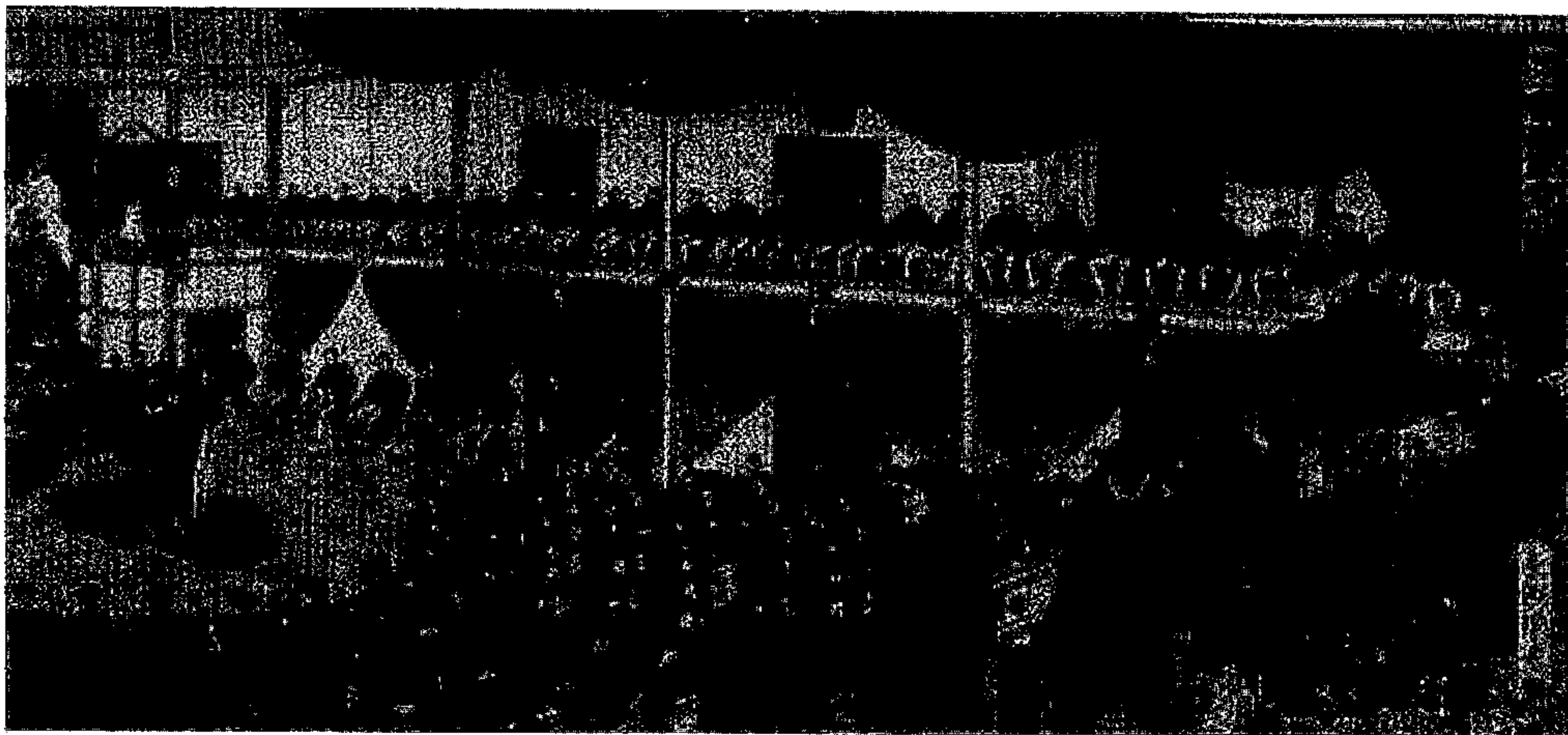
看到无法选出新人选，大隈发言道：“我推荐犬养毅”，并且立刻起身准备上报天皇批准。而桂则拉住大隈道：“你说要推荐犬养毅，但是首先必须经过内阁讨论”。依然用内阁必须先统一意见来阻止人选产生。大隈实在没有主意，立刻去见天皇，他知道如果推荐犬养毅，桂一定会利用此事做文章，他没有向天皇推荐任何人，他请求天皇下“圣旨”，同意自己辞职，因为他无法让内阁达成一致意见。天皇回答现在不是决定首相去就的时机，没有许可。次日，大隈再次向天皇举荐犬养毅，结果当日获得批准。

看到这种内阁实在无法维持，自由党的板垣以及藏相松田，递信相林，于29日一起向天皇提交了辞呈。而桂也立刻谒见天皇，要求天皇不批准他们辞职，结果天皇采纳了桂的上奏。僵持到了10月31日，大隈最终也提出辞职。

“百日维新”与“第二次山县内阁” //////////

伊藤6月24日完成政权移交之后，7月26日起开始对中国“漫游”，伊藤人尚在中国，日本国内的元老山县有朋就将隈板内阁“结果”了（10月31日），11月7日伊藤博文在长崎登陆，11月8日第二次山县内阁组阁完毕。

伊藤如果将政权交给萨摩藩阀，还无法说交权是一场阴谋，而接权的是所谓“宪政派”，伊藤通过“交接”表演，给中国上演了一场日本是“君主立宪”国的大戏。至于板隈内阁为何短命？日本公开的历史称：“大隈领导的进步党与板垣领导的自



浮世绘——伊藤博文主持召开国会

内阁在萨、长手中轮换，内阁成员既不是民选议员，更不会对议会负责，内阁与民选议员的唯一一次交锋，是在每年一度的预算审议的国会上。内阁可以随时解散国会，可国会议员却拿内阁成员无可奈何，畸形宪法下的孕育出一个军事独裁的怪胎。

由党，从以往的相互对立到突然合并，短期内组成了新的宪政党并组阁，因此内部权利斗争激烈，文部大臣尾崎在演说中有‘日本不可能成为共和国家’的言论，上述原因是这届内阁半年后瓦解的原因。”

200多个国会议员也不抵一个山县有朋，议会中的多数党、反对派内阁，都无力与藩阀抗衡。

赶在伊藤回来之前让“宪政党”内阁解体，实际上也是桂等人的阴谋。推进两党立刻合并成为“宪政党”并且拼凑“宪政内阁”的始作俑者是伊藤，他在中国完成了让中国“自坏”的任务，日本已经不再需要“宪政内阁”继续演戏了[30]

中国“百日维新”失败后，日本收容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他们与1897年8月从英国经加拿大返回日本的孙中山在日本汇合。

孙中山1894年3月前往上海，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6月到达天津，7月到北京，一路要找李鸿章提出他的改革建议，8月1日起中日之间宣战，李鸿章因朝鲜问题焦头烂额，哪里有工夫听孙中山的改革建议，更无可能召见他。向李鸿章提交书面改革建议的方案受挫，10月孙中山请郑观应弄出国护照，1894年底前往檀香山（夏威夷）“宣传革命”。1895年从檀香山返回广东后，孙中山由上书李鸿章时的非暴力的改良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革命者，他希望通过武力改变中国现状。无论是日本史料还是中国有关旁证都表明，孙中山在1894年就曾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

郎接触，要求日本提供军火。从夏威夷回到广东之后，他计划在1895年重阳节时，在广州举行武装爆动。这次计划失败后，孙中山于1895年11月12日到达日本神户。一个月后离开日本，开始了他向世界宣传革命之旅。

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的康、梁等开始“公车上书”，要求改革，他们要求进一步强化光绪皇帝的权力，他们对明治天皇在日本的傀儡地位一无所知，可他们竟认为只要光绪帝有了明治天皇一般的勇气与权力，中国就可以“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31]

离开中国前，孙中山在广州曾与康梁有过接触，在日本他们再度会面后，他们周围聚集了不少日本的“志士、大陆浪人”。[32]

宫崎滔天家的兄弟当初都反对藩阀政府，他们追随大限和犬养毅。1884年开始，日本的民权运动领袖们就将精力转移到国外，转移的目的地，既不是欧洲也不是非洲、美洲，而是藩阀极力要扩张的亚洲，先朝鲜，后中国、菲律宾，他们是政府侵略扩张的尖兵。“先改变东洋，然后影响日本”，这一“倒行逆施”竟然是这些“民权运动家”的理想。在大限、犬养毅的斡旋下，宫崎滔天1897年从藩阀政府处获得了活动经费，再次前往中国“调查”，9月回到日本后，宫崎向他们推荐了孙中山。

据孙中山回忆：“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限、大石、尾崎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士交往之始也。”[33]

从记录上来看，首次与犬养毅见面应该在大限出任首相之前，而孙中山与大限等见面，应该是在大限出任首相，也就是限、板内阁组建之后。孙中山在日本的生活费用，均由平冈浩太郎负责。平冈是“玄洋社”首任社长，他为“玄洋社”“黑龙会”等提供活动经费，专门从事在朝鲜、中国大陆的扩张活动。

日本从封建时代开始，贵族及封建领主对“侍”的控制手段就是：支持时就提供经费，不支持时就“断其口粮”，钱扔在哪儿，哪儿就热闹的情况至今仍非常普遍。压制反对派时，或出钱支持反对派的对立面；或收买反对派内部人事制造内讧，让他们“自坏”，否则就“冷落”一边。换言之，能够获得藩阀经济支援的，只有藩阀要利用他们之时，也是他们为藩阀利益服务之时，藩阀无论如何不会提供资金给反对自己的人。宫崎滔天是大限、犬养的走卒，因此宫崎从他们那里获得资金援助；而大限、犬养等又是藩阀们操纵的傀儡。

第二次山县内阁产生后[34]，藩阀政府对大限等都断了“粮”，间接从大限处获得经济资助的康、梁、孙中山，就更不可能从日本人那里获得什么资助了。1899年初，康有为被日本“礼送出境”，他去了加拿大。孙中山依然在日本，但在没有新的活动需要孙中山配合之前，藩阀政府是不会再给他钱了，将他冷落一边。

1900年，中国爆发了反帝的“义和团”运动。六年前中国向日本宣战，当时只针对日本一个小国，“甲午战争”中国宣战时没有必胜决心，开战后没有打仗耐心，打一仗溃逃一次，可这次慈禧太后没有任何准备就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比“甲午战争”时“勇气更大”，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诏。

孙中山于6月11日离开日本。经过三个多月的在外奔波，他9月到达台湾，台湾总督儿玉接到政府命令，支持孙中山。孙中山在国内的策应者准备在惠州起义，而日本则希望他们在厦门制造混乱。孙中山向儿玉借钱，并表示革命成功后连本带利一起归还，儿玉同意；儿玉的助手、日本驻台湾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不同意。他要孙中山的革命党去厦门抢“台湾银行厦门分行”，并称他个人可以保证，绝对不会因此追究革命党的责任。[35]

针对日本目标发动攻击，或日本人“自作自演”，或日本人利用其他人，都是为了袭击发生后，为日本“出兵保护”制造借口，日本在朝鲜就屡次使用这种手段。

“八国联军”联合出兵时，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派遣了22000军人到中国。他同时计划乘北方动乱之机，在南方从台湾向福建出兵。由于其他列强反对瓜分中国，提出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日本阴谋破产。日本最后才放弃出兵厦门，占领福建、浙江的计划。山县派兵后下台，第四次伊藤内阁以与列强“协同”为旗号上台。日本不再出钱、出枪支持孙中山，他哪里知道日本突然改变政策的理由，他也只好命令惠州起义部队解散。10月22日，日本人山田良政持孙中山手令，命令起义军停止行动。

日本一方面支持中国“反帝”，另一方面积极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次日本出兵人数最多、也最迅速，日本此后扬言要维护列强、“文明国家”在远东的利益，有意要充当列强在远东的“宪兵”，1902年与英国签署《日英同盟》条约。

伊藤第四次组阁 //////////

山县组织过两届内阁，共经历了三次国会，三次都“有惊无险”，没有解散过国会。1898年11月召集的第十三次国会，虽然反对派依然因预算问题与政府唱对台戏，但他没有解散国会，预算顺利通过，国会按时闭会。

实际上，山县刚一提出要增收地租税就与反对派冲突。山县以前曾威胁：“要一次接一次地解散国会，必要时可以终止宪法”。而这次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虽对立但没有闹到解散国会的地步。1899年11月20召集的第十四次国会也同样，反对只是小波澜，后来无疾而终。第二次山县内阁，瓦解反对派攻击的重要手段就是利



用“宪政党”，而“宪政党”正是在中国积极参与颠覆的主要集团。

1892年1月，伊藤曾通过侍从长德大寺[36]（当时松方正与反对派争斗得焦头烂额）向明治天皇建议：“立宪政治必须依靠政党才可以运作。因此，我愿意辞去枢密院议长的职务，下野组织政党。本人虽不聪敏，但是我坚信，集合类似大隈改进党那样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难度，我想率领政党帮助政府。”

天皇得知伊藤的上奏后说：“他说的话难以理解”，对该上奏不置可否。1892年1月22日，伊藤再次提出上奏：“我要组织的政党，不是为了推翻内阁，而是为了帮助内阁。”听到这话后天皇说：“我搞不懂了。你总是贬低松方，说他不是首相之器，而且指责该内阁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你共同商量国事，这不是你说的吗？如果这些是真话的话，你组织政党，准备帮助谁呢？当今的急务，不是组织政党，而是改造内阁。先改造内阁，组成一个可以信赖的内阁，这样才能帮助政府。如果像今天这样，组建了政党，该政党立刻开始与内阁唱对台戏，这与自由党、改进党有什么区别。你还是将自己提出的建议收回去吧。”[37]

1900年9月，伊藤收到了反对派送来的大礼，以前因反对“藩阀”而成立的两个政党，1898年合并为“宪政党”，“宪政党内阁”垮台之后再改组为“立宪政友会”，该政党推举伊藤为总裁。反对派反对“藩阀政府”，可一遇到对外扩张的机会，反对派的“国家意识”甚至超过藩阀，他们会立刻将精力集中在“扩张”上，“藩阀”对反对派的这一特点非常了解，每当反对派将矛头对准自己、藩阀遇到政权危机的时候，藩阀就人为制造“外来危机”，换言之，利用“外来危机”促成“举国一致”，渡过难关。

伊藤与山县，分别是藩阀中的文武重镇，政权在他们之间“禅让”着，好似在演出“双簧戏”，山县唱罢，伊藤登场。伊藤9月15日刚刚出任“政友会”总裁，山县9月26日就提出辞呈。28日伊藤以总裁身份被天皇召见，随后伊藤受命组建新一届内阁。10月19日，他以最大政党领袖名义组建了“第四次伊藤内阁”。(1900.10.19-1901.5.2)

1900年底，照例又是召集国会，审议下一年度预算。此时的伊藤，已经是国会内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政友会”的总裁，伊藤出任“政友会”总裁之后，通过“收买”提供官位等方式，让“政友会”中的民选议员们觉得自己开始实际参与国家政治了，“反对派”都变成了伊藤总裁之下的党员，党员岂能反对自己的总裁？在众议院，伊藤提出了扩张军费的预算案，“政友会”成员因获得实利而不再大张旗鼓地反对自己的“总裁”，因此，伊藤提出的“增税扩军方案”，非常顺利地就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正当伊藤为自己没有遇到阻力而洋洋得意的时候，没想到经贵族院审议时



翻了船。贵族院预算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否决了众议院通过了的预算案,贵族院给了伊藤迎头一棒。

伊藤当初制定《明治宪法》,为维护“藩阀独裁”设置了多处机关,多重限制众议院权力的“安全阀”之一就是“贵族院”。作为上院的贵族院,它可以否决众议院已经审议通过的决议案。

伊藤立刻主持内阁会议商讨如何应对。以前自己设计的维护“藩阀独裁”的安全阀,现在竟然将自己“关闭在外”。“政友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而反对意见认为,即便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后的“政友会”仍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可贵族院仍享有对提交议案的否决权。也就是说,贵族院还“挡”在众议院前面,要否决仍然可以否决。依照《明治宪法》,众议院民选,而贵族院根本不要对民意负责。伊藤制定的《明治宪法》现在跟伊藤自己开了一个大玩笑。出现如此尴尬,让伊藤既不可能因此而修改宪法,解散贵族院;也无法用突然增加贵族院内支持伊藤方案成员的办法,增加贵族院议员。

不过这些也难不倒“藩阀”,明治天皇任何时候都会为“藩阀”救急。也就是说,“藩阀”让明治天皇干什么,明治天皇就会干什么。“藩阀”元老山县、松方、伊藤等私下密议,他们决定再次利用天皇的力量来迫使贵族院“放行”。

由“藩阀”起草、以天皇名义下达的诏书中称:“增税并扩张军费是考虑到当前内外形势下的急务,况且该预算案已经通过众议院审议,朕希望贵族院成员表现出忠诚,翼赞内阁决定。”[38]

伊藤再次利用明治天皇的诏书将《明治宪法》中的漏洞补上。

预算通过之后,“政友会”的利用价值骤减。1898 年 6 月,伊藤曾主动将政权交给大隈、板垣,然后以下野政治家身份“外游”中国,后来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伊藤计划这次再来一次让权下野,然后外游。[39]

“第四次伊藤内阁”与“第三次伊藤内阁”至少存在两大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是“短命内阁”,其次,都是伊藤上台半年多后就撒手离开政府。“第三次伊藤内阁”时,他主动将政权交给“隈、板内阁”;“第四次伊藤内阁”时,他主动将政权交给桂太郎。还有一个相似就是交权后立刻开始“外游”,1898 年交权后到中国;1901 年交权后的目的地是沙俄。第三次时要“帮助中国君主立宪”;第四次时是要在《日英同盟》或者“日俄协商”中摇摆。

他将政权转交给了自己内阁中的陆军大臣桂,虽然伊藤内阁号称“政党内阁”,可接任的“桂内阁”(1901.6-1905.12)中,一个政党成员也没有。桂内阁此后维持了长达四年之久,其间日本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日英同盟”,再就是与此密切相

关的“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后，日本想方设法要吞并朝鲜。而李鸿章引入沙俄抗衡日本，这让日本不敢在朝鲜轻举妄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出兵中国东北的沙俄没有撤回沙俄境内，而是驻扎在了中国东北。日本鼓噪这是对日本的威胁。日本此前已经刺探到清政府与沙俄之间签署了“密约”的情报。日本曾向中国清政府提出共同瓜分琉球、朝鲜，这些遭到中国拒绝后，日本就转向中国挑战。日本这次向沙俄提出共同瓜分朝鲜，俄国拒绝，日本遂与沙俄敌对，转与英国结友。

一个曾经在日本长期驻在、号称日本通的英国大使曾经断言：“日本若想跟沙俄一战，一定是在获得英国的支持之后。”他的预言后来应验。

从英国的角度来说，与其让日本与沙俄联合在远东共同瓜分，不如让好战的日本与沙俄在亚洲相互消耗一下更有利。

自伊藤在任的1901年4月开始，日本驻英国公使林董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之间，已就《日英同盟》问题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协商。对于“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公开号召国内“卧薪尝胆”，而私下却以国内“反俄国民情绪”高涨为由，要求沙俄让步，也就是说，只有与日本共同“瓜分朝鲜”，日本的对俄态度“才会好转”。“甲午战争”的谈判刚一结束，山县有朋就以参加沙皇登基典礼为名，1896年到沙俄与其签订《日俄协定》。日本以北纬38°线为界，欲将朝鲜划分为南、北两个势力范围，北边属于沙俄，南边属于日本。借助1900年“八国联军共同出兵”，日本原本希望通过与沙俄“协商”获得更多利益，但沙俄与清政府的关系反而越加紧密。看到沙俄“冷淡”，1900年之后，日本转向为中国“伸张利益”，反对沙俄在中国驻军。公开指责是为了压迫对方尽快私下交易，这让沙俄觉得日本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桂太郎内阁挑起日俄战争

1901年5月2日伊藤提出辞呈，23日，元老会议推荐桂太郎出任继任首相。6月2日，桂太郎内阁产生。桂太郎内阁的政治目标是“实现‘日英同盟’”，然后继续压迫沙俄接受日本提出的“满朝交换”。[40]

1901年12月10日（明治三十四年）召集第十六次议会，审议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预算，这次国会于1902年3月10日闭会，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激烈的

争吵。6月21日，政友会中的反“藩阀”斗士——星亨遇刺身亡。[41]



1902年8月10日举行大选，“政友会”在没有总裁支持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多数席位。

1902年12月召集第十七次议会，桂提出要延长地租税征收期限，用以扩张海军，这一预算案当然遭到反对党的反对。28日开始正式审议，这一天桂怀揣解散议会诏书与会，当他对预算案的说明刚一结束，反对派就提出了终止讨论的动议并立刻表决获得通过，桂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解散国会诏书，宣布立刻解散国会，定于1903年3月1日举行大选。[42]

1903年1月2日，伊藤利用去皇太子家拜年的机会亲自前往桂的家中。政府领导人与最大的反对派领导人“欢聚一堂”。谁能想像到，这次桂内阁提出政府预算，众议院中的在野党反对，桂内阁解散议会宣布重新大选，一切的导演者竟然是伊藤博文本人。

身为元老，伊藤早在桂内阁尚未提交议会讨论前就知道了政府预算案，身为反对党的领袖，他也同时鼓励反对派在议会上与桂内阁针锋相对。桂内阁人称“小山县内阁”，表面上他执政，实际上他是山县等藩阀人物的傀儡。伊藤根本不会对政友会的政党纲领以及主义负责，他只想维护“藩阀利益”，对于这次预算审议，伊藤玩弄“明反对暗帮忙”的手腕。

第十七次议会召集前，伊藤与大隈举行了“侯（爵）伯（爵）会谈”，伊藤表示，他领导的“政友会”与大隈领导的“宪政本党”将“相互提携”。在1902年8月举行的众议院议员全国大选中，身为最大在野党总裁的伊藤博文，对选举中自己领导的政党是否获胜，能够取得多数席位等，概不关心，他一方面要求政友会要裁员节省经费，另一方面对自己领导的政党参加竞选一分钱也不提供。政友会干事长原敬在他1902年4月到7月的日记中对此多有记载，他希望伊藤为政友会筹措经费。[43]

可在1903年3月1日后的全国选举中，他突然提供了4000日元的选举资金。

在1902年8月的全国大选中，桂内阁中的警视总监大浦兼武以种种理由干涉选举，而1903年3月的选举中，对去年被检举，今年愿意协助桂政府的人一概释放，不但鼓励他们参加选举，还对可能当选者提供资金帮助，条件是在议会上他们必须支持桂提出的预算案。利用国家机构操纵选举，就开始于这届桂内阁。

议会解散之后，桂与内阁中藏相曾祢私下商议，终止“延长征收地租”案，将“铁道建设费”转为发行公债，同时将原本用于铁道建设费的预算转用于海军扩军。

1903年5月12日。大选结束后的第十八次议会开会，桂提出了解散议会前原样的预算案，它立刻被再次否决。桂威胁议员道：为了让本内阁制定的预算获得通



过，不惜无数次解散国会。

国会议员"刚结束失业重新就业"，现在再次面临"失业必须重找工作"的恐惧，加上议员中已有不少人被藩阀政府收买，伊藤乘机跳出来"和稀泥"，他要反对派接受桂后来提交的、"换汤不换药"的预算案。反对派这时才发现，原来他们被伊藤与桂之间的"谈合"耍弄了。国民、民意、政友会以及立宪本党的众议院议员，都是伊藤以及桂太郎等掌中的玩物。

预算通过后，本届议会结束。6月23日召开了元老、大臣出席的"御前会议"，次日，桂向伊藤、山县以及天皇提出辞去首相职务的要求，可元老谁都不点头"同意"。此后桂退了一步，他与山县一起向天皇提出另外一个"请求"：伊藤以元老身份参与国政，同时又是反对派的政党领袖，一身兼多职于国家不利，恳请天皇下诏，让伊藤离开政友会转任枢密院长。在天皇的干预下，伊藤与西园寺公望调换位子，西园寺出任政友会总裁，伊藤任枢密院长。

利用天皇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藩阀人物在藩阀想干的时候才行，绝无反对派让天皇下诏书，让"藩阀"在某些问题上让步的事例。

桂于1902年12月28日解散第十七次议会，同时宣布1903年3月1日开始全国大选，就在众议院议员被迫"失业"，忙于参选要"重新就业"的时候，1903年4月21日，山县、伊藤、桂、小村寿太郎等四巨头，在京都的山县家中(名无邻庵)召开了"无邻庵会议"，会上决定对沙俄宣战。两个月后召开的"御前会议"仅仅是"认可"或者说"追认"了四巨头决定的事项。

"御前会议"结束后，舆论机器也跟着飞速转动起来，日本国内大肆宣传沙俄对日本的威胁。

8月开始，日本代表在圣彼得堡与沙俄谈判，9月将谈判地点改在东京。日本不断提出无理要求，同时将"沙俄拒绝接受日本的和平建议"的消息不断报道出来，到了年底，也就是准备召集第十九次议会，审议1904年预算的时候，日本国内已经因"日俄谈判"而沸腾了，反对派开始指责"政府软弱"，他们要求政府"立刻终止谈判，向沙俄宣战"。此时的政府异常"温和""中道""冷静"。

1903年12月5日召集第十九次议会，10日举行开会仪式，11日正式开会，会议刚刚开始三分钟，所有政府的提案别说审议，议案尚未提交，桂就宣布解散国会，决定在1904年3月1日开始大选。

国内大选尚未开始，桂领导的政府宣布与沙俄之间的谈判破裂，2月6日断交，2月8日宣战。宣战后日本立刻进入"举国一致"体制。3月1日开始的大选已经是在战争中进行的，与以往相比，大选进行得异常平静，此后的第二十、二十一次临



时国会，审议的也都是战时财政，基本上是在全体一致同意的状况下获得通过，以前议会中的争吵情景早已经无影无踪。用“制造外来危机”来拯救“藩阀专权”，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

藩阀向国内外的公开宣传是：“为了拯救日本于危亡中，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中国以及朝鲜的亚洲人利益”，唯独没有提及战争是为了“藩阀”，几十万日本壮丁死在了战场上，他们的家人因为失去家中的顶梁柱而陷入精神及物质的痛苦中，只有藩阀达到了目的，他们没有被推翻，他们获得天皇颁发的勋章以及奖金，很多人一直活到老死。

每次向议会提交扩张军费的理由都是为了“防御”，而准备好了就向外国宣战的结果表明：准备完全是为了战争。藩阀人物在“准备战争”中大饱私囊，在战争过程中也不忘大发战争财，被煽动起来的无知国民却成为战争牺牲品。

在日俄战争前的御前会议上，明治天皇向决心宣战的伊藤发问道：如果战争失败怎么办？伊藤回答：万不得已时我将亲赴战场，直到战死为止。

伊藤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战争失败，他就用武士传统的“剖腹”一死了之，由此可知，他推动对外战争并没有真正为日本民族着想。

吞并倒霉的邻居 /////////

“甲午战争”后，日本要求中国在七年内赔偿完毕，就在中国赔偿结束的1902年，藩阀政府开始策划下一场“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时，藩阀政府宣称“此次战争是为了朝鲜的独立”，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食言”，日本要将朝鲜变成自己的“属国”。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伊藤博文3月作为“慰问朝鲜国王特派大使”赴朝，与朝鲜国王会见并且滞留一周多，5月份，朝鲜宣布与沙俄断绝外交关系。

1905年9月5日，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刚刚签订，1905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作为天皇的“慰问朝鲜特派大使”赴朝鲜，伊藤称“帮助朝鲜进行内政改革”。无论是此前日本与英国之间的《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还是日俄之间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都要求这些国家承认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有“保护与监督权”。11月，伊藤逼迫朝鲜签署了《日朝协约》，从此之后，朝鲜的外交权由日本“代行”。为反对日本的奴役，朝鲜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政府一方面派遣密使前往美国进行说明，另外有意向外界泄露谈判内容及细节。

《协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立“统监”，1906年3月，伊藤博文作为首任朝鲜统



监来到朝鲜，伊藤成了朝鲜的“太上皇”，他将朝鲜国王的一切都置于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1907 年 6 月荷兰海牙召开“万国和平会议”，朝鲜国王派遣密使前往，揭露日本的“统监”制度实际上是将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该和平会议议长是沙俄人，在日本人的鼓动下，该议长拒绝将朝鲜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伊藤博文得知此事之后，以“拒绝日本的保护就是向日本的宣战”恫吓，同时威胁将对朝鲜宣战，朝鲜国王后来不得不宣告退位，让皇太子李坧即位。1907 年 7 月，伊藤下令解散朝鲜的军队。正是因为伊藤在吞并朝鲜问题上的表现，伊藤博文于 1907 年 9 月被授予公爵号，这是华族中的最高爵位。伊藤于 1909 年 6 月卸任，同年 10 月他准备转道中国去沙俄，还要为日本“再建功勋”。

“甲午战争”后为了能够尽快将朝鲜吞并，日本一直与沙俄之间秘密协商“满韩交换”，“日俄战争”后，朝鲜已经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同时日本继承了沙俄在中国旅顺以及南满铁路上的一些权益，日本的口胃随之改变，日本准备向沙俄提出“满蒙交换”的新主张，以日本同意沙俄在中国北满以及外蒙古享有特殊权益作为交换，沙俄同意日本在中国内蒙古以及南满享有特殊权益。伊藤博文尚未踏上沙俄领土，就在哈尔滨被朝鲜青年安重根开枪打死。1910 年 8 月，朝鲜被日本吞并。

伊藤博文对天皇以及日本的功劳，是建筑在牺牲朝鲜民族的基础之上的，朝鲜人民对他恨之入骨，终于将他送入了“地狱”，而日本人则将伊藤博文的立像摆进了国会议事堂。

---

[1] 木户因反对1874年出兵台湾而辞去参议职务。

[2] 萨摩藩人，后出任过首相。

[3] 萨摩藩出身的政商。李鸿章曾就日本从台湾退兵，支付50万两，相当于5万日元。

[4] 他提出“天皇亲政”，意为抛弃表面上万事天皇亲裁，而实际上事事都是藩阀做主的“藩阀独裁”。

[5] 渡边几治郎著《辅弼明治天皇的人们》千仓出版社 第212页。

[6] 同上书，第214页。

[7] 参照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十五）近代二、第74—76页。

[8] 1882年（明治十五年）3月2日《原敬日记》：“晚与井上（馨）外务卿会晤”。当时原敬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以他的地位，而且用“会晤”这个词，说明不是他主动“拜会”政府高官，同时也并非是井上外务卿有事要透露，主动“接见”民间记者。寥寥数语的简单记载，流露

出这次“会晤”不同寻常。虽然《原敬日记》本身没有透露出上述内容以外的任何信息，但是原敬后来的行为告诉了我们答案。

与井上“会晤”后，原敬离开了他所在的报社，经井上的斡旋转入了藩阀政府暗中支持的《大东日报》，任该报总编。当月14日就任，月工资80元，再加交际费50元。该报只存在了8个月，10月份解散之后，原敬并没有因此而失业，而是再次由井上馨安排，摇身一变成为了外务省的官吏，主要工作是翻译法国的电讯。在外务省工作1年左右后，1883年11月被派往中国，任天津领事。当时法国在安南与中国清政府发生武装冲突，日本希望法国在安南，日本在朝鲜，一南一北“围剿”清政府。派原敬出任天津领事是因为他会法语，同时李鸿章在天津办公，日本要他穿插于中、法之间。

在天津，原敬首次遇见前来与李鸿章谈判的、藩阀政府的头面人物-伊藤博文。《天津条约》签署后，他获得慰劳金700日元，6等功勋。1885年5月9日（明治十八年）被派往法国任外交官。同年底（12），日本开始实行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外务大臣为井上馨（参照前田莲山著《原敬》时事通讯社65—78）。

[9] 久米正雄著 林其模译 《伊藤博文时代》团结出版社 第9页。

[10] 1879年，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曾访问过日本，他曾向天皇提出过模仿美国的制宪建议。

[11] 币原喜重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从昭和五年左右开始，宪法中的漏洞完全暴露出来，大家都不提宪法这个词，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宪法问题。此时已经没有元老也没有元老会议了，只好大家摸着黑对付。如果宪法中有‘内阁大臣由总理大臣（首相）任命’这一条，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12] 尾崎行雄著《民权斗争七十年》读卖新闻社 第86页。

[13] 同上书、 第80页。

[14] 《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十五（近代2）岩波书店 第266页。

[15] 中村尚美著 《大隈重信》吉川弘文馆 第228页。

[16] 大津淳一郎著《大日本宪政史》第三卷 第636—638页，中村菊男著《伊藤博文》时事通信社 第54页。

[17] 尾崎行雄著《民权斗争七十年》读卖新闻社 第171—175页。

[18] 同上书 第82页。

[19] 1894年3月28日，金玉均在上海被刺杀。据说杀手受闵妃指派，可杀手却是从日本一路追随金玉均来到了上海，也就是说，背后指示者希望金玉均死在中国上海。日本开始要尸体，清政府同意给了，可日本在即将接收之前说不要了，结果清政府用军舰将尸体送回朝鲜，金玉均在朝鲜被暴尸，日本国内舆论攻击政府软弱，中国清政府无礼，要求对清政府宣战。金玉均1884年底因受日本支持的政变失败逃往日本，10年间都被日本冷落一旁，几乎在1894年朝鲜国内爆发东学党运动的同时，金玉均被启用派往中国上海，据说是伊藤博文要利用他代表朝鲜，与中国的李鸿章一起商讨中、朝、日三国联合，由日本帮助改革。

[20] 尾崎行雄著《民权斗争七十年》读卖新闻社 第85页。

[21] 日本历史故事中的主人公。率领虾兵蟹将去抢夺财产，后来满载而归。

[22] 参考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

[23] 同上。

[24] 渡边几治郎著《大隈重信》时事出版社 第136页。

[25] 尾崎行雄著著《民权斗争七十年》读卖新闻社 第259页。

[26] 中村尚美著 《大隈重信》吉川弘文馆250页。

[27] 《桂太郎自传》平凡社东洋文库。

[28] 尾崎行雄著《咢堂回顾录》雄鸡社 第262页。

[29] 尾崎行雄著《民权斗争七十年》读卖新闻社 第277页。

[30] 参照川原吉次郎著《桂太郎》时事通讯社 第38—50页。

[31]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乐观地估计："以中国之人民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32] 日本学者吉野作造对"大陆浪人"是这样定义的：一些人愤慨于藩阀专制，因而埋头于政府革新的运动。另外一些绝望于国内当世，而求友于邻邦，首先一新东洋的空气，由之冀求慢慢地改进其祖国。后者虽然是少数人，但是他们却或往来于朝鲜，或投身于中国，而直接、间接地帮助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梦》中说：国内无法反对藩阀，就在对外扩张上充当藩阀走卒，这就是日本民权分子的演变轨迹。

[33]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232—233页。

[34] 第二次山县内阁时，山县从宫内省支取了98万日元的巨款（相当于今天的50亿日元），资金流向至今仍然是个谜。《原敬日记》中说：难以相信这些钱都用于操纵议会。跟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是否有关呢？菲律宾的殖民地宗主国美国支持日本北进，以缓和日本对菲律宾的压力。

[35] 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06—207页。

[36] 后来的首相、西园寺公望的哥哥，住友财阀的大股东。

[37] 参考尾崎行雄著《民权斗争七十年》读卖新闻社 第255页。

[38] 同上书 第112页。

[39] 第二次大隈内阁时，为了让袁世凯能够尽快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制定了"派遣特使，假借漫游的名义前往，一定要选派让袁世凯信服的、有地位并且有手腕的人物前往"的秘密对策。（《大隈重信》《四元老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70页）

以漫游为名，实际上暗中进行负有使命的政治活动，这是日本阴谋外交的一个特点。1898年的伊藤外游，最终造成中国"百日维新"失败，失败后日本立刻邀请康有为赴日本避难，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先入日本使馆，后登上日本船只亡命日本。

[40] 日本希望用《日英同盟》讹诈沙俄接受日本提出的"满朝交换"。朝鲜是个独立国家，满洲是中国领土，日本竟要拿一个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地盘去交换另外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盘。日本私下与沙俄谈交换，沙俄不接受他们就宣称要开战；而对外公开指责沙俄占领满洲，威胁朝鲜，日本俨然一个为中、朝主张正义的国家。1902年5月，英国海军大臣对日本驻英公使林董表示：日本与英国海军力量不对等，若要共同防卫，只有在日本海军具有与英国海军同样的实力之后才有可能（与现在的《日美安全保障协定》有相似之处）。

也就是说，在享受权利之前义务必须对等。这同时意味着，日本如果要发动战争，必须自己承担责任。

[41] 1921年第三任政友会总裁原敬遇刺身亡，此后的总裁高桥是清在1936年遇刺身亡。

[42] 日本武士的一个特点，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让你也无法达到目的。

[43] 1902年7月15日，"去大矶会见伊藤。希望提供资金支持。伊藤不理。"1902年11月6日，"伊藤冷热变化无常，最近尤甚"。

第七章 明治宪法孕育的"畸形儿"



发出警世箴言的"侏儒"

芥川龙之介，1892年出生于东京，因生于龙年龙月龙日龙时（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取名"龙之介"，号"柳川龙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他同时还是俳句高手，俳号"我鬼"。生父名新原敏三，原籍山口县，在东京经营牛奶业。龙之介出生9个月后母亲精神失常，遂被舅父芥川道章夫妇收养，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代在将军府中任文职，"一新"后，养父在东京府任土木科长，养母精通诗书琴画，家里有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他自幼喜欢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上中学之后，广泛涉猎欧美文学。1913年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专攻英文。上学期间，成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1915年发表《罗生门》，但此时并没有受到文坛的重视。

芥川很喜欢写强盗，强盗的特点是"恃强凌弱"，《罗生门》就是一篇"将强盗行为正当化"的作品。中国儒教中有"渴死不饮盗泉之水"的说教，可在作者的笔下，一切都冠以"为了生存"的美名，将抢夺这一罪恶行为美化为合情合理。"罗生门"上，老妪"犹如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似的，一根根地薅起（死人）那长发来了。头发好像顺手就薅了下来"。

拔下一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死人的头发，对老妪来说易如反掌并且没有任何罪恶感："可不是呢，薅死人头发这挡子事，或许是忒缺德的事，可是，撂在这（罗



生门上）的死人，一个个都欠这么对待。被我刚薅掉了头发的女人嘛，生前把蛇切成四寸来长，晒成干，说是干鱼，拿到带刀的警卫坊去卖”。

在老妪看来，她要生存，而且没有其他的生存手段，拔死者头发出售，实际上与死者生前卖假鱼干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生存所迫”的“无奈”与“不得已”。

“那些带刀的说这女人卖的鱼味道好，当作少不了的菜肴来买呢。我并不觉得这个女人做的事就怎么坏。不做就得饿死，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啊。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事，我也不认为是为非作歹。我也是为了免得饿死，没有出路才这么干的。是啊，这个女人很了解我没有出路这一点，会宽恕我的行为吧”。

从老妪口中听到这一切的仆役，手里有大刀，年轻力壮，他看到、听到的一切，不但丝毫没有激起他扬善惩恶的念头去制止，反而像似提醒了他，已经成为浪人的仆役，同样认为自己要生存，“不得不”重复老妪的行为。既然老妪可以抢夺一个比她弱的、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死尸；仆役也同样可以抢夺一个比自己弱的、无法反抗自己的老妪。

“仆役麻利地剥下老妪的衣裳，接着，他将紧紧搂住他腿的老妪，粗暴地踹倒在死尸上，离楼梯口只有五步远。仆役腋下夹着剥来的黄褐色和服，眨眼之间就沿着陡直的楼梯跑下去，消失在夜幕中”。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 8 月出兵中国山东，将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收入囊中后，1915 年 1 月就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芥川在 1915 年 9 月完成了该作品，11 月公开发表。



1916 年大学毕业前，他在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了《鼻子》。[1] 这篇作品受到夏目漱石的极力赞扬，1916 年又接连发表了两篇作品《芋粥》《手绢》[2]，从而奠定了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他在镰仓

芥川龙之介

日本大正时代小说家，全力创作短篇小说。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了超过 150 篇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取材巧妙，情节新奇甚至诡异。作品关注人类社会丑恶现象，但避免直接评论。他用浅显的文字，质朴的故事，呈现给每个日本读者必须认真思考、极为深刻的现实问题。它是日本专制政府高压钳制思想下的一朵奇葩。

海军机关学校任教三年。1919年27岁时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成为签约职员。[3]

1921年3月底到7月中旬，他来中国访问，年龄刚满29岁。[4]报社给他一个"海外视察员"的头衔，承担食宿的所有费用。他在中国共访问了近20个城市，在中国访问期间，他特意拜访了几个重要人物，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有：李人杰（又名汉俊）[5]、章炳麟、胡适、辜鸿铭（当时64）[6]等，因为芥川是学英文的，与后两者交谈时没有翻译。

芥川在此时受报社资助出游中国，显然，报社希望借助芥川的影响力达到某种目的。在芥川抵达上海的次日（3月21日），大阪《每日新闻》专门刊登大幅广告，称著名作家芥川将从中国发回报道。从后来连载的文章可以发现，报纸上发表的《中国游记》，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而是要迎合政府的宣传口径，将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中国形象"打破。

广告称将用连载方式发表芥川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可事实表明后来并没有实现，据说是由于芥川本人的种种原因无法履行约定。《上海游记》于1921年8月、《江南游记》于1922年1月、《长江游记》则在1924年8月起才开始陆续发表。1925年11月，"改造社"出版发行了《中国游记》单行本，这时添加了《书信一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有许多丑化中国的内容，可它究竟出自芥川本人之手还是报社有一个专门写作班子背后操刀炮制，这些现在尚不清楚，但毫无疑问，芥川短暂人生中的唯一一次出国访问，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仅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对在报纸上发表《中国游记》似乎已经失去兴趣，同时，文学作品却前所未有地多产并深刻。[7]

在上海，芥川访问了章炳麟，这位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日本长期居住并对日本有深刻的见解，芥川在《上海游记》中，对访问章炳麟有详细的记载。1921年4月26日，他前往法租界访问章炳麟。当日春寒料峭，阴雨霏霏。他拜会章的深刻印象有三，其中之一是书斋中悬挂一个巨大的鳄鱼标本，芥川"对主人的志趣产生了疑念"。这部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可最让芥川受到冲击的内容，却发表在1924年3月9日的《女性改造》杂志中题为《僻见》的文章里。章炳麟对芥川说："我最厌恶的日本人是征伐鬼岛的桃太郎，同时对热爱桃太郎的日本国民也不得不多少抱有反感。"

听者芥川感叹道："章太炎先生是个贤人，我每每听到外国人嘲笑山县公爵，颂扬葛饰北斋，责骂涩泽子爵，然而从未听到任何一位日本通像我们的章太炎先生这样，向桃子所生的桃太郎射出一箭。不惟如此，先生的这一箭远远要比所有日本通的雄辩都含有更多的真理。"[8]

芥川1921年7月中旬回国，8月就发表了一篇以芜湖为舞台的短篇，题为《母亲》。[9]12月，芥川发表了以日俄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将军》[10]、《树林中》，1924年7月，他发表了改编了的《桃太郎》。

鬼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热土中。“在热带般的风景中或弹琴或跳舞，或吟唱古代诗人的诗歌，安居乐业。鬼的妻子和女儿或织布酿酒，或用兰花编织花束，生活与我们人类无异”。“桃太郎厌恶像爷爷奶奶那样上山下地干活，他好逸恶劳，想从掠夺中让自己生活富裕起来。他残忍好战，而且狡猾奸诈，善于用利诱，招降纳叛。猴子、野鸡、狗等，都被他用股份鬼岛珍宝为诱惑收买而来。此辈唯利是图，并非什么忠义之士。”“桃太郎一手挥刀，一手摇着绘有太阳图案的‘膏药扇’，率领爪牙要将鬼族斩尽杀绝，一个不剩”。“没有比饥饿的动物更具备忠勇无双的士兵资格的了。他们个个都像狂风暴雨一般，追逐着四处逃命的鬼们。狗张开大口，只一口就咬死了一个年轻的鬼；野鸡也不甘落后，用他那尖利的嘴，把鬼的孩子一戳就戳死了；猴子果然不愧与我们人类有亲族关系，在扼死鬼的女儿们之前，必定要先肆意奸淫凌辱一番。”

“桃太郎后来率领三个家臣满载战利品，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满心以为这下可以用掠夺来的财宝荣华富贵，享乐天年，一下成为了富豪，但是没想到制造了对手，鬼岛从未停止反抗。桃太郎不停地遭到报复，来自鬼岛游击队的袭击，若不是鬼岛上的反抗者误将猴子当成桃太郎，桃太郎的脑袋早就被砍掉了。月高风清之夜，鬼岛上的反抗分子聚集在椰子树下，他们不是为了谈情说爱，而是将炸药塞进椰壳，他们要夺取鬼岛的独立。在桃太郎看来，这些人是反抗暴乱分子。”

芥川的人生格言是“人生不过是条船线”，在他短短12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写了148篇短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他的作品，每篇都要力争表现一种思想，与其说有故事、有情节，不如说故事及情节都要服务于表现思想。换言之，为了反映思想安排故事及情节。对于他小说发生的背景很多不是现代而是古代，他本人是这样说明的：“比如说，我现在选一个题目，写篇小说，为了能充分表现好这个题目，要找一个非常的事件。这是异常的事件，正因为它非常与众不同，所以作为当今日本现在仍在发生的角度来写就非常困难。如果硬要写下去，很多时候会将不自然的感觉带给读者，这时，费尽精力选好的题目也白白浪费了，为了克服上述苦难，只能选古代、外国或者古代外国的故事。我从古代挖掘作品内容通常都是由于上述原因，为了避开不自然这个障碍而选择古代的。”[11]

1927年7月24日，芥川用吞食大量安眠药的方式自杀，享年36岁。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这一遗书中，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感到“朦胧的不安”，至于“朦胧的

不安”究竟是什么，后世研究者各发己见。有人说他出于对精神分裂预感的恐惧，有的说是因为异性问题，对于身体多病的痛苦，还有人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才华根绝，油灯耗尽。上述所有推测，都将他的死归结于他的个人原因，没有与另外一个人物以及那个时代联系起来。

芥川在《长江游记•芜湖》中有这样一段话：“唉，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灵昏聩，想必比起我一介游客，怕是更要深感嫌恶的吧”。这说明他对受到日本欺侮的中国并没有绝望。1924 年他发表了《侏儒之言》。顾名思义，才华横溢的作者此时将自己比做“侏儒”，在“倭寇”一节中“侏儒”说：“倭寇的事实证明我们日本人有足够的能力与列强为伍。我们在强盗、杀戮、奸淫等方面，决不劣于寻找‘黄金之岛’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12]

他对沉浸在靠抢夺致富的疯狂“桃太郎”以及整个日本绝望。一介文人书生，武器只有一支笔加几篇文章，与握有刀枪并且以财富为诱惑的武士相比，芥川仅仅是力量渺小的“侏儒”，他无法改变“桃太郎”本人，以及桃太郎用诱惑手法拉起一个队伍去日本岛外掠夺的现实，自嘲为侏儒的芥川选择了离开人世。

1927 年 4 月(昭和二年)，继承长州藩扩张侵略衣钵的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首相，“桃太郎”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芥川所谓“朦胧的不安”，应该是他对昭和天皇、昭和时代以及未来日本的不安，他与昭和天皇“不共戴天”，他怕今后“死无葬身之地”。

八年后的 1935 年，他的好友菊池宽设立了以芥川名字命名的文学奖，1945 年，“桃太郎”终于走向破灭。

明治天皇

内阁	主要任务
第一次桂内阁（1901.6.2–1905.12.21）	为进行日俄战争而组建的内阁
第一次西园寺内阁（1906.1.7–1908.7.4）	处理战后事宜的“擦屁股”内阁
第二次桂内阁（1908.7.14–1911.8.25）	为吞并朝鲜而组建的内阁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1911.8.30–1912.12.5）	过渡内阁，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明治天皇去世



明治天皇于1912年8月去世，5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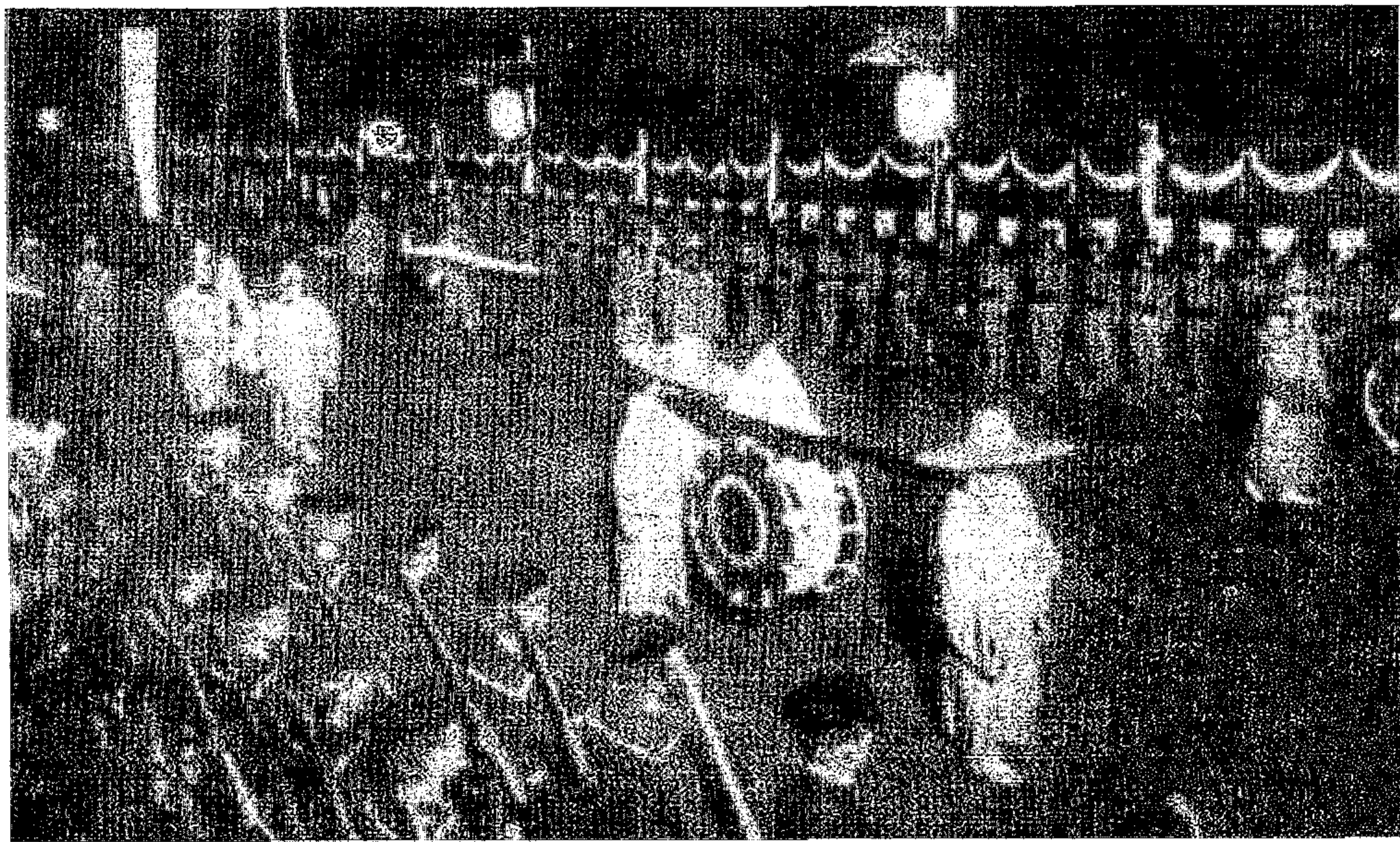
1904年2月8日，日本对沙俄先偷袭再宣战，也就从这一年开始，明治天皇患上了糖尿病，1906年起并发肾病。到明治天皇去世时为止，日本经历了1909年伊藤博文被射杀，1910年吞并朝鲜，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等几件大事。

为了确保证“日俄战争”能够进行下去，“藩阀政府”想尽一切手段筹钱，一在国内增税、发行巨额国债；二向国外大规模举债。到1905年底，日本国内外负债累计达22亿日元，而战前每年的财政预算才2亿5000万日元。战争花费了17亿1000多万，超过战前1903年年收入的六倍半。

1906年1月7日，桂被免去总理大臣职务，“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3]。这是自内阁制建立以来，政权首次移交给藩阀以外的人物（1898年的限板内阁是个例外）。即便这种“公权私授”，也是早在1905年8月就私下协商好了的内容。与中日“甲午战争”不同，“日俄战争”后日本没有获得割地与赔款，这让藩阀政府面临的危机加剧。为了避开反对派的反对，藩阀政府决定让西园寺领导的反对派来充当挡箭牌。这次交易的幕后内容为：“由反对派出面组阁，作为交换，反对派不再攻击藩阀。”

明治天皇的葬礼

多数日本人认为明治好昭和坏，尽管这样看的理由因人而异，但从胜败这一定位两个天皇的日本人不在少数。明治时代打了胜仗，昭和天皇打了败仗，仅此而已。



1908年1月,桂太郎致函元老山县有朋:"言财政,言外交,言内务,然作为一个整体,内阁全体之统一则不见,若如此继续发展下去,'国家丸'将驶抵哪个港口?实在令人不安。"

经过两年的"韬光养晦",藩阀人物桂太郎迫不及待地要重掌政权。他攻击西园寺内阁:"对反对明治天皇者取缔不利。"1908年7月,西园寺内阁总辞职,桂接任,组建第二次桂内阁。第二次桂内阁的目标是:吞并韩国。

1909年10月,"亲俄"的伊藤博文离开日本到达哈尔滨,俄国财政大臣科克普佐夫登上伊藤乘坐的专列,他邀请伊藤博文下车检阅在站台上的仪仗队,当他们先后走出车厢外时,混在人群中的朝鲜青年向伊藤博文开枪,伊藤博文中弹死亡。

这次事件加快了日本吞并朝鲜的步伐,1910年8月,日本胁迫朝鲜签署了《日朝合并条约》。与此同时,桂让西园寺下台时的传闻变成现实:"大逆事件"爆发。1910年5月,检察机关逮捕了一个所谓预谋暗杀明治天皇的集团,12月10日起在最高法院"公审",1911年1月就宣布24人死刑。经明治天皇干预,一半人被改判无期徒刑。

伊藤博文死了,再受"大逆事件"的刺激,明治天皇的病情日益恶化,他经常念叨:"我死了之后,世道会变成什么样?我想死,想快点死了算了。"

1911年8月,桂再次将政权交给西园寺,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开始。与桂首次将政权交给西园寺同样,这次依然是藩阀主动交权。桂交权下野,是准备以平民身份外游,桂计划完成1909年伊藤没有完成的任务:"日俄协商""满蒙交换"。

在后藤新平等的陪同下,桂于1912年7月6日前往沙俄,7月28日,日本传来明治天皇病危的消息,桂中止行程,从沙俄紧急返回日本。途中他用德语创作了一首诗:"如果日本与俄国能够在中国问题上合作,我们将所向无敌"。7月30日,明治天皇死去。

大正天皇时代的准备

从1912年8月大正天皇即位到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时为止,日本经历了短暂的大正时代,共14年。除去昭和天皇出任摄政的五年(1921年底-1926年底),大正时代实际只有九年。

内阁	主要任务
第三次桂内阁（1912.12.21–1913.2.11）	准备再次对中国强硬
第一次山本内阁（1913.2.20–1914.3.24）	应对中国的袁世凯政权，暗中支持反袁的“二次革命”
第二次大隈内阁（1914.4.16–1916.10.4）	应对袁世凯政权，偶遇到一战爆发，乘机对华强硬。
寺内内阁（1916.10.9–1918.9.21）	要消化“二十一条”，意外遇到俄国革命，转向出兵西伯利亚。

“第三次桂内阁”与“大正政变”

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期间，沙俄让“外蒙”独立，日本则野心更大，同时策动“内蒙独立”“南北分治”“满人治满”，最终所有阴谋都因为袁世凯掌权而失败。山县有朋指责西园寺在中国问题上没有把握住机会。

明治天皇1912年8月下葬，在年底召集的国会上，陆相上原勇作向首相西园寺提出：增设两个师团。

作为“明治立宪之父”，1898年伊藤博文宣称要“帮助中国”实现“君主立宪”，中国行之前他将政权交给了反对派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后者临时拼凑了“宪政党”并组建内阁。伊藤将首相职位让给了大隈及板垣的同时，安排桂和西乡从道分别出任隈板内阁中的陆军、海军大臣。桂与西乡的主要任务有两项：(1)监视、控制反藩阀的大隈与板垣；(2)作为定时炸弹存在于内阁中，萨、长藩阀不满意时可随时“引爆内阁”。

1898年隈板内阁时，“引爆”实际上并未发生，可在1912年的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引爆”变成了现实。上原勇作提出要增设两个师团，西园寺1912年12月1日公开表示反对，但私下保证下一年度实现。即便如此，陆军大臣还是在次日，不经过首相，以《明治宪法》中天皇直接统帅军队为依据，直接将辞呈提交给了大正天皇。同时，陆军的实际操纵者山县有朋拒绝推荐继任人选，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因此被“引爆”，西园寺只好于5日提出辞职。这是进入大正时代之后，首次由陆军掀起的“大正政变”。

桂8月11日返回东京，当时他已是一个无官无职的“闲人”，两天之后的8月13日，他出任大正天皇的内大臣兼侍从长，而以往这个职位历来都是由京都的世袭贵族出任。到了12月17日，桂再从天皇的侍臣突然转变为首相，组成“第三次桂内阁”。

西园寺两次获得政权，都是桂主动授之；而西园寺两次交权，也都是在桂的逼迫之下。也就是说，桂要他接权就必须接；让他还回来就必须还。长州人如此跋扈让萨摩人不满，桂组建第三次内阁时，萨摩控制的海军也甘示弱，同样以拒绝推荐海军大臣回敬桂，但桂采用了当年伊藤博文的老手段，他让大正天皇为自己下诏。天皇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大正天皇下令，前任海军大臣斋藤实最后"服从命令"留任，内阁终于组成。长州藩阀可以采用的手段并非萨摩也可以采用。

国会开始之后，反对派继续在国会内反对桂。1月21日，他下令议会休会15天。2月5日议会重开，反对派再次提出"内阁不信任案"，桂下令再休会五天。事后桂找到西园寺，要他说服反对派撤回不信任案，被西园寺拒绝。桂看到这一招不管用，就继续用老办法：再次要求大正天皇下令。大正天皇召见西园寺，重提桂的要求，西园寺遂用辞去"政友会"总裁职务的方法抗命。

2月10日议会复会那天，约6000多人包围了议会，他们与桂召来的军警发生激烈冲突，暴乱迅速波及全国。面对严峻的形势，2月11日桂总辞职。内阁只生存了57天，以寿命之短破了日本宪政史中的纪录。

第三次桂内阁是明治与大正之交的首届内阁，新天皇年富力强，反对派也日渐成熟并强大，伊藤博文"架空"明治天皇的那种统治已经成为了历史。日本历史上将这次反对派反对长州藩阀的运动称做："第一次护宪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护宪"竟然是要将《明治宪法》中"天皇总揽大权"落到实处。也就是说，明治天皇的实际权力与《明治宪法》中规定的内容"货不对版"，反藩阀派要通过支持大正天皇专制来反对藩阀专制。"大正民主运动"因明治宪政畸形而畸形，它最终孕育出一个怪胎：要实现天皇专制。桂内阁崩溃后，1913年2月20日，萨摩出身的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14]。

1912年8月袁世凯任命孙中山为铁路总办后，孙中山立刻提出要访问日本，希望日本提供资金，帮助他实现在全中国建立铁路网的梦想。多次要求都被日本拒绝[15]。1913年3月孙中山访日终于成行，这时桂已经下野，他与桂太朗[16]见面后不久，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遇刺[17]，孙中山表示"非去袁不可"。孙中山修铁路日本说没钱；可对他的反袁革命，日本既给钱又给枪炮。1913年7月中国爆发"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反袁派相继逃亡日本，在袁世凯政权渐入佳境的时候，桂神秘死去。[18]

看到中国局势再次发生变化，日本国内迫切需要更换山本。

以前藩阀内阁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都是在每年一度的、审议预算的国会中展开，这次山本内阁的预算案在国会中"绿灯"通过，可在贵族院遇到了"红灯"。贵

族院反对众议院通过的海军预算，贵族院要求大幅度削减，贵族院与众议院意见对立，两者协商也无法达成妥协，这时爆出海军收受西门子公司贿赂的丑闻，山本于1914年3月23日引咎辞职。后来发现，一切与山本无关。

“第二次大隈内阁” /////////

1898年，日本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搞“君主立宪”，结果中国维新“百日结束”；1914年听说中国袁世凯准备搞“宪政”，日本再次将大隈这个已经远离政权16年的老人推上首相宝座，而推荐76岁的大隈重信上台并为此专门奔走的，是已经半身不遂的78岁元老井上馨。

日本各界将老人大隈重返政坛戏称为“命运的捉弄”[19]。

大隈两次组阁都与中国“立宪”有关；两次出任首相也都不是日本宪政运动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藩阀首脑在幕后操纵。明治元年大隈30岁，山县有朋比他小一岁，井上馨比他大三岁，与山县等藩阀人物40岁左右出任首相相比，大隈第二次出任首相时已77岁，比藩阀人物晚了30年，原本应向天皇推荐其他人当首相的人，现在竟然是被推荐人。第一次大隈内阁时，“志士”平冈浩太郎曾积极参与；第二次大隈内阁也同样，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内田良平是幕后联络人。[20]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之后，8月8日，元老山县有朋专门向大隈提出了一份政策实施纲要。内容是要日本“坐山观虎斗”。可井上馨称一战为日本的“天佑之机”，日本以自己是英国同盟国为由，8月23日，天皇突然下诏向德国宣战，宣战之后立刻出兵夺取了德国在中国青岛以及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大隈送给袁世凯的“礼物”是1915年初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既不是大隈个人的突发奇想，也不是因为一战爆发，日本突然临时拼凑出来的方案，它无论内容本身还是谈判手法，都是“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对朝鲜的《日朝协约》的翻版。日本要将对朝鲜成功的经验用在对中国上。

日本宣称“甲午战争”是为“朝鲜独立”而战；“日俄战争”是“以将沙俄从满洲清除、归还中国为目的”而战，这次对德国宣战，应英国要求，日本向世界宣布：“以将青岛归还中国为目的”。日本占领青岛后，只字不提归还问题，积极策划要在欧战结束之前，单独与中国解决“悬而未决的所有问题”。

1905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向朝鲜派出伊藤博文；这次日本内部再次出现了“派遣特使”的意见。“假漫游名义‘派遣特使’，一定要选派处于让袁世凯信服地位并且有手腕的人物前往”。[21]元老们向大隈推荐了后藤新平，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最终没来。[22]



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在接到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提交的书面要求之后，采取的手段竟然与当年朝鲜应对日本的同出一辙。[23]袁世凯一边拖延谈判；一边将谈判内容有意泄露出来，日本的野心及贪婪立刻传遍了全世界。以前曾积极参与反袁的革命党人，这时起也最终明白：日本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他们停止了反袁活动，同时他们宣称：除非袁世凯称帝，否则他们将不再反对袁世凯。内田良平则要利用这一点置袁世凯政权于死地。[24]

日本一方面向袁世凯灌输"帝制有利于高效管理国家"，为了帮助中国成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日本愿支持袁世凯建立帝制；另一方面，对革命党人谎称"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主动提出的，以此交换日本支持他称帝。就在袁世凯在中南海里筹划称帝时，孙中山等反对派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全中国掀起了推翻袁世凯帝制的"第三次革命"。待中国爆发反袁运动之后，驻北京的日本使馆率领外交使团"劝袁世凯缓称帝"，理由是"帝制"给中国带来混乱。被日本折腾的袁世凯于1916年6月死去，10月大隈交权下野。

推荐大隈上台的是长州藩，迫使大隈交出政权的依然是长州藩。中国各地的内乱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更多实际利益，推翻了袁世凯之后，日本迫切希望与袁世凯之后的段琪瑞政权建立联系。大隈辞职后，他推荐加藤高明[25]为继任首相，而以山县为首的长州藩阀，推荐了同属长州藩阀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

寺内上台，一方面想将大隈政权文字化了的"二十一条"消化，另一方面准备与沙俄携手压制北京政权。为了讨好段祺瑞政权，于1917年1月开始推行"西园借款"。日本利用沙俄在欧洲战场吃紧之机，以提供武器、物资支持、说服中国参战为条件，要求沙俄将中国北满的权益转交给日本。

1918年3月(俄历)俄国爆发"二月革命"，11月再爆发"十月革命"，苏联将日本提出的"交易条件"公布于众，可这些并未引起北方政府的重视。新生国家的诞生，反让日本从一战时联合沙俄共同对付中国，突然转变为利用北京政权，"共同"对付苏联。日本于1918年8月出兵西伯利亚。

"日俄战争"结束后藩阀要西园寺出来收拾残局；一战结束藩阀准备再让西园寺"出马"。山县竭力推荐西园寺，而后者坚辞不就。原敬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山县将竭力妨碍政权归'政友会'，不到一筹莫展时决不会推荐我"。山县在多次推荐西园寺无果的情况下，接受了西园寺推荐的原敬。原内阁于1918年9月29日成立，原内阁出现的表面原因是：国内出现了"大米骚乱"。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山县依然在原内阁中安置了随时可以摧毁内阁的定时炸弹，原内阁中的陆相



是长州出身的军人田中义一，海相是萨摩的加藤友三郎。

“藩阀”与大正天皇双双退场

一战爆发让日本大发了一次战争财。“日俄战争”时的内、外债一笔勾销还不算，国内收入首次开始出现盈余，1917 年是日本开始转变的好年份，日本开始为昭和天皇选妃。

1917 年 1 月，经贞明皇后挑选，久迩宫良子王女内定为皇太子妃。9 月，天皇家与良子家交换了订婚信物。此后，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可一战后的局势却让日本政府高兴不起来。1918 年西伯利亚出兵没有收获，1919 年朝鲜、中国，先后爆发反日的“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日本成为亚洲国家的“公敌”。当时还是青年贵族的近卫说：“日本被看成是侵略之国、强盗之国。”

一战前日本曾计划联俄、联德对付中国；一战后两个帝国消亡。德国战败，新生苏联已经没有向东方扩张的野心，同时，日本对领土的贪婪震惊了整个世界，对于 1922 年 7 月期满的“日英同盟”，英国已公开表示不再续期。日本想利用自己充当英国“亚洲宪兵”的机会，威胁中国，甚至威胁美国。为了增强与英国的“密切关系”，山县与原敬策划皇太子出访，希望通过“皇室外交”，修复已经出现裂痕的“日英关系”。

1919 年 11 月(大正八年)，原敬提出希望让皇太子出访欧洲，山县等人立刻表示赞同。原敬一直以来都是反藩阀的“政友会”的实际领导人，在议会中，政党历来高举“护宪”大旗，以实现《明治宪法》中的“天皇专权”作为反对藩阀的手段。可当两个昔日的冤家对头真正坐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与手段竟然惊人地一致，都将皇室视为“董事会中的董事”。

对于藩阀总头目山县想利用皇室展开“皇室外交”，历来对山县存有戒心并反感的皇室表示反对。皇后以“大正天皇生病，皇太子出访万一有个闪失”为由，不同意皇太子出访。从明治到大正，日本没有天皇出访外国的先例，而且日本被称为“神国”，一战后很多帝国瓦解，君主退位，这时让天皇出访“不合时宜”。

明治、大正之交的藩阀与皇室的斗争，将桂推到了风口浪尖，桂死了，下一个人物是原敬，而幕后操纵者依然是山县有朋。明治时代以来，对藩阀的安排，皇室从来不敢说“不”。大正天皇自恃有反藩阀的政党撑腰，开始对“架空”皇室抵抗，两强相斗，最终的结局是大家一起完蛋。

1920 年夏，山县以从前红十字医院院长平井处获得消息为由，干预起皇室的婚



姻。据说平井告诉元老山县有朋：岛津公爵家与久迩宫家之间有色盲遗传，他们两家结合生育良子，一旦嫁给皇太子，恐怕会将色盲遗传给后代。

日本的“大奸”总是以“大忠”面目出现。岛津家原是萨摩藩主，他们与皇室的久迩宫联姻，他们的后代再与皇储结合，皇室势力将更加强大，这对操纵皇室构成了威胁。对大正天皇行使权力问题，皇太子公务出访问题，皇室开始说“不”本身表明，皇室已经开始公开与元老冲突了，假如这时山县不还皇室以颜色，那么今后将无法控制皇室。山县找来元老西园寺公望、松方正义，要他们俩去说服宫内大臣，通过宫内大臣压迫大正天皇提出退婚。宫内大臣波多野敬直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后因他无法完成任务，波多野被免职。

山县推荐了自己的党羽—陆军中将中村雄次郎出任宫内大臣，新大臣中村全力以赴，要以“科学依据”作为突破口。中村找来东京大学的副教授三浦谨之助，三浦的结论是：良子王女的后代中必将产生色盲。山县再次找来元老西园寺公望、松方正义，要求伏见公博恭亲王劝说久迩宫解除婚约。良子的父亲邦彦异常愤怒，他也用医学权威的意见回敬山县，他委托的医学权威的意见是：色盲不遗传。

山县乘机提出要复查，要求文部大臣安排医学专家。文部大臣挑选了四位专家，专家们深知自己的意见会被双方利用，也就是说，专家意见会卷入政治阴谋。一边是皇室，另一边是藩阀，哪一方都不能得罪，最后两个专家说“会”；两个说“不会”，将皮球踢回给了文部省。

面对山县的高压，久迩宫找来头山满等日本右翼，他们公然表示要暗杀山县。反对藩阀专权的内务大臣表示：“反对呼声日起，暴力活动随时可能爆发，自己无法安排足够警力保护山县”。历来对山县不满的大限、山本权兵卫等，更将这次事件看成是山县蔑视皇室的行为。山县安排的宫内大臣中村雄次郎不得不辞职。山县继续向皇室施压，他以辞去元老职务要挟，而皇后用“不许可”回敬。婚姻的私事与出访公务纠缠到一起，头山满等“右翼”到处散布谣言：“朝鲜人策划骚乱，欧洲到处都是工人罢工，皇太子到外国不安全”等，阻止皇太子出访。他们煽动民众去明治神宫祈祷“天皇康复，终止出访”，还组织人马上街游行示威，他们要为“绝对君主”正名。

首相原敬在日记中写道：山县长期以来专擅权势，处处遭到反对，这是引起这次事件的最主要原因。”

藩阀元老与皇室的争斗，终于以皇太子按时出访，元老放弃干涉皇太子成婚达成妥协，这是日本典型的一个条件换取另外一个条件的交易手法。1921 年 2 月 24 日，政府公开对外宣布，皇太子计划 3 月 3 日出访(大正十年)。皇太子 1921 年 3 月 3 日出发，9 月 3 日返回。出访时，大半时间都呆在英国。



“战争狂人”昭和天皇

日本政界“首班”之更换，采用的是接力跑方式，一届内阁首相的终点同时又是继任接力者的起点。昭和天皇从祖父、父亲那里接过的接力棒是世袭的，他可以一直跑到退位为止；而其他历届内阁首相则每人只能跑一程。昭和天皇与内阁首相的终点不同，但想要坐稳的内容同样，都是要有“功劳”，完成了任务才行，否则追随者就会背叛，他们就会想“抬”别人。

昭和天皇的最大特点是“战争天皇。”从他即位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日本的对外战争从未间断。希特勒参与战争“事必躬亲”，从制定详细的战争计划到调兵遣将他都亲自参与，与希特勒不同，昭和天皇参与战争，利用了他学到的“帝王学”知识，以他祖父、父亲被操纵、当傀儡为教训，他利用天皇掌握的“赏罚”大权，决定找谁来接力跑。想“立功获奖”的人有的是，究竟谁可以接力领跑当首相，昭和天皇选择他认为可以跑得好的人，按照他的意志办事的“代行人”。对按照他意志行事者“赏”；违背他的意志者“罚”。以往推荐首相的权力在元老，进入昭和时代后，元老仅剩下最后一个[26]，即便元老推荐了人选，昭和天皇也会



刚上小学的昭和天皇(右)

被世人称为战争天皇的昭和天皇，其在位期间是日本最为动荡的时期：既经历了战场上不可一世的横扫亚洲，也遭受了盟军对其本土进行的毁灭性打击；既经历了战争之后的满目苍夷，也迎来了废墟之上的再度崛起。照片上尚属幼龄的昭和天皇，恐怕想象不到自己未来的人生将要发生如许变化吧。

用"面从腹背"的方式让内阁难产。想借助昭和天皇的力量往上爬的少壮陆军有的是，昭和天皇常年身着陆军大元帅服，就是为了以此表示他对陆军的器重。只要他使个眼色，陆军军人就知道该怎么干。陆军要么让内阁难产，要么让内阁破产，昭和天皇的赏罚权就是他控制陆军这匹战马的缰绳。

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指出："天皇在任免国务大臣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昭和天皇与明治、大正天皇的最大不同。

明治时代日本分别进行过"甲午"和"日俄"两场大的对外战争；大正时代，1914 年出兵青岛，1918 年出兵西伯利亚，两次出兵都没"抢回"东西来，日本认为自己"得不偿失"，大正天皇无能，辅弼天皇的领导人无功。"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台湾，"日俄战争"日本吞并了朝鲜，还从沙俄手中获得了"南满"租借地，这些一直停留在"租借"状态的地域，对昭和天皇来说是个"半拉遗产"，完全将其并入日本版图，就是他的立功起点。

对于昭和天皇来说，面对"遗产"是"原地踏步"还是"跑步前进"，这是看得见的"功劳"，只有"增加"才算"立功"。可随着一战结束，苏联这个新生国家诞生，中华民族开始觉醒，亚洲各民族都开始要求独立，外部环境已不再允许日本像明治时代那样扩张。1920 年"国际联盟"成立，以一战造成的人类浩劫为教训，"国际联盟"希望能从根本上杜绝战争。1922 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上签署了《太平洋四国公约》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和《海军条约》等，《日英同盟》也从此终止。美国要给狂奔的日本武士套上缰绳，而对昭和天皇以及他领导的日本来说，不挣脱"华盛顿体系"则无法立功，美国从此被日本视为眼中钉。

到二战日本投降时为止的历届首相，都是为昭和天皇"干活"的"打工者"，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增加财产"，无法推进者就立刻下台换人。一方面日本要扩张，另一方面中国等亚洲国家要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只要日本不改变国策，最终结果只能是武装冲突，而这也正是昭和天皇选择并依靠军人的根本原因。日本上自天皇下到一般百姓，"变大"成为了共同要求，任何妨碍"变大"的人都被视为"国贼"，日本国内也因此充满血腥。

日本将邻国视为自己国家的"富源"，对本国出现的贫困、失业、经济危机，不看成是资本家的残酷压榨所致，而歪曲成"富源"供给不足，日本自明治时代开始，就将自己的"利益线"画到了周边国家，自己的利益在别人家的庭院里，满脑子强盗逻辑。政府鼓励人人都去当"桃太郎"，将反对者投入监狱。

内阁	任务	结局
原内阁（1918.9.29–1921.11.5）（政友会）	收拾一战后残局的“擦屁股”内阁。日本从大正向昭和过渡。	第一次“护宪”运动后出任首相。遇刺身亡
高桥内阁（1921.11.13–1922.6.6）	藏相接任，主要是为了审议预算	半年的短命内阁。（1936年被刺杀）
加藤友三郎内阁（1922.6.12–1923.8.26）	海军军人。解决华盛顿会议上承诺的问题，一，从西伯利亚撤军，二，裁减海军。	死在任上。死因不明
√[27]第二次山本内阁（1923.9.2–1923.12.27）	海军军人。遭遇关东大地震，虎之门事件	藩阀老人
√清浦内阁（1924.1.7–1924.6.7）	贵族出身。藩阀开始淡出。	半年的短命内阁。
第一次加藤高明内阁（1924.6.11–1925.7.31）（政友会）	从此开始政党领袖轮流执政。三菱创始人的女婿，与连襟币原一起推行“币原外交”	第二次“护宪”运动后出任首相。
第二次加藤高明内阁（1925.8.2–1926.1.28）		死在任上，死因可疑。
√第一次若槻内阁（1926.1.30–1927.4.17）民政党(前身宪政会)	国民党开始北伐，大正天皇死去，昭和时代开始	

原敬出任首相之前，长期作为藩阀的反对派出现，反对派反藩阀的主要手段，不是驱逐藩阀，而是要将藩阀搁置、冷落的明治天皇“抬”起来，他们批判藩阀阉割《明治宪法》，反对“架空”天皇，他们以要求实现《明治宪法》中规定的“君主总揽大权”作为反藩阀手段。随着藩阀人物相继死去，退出政治舞台，反对派终于从原来的“旁观”转变为“加入”，一旦他们开始掌权，他们就开始反对以前自己曾坚决主张的“君主总揽大权”。藩阀制定了“畸形宪法”，然后藩阀“畸形运用”，反对派“畸形反对”，结果必然走向反动。原敬这个“平民宰相”，恰恰出现在了大正与昭和之交的时代。原敬立志要对皇权进行限制，为防止军人以直属天皇领导为由控制政府，他主张政府要“担当全部责任”，强化首相权力。他提议要皇室具有“慈善恩赏”的荣誉大权，可他的政治理想直到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人手中才得以实现，这对标榜“亚洲首个立宪国家”的日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武士时代，天皇“委任将军统治”；明治时代，天皇“君临而不统治”，好容易熬到了大正时代，大正天皇希望自己能亲政，没想到又被“政党政治”压下去。在大正天皇与政党开始权力斗争的时候，应时出现了“天皇机关说”：天皇只是股份公司中的一个股东，国家管理要靠经营者。对皇室的另一个“杀手锏”是：桂声称现在的天

皇家是南北朝时代北朝的后裔。言下之意是：你们并不值得我们尊重并表忠，你们是傀儡的后裔。[28]

原敬对皇室继续“架空”，为了“怀柔”军人，他在任期间，1919年度的军费支出，占总年收入的48%，1920年占49%。执政后的原敬，忘记了自己当年在议会中曾为反对藩阀政府而恶战苦斗，他采取当年藩阀对待反对派的同样的手段，压制在野党的反对呼声。他利用政友会在议会中的多数，强行通过预算。

1921年11月加藤友三郎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原敬代理海相。1921年11月4日晚7:30分，原敬准备从东京车站乘车前往大阪，事先埋伏在那里的、19岁青年中冈艮一将首相刺杀，日本警察对幕后人物并未深究。

20天之后的1921年11月25日起，皇太子出任摄政，代理大正天皇执行政务。1922年2月山县去世。以藩阀人物与大正天皇共同退出历史舞台为标志，裕仁粉墨登场。日本还剩下西园寺与松方正义两个元老。西园寺要求裕仁摄政学习生物，此举的目的是要他远离政治，可裕仁对军事的兴趣远远超过生物。

昭和天皇出任摄政的五年期间，先后出现过五个内阁，内阁产生均与摄政无关；可内阁频繁更替却与他有密切关系。

原死后，原内阁的藏相高桥是清出任首相，组建了高桥内阁。华盛顿会议结束之后，1922年6月，高桥交出权力。

日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兑现华盛顿会议上的承诺。一要西伯利亚撤军；二是海军必须裁军。

对于由谁接任首相，元老松方推荐了加藤友三郎，他在原、高桥的两届内阁中均任海相，一年后的1923年8月24日，加藤首相“病死”在任上，内阁也随之终止。

西园寺再推荐海军元老山本权兵卫。世道似乎要与这个70多岁的老人过不去，在他继任与退任的过程中，都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横祸”。他接到组阁命令后的第四天，即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1923年12月27日，摄政裕仁经过东京虎之门，难波大助向天皇乘坐的汽车开枪。[29]

山本于同日提出总辞职。突发事件后首相突然辞职，西园寺推荐枢密院议长清浦奎吾为继任首相。1924年1月，清浦内阁成立。这个75岁的老人组成所谓“超然内阁”，半年之后就交出了政权。清浦出任首相前是枢密院议长，他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更不是政党领袖，政党联合起来反对他出任首相，日本国内掀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年5月10日普选，“护宪三派联盟”胜利。6月7日清浦辞职，“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出任首相。

1924年6月11日，加藤高明内阁产生，7月2日，元老松方正义死去，此后日



本就剩下西园寺公望一个元老。1924年2月起，英法等国先后承认苏联，日本于1925年1月承认苏联，日本向苏联开出的条件是不能支持中国。自加藤内阁开始，两大政党的首脑开始轮流组阁，加藤高明最后死在任上。

若槻1926年1月组阁。中国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6月决定出兵北伐，12月底，北伐军占领南昌。

一切好似经过了人为安排似的，1925年4月开始，长州出身的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就任“政友会”总裁，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裕仁摄政当日就任天皇，日本开始进入“昭和”时代，昭和时代的首任总理大臣就是贯彻对外扩张的田中义一。

战争天皇 //////////

田中内阁 昭和时代原则上应该从1927年开始，因为昭和元年实际上只有一个星期。自明治时代起，军人出任首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田中从一个退役军人，先曲线成为政党总裁，然后再出任首相，这表明在大正与昭和之交，“宪政常道”的政党政治正逐步确立，非政党总裁无法出任首相。原敬被刺杀之后，日本再经历了山本、清浦两次非政党的藩阀内阁。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时，高桥是清[30]将政友会总裁的职位转让给了田中义一。

一战期间，日本1914年出兵占领了青岛，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可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先后从两地撤兵，对于大正时代的这两次出兵、两次撤兵，日本认为是“军事成功，外交失败”。田中在昭和时代出任首相，就是要解决对日本来说一直悬而未决的“满蒙问题”，日本要在中国制造内乱，乘机将“满蒙”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4月17日若槻内阁总辞职。20日，出身长州的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以“政友会”总裁身份组阁，他同时兼任外相。中国国、共分裂后，国民军继续北伐。北伐军进入山东后，田中内阁于5月28日向山东第一次派兵，6月27日召开“东方会议”。“东方会议”的内容是：不惜用强硬手段解决“满蒙问题”。会议结束后，田中再次向山东增派军队。8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8月30日田中宣布从山东撤兵。9月底到11月上旬，下野后的蒋介石访问了阔别13年的日本，其间与田中见了面。

原本计划外游五年的蒋介石年底返回中国，1928年起，重新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4月占领徐州。4月19日，田中决定第二次向山东派兵。北伐军5月1日到

达济南，日本军队5月2日接踵而至，3日制造“济南事件”，北伐军不得不避开日本军队绕道北上。

内阁	任务	结局
田中内阁 1927.4.20-1929.7.2 政友会、前陆军大将	肢解中国，将东三省从中国分离出去	下野2个月后死亡，死因不明。
浜口内阁 1929.7.2-1931.4.13 民政党、文官	改变田中的对中国强硬，签署伦敦裁军条约，但被指责软弱。	1930年底遭遇暗杀，半年后死去。
第二次若槻内阁 1931.4.14-1931.12.11 民政党	经历“九·一八”，日本国内的“十月事件”，幸运躲过暗杀阴谋。交权下野。	听话人物，两次组阁并活到战后。
犬养内阁 1931.12.13-1932.5.16 政友会	继续田中的工作，肢解中国。	被暗杀身亡
斋藤内阁 1932.5.26-1934.7.3	海军军人。等待国际舆论平息，要将满洲国纳入日本操纵之下。	辞职后，在“二·二六事件”中被暗杀
冈田内阁 1934.7.8-1936.2.26	海军军人。“二·二六事件”，在首相官邸内，内阁终止。	首相的妹夫被误以为是首相，结果冈田躲进橱柜幸免。
√广田内阁 1936.3.9-1937.1.23	为陆军侵略扩张完成了所有准备。为战争准备好了钱，为军人干政作好了制度准备。	唯一一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判处绞刑的文官战犯，唯一一个在绞刑执行前没有高喊“天皇万岁”的人。
√林内阁 1937.2.2-1937.5.31	短命内阁， 被认为是“没有勇气”的军人。	活到战后，没有被起诉。
√第一次近卫内阁 1937.6.4-1939.1.4	制造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战后畏罪自杀
√平沼内阁 1939.1.5-1939.8.28	“大逆事件”时的检察官，日本国家主义的积极推动者	活到战后，被判终身监禁，后来死在狱中。
√阿部内阁 1939.8.30-1940.1.14	陆军军人，观望欧战，中国战场要诱降蒋介石。	活到战后，没有被起诉。
√米内内阁 1940.1.16-1940.7.16	海军军人，与阿部同样。	活到战后，没有被起诉。

张作霖撤离北京返回东北，6月4日在沈阳边上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但日本乘机让东北军与北伐军“自坏”的阴谋没有成功。张学良接班后，1929年“易帜”，日本阴谋实现的“弱化”中国计谋不但没有实现，中国反而重新实现了统一。田中义一不得不辞职（7月2日）。两个月后的9月29日，田中死于艺妓宅中，死因不明。



皇姑屯事件

由于没有满足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要求，时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上，这一事件被认定为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但张作霖之死并没有让日本人分裂东北的愿望得逞，张学良的易帜，让田中义一成为了“替罪羊”。

浜口内阁　田中之后“民政党”总裁浜口雄幸组阁。

依照《明治宪法》，政府与军队的统帅大权都在天皇，天皇位于三角的顶点，政府与军队是平行的底边。藩阀时代，藩阀将天皇架空，军队与政府都被藩阀牢牢控制，议会是这个三角之外的旁观者。大正时代开始政党政治，从政党中产生的内阁，希望盘踞在三角形的顶点，同时将天皇与军队放置在并行的底边，这与他们主张的“护宪”相矛盾；而昭和天皇坚持要求按照“宪法”治国。“护宪”派陷入了自我制造的泥沼之中。

1930 年 11 月 14 日，浜口首相按计划去地方演讲，但在东京车站遇袭负重伤。浜口遇刺后，有长达半年时间日本无首相。

第二次若槻内阁　1931 年 3 月，陆军的“樱会”成员与民间的大川周明等结合，策划发动军事政变。计划动员社会人员先包围议会制造混乱，然后军人乘机颁布戒严令，接着“抬”出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当首相，预定 3 月 20 日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人政权。此次阴谋直到战后才被公开出来。4 月 13 日，浜口内阁总辞职，元老西园寺推荐若槻为继任首相，第二次若槻内阁就是在这样的阴谋中于 4 月 14 日成立。

若槻是浜口的学长，俩人都是大藏官僚出身，浜口内阁被指责为“软弱外交”，

这是因为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日本答应了英美提出的削减海军方案。它是继1922年“华盛顿裁军会议”之后，日本第二次接受英美方案（1929年4月签署，10月批准）。“华盛顿会议”时，若槻曾作为日本首席代表出席，若槻与浜口同属民政党。

宇垣此后调任朝鲜总督，浜口于1931年8月25日死去，他没有看到“九•一八”。

“九•一八”之后，桥本欣五郎、“樱会”成员、民间的大川周明等“三月事件”的原班人马，再次策划“十月事件”。他们计划于10月21日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若槻礼次郎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颁布戒严令，建立以荒木贞夫中将为首的军人政权。10月，土肥原贤二策动溥仪离开天津前往营口成功，日本让前清的皇帝当傀儡，多年来梦想肢解中国的计划终于有了实质上的进展。若槻在批准了临时军事预算之后，以内阁意见不统一为由，12月将政权交出。此后日本军人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

若槻之所以能够两次出任首相并能活到二战后，最大的理由应该是他“听话”。操纵者让他上他就上，让他下他就下。他从死去首相处接权；从他手中接过政权的后继首相都必死无疑，他两次执政，但两次内阁都是前内阁的原班人马，他没有自己组阁过，这些都是空前绝后的。大正、昭和之交，加藤高明首相在1926年1月28日死在任上，若槻30日接任并出任首相。当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死去，昭和天皇即位，因为需要田中这样的强硬派出马，若槻1927年4月20日挂冠而去，接他权多田中后来死去。日浜口辞职，若槻再次接任，当年9月爆发“九•一八”，12月他将政权交给犬养毅，犬养12月刚接权，但1932年5月就被海军军人打死。

内 阁	“自作自演”却说“军人独断”	嫁祸于人却称“自卫”
田中（1928）	河本大作	精心策划
第二次若槻（1931）	石原莞尔	精心策划
近卫（1937）		

近卫内阁时的空格是留给“七七事变”的，日本现在谎称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误会”。凡事不分大小，不精心策划、认真准备就行事，完全不符合日本人的习惯。相反把精心策划说成偶然却是日本人的经常做法。

1921年日本签署了《九国不战条约》，日本当时就已经知道，这个条约的针对者就是日本，旨在给好战的日本套上“马嚼子”，为此，日本自签署条约之初就开始研究如何钻这个条约的空子。虽说该条约禁止用战争手段解决冲突与争端，但对受到攻击后的“自卫”问题却是空白，也就是说，“挨了打还击”是合法的。日本知道，用对朝鲜的手段吞并中国无可能，只能用战争手段迫使中国就范，签约后日本发动



战争受到限制，因此日本要想“歪点子”。

河本大作在中国东北制造南方革命军炸死张作霖的假象，同时策划当天晚上向奉天日本侨民会馆及日侨居住区投掷炸弹，日本军人企图通过“自作自演”制造中国东北军进攻日本的假象，嫁祸于人，然后日本以“维护和平”的名义出兵。因为东北军按兵不动，日本的阴谋落空。事后河本将经验教训传授给了板垣征四郎：“今后搞事，绝对不能让中国人参与。”[31]

三年之后日本人再来。还是成关东军“独断”天皇不宣战的“自卫”。1931 年 9 月 18 日前，日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自己炸毁了位于中国军营附近的铁路，然后袭击中国东北军的兵营。为了制造“受到攻击”的假象，关东军自己布置现场，甚至还将中国士兵的尸体搬到路基上，谎称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本向世界宣布“不扩大”调查原因、局部解决，同时又不断扩大规模。东北军以为用 1928 年同样的隐忍手段，日本关东军就会自行撤离，可这次日本没有。日本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即使中国按兵不动，他们也要积极行动。

1937 年“七七事变”，依然是日本军人在中国军队驻地附近“演习”，然后日本军人失踪，捏造“受到中国军队攻击”的谎言，然后开始“自卫”。

三次都是利用夜幕掩护，嫁祸于人。三次都是“独断”，1928 年是河本，1931 年是关东军，1937 年是“中国驻屯军”。

犬养内阁 “九•一八”事件发生 24 小时后，关东军就已占领了南满铁路全线。张学良、蒋介石对国际联盟充满期待，立刻向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动武问题。经过一番舌战，“国联”通过了要求日本在 11 月 26 日前撤军的决议。日本拼命阻挠“国联”派遣观察团到中国东北调查日本是否是“自卫”，监督日本是否撤军。日本反对设立撤退时间表，保证坚决执行“国联”决议。日本政府要求“国联”相信：政府是“稳健派”，一切都是“激进”的军人擅自行动。还要求“国联”相信“稳健派”有能力压制“激进派”，声称假如“国联”积极行动，反而会刺激“激进派”，这样更不利于政府让军人撤退。

“国联”希望看到若槻首相的实际行动，币原外务大臣兑现“信义保证”[32]。可昭和天皇不愿再看到日本以往“军事胜利，外交失败”重演，若槻辞职，76 岁高龄的犬养组阁。犬养自年轻时代开始就追随大隈，谋划中国一辈子，这次昭和天皇有意让他来“啃难啃的骨头”。犬养内阁中的陆军大臣是“强硬派”荒木，外务大臣是“国联”前日本代表芳泽，新内阁成立后不久，日本反向更加“激进”的方向狂奔，12 月底开始大规模进攻锦州，1932 年 1 月再次将战火引向中国上海。就在战争吸引了国际目光的同时，建立傀儡政权的行动也在“水面下”积极展开。



1924年冯玉祥从日本那里拿了钱发动了"北京兵变",他从后方袭击吴佩孚,让准备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吴下了台。冯在北京干的另一件事是:将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中赶走。11月5日溥仪离开故宫后,回到自己亲爹家中住了20多天,11月29日他就就在日本的庇护下进入了日本使馆,而当时日本的驻华公使就是芳泽,他是犬养的女婿。溥仪在日本使馆里住了两个多月后,还是在日本的帮助下,1925年2月23日乘车离开使馆到天津,住进了日本租界,在门口公然挂上"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

日本人是凡事非常慎重的民族,没有上级的许可,下级决不会"轻举妄动"。作为驻华公使,芳泽本人绝对不会擅自邀请中国的"前皇帝"入住自己的公使馆,从他邀请溥仪入住并且后来没有受到日本国内任何批评可见,他个人的"善举",应完全是遵循了日本国内的指示。1927年底到1928年初,又是由芳泽出头,要在中国东北扶植溥仪的活动再次紧锣密鼓地展开。

张作霖离开北京前的1928年6月3日,芳泽前往张大帅府,说是来送行,实际上是要求张作霖签字同意间岛行政权转让、土地商租权和修筑敦图铁路。6月4日张作霖被炸死,日本实际上在此时就有扶植溥仪回东北的计划。[33] 扶植傀儡是为了"交易",谁给日本的利益多,日本就扶植谁,看到从张作霖那无法有更多收获,日本就将他处死。

1931年"九•一八"时,芳泽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在"国联"会上保证:日本准备局部解决,不会扩大。可土肥原在1931年10月2日前往天津"静园""拜访"溥仪,要求溥仪一定要在16号之前到达东北,日本要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建成"满洲国"。在日本暗中布局结束后,日本转而同意派遣调查团,日本要将傀儡政权变成"满人治满"。10月8日,日租界出现了向华界进攻的便衣队,驻天津日军下令戒严,秩序混乱。10日晚,接应溥仪离开天津的行动开始,接应他的车每到一个关卡都顺利放行。10月13日到达营口满铁码头,11月16日,也就是在"国联"理事会开会的当日,溥仪建立傀儡政权的所有工作已经结束。

犬养毅上台,就是要日本这次在军事、外交上取得双重胜利。他女婿芳泽从欧洲回日本,有意绕道莫斯科,得知苏联不会武力干涉,美国也仅停留在口头上"不承认"后,日本更加强硬。不但没从东北撤军,还要在英、美势力集中的上海再次制造事端,这次军事行动依然是"自卫"。

犬养之强硬通过"一•二八"表现了出来。日本飞机向上海空投炸弹,这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飞机首次轰炸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12月29日,若槻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到东北视察。他是被指责为"软弱"



而下台的人物，但他继续为接任者荒木提供强硬建议：要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也就是2月下旬3月上旬建立“满洲国”。外务、陆海军制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1月，板垣接受了新的任务，随后离开日本前往中国东北。板垣来到中国后，一切按日本的计划进行。他召集中国人开会，臧式毅在会上提出要实现日本人原来鼓吹的“东北联省自治”，可板垣命令：建立满洲国。

2月18日，关东军发表“独立宣言”。2月22日，板垣来到旅顺，会见被软禁的溥仪。

日本同时支持两派，让两派竞相与日本“交换利益”。1932年2月19日，沈阳召开“东北行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在东北建立共和制新国家。溥仪非常生气，写下“复位正统系”的八条理由。2月21日，溥仪派郑孝胥、罗振玉参加在沈阳召开的“建国会议”，要“复位”。[34]

板垣在旅顺见溥仪，同意“新国家”可以名“满洲国”，溥仪出任元首，但名称是“执政”，溥仪一定要当“皇帝”，争论没有结果，次日（23日），板垣对郑孝胥、罗振玉下令，一切不能更改，一定要皇上出来收拾政局，而且说这是军部最后意见，改变就是“敌对态度”， 郑孝胥向溥仪转达日本要求，罗振玉说：“事已至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即行退位。”溥仪同意，答应“暂定一年为期”，出任“执政”，1932年3月1日起，“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定国号为“满洲国”，年号自1932年3月1日起改为“大同元年”，“国旗”定为红蓝白黄黑“五色旗”。首都为长春，改称新京。[35]

3月9日执政典礼，3月10日伪满中央各院、部长在参议府举行就任仪式。同日，溥仪致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信中有“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护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指定之机关。”满洲国重蹈当年朝鲜的覆辙。

斋藤、冈田海军军人内阁　满洲国如期成立后，明治时代的政治家犬养毅的“任务”结束，犬养首相首相在“五·一五事件”中被刺杀，对于由谁出任下一届首相，政党领袖已经被排除。有人提议陆军大臣荒木，后来元老西园寺推荐了前朝鲜总督斋藤实，荒木继续留任陆军大臣。西园寺对新内阁寄予了如下期望：“这届内阁的目标就是什么也不要干。”不过，只要看看新内阁的人员组成，就能够对这届内阁准备干什么推测个八九不离十。首相是前朝鲜总督，外相是前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他以提出“即便让全日本变成焦土也决不放弃满洲”而闻名，是“焦土政策”创始人。藏相是高桥是清、陆相是荒木贞夫、海相是冈田启介。自斋藤内阁起创设“五相会

议"制度，以上五人定期讨论日本的外交、军事、财政问题。此后日本的外交及财政，都是为军事服务的仆从，军人要钱就得给钱；军人要外交人员到国际上撒谎、到中国玩弄手腕，他们就得照办。

陆军被认为"过激"，海军则被戴上了"稳健"的高帽，海军军人杀死了首相，但"稳重"的海军军人仍可出任首相。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认满洲国。

1933年2月16日，帝师陈宝琛就溥仪执政一年届满，写信给胡嗣瑗，提出"满洲国"要"取实而舍名"，"真有独立之精神、自治之权力"。五天之后的1933年2月21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3月1日，溥仪发表广播讲话称，一年内遇到很多事，妨碍了建国，要推迟。1934年1月郑孝胥就实施帝制问题发表声明，拥戴溥仪为"满洲帝国皇帝"，3月1日举行"继位大典"，改年号为"康德"。但龙袍只能私下穿，其他公开场合穿军服。

1934年6月6日，裕仁的大弟弟雍仁来长春访问，到1934年7月，斋藤内阁要干的活都干完了，与犬养毅对外"软弱"不同，轮到斋藤下台时的理由是：国内出现了"帝人事件"等一系列政治丑闻。

1934年7月8日，天皇再次命令海军大臣组阁。新内阁中，海相冈田升任首相。斋藤虽因"丑闻"[36]下野，但也没有"一戮到底"，他转任内大臣。藏相继续是高桥，陆相荒木出局。同年12月，日本废除了《华盛顿条约》。

1936年2月25日晚，"亲美"的斋藤、铃木等刚刚出席了美国大使格鲁在大使馆内举行的电影招待会。26日凌晨，1400多名陆军军人制造了"二·二六事件"，被认为束缚昭和天皇手脚的人物都在刺杀名单上。出局的荒木被推举为是继任首相人选，而两个海军大将、藏相都成为政变陆军的攻击对象。

"清君侧"者瞄准了1936年12月31日期满的"伦敦海军条约"。

陆军政变军人精心选择了打击目标，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铃木1929年1月起任侍从长。西园寺虽然是最后的"元老"，但他对政局已几乎没有影响力，自1927年开始，首相人选都是决定后通知一下他而已。将元老级人物列入刺杀名单，更注重的是象征意义。

广田内阁 军人内阁结束后，有人提议建立皇族内阁。[37]

西园寺这次推荐近卫文麿。近卫家是世代辅助天皇家的贵族，可这次推荐被近卫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近卫事后对此解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获得绝对支持的人坐不稳的。"也就是说，西园寺并非绝对力量。

"军事政变"平息后，东京实施了长达五个月的戒严，接下来文官广田弘毅组

阁。1931年的“三月事件”直接催生“九•一八”;“十月事件”催生了上海“一•二八”,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终止了政党内阁,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虽是由文官出任首相,可背后的操纵者却是陆军。《明治宪法》并没有规定陆军可以决定首相以及内阁人选。

连军人的脑袋都保不住的时代,广田一个文人敢出任首相并且能够活到日本投降后,说明他对日本军部“言听计从”而且还“立过功”。陆军大臣反对广田任命吉田茂为外务大臣[38],广田就顺从了陆军;陆军要求广田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制,他就恢复了该制度。在广田任上,他将国家总预算的七成给了军部,剩下三成要支付工资等,军费到了无法再增加的程度。

	昭和十一年(百万日元)	昭和十二年
国家预算总额	2282	4742
军事费	1078	3271
陆军	510	2251
海军	567	1020
军费比例	47%	69%

编制如此庞大的军事预算的理由是:日本必须对未来战争进行物资储备,以免战争爆发后无法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到大量的战争物资。

完成了预算审议之后,1937年1月,广田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寺内与国会议员因为肃军问题引发争吵,寺内指责对方言论侮辱了陆军,要求政府解散国会,广田顺势以“政局严重,力微不能胜任”为由下野。[39]

元老西园寺再推荐宇垣出任首相。宇垣一成是日本昭和史中的“传奇人物”。1931年、1937年,日本分别对中国进行了两次重大军事行动,每次军事行动爆发前的首相候选名单上宇垣都“榜上有名”,可两次他都以“候选人”告终,就是没能当上首相。1931年3月爆发未遂的“三月事件”,当时的首相候选人是他;1937年1月广田之后的首相候选人还是他。

1月26日,天皇“同意”了元老西园寺的推荐,让宇垣组阁。除了陆军大臣人选之外,宇垣的组阁活动都进展顺利。由于陆军拒绝推荐陆军大臣,宇垣希望也能像桂当年那样,利用天皇发布命令的方式,让自己恢复现役兼任陆军大臣,但他向内大臣通报后,内大臣表示反对。昭和天皇表面尊重元老意见,暗中支持陆军破坏,结果宇垣组阁流产。元老不再坚持,政党也在一边观望,宇垣一个人孤军奋战一周后,2月1日他放弃了组阁。

这次组阁流产，与其说元老与昭和天皇在首相人选上看法不一，不如说两人在选择国家走向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二战后的美军战犯名单中，有文官广田没军人宇垣，这本身表明美国人对什么人积极推动战争并非心中无数。

田中内阁时，宇垣是陆军大臣，田中决定出兵山东，宇垣上书表示反对。理由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他在日记中是如此思考中国问题的："在中国的政治活动的源流中，有民族国家这样一股强大的潮流在涌动。顺应并指导这种潮流的是蒋介石，支持并推动蒋的这一潜在潮流的巨大力量决不可忽视。即使把蒋政权搞垮，这种潮流仍然继续存在。要紧的是要多加警惕并应付这方面的动态。"

林内阁 1937年2月2日，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出任继任首相。但该内阁仅仅维持了三个月。（1937.2.2-5.31）

林铣十郎受到陆军的推崇。他与宇垣是命运中的一对。1931年陆军策划"三月事变"，政变军人推荐的首相是宇垣，宇垣后来没能出任首相，但转任朝鲜总督，林在总督手下任驻朝鲜军司令。接着爆发"九·一八"，林"越权"派兵在中朝边界的新义州等待，收到关东军要求出兵的请求后，他立刻下令待命的日军越境进入中国吉林。在中国问题上敢于大胆行事，让他后来官运亨通，天皇这次弃宇垣而推举林，显然是要鼓励他，要他大胆地放手干。

林铣十郎内阁2月2日组成，8个人分担13个部门的职务，一人兼多职，从人手没有完全配备好就可知道，他不准备长久干下去。该内阁中的陆军大臣中村上任后不久就称病离任[40]，接任者是杉山[41]。宇垣组阁过程中，曾推荐他出任陆军大臣，但遭到了拒绝。刚刚拒绝了宇垣，让宇垣内阁流产的人物，在林组阁时却毫不犹豫地出任了林内阁的陆军大臣，他挺身而出，是想给下不了决心的林铣十郎打气，杉山后来官至元帅，并非由于他打仗有多大本事，而是因为他最听昭和天皇的话。他看准了昭和天皇的"奋斗目标"是解决"满蒙问题"，他要具体去实施。

以往历年的预算审议，都是让首相最为头痛的时候，因为在《明治宪法》下，只有在国会开会讨论预算的时候，政府和反对派才能见面，反对派憋足了劲要在此时给政府出难题，有的首相会在国会开会前辞职"躲避"；还有首相与反对派协商："你们预算审议别刁难我，通过后我辞职"，可林内阁与上述所有的都不同。预算审议已经平稳结束，政党、议会等都对扩军预算都没有表示反对，他在审议通过了预算之后解散了议会，同时再辞去首相职务。他究竟是想恢复政党内阁？还是想让政党领袖出来承担责任？总之，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巧妙地拒绝了天皇命令，他没有干的事，得有人接着干。

如果说内阁异常的话，那么广田内阁、林铣十郎内阁、后来近卫内阁都异常。

第一次近卫内阁　因推荐宇垣出任首相失败，元老此后再也不向天皇推荐内阁首相。元老推荐的时候不出来；不推荐的时候自己出来，这个人物就是近卫。47岁的近卫，以往从未有过出任国务大臣的经历，也不是政党领袖，甚至国会议员都不是，可首次出马，就越过一般大臣，成为国务大臣中的首席。他在最难满足军人要求的时代当上了首相。近卫愿意出马并且可以实现飞跃，说明他受到了“强有力者”的支持。

近卫的父亲笃麿是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因藩阀不希望这个贵族出现在明治天皇身边，他只能在中国活动。他以办学为名，在中国境内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网，日俄战争他也曾积极参与，可战后日本既无赔款又没割地，他战前筹集的款项战后被追讨，最后他只能自己讨腰包了事，受这次事件的打击，笃麿于1905年去世。文麿发誓，从此之后再也不干父亲那样自己讨腰包干活的傻事。

近卫出任首相33天之后，7月7日，北京郊区爆发了“卢沟桥事件”，以此为导火索，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近卫不是被军人牵引，而是事事走在军人之前，他是唯

近卫文麿内阁成员的合影

1937年6月，日本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大臣们在就任仪式后拍摄的集体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人是近卫，第二人是外相广田弘毅。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爆发。干件事，而且是一件大事，没有经过精心准备就贸然行动，这完全不符合日本人的传统习惯。



——一个没有受到过“软弱”指责的文人首相，军人后来都叫停了，他还要打。

平沼内阁 对“七七事变”，日本人一说“误会”，二说“当地军人不听话”，三说“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只是中国人不理解日本的“真意”，日本只要压制“抗日分子”。

“九·一八”是想将中国逼上谈判桌，让日本能够像英国割让香港或者租借九龙那样，长期在东北继续呆着，没想到因张学良军队没有抵抗而有“意外收获”，“七七事件”同样，日本希望将蒋介石逼上谈判桌，要蒋承认“满蒙独立”。

在战国时代，“实力大名”的标志是：将“和”“战”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名”，通俗地说就是：想打就能打；想和就能和，这样的“大名”是“大大名”。一步达不到目的，就将一步分为两小步，先用“和谈”削弱对方，下一步再令对手“缴械”。室町时代的足利将军，用“让南、北两朝天皇轮流当天皇”诱骗南朝天皇归北；德川家康让丰臣秀赖母子将大阪城墙拆除、护城河填平，作为“和平诚意”的表示，以此换取家康军队停止攻击，明明是对方坚固的防御让家康军队无可奈何。“甲午战争”伊藤博文称是为“朝鲜独立”，到日俄战争时变成“委任统治”，最后完全吞并。

这次对华战争让日本陷入“持久战”的泥沼，日本打不下去了，近卫就先用“和谈”诱降蒋介石，1938 年 1 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诱降蒋介石，明明是自己诱降失败，可近卫 16 日发表第一次声明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938 年 5 月开始，近卫改组内阁，5 月 26 日宇垣出任外相，日本亮出“主和”人物出马的信号，张群甚至向宇垣致电，表示中国有愿望，但是要日本先表明条件。为了向中国表示日本意在苏联，不在中国，关东军 1938 年 7 月在中国东北挑起“张鼓峰事件”，此时中国的高宗武正私下访问日本。后来宇垣辞职，外相更换为有田八朗，日军再次对中国发动徐州、汉口和广州作战。日本人认为，扩大战果能够促使国民政权的瓦解。

这次战役结束后，1938 年 11 月 3 日近卫再发第二次对华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言下之意可以让听话者存活，让中国成为日本的一个“藩国”。这时汪派的几个谈判代表正在上海与日本代表草签了密约，其中有中国最关心的内容，日本从中国撤军。

作为对这次声明的回应，汪精卫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进入越南河内。1938 年 12 月 22 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可此前谈判中约定好的“从中国撤军”的内容，声明中只字未提。明知日本已经变了卦，可汪精卫仍按原来约定，于 1939 年 12 月 30 日公开发表声明回应。自以为了解日本的汪精卫，实际上对日本人并不了解，德



川家康从来不给“藩国大名”送礼[42]，获得他礼物的人，都是家康要求联盟，准备攻击其他对手之时。

对于汪精卫的叛逃行为，重庆1939年1月2日宣布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蒋介石宣布要继续抗战，汪为孤家寡人，没有人追随响应，近卫的诱降目的没有达到。1939年1月4日他宣布下野，接任者平沼。新内阁仅仅是更换了一个首相，其他外相有田、陆相板垣、海相米内、文相荒木、内相木户等都是原班人马留任。近卫要躲在幕后观看局势发展，对日本有利时他就复出，无利时他就推脱。原本汪精卫与近卫打了个平手，事情可以因双方都无法满足对方的条件到此为止了，可蒋介石劝汪精卫离开河内出游他不走，最终蒋介石3月21日派人暗杀他。汪精卫在河内没有安全感，他请求日本人保护，4月26日汪逃离河内，后来登上了日本人迎接他的“贼船”，5月6日到达上海。

汪精卫一行5月31日秘密前往日本，6月18日回国。在日本期间除了与板垣的会见之外，其他都是礼节性会晤，日本军人要他回上海等“揭开锅盖”看结果[43]。简直就像等待汪精卫来看大戏那样，1939年5月开始，日本关东军选择从内蒙古进攻外蒙古，一要表演日本意在“北进”，二要测探一下苏联与蒙古之间的同盟条约是否有效。苏联果断投入大量兵力，彻底挫败了日本的挑衅，诺门坎战役关东军死亡1.5万人，此外没有捞到任何便宜，这次日本真正实现了“不扩大”，9月谈判，结束了战事。

8月23日，诺门坎激战犹酣之时，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战场以及外交的双重打击下，平沼留下“欧洲形势离奇复杂”的名言，于8月28日卸任而去。

30日阿部组阁。9月1日德军进入波兰，3日英、法向德国宣战，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而中国方面，汪精卫从日本回来之后，马不停蹄地要将几个傀儡政权统一起来。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民国时代的“二十一条”上签了字[44]。“近卫三原则”早已无影无踪，与袁世凯时代一样，虽然日本强调一定要严格保密，可参与谈判的高宗武、陶希圣将绝密内容带到香港公开发表，再次让日本的野心暴露给全世界。英美继续支持蒋政权，日本将陆军的阿部更换，“亲英美”的海军大将米内组阁。

1940年4月，前首相阿部信行成为日本驻汪政权的首任“大使”。同时，日本与蒋之间的谈判也在紧锣密鼓中进行。1940年3月间在香港与“宋子良”谈判，接着再来“钱永铭工作”，日本只要能够诱降蒋介石，准备随时抛弃汪精卫。

法、荷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对日本来说好似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战时已经

领教过日本的德国，知道武士最擅长“乘人之危”，希特勒用鼓励日本成为亚洲霸主来引诱日本上钩，对东南亚垂涎40年的日本，看到英国已经无力“东顾”，不等德国“说服”日本，日本要主动投入德国怀抱，日本的口号是：“别赶不上末班巴士”。依然是要“搭乘”战争快车，阿部、米内两届内阁，对外方针是“不加入欧战”，这时日本要迫不及待地“收拾战场”。

太平洋战场上的争斗 //////////

第二次近卫内阁 1940.7.22–1941.7.16	签署三国同盟，陆军出兵印度支那北部
第三次近卫内阁 1941.7.18–1941.10.16	欺骗美国，为偷袭珍珠港做准备。活到战后，被美军逮捕前服毒自杀。
东条内阁 1941.10.18–1944.7.18	对美宣战，集中精力进行太平洋战争。活到战后，被美军逮捕前开枪自杀未死，后被判处绞刑。
小矶内阁 1944.7.22–1945.4.5	准备收拾后事内阁。活到战后，未被起诉。

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内阁　1940年6月24日，近卫辞去了枢密院议长的职务。7月5日，大日本生产党的前田虎雄被检举，他们计划暗杀米内，发动“昭和维新”。内大臣汤浅此时托病辞职，接任者是木户。他是“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的孙子。木户与昭和天皇从小一起长大，他对天皇的想法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们同为明治时代“功臣”的孙子辈，在对外扩张上要超过他们的爷爷辈。木户接任后，迫不及待地要推翻米内内阁。而推翻内阁的目的就是要立即转变国家政策，从以前疏远德国到强化日德关系。

推翻米内内阁的手段是从内部爆破。参谋总长闲院宫策动陆军大臣畑辞职，畑接到闲院宫的书面指示之后立刻辞职。7月16日，畑向米内提交辞呈，米内要求他推荐继任陆相，他回答无法推荐，米内同日总辞职。而在此之前的7月8日，也就是米内总辞职的一周前，陆军次官阿南已经访问了内大臣木户，表明陆军希望近卫接替米内。畑既不向米内前首相，也不向继任近卫首相推荐继任陆军大臣，他直接向昭和天皇推荐：希望东条成为新内阁中的陆军大臣。

近卫内阁尚未成立，畑就向天皇推荐了东条英机任陆军大臣。东条之所以在此时备受重视，是因为东条父子两代人都曾在德国学习过军事，是陆军中的所谓“亲德军人”。这届内阁与前两届的“观望内阁”不同，内阁的任务与目标非常明确，要分享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果。英、法、荷等被德国拖在欧洲战场上，他们在亚

洲的殖民地成为了“弱肉”，只有与德国结盟，日本才有机会分享此“盛宴”，相比而言，英、美不但没有给日本带来“领土”，一战之后美国还一直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日本是看到美国强大才一直“忍气吞声”。日本统治者认为，跟德国结盟之后，美国也不再可怕，英国灭亡指日可待，此后，世界上就只剩结盟的日、德、意以及孤立的美国，轴心国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平沼内阁时，商讨是否与德国结盟的“五相会议”，70多次会议的讨论结果都是“慎重”占了上风，可这次松冈外相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签约了。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日本的“新秩序”范围从“东亚”扩大到“大东亚”。1940年8月1日，外相松冈对外发表国策讲话，提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近卫内阁称陆海军进入印度支那北部的理由是为了完成对蒋介石政权的包围。日本提出和平进驻与武装进驻两个方案。让投降德国的法国维希伪政权协助日军进入，如果不配合，日军就要武力进入。包围中国是假，为后来海陆军可以以此为基地南进是真。

中国出现的“持久战”让日本海陆军之间的分歧加大。海军认为，解决了中国问题之后，海军方可在南方大显身手，陆军对此表示反对，陆军认为海军光吃预算不立功，陆军要政府利用外交手段切断援蒋路线。第一次近卫内阁让德国不再援蒋。第二次近卫内阁，松冈与斯大林签署“中立条约”，这表明日本将要对英、美实施打击。松冈在德苏战争爆发后，提出“毁约北进”，海军对此当然高兴，而陆军对两次失败记忆犹新，他们要求海军出力。加之德国的要求，日本最终确定要“南进”。

东条内阁　1941年10月18日，东条内阁组成。

对于组建东条内阁，谁都知道意味着对美宣战。作为现役军人出任总理大臣，日本近代史上先后有山县有朋，桂太朗，寺内正毅，加藤友三郎，东条是第五个。前面4人都是在藩阀横行的年代，而唯独东条是在昭和时代。

东条发动战争后，一人身兼三职，他可以参加大本营会议。

后来小矶组阁，同样想参加大本营会议，尽管他也是军人，但遭到拒绝。1945年1月，经天皇下令他才可以参加，但不能对战争问题发表意见，理由是他代表政府，战争是军部的事情。小矶要求恢复现役，兼任陆军大臣参与，同样被拒绝。3月10日的美军空袭让东京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东京40%的地方变成废墟，死亡人数多达10万。一个月后的4月5日，小矶内阁总辞职。接任者是78岁的退役海军将领铃木贯太郎，天皇以前的侍从长。

[1] 鼻子对主人公来说原本多余，带来无限烦恼，可去除之后烦恼更多，最后干脆恢复原状。笔者认为，该作品暗指日本无用、多余的天皇制。

[2] 《手绢》讽刺了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所鼓吹的武士道。

[3] 不必每天上班，只要每年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表若干小说即可，月薪130元。奖金和稿费（每千字五元）另算。在报纸上发表小说只能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而杂志则不受限制。当时一日元约合中国一块大洋。

[4] 3月3日大正天皇的皇太子访问英国，9月回到日本，12月开始出任摄政。大正天皇在位仅九年。

[5] 中共创始人之一，两个月后，中共一大在李家客堂召开。李为东京大学毕业生，交谈不要翻译。芥川认为他是"新生力量代表"，果真后来"共产党"成为最让日本扩张主义者头痛的坚定民族主义者。芥川与李长谈半日，对他印象颇佳。

[6] 芥川在日本期间结识了路透社记者，爱尔兰人琼斯，他在东京供职5年，1921年调到上海，芥川到达上海后两人相见，琼斯叮嘱他，到了北京，紫禁城不去亦可，但辜鸿铭不能不见。芥川到了北京之后，果然专程前往北大，专访辜鸿铭。芥川当时29，两人年龄相差35岁。他在他的《北京日记抄》中记录道："琼斯之言，不欺吾也。" 芥川的《辜鸿铭先生》一文中有对他的专门描绘。"花白辫子，白大褂，一副遗老打扮。"辜鸿铭夸芥川："不着洋服，甚感佩，所憾者唯无辫子耳。"

[7] 有一个内容在大阪《每日新闻》上没有发表，直到1925年出版《中国游记》单行本时，才在新添加的《杂信一束》中发表。第七部分写参观长沙的一所小学，教师"那副铁板着的脸，可谓至今罕见。为了排日，女学生都不用铅笔写字，为此书桌上都放着笔砚，用毛笔在做几何和代数题目。我想顺便看一看宿舍，请当翻译的少年去交涉。那领路教师脸板得更紧，厉声回答道：'不能参观宿舍。前几天，五六个士兵闯入女子宿舍，强奸了女学生。'"

[8] 1921年8月起在《每日新闻》上以《上海游记》为名的连载中有《章炳麟》一节，但却没有上述内容。

[9] 别人的灾难就是自己的幸福。笔者认为，该作品暗指趁火打劫的日本。

[10] 作品讽刺了"日俄战争"中立功、后来为明治天皇殉死的乃木希典，这篇小说被"检阅官"多处删除。

[11] 《澄江堂杂记》三十一《古代》。

[12] 芥川龙之介著 林少华译《罗生门》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169页。

[13] 1870—1880（22—32岁）的十年间，贵族青年西园寺在法国留学，当局称他有"自由主义思想"，藩阀头目岩仓曾派间谍在他身边监视过他。西园寺从法国回日本后，加入了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报社，明治天皇因此曾下令，让他离开该报社。

[14] 山本在袁世凯出任朝鲜督办时与他相识，后有交往。

[15] 虽然孙中山自诩为"日本通"，可他并不知道，"日俄战争"后日本面临财政危机，每年用于归还内、外债的本息都捉襟见肘，这时哪里有钱帮助孙中山？！其次，就是有钱，日本也不会真心实意帮助中国发展。日本唯一愿意出钱的时候，是要破坏袁世凯政权、弱化中国、让中国"自坏"的时候。

[16] 根据孙中山的翻译戴季陶介绍，桂对《日英同盟》有名无实不满，桂的政治目标是实现《日德中



同盟》。桂对英国之不满，一是对英国支持袁世凯不满，二是对《日英同盟》中英国不参与日本挑起的战争不满。孙中山虽然多次到访并在日本长期居住，但他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反帝"，让自己国家富强起来的想法，纯属空想。1907年日本组建"满铁"，钱是借来的，技术也是来自美国的。日本只想让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

[17] 不可思议的是，宋在遇刺之前美国的报纸已经预测宋将被刺杀。有人希望中国"自坏"。日本先支持孙中山反满清，再支持他反对袁世凯。

[18] 长岛隆二著《政界秘话》平凡社（1928） 第125页。1913年3月8日桂突然发病，前一天晚上还出席了一个实业家举办的晚餐会，精神极佳，5月16日他的长子病死，他本人10月10日死去。他立下遗嘱要求解剖尸体。他的追随者加藤高明、后藤新平都死因可疑。

[19] 中村尚美著《大隈重信》吉川弘文馆 第291页。

[20] 何谓"志士"？《玄洋社社史》是这样说明的："欲为刀笔之吏，无其职；欲归农，忌其卑；欲经商，无资本；欲从工，无技术；已拿不出武士的架子，呈形容枯槁之状，闷闷不安之态"、"于是，不由得勃然激起不满反抗之情，借尊王的义名，自私专横，为所欲为，心中强烈要求讨伐君侧之奸，世众之敌"。

（日本玄洋社编《玄洋社社史》第69页） 武装反"藩阀"无法实现，他们就转身投入"民权运动"，政府惟恐他们在国内闹事，就鼓励他们到国外去"立功"。伊藤博文之流，因推翻幕府，建立新政府有功，因此从下级武士摇身一变，成为掌握大权的新政府领导人。而其他藩国的武士，一新后不但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及身份，而且变成了干什么不像什么的流氓。他们因此成为反抗新政府、主张"民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伊藤等因此将他们放逐国外；有利可图时政府就跟进，看到形势不好政府就将他们回收。政府支持与否的手段是资助或断绝资助。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萨摩藩出身的松方正义，曾资助"志士""大陆浪人"5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2亿日元。

[21] 《四元老备忘录》转引自《大隈重信》 时事出版社 第170页。

[22] 1898年任台湾民政局长，1906年任满铁总裁，后任拓植局总裁，一生积极参与日本对外扩张。

[23] 日本当时驻华大使日置益对周自齐称："珠宝店着火，难保邻居不来抢夺"。日本人将自己趁火打劫的行为明说了。日本比一般的趁火打劫的强盗实际上还要阴险、毒辣，不单自己抢，还要鼓励其他强盗一起来抢。利用居住在附近的便利，事先进店侦探，看哪里有财宝，哪个是重要财宝，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有意在珠宝店内放火，然后与其他强盗一起来抢。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就是如此。日本在向袁世凯政权提出"二十一条"时威胁袁称：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支持孙中山发起反政府暴动。《船津辰三郎回忆录》第163页。

[24] 他专门写报告给大隈，让政府出面支持袁世凯称帝，同时再支持各界反袁。梁启超、孙中山、蔡锷都受到日本资助反袁。

[25] 三菱财阀创始人的女婿，"宪政党"总裁，大隈希望政党政治继续。加藤是英国通，宣战时都是他积极主动，并没有与元老及大正天皇商量，大概因此得罪了双方，虽然后来出任首相，但最后还是死在了任上。1926年一头一尾各死一个重要人物，头上是加藤，尾上是大正天皇，昭和天皇要让"明治宪法"名副其实。

[26] 山县1922年、松方1924年相继死去，只剩西园寺一个人。

[27] ✓ 为活着的首相，大正到昭和，活到战后的首相不多。

[28] 争论南朝皇室才属正统问题，到二战后出现昭和天皇是否应退位时又突然热闹了一段时间。而在大正时代，敢于并由藩阀重要人物提出“北朝属非正统”，这表明“抬”与争“抬”者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假如出自一般人之口，坐牢无疑。而桂提出此问题，显然是为了要压制皇室。南北朝时代，日本皇室分为两支，南朝是与将军抗争的；而北朝是足利将军扶植的傀儡皇室，后来南朝回归了北朝。可参照第六章。

[29] 难波的父亲是山口县（长州藩）大地主难波作之进，众议院议员。难波向天皇开枪的动机，据说是因为对特权阶级利用天皇镇压国民不满。从明治天皇到大正天皇时代，架空天皇、压制民众的是长州藩阀，山县死后，长州失势，萨摩（元老松方属萨摩藩）抬头，他推荐的两届内阁首相均出自海军，这也是萨摩的地盘。难波的所谓不满，大概就是指萨摩藩控制了天皇。真相是个谜。

[30] 在原敬内阁中任藏相，原敬被刺杀后出任首相兼藏相，继任政友会总裁。看到非政党的清浦内阁逆流出现，他放弃爵位，率领政友会参加大选“护宪”。在后来的犬养、斋藤、冈田内阁中均出任藏相，力主削减军费，1932年“二・二六事件”中被政变军人枪杀。据说田中义一动用了陆军机密费，买到了政友会总裁一职。

[31] 河本在1929年5月停职时，向后来接班的板垣征四朗大佐介绍情况时说：“今后绝密行动绝对不能让中国人参与。”结果“九・一八”“七七”事件都是日本人自己亲自参与（参照根津司郎著《昭和天皇不知道》早稻田出版 第102页）。

[32]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和平进入济南，2日，蒋介石进入省署办公，日本人接踵而至。5月3日，日本代理总领事、驻中国天津、济南的日本武官前来拜会蒋，夸赞北伐军军纪良好，一切秩序井然，日本军队准备撤离，他们专程前来道别。他们前脚离开，日本军人后脚就向北伐军发动突然袭击。日本所谓“不扩大”，关键是要看对手是谁。“不扩大”是用来麻痹对手的诡计，以此瓦解对手的战斗意志，为自己赢得准备时间并且保证偷袭可以获得最大成效。对手弱，他们就要欺负到底。

[33] 1927年3月30日，康有为离奇死在山东青岛，此前他与溥仪有过联系。杀死他的人，应是对通过他达到目的绝望的人。溥仪身边后来充当日本联络人的是郑孝胥。父子俩后来也都先后暴病死在“满铁”医院。日本只要溥仪建立“满洲国”，长城内的领土要留给汉族“傀儡”。1932年正月，郑孝胥之子郑垂暴毙，日本就是要“杀鸡给猴看”。最早将溥仪与关东军联系起来的中间人物是上角利一，“九・一八”后不久，他便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与罗振玉一起，潜入天津要溥仪去东北。上角退任后，伪执政府掌礼处翻译中岛比多吉接任，再接着是后来的伪执政府侍从武官石丸志都麻吕中将接任，最后是吉冈安吉。“九・一八前两个月，他还向溥杰透点风，让他回天津度假时转达溥仪。”（参考王庆祥著《伪满洲国皇宫揭密》团结出版社 第67页）。

[34] 同上书、第243页。

[35]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8页。

[36] 斋藤内阁末期，日本国内一直各种“政治丑闻”不断，该内阁虽被指责为“怠工内阁”，可该干的事都干了，继任的海军冈田继续强硬。

[37] 1941年对美国宣战前，同样有人提议建立“皇族内阁”。两次重大的对外战争前都有人建议组建“皇族内阁”，这表明：战争是天皇家的战争。陆军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是裕仁老婆的叔叔；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则是裕仁妻子的表兄。自1931年9月18日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俩人长期分担两职。南京大屠杀的指挥者是昭和天皇的叔叔朝香宫。皇室财产占国



家财产的一半以上，增减都是皇室占大头。

[38] 是被军人袭击对象的牧野伸显的女婿。官位好似拥挤电车上有限的座位，人人都想有人站起来后坐上去，昭和天皇抓住了想抢位子者的心理，不为他办事的，他就不让他坐首相位。

[39] 陆军绝密文件规定，广田内阁寿命为半年，参见第一章。

[40] 1940年第二届近卫内阁时，海相吉田善吾在“三国同盟”签署前称病离职。

[41] 积极推动战争，日本投降后自杀。

[42] 参考二战结束前日本向苏联“送礼”，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期间，日本向美军送“慰安妇”。

[43] 日本的一个成语，打开锅盖一看才知道里面的真实内容，多用于上当、受骗时。好似日本人送礼，豪华包装里面是一个不值钱的廉价物品。

[44] 陶希圣将汪等与日本的合作比喻为打麻将。汪等坐在麻将台上打，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个日本人，中国人只是摸牌、出牌，他们各自身后的日本人决定牌如何出。积极参与这次活动的日本人之一是犬养健，他是1932年被军人刺杀的犬养毅的儿子，他与军人合作得很好。

第八章 日本政坛中的“大扫除”



“洁癖”日本人

在日本，无论政府公务机关还是一般百姓家庭，每年年末都要进行大扫除。干干净净迎新年，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的共同风俗。日本的各大媒体常在此时将镜头以及报道焦点对准日本的各大著名神社，对那里的“大扫除”过程加以报道。只见日本各大神社的神官们手执各种打扫卫生的工具，或戴上口罩；或用毛巾将头、脸包裹得只露双眼，有的爬高，有的钻低，将“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求得整个神社焕然一新。

日本人酷爱整洁，对卫生的要求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日本人称自己的这种要求是“洁癖”。神社是神灵栖居的地方，在“神”既“洁”这一观念的支配下，神官们常年将神社打扫得一尘不染，光可照人。可平时神社里参拜者人来人往，总有些旮旯、死角无法每天都去清扫，这些地方只有等到年关将至，在专门安排的年末闭门“大扫除”时才清扫，神官们平时只追求大面上过得去。为辞旧迎新而进行的年末专门停业清扫叫“大扫除”，这时要对“不洁”进行“总决算”，大有“除秽务尽”的气概。

年末“大扫除”包括平日忽视的死角，当清扫工具深入到这些地方之后就会发现：绑在长长竹竿上的鸡毛掸子“敲打”到哪里，哪里就会尘土飞扬。日本人对此类现象专门造出了一个成语：たたけばほこりがでる，翻译成中文就是：“只要敲打就



浮世绘——厨娘

日本人对卫生的追求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这幅浮世绘上画的虽然是最容易弄脏弄乱的厨房，但我们在其中看不到一丝杂乱，四位妇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一切井井有条。这种被世人看成是“洁癖”的习惯，同样也会运用到对政治家的要求以及选择上。

会出灰尘”。

这个成语非常形象，它来自日本人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既是对熟悉的生活经验的总结；又是日本人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一种记录与再现。该成语除了特指“大扫除”这一特定对象外，还可以广泛应用在其他各种场合。

神社平日已足够干净，可如果“叫起真来”，随时都可以找到有灰尘的地方。不单神社如此，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包括人在内，何尝不如此?！比如日本的政治家，如果仅从平时的表现上来看，就好似平日的神社，各个都是光彩照人的“人杰”，没有铜臭，理想高远，为了国家与民族、选区的选民，每天忙碌。几乎无法发现甚至想像，这样的“圣杰”竟然有“污点”或“丑闻”。神社要开门迎客；政治家要为集团争取利益，“光彩照人”一是因为掩盖得好；二是由于没有到被敲打的时候。“敲打灰尘”“抖搂丑闻”，只有在“送旧迎新”的“大扫除”之时方能开始，而此时就是要将其“污点”与“不洁”暴露出来。

日本的保守政治家没几个"干净"，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可当他们出任首相闪亮登场时，总是没有任何"不洁"，只有当集团要赶该人物下台时，"大扫除"式的"总决算"才会正式开始。一切与其有关的言行，包括他身边人的言行，都会被用放大镜"照"一遍，用筛子"过"一次，然后将"尘土"通通"敲打"出来，"敲打"是为了"送旧迎新"。为了让前任政治家"肮脏"退场；接任政治家"洁净"登场，保守集团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要将他的"不洁"通通"敲打"出来。贪污受贿、男女关系、偷税漏税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在该政治家上任之前就存在，并非出场之时或执政之后才出现或发现，只是因为没到"敲打"的时候，当周围形势发生变化，需要赶该人物下台而他本人又不愿意爽快交权时，陈年累月的"积尘"都会被"敲打"出来。"敲打"是"送旧迎新"的信号与前奏，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旧""秽"黯然退场；"新""洁"高调登场。

日本近代史中的许多首相，都是在任期未满之时，因"组织需要"，被用"送旧迎新"方式"敲打"出局，这是日本政坛首相更迭的一个特点，而更换"首班"往往是为了换政策。

在日本的"纵向统治"中，任何一个掌握赏罚大权的领导人或集团，对"下"的欲求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武士"人人渴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变大"，而"变大"的具体内容就是对财富、权力、异性的占有。只要"武士"勇于为集团带来利益，那么集团就会放手让他"变大"，有时甚至不惜利诱，这时集团对"武士"所具有的"不洁"都会"熟视无睹"，甚至会找"下"来为他当"抹布"，用"肮脏下"来"干净上"。一旦发现该武士无法为本集团带来利益，那么就会更换另一个能为本集团带来更大利益的"新人"，此时会一反以往对"不洁"的容忍态度。

只有当武士老老实实服从组织，迅速将位置让出，"敲打灰尘"的活动才会嘎然停止，否则组织就会不断"敲打"，让你难堪、丢人、无地自容，直到他"退场"时为止。有组织地敲打与有组织地掩盖、隐瞒，任何时候都互为表里。

战后内阁"走马灯"

"如果要维持现状，没有必要更替内阁"。

内阁首相	就任年龄	时间	任务	退出政坛方式
铃木贯太郎（1867-1948）	77	1945.4-1945.8.15	准备投降	○ 主动辞职
东久迩宫捻彦（1887-1990）	58	1945.8.17-1945.10.5	实际投降	○主动辞职
币原喜重郎（1872-1951）	73	1945.10.9-1946.4.22	与占领军周旋	● 无奈地交权辞职
吉田茂（1878-1967）	68	1946.5.22-1947.5.20	与占领军周旋	● 无奈交权辞职
片山哲（1887-1978）	60	1947.5.24-1948.2.10	改革内阁	●无奈交权辞职
芦田均（1887-1959）	61	1948.3.10-1948.10.7	改革内阁	# 被"敲打"辞职
吉田茂（1878-1967）	70	1948.10.15-1954.12.7	充分利用冷战与美国周旋	# 被"敲打"辞职
鸠山一郎（1883-1959）	72	1954.12.10-1956.12.20	恢复日苏邦交	◎完成任务主动辞职
石桥湛山（1884-1973）	72	1956.12.23-1957.2.23	希望与共产圈国家交往	※ 称病辞职
岸信介（1896-1987）	60	1957.2.25-1960.7.15	修订安保条约	◎完成任务主动辞职
池田勇人（1899-1965）	60	1960.7.19-1964.11.9	发展经济	※ 称病辞职
佐藤荣作（1901-1975）	63	1964.11.9-1972.7.7	对内继续发展经济，对外追随美国，孤立中国	● 无奈交权辞职

以上内阁更替一览表，自1945年开始到1975年为止，共30年时间、12届内阁，以平均时间计算，每届应该为五年，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各届首相执政期间长短不一，任期最长的是跨越40-50年代的吉田和60-70年代的佐藤，俩人分别执政7、

8年，仅他们俩人的执政合计，就占据了30年中的一半，长达15年之久。其他各届内阁，以战后的铃木、东久迩、币原等三届最短，分别是4、2、6个月。50年代中期的石桥的实际任期也只有一个月，上任一个月后称病，将政权委托给副首相岸信介，两个月后正式辞职。这四届内阁，加起来的执政时间也才勉强有一年。首相在位时间长短不一，更替理由以及方法各异，日本内阁变动似乎无规律可循，但如果认真比较，依然可从中发现更迭规律。



(1) ○ 主动交权辞职

铃木、东久迩

(2) ◎ 完成任务后主动辞职内阁

鸠山、岸

(3) ※ 称病辞职

石桥、池田

(4) ● 无奈交权辞职

币原、片山、佐藤荣作

(5) # 被敲打下台内阁

芦田、吉田

爽快交权的四任内阁 //////////

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是所有人都怕“大任”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最没有人愿当首相的时期。以前首相位是“香饽饽”，为争夺首相宝座可以不择手段，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可此时是人人都要躲避还怕来不及“凶位”，之所以首相位遭遇如此冷落，是因为这时是日本最困难的时期，此时出任日本首相“吃力不讨好”。以77岁高龄出马的铃木贯太郎[1]为例，他非常清楚昭和天皇为何会屈尊“恳请”他出任首相。前任几届打败了仗，日本的“国运”一届比一届“衰”，让他出马是为前任收拾残局“揩屁股”，他能够“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能在输局已定的前提下，让日本输得尽可能少点、体面点。他4月接手，8月交权，其间日本遭受了两枚原子弹的袭击，在昭和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播放之后，他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接他铃木班的是东久迩，他是昭和天皇的叔叔。这也是自内阁制度建立以来、唯一一个皇室成员出任首相的内阁。东久迩“迎接”占领军进驻，日本此时签署了投降书。一边要应付美军，另一边还要听命于天皇，这时最容易“吃力不讨好”。1945年9月



27日，昭和天皇“拜会”了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日本方面要严格保密，而美军要求“不准压制言论自由”，10月4日再发布“要求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解除限制”的备忘录，东久迩以“无法配合”为由，辞去了首相职务。接任者是币原[2]，一个已经被人遗忘、活跃于大正时代的73岁的政治家。他英语娴熟，昭和天皇“恳请”他出马，主要是看中他的英语能力，要他与美军周旋。与前任一样，币原领导的内阁，虽然满打满算是六个月，可实际寿命也只有两个月。他之后仍是一个懂英语的人出任首相，他是币原内阁中的外相吉田茂。

这段时期出马的所有首相，都是在昭和天皇的“恳请”下上任的，特点是“出”不爽快，“下”爽快。他们找个合适的理由就交权下台了。

主动下台的首相 //////////

鸠山与岸属于完成了各自任务后主动下台的领导人。他们在执政期间就高调表示，自己决不留恋首相位，完成“重任”后就会将政权交出。主动交权，当然也就避免了被人“敲打”的难堪。

鸠山一郎的前任是吉田，因为后者不愿交权，结果最终被“敲打”出局，72岁高龄的、战前的“党人”政治家鸠山这才登场。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当一次日本首相，他本人“执著”也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前任吉田的“亲美”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保守势力迫切需要转向苏联，与其说鸠山是合适的人选，不如说有一个新任务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来干，时代给了鸠山机会。鸠山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因此完成任务后“迅速引退”，他将政权接力棒转交给了后继者。新任务等着石桥，他要解决中国问题，可当他发现此问题一时半会无法解决时，石桥遂将政权转交给岸信介，他以首相身份仅仅度过了一个圣诞节，别说周围人看到他有什么“政绩”，甚至他本人还没有想明白应该如何开始着手的时候，石桥就已经“闪电”离职了。岸修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立刻交权下台。

鸠山与岸，他们俩接权上台相似；完成任务后爽快交权下台也相近。日本的保守政权好似一个钟摆，在左右之间摇晃。鸠山摆向苏联，岸再摆回美国。两者的差异在于：鸠山在民众的欢呼声中体面交权；岸在民众的“声讨”中交权。但表象背后也同样有相同的地方。鸠山卸任，日本对苏联的热情立刻消退；岸下台前，反美呼声响彻日本列岛，辞职后，日本列岛立刻恢复了平静。

称病下台的首相 //////////

还有一种交权下台也属于“不恋权”一类，但它与通常的辞职不同。通常的辞职，要么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引咎辞职，要么完成了一个任务“高洁”辞职。而这种既不属于没有完成任务；也没有在执政期间出现重大失误，仅仅是因为外界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保守势力迫切希望通过换人改换政策，同时又不愿意让外界知道原因，这时最好的方式就是首相自己“称病”辞职，既维护了当事人的体面，又为日本政府保了密。

与完成任务后高调辞职的鸠山与岸不同，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称病”辞职的有两人，一个是石桥，另外一个是池田。以生病为由交权，有病也是确有其事，石桥患感冒；池田得了癌症。但身体不好并不是辞职交权的真正理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近、现代史上“带病掌权”的人物有的是。远的不说，就是石桥的前任鸠山，他在出任首相之前曾因脑溢血中风倒下[3]，可后来还是接替吉田出任首相。1956年1月，鸠山再因心脏出问题病倒在了旅途中。他的亲属、医生均紧急从东京赶到伊豆，这时再次招致“他的身体行吗？”的置疑。又是保密，又是休养，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后，他才重返东京。10月，鸠山以74岁高龄访问苏联，他带着医生、护士仍坚持出访，许多人都为他的身体能否承受长途旅行担心。接权、执政时，他有病都坚称“没病”，可访问苏联回国后，他宣布身心疲劳到了极限，以此为由交权下台。“带伤运转”的首相还有大平正芳、小渊惠三，这两位首相死在了任上。

再说石桥，仅仅因为患感冒就将首相职位交出，简直不可思议。他完全可以在感冒痊愈后继续执政，而且他身体不好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1958年之后岸与中国交恶，石桥在1959年、1963年两次访问中国，以前以首相身份在中国各地访问期间，身体好得很。

池田1964年8月被查出患上癌症，可他的智囊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隐瞒病情。对外宣布他的病名为“癌症前期症状”。隐瞒病情也是为了让他可以继续执政。对这两个人物来说，引咎辞职说不过去；完成任务交权又“壮志未酬”，只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可这个理由又不能对外公开，好似“隐瞒病情”，用“病情”隐瞒“国情”。

两人上台时的经历也很相似。

石桥是作为鸠山的继任登场的，在1956年底的总裁竞选中，石桥刚刚战胜了岸等其他对手，出任自民党总裁并当上了首相。[4]当时全日本都在为这次“民主”竞选首相喝彩。

池田也同样，他接岸信介的班上台，对于由谁出任继任首相，岸提议通过“协

商”方式产生下任首相，要自民党三要职：干事长、政调会长[5]、总务会长与重要阁僚、众参两院议长等实力人物“协商”，讨论决定由谁出任新一届首相，但遭到包括池田在内的所有人物的一致反对，他们反对“协商”产生首相，要求通过竞选产生。这次竞选中，池田有两个竞选对手，一个是也曾经参加过与石桥竞争的“亲台”人物石井光次郎，还有一个是“亲华”的松村谦三。这次虽然与石桥竞选总裁时同样，仍是“两中”对“一美”，但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不成熟，一中、一台仅仅是露面表示一下姿态而已。岸之后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通过发展经济缓和国内统治阶级与无产大众之间的矛盾，而池田倡议的“所得倍增”政纲，受到了劳资双方的欢迎。

1964年7月，自民党再次召开党代表大会，因为自民党是国会中的多数党，选举自民党总裁实际上就是选举日本首相，与池田竞争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大野伴睦不久前去世了，池田的竞争对手有佐藤荣作与藤山爱一朗。藤山“亲中”；佐藤与他的哥哥岸同属“亲美”派。池田干得不错，没有理由让他下台更换首相。投票选举因此只能说是一种形式，池田在第一次投票就过了半数，以242票、超过半数4票第三次当选。1964年7月18日，新内阁组成。

石桥与池田，两人都是充分反映了“党意”人选，“党意”刚选择了他们，他们就“撂挑子”，引咎辞职显然无法“自圆其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两个人物在当选总裁三个月后就“称病”交权呢？

尽管两个人的病由不同，病兆在他们各自身上，可真正的“病因”或者说“病根”，却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上。

当上首相，是“变大”的结果，同时又是“变得更大”的起点。如果说首相必须在任期内完成一个重大任务的话，那么石桥是最没有成就的一个首相。吉田完成了《旧金山条约》，让日本从一个战败国变成了独立国家。鸠山实现了“日苏关系正常化”。岸修定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了《新安保条约》。池田实现了“所得倍增”，举办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佐藤荣作续签了《安保条约》，完成了“冲绳回归”。石桥没有完成任何任务，鸠山上台，与“共产圈”国家苏联恢复了邦交，作为鸠山的继任，日本认为“中苏一体”，需要石桥乘势解决对中国大陆问题。可北京与日本之间的问题难点在于日本的赔偿，中国没给石桥“送礼”，没说要免除战争赔偿，这让石桥打开中日僵局无望，与其占着位子干不成事，不如爽快将政权交出，让后继者解决其他问题。石桥既没有“污点、丑闻”，也没有功劳，因此称病交权最体面，也不会暴露日本的意图。石桥遗留的问题在1972年让田中角荣完成了，换言之，假如当时中国把给田中的条件给了石桥，那么石桥也会与鸠山同样，成为解决“共产圈”国家问题的“有功之臣”。由此可见，与其说鸠山与田中俩人有什么有特殊能

力，能够在外交上“突破”，不如说中、苏两国送了“礼物”给他们，苏联送给了鸠山；中国送给了田中而没给石桥，这让中日问题拖1972年田中角荣任上才解决。田中角荣与鸠山，两人接权相似。

再看池田，虽然9月住进了医院，可10月1日日本东海道新干线通车，10月10日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这些都是池田要露面、向世界展示日本经济奇迹的时候，这时池田不能缺席。就在他对未来执政“踌躇满志”的时候，没想到老邻居中国一点也不给面子，池田刚刚再选上自民党总裁，而中国竟然给他送了一个“大炮仗”，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实验成功首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冲击波不光打破了罗布泊上的千年沉寂，还跨越了太平洋，引爆了池田内阁。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4日闭幕，10月25日池田以生病为由宣布引退。真正交权是在11月9日，而他因病去世是在一年后的1965年8月[6]。

日本武士制胜要诀之一是：绝对不能让对手知道自己的弱点，因此，既不能让外界知道石桥因“对华工作”无望而下台；更不能泄露池田内阁被中国的原子弹“炸

被原子弹摧毁后的广岛

美军对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不仅摧毁了这两座城市，还彻底摧毁了日本顽固势力的“决战”之心。东京奥运会时，日本特意挑选了一名广岛原子弹爆炸当天出生于广岛的男孩来点燃奥运主火炬，而此举究竟是想说明“原子弹也无法摧毁日本”，还是“日本从此进入和平发展时代”，这种刻意安排的背后，存在多种诠释和解读。



飞”的秘密，“称病”成为最稳妥的借口[7]。

从他们“称病”卸任后的人事安排上，也可以看出当初让他们两下台有多么匆忙。

石桥将政权转交给岸之后，内阁仅仅更换了一个首相，其他阁僚都继续在位。池田时也同样，池田下台、佐藤上台时，佐藤只更换了一个官房长官，其他内阁成员继续留任。

10 月 25 日池田表示要辞去首相职务，当时的自民党的干事长是三木武夫，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他也是背后积极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之一。三木提议池田辞职后应“协商”产生总裁。当时的候选人有三个，与苏联“友好”的河野，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藤山爱一郎，还有继承吉田茂路线的佐藤。佐藤、池田、岸信介等，都是竭力主张“一中一台”，要通过制造两个中国来“弱化”中国的人物，日本边上的两个大国，苏联和中国，都成为了“有核”国家，日本此时更要钻到美国的怀抱中了，佐藤是岸信介的亲弟弟，他以前就一直批评池田“只注重发展经济不注意国家安全”，中国的蘑菇云给池田的“所得倍增”蒙上了阴影，池田之后的继任者，当然是非追随美国者莫属。

被敲打下台的战后历届首相

“敲打”鸠山与第一次吉田内阁 /////////

出现了新形势，日本保守集团迫切需要更换人马解决新“悬案”，可这时在任首相既不爽快交权；又要继续“霸位”，延误了解决“悬案”，这时保守势力集团就只能“动粗”了，用“敲打”的方式“赶”他下台。“敲打尘埃”就是“迎新”之兆。日本是个严格管理的国家，当组织认为某个人物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无论如何会为该人物提供各种便利，有“丑闻”都要“盖上盖子”。[8]

1945 年 12 月 18 日，在币原内阁中任厚生大臣的芦田提议解散众议院，提议在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后，币原于次日解散众议院，宣布于 1946 年 1 月 21 日到 22 日举行大选。[9]

没想到盟军总部突然对大选“叫停”，12 月 20 日盟军总部下令大选暂时推迟，决定在大选之前先对军国主义分子以及其追随者进行“整肃”。1946 年 1 月 4 日，盟军总部公布了“整肃备忘录”，依照美军划定的范围，币原内阁中有五位大臣属于

被"整肃"的对象,币原希望这些大臣能够继续留任,但美军没有同意,币原只得服从美军命令,通过改组内阁让政权延续。1946年1月12日,被日本政府隐匿的原缅甸伪政府主席巴莫向盟军"自首",此前他获得日本政府资助,在日本各地东躲西藏。他向美军占领当局告发,日本军人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这让币原政权再次陷入危机。

经过GHQ许可,政府在1946年2月25日宣布:4月10日举行全国大选。这是战后的首次选举,也是自上一年12月7日公布了新选举法之后的首次大选。新选举法赋予女性有与男性同等的选举及被选举权,参选年龄也从原来的25岁降低到20岁。

这次选举的最大特点是政党奇多。据统计,全国性的政党有13个,地方政党多达350个。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主要有两个,分别是"进步党"与"自由党"。两党合计得票率为43.1%,获得了50.5%的议席。"社会党"有331个候选人参选,最终当选者只有92人,占总议席的20%,共产党有五人当选。

1946年4月的大选中,确定席位为466席,鸠山领导的"自由党"获得141席,成为第一大党,第二位是"进步党",94席。尽管鸠山领导的"自由党"席位最多,但在议会中的席位仍未过半,只能组成联合政府。在政权必须继续控制在保守派手中的问题上,鸠山和币原都是一致的,但在是否由政党领袖出任首相、组建内阁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鸠山认为自己是第一大党的党魁,理所应当出任首相,而币原不希望搞"政党政治",他要继续明治以来的天皇"委任统治"。鸠山希望与"社会党"联合组建政权,这一提议最初遭到"社会党"的拒绝;可后来"社会党"表示愿意协作时,他又改变主意,决定组建单独组阁。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4月22日币原终于同意辞职,当时新宪法尚未颁布,继任首相不是由国会指名,而是由前任首相奏请天皇同意。4月30日,币原向天皇报告继任首相为鸠山,鸠山连出任首相时穿的大礼服都准备好了。

可就在鸠山已经拟订好内阁成员名单,他本人准备进宫谒见天皇出任首相时,5月3日,盟军司令部通知鸠山,他在第二批"整肃"名单中榜上有名,属于被"褫夺公职"对象,鸠山因此与首相职位失之交臂。对于这次突然被"敲打",鸠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如果要当总理大臣就会被革除工职;而只要死了心不当总理大臣,加入币原内阁就可以免除被革除工职的处分。只为避免被革除工职而去做别人内阁的阁员,那是断然不能接受的。"[10]

如此表白说明,如果他不去争当首相,主动将总裁的职位让出,那么他可以稳稳当当地捞个大臣当,否则将被"整肃",失去一切。鸠山对有人向他"露底"不服气,



一定要挑战“传闻”，而结果证明“传闻”不是“空穴来风”。

鸠山一郎是鸠山和夫之子，后者曾在1896年出任过众议院议长。鸠山一郎于1915年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此后他一直属于“政友会”。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鸠山一郎以“政友会”总裁身份出访欧洲，他于7月19日从神户乘船启程，8月18日到达德国柏林，其间参加了纳粹党代表大会，10月19日到伦敦。回国后，1938年他出版了《世界面貌——外游日记》一书。该书主要记录了鸠山对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的访谈，内容多为吹捧希特勒，美化侵略扩张的言论。鸠山曾对希特勒提议：“为了把英国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日德应该在中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出席英国首相张伯伦以及其他保守党领袖的宴会上，他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中国如果不由日本管理，很难继续生存。”

1946年4月的大选结束后，就在鸠山一郎忙于组建新内阁的过程中，突然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记者就该书对他发难，他们引用鸠山书中的内容追问他写作目的及动机，鸠山回答：“书中的内容都是谎言”。同时还进一步辩解说：“只有大学同学聚会时，人才会说真话。”

1932年，鸠山出任斋藤内阁中的文部大臣，当时的京都大学法律系泷川幸辰教授著有《刑法读本》一书，政府认为该书观点“左倾”，禁止该书发行。而泷川教授在讲课过程中依然讲授该书中的内容，时任文部大臣的鸠山一郎向京都大学校长下令：停止泷川教授的职务。京都大学法律系教师集体提出辞呈表示抗议。在军国主义政府期间，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这也是鸠山被“整肃”的罪状之一。

在鼓吹并积极参与日本对外扩张问题上，鸠山与吉田不分伯仲。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时，鸠山是内阁书记长官，吉田是外务次官。吉田曾向田中提出：“为了维护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日本应该干涉中国内政。”吉田因对币原“软弱”不满，支持田中强硬，因此获得了外务次官的职位。1936年广田弘毅出任首相时，吉田希望出任外务大臣，后因军部反对，他没能入阁。

吉田比鸠山大五岁，可在美军的“整肃”风暴中，鸠山成为众矢之的；吉田却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吉田躲过了被“整肃”的一劫还不算，后来竟然能够接替鸠山出任“自由党”总裁，最终出任首相。拉下鸠山，推上吉田，一切看似一个难解之谜，但谜底在《木户幸一日记》中。

鸠山5月4日被“整肃”后，“自由党”的继任总裁也有过几个人选。有芦田均、原宫内大臣松平恒雄（1877-1949）及吉田茂。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有过外交官经历，会英语。松平曾出任过驻美、英大使，伦敦裁军会议首席全权代表，芦田曾在俄、法、英等使馆中当过外交官，他于1932年辞去外交官职务，加入“政友会”从政。

这些人中只有吉田最后胜出，可这竟然是昭和天皇的意志。



《木户幸一日记》1945 年 10 月 5 日

1 时 45 分，接到与首相（东久迩）一起进宫的指示，中途离开会议室立即出发。首相谈到：若依照麦总部昨晚交代的方案去进行，实无法完成任务，因此提出辞呈。拜谒天皇后又到皇族休息所参见，并就继任内阁等事宜进行磋商。

2 时 10 分至 2 时 30 分，到御文库谒见天皇。看到首相辞呈后，接受了天皇推选后继内阁首相的命令。

3 时近卫来室，就政府内部形势和今后趋势等进行恳谈。

3 时 45 分，据平沼枢密相、藤田侍从长传达的圣旨前往谒见天皇，进入参殿者休息厅，当即就后继首相等事宜进行全面磋商。这时大家一致认为，应按下列条件推选继任首相：美国方面不反感的人；没有战争责任嫌疑的人；通晓外交者。第一候选人是币原男爵，第二候选人是吉田外相，获得一致同意。

5 时 20 分到 50 分，到御文库拜谒天皇，禀奏上述决定，天皇同意。

由此可知，对于今后推荐什么人出任首相，保守势力早已计划好了。东久迩之后的第一人选是币原，其次是吉田。如今币原面临无法继续出任首相的困境，那么他们就要全力推举吉田。虽然大选的结果鸠山胜出，但鸠山的“自由党”原本就是由保守分子出资组建，鸠山不服从安排，保守势力遂借助美国人之手将他“驱除”。

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首相，这是大正时代反藩阀独裁的“胜利果实”，而“政党政治”在进入昭和时代后不久，就在 1932 年军人政变的枪声中终止。鸠山希望重新回到大正时代的所谓“宪政常道”上，可保守势力坚持要用军国主义时代的暗箱操作方式。吉田并非“自由党”党员，他不但瞬间完成了“非党员”到“党员”的跨越；而且还实现了一入党就跳过所有一般党员，出任该党总裁的飞跃，一切表明，有保守势力的“黑手”在背后操作。吉田 1946 年 5 月 22 日就职，一年后的 1947 年 5 月 20 日将政权交出。

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各个都不干净，战前他们都曾积极参与过战争，假如美国要依靠他们实施“间接统治”，那么只有在“五十步百步”中选择，这同时也是美国占领当局所面临的困局。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场上，美军的对手是日本“皇军”，当时你死我活、刀光剑影，这些都是明的；日本投降后两者地位发生变化，“作战方式”也

随之发生了改变，日本文人"面从腹背"，表面鞠躬说"哈伊"，背地里则用各种方式抵抗。美军并没有深入到民众之中，了解他们的要求，从他们当中选择领导人，为了"平稳过渡"，美军事事与残存的国家机器以及运转这一机器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这样一来，美军的各项改革只能是大打折扣。

"整肃"和"大选"让二战前的很多职业政客离开了政坛，可它并没有触及保守势力的根基，公、检、法等大权都被严密控制在保守分子手中。这次新、旧内阁更替，实际上仅仅是吉田与币原换了一个位子而已。吉田在前币原内阁中任外相；新的吉田内阁中，吉田任首相兼外相，而币原任国务相、副首相。

"敲打"芦田与第二次吉田内阁

1945年8月11日晚，芦田均来到鸠山位于长野县轻井泽的别墅，商量战争结束后如何重返政坛。天皇宣布投降一周后，鸠山从轻井泽回到东京，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新政党。"自由党"于11月9日成立，此时距10月10日成立的币原内阁，时间刚好过去了一个月。币原组阁时邀请积极筹备"自由党"的芦田入阁，接到邀请后，芦田立刻脱离了"自由党"，出任币原内阁中的厚生大臣。1946年4月币原内阁总辞职后，芦田离开了政府。1947年3月31日，旧宪法下的最后一届议会解散，"进步党"与"国民协同党"的一部分重组为"民主党"，5月，芦田以"民主党"总裁身份加入片山内阁，任外务大臣。片山内阁是日本新宪法颁布后的首届社会党人内阁，国民对其期待非常高，可这届内阁只坚持了九个月。

片山内阁1948年2月瓦解之后，23日"民主党"总裁芦田均被国会选举为首相，3月10日组成了"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协同党"的三党联合内阁。由于内阁依然是"民主""社会""国民协同"的三党联合内阁，与上届片山内阁相比，仅仅是更换了一个新首相，新内阁因此被称为"翻版联合政权"。

新内阁成立后不久，美、苏间的"冷战"激化，其标志是4月1日开始苏联封锁柏林。此前的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在旧金山发表了"要使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防波堤"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称："占领日本及德国让美国不堪重负"。美国当初占领日本，目的在于彻底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所有改革都瞄准消除日本重新武装。可在解散财阀、削弱日本工业能力的问题上，遭遇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此时的中国大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开始了总反攻。国际形势的变化，让美国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改变，美国此时下决心要使日本成为"反共堤坝"，从原先的"削弱日本"转变为"扶植日本"。尽管芦田内阁被称为事事



冬天里的昭和电工

初衷是政府为了重振战后百废待兴的经济而设立的“国家财政补贴”，可结果却成为了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肮脏的权钱交易。日本的所谓民主政治，仅仅是将选民“恭维”为“有权者”的游戏，真正的“有权者”是“统治者”，他们可以“自作自演”。划拨钱款给自己的是他们，“自我揭露”的还是他们。昭和电工事件便是“公仆”玩弄“有权者”的一次政治阴谋。

服从美国占领军的“yes man 内阁”，可保守分子仍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掌权，他们要将芦田从首相位置上赶下去。1948 年 3 月 15 日，原来的“自由党”更名为“民主自由党”并举行新党成立大会，随着“同志俱乐部”的 36 名国会议员加入“自由党”，新成立的“民主自由党”一跃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这实际上是保守政党准备卷土重来的信号。

“社会党”领导人西尾末广以副首相身份加入芦田阁，在 6 月 1 日众议院调查“非法财产交易”特别委员会上，他承认作为书记长个人，曾从建筑商那里收受过 50 万日元的政治捐款。 7 月 6 日他宣布辞职，次日东京地方检察厅对他提起公诉，8 月 27 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布他无罪。他主动“认错”，实际上是想从内部“引爆”芦田内阁。

6 月 23 日，“昭和电工”经理日野原节三因涉嫌向商工省官员行贿被捕，“昭和电工事件”从此进入公众视野，这个导火索最终“引爆”了芦田联合内阁。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战后的日本政府制定了国家财政补贴私营企业的政策，“昭和电气工业公司”为从国家的复兴金库中获取更多资金，以生产化学肥料为名向政府申请补贴。而政府批准的前提是：必须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政治捐款返还给政党。“权钱交换”是当时所有从政府那里获得补贴的企业都要从事的交易，可唯独在这个时刻，与现内阁有关的“丑闻”都被“敲打”出来。以1948年6月23日日野原节三被捕为开头，9月大藏省主计局长福田赳夫、9月30日前大藏大臣、现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栗栖赳夫、10月6日“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先后被捕。10月7日，“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将西尾末广从“社会党”中开除出党，同时芦田宣布内阁总辞职[11]。

“昭和电工事件”最终导致64人被起诉，审判一直持续到1958年，后来只有日野原、栗栖赳夫被判有罪，其他人均被宣布无罪释放。罪名虽然被洗刷掉了，但芦田被“敲打”下台的事实无法改变。[12]

为了阻止“民主自由党”总裁吉田茂成为继任首相，日本国内曾出现过推举“民主自由党”干事长山崎猛组建新内阁的活动，可就在首相竞选即将开始的10月14日上午10时，山崎猛突然辞去了国会议员的职务。辞去议员意味着他彻底离开政界，此举的直接结果是吉田茂可以单枪匹马地顺利当选。从芦田被政治丑闻推翻，到山崎猛在选举即将开始前突然宣布退出，一切都是为了给吉田“亮绿灯”，让吉田顺利当上首相已经是第二次。鸠山以前刚“出马”就“翻车”；片山、芦田刚主政就遇到重重障碍，唯独吉田茂“有惊无险”，保守势力用“面从腹背”的方式，与占领军进行没有硝烟的战斗。

10月14日夜晚举行的选举中，吉田茂再次如愿当选为首相。在众议院中，吉田领导的“民主自由党”当时只有151个议席，虽是最大党，但议席数并没有过半，只占众议院内的三分之一。在10月14日决定谁能够出任继任首相的投票中，吉田158票，片山1票，空白票213票。158票意味着吉田获得了来自本党的全部选票，此外他还获得了额外的7票，片山的1票很可能是他自己投自己，可其余的213张空白票可谓史无前例。如此多的空白票，只能说明国会议员们对保守分子操纵政治极为愤怒。“民主”“民意”的背后是“阴谋”与“欺骗”，日本的史学家及政治学者至今没有说明其中原委，吉田在“以少胜多”的情况下被国会指名为继任首相。

1948年10月15日，吉田在皇宫接受了首相任命，同时在场的还有前首相芦田。10月19日组阁结束，第二次吉田内阁成立。12月7日芦田均被捕，1952年10月他被宣布无罪。

由于吉田领导的政党的议席数没有过半，为了保证他领导的政府的政令能够

在众议院顺利通过，吉田的首要任务是让“民主自由党”能够在众议院中获得过半议席，他要尽快解散国会举行大选。“昭和电工事件”尚未查清，可芦田此时已焦头烂额，吉田派要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时机获得更多的席位。GHQ 并不同意解散国会，美国也不希望吉田再次出来。

众议院应在何种条件下解散，1946 年颁布的新宪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内阁的规定是第五章第六十九条：众议院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或否决了信任案）时，若不解散众议院，内阁必须总辞职。吉田希望依据这一条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为达到上述目的，他在组阁时就预先进行了布局。日本内阁总辞职，以前有内阁成员受他人指使，通过该人物在内阁中故意制造“内阁意见不统一”，由他本人辞职“引爆内阁”。与以往的“由外到内”不同，这次吉田搞了一次“从内到外”，组阁时，他在自己的内阁中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让他在必要时充当“神风队员”。

历届内阁中的重要人选之一是大藏大臣，吉田组建第二次内阁时，外界一致认为吉田会任命池田成彬，后者战前曾出任过日本银行总裁，有过大藏大臣经历，同时还是三井财阀的常务理事，他最能代表保守势力的利益。可吉田并没有让池田成彬入阁，他选池田成彬的秘书泉山三六当大藏大臣。泉山三六既无任何从政经验，也不懂经济与货币政策，如此重要岗位让一个没有任何从政、从商经历的人出任，任命之初让所有人愕然。第一次吉田内阁时，吉田为了找一个农政专家，他不惜三顾茅庐选拔人才，而这次的人事安排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答案在两个月后终于揭晓。[13]

新内阁诞生两个月后的 12 月，泉山三六开始“剖腹”。12 月 13 日，泉山在众议院食堂“醉酒”，然后强行要与“民主党”女议员山下春江接吻，在后来审议预算案时，他又“醉得无法站立”答辩，反对派因此要求他辞职。泉山表现得非常顺从，立刻辞职。吉田的目标是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他与反对派之间达成了“协议”，通过预算案后立刻解散国会。与历年不同，通常新年度的预算要拖到该年份的国会中进行审议，可这次 1949 年的预算，在 1948 年年末就开始审议并出人意料地迅速获得通过。12 月 23 日追加预算案成立后，反对派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并在众议院中获得通过，吉田立刻解散众议院，宣布举行全国大选。

国际上，8 月到 9 月，朝鲜半岛上出现了北边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南边的大韩民国，分别受苏、美的支持。9 月 24 日，大陆的解放军解放了济南，12 月 1 日解放了徐州。11 月 12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 25 名日本被告有罪，12 月 23 日，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以死刑。众议院恰好在这一天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吉田同时宣布解散国会。这些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保守势力有意为之。



大选定于1949年1月23日(星期日)举行,这是战后第三次、也是新宪法实施后的第二次全国大选。24日,全国的选举计票结束,吉田领导的政党的票数获得飞跃,大选前"民主自由党"仅有151个议席,大选后一举增加到264个,加上选举结束后转入"民主自由党"的,共269个。在众议院总共466个席位中,"民主自由党"一下占有过半席位。一个党在国会内占有多数议席,战前也只出现过四次,而吉田这次则是战后首次。"民主党"从90跌落到69席,"社会党"以前分裂为"左""右"两个,但合计仍有111席,但经过这次选举,仅获得48席。从"社会党"左派中分裂出来的"劳农党",从原来的12席变成7席。片山、芦田联合内阁时,三党联合总议席有242席,可选举结束后只剩139席。仅仅经过一次大选,就失去了40%、103个席位。

与战前的"非责任内阁"不同,解散国会意味着首相本人也瞬间失去了国会议员的资格,吉田本人也必须加入到重新竞选的行列中去,因此,首相是否宣布解散国会,历来有主动、被动之分。当执政者判断解散国会、重新大选能够确保本党获得更多席位时,首相就会果断解散国会。相反,当估计解散国会、重新大选无法削弱对手,还可能让本党失去席位时,首相就会避免主动解散国会。对反对派来说,对政府不满并认为有可能推翻政府时,反对派就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当反对派的势力占上风时,"不信任案"会迅速获得通过,这时政府就不得不在"解散国会"还是"总辞职"中进行选择。对政府来说,后者是"被动解散"。很多时候反对派已经事先在私下进行了充分准备,然后在国会中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只要该案获得通过,就等于是要执政党下台。

"请君入瓮"——敲打吉田

1946年5月3日鸠山被"整肃"后,他将"自由党"总裁职位"让"给了吉田,据鸠山回忆,吉田曾向他约法四条:(1)我没有钱,也无法搞到钱;(2)请你不要干涉我选谁当大臣;(3)如果我感到厌倦,可以随时放弃;(4)待你恢复身份后,会马上将总裁职位还给你。

1951年底鸠山重返政坛之后,他依据第四条向吉田索要总裁职位。可吉田在回忆录中说,与鸠山的"约定"只有三条,不承认有第四条。可他以"反对公权私授"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左二)访问日本

对日本,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杜勒斯家族有三代人跟日本打交道的教训,朝鲜战争这一"热战",给了他以及他身后的美国以机会,可以实际考察日本对"集团防卫"与"自卫"的态度。杜勒斯与吉田茂之间开启"斗智",直到今天仍在日美之间延续。

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本身说明,吉田变相承认了第一次吉田内阁是"公权私授"。两人之间的争论,与其说吉田"赖账",不如说"归还总裁"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1947年"新宪法"生效,重新举行大选后的首届内阁是片山内阁,接着又有芦田内阁,"第二次吉田内阁"组建于1948年10月,1949年1月经过全国大选后再组建"第三次吉田内阁",1952年去兑现六年前的"承诺",显然"落后于时代"。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京,4月占领南京,5月攻占上海,10月新中国成立,12月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北,中国分裂为大陆与台湾两个部分。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白皮书》,其中承认蒋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援助蒋政权。美国国务院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与北京政权开始交往。期待中国能够出现一个稳定的政权并且愿意与之保持外交关系,这是美国的一贯政策,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政府倾向北京已经毫无疑问。

1950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要早日开始"对日媾和谈判"。美国想尽快从日本撤走,可日本并不希望美军撤离。自1947年日本颁布《新宪法》时开始,日



本天皇就担心“谁保卫日本”，他曾向麦克阿瑟提出要美国保卫日本。1950 年 6 月 17 日杜勒斯[14]特使访问日本，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三天之后吉田改组了内阁，麦克阿瑟以前曾要求日本建立警察预备队、扩充海上自卫队，日本态度“暧昧”，自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在亚洲演变为“热战”，日本这才迅速建立起了“自卫队”。1951 年 1 月杜勒斯再次到访日本，发表了“对日媾和草案”。麦克阿瑟欲将朝鲜战争扩大；而美国政府要阻止战争继续扩大。日本当然希望朝鲜战争继续，这样可以让日本有更多美元进账。[15]美国 4 月将麦克阿瑟召回。

自 1951 年 2 月起就传出鸠山即将被解除工职处分的传闻，战前的政治家们开始积极活动，重新聚集在鸠山周围，他们在一起商讨如何推翻吉田内阁。1951 年 6 月 11 日，鸠山因脑溢血突然发作而病倒，以鸠山为中心的推翻吉田的工作不得不暂时推迟。鸠山于 8 月 6 日被解除处分。

1951 年 9 月 4 日签署了《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 年 4 月 28 日该条约生效。日本独立了，会说英语的吉田的有用性也立刻下降，随着美国宣布解除以前的整肃令，一批战前政治家开始重返政坛。如果“完成”了让日本“独立”任务的吉田茂此时就“激流勇退”，那么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在此后结束了，可吉田茂并不愿意像第一次吉田内阁时那样爽快地将政权交出，因此反对派选择“请君入瓮”的方法，他们只能通过不断地“敲打”，将吉田茂“赶”下台。

吉田早就意识到，日本独立后，针对他的夺权活动将会展开。根据大平正芳的回忆：池田安排他 1951 年 10 月访美，回国后即向他透露，众议院不久将解散，要他回家准备参加竞选。自 1952 年初开始，大平一直在家乡进行竞选的准备工作。[16]1952 年 8 月 28 日，吉田茂突然解散了国会，日本政界通常称这次解散众议院为“突然解散”，而大平的回忆表明，吉田早已提前暗中积极准备，在完成了所有前期准备之后才突然宣布，“突然”仅仅是对反对派而言。

反对派遏止执政者的手段之一就是提交“内阁不信任案”，迫使首相“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前提是估计本派将在大选中将获得更多的席位。鸠山复出后，已经多次提出过要“解散国会”，但均被吉田以国会议员任期未满为由拒绝。[17] 8 月 26 日召集了第 14 届通常国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吉田将要解散国会，可两天之后的 28 日，吉田突然解散了众议院，这次是吉田主动。他搞“突然袭击”，就是为了让反对派“措手不及”。

9 月 12 日，鸠山在“日比谷公会堂”发表了重返政界后的首场演说，他主张：今后的首要政治课题是“日、苏邦交正常化”和“重整军备”。他往“左”比吉田还“左”；向“右”比吉田更“右”。

对吉田的首次敲打 //////////



大选结束后，吉田领导的“自由党”[18]确保了在国会中的过半席位，10月23日，“第四次吉田内阁”成立。

1952年11月27日，“右派”社会党议员加藤勘十向“第四次吉田内阁”中的通产大臣池田勇人重提两年前池田在国会答辩时的一个问题。两年前池田在国会中接受质询时曾回答：“我要清楚地说明，在通货膨胀、经济转向稳定的过渡时期，从事投机的、违反普遍原则的商人，有五或十个人破产是在所难免的。此事虽然值得同情，但也是不得已的。”

加藤重提两年前的质问：“那么，五或十人的国民死了也无所谓吗？”

池田答：“因破产而自杀之事值得同情，但我可以直白地说，这种事发生了也没办法。”

反对派以大臣对国民冷漠为由，立刻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反对派要用“敲山震虎”的方式，通过“旁敲”池田“敲打”吉田。

可该动议在表决时未能获得通过，在野党因此再提交池田必须辞职的动议。此时“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席位过半，假如“自由党”团结一致，该动议显然又会成为一个废案。可“自由党”内部出现了“反吉田派”，他们在对动议开始表决的关键时刻，有意缺席，不参加投票表决，结果在野党提出的动议获得通过，池田被迫辞职。

这次“敲打”的真正的对象是吉田以及他领导的内阁，而不是通产大臣池田，吉田无法撼动，池田最终成为了牺牲品。

吉田内阁中的农林大臣广川弘禅，他与儿玉誉士夫关系密切，而后者掌握着“自由党”的金库。鸠山与广川曾在儿玉家见过面，广川此时对鸠山说，“以前的事实在抱歉”[19]。1953年2月中旬开始，他明确表示要支持鸠山，反对吉田。而广川曾经是最积极支持吉田的策划人，以前积极推吉田，全力倒鸠山。

1953年2月28日，第十五届国会开会，社会党议员西村荣一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向吉田提问，吉田骂该议员“混蛋”。后吉田当场认错并表示收回，西村也做出：既然你收回我也不再追究的姿态。原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没想到这次骂人竟再次成为后来“敲打”吉田的“导火索”。3月2日，鸠山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惩罚首相”动议，3月5日斯大林去世，在野党此后再次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广川派故伎重演，在表决时又再次率领本派议员缺席，结果反对派的动议以192票赞成，163票反对而获得通过。吉田因此将广川的农林大臣职务免去。

在内阁总辞职还是解散国会的选择面前，吉田选择解散众议院。1953年3月

14 日夜，吉田再次解散国会。而这次“解散”虽名为“混蛋解散”，可它并没发生在骂“混蛋”之时，而是在双方已经同意不再追究的半个月之后。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伴随着大量的经费支出，所有国会议员都会在宣布解散之后立刻“失业”，因此，绝不可能因为一句骂人话就轻易解散国会，这次“解散”距上次大举结束刚刚过了五个半月。国际形势将会随着斯大林去世而发生重大变化，这应是引发日本政坛“地震”的真正原因。

“反吉田”的鸠山率领 39 名国会议员退党，组建了“鸠山自由党分党”，鸠山出任总裁。经过大选，他率领离开的 39 名国会议员中，有 35 人重新当选，还有四个人落选了。

在竞选纲领上，鸠山领导的“自由党分党”与另外一个“反吉田派”的“改进党”相近，都提出要“修改宪法，重建军队”。4 月 19 日大选结束后，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只获得了 199 个席位。因在国会内的席位没有过半，下届内阁只能是联合或少数派内阁。国会内就谁出任下届内阁领导进行投票表决，5 月 19 日，吉田、重光、铃木茂三郎(左派社会党)、河上丈太郎(右派社会党)四人参加竞选，结果吉田胜出。“第五届吉田内阁”在同一天诞生，这次是少数派单独内阁。吉田内阁虽然“延命”，但吉田不久将要下台的端倪已经显露，而推翻他的力量并不来自社会党，社会党只有在追随保守势力时才能发挥作用。

7 月“朝鲜停战协议”签署，日本因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也从此终结。

对吉田的再次“敲打”

1954 年 1 月，对吉田的新一轮“敲打”再次开始。日本“保全经济会事件”[20]、“造船贿赂事件”，又一次吸引了外界的目光。1 月 7 日，东京地方检察厅开始搜查，造船工业会会长丹羽周夫(三菱造船社长)、同会副会长土光敏夫(石川岛重工业社长)等 71 人被捕。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涉嫌从造船工业会、船主协会受贿 2500 万日元，政调会长池田勇人涉嫌从海运公司受贿 200 万日元。

在日本投降时，日本的远洋船队几乎丧失殆尽，为了重建日本的远洋船队，战后日本政府对造船企业及海运公司提供补贴。为了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造船以及海运公司向政府主管官员行贿，这是芦田内阁时“昭和电工事件”的翻版。政府贴钱给造船及海运公司，而这些受益企业则从补贴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政治捐款”返还给执政党。4 月 19 日，检察当局决定以“受贿罪”逮捕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政调会长池田勇人、外相冈崎胜男等多人。吉田与副首相绪方竹虎、法务大臣犬养

健一起商讨解决办法。依据“检察厅法”,法务大臣对犯罪搜查有指挥监督权并可指挥检察总长。吉田茂要求法务大臣犬养健行使“法务大臣指挥权”[21],停止逮捕搜查。犬养健后来“奉命行事”,作出“延期逮捕”决定后,他于21日辞去法务大臣职务了事。

佐藤等既没有被逮捕,资金流向也未被深究。这次政治丑闻,最后被判有罪的只有饭野海运公司的一名副社长及运输省官员等共17人。石川岛重工业中的高管及运输省中的一个科长候补自杀。小人物或死或进班房,以他们“剖腹”结束。

对于这次“政治丑闻”,“反吉田”的“鸠山派”一反常态,反应异常“冷静”。以往连吉田骂人、内阁成员回答问题时出言不逊,都可以成为“倒吉田内阁”的“把柄”,可这次暴露出的“权钱交换”的惊天丑闻,无论涉及金额还是牵涉到的高官,远远超过了“昭和电工事件”,以鸠山为首的反对派竟然没有“穷追猛打”。“第二次吉田内阁”稀里糊涂地利用了“昭和电工”这一政治丑闻,将首相芦田均从总理大臣宝座上“敲打”下来,这次收取贿赂的方式、方法与上次完全一样,可结果竟然完全两样。1948年芦田似乎“束手待毙”,交权后被逮捕,可几年之后又被判“无罪”,这次则法务大臣犬养键解救佐藤荣作等人。日本政治就是不想让人看懂。

整个日本都被吉田的“黑金”“强权干预司法”等丑闻所吸引,众人只注意到“行贿”与“受贿”双方,忽视了真正的“用贿”的一方,鸠山派“集体沉默”,让佐藤荣作躲过了逮捕还不算,后来他竟然还当上了首相。池田对于自己受贿后的资金流向是这样说明的:1953年10月,作为吉田首相私人特使访问美国时,作为私人礼物送给了美国主管防务问题的副国务卿罗伯特森。佐藤当时拒绝说明资金去向,他当时沉默;到1957年鸠山露底,据鸠山回忆:误将2000万日元当成佐藤的欠款收下了。[22]

1954年揭露的“丑闻”实际上发生在两年前的1952年;而鸠山在1954年不出来“澄清”,到了下台之后才出来说明。[23]

“反吉田”的人物不断在鸠山周围聚集,6月开始,有人提议鸠山与重光联合。

9月19日,鸠山与重光会面,重光保证:“我愿充当一名小卒为你们效劳。”[24]

1954年9月26日,日本首相吉田茂开始出访加拿大、法国、西德、意大利、梵蒂冈、英国和美国。据他本人介绍,原计划6月出行,但因国会内爆发了“斗殴事件”,故他推迟了出访。在权力斗争如此激烈之时,吉田明知自己“后院起火”,可他仍坚持要出访,而且时间长达两个月,摆出一副你“敲打”我也不怕的姿态。

将吉田敲打出局 //////////

吉田“前脚”出国访问;旨在推翻吉田的“新党”后脚组建。1954年10月初,“新



党”筹备委员会成立，11月15日正式挂牌，“反对派”用它来迎接11月17日返回日本的吉田。11月24日“民主党”成立，鸠山当选总裁，重光为副总裁，干事长是岸信介，组织委员长石桥湛三，政策委员长芦田均。30日召开临时国会。12月6日，“民主党”干事长岸[25]、“左派”社会党书记长和田博雄、“右派”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三派领导人一起提出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案”。吉田强硬表示要再次解散国会，但吉田遭到本党内部的坚决反对，他们要求吉田辞职，不准他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

鸠山组建了“民主党”并当选新党总裁，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成为总理大臣，因为此时的总理大臣是“自由党”总裁吉田茂，必须吉田茂先空出位子，鸠山才有机会上。“自由党”内部开始“造反”，11月22日，也就是“民主党”成立的两天前，吉田给“自由党”总务会长以及党内干部写了一封信，信中并没有明确表示他将辞去总裁职务，仅仅提及他本人并不留恋总理大臣的位子。

总务会长大野将这封信解释为：吉田已经通过这封信函表明将辞去“自由党”总裁职务，吉田准备将总理大臣的宝座让给鸠山。在28日的“自由党”众参两院议员的总会上，大野宣布吉田将在适当的时候“勇退”，“自由党”准备推举绪方为新任总裁。

没想到吉田并没有辞去总裁的想法。对于反对派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吉田准备用立刻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的方式反击。12月6日晚，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内阁会议，副总理绪方竹虎对总理吉田表示：“如果你要强行解散国会，那么我作为内阁成员将不在宣布解散国会的文件上签字。”直到7日早晨，与会者一直在讨论究竟是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还是内阁总辞职或者吉田辞去总裁职务。内阁中的几个大臣主张总辞职，这样多少可以给吉田挽回一点面子，比吉田一个人单独辞去“自由党”总裁而失去总理大臣职务要体面一些，吉田愤然离开了内阁会议室。

与内阁会议同时进行的是“自由党”干部会议，吉田领导的“自由党”的干部们一致反对吉田解散国会。吉田从楼上内阁会议室中退出，来到楼下的党务会议场，他再次强硬地宣称：“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要解散国会。内阁会议已经决定了解散国会。”

自由党总务会长大野伴睦脸色陡变，站起来说：“不可能。我们知道很多内阁成员反对解散国会。内阁短暂，但是党的生命永久。即便是总裁，也绝不允许无视党的纪律。”

这时全体成员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解散国会。吉田不得不退出党务会议室，在走廊上他遇到了松野。松野叫住了正准备上楼的吉田厉声说道：“吉田君，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不是因为有了总裁才有政党，而是因为有了政党才存

在总裁。如果你胆敢挑战党的纪律，即便你是总裁，也可以将你开除出党。”

叼着雪茄的吉田，脸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一言不发地消失在了楼梯的尽头。站立在走廊上的数十名国会议员，将内阁成员从房间里一一叫出，明确告诉他们反对解散国会，如果有谁在解散国会的文件上签名的话，立刻开除出党。除了池田与佐藤之外，其他成员都强烈要求吉田辞职。池田、佐藤因此再去劝吉田总辞职，但仍遭吉田拒绝。看到劝解吉田无效，俩人便再次离开吉田所在的房间，经过简单地商议之后，他俩又再度折回吉田的房间，他们对吉田说：“罢免副总理，解散国会几乎没有可能”。听到这番话，吉田知道他最后的几个忠实干将也已经改变了态度，因此离开了首相办公室。他将辞去总理大臣及总裁的辞呈留在了书桌上，内阁会议在总理大臣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总辞职的决定[26]。

加上“第一次吉田内阁”，吉田茂的在任时间长达7年，这次终于被“敲打”下台。

反对派预计7日提交“不信任案”表决，但吉田在会议开始前已辞职（7日早晨）。9日，鸠山被国会提名为首相，10日组阁。

对于这次“政争”，财界人士的说明揭开了部分谜底。

经团联、经济同友会等财界各团体，不断呼吁保守势力必须联合，严厉批评保守派的内部抗争，财界领导层看到吉田内阁不受欢迎，要求保守势力团结的同时，建议吉田让位，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12月，反对派提出“不信任案”；吉田准备以解散国会对抗，财界长老警告绪方和池田：“如果再解散国会，财界将不再提供政治资金了。”这是吉田放弃政权的直接原因。[27]

---

[1] 1945年4月12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去世，15日小矶交权下台，17日铃木组建新内阁。

[2] 三菱财阀的继承人岩崎弥太郎有四个女儿，大女婿是加藤高明，大正末期的首相，1926年初死在任上。年底大正天皇死去。“大正民主”，也就是政党“架空”天皇，以两个大人物双双退场宣告结束。弥太郎的四女婿是币原，他在战后要恢复“君主立宪”时复出，当上了首相。两人的另一共同特点是：都毕业于东京大学，英语娴熟。

[3] 1951年6月。

[4] 详细见第九章。

[5] 政务调查会长。

[6] 详见第九章，表演的日本政治。

[7] 1964年7月，池田连任第三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开始，池田、佐藤、藤山三人竞选，第一次投票池田就以四票之多过半，成功当选。8月份，他觉得身体不适，结果去医院检查，对外宣布的病名为“癌前期病变症状”。

9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MF总会结束之后，他9月9日立刻住进了癌症中心。10月10日的奥运开幕也是从医院直接去的，奥运闭幕的次日，10月25日，他宣布辞职。他次年8月去世。佐藤上台，池田在医院里写下“某某在做超高难度的C级动作”。（转引自 御厨贵、中村隆英著 姜春洁译《宫泽喜一回忆录》东方出版社第182、185页）。

[8] 美国在1965年开始大规模在越南发动战争，池田说的应该是日本以及佐藤追随美国走上了危险道路。池田的另外一个心腹是大平，而在佐藤时代，大平受到冷落。

据说池田手术后恢复得很好，还常去打高尔夫，但1965年8月突然病危，“亡故的原因是胃穿孔。具体医理药理我也不懂，反正是突然病变，药物穿透了胃部，导致死亡。手术后不到另个星期，病情就急转直下，8月13日当晚，医生们见先生忽然发病去世，顿时大惊失色，医院里简直炸开了锅。

先生忽然辞世，没有留下关于后任的片言只语，于是大家只好猜测推断，自然地，目光都落在了先生生前留下的那张字条上，既‘某某在做超高难度的C级动作’，后来被认为是按时佐藤继承其位的证明。”

池田认为中国只能在日本销售毛笔、砚台，是个除了有地下矿藏外没有工业的穷国、弱国，因此无法对日本构成威胁，他此时强调要与中国堂堂正正地“和平竞争”。他不想给美国更多的钱，用于“围堵”共产主义势力扩散。1964年10月，为庆祝中国国庆，日本组织了跨党派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日本希望通过社会党人之口，要求中国象对战犯那样，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也对日本“宽大”，有代表团成员故意问廖承志是否有“好消息”能够“透露”点给日本，廖承志幽默地回答：不久就会有好消息公布出来的。而日本访问团后来获得的好消息却是：中国首颗原子弹实验成功。日本访问团成员既沮丧又震惊，立刻在北京起草了对中国政府的“抗议”，他们强调自己是原子武器的唯一受害国，因此不能接受中国拥有原子弹。

[9] 日语中对“掩盖”有一个专门的成语，翻译成中文就是“盖上盖子”（ふたをする）。“打开盖子”（ふたをあけてみると）就是“名实不符”。

[10] 详见第九章。

[11] 《鸠山一郎回忆录》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 55页。

[12] 币原内阁时的外相是吉田茂，吉田动用外务省机密费20万日元，给了从缅甸逃亡日本的前伪政权领导人巴莫，巴莫后向英国人自首，美军占领当局曾为此事传讯吉田茂，吉田以自己不知情为由，让下属“剖腹”顶了他的罪。而芦田被捕，既没有人为他顶罪；他本人也没有动用“指挥权”，终止司法介入。

[13] 这次事件被称为“疑狱”。很多事情至今不很清楚。

[14] 对于谁推荐他当大臣，为什么会在国会中有上述行为，泉山三六虽出版了《昏昏噩噩当上了大藏大臣》一书，但并没有交代其中原委，反而以“老虎大臣”出名，后来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15] 他的弟弟是艾伦·杜勒斯（1893—1969），1941年12月起在瑞士活动，曾与日本派往欧洲的“和谈”代表秘密私下接触。1953年至1961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16] 日本希望打，但又不希望大打，因为美国提出万不得已时要让韩国军队进入日本躲避，以日本为

基地反共。日本曾信誓旦旦地要充当“反共桥头堡”，可日本又怕美、苏之间的对立演变为大的战争，将日本变成战场。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越南战争中。

[17] 转引自詹开逊编译《首相宝座争夺战》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13页。

[18] 1953年3月期满。

[19] 1950年3月，吉田领导的“民主自由党”吸收了“民主党”中的联合内阁派，更名为“自由党”。

[20] 指他以前协助吉田将鸠山的自由党总裁位夺走之事。《鸠山一郎回忆录》第135页。

[21] 利用高息吸收存款的特殊金融机构。1949年成立，1953年停业。该会领导人曾向广川弘禅、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提供大量“政治资金”，作为回报，池田等制定了有利于该机构从事经营活动的法律。

[22] 所谓有指挥权，都是日本官僚对法律条文解释出来的内容。讨论是否逮捕佐藤等的司法会议从19日开到20日，21日法务大臣宣布的结果竟然是“不逮捕”，表面上法务大臣事后立刻“引咎辞职”，但结果却是没抓人。

[23] 参见《文艺春秋》1957年4月号，第55—56页。鸠山称：“这笔钱是怎么用掉的，我却一无所知。”

[24] 鸠山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是这样说的：“吉田不愧为吉田，最后竟挥舞那把‘发动指挥权’的大刀，把这股火势一下子扑灭了。我认为这真是胡闹，哪里还有什么三权分立！这样，政党政治只有信誉扫地，可是我没有作声。”《鸠山一郎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148页。

[25] 《鸠山一郎回忆录》第195页。

[26] 岸的弟弟佐藤介绍他加入了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

[27] 参考升味准之辅著《战后政治》（下）东京大学出版会 第431~434页。

[28] 正村公宏著《战后史》（下）筑摩书房 第14页。

第九章 “表演”的日本政治



歌舞伎中的“黑衣”

歌舞伎起源于江户时代初期，是一种极具日本特色的表演艺术。据说1603年，由出云大社的巫女阿国为首的一班女子在京都兴起。内容多是女扮男装表演冶游，此后该类歌舞开始在各地盛行。后幕府认为这类演出有伤风化，改由男子出任演员，1653年起获得幕府的正式认可，从此之后歌舞伎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100年之后的元禄时代，歌舞伎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歌舞伎无论是舞台本身还是表演手法都有其独特的地方。演员出场的通道叫“花道”，它的起点不是舞台的后台而是观众席的后方，演员通过观众席中辟出的通道登上舞台。花道中还有一个升降口，演员有时从这里登场、谢幕。舞台的中央是一个活动的圆形舞台，可以旋转，便于场景的迅速转换。

歌舞伎的内容通常不变，分为“荒事”与“和事”两部分。“荒事”是武生戏，“和事”主要描绘人世间的俗事，通常表现一个窝囊的丈夫。主角通过脸谱、道具（身背长刀）、着装等表示强大与正义。为了表示高大，演员要穿高的木屐，为了遮盖脚下的木屐，还要穿上特制的长裤，丑角则丑陋。红色代表善、美；蓝、黑代表恶与鬼神。每次出现冤罪的时候，代表正义的、名叫镰仓权五郎的武将就出现了。后来又出现了以表现市井生活为内容的“世话物”（现代戏），大多是惩恶扬善的内容。

与许多国家的戏剧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一类人物作为辅助演出的人员总出现



歌舞伎表演

歌舞伎是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艺术,起源于17世纪江户初期,逐渐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剧种。400多年来,与能乐、狂言一起保留至今。在歌舞伎中最重要,同时又最要"视而不见"的要素,是不能"忽视"的角色——"黑衣"。

在舞台上,他们全身着黑衣并且用黑色面罩遮面,"黑衣"(くろご)被称为"后见"[1]。好似脸谱告知一个演员固定扮演某种类型的角色那样,对身穿黑色服装的人员,观众不能视其为演员,必须对他们"视而不见"。黑色代表"不存在"。他们明明在舞台上忙碌,但观众必须忽略他们。他们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比存在还有影响力的存在,一切观众能够看到的,实际上都是被这种"视而不见"的存在摆布、操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衣"变成了灵魂。围绕"黑衣"(くろご)形成了一系列的关联词,有"闇"(やみ)、"裏"(うら)、"演出"(えんしゅつ)等。日本自国家诞生的时刻开始,统治就一直存在操纵与被操纵,无论京都的皇室还是将军,都有被"黑衣"操纵的时候,"黑衣"的操纵与摆布,是演出可以进行下去的关键,"闇"与"黑"是同义词,它们都可以作为接头词,添加在其他词的前面组成一个复合词,表示"黑"某某,当"闇"(或黑)与"将军"组合成为"闇将军"一词时,它是"看不见的最高统治者"之意。

在戏剧的整个进行过程中,"黑衣"是整个大戏中的主角,情节转换等都是因为

他穿插其中。作为观众，要在“看到”的同时，强迫自己“看不到”。戏剧被分为“表演”与“操纵”两个部分，“表面上”的“可歌可泣”“悲壮豪迈”“高潮迭起”与“表面下”的简单、机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场面能够大起大落，千变万化，都是由于“黑衣”动手动脚而已。这是“名”与“实”，“表”与“裏”的分离，任何时候，看着台上的，要思考到背后的。演出者为了吸引人，要想方设法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表演”上，可作为旁观的看客，一定不要忘记后面有人在操纵。日本歌舞伎所具有的特色，实际上就是日本统治者治国手法的再现。政治舞台上总有“黑衣”在背后操纵，作为观众的国民，他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表面上的演出中，明知有“黑衣”在背后操纵，也只能“视而不见”，当它不存在。当今电视、报纸发达，传媒为“黑衣”推波助澜，如果仅仅依靠媒体这一“说明书”去看日本的政治，忽略进行深入的比较观察，那么永远都只是“看热闹”，只有发现了“黑衣”，明白他是如何操纵的，才能看出“门道”。

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集团，日本人笃信“力量”决定一切。对“大”“强”“力量”追求并推崇的同时，还有对“力量”十分恐惧的一面。对“强”者态度好似奉“神”，或保持距离不去招惹它；或主动充当“侍”去“敬”它。“敬神”就是要说好话，定时带上供品供奉；“娱神”就是“演出”给“神”看。“演出”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装可怜”，对冒犯、不敬自责；还有一种是“装神勇”，为了强化集团内部的团结，有时要对“神”侵犯并发泄一下。而这些“表演”的背后，都有“黑衣”在严密控制。

针对美国的表演

1942 年 2 月日本攻占新加坡之后，“亲美”的吉田茂认为，这时是与英美开始和谈的最佳时机[2]。他向近卫建议：“如果与皇室最亲密的近卫公去瑞士，即使是一般的逗留，也会引起欧洲各国的注视。倘若战局对英国不利，一定会有人对公爵做工作；假如德国陷于苦战，也会有人来接近卫公。”[3]

吉田在他的意见书中称：

为完成圣战及国家百年之大计，愿献上拙见。现在正是近卫公为皇室和国家做贡献之机。公应率大使或公使以及三、四名外交官，以视察为名亲赴欧洲。途中，如果各国元首和政治家要求同你会谈，可以会见。经过苏联和轴心国到瑞士之类

的中立国，随处可以找到对任何一个交战国都方便来往的落脚点，暂以超脱之态度观察形势。其间，随行人员应在暗中活动，促使各国政治家与公接触。战局对德国越有利，美英就越会通过公寻求摆脱困境的活路。如果战局不利，德国也会采取同样态度。凭借近卫公过去的资历，美国、德国都会以你为友。我国外交如能善用公这样的人物，就可以使我国在和局中处于主动地位。

公在欧洲数旬，如观察前途无望，可以若无其事地踏上归途。假如还有一线希望，可以从我国文武官员、学者、企业家中选拔一些人才(最好在欧美有朋友的)，开始准备和平条约草案，供帝国政府参考。同时，让这些人担当重任，促使各国同我交往，维护我国利益。一旦世界媾和时机成熟，公可受帝国政府委托，作为全权首席代表率领上述适当人才出席媾和会议，随员可作为全权的幕僚参与具体媾和事务。[4]

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强调“主从”，“主”要自上而下掌控一切，虽然对美宣战，但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显而易见，开战是日本主动，日本还要在和谈上掌握主动权，也就是说，日本想和的时候就和。想和是因为自己力量不支，绝不是其他理由，可自己的弱点绝对不能流露，暴露了自己将失去主动权。

1944 年 6 月开始，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推翻东条内阁的涌动。统治集团内部有人提议让东条等人充当“人柱”，以“牺牲”军人，让英、美将愤怒集中在“狂暴军人”身上的方式，来换取整个开战机器存活。[5] 好似领主下令武士承担责任“剖腹自杀”，武士不得不选择自我“牺牲”那样，武士为换取子孙能够继承武士名位，不沦落为浪人，“从命”自杀。

1944 年 7 月 18 日，东条内阁以“内部意见不统一”为由总辞职。7 月 22 日，陆军大将小矶国昭组阁，米内出任海军大臣。小矶国昭的首要目标是与中国“蒋政权”重启“和谈”。日本曾经设想当英、美攻入日本本土时，将大本营迁往中国或朝鲜继续抵抗。

看到自己提出的、建议近卫出游欧洲的计划被搁置，吉田茂再提议派他去英国领地，直接与英国谈判。吉田茂专门拜访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

小泽事后回忆道：

我在昭和十九年(1944)秋从南方回到东京，秋月[6] 老人曾把我叫到他豪德寺的府第三四次，当时他已年迈体衰，卧床不起，我坐在他枕边听他谈很多往事。明治后老人曾当过外交官，对日、英外交史特别熟悉，他谆谆开导我说：“英国过去就



对日本抱有亲近感，应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工作。战争基本上不是打错了吗？要让小矶下台了，开展一场运动赶他下台。然后让米内当首相。”因为我知道小矶内阁成立的经过，就说：“那不大可能。”他问：“那么谁合适呢？”我回答：“老前辈铃木贯太郎最合适。”[7]

吉田希望军方提供飞机在印度或英属殖民地降落，在那里同英国人开始谈判。因军方答复飞机少无法行动，吉田再要求：“那么出动潜艇，把我们当作货物装上，拉到英国势力圈去。”

军方告知日本潜艇的现状：“我们的潜艇不仅无法攻击敌人，连向南洋群岛输送食品都忙不过来。本来不应说的情况也直说了。”[8]

日本曾计划在战局暂时有利于自己时，与英、美开始谈判，再有就是在日本陷入危机之后。“黑衣”要将“和战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战争看成是自己操纵的歌舞伎，想发动时就发动；想终止时就终止，“为所欲为”是“上”以及“黑衣”的实力体

中途岛战役

偷袭珍珠港成功让“大日本海军”狂喜，可“中途岛海战”却让日本海军瞬间又变回了“小海军”。日本期待能在南太平洋上取得陆战胜利，重现日俄战争中让沙俄舰队长途奔袭、日本拦截战胜的战例，可当这种局面没有出现之时，日本就想对美国进行“表演”，以期“死而不僵”。



现。日本对中国的蒋政权，想打就打，可后来“想和”时，蒋政权并不买账，结果让日本陷入战争泥沼。同样，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这次的对手是英国、美国，日本“想和”，可对方要以彻底打败日本为“和”的前提条件，出于对强者、对受到惩罚的恐惧，日本想以不暴露自己弱点为前提，赶快开始“和谈”。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对英、美作战的短暂胜利，此后战局开始逆转。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战役”中损失了四艘主力航空母舰，随着战斗在太平洋中各个岛屿上展开，日本的补给线越来越长，陆、海军之间常为争夺舰艇、飞机爆发激烈争吵。“传回日本的战报，更多是日军退守的内容，天皇也越来越孤独地呆在宫中。”

到了天皇开始频繁召见各路重臣、表示要倾听他们意见的时候，已是天皇万般无奈、希望通过“下”之口说出日本应该如何面对最坏结局之时。1945年2月近卫被召见。1945年2月14日，近卫进宫谒见天皇并单独向天皇提出了上奏文，希望迅速“实现和平”。

近卫在上奏书中称：

虽然十分遗憾，但是战争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我在此前提下的陈述如下。

战败固然是我国国体之创伤，但英、美舆论直至今日尚无变更我国体之要求。因此我认为：仅战败尚不致影响我国体。从维护国体原则出发，更值得忧虑的是伴随战败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它比战败更可怕。

大部分职业军人出身于中等以下家庭，许多人的境遇让他们更易接受共产主义，而且他们在军队中受到的教育完全集中于国体观念这一点上，共产党人正是利用国体和共产主义可以并存来引诱他们。

现在已经很清楚，当初发动“满洲事变”“中国事变”，最后导致“大东亚战争”，都是军部有预谋的行动。

我认为结束战争的最大障碍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直至今日军部内的那些影响时局的人依然存在。清除这些人并重建军部，才是从共产革命威胁下拯救日本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唯望陛下当机立断。从战争必败无疑这一前提来说，我认为继续进行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完全是上了共产党人的当。为维护国体，我建议应迅速采取措施，早日结束战争。

近卫提出的具体方案是“肃军”。在1949年12月号的《文艺春秋》上，殖田俊吉[9]在题为《日本帕特里奥事件经过》[10]的文章中，介绍了近卫的“肃军计划”。



近卫等人的计划是：天皇下令近卫组阁，当晚举行只有陆军大臣真崎和近卫首相两人出席的就职仪式。他们两人继续留在宫中，按事先拟好的名单，计划将陆军部、总参谋部的首脑们全部解职，编入预备役。不仅搞掉总参谋长、副总长、陆军部的军务局长，而且把他们下边、一直到宪兵司令的一伙人全部编入预备役。

近卫怎么样了？天皇下令组阁，他应当到宫中来啊？迟迟不见人影是因为出了什么事吗？正当人们产生疑虑的时候，全部解职的行动已经完毕，近卫从宫中走出。第二天早上，他指挥近卫团包围已经编入预备役的主要将校军官住处，进行逮捕和抄家，然后对国民公开发表声明，说明为什么要做这样果断的处置，同时对各方面的派遣军将领说明事实真相。“肃军”之后就转入下一步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设想。说起来简直像是说梦话。[11]

演给苏联看的戏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此后松冈曾威胁苏联“三国同盟在日苏中立条约之上”，后日本“南进”而没有“北犯”。1945 年 4 月 5 日小矶下台；4 月 7 日铃木上台。米内继续出任海军大臣。就在小矶下台的当日，4 月 5 日苏联向日本宣告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12]

1945 年 4 月 7 日铃木内阁成立后，铃木要求东乡外交大臣设法开始向苏联求和，新任外相东乡立刻召见苏联驻日本大使马力克，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称：“全世界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唯独日苏之间和平，是阴云下的唯一一片蓝天。”[13]

近卫想模仿意大利的帕特里奥将军，在日本上演一场日本版的“帕特里奥歌舞伎”，让军部充当替罪羊。可这出大戏最终没有演成。铃木内阁一边在冲绳与美国决战，一边加快了借助苏联“谋和”的步伐。陆军参谋总长梅津还专门登门造访松冈洋佑，后者在 1941 年 4 月因签署《日苏中立条约》曾与斯大林有一面之交。可梅津多次上门劝说都被松冈以“败战无外交”为由拒绝。“败战”这个字眼对梅津刺激很大。他们再回头找广田，广田在 1932 年曾出任过驻苏大使，但同样遭到广田的严词拒绝，广田只同意与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在日本会谈。

日本计划向苏联的献上的“大礼”是：日本从苏联购买石油、飞机，同时向苏联提供驱逐舰。



根据天皇侍从长藤田尚德海军大将的回忆[14]:“2月9日,广田向天皇建议要重视与日本没有开战的苏联。”

就在日本谋求利用苏联居中调停的时候,2月4日开始,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也在思考日本人同样的问题——尽快结束战争。

1943年11月22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聚会,26日发表“开罗宣言”。此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再在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同意:苏联将在德国投降后对日宣战。日本并不知道几个大国决心联合起来,彻底打败好战的武士。在1945年2月4日到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国将以前决定了的内容更加具体化。

三国商定:在德国投降后的两到三个月内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希望在日本投降后获得库页岛南半部分及千岛群岛,租借旅顺,优先使用国际化的大连港,中苏合办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广田2月9日上奏,“雅尔塔协定”10日签订。在对外关系上,日本任何时候都像围棋中的对奕那样,采取行动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明明是日本已无力再继续战争了,可日本找苏联的理由居然是:“为德苏居中调停”。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将上述内容转达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后者听得目瞪口呆,良久之后才缓过神来,他明确表示苏联没有与希特勒和解的想法。佐藤再称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还有日苏间的问题需要解决。

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登陆,1945年4月5日,也就是冲绳战役开始后的第四天,苏联宣告废除《日苏中立条约》,两天后的4月7日铃木新内阁成立。此时日本已非常清楚德国气数已尽,在4月22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商议并决定了德国投降后日本应采取的方针策略。

由于日本无法找到与美国和谈的机会,冲绳上演了一场“玉碎”大戏,日本宣称誓与美国军队血拼到最后一个人。对英、美的表演是组建“国民义勇队”,准备“本土决战”;而六巨头的私下决定却是“采取果断措施收拾战局”。好似“耻”与“无耻”是一张纸的两面那样,给他人看一面时就挡住了另外一面。在日本领导人看来,“决战”与“收拾战局”只是修辞的问题,后者属“绝密行动”,依然是日本主导。

4月30日,柏林被联军攻陷,德国法西斯彻底失败。日本这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切地希望抓上一根救命稻草。第二次近卫内阁中的外相有田八郎在其回忆录《人眼看实世》的序写道:“战争爆发后,99999999人可以专心于从事战争,剩下的100或50人就必须考虑有关结束战争的问题。”[15]

日本统治者将日本人分为“上”与“下”两个部分,“上”是头;“下”是身体。身体永远不知道头在想什么,只是机械地服从大脑发出的指令。统治者将治国变成

演“歌舞伎”，统治者是“黑衣”，日本国民成为了演员，统治者要让国民在自己控制下“蠢动”。

东乡认为：“大家通常考虑让梵帝冈教皇、瑞士、瑞典等中立国家居中调停，这些看似不错，但实际上不可行。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小国，不具备左右国际局势的力量，没有改变大势的威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不同，日本必须抓住一个强有力的、在国际上有很大发言权的大国。在这种前提下，苏联就是最好的选择。”[16]

东乡曾出任过驻苏大使，选择苏联居间调停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近期与日本和平相处的大国也只剩苏联这一个国家了。自 1939 年苏联红军在外蒙大败日本关东军以来，日本与苏联之间没有再交战过。

东乡在名为《时代的一面》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将给予苏联的让步明确下来，会议决定“将要点写成文书，然后要求出席人员一起签字。”

日本方面开出的礼单，也是日本诱惑苏联居中调停的代价。

（1）归还南库页岛；（2）取消渔业权；（3）开放轻津海峡；（4）确认苏联在外蒙古的势力范围；（5）转让北满的铁路权利；（6）出让大连、旅顺的租借权。根据具体情况，不得已时割让千岛群岛北部。

这些内容仅是日本愿退回到“日俄战争”前的状况。日本此时仍做着今后继续支配中国东北的美梦，因此只将北满铁路权利及大连、旅顺租借权作为“代价”转让给苏联。5月11、12、13日连续三天的六巨头会议结束后，东乡外相立刻拜访了广田，要广田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开始接触。

日本采用的惯用手段是，用“漫不经心”掩盖“别有用心”。二战爆发后，日本与苏联分别埋头于与各自对手的交战中，相互间一直保持距离，没有什么来往，现在日本突然决定要接近苏联，日本方面自作聪明地要将一切“伪装得很巧妙”。

“日本政府对广田的行动指令，至今还保留在广田的家中。”[17]

（1）鉴于目前战局紧迫，帝国不仅要极力防止苏联参战，而且要主动谋求苏联的善意中立。为此与苏联驻日大使之间开始对话，探询苏联政府意向，把苏联引入前面制定的轨道。除了我们已经制定的目标外，有关结束大东亚战争事宜，也要求对方斡旋，以期于我方有利。避免由我方提出要求，对方提出要求时要给予答复。

（2）可以告知对方，这次谈判是在政府委托下进行的。

（3）让对方明白，迄今为止苏联之所以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同时还要让对方认识到，战后苏联将与英、美处于对抗状态。那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

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苏联红军将于欧战结束后三个月内出兵中国东北，将驻扎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彻底“送回”岛国。日本这个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员，竟然在德、意法西斯“伙伴”被彻底摧毁之后，仍然一相情愿地幻想斯大林会被他们的“表演”迷惑，事实证明，“离间策”只能加速日本的毁灭。

时，保持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当地位对苏联有利。还需要提醒，今后日、苏、中三国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英、美。

(4) 至于代价，尽量不要提出，非要提出不可时可以暗示。[18]

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从阻止德国军队进攻到反攻、直到攻克柏林，这一切都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苏联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以及联合国的协助，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即便日、苏之间没有《中立条约》，日、德联合进攻苏联使其腹背受敌，日、德灭亡苏联也只是一种假设。假如日本关东军从中国东北进攻苏联西伯利亚，可能面临苏、德讲和或美国、中国联合攻击日本，让日本面临前后两条战线的危局。苏联在海参崴布置了远程战略轰炸机，日本怕一旦对苏联宣战，整个日本都在苏联轰炸机的航程范围内。日本过高估计了德国可以单独战胜苏联，因此才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日本决定“南进”，也并非是想“放苏联一马”的一时心血来



潮，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割让了中国台湾后，日本一直想以台湾为跳板，扩张进入东南亚，东南亚是日本垂涎了50年的地方。

1945年6月3日，广田弘毅首次与苏联驻日大使接触。为了将这次会面变成一个"偶然的巧合"，日本方面开动了所有国家机器，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充分的布置。

因东京多次遭受美军空袭，广田弘毅在东京的住宅也被焚毁，为躲避空袭他已搬家，日本警察找他还颇费了些精力。各国驻东京的大使馆此时也已搬迁，部分人员已迁移到东京以外的地方，苏联驻日本使馆的部分人员迁到了日本的温泉疗养地箱根。

苏联大使马立克住在箱根的"强罗饭店"，日本"星制药"公司总经理的别墅与"强罗饭店"一墙之隔，为了让广田能够"偶然巧遇"马立克，日本方面安排广田搬到该别墅内避难。

6月3日，搬入该别墅的广田假装晚饭后散步，突然造访了马立克大使，接着立刻发出邀请，要马立克次日、也就是6月4日，到他的别墅中吃晚饭"叙旧"。

晚宴上，广田严格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口径，大打与苏联大使马立克的"旧友之谊"牌。

广田说："这次战争，日、苏之间没有大动干戈实在是万幸。尽管苏联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仍取得最终胜利，为苏联而高兴。我国希望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下维护亚洲安全。苏联有很大一部分领土在亚洲，我认为苏联是保证亚洲安全的基础。"

日本政府指示广田："避免由我方提出要求，不能暴露日本真实意图。"广田因此尽可能将话题往日本希望的方向引，他说："苏联在欧洲收复失地，有所作为，在亚洲也同样应该有所作为。日、苏两国之间目前都遵守《中立条约》，没有必要担心什么。但条约将在一年之后期满，有必要对今后有所考虑和安排。日本方面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对此的大体意向。"

马立克回答说："希望听听日本对有关日、苏、中三国今后关系的具体方案和想法。"

广田则称："日、中之间现正处于战争状态，目前很难就有关中国问题明确说些什么。至少在日、苏之间，可以进一步增进本来已经存在的友好关系，把中国作为今后的考虑对象，逐步将中国吸引进来。日本政府希望与苏联之间缔结新条约，希望苏联方面尽快开始着手准备。"

马立克回答回去研究并通报政府。面对美军日益激烈的空袭，日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迫不及待地要获得苏联方面的回复。6月17日，广田再送晚餐请帖，

希望通过吃饭了解苏方是否考虑过日本的建议，但这次邀请被马立克拒绝了。

四年前的日、美谈判是为了掩盖日本“偷袭珍珠港”；而这次开始的“日苏谈判”，此时日本已经是被痛打对象，日本的“表演”的内容竟然是“日本今后将追随苏联，成为日后苏联在亚洲的宪兵”。

马立克在多次拒绝后，最终同意6月24日再次与广田见一面。但马立克称要日本提出更具体的方案。

广田称：“如果日本海军与苏联陆军联合起来的话，那将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日本希望从苏联获得石油，作为交换，日本提供橡胶、铅、锡、钨等南方战略物资。只是运输要苏联方面自己负责。”[19]

当时的日本海军已经丧失了运输能力，退缩回日本本土还不算，甚至连保护自己海岸线的船只都不够。此前日本军部人员曾主动与苏联驻日本使馆武官接触，当时日本军人提出，“用日本军舰从苏联换取战略物资”，广田则改变了“交换内容”，要用日本掌握的“南方物资”交换“石油”，以此表明日本的大舰队只是石油不够，因此无法阻止美军的海上进攻。日本向苏联“乞降”时，国内已经无法组织有效的生产，已经不单纯是缺油少弹药的问题，日本整个天空都向美国飞机敞开，美军轰炸机好似在日本上空值班，悠然而来，倾泄下装载的炸弹后，轻松离去，马力克亲眼目睹了日本的惨状，可日本竟然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进入7月之后，日本更加焦急，计划让近卫作为天皇特使直飞苏联，与斯大林直接谈判。7月12日天皇召见近卫，要他亲自前往苏联并向日本驻苏联大使发去加急电报，要佐藤大使通知苏联方面，准备接待随时准备起程出发的近卫。

五个月前（2月），近卫曾上奏天皇，要将战争责任推给军部，以“军部内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军官发动战争”作为“肃军”理由，用发动政变、自己清除一部分军人当替死鬼的方法，换取与英、美和谈。看到与英、美谈判无望，日本立刻转换对手及手段，这次要与“煽动军人发动战争”的共产国家元首斯大林坐在一起谈判。日本打遍了所有国家后开始找人“和谈”，此时为“和平”要与苏联携手；可对美投降后又立刻变成“美国反苏的桥头堡”。操纵的演员的“黑衣”没变，可“演出”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上半场是“亲英、美”；“下半场”是“亲苏联”“反英、美”。唯一相同在都是“利他”行为上，日本武士向领主强调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时，会说：“失去了我的保护，你将没有了安全。”同样道理，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这时一定要找一个“利他”的理由。

7月14日早，斯大林等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波茨坦，出席17日在那里举行的“波茨坦会议”，几大巨头讨论的内容是如何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可日本此时竟然



还做着“日本玩转所有国家”的美梦，计划派近卫携带天皇书信乞降。

苏联不想让日本知道三巨头在波茨坦开会，因此故意敷衍日本，要求日本说明派遣近卫来莫斯科的理由。日本不提“乞降”，强调为了“和平”。斯大林将日本“乞降”的“表演”转达给了杜鲁门和丘吉尔，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不要理睬日本”。要用更加严厉的惩罚回答日本。

战后保守势力上演的好戏

配合盟军“民主”进程的表演 //////////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乘飞机抵达日本厚木空军基地，9月10日发表了盟国对日管理方针。日本国内好似回应他的呼吁一样，社会党9月22日，自由党10月7日，突然间开始筹备政党。社会党11月2日，自由党11月9日，进步党11月16日，日本协同党12月18日，一夜之间，日本国内的政党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自由党事后表明自己的组党经费来自右翼分子；而社会党一直没有说明建党经费来自何处。

战后的日本，众多国民首先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如何活下去；而统治阶级思考的紧要问题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最担心自己被推翻，日本出现代表民众利益的新政府。

日本的政治家又叫“代议士”，代替他人议论政治的人士之意。谁给他们钱，他们就为谁说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来说，找钱解决衣食问题，比花钱找能够代表、维护自己利益的政治家更紧迫。并非他们不希望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出现，只是他们将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打败军国主义政府的美国占领军身上。美军推行的战后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摧毁日本的战争机器，解散财阀。资产阶级因此千方百计地要与美国对抗、抵制。资本家要出钱寻求代理人，同时他们也最愿意并最能出得起大钱。1974年8月2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日本经济联合会长樱田武的谈话：“财界为了使盟军停止其占领政策中所计划的对日本进行分割占领，中止对经济界的清洗，决定援助有外交才能的政治家”。

战后物资极为短缺，保守势力有时甚至故意制造恐慌，乘机大发其财，他们通

过“放出”手中控制的物资获得钱财，然后再将这些钱投放在为自己利益发言的“代议士”身上。

美军进驻日本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此悄然开始。按理说战争结束，围绕战争而进行的生产以及政府为此进行的支出，理论上也已应该终止了。可东久迩政府却对以前采购，而实际上已经停止生产的、没有供货的军需品继续付账。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战前政府下了订单，后因日本宣布投降而不再继续生产的，东久迩政府以给资本家企业造成了损失为由，对这一部分也给予补偿。东久迩内阁、币原内阁的最主要经济工作之一，就是通过上述方式，将国库中剩余的最后一些财产转到资本家的钱袋中。

到战争结束时的 1945 年 8 月止，政府的军费支出:陆军 55.53 亿，海军 19.71 亿，相关的军需支出 22.1 亿，合计 93.34 亿。接着的 9 月份，陆军 16.2 亿，海军 29.19 亿，军需 0.4 亿。合计 45.61 亿。在这两个月期间，突然支付了 142.95 亿。[20]1945 年的年度支出预算为 244 亿，可仅仅在投降期间的这两个月期间，支付给已经结束了的战争的“军费支出”竟然高达 100 多亿。1945 年 8 月到 9 月间，日本银行中的存款余额突然比上个月增加了 7%-8%，由此可见，储蓄增加与政府大规模支付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些突然增加的存款绝无可能来自贫困的社会底层，只可能来自有钱的资本家。

政府找出种种理由要将国家财富转移给资本家；而这些钱后来再被用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战前积极参加战争、希望通过战争发小财的前军人，一般劳动者以及深受日本战争之害的国家，日本政府总以“战败没钱”来耍赖；可对转移财富给资本家，让发战争财的资本家最后还能大捞一票，日本的保守政府却决不含糊。

1945 年 11 月 24 日，GHQ 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关于杜绝战争牟利以及重建国家财政的备忘录”，至此，日本政府将大量国库资金转移给资本家的活动才终止。也就是说，如果不是 GHQ 发现了问题并及时叫停，保守政府还会继续用这种方式，将国库中的财富转移到光为止。政府的理由是:救济资本家才可以保证工人有收入。

政府将大量资产转移给资本家，同时发行高额国债，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币原内阁中的藏相津岛对此是这样说明的:“当前物价高涨的最大原因是工资过高，随着复员以及今后劳动力供给增加，过高的工资将会回落到合理位置”。政府反觉得给劳动者太多了。正如日本的一个词所表示的那样，民众获得的，仅仅是资本家手指缝中“漏掉的一部分”（おちこぼれ），从明治时代至今，日本“权钱交换”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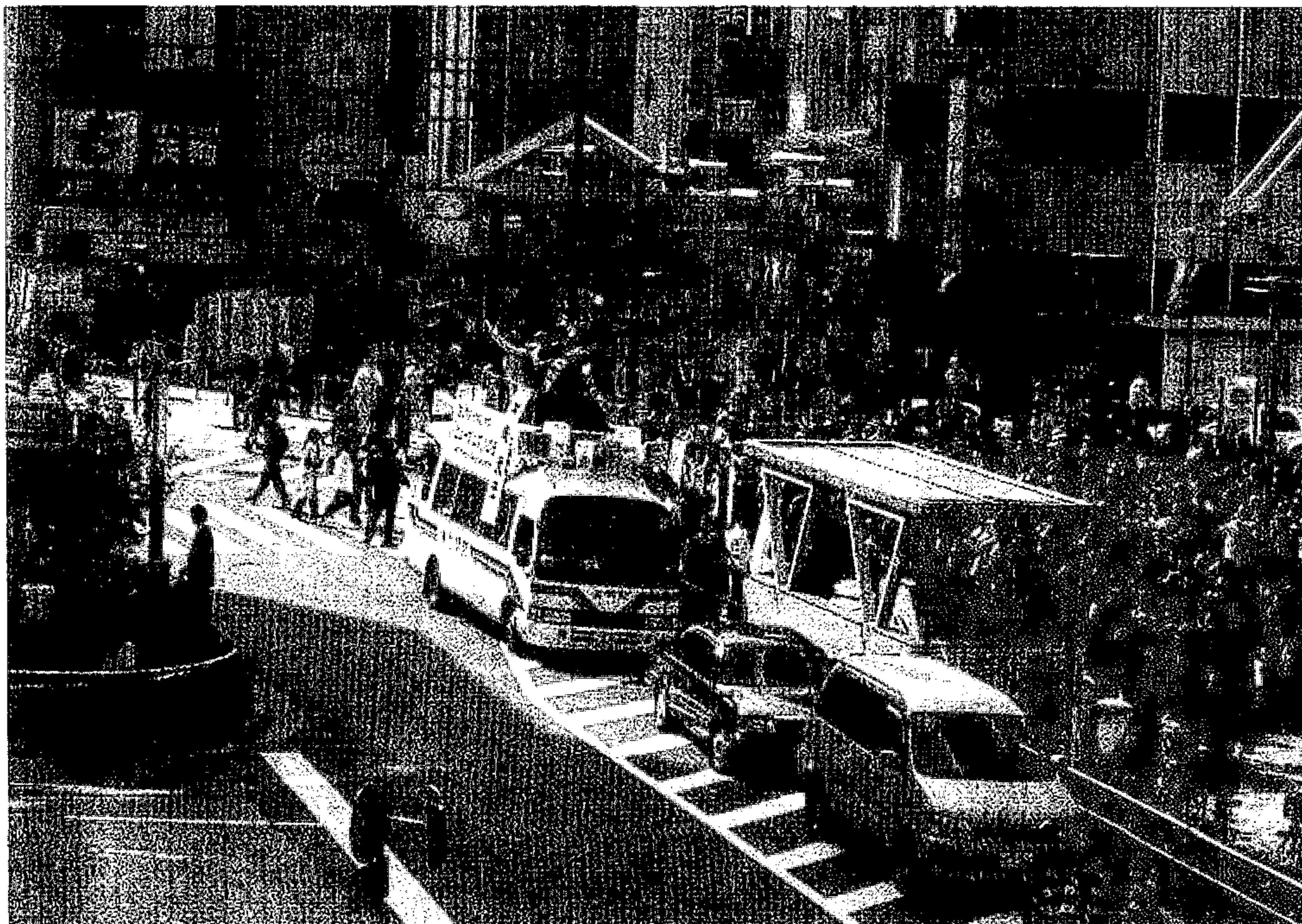


组建政党的演出 //////////

鸠山筹备建政党时，自掏腰包拿出 300 元(相当于三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干事长河野一郎将筹集资金的问题托付给了政友会的后台老板辻嘉六。辻嘉六把曾经是右翼分子的儿玉誉士夫介绍给了鸠山。战争期间，儿玉受日本大本营参谋部指使，在中国上海成立儿玉机关，大肆发行日本军票，疯狂掠夺战略物资。为进行战争储备，他将掠夺到的物资运回日本，据说金条以及其他贵重金属都是用飞机空运回了日本。据儿玉事后披露，他原想将这份资产退给辞职前的海相米内光政，但是米内对他说："接受这份资产的日本海军已经不存在了，可以将它们用在对国家有益的事业上。"[21] 儿玉将这份资产的一部分拿出来，以"无论受到什么压力也要绝对捍卫天皇制"为条件，交给了鸠山。战后儿玉可以成为保守党的"黑将军"，完全是因为他掌控着保守党的血液——大量的政治资金。为了"本土决战"，

日本街头竞选一景

日本的多党政治，只是将"戏剧"从赤坂的"料亭"里搬到了人流容易聚集的车站前广场上，拉票选举是"利益环流"，你投票选我，我当选后"返还"给你部分利益，至于如何获得利益，政治家从利益蛋糕中切走了多少，没有政治家会将"真实"告诉选民，"有权者"仅仅是"'有'投票权"。



投降前日本进行了大量的战争物资储备，这些储备高达上百亿日元，而这些财富后来成为了保守政治的血液。

据说三木武吉从儿玉那里拿到大笔捐款后满不在乎地说："要是我们不将这样的钱花掉，钱都会难过流泪的。"

币原内阁时，"进步党"是国会中的最大政党[22]，该党成员多是战前的国会议员，他们的政治纲领是："反共，拥护天皇制，民本主义。"

"进步党"成立于1945年11月16日，该党的基干是"大日本政治会"，而"大日本政治会"组建于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3月30日，它的前身是军国主义政府组织的、臭名昭著的"翼赞政治会"。"大日本政治会"在美军进驻东京后的1945年9月14日解散。积极推动战争的近卫，也曾是该党总裁的候选人之一，后由83岁高龄的町田忠治（1863-1946）出任总裁，后者曾担任过立宪民政党总裁，在小矶内阁中出任过国务大臣。

町田的亲信大麻唯男要求田中角荣拿钱，田中与保守政治也从此结缘。他与儿玉后来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也是因为各自起点之不同。儿玉成为了保守政党背后的"黑金提供者"；田中则成为了前台的"政治家"，并于1972年出任首相。田中角荣日后被称做"平民宰相"，这仅仅是对他没有大学学历而言，假如没有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以及日本战败投降，也不可能会让田中的"变大"梦想成真。1937年他19岁时，开始有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1940年入伍，一年后的1941年就退伍了。在日本的对外战争最需要人手之时，唯独田中能够退伍并继续从事他的建筑业，可见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以及与军部的不同寻常关系。入伍前承包军部工程，退伍后承接更多的军部工程。1943年，他的业绩已经进入日本前50家建筑承包商之列。[23] 田中在战争期间究竟承包了哪些具体工程？是否战后也从东久迩政府那里获得过"建筑工程款"？这些都不清楚。

战后军部没了，可与军部紧密勾结的保守势力依然存在，保守分子要求田中出钱，田中立刻就拿了出来。1945年11月，大麻向田中求援道："选举已经迫在眉睫，我曾说过，谁先筹备300万元谁就当总裁，望你给予协助。"据说田中捐款100万。由于战争中很多房屋被毁，战后日本出现了建筑高潮，田中一边挣大钱，一边捐款从政。

1947年初的首次大选前，GHQ发布了首次清洗名录，"进步党"中的274名国会议员，有260名都在清洗名单中"榜上有名"，仅剩14名国会议员，大选之后又有两名落选，加上选举后被清洗的两名，这个党初创时的议员仅剩10名。选举结束后，币原出任该党总裁。

"代议士"只给为自己出钱的人"代议"政治，他们是靠"议政"吃饭的"职业政



客”。“拿别人的手短”，日本也不例外，从资本家那里拿钱从政，就必须为资本家说话。依靠这样的政治家清算战争责任，铲除资本家势力只能是空想。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只能依赖外力的美国占领军，可美军的行动又受到双重条件的制约。一是保守势力顽强抵抗；二是后来冷战开始，美国的占领政策开始转变，美国的外力放缓让保守党死灰复燃。

《战后日本保守党史》的作者富森睿儿指出：“保守党未能从战前的体质中脱胎换骨，割不断它曾协助过战争的历史。”[24]

三个保守政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某一时期却都有过一段为战争效劳的历史。日本战败后，要想从根本上脱胎换骨获得新生，这些人是没有资格担任政党领导人的。保守党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清洗其领导人。”

参加社会党成立筹备会议者，多是战前积极协助并参与日本对外扩张侵略战争的前国会议员。“会议一开始，浅沼稻次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提出了‘维护国体’的主张；会议最后则在贺川丰彦的带领下，齐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在开会期间，出席者之一的小崛甚二突然站起来大声疾呼：‘这里有战犯，他们在战争期间不遗余力地协助当局推进战争，充当军部的走卒，和这种人一起怎么能建成社会主义政党？’于是，座谈会顿时乱作一团。后来，西尾末广等人出来调解说：‘小崛先生的意见颇有道理，我们决不让这些人参加党的核心组织，请放心便是’。这场风波这才算得以平息。”[25]

“社会党”中既有战前积极参与“大政翼赞会”“产业报国会”的人物，还有因为反对战争、依据“治安维持法”被关押的人物，不同经历，不同信仰，这些人的组合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测到未来。

著者继续回忆称：“座谈会上发生的这个小故事却生动地反映了即将成立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情况。这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犹如一家有好多个门可以随意进出的百货店一样，它包括各种各样的人，从战犯、维护国体论者等右派分子，直到一部分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左派人士，他们想成立一个除了日本共产党以外的战前无产阶级政党各派的联合组织，而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则掌握在西尾末广、松冈驹吉等战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手中。”

新党的奋斗目标是：“既和左面的日本共产党，又和右面的鸠山一郎等人的保守党划清界限，这个党将团结这两者之间的全部中间派人士。”

无论是社会党人还是保守的自由党，共同的特点就是将战争责任完全推给军部。在他们看来，军部法西斯、军部中的“革新分子”是“极右”势力；共产党是“极左”的极端分子，只有自己是稳健的“中道政治”。将自己在战争中积极参与的事实

完全抹杀，他们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

1945年10月10日，根据GHQ的指示，日本政府释放了关押在监狱中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出狱后开始重建共产党。12月1日召开了党代会，这是自1922年建党以来的第四次党代会。战争前，共产党公然反对天皇制、私有财产，他们的目标是用暴力推翻现有的、建立在剥削制度之上的资产阶级政府，因此受到了严厉镇压。1935年之后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出现了10年的空白期。第四次党代会是作为合法政党的首次大会，共产党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要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遵守“波茨坦宣言”，在日本推行民主主义的和平政策。此外还提出要改善劳动条件，确立社会保障体系，废除土地私有制。他们批判了战前的工会，认为一部分工会干部充当了军国主义政府的帮凶，为对外侵略战争服务。

1946年1月12日，在延安的野坂参三回到了日本。2月，日本共产党召开了有野坂参加的第五次党代会，对天皇制以及私有制，决议都比以前的纲领有所退步。战前，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都被关入监狱，日本经历了战败之后，民众才对共产党以及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共产党主张保护民众利益，在贫困以及随时受到失业威胁的当时，共产党受到普遍欢迎。

凡事必须在所有准备进行好之后，这是日本人的习惯。战后的“新政党”成立高潮刚结束，币原内阁中的厚生大臣芦田就提议要举行大选，组建“新党”是为了成立“新政府”。

保守势力组建政党，让人联想起太平洋战争前日本政府倡议组建“产业报国会”，当时的积极推动者是内务省与警察。日本政府一方面对工人运动严厉镇压，要破坏掉所有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另一方面，要自己主导，建立由资本家收买的工贼领导的工人组合。1938年7月，由前“产业报国联盟”为主体，政府推动所有有1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组建“产业报国会”，1940年9月底，有46000多家的企业，418万工人被组织了起来。1940年11月，组建了“大日本报国会”。在破坏工人运动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组织，只是为了今后日本在发动战争期间，自己后院不要起火。工人不要起来推翻政府，而是要“举国一致”为战争服务。对外扩张侵略虽然实现了“全民就业”，可大发其财的是资本家。

新组建的日本社会党中的许多成员，以前就是“产业报国会”中的“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一切都与战争前是同一个模式：资本家在背后出钱，然后开始“建党”活动，多个政党仅仅是“表演”而已。



第一次吉田内阁上演的好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吉田内阁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内阁。从币原1946年4月22日总辞职到5月22日吉田内阁成立为止，无政府状态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战后的首次大选结束后，1946年5月1日，自1935年以来就中止了的劳动节集会再次复活，据说当日在东京皇宫广场上集会的民众多达5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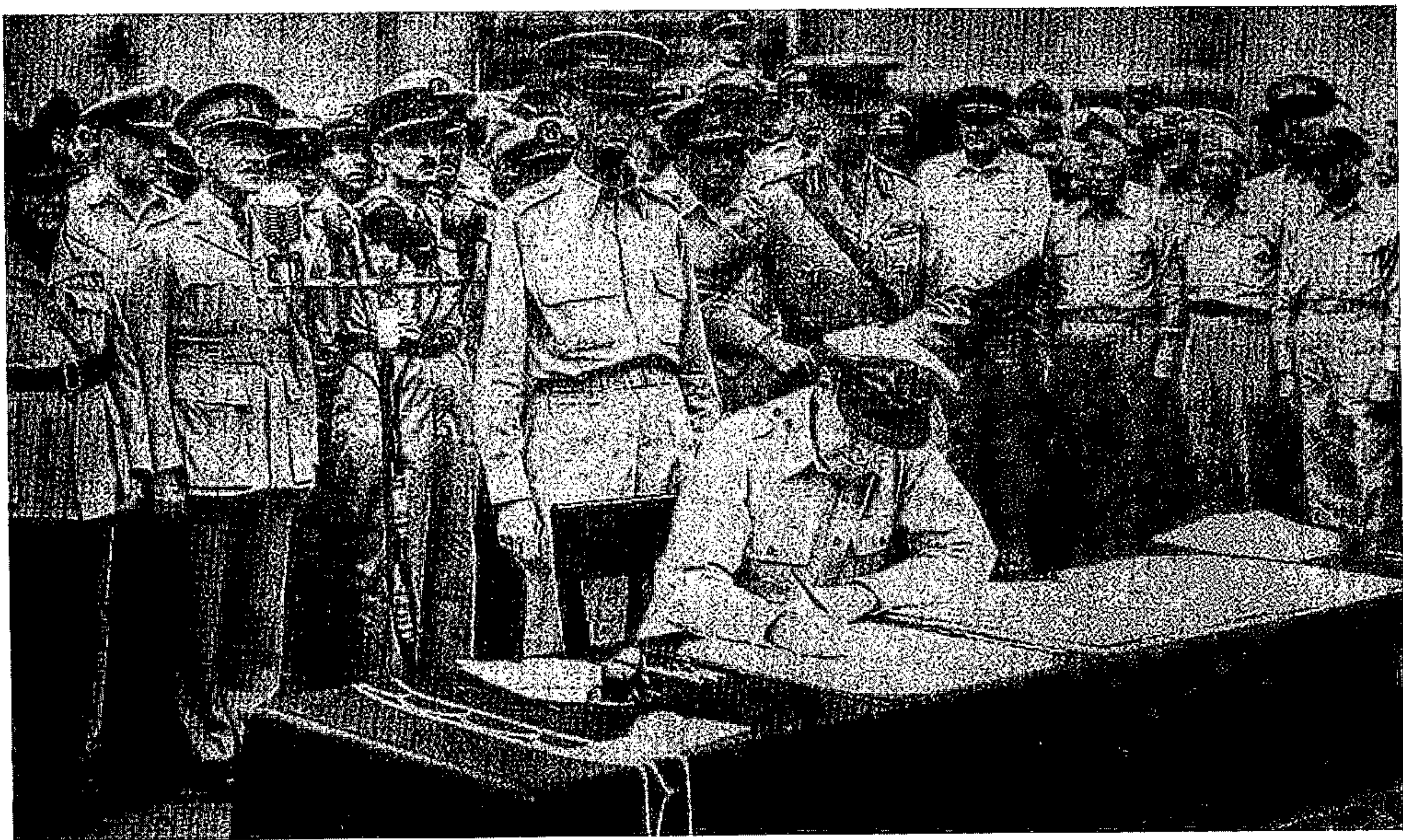
4月30日鸠山准备组阁，5月3日美军宣布鸠山属于清洗对象，他瞬间失去了出任首相的资格，接任者是吉田茂。

日本有句成语，“海里修炼一千年，山中修炼一千年”，这是说一个龙王，在海底修炼一千年之后，再次进入山中修炼，经过两千年的海陆修炼，他成为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统治者。吉田茂将自己在大矶的别墅命名为“山海楼”，其用意不言自明。

5月12日，东京世田谷区的区民大会代表十多人进入皇宫，要求查看是否有大米藏匿。5月19日，曾参加“五一大游行”的各方代表又在皇宫广场集会，要求保障大米供应，据说有25万人参加，代表们分头前往首相官邸、皇宫。当时日本大都

代表盟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用了六支“派克钢笔”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下自己名字，美国在世界最强的地位，决定了麦克阿瑟以及他身后的美国成为了日本人死抱的大腿。麦克阿瑟要彻底改造日本的高迈理想，事后被日本人说成是“结结实实地利用了一次美国人的虚荣心”。



市内的大米供应，平均每个市民每天的配给只有297克，而且还经常被人为拖欠，代表们前往官邸静坐并要求会见准备组阁的吉田。吉田在5月16日从天皇那里获得了组阁的命令，[26]此后他搬入首相官邸准备组阁，游行示威代表们到他的官邸请愿。游行、红旗，不但让保守派异常恐惧，同时也引起了GHQ的高度关注。5月20日麦克阿瑟发表声明："最近日本民众的行为，是在某些组织领导下的大众暴力，并且有逐渐向暴力恐吓行动发展的倾向。这对日本未来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同时警告说："必要时占领军将采取行动。"在这之后，首相官邸中静坐的示威人群散去，原计划的新的示威活动也都相继中止了。

麦克阿瑟对外发表了干预声明的同时，对一直没有组成并处于瘫痪状态的日本政府表示："只要我当最高司令官，就不会让一个日本国民饿死。"[27]

有了麦克阿瑟的保证，吉田内阁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对于擅长阴谋的吉田来说，高举红旗游行的示威群众和在一边焦急关注的美军，变成了双方都需要他的绝好机会。麦克阿瑟发表声明的两天之后，吉田内阁于5月22日成立。

5月24日，昭和天皇在中午、晚上7时、9时，共三次通过NHK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这是继8月15日投降讲话以来的第二次。

"国家重建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国民生活，尤其是保证粮食供应。在大城市，粮食空前短缺，这让我非常痛心。希望全体国民共患难，发扬互助精神，克服眼前的暂时困难。此时此刻，希望国民继承我们家族国家的优良传统，超越各自的利害，面对难局，在重建国家的道路上前进。"

天皇讲话与战前对外宣战时同样，依然号召要"举国一致"，日本统治者将日本看成是"家族国家"；天皇则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家长"。

在吉田看来，"红旗"与"美国粮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红旗再在日本上空继续飘扬一个月，美国的粮食必将更快运到。"

吉田的外甥武见太郎，一直在幕后积极参与第一次吉田内阁的组阁活动，事后他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听到吉田这样讲，我才第一次看到什么是外交。"[28]

在获得了美国的粮食保证之后，吉田内阁终于成立了，可事后美国人发现，日本政府有意夸大了日本存在的粮食危机。麦克阿瑟因此严厉批评吉田政府统计不够准确以及恶意编造。对此，吉田茂在他的《十年回忆》第一卷中以《勉强渡过粮食危机》为题，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盟军总部方面认为，日本统计数字荒唐无稽，因此大加责难。事实上，也许由于农林大臣低估了农民的交售量，以便让占领军多配给粮食，才提出了450万吨这一数字。自从战争发动以来，我国政府动辄有意无意地片面发表对自己有利的数字，这已经成了习惯。有一次连麦克阿瑟元帅也指责：

‘日本的统计数字毫无根据’。于是我回答说：‘如果战前日本的统计完备，也许不会那么轻率地发动战争，即便发动了，也会迅速投降’。说罢一笑了之。”[29] 农林省1946年1月宣布：“上一年的粮食生产总量为1905年以来最低，整个国家需要7500万石，而实际收获只有3916万石，存在巨大缺口。”

说日本不擅长统计是错话，日本自战国时代开始就将统计视为保家卫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大名要统计粮食及人口，这些是进攻与防守的基础。在物资稀缺的日本，不但统计重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手中控制的物资来实施统治，要推动及鼓励某个事项时，就将财、物投入；反之要阻止以及扼杀时，就收紧口袋，阻止财、物的流入。

日本军部就藏匿了很多粮食，保守政府将粮食作为控制国民言行的手段。

吉田政府利用红旗从美国占领军处获得了粮食之后，日本国内再次掀起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浪潮。

第二次吉田内阁的表演 //////////

1947年新宪法颁布后，日本出现了首届社会党人组建的片山内阁，因保守势力在背后捣乱，该内阁仅生存了九个月，接任者是芦田均，他领导的内阁也同样被保守分子推翻。片山属无奈交权；芦田则被“贪污丑闻”推翻。两者都没有行使解散国会、重新大选的权力。

1948年10月14日，国会提名吉田组阁，保守分子再次掌权。经过1949年1月的大选，吉田领导的“民主自由党”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获得了国会中的264个议席，一党过半。共产党从4席跃升为35席，“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协同党”惨败。片山前首相以及许多原任或前任内阁的成员都落了选。保守分子利用“丑闻打击政治对手”，让“社会党”失去民心，这部分票多数流入了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保守派”囊中。

吉田上台后不久，美国人约瑟夫•道奇（底特律银行董事长）以盟军总部顾问身份来到日本，他参与编制了1949年度的财政预算。财政紧缩的首要措施是减少国家开支，而减少国家开支的主要手段就是“裁员”。属于裁减对象的有26万人之多，国营铁路公司人员最多，同时也是裁员“大户”，“国铁”工会强大，这里的“劳资”矛盾也最为尖锐。原本就通货膨胀，失去工作的工人瞬间就丧失了生活来源。保守分子要将国家面临的困难强行转嫁给工人。为工人呼吁的只有共产党，而德田球一等20多名共产党领导人反成为这次清洗的对象（1950）。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

报》被勒令停刊。第一次吉田内阁时，他曾“利用红旗换取美国的粮食”，而这次他要利用美国高压，达到压制工人运动的目的。

日本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占领军刚刚进入的时候，德田等属于被解放的对象，而积极参与战争者被清洗；现在开始走向完全相反的道路，当初被清洗的保守分子被解除清洗，而德田等反遭清洗。

保守分子制造阴谋，陷害共产党人。

1949年7月5日，国铁总裁下山定则在去上班的途中，要求司机在日本桥的三越百货店前停一下，他本人进入店中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专车上。6日深夜零时25分，在东京北部的足立区常磐线绫濑车站附近发现了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被火车碾过。7月1日，下山总裁刚向国铁工会宣布，要求裁减96000名员工。此后每天都与工会代表开会，5日是他回答工会提出要求的最后一天。

对于他的死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是他杀。有人将下山杀害后，将尸体搬运至抛弃现场，伪装成自杀。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杀。由于占领军的压力，他不得不实施大裁员，这些让他身心疲惫，最终他选择自杀逃避。

事件的真正原因至今不明。事件发生后，工会首先成为重点怀疑对象，还有人怀疑是美国情报机关所为，总之，没有人将矛头指向保守政府。该事件发生后，工会蒙受不白之冤，工会活动从此陷入低潮。

“下山事件”10天后，7月15日晚9时30分左右，在东京西郊中央线的三鹰车站内，停在电车车库内的无人电车突然启动，在站内候车的6名乘客被撞死，20多人被撞伤。不知是人为原因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车库内的电车制动器从刹车切换到了高速行驶的位置。据事后分析，有人进入了停在车库内的电车上，将列车发动起来后，跳下电车逃离，结果发生了空车撞人的惨剧。显然，这是人为的破坏行为。

16日吉田发表讲话称：“共产主义者破坏社会安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将几起恐怖事件栽赃在共产党人头上。战争结束了，驱赶国内底层去外国抢掠已经无法继续，保守分子遂将国内贫困无产者视为自己的敌人。在事件调查过程中，国铁工会中的共产党员相继遭到逮捕，最后有十人被起诉，其中只有一个人是非党员。在警察调查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承认是一起密谋制造的事件，而在审判开始后，他们都主张自己无罪，主张以前的笔录是在警察的威逼下不得不承认的。所有被捕者中唯一的一个非共产党员竹内景助，他后来承认是他个人犯罪，与所有共产党员无关。1950年，一审判决竹内景助有罪，其他人无罪。在此后的审判中，竹内多次改变供述，说自己无辜、清白，他于1967年死在狱中。





松川事件现场

吉田茂内阁中的官房长官增田甲子七，未经调查就诬指该事故为工会所为。检察当局遂以“列车颠覆致死罪”起诉国铁及东芝松川工厂工会会员各十人。其中内幕至今仍未被揭露本身表明，这是吉田内阁一手操作的“表演”，目的在于嫁祸于工人，日本政府好趁机迫害工会和日本共产党。

“三鹰事件”过去一个月后，再次发生了松川旅客列车翻车事件。8月17日早晨3时零9分，在福岛县境内的东北本线的金谷川与松川两站之间，由青森驶往东京上野的客车前方车厢突然脱轨，机车驾驶、副驾驶等三人死亡，乘客五人受伤。后来调查发现，有人将钢轨与枕木之间的固定螺栓拆除，结果造成翻车事件。这次事件也被指责为“共产党人有预谋的破坏活动。”9月10日之后，又有20多名“国铁”的工会干部被捕，除一人外，其余都是共产党员。

与上两次同样，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是共产党人故意所为，经过后来14年的漫长审判，日本最高法院最后宣告全体犯罪嫌疑人无罪。

这三起事件，至今依然谜团重重。唯一清楚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事件都与日本共产党无关。现在的说法是：美军情报机构为了压制共产主义运动，由他们策划并实施的。无论今天如何推测，这些事件的确对当时的工会运动造成了巨大打击。利用这些事件的人，实际上达到了压制共产党运动的目的。能够动员司法以及警察

机构的，战后只有保守分子。

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浪人”在中国自己制造事端，然后再栽赃到中国人头上，类似事件又发生在了战后的日本。“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针对共产党的阴谋活动突然销声匿迹。

二战期间，美苏曾一度携手，共同打击法西斯。可二战结束后不久，这对同盟伙伴立刻变成对头冤家。1946 年 3 月 5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指责苏联扩张。3 月 13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回应称:“英美是战争制造者。”美苏之间从此开始进入“冷战”。1947 年 3 月美国援助希腊、土耳其，6 月开始实施帮助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马歇尔计划”，而苏联则联合社会主义国家对抗。1947 年底，苏联提议美苏从朝鲜同时撤军，但遭到美国的拒绝。而在越南，胡志明领导的、争取越南独立的解放军与法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爆发战争。在中国，1947 年 7 月开始的国共谈判失败，中国内战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开始寻求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1948 年 1 月片山内阁时期，美国陆军长官罗亚尔发表谈话指出:“解散财阀破坏了日本的工业能力，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同时，也让日本失去了和平发展的力量。日本无法自立，必将拖累美国。”

日本战败前夕就曾计划单独向苏联投降，然后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看到向苏联投降无望，后来转向美国投降。对美国投降之后就开始离间美苏关系，保守分子知道，美国人对红旗过敏，1946 年 5 月的“要大米示威”，1947 年 1 月底(2 月 1 日)要求涨工资示威，两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都遭到了麦克阿瑟的压制，在美国占领军看来，反对保守政府就是“赤化”。用保守分子的话来说:“结结实实地利用了一次美国的虚荣心”。麦克阿瑟保证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日本的保守分子乘机要“睡在美国人怀里”。美国占领军每天在日本的投入是 100 万美元，美国不愿意将自己国家纳税人的钱投在日本，美国人要撤走，日本要拉住美国不让走。1948 年初，美国的斯托劳埃可调查团、德雷帕访日团相继来到日本，他们的建议是，为了亚洲的稳定，遏制苏联的扩张，“在和平基础上恢复日本经济有利于美国的占领”。1948 年 10 月吉田迫不及待地要推翻芦田上台，背后的大背景是美国对日政策的转换。1948 年 12 月 9 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停止解散财阀，19 日，再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稳定经济的九原则。



[1] 中文为监护人、保护人的意思。在歌舞伎中指“辅助人员”。

[2] 木户在战后证言称，日本对英、美宣战后的头三个月，传入宫中的都是“战胜”的好消息，此后都是于日本不利的“败战”消息。

[3] 近卫在日本对英、美宣战前将政权交给了“武人”东条，日本似乎此时时就预留了“文人谈判”一手。

[4]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派遣与罗斯福总统有交情的野村吉三郎与美国谈判，日本只想通过“友情”达到日本的目的，并没有因为俩人之间存在“友情”，野村把将日本将要发动战争的消息透露给罗斯福。

[5] 东条内阁中的外相东乡，1942年11月以反对设置“大东亚省”为由辞职。这是东条宣战内阁首次遇到内部意见不统一，但最后东条的继续战争路线占了上风。

[6] 秋永月三，陆军中将。

[7] 猪木正道著《吉田茂的执政生涯》江培柱 郑国仕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第11页。

[8] 同上书，第11页。

[9] 曾是长州军人、1927年起任首相的田中义一的秘书。

[10] 1943年上半年开始，英、美联军开始空袭意大利，地面部队也开始对意大利发起进攻。7月10日开始登陆西西里岛，接着攻入意大利本土。意大利王室、政治家以及军人都开始反对墨索里尼，前参谋总长帕特里奥将军随即将墨索里尼软禁，解散了法西斯党，拥护王室成立了新政府。（1943年7月）他们派遣使节到中立国西班牙与英、美谈判，8月，帕特里奥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9月3日签署投降书。接着，他们加入英、美一方，向昔日的同盟国德、日宣战。虽然墨索里尼被希特勒派遣的空军救出，让他领导北部意大利的政府，可随着德国的战败，墨索里尼最终在1945年4月被杀死。

[11] 转引自《吉田茂的执政生涯》第36页。

[12] 松冈外相与苏联缔结的《日苏中立条约》到1946年4月25日期满，在此之前的一年（1945年4月25日），如果签约双方中的一国不宣布废弃则自动延长。

[13] 松本重治等著《近代日本的外交》朝日新闻社 第112页。

[14] 日本读卖新闻社编 蔡德金 丁晓强等编译《天皇和日本投降》档案出版社（1992）北京 第 8页。

[15] 同上书 第12页。

[16] 注意联想二战结束后日本转向美国一边倒政策。

[17] 同上书，第55页。

[18] 1941年松冈缔结“日苏中立条约”时，曾带着政府大礼前往，但是没送出就完成了任务。日本这次也希望最好不送礼就能达到目的。注意与二战后美国占领期间的对美宣传比较。日本此时鼓噪，自己投入美国怀抱有利于“防止赤化”，是阻挡“共产主义扩张”的防波堤。

[19] 同上书，第81页。

[20] 参照正村公宏著《战后史》筑摩书房 第128页。

[21] 儿玉誉士夫著《恶政、枪声、乱世-风云四十年的记录》。

[22] 依据战前的明治宪法，内阁首长不是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大正时期曾出现过短暂的多数党领袖出任首相。

[23] 马弓良彦著《田中角荣其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24] 富森睿儿著《战后日本保守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11页。

[25] 小山弘键 清水慎三编著《日本社会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4页。

[26] 依据旧宪法，国会无权提名首相人选，首相要天皇提名。

[27] 猪木正道著《吉田茂的执政生涯》第141页。

[28] 同上书，第141页。

[29] 同上书，第154页。



第十章　批发市场式的日本政坛



银座一隅的批发市场

自从江户幕府开府以来，“筑地”从当初的卸鱼码头发展成为今天的食品综合批发市场，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的批发手段是大批发商批发给中间

东京银座的繁华夜景

东京银座是举世闻名的高级娱乐区，东京的白领们每天晚上都要在这里享受着醉生梦死的时光。当繁华落尽，那些批发商们就进驻这里，开始一种新的交易。这就是日本，繁华下所掩盖的交易，掩盖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批发商，中间批发商再批发给小批发商，小批发商批发给零售商。这种层层批发的纵向批发体制，现在正受到产地直销等新兴商业手段的冲击，但它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筑地”位于东京高级娱乐区——银座的一隅。在银座的霓虹灯相继熄灭，醉客们开始踏上归途之时，“筑地”的工作开始进入高潮。整个批发市场内外就好似一个战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货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入各自的停放地点，从货车中卸下各种各样的食品立刻被搬运到市场内。海船则停泊在市场的专用码头上，新鲜的海产品从船上被卸下，搬运到市场内。海产品被搬入批发市场之后，批发商们开始“下见”。“下见”就是在正式开始某件事之前的事先观察。前来“下见”（したみ）的，都是准备参加即将进行的鱼类竞卖的买家，他们怀揣各自的订货计划，先来看货，然后决定自己的价位及采购量的多少。在竞卖中，将以什么价格、吃进多少数量，来自买家对市场行情的综合判断。在中间批发商之下还有众多的零售商，他们是纵向的商业伙伴关系，这一网络常常建立在几代人长期交易的基础之上，零售商要从中间批发商处进货；中间商要依靠零售商消化自己批发进来的货物，他们是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对上级批发商来说，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金字塔状的分销锁链。上级批发商偶尔犯一个小错误，错误地估计了行情的时候，他的下级批发商要共同分担风险与失误。如果上级批发商屡次采购失败，让零售商承担部分损失，一两次他们可以忍受，但总是如此他们就会抛弃该批发商，转到其他有利可图的批发商门下，共同获利是维持他们联系的纽带。对上级批发商来说，低价多进与高价少进都于自己不利。太多则零售商无法消化；太少零售商又吃不饱。为了保证销售链条常年运转并在维持原规模的基础上有可能扩大，上级批发商就必须有“拿手绝活”，越有成绩，他在批发市场中的地位也才越高，同时获得的实际利益也就越大。

“下见”对每个上级批发商的机会都是公平的。各种各样的鱼类摆放在一个大厅中，上级批发商手拿手电，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仔细观察，用手电照鱼的眼睛以分辩鱼类的新鲜程度，同时还有用鼻子闻、用手去摸，以分辨肉质以及产地。通过充分的“下见”，决定在竞卖中将以何种价格举牌吃进。制定独自的采购计划时，还要仔细琢磨竞争对手，因为他人举牌也会影响到自己竞买。乍一看，交易是单品的鱼，可与它相关的所有信息都会对举牌下单产生影响，比如对渔汛的了解，是刚开始还是已经进入尾声？当年的渔汛是“大”还是“小”？是否有外国的同类渔产品进入日本市场？今后一段时间的天气是否会影响鱼类的捕捞，而节假日又会与鱼类消费量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实际考察外加常年形成的经验，不具备这些知识是不敢贸然进入



拍卖大厅并举牌的。

拍卖在规定的时间内准时开始，采用的是日本传统的方式，在拍卖开始的铃声响彻之后，拍卖主持人登上一个高台，参加竞买的买家环绕在他周围，主持人由低至高开始报价，买家则时刻注意他的报价以及周围竞争对手的举牌情况。主持人报数的速度很快，不习惯者往往无法听清他说些什么。参加竞买的买家用一种特殊的手势回应，相互之间的交流在短时间内结束，标的物在瞬间就通过竞拍主持人，从委托人那里转移到了作为买家的上级批发商手中。竞拍主持人用很快的速度在一张相当于买卖合同的纸片上记录下一组数字，将其中的一张递给中间批发商，中间批发商待会只要凭这张纸，就可以付钱提货了。

每天供应东京消费的鱼类总量一定，参加竞买的批发商也就那么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天都是同样的人物参与竞买同样的货物。每个竞买者的动机相同，都是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当买家判断进价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时，他们就会放弃，变成观望者。只有在买家认为价位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时，买家才频频加入竞买的行列，与其他买家竞争。能否在竞买中吃进一批货，表面上存在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出高价者就可以付钱拉货，但在这种朴素原则的背后，是以自己的家产、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的批发锁链的顺利运转为“赌运”的。一旦出高价拿下了货物，而自己最终又没能批发出去，那么就必须自己承担损失，积累的家产，良久形成的销售锁链等，都将化为乌有。

赚到钱可以去一路之隔的银座“花天酒地”一番；假如在生意场上失败了，那就只能到货场上去搬鱼了。在和平气氛下进行的竞拍背后，蕴涵着残酷的死活问题。

日语中有“出番”这么一个词，“番”是“番号”“顺序”的意思，“出番”就是轮到工人该出工、演员该登台上场的意思。对政治家而言，“出番”就是“出马”参加竞选，或领受政治任务的意思。“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也好似筑地批发市场中参加竞买，每个政治家都有自己的主打方向，擅长的领域。日本的国家利益及国家面临的政治课题，日本政治家称之为“悬案”，“悬案”好似摆放在批发市场中的冻鱼，早就一条一条地摆在所有人面前。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可以去“下见”，进行事先调查。谁有能力解决谁举牌，拿下“悬案”者就可以组阁当首相，首相利用自己的“子分”（喽啰）去“消化悬案”。能够“消化”则皆大欢喜，论功行赏时人人有份，无法解决则靠边站，让其他竞争对手接着“出马”。

政治家不会贸然去为政治“悬案”举牌，因为一旦无法“消化”，轻则从政坛上跌落，重则永远从政坛上消失。政治家吃进“悬案”往往以政治生命为“赌注”，每个政治家都想从“花道”[2] 上走上走下。日本的政治家，与其说有什么坚定的信仰要终生

贯彻，不如说他们更像筑地批发市场上的商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什么好买卖就买卖什么。也就是说，日本的政治家习惯用商人的手法及态度去处理国家的政治。



第一届吉田内阁留下的“悬案”

好似从中央批发市场上批发回来了鱼，同一系统的分销商们要将其再批发、分销掉那样，前任没有分销光的，继任者接着分销，要么将前任没有干完、或没有干好的活干完；要么自己单干。日本的政治实际上就这么简单，是商人式的、看“行情”变化解决问题的政治。

“第一届吉田内阁”实际上是保守势力在背后暗箱操作产生的内阁。让吉田干的活，实际上在日本投降前开始就一直留在那儿了。日本统治集团一方面让军人在战场上拼命抵抗；另一方面准备像海参那样，随时将他们“抛弃”，准备用“牺牲军人”的方式换取保守势力“延命”。以近卫为首的文人积极进行各种阴谋，包括向苏联投降，提出“自己处罚战争罪犯”，都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疯狂杀人的武士最怕“被别人杀”，他们最怕自己落到墨索里尼、希特勒那样的下场。从铃木内阁到东久迩皇族内阁，再到大正时代的老政治家币原内阁，从事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保住统治大权。

美军刚刚进驻，近卫就策划组建政党，修改宪法。看到“政党”已经组建完毕，币原宣布内阁总辞职，重新举行大选。占领军司令部这时突然“杀出”，提出要先“整肃”，再“大选”。保守政府虽然被美军的迎头一击打懵，但不久就缓过神来，他们让币原与吉田换了个位子，前内阁中的外相吉田，变成了新内阁中的首相。“第一届吉田内阁”号称“粮食内阁”，而“填饱肚皮”问题早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存在，只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该问题比以前更加严重而已。

日本投降后，大量前军人返回日本后“复员”，在海外殖民地的日本人也相继回国，总计 650 多万人一下又涌回到那四个岛上，加上原来在日本本土生活的居民，这些人的吃、住问题成为大问题，若解决不好，随时可能发生推翻政府的暴动。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向美国要求救济，打开以前日本军部的秘密粮库，这些都是临时的补救手段，从长久计议，必须要有更多人去种粮食，提高粮食产量。占领军适时地提出了“土地改革”方案，对于美军的这一改革计划，吉田政府也积极地予



二战之后的老兵

二战结束，意味着日本这个病人身上的输液管全部被拔掉，男性上战场、女性进工厂的"全民就业"不再，和平时代要男女都挣抢同一个饭碗，生活的压力易于让日本民众把希望寄托在飘渺的神灵身上。

以配合。将地主的土地限制在自己耕种的有限范围内，同时将他们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这样一可以消化聚集在城市里的复员兵，二可以缓解失去了工作在城市中徘徊的失业者的压力。很多人回家乡种地，农村成为了有魅力的地方，"无产者"也因获得土地而变成了"有产者"。

为了让战争能够进行下去，战时政府发行了1233亿国债，为资本家提供的补助也高达1047亿，两项合计2280亿。战争结束了，政府面临如何消化这些内、外债。以前日本可以从殖民地掠夺性地获取廉价原材料，在日本加工的产品还可以高价出口，现在这些已经没有可能，原材料进不来，产品也因没有机器无法加工，也没东西出口。

对于巨额内、外债引发的通货膨胀，美军的态度是"剥夺剥夺者"，战争期间，真正发大财的是日本的资本家，肥了许多与军部密切勾结的政商，美军的方针是："要让日本政府及全体国民知道，从经济的角度而言，战争最不经济，无利可图"。占领

军的另一个改革政策是下令停止支付各种补助、国债，同时提出进行税制改革。征收高额的财产、遗产税，平民百姓反正只剩下活命钱，这项措施直指在战争中发了财的资本家。

1946年12月24日圣诞节，GHQ公布了远东委员会12月18日通过的“有关鼓励工会组织的十六原则”，该原则与以前发布的支持建立工会、保护工会等改革命令相比，没有什么重大的新内容，主要是对以前的改革原则进一步细化。

作为对占领军公布的“十六原则”的回应，1947年元旦，吉田茂在新年广播讲话中指责罢工工人是“不逞之徒”。工会组织要求吉田收回“不逞之徒”的讲话并道歉，吉田后来以“发言导致误解，深表遗憾”作为回答。18日，日本各工会决定从2月1日起进入无限期全国总罢工。继1946年“五一大罢工”之后，麦克阿瑟再次出面干预，1月31日，占领军司令部发布了禁止“二·一大罢工”的命令。当日下午1时30分，麦克阿瑟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要实施‘二·一’全国大罢工，联合国将停止对日本的援助。”

当晚9时20分，工会领导人通过广播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命令，停止罢工。

麦克阿瑟“各打五十大板”，在制止了日本工会总罢工之后，于1947年2月6日致函吉田茂首相，下令举行大选。

对于麦克阿瑟提出的要求，日本政府内部立刻开始了变通的准备。2月12日夜，“自由党”“民主党”“社会党”中的重要干部一起开会，商谈组织联合政府。

“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设想成立“以吉田为首相的四党联合内阁”，他在与保守党领导人会谈时称：“与其爱党，首先要爱国”。[3] 后由“社会党”牵头，四党召开了联合会议，在组织内阁的问题上，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并且共同商讨了如何分配内阁职位的问题，会议决定吉田总辞职后，再由吉田组织“第二次五党联合内阁”。但是在2月14日下午，“自由党”“进步党”“社会党”“协同民主党”以及“国民党”的五党干事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联合组阁失败。[4]

1947年5月3日，是日本宪政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明治宪法》被废除，由占领军积极参与并制定的日本《新宪法》生效。

《新宪法》规定，内阁首相必须从国会议员中产生。依照这一规定，替代鸠山出任“自由党”总裁、进而成为首相的吉田茂，将因为不是民选议员而失去首相资格，也就是说，即便是现任首相，也必须参加竞选，先获得民选国会议员的资格。

日本告别了以往天皇任命首相的“委任统治”方式，同时又开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依据《新宪法》，在众、参两院中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才可以取得组阁权，多数党的领袖方能出任首相。

1947年4月，全日本上下都在为各种竞选而忙碌。除了众、参两院的国会议员选举之外，还有地方自治首领的选举、地方议会议员的选举。在这次大选中，"社会党"在众议院、参议院中均取得多数席位。"社会党"获得143席，成为第一党；保守的"自由党"仅以10席之差屈居第二位（131）；"进步党"此时已改名为"民主党"[5]获得121席，居第三位，共产党由原来的六席减少到了四席。"社会党"大跃进表明，日本国民对"社会党"充满期待。"社会党"在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意味着：新一届的内阁应该由"社会党"人组成，而"社会党"领导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大臣。

"社会党"虽居第一位，但远不到半数。保守派的两党随时有可能联合起来，这时"社会党"的微弱多数就会立刻被颠覆，同时，"社会党"只能组建联合内阁。在"社会党"全体议员出席的全会上，"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提议："不一定非由第一大党推选首相。"

1947年4月27日，《朝日新闻》用大标题报道了麦克阿瑟元帅的声明："民意排除共产主义，选择了中间道路。"麦克阿瑟极端看好《新宪法》生效后的"社会党"政权，而且片山是基督教徒。

5月15日，"社会党"左派代表发表"要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的声明，5月19日，片山哲与吉田茂举行会谈，吉田是这样回忆这次会谈的：

"自由党"既然败给"社会党"，我便决心不采纳党内一部分人所主张的联合或分化等办法，干脆总辞职，把政权交给第一党的"社会党"，以树立我国民主政治的规范。但是，恰在此时，"社会党"的片山委员长和西尾书记长一同来访问我。起初，只有片山君一个人走进我的首相办公室，他对我说：'我想你是不会入阁的，希望你从'自由党'中推选参加下届'社会''民主'两党联合内阁的阁僚。"他的理想是成立以"社会党"党首为首相的各党联合内阁。

我向他提问：'社会党内所谓左派的想法究竟如何？"片山君没有马上答复，而是把在隔壁等待的西尾君叫了过来，让他来回答。西尾君作了种种说明，结论是"可以认为是容共"。我回答说："那不行。我们一开始就是明确反共的，如果让反共和容共的党派组成联合内阁，那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对社会党也不会有好处。"我们的谈判就此破裂了。[6]

吉田要求"社会党"清除"左派"，以此作为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对此，连一向对保守派妥协的"社会党"中的右派都坐不住了，认为保守派严重干涉"社会党"的事务，拒绝了吉田的提议。



5月20日，吉田内阁总辞职，“自由党”退出“四党联合内阁”。6月1日，由“社会”“民主”“国民协同党”三党联合组成的联合政府产生。“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长片山哲出任首相，书记长西尾末广任内阁官房长官，“民主党”领导人芦田均出任外务大臣，“国民协同党”书记长三木武夫出任递信大臣。

片山哲本人也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靠保守党克服共产主义政策是缘木求鱼，只有‘社会党’才可以指出共产主义的错误之所在，可以否定其存在。为了让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成熟，只有在驱逐资本主义的同时，反对共产主义。”[7]

在“社会党”人看来，自己是“不偏不倚”的“中间派”。“资本主义”属于“极右”；“共产主义”属于“极左”，只有“社会党”代表广大的中间阶层。

吉田茂所谓将组阁权完全交给“社会党”，并称这是“树立民主政治的规范”，实际上是玩弄阴谋。“民主党”与“自由党”可联合而不联合，它转向与“社会党”合作，“民主党”向“社会党”提出了合作条件，这实际上是保守势力给“社会党”套上的“紧箍咒”。

一、坚决反对极右和极左

二、不泄露国家机密

三、不从事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一切活动

5月20日召开国会，23日进行了总理大臣提名表决，“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获得426名议员中的420张选票，当选为新首相。麦克阿瑟向他祝贺时称：“这次国会选举的结果，标志着日本国内政治已经走上‘中间路线’，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位属于长老派教会的基督教领袖来担任国家领导。”

作为现任首相，片山比任何人都清楚，在日本已经铺就好的资本主义路线上，“社会党”的列车很难在上面行驶。获得政权的“社会党”实际上处境尴尬。“社会党”虽受民众的支持，可“社会党”事事受到保守势力的掣肘。“社会党”内部有保守势力的代表混迹其中；外部有两个保守党蠢蠢欲动，它们随时都有可能会联合起来，“社会党”想给民众多干点实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社会党”向民众承诺并准备推行的政策，处处受到维护资本家利益的保守党的牵制，让社会党人的承诺无法兑现，让维护民众利益成为了一句空话。对于“社会党”之无能为力，选民又非常严厉。这一切让“社会党”最后不得不交出政权。

“社会党”决心推行“煤矿国有化”，这样可以保证更多工人就业，但遭到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他们向保守党行贿，公然在国会内向支持自己利益的国会议员派发

金钱。

“煤矿国有法案”的背后是资本家利益与工人利益的对立，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保守党此时暴露出本来面目，“自由党”在审议进入高潮时提出“非社会主义政党大团结”，“民主党”中的保守分子立刻从联合政府内部倒向在野的反对党－“自由党”，片山哲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议会自明治时代开设以来，每年国会开会讨论年度预算的时候，都是执政的政府与反对派交锋最为激烈的时候。1948 年 2 月 5 日，在国会讨论年度预算时，执政的“社会党”首先遭遇到来自自己内部的反对。“左派”社会党人，担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的铃木茂三，否决了政府提出的预算案。以铃木为首的“左派”社会党议员，反对用提高铁路运费、通讯费作为给公务员加薪的财源。他们主张，政府如果通过这种方法给公务员加薪，实际上只能加速通货膨胀。“左派”社会党议员因此对该议案投了反对票。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公务员因为没有加工资而实际收入已经大幅度缩水，他们对自己提高工资期待很高，当要求受阻时非常不满。社会党因此失去了这部分支持者。在大众看来，此类方案遭到保守党的否决尚可理解，可“社会党”就是为民众谋福利的，这种时候连“社会党”也靠不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守分子就是要让“社会党”无法干下去。

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危机，片山决定总辞职，在说明辞职原因时称：“在联合内阁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由于党内情况而产生的烦恼，这也是我国在目前情况下难以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我深信，日本民主革命应以排除‘极右’和‘极左’的‘中间道路’来实现。也就是说，在拥有绝对多数议席的政党出现之前，今后仍必须是联合内阁，这也是‘中道政治’的一种形态。”

片山哲领导的政府仅仅维持了八个月，换言之，八个月后他就撂挑子，将自己的选民抛弃了，于 1948 年 2 月 10 日宣布总辞职。

继任的“民主党”认为：“从政党角度来考虑，下届政权只能以‘民主党’为核心。原因是在目前形势下，‘极右’与‘极左’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片山联合内阁的首脑虽然是‘社会党’人，但是所有的政策都是以‘民主党’为主体的。”[8] 联合内阁中的“社会党”“民主党”，都将自己定位于“中道地位”，主张自己是“不偏不倚”的中间派，代表大多数日本国民利益的政党。片山之后的芦田内阁也只有七个月，与联合内阁的短命政权相比，自 1948 年 10 月“第二次吉田内阁”成立以后，保守党长期执政持续了 40 多年之久[9]。如果说“社会党”主导的政府是“中道政府”的话，那么保守政权一直都是右翼政府。

2 月 21 日，众议院提名“民主党”总裁、不是片山内阁中的外相芦田均为首相，

芦田均领导的内阁，依然是“社会”“民主”“国民协同”的三党联合内阁。3月10日组阁结束。芦田与片山的转换，就是“社会党”与“民主党”地位的转换。“社会党”右派加入内阁，而左派分裂出去。7月6日，“右派”社会党议员西尾末广，因任“社会党”书记长期间曾从清水组（日本著名的建筑公司）收受过“政治捐款”，引咎辞职。

第二、三、四届吉田内阁留给后世的“悬案”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交战各国在法国的“巴黎和会”上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战胜国英、法在德国驻军监视，可这些举措后来并没有能够遏止德国的军国主义复活。作为教训，二战后大国将德国分割成两个部分，分割占领是为了削弱德国。两次的方式、方法不同，可宗旨都一样，就是不能让德国再次强大，成为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威胁。这一思想同样也存在于对日问题上。

苏联提出要占领北海道，可斯大林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杜鲁门的拒绝，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不准备对日本采取对德国那样的分割占领方式，美国对日本要单独占领。

1946年2月8日，美国国务卿汉斯公开表示，将在一年之内与德国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但是对日本的占领将持续15年时间。美国对日本的最大担心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占领期间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不能让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复活而展开的。硬件上要削弱日本的工业能力；软件上要对教育、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除了物质、制度、人员的思想保证之外，还要驻军监视。

1947年，麦克阿瑟接受了调查小组首次提交的结束对日占领的草案，美国计划在1947年8月中旬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平会议”，和平条约必然伴随驻军，而驻军又面临费用问题，究竟什么人来负担美军驻扎费。自从1945年8月美军开始进驻日本到1952年4月美军撤离，其间共有六年零八个月，美军撤离一直没有实现，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美国想驻军，其次，日本不希望美军撤走。同样结果，但双方对这个问题的视角截然不同，最终看法当然也完全相反。

美军占领日本之后，日本看到美国是今后世界强国，战争结束前，日本曾计划单独向苏联投降；战后则完全投入美国怀抱。为了表现自己对美国的“有用性”，当年广田向苏联驻日本大使马力克“兜售”的内容，此时仅仅更换了一个国名，从苏联



变成了美国。日本向美国强调自己的战略价值。首先，日本处于东西方的要道上，是美、苏在亚太地区争夺的焦点。其次日本具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众多的劳动力，日本还有经过战争训练的前军人。假如这些被苏联利用，也就是说如果日本倒向苏联，将会对美国十分不利，因此美国必须扶持日本，支持保守政府，以保证日本倒向美国而非苏联，这样可避免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可不管什么派掌权，只关心不要针对美国再发动战争。日本一方面对美国占领军极尽谄媚之能事，另一方面一遇到美国下达的命令于保守势力不利时，就自己不出面反对，让社会党等出面反对。日本最擅长的手段是制造“内阁不稳”。

吉田茂不无得意地说自己是“不倒翁”，不倒翁能够稳定的原理就是“左右摇摆”。日本自一新之后走向世界时开始，就一直利用大国对立，暗中“壮大”自己。看到 1947 年之后国际上出现了“冷战”以及“两个阵营”，日本保守势力也将国际问题国内化，针对国际上国家的强弱，在日本国内相应地建立起对应的政党，保守势力唱主角，社会党在边上“敲边鼓”。

美国表现出“抽身要走”，苏联就说“且慢”。苏联要求美国不要急于召开“和平会议”，理由是中国问题尚未明了，中国是受日本之害最深的国家之一，没有中国参加的“和平会议”不能称之为“和平会议”。对日签署《和平条约》的问题自此开始停滞，直到 1949 年 9 月重新开始。美国国务卿爱奇逊与英国外交大臣倍宾举行会谈，会谈的中心内容依然是不希望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要求今后长期一段时间对日本进行监视、限制。后来法国也加入进来，发表了“三国联合声明”。



拯救落水美兵

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警察在拯救一名被愤怒群众抛入皇宫前壕沟中的美国士兵。驻日美军一直存在各种纪律问题，日本政府为了换取“美军保卫日本”，即便驻日美军在日本犯罪，日本政府也不敢惩处他们，生怕他们撤回美国。因为美国对保卫日本比“暧昧”的日本人“还暧昧”，驻日美军又时常成为日本对美发泄不满的泄愤对象。

虽然美国就中国的“国、共两党”谈判付出了努力，但最终还是演变为“内战”，随着美国对蒋政权的抛弃，中国大局最终明了，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美国此时仍没有放弃与北京政权保持友好的念头。

1949 年 5 月 7 日，吉田首相公开表示：媾和之后仍希望美军驻扎在日本。此后他在多个场合公开强调：今后将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年 11 月 11 日，他在参议院大会上发言说：“单独媾和，如果今后能在此基础上开始全面媾和，政府当然愿意。”这也就是说，日本要求美国驻军是要“单方面媾和”，摆脱战败国被联合国军的共管地位，然后再分别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缔结和平条约。此后日本要求美军驻守，而麦克阿瑟表示反对。

1950 年，杜鲁门任命杜勒斯为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是在华尔街开设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青年时代出席过“凡尔赛和会”，具有丰富的国际外交事务经验。被称为是共和党的“影子国务卿”。杜鲁门属于民主党，起用共和党人推进外交事务，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党见，早日解决日本问题。

对美国来说，“宁愿失去一个弱朋友，也不能制造一个强对手”。在美国看来，日本是美国的首要威胁，中美、美苏之间，很难有理由或者直接利益冲突引发战争。在美国历史上，主动攻击美国的国家只有日本，而且日本自日俄战争结束后就曾多次威胁美国，称要对美宣战。美国的假想敌也一直是日本。

可中国、朝鲜后来都分为两个，这让吉田有机可乘，他要与美国签署和平条约，同时还要求美国提供保护。换个角度而言，只有钻到美国的羽翼之下，日本“赖账”才有可能，日本怕中、苏追杀。出于自私的考虑，日本国内的反对派对吉田的“单方面媾和”也没有坚决反对，他们对“美军驻扎保护”也持认同态度。

与所有国家同时缔结和平条约，宣布日本永远成为一个中立国，这原本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必然归宿，也是日本应该选择的康庄大道，可日本并不想如此。

苏联提议全面媾和，日本国内也有同样的呼声。1949 年 12 月 9 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占领地区教育会议，他在会上表示，日本应该与所有国家同时缔结和平条约。1950 年 1 月 15 日，由《世界》杂志主办的“和平问题座谈会”在日本召开，出席会议的日本著名知识分子 35 人，联合签名发表声明，要求与所有国家一起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样既可以让日本尽快独立，减轻“外国的负担”，又可以真正实现新宪法中规定的精神。这些知识分子十分清楚，日本战后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保持中立，不加入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它是维护和平的最积极的选择。世界现存两大阵营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日本加入了其中的一方，必然疏远甚至增加了与另一方对立的可能，一旦对立双方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会“被

动”地卷入战争。自明治时代开始直到昭和时代日本投降时止，日本的外交史就是不停地联合、背叛、攻击，以日本战败为契机，日本应该对以前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彻底告别这种阴谋外交，真正变成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选择成为中立国家，也是实现全面和平的大好时机，可吉田内阁并不愿意进行这种选择。他依然选择明治以来的阴谋外交，希望看到世界上出现两大阵营的对立并加入其中一方，表面上说要调节双方之间的对立，实际上要挑拨、离间双方的关系，甚至要加剧、怂恿两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日本中立，美军撤离就是一种必然，也符合减轻他国负担，实现日本经济独立的独立国家的要求。1950 年 4 月，在野党发表全面媾和、日本中立的声明。

可这一提议遭到了吉田领导的保守政府的抵制，他们反诬苏联的动机是要“颠覆日本政府”，日本宣称要成为美国的反共基地，日本不说要美国保护是为了“赖账”，而是为了美国。美国在此问题上也有自己的难言之处，如果推迟日本独立，美国的占领支出要进一步增加，美军每天的驻扎费是 100 万美元，美国希望尽快摆脱。而日本并不想走和平道路的态度，同时让美国担心。既然美国驻军还可让日本支付费用，那美国也就“顺着”日本的思路，美国要驻军，但由日本主动提议，变成日本“邀请”。

在“绝不能让日本再次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问题上，美、苏这两个大国的见解是一致的，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改变。

1950 年 5 月 3 日，吉田首相在执政党自由党的两院议员秘密全体会议上发言说：“南原繁东京大学校长所说的‘全面媾和论’是‘曲学阿世’之徒的言论。”他的发言被媒体公开后，遭到了全国知识界的反对。南原则在 5 月 6 日专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回应称：“这种粗暴的言论与战前军部压制学者时的做法相同，这种言行本身就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危机。”

安全保障条约与行政协定 //////////

1950 年 4 月 25 日到 5 月 22 日，吉田派遣藏相池田勇人、吉田的特使白洲次郎一起前往美国。派遣他们前往美国的目的，是要他们向美国传达日本的想法：在“媾和条约”签署之后，希望美国同意继续驻守日本。这也是说，在美苏对立的现状下，日本选择了加入其中的一方，日本选择了美国。

1950 年 6 月 17 日，杜勒斯到达日本，25 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从结果上来看，加速了日本媾和，同时也将美国在日本驻军的问题确立了下来。



在完成了《对日和平条约》的美、英共同草案之后,1951年7月9日杜勒斯致信吉田,要求吉田本人亲自出席"旧金山和会",媾和代表团必须由"超党派"人士组成。为此,日本国内各党派就是否出席意见不一。为了议论并且说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8月16日到18日,日本专门召集了"临时国会",吉田在会上说明:"是日本主动要求美军继续驻扎"。8月31日,首席全权代表吉田与其他代表团成员一起乘飞机离开东京前往美国。这次"和平会议"不似当年"巴黎和会"那样会期长达半年、先讨论后签约的会议,这次会议只开了四天。9月4日,在旧金山市内的音乐厅宣布举行"对日和平会议",杜鲁门总统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并发表了现场演说,他在演说中强调,美国人民不会忘记珍珠港事件,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双方仍需努力。美国最大的关心,不单是保护日本不受侵略,还包括不要让日本再次成为威胁其他国家安全乃至和平的策源地。

9月5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苏联代表葛罗米柯提出应该有来自北京的代表参加,波兰以及捷克的代表也表示赞同,可出任议长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回答此问题与会议无关,阻止提交大会表决。葛罗米柯提交了苏联的提案,要求承认北京政府对台湾拥有主权,千岛群岛、库页岛为苏联领土,小笠原、冲绳的主权属于日本,"和平条约"生效后90日内,联合国军从日本撤离,任何国家都不在日本设立军事基地。[10] 葛罗米柯还提出日本可以建立最低限度、用于防卫目的的军队的提案,但没有获得日本的任何响应。苏联提案的动机非常明确,主要可以分为两大内容,一个是领土,另外一个是防止日本再次对苏联构成威胁。因在地理上与日本是邻国关系,苏联对日本的要求与美国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不能让日本再次成为自己国家的和平威胁。亚洲大陆上存在两个中国、两个朝鲜,无论相互之间如何对立,在对日本的问题上,双边的要求都是一致的。这些国家均遭受过日本的长期蹂躏,自己没有力量与日本抗衡,他们都希望美国能够遏止日本。

各国代表的演说结束后,9月8日举行了签字仪式,除了日本之外,有51个国家参加了会议,苏联、捷克、波兰三国拒绝签字,其他48个国家签字。签字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因与德国之间存在战争状态而对日本宣战的中南美及欧洲国家,与日本直接交火的国家只有美、英以及英联邦国家、荷兰以及东南亚的几个国家,中国大陆和台湾、南、北朝鲜都没有获得邀请,印度和缅甸因对中国大陆无法出席不满,也没有参加会议。

《和平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在旧金山市内的美国第六军司令部,举行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字仪式。日本代表只有吉田一个人签名,美国有艾奇逊、杜勒斯等四人签名。吉田一个人出席并签名,据说是考虑到国内存在反对《安保条约》



反对美军基地扩建的示威抗议

这是东京下砂川町居民反对美军基地扩建的示威抗议。因为是日本政府"邀请"美国军队保卫日本,因此美军要扩张基地时,只提要求不出面,一切要日本政府去"搞定"。日本政府派人强行测量圈地,结果造成严重流血事件。

的呼声,他用一人签名的方式负完全责任。

1951年10月10日,日本国内召开临时国会,审议《和平》《安保》两条约,参议院在10月26日、众议院在11月18日,分别以多数票赞成获得通过。11月28日,日本政府将条约批准书寄往美国。12月10日,杜勒斯再次访日,明确表示日本必须与台湾签署《和平条约》,否则美国上院将不会批准《对日和平条约》。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说过:《旧金山和约》存在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存在于《行政协定》中。

这也就是说,条约的核心在于《行政协定》中。1952年1月26日,美国政府特使腊斯克访日,日美双方开始就"协定"展开谈判,在野党发表共同声明:"反对行政协定",要求提交国会审议(《安保条约》审议已经以多数赞成并且获得通过),2月,众、参两院否决了该提案。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谈判,2月28日两国代表签字。之所以不用条约而采用协定的方式是因为,条约必须通过议会审议,而"协定"属于总统、首相的职权范围之内,不需要提交议会审议。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的两个条约生效,联合国共同占领日本宣告结束,GHQ同时宣布解散。

由于吉田选择“单独媾和”，拒绝与中国、苏联、朝鲜等签署《和平条约》，如何解决与这些国家间的问题，只能留待今后。继吉田之后上台的人，也就是要将吉田没干完或者没干好的活儿干好、干完的人。

自《旧金山和约》签署后，美军依然在日本驻扎，同样驻军，但两者的地位已经截然不同。《和约》签署前日本是“战败国”；《和约》签署后日本成为“独立国家”。美军驻扎由最初的军事占领转变成为应日本的要求而驻扎，日本必须为美军驻扎支付费用。

根据 1952 年签订《日本行政协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日本每年要为美军驻扎支付 1 亿 5500 万美元[11]。美国方面的分担额没有具体规定，只负担日本负担额之外的部分，美国究竟支出了多少是“美军机密”。1954 年日本政府预算为 1 兆日元，而防卫费已达 1000 多亿日元，占国家总预算的 0.1%。防卫费中的一半，也就是 500 多亿日元是支付给美军的费用。日本刚开始付费，就对支付金额不满，1953 年支付了 620 亿，1954 年“砍掉”50 亿，变成了 570 亿，鸠山出任首相之后，提出要美国再削减 200 亿，后来美国答应削减 178 亿日元，如今日本每年支付 50 亿美元。

分头包销政治任务

鸠山举牌的“悬案” //////////

1952 年 4 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立刻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加盟申请，但苏联动用否决权，让日本的愿望落空。1955 年 9 月，日本的愿望再次因为苏联动用否决权而失败。

吉田让日本独立了，可“进了一大步”的同时又留下了一个“大漏洞”。日本投降后，中、美、英、苏四大国专门成立了针对日本的“对日理事会”，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时，美、英在条约上签了字，但中国大陆被看成是“共产圈国家”，日本没有跟中国大陆、苏联之间进行任何谈判。中、苏既是日本的近邻，近代又深受日本之害，日本跟“远”的国家和解了；跟近邻国家还处在战争状态，别说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困难，就是所谓“和平”本身也大打折扣。

在日本看来，重返国际社会需要苏联支持，与苏联关系正常化，还伴随着其他的现实利益。日本希望获得在北太平洋的捕鱼权，希望二战后被押往苏联的日本



人能够尽快回国。

1952年1月1日，斯大林应日本“共同通讯社”的请求，通过该通讯社向日本国民发出了新年贺词。

请转告日本国民：我祝日本国民自由和幸福，并祝他们为了本国的独立，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最终胜利。苏联人民完全理解日本国民的苦难，对日本国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同时相信，日本国民能像苏联人民当年做到的那样，求得他们本国的新生和独立。

斯大林在《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前向日本发出呼吁，此举表明了苏联的极大善意。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1953年9月12日，鸠山在日比谷公会堂发表了重返政界后的首次演说，他主张，今后的重要政治课题是日苏邦交正常化和重整军备。

1954年3月，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核试验，日本“第五福龙丸”误入该海域，遭辐射侵袭，日本国内掀起攻击美国的舆论高潮。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字，10月中、苏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中、苏两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愿意本着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互惠的贸易关系，逐渐与日本恢复关系正常化”。1954年10月，日本成立了“日中、日苏邦交恢复国民会议”。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一直“反共”调子比吉田还高的鸠山，发现国际环境有利于自己“出马”，由他去帮吉田补漏的时机已经显现。1954年11月24日，鸠山另立“民主党”并出任总裁。此前他在政权外徘徊、观望了三年之久，可这次不到一个月，他组建了新政党的同时就当上了新党总裁，接着就组成了新内阁（12月10日），“一气呵成”的速度让人想起第一和第二次吉田内阁。

鸠山出任首相时已经72岁，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党人要在首相的“花道”上走上、走下，假如没有短期内可以完成并且易于解决的问题，上台登场无论如何轮不到他头上。鸠山的政纲有三：修改宪法、重整军队、推进与共产圈国家间的外交。

他的施政纲领同时告诉外界，日本对吉田茂的外交政策存在两方面不满，对美国驻军、付费等问题不满；对与苏联没有结束战争状态不满。能同时解决最好，但首要问题是要苏联对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开绿灯”。

1955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决定开始对苏谈判。日本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泽田兼三在纽约向苏联的索伯列夫常驻联合国大使转达了日本的意向，大选后“第二次鸠

山内阁”成立，政府任命松本俊一为“日苏谈判”全权代表。双方后来约定谈判地点在伦敦，苏联全权代表是驻英国大使马力克。6月3日起双方开始谈判，苏联在6月14日，日本则是在两个月后的8月16日，相互提交了各自的《和平条约》草案。

苏联基本上是将“旧金山和会”时提出的苏方对日提案“全盘端出”。对于恢复邦交后双方签署渔业、通商协定，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相互放弃赔偿权，日本加入联合国等问题，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

但在遣送在押日本人回国、领土、海峡航行权以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日本要求立刻将关押日本人遣送回国，而苏联则回应：“现在苏联关押的日本人是战争罪犯，尚在服刑期间，刑满后才可以释放遣送。”后来苏联释放了一部分并将扣押人员名单交给了日本。

对于海峡航行权，苏联要求日本承认各国商船可以在根室、宗谷、津轻、对马海峡自由航行，而军舰只能是周边的国家才可以航行。同时要求日本不能与任何一个参加过对日战争的国家联合或者结为军事同盟，明摆着要求日本中立。

领土问题，苏联要日本按着苏联的要求办；可日本提出要苏联归还南库页，千岛群岛或至少要北方的四个岛。

8月11日，河野到达伦敦，松野告知谈判进展相当顺利，河野表示：“我要去华盛顿，同重光一起会见美国领导人，在美国那边没有结束以前，请你不要让谈判进展得太快。”

日本摸清了苏联的底牌之后，转向美国求援。最初鸠山要派重光赴美，而杜勒斯以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待为由，拒绝他前往美国。8月下旬，重光终于实现了美国之行。与他同行的还有民主党干事长岸信介，而河野从英国伦敦到美国与他们会合。

重光在纽约对杜勒斯称：由于现行条约只有日本为美军付费，但是美军没有承担保卫日本的任务，导致国民反美情绪高涨。但杜勒斯反击说，美军没有承担义务问题在日本，而非美国。因为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能向海外派兵，日本不保卫美国，美国也因此无法保卫日本，日本提出要将协定修改为对等同盟条约无法理解。

9月1日，日美发表联合声明，称日本将为保卫西太平洋做出贡献。

重光对此发表谈话：“双方议论了向海外派兵的问题，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8、9月期间，日本国内政治也在悄悄发生巨大变化。

“正当松本在伦敦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会见了社会党的铃木茂三郎。大约是8月底或9月初”。[12] 松本也回忆说：“自从重光外相同岸干事长、河野农相一起从华盛顿回国以后，保守党合并的步子却突然加快了”。



9月中旬，日本通知松本暂停谈判。9月21日赫鲁晓夫在接见到访莫斯科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了苏联的不满。赫鲁晓夫指出："上一次苏联政府曾和德国总理阿登纳之间进行过非常艰难的谈判。可是只有五天就解决了德苏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然而伦敦谈判，日本方面却与此相反，已经白白浪费了四个月的时间。我的印象是日本政府故意拖延谈判。伦敦的松本全权和马立克全权代表只是一味喝茶，几乎没有谈及两国友好关系的问题。"

日本一方面有意放慢谈判，另一方面在国内制造反苏舆论，称谈判没有进展，被扣押日本人无法尽快返回，责任在苏联。

在英国进行谈判的松本回忆道："保守党合并的演变，将左右这次谈判命运。"他于9月22日离开伦敦，10月1日到达日本。

日本是二战中的战败国，自恃有美国撑腰的日本，不但与苏联"对等"谈判，而且态度强硬，战败国竟然向战胜国提出"归还领土"要求，日本对战胜国的态度完全是商人式的，利用美国压苏联，知道了苏联的"底牌"之后反过来"压"美国。日本认为给美军的驻扎费不能白付，美国要帮助日本获得领土，否则我们就请你们走人。而对苏联，日本以美国的同盟国自居，你不满足我的领土要求就无和平可言，日本不与苏联签署"和平条约"。

通过接待来访的日本人，美国大致了解了日本的想法。一，希望美国继续留在日本，二，日本想削减付费，同时还想指挥美军。用日本的话来说就是"强化"两条约，摆出一副准备跟邻国再打一仗的架势。日本高调宣传自己有"和平宪法"，而文字上的"和平宪法"需要行动上的"中立"作为实际保证，可日本的做法是要"修改宪法"，"重整军队"。苏联那边要求日本不要向美国提供基地，尽早让美军撤回本土；日本这边提出要强化"日美关系"，不但继续向美



浮世绘——《大日本名将鉴·阿部比罗夫》

俄罗斯在历史上的绰号是北极熊，正因为有不会结冰的大海阻隔，"北极熊"才没能"漫步"到日本。日本弱小怕熊，希望借助美国雄鹰的力量与熊抗争。阿部比罗夫凭借一把短刀把巨熊干掉，恰恰表现出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

军提供基地，为将《安保条约》变成《同盟条约》，日本要逐渐增强自卫队的实力，直到日本达到满足“日美同盟”的实力。美国以《同盟条约》违反日本的《和平宪法》，同时对美国“不公平”为由，拒绝《同盟条约》。所谓“不公平”是指：美国要承担保卫日本的义务，而日本并没有能力保卫美国，力量不对等就失去了同盟的基础。还有一个问题是，日本跟美国同盟，对手是谁？准备达到什么目的？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好似赛狗场上的电动兔子与猎狗，美国一方面永远不让日本追赶上，同时还诱惑日本：等你追上了兔子我们就同盟。日本武士喜欢“下克上”，让猎狗追上兔子时的危险美国比任何人都清楚。

最初苏联代表曾乐观地估计：谈判“两三个月就可以结束”。之所以如此乐观，是因为 1955 年 5 月 15 日，苏、美、英、法同奥地利签署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保证奥地利的中立。在苏、美两个大国眼里，日本是个战败国，又有“和平宪法”，宣布“中立”是水到渠成的事。

苏联的要求是一贯的，着眼于长远的今后和平；而日本考虑的是现实利益，要领土、在苏联水域上的捕鱼权、释放苏联扣押的日本人、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1951 年签署《旧金山和约》之前，日本就“单独媾和”还是与所有国家一道媾和，社会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在 1955 年 10 月 13 日，“左”“右”两派社会党终于合并了。11 月 15 日，“民主”“自由党”解散，成立了“自由民党”。日本保守派执政，社会党配合的体制从此确立。日本国内的政党、内阁、对外国的认识，都有“上下”“主从”之分，在日本眼里，世界上现存两大对立阵营，美国“最大”“最强”是“上”；苏联是“下”，属于“从”。

苏联方面要求：凡针对曾与日本交过战的任何国家签订的任何联盟及军事同盟，日本均不参加。同时还表明，苏联不要求取消日本同别国签订的协定作为日苏邦交正常化的条件。如果日本国内没有外国军事基地(指美军基地)，苏联可以送两个岛给日本。苏联希望的是以领土换和平。而日本则认为，苏联给领土是因为日本有“皇帝新装”获得的，日本还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

1956 年之后，日、苏间再次开始谈判。

日本对领土的要求依然非常执著，看到苏联方面也开始放缓之后，日本决定再次派遣河野，以进行渔业谈判为名，探测苏联的极限。4 月 27 日开始，河野与苏联开始进行“渔业谈判”。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会见河野时再次强调：“西德总理阿登纳在莫斯科逗留了短短几天，就同苏联恢复了邦交”。对日本久拖不决表示无法理解。而日本方面则回答说，要为和平条约签署积累实际业绩，换言之，苏联必须给日本“送

礼"表示友好。释放苏联扣押日本人，让日本渔船到苏联领海捕鱼。

苏联后来采取的手段是：捕鱼协定谈好了先搁置，等到恢复邦交之后再生效。

日本竭力希望"败于战争，胜于外交"贯彻在日苏谈判中。

5月26日河野回国，重光一行7月29日抵达莫斯科，日本宣布重光为全权代表，7月31日起开始谈判。到了8月12日，这个曾经在美国受到杜勒斯指责的日本外相，突然决定从苏联拿回两个岛，同时让美军从日本撤出。但日本政府拒绝了苏联的方案，指示重光暂时离开莫斯科前往伦敦，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国际会议。在伦敦，重光再次遇到老对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大使馆，杜勒斯表示，如果日本以接受苏联两个岛为条件，欲将美国赶出日本本土的话，那么美国就占领冲绳。8月24日，重光在巴黎再访杜勒斯，美国驻苏联大使波伦也参加了会见，杜勒斯表示，美国的建议，实际上是为了日本将来可以收回来四个岛。

1956年9月，鸠山决定亲赴苏联，鸠山从"花道"登台，就是要解决对苏问题，在位两年，他也希望能从"花道"上尽快退场。两国就以下问题基本上达成协议：(1)宣告两国结束战争状态；(2)交换大使；(3)释放被苏联关押的日本人；(4)签署渔业协定；(5)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领土问题搁置。

10月12日鸠山一行到达莫斯科，日本希望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看是否可以从苏联那里获得领土。10月18日，赫鲁晓夫第一书记提出，由于他有紧急任务需要外出，要求将预计19日举行的签署联合宣言延期举行。日本以为发生意外，生怕苏联突然变卦，坚决主张19日签字，结果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于19日下午举行了签字仪式。赫鲁晓夫仅仅是紧急赶往波兰而已。日本因为领土问题没有与苏联签署"和平条约"，只发表了联合宣言。谈判耗时一年半。[13]

石桥必须解决的"悬案" //////////

在日本历代政治家中，石桥以出任总理大臣时间之短破了记录。

1956年10月7日鸠山访苏，10月19日发表《日、苏共同宣言》。日本国会11月审议承认，11月12日两国政府交换了批准书。访苏归来的鸠山，回国后立刻正式声明准备引退，执政的"自民党"各派开始了继任总裁角逐。

据说鸠山不愿意指名由谁出任继任总裁，"自民党"因此采取了"公开竞选"的方式。宣布参加竞选的有三人，一个是"亲美"的岸信介，一个是"亲中"的石桥湛山，还有"亲台"的石井光次郎[14]。1956年12月，举行了两党合并之后的首次总裁选举，这是保守党第一次正式公选总裁。投票选举的方法是，如果第一轮投票中某一

竞选者所获票数过半，那么该人物将成为新任总裁。假如没人得票过半，那么将末位竞选者淘汰出局，再进入第二轮投票，所有人对前两名进行重新投票，获高票者当选。

在第一轮投票中，岸信介获得223张选票，石井、石桥各得137票和151票。岸的票数虽多，但没有过半，因此进入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选举中，石桥得258票，岸得251票，岸以7票之差落选。从选票的流向分布来看，第二轮选举岸仅增加了近30票，而石桥则大增107票。是岸不得人心？还是有人暗中操作？实际上，结论在3人宣布“出马”竞选之初就已经明了。首先，鸠山内阁完成了日、苏关系正常化，日本认为苏、中一体，都是“共产圈”国家，苏联问题解决之后，日本迫切希望解决中国问题，甚至有可能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力，帮助日本达到目的。而要解决对中国大陆的问题，首先需要选派一个中国能够接受的“选手”。其次，“两中”对“一美”，结果“两中”肯定要大过“一美”。石井总共参加过两次总裁竞选，1960年参加了岸下台之后的第二次总裁选举，他的竞争对手是“亲北京”的松村谦三，他依然是“陪同”做样子。“台湾”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发言已经不具备影响力，日本只想从两岸对立中渔利，实际上根本不将台湾放在眼里。在日本看来，美国是老大，一切要跟着“机轴”转。内阁中也有“主从”关系，鸠山内阁中有重光，石桥内阁中的外相是岸，岸组阁之后的外相是藤山爱一郎。一个扮演“左”；另外一个要往“右”修正。对自己有利时就“拧成一股绳”，无利时就“意见不合”，“主”对“从”有否决权。

苏联之后就是中国大陆，主打对美国的岸没有继任理由。岸在战争期间曾积极参与过战争，战后曾作为战犯被捕入狱，一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物，中国大陆怎么可能接受？

石桥则不同，他既不像战前、战后都是职业政客的鸠山，也没有岸那样的“不洁”经历，石桥战前是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记者，他曾著文反对日本武力对外扩张，他提出过著名的“小日本主义”，他是一个中国容易接受的人物。

石桥与鸠山一样，都是高龄当选，这表明保守势力希望石桥也能像鸠山对苏“速战速决”那样，对华也“快刀斩乱麻”。可石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垫铺，中国方面也没有明确的回应，解决中日之间问题的最大难点是战争赔偿，要日本掏钱可没那么容易。看到对中国问题没有即刻解决的迹象，日本干脆将中国问题搁置，让石桥下台，“右派”岸立刻上台，日本要重回“亲美”路线。

石桥在1956年12月23日圣诞之前组成了新内阁，1957年1月24日告病，然后将政权移交临时首相岸信介，2月22日正式宣布下野。





岸信介要解决的“悬案”

岸信介（1896-1987）是山口县人，曾祖父佐藤信宽曾出任过岛根县知事。舅舅的妻兄是松冈洋佑，他的表弟是吉田茂的女婿。生长在长州的背景，也是他后来飞黄腾达的原因之一。岸于1920年东京大学毕业后，1921年出任农商省高级事务官。“一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的孙子——木户幸一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木户幸一后来不断升官，直到成为昭和天皇的心腹兼智囊，岸也随之不断“青云直上”。

在关东军的邀请下，1936年岸39岁时前往满洲国，出任产业部次长。当时的满洲国，所有部门的正职都是中国人，日本人虽都名为“次长”，可却是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岸每次更换岗位以及就职地，都与后来的战争密切相关，军人在前线作战；岸在后方负责装备保障，他是“编外”军人。在中国东北，岸具体负责满洲的五年开发计划，创建了重工业。

1939年阿部内阁时岸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出任商工省次官。米内、第二届近卫内阁中他都留任，到了1941年10月东条组阁时，岸再官升一级，从次官升任大臣。1943年商工省改为军需省，东条兼任军需大臣，岸任次官，依照岸自己的说明，这次转变是将“消费经济转变为军需经济”[15]，目的在于让所有生产都服务于日本的对外战争，东条兼任军需大臣，而实际工作都是岸在干。为了让岸这个次官具有大臣的实权，东条专门给他安了一个国务大臣的头衔。

进入1944年后，日本国内开始“倒东条”，旨在让东条成为战争的“替罪羊”。在木户的授意之下，岸故意与东条作对，在东条内阁中人为制造“意见不统一”。没有昭和天皇默许，木户不遗余力插手，一个文人大臣怎么敢有胆量去推翻军人首相?！这是一个军人杀文官可以扬长而去的时代。东条不准许岸辞职时他坚决要辞职；半年后东条命令岸辞职时他坚决不辞，东条最终以“内阁意见不一”为由总辞职。在推翻东条内阁的过程中，岸完全听命于木户，向东条“投井下石”。[16]

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后不久，东条内阁中的成员首先被指定为战犯嫌疑，1945年9月11日，岸在家乡山口县被逮捕，接着押解到东京并被关押进横滨监狱。据当时他自己估计，恐怕再也没有可能迈出监狱的大门了。1946年4月29日，东条等28人被起诉，1948年12月23日，对宣布死刑的七人执行了死刑。

远东军事法庭最后以“虎头蛇尾”告终，岸属于“战争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被关押的三年中只被提审过三次。与天皇将战争责任都推给军部、东条同样，岸的“反东条”经历反倒成为他日后“凤凰涅槃”的政治资本。

1948年12月24日岸被释放出狱，1949年2月他在东京设立“箕山社”，实际

上就是岸的政治事务所。1952 年 4 月 29 日《旧金山和约》生效，解除公职令自动失效，他从低调转为抛头露面，将当初的“箕山社”改为“重建日本联盟”。野村吉三郎、重光葵等都是该政治结社的顾问。

岸本人没有参加 1952 年 8 月举行的全国大选，受吉田委派，他于 1953 年 2 月 7 日起出访欧美，计划 3 个月后返回。就在他到达德国时，共产党巨头斯大林于 3 月 5 日去世，日本国内政局骤变，3 月 14 日爆发“混蛋解散”，吉田再次解散国会。岸的弟弟佐藤荣作发电报力邀他回国，3 月 21 日回国后，他以“自由党”党员身份参加大选，4 月 19 日当选，受吉田茂委托，岸担任“宪法调查会会长”。

1954 年 12 月，吉田领导的“自由党”内阁垮台，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鸠山被指定为首相，鸠山内阁成立后不久，1955 年 2 月，鸠山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鸠山的“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岸依然没有入阁，留任干事长。干事长是一个政党的“财神”，他最初加入了吉田的“自由党”，后为筹建鸠山领导的“民主党”出力，接着他策划了“民主”与“自由”两大保守党合并。

虽然岸不是内阁成员，但以民主党干事长身份，1955 年 8 月与鸠山的外务大臣重光、农林大臣河野一起访问美国，他亲眼目睹了杜勒斯呵斥重光的一幕。“日美安全保障”的始作俑者是吉田，鸠山任上没有解决，轮到他出马，肯定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岸的个人经历表明，他个人“变大”与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有“密切”关系。美国占领之初“除恶务尽”，将 21 万人列入“整肃”名单，岸也作为“战犯”被关进了监狱，可《旧金山条约》生效后，不但这 21 万人重返社会，连岸这样在监狱中呆了几年的人后来竟然也能继续从政，甚至当上日本的掌舵人，可见美国政策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而从岸后来的言行来看，日本战败投降、在监狱中的经历，并没有让他对战争有深刻的反悔，只要看看他当政之后的所有表现就知道，在搞阴谋等方面，他比吉田茂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7 年 2 月 25 日，岸内阁产生，国会结束之后，他立刻于 5 月 20 日开始出访东南亚六国。直到 6 月 4 日为止，他访问了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塞龙(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以及台湾。日本首相出访东南亚，战前无先例[17]，战后也是首例。访美之前先访问东南亚，都是为了访美进行的准备。在台湾，他公然向蒋介石提出，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要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起，共同组建“防共产势力保卫圈”。

结束出访回到日本后，岸在 6 月 14 日主持召开了“防卫会议”，决定从 1958 年开始，要将陆上自卫队扩充至 18 万人，实现舰艇 12 万 4000 吨，飞机 1300 架的目标。

6月16日，他带着上述计划访问美国。他率领了一个7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宣称“日美关系进入了新时代”。在访美前就提出，日本最迫切期待解决的问题是：修订安全条约，希望美国归还冲绳、小笠原群岛。

1957年秋起，人类进入了“宇宙时代”。10月4日苏联发射了首颗地球卫星，11月3日又发射了第二颗，重量为第一颗的六倍，同时将一只狗送上了太空。10月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称：苏联的人造卫星意味着苏联火箭已经可以运载洲际导弹，该卫星有重大军事意义。美国宣称自己在国防上落后于苏联，以前的原子弹竞争重新演变为新的导弹竞争。

美、苏之间趋向缓和，双方之间也没有理由爆发一场战争，可日本“闲不住”，日本的保守势力一直忘不了“朝鲜战争”的“甜头”。岸在东南亚的言行已经表明，日本仍期待在亚洲的某个地方再爆发一场“热战”。

按照美国当初的计划，要在日本驻军15年，到1960年时刚好满15年。《和平宪法》已经颁布了15年，按理说“和平”的想法应该深深扎根在日本人心中，日本作为一个战争的加害者，同时又是受害者，选择走与《和平宪法》相符的“康庄大道”是很自然的事，可事情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日本提出要修改《安保条约》，只要求美国驻军人数减少，人少可以有理由少付钱，但并不是彻底让美军返回本土。自1957年8月1日起，美国的确开始从日本本土撤军。在谈判的过程，美国了解了日本的想法。

1958年6月12日，第二次岸内阁成立，这是他要全力以赴修订《安保条约》的信号。

日本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最不满的部分为：

一、条约中美军对日本的防卫义务不明确；

二、美军司令指挥驻日美军，有可能引发与日本无关、但将日本变为战场的战争；

三、条约中没有有效期限和修订、废除条款；

四、日本要求归还冲绳、小笠原群岛。

日本的不满说白了就是：日本为美军驻扎付费，但“高鼻子武士”并不听指挥，他们只听美国总统或者驻军司令的。其次，美、苏对立对日本来说是好事，能相互打起来最好，但千万别把日本变成战场，美军绝不能将战争带到日本。有人来打日本，美军必须与日本自卫队一起“集团防卫”；而美军跟别人打时，日本只愿意“后方

支援”。美、苏之间互射导弹可以，但是美国不能利用日本的基地发射，因为这样一来会引来苏联的导弹攻击日本。日本的所谓“集团防卫”“事先告知”“后方支援”，实际上就是要避免上述情况。

鼓励并怂勇别人相互消耗，但又怕把自己绕进去，这就是日本对“和平”的认识。对于日本提议的“集团防卫”，美国提议要中、美、苏、日四国共同参加，但是遭到日本拒绝，日本只跟美国“同盟”。为了日本利益让美军流血美国也不愿意，日本对苏联有领土要求，也没有签署《和平条约》，万一日本跟美国打起来的话，美军将会“被动卷入”，美国因此提出领土问题是日本自己的问题。

对于驻日美军[18]不听日本指挥，保守势力只朝一个方向思考解决方案：“日本继续付，但今后美国得干活”。似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了，既然“高鼻子武士”拿钱不干活，不再付费让他们回去不就全解决了吗？可这恰恰是日本最不可告人的一部分。明知美国的集团防卫牌在美国手里，日本仍要吹嘘日美是同盟伙伴关系。麦克阿瑟说日本还是个“12岁的孩子”，几个大国都为这个“顽皮的政府”想办法，可周围大国为日本想了的办法，日本并不接受。

日本的“社会党”认为：应该废除条约而不是修改，而保守政府拒绝废除，只希望修改。

1958年11月19日，中国外长陈毅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希望日本中立。12月2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向日本驻苏大使递交了备忘录，表示：“缔结新的日美军事条约将使远东局势更加复杂化，并加深该地区卷入军事纠纷的危机，加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对于人口密度高、领土窄小、物质资源和其他资源又集中的日本来说存在致命危险”，呼吁日本采取中立政策。

日本政府反驳说，日本不选择中立，日本人可以决定为了自身安全选择何种途径。

1959年4月，赫鲁晓夫向日本提议：保证日本的中立，5月再次发表“备忘录”，呼吁日本中立。但依然被日本政府拒绝。

1959年4月，修订草案完成。冲绳、小笠原归还留待将来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不在美军防卫范围内。

修订了之后依然是日本给钱、给地，美军仍不听指挥。如此条约让主谈修订的自民党出面反对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日本刚好有“社会党”，自民党不好出面的事就找他们来出面。“社会党”人反对，原本应该反对在谈判桌上“谈判无能”“自取其辱”的自民党，既然条约内容不能让日本满足，伤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那么自民党自己完全可以从根本上完全推翻这个条约，可日本不愿意如此。自民党找来的社会党，只反对条约中没让日本满意的内容，并不反对“日美集团防卫”本身。



没有将条约改到日本满意的程度不是自民党无能，而是美国人太狡猾。

1959 年 3 月 28 日，社会党集合 134 团体的 620 名代表，召开了“阻止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国民会议成立大会。该“国民会议”自 4 月 15 日第一次统一行动，到 1960 年 1 月新的安保条约批准时为止，总共采取了 11 次阻止修订安保条约的统一行动。1959 年底，国会内审议通过，1960 年 1 月 18 日，《新安保条约》和《新行政协定》在华盛顿签字。

在日本国内，在审议通过该条约的过程中，上演了种种闹剧。

1960 年 1 月 11 日，日本代表团赴美签字，但岸首相一行在机场受到学生的阻拦。学生占领了休息室，后警察逮捕了 79 名学生。

岸签署协定从美国回来后，国会开始审议讨论。其间发生了苏联击落侵犯苏联领空的 U-2 侦察机事件。

示威游行的学生

1960 年 1 月 15 日，岸信介首相前往美国参加《新安保条约》签字仪式，700 名学生到羽田机场静坐阻拦，后与警方发生冲突。该条约在日本国会审议期间，日本各地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抗议示威集会。





日本外务省4月13日宣布艾森豪威尔将在6月19日访问日本。

1960年5月19日，国会为审议该法案，国会于深夜开始开会，而社会党议员无法进入会场，无法参加表决。实际上，岸领导的自民党在国会中拥有287个席位，即便社会党人参与投票表决，也无法阻止该案获得通过。5月20日凌晨0时5分开始审理。后来在社会，民社两党和自民党反主流派缺席的情况下，审议通过。

5月20日，“社会党”“民社党”“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主张众议院中的表决无效。他们对政府以及自民党的“非民主手段”提出严重抗议。5月20日之后，全国开始了反对示威。社会党人用拒绝出席国会来抵制国会内的其他议案的审议。很多团体也同时发表声明，抗议自民党强行通过审议。在日本各地，规模不一的抗议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全学联的7000人游行队伍冲入了国会附近的首相官邸，与那里的警察以及机动队发生冲突，有40多人负伤。警视厅在国会正门前布置了装甲车，设置了阻止游行队伍的路障。

根据宪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参议院对众议院的决议，30天内不作出决议，众议院的决议生效。依照“自然生效”的法律条文，5月19日通过的众议院议案，在今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参议院即使不审议，一个月后的自动生效之时，刚好是艾森豪威尔抵达日本的前一天。

6月10日，为艾森豪威尔访问日本来打前站的美国白宫新闻报道官抵达日本，出机场时遭到学生围困，有示威者爬上了他乘坐的轿车，警察在十几分钟之后才赶到现场解救。6月15日，大约7000多名学生闯入国会，学生与警察爆发冲突，其间一个女学生被踩死。日本以无法保证安全为由，于6月16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会议通过了取消了艾森豪威尔到日本访问的决议。6月19日深夜零时起，《新安保条约》自动生效，此后，示威游行立刻销声匿迹了，岸在23日宣布辞职。

修订后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部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换言之，岸完成了部分任务。日本特别期待的四条当中，有两条获得了修订。旧条约没有明确期限，新条约中有“十年期限”；旧条约中美军可以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在日本的美军基地，新条约中增加了美军的“事先告知义务”。这一条主要是怕美苏之间爆发战争，将日本变为战场。但日本最期望的事项没有解决，依然是日本付费，美军不保卫日本。

无论从美国的尊严还是近代日本向美国不宣而战的经历来说，美国无论如何不会答应成为日本的雇佣军。美国不缺钱，不会因为日本支付点驻扎费，就让美军为保卫日本流血；还有，美国不可能站在自己二战对手的一边，去向二战中的盟友宣战。

1952 年前吉田茂与美国谈判时，一边谈判，一边私下对反对派做工作，说明



"单独媾和"的好处,让反对派不要反对。1959 年,被称为"昭和妖怪"的岸信介用的却是另外一种方法:一边谈判,一边找反对派来反对。"言行不一"的日本人总是无法让人放心,仅有一纸《和平宪法》并不表明日本一定不会再发动战争,何况日本一直宣称要"修改宪法"。美国声称只有在日本具备保卫美国的军事实力之后,美国才可能保卫日本。可美日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好似赛狗场上的猎狗去追逐跑在前面的电动兔子,猎狗永远无可能追赶上电动兔子。同样道理,美国永远不会让日本在军事实力上追赶上美国。日本情愿继续玩猎狗追电动兔子的游戏,这个游戏可能在 21 世纪还要再持续几个 10 年。

---

[1] "事先调查"之意。

[2] 日本的歌舞伎,演员在众人瞩目中登场,演出结束后,轰轰烈烈地退场。

[3] 石桥湛山著《湛山回忆》每日新闻社 第355页。

[4] 参照《吉田茂的执政生涯》第235–240页。

[5] 前不久脱离"自由党",参加"民主党"的芦田均和前任"进步党"总裁币原等人成为该党的核心。

[6] 猪木正道著《吉田茂的执政生涯》 江培柱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第245–246页。

[7] R·B·特克斯特著 下岛连译《美国在日本的失败》文艺春秋出版社(1952年)东京 第132页。

[8] 转引自《吉田茂的执政生涯》第260页。

[9] 社会党人到1994年才第二次执政,1995年是日本投降50周年,好似以前保守分子将政权交给社会党人那样,这次保守分子依然让社会党人"挑战难题"。此前金丸信贪污、腐败丑闻被揭露。

[10] 参考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斐阁选书 第89页。

[11] 当时的固定率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1亿5500万美元等于540多亿日元。

[12] 《鸠山一郎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00页。

[13]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迅速上台,9月底访问中国,为签署"联合宣言"只谈判了几天,可后来为签署《和平条约》,谈判进行了六年。原因也是领土问题,日本要中国将钓鱼岛给日本。

[14] 久原是"日立"和"日产"公司的创始人,是曾经"支援孙中山革命"的久原房之助的女婿。

[15] 《官场六十年》商务印书馆 第38页。

[16] 在东条被绞死、已经死无对证的时候,岸给出的推翻东条内阁的理由是:"塞班岛陷落后,如何提高国民士气,把战争进行到底"。《日本经济新闻》1954年10月27日晨刊"我的反抗历史"。

[17] 只有东条出访过缅甸。

[18] 以前日本揶揄GHQ是go home quickly 的缩写,这表明日本很希望美国军人能够早日回到他们的故乡。可日本对"和平"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思维,让美军在日本驻扎了60多年。不知日本还准备与美国"集团防卫"多少年。

第十一章 “洗脑”（せんのう）——战后的关键词



八位老兵的人生

日本学者野田正彰，以“战争中的罪的意识的研究”[1]作为研究课题，在获得日本文部省（1995）资助后实施了他的课题研究。他以几个从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为对象，通过对他们进行访谈，结合他们以前出版的回忆录，将老兵们的回忆与作者的议论结合起来，完成了他的专题研究。[2]

野田共访问了八位日本前老兵，八人中的两个前军人在战争结束前返回了日本，这两人没有在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的经历。与其他六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两人的战争回忆都说亲眼看到过其他日本军人对中国人残暴，而他们自己则没有参与。另外六个人有过被中国战犯管理所关押的经历，他们都承认曾亲自参与并实施过刺杀活人、解剖活人“练刀”，这些都是日本军队针对新兵设置的“练胆”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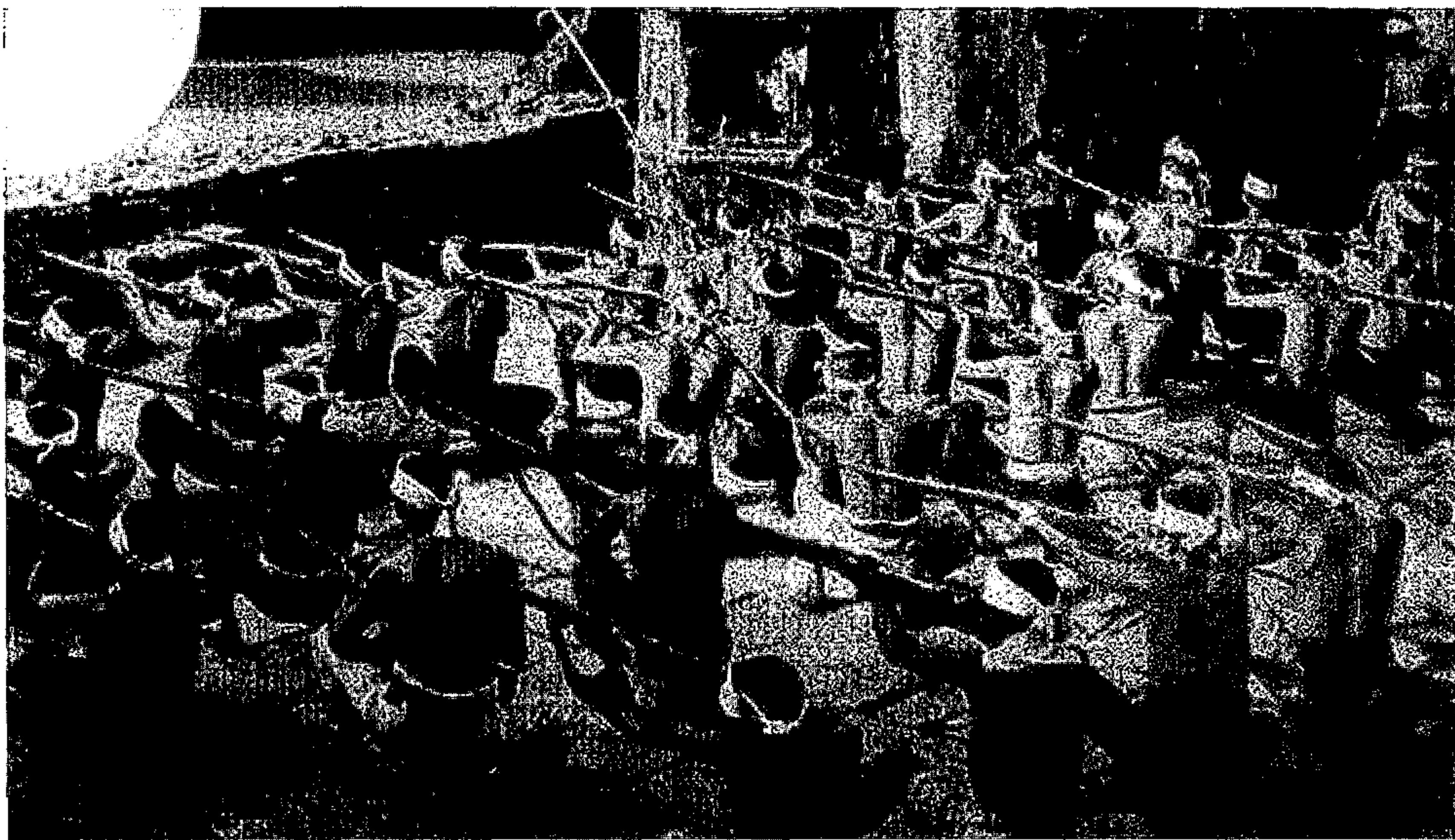
姓名	出国前状况	加入军队动机	反省与转变	归国后
尾下大造（1922年出生）	出身于岐阜县的农民家庭，七兄弟中的老二，小学毕业后在家帮忙，1940年底进入军队	家中贫困，希望早些结束兵役，能够在中国长期居留并致富	在中国以及菲律宾战场，看到的都是日本军人屠杀、抢掠当地人	没有在中国被关押的经历，1945年9月1日在越南得知日本投降，1946年4月回国。
小川武满（1913年出生）军医	中国旅顺生长，中产阶级家庭，四兄弟中的老二	军人子女，以加入军队为荣，希望飞黄腾达。	解放军攻入北京前返回日本	没有被中国关押的经历。1948年底回国，战争让他失去了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只有他一人活到战后
（1）小岛龙男（1917年出生）	他出生于东京，父亲经营着一家大米批发店。毕业于东京外国语专科学校	希望出人头地。烧、杀、抢、强奸，绑架中国劳工去日本，干尽坏事	1945年8月在东北被俘，押解到苏联强制劳动五年，1950年7月，由苏联转交中国	1956年9月回到离别17年的日本，因反战被指责"被洗了脑"
（2）汤浅谦（1916年出生）军医	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医生家庭，九姊妹中的老三	具有强烈的个人膨胀欲望。	1951年1月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它战前是日本的一所监狱	1956年回国，刚开始的六年，为了生活沉默，后开始揭露战争
（3）富永正三（1914出生）	熊本县人，东京大学毕业	进入满铁后再加入军队，希望"变大"，而中国是他实现梦想的舞台		1956年释放后回到日本，多次找工作受挫，理由是他被洗脑
（4）永富博道（1916年出生）	熊本人，日本出生，朝鲜生长，大学毕业	要升官	1949年4月被解放军逮捕，1956年法庭判处他13年监禁	1963年被释放回国，每次找到工作后都被公安骚扰
（5）三尾丰（1913年出生）宪兵	岐阜县深山里的一个贫苦人家的次子，小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养蚕	1934年入伍后来到中国。后加入了工资高、晋升快的宪兵	1945年8月在东北被苏军俘虏并带往西伯利亚，1950年被转送中国	1956年免予起诉回国。42岁。多次找工作都因为警察的干预，最终失去了工作
（6）土屋芳雄（1911年出生）宪兵	山形县贫苦农民家庭，七姊妹中的长子	家中极为贫困，希望尽快晋升，自己发财，也为父母盖房子	1931年入伍并来到中国东北，34年加入宪兵后一直在齐齐哈尔	1956年回国。因为有反战言行被日本警察跟踪，指责被中国"洗脑"

“洗脑”说的缘起

野田的研究报告共有17章，其中关于“洗脑”的“洗脑人生”“摆脱洗脑”就占据了其中的两章。汉语中没有“洗脑”这个词，可它在日语中却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常用词，该词的另外一个近义词是用外来语表述的“思想控制”（mind control）。作者的研究课题为“罪的意识的研究”，顾名思义，作者欲对“罪的意识”进行挖掘，探明其生成原因以及形成过程。“洗脑人生”与“摆脱洗脑”是前老兵们“染黑”与“洗白”的双重人生经历，同时又是他们从“无罪”到“有罪”意识发生改变的分水岭。“洗脑”是“罪的意识”研究课题中的关键词，老兵们从“忠勇皇军”认识转变为“万恶不赦的罪人”，其间经历了日本战败、被俘关押以及被释放回国与家人重新团聚、重返日本这会这样一个轮回，这样的经历促使他们“罪感”萌生，而“罪

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民众

日本“明治一新”之后，日本民众深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对战争产生了近乎于病态的狂热。军国主义教育的根本就是“洗脑”，用“上下”、“强弱”、“优劣”、“内外”来建立双重标准，鼓励民众到外国去当强盗，并将其美化为为国、为民的壮烈行为。





感”之有无始终围绕“洗脑”而展开。

老兵回国后抱有自己是“万恶不赦的罪人”的想法，因此与前集团成员之间出现了思想认识上的鸿沟，而前集团成员立刻将这种差异规定为“被洗了脑”。也就是说，原集团成员的深层集体无意识是：“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没有罪”。他们战争前如此，战争后依然如此。“杀人”究竟是“善行”还是“罪行”，大脑中“有罪”与“无罪”意识之萌发，并非来自行为本身，而来自集团内外的双重标准。在本集团中，言行中“对上不恭”都属于无礼、粗暴，杀人偿命更是维护本集团秩序的铁的法则。可本集团之内的“礼”“纪律”“法律”，到了集团之外便失去了约束力，杀人越货在本集团中是危害巨大、必须严惩的行为，可针对集团之外的成员则是“勇猛”的代名词，杀人越多，抢夺回来的财富越多，表明对集团的贡献越大。军人们走向中国战场之前，日本国内就如此反复灌输，通过现实的赏罚的榜样让日本军人形成了“杀中国人无罪”的集体无意识，战后迅速从中国逃回日本的前军人没有过上述思想转变，他们仍处在战争前的同一状态上。

日本文人喜欢用“关键词”作为反映国民性差异的重要线索，“洗脑”一词在汉语中没有而在日语中有说明，“洗脑”是两个民族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归国老兵坦承，来中国之前、被关押期间、被释放回日本之后，对“洗脑”的感受并不十分强烈，强烈感受发生在回国之后被前军人“战友”指责“被中国洗了脑”之后。

在中国期间只想将罪行都“交代”了就可以获得宽大处理，能够早日回日本与家人团聚。回国后他们首先面临就业问题，有各色人物主动积极地为他们介绍工作。可当看到他们都表现出反战情绪后，尤其是他们有些人在履历书上明确写明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之后，所有可能到手的工作都没了，而拒绝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的理由也同出一辙：“你在中国被洗了脑。”也就是说，是非标准不一样，就会被贴上“被洗了脑”的标签。老兵们因此多了一种感受和疑问，如果与他们的“战友”同样没有改变就不会被指责为“被洗了脑”，而从前至今一直没有变化，不正是因为“被洗了脑”但自己一直没有察觉吗？

（1）小岛于 1956 年 8 月被释放，据小岛回忆：“当时想的只是可以回国了，关于不起诉的理由根本没有考虑。按照当时的认识，也就是这种水平。并非是真正觉得自己有罪。从旅顺乘车前往天津，因为能回国，兴奋得无法入睡。满脑子装的都是日本。”

回到阔别 17 年的日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他要找工作。回国后，以前的大学老师和亲友都积极伸出援助之手，热心地帮他介绍工作，可因为他从中国回来，被贴上了“赤色”“被洗过脑”的标签，就业遇到很多困难。最经常“关心”并且

访问他的是公安警察。另一方面,自卫队却向他频频招手,以前他是军人,现在还让他当军人,有人以"帝国前军人的归宿应该是自卫队"为由极力向他推荐。他拒绝后才恍然大悟:"中国人说的果然没错"。因为父母尚有开米店的祖产,他在家帮助父母开店。工作了一年之后,他进了一家贸易公司工作。

找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将心比心"时才让小岛重新回想起中国:"日本人在战争中死亡了300万,所有死者家属至少知道亲属死在什么地方,而在中国,有数百万个家庭的亲属下落不明。"

(2)1956年6月汤浅被免予起诉释放,7月回到他阔别了14年的东京。很多人前来迎接他,迎接者中有原来军队中的医师和护士,他们之间的对话,让汤浅觉得自己与前来迎接者之间已经存在思想上的巨大鸿沟。

"汤浅,你怎么会是战犯?那场战争是正确的呀!你坚持这样说了吧,用不着遮掩。"

"一起参加过活体解剖的人,对以前的事情没有丝毫悔过之意。"也就是说,只有从中国释放回来的前战俘们,他们对自己以前的"犯罪行为"悔恨不已;在日本的前军人没有任何"犯罪感"。

"华北方面军有30万人,共有20多个陆军医院,军医加起来有数千人,卫生兵与护士加在一起也有几千人。所有人都对以前的事情保持沉默。"

(3)富永1956年回到日本,因他在求职简历中写下:"极度厌恶战争,今后要在反战和平中生活"的感想,结果多次求职碰壁,各单位拒绝富永的理由都是"被洗了脑"。找不到工作,社会拒绝并排斥他,只有日本的公安调查官觉得他"有价值",经常来他家找他。同样毕业于东京大学并曾在中国东北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岸信介是A级战犯,他从牢里放出来之后竟然当上了首相,这样的人领导日本,可以想象对战争的反省能够进行到何等程度。深刻反省者成为了另类,集团的"叛徒"。

(4)永富博道,日本战败后他依然在中国山西为非作歹,直到1949年4月山西解放,他于12月被逮捕。永富因罪大恶极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刑期从逮捕之日起算,当其他人于1956年被免予起诉被释放回日本后,他还有七年刑期,最终于1963年9月被释放回国。野田称永富的人生是"洗脑人生"。

永富当年是作为出征英雄被"欢送"出国的,回国时他已47岁,求职时只因他有反战思想而多次被拒,遭拒绝的理由是:"你在中国被洗了脑"。日本社会拒绝"不同声音",要用惩罚手段强制服从,只因他们批评战争,周围的人就给他们贴一个标签:"应该到医院去检查,看脑子是否有毛病。"当他们揭露战争丑恶时,外界的回应是:"给日本陆军抹黑……你这样也算前帝国陆军的军医吗?"

他们曾经是“无犯罪意识集团”中的一员，永富回国时日本已经进入了高度增长时期，对前皇军的奖赏是给他一个糊口的饭碗，即便如此他也不断被日本警察跟踪、监视，好容易进入道路公团工作，由于警察不断来骚扰，他后来不得不辞职离开。

保守统治者不允许成员有与集团不一致的想法，反思自己的罪恶就是背离集团，就是“外”，属于被排斥、清除的对象；反之，假如他继续坚决追随保守政府，则会获得很多“好处”。

（5）1956年夏天，前宪兵三尾丰乘船回到日本。用他的话来说，最能够充分体会到做人的感觉，还是在后来与妻子及三个女儿一起生活的后30年。他在中国被俘后，家人先回了日本。他被释放回国后，让他感觉反差最大的就是：日本警察用以往他对待中国人的手法对待他，他在哪里就业，警察就跟到哪里，到处散布“三尾在中国被洗了脑”。1965年他离开东京前往大阪，在那里才最终安定了下来。

虽然三尾等在中国干尽坏事，可中国人让他们健康地活着回到了日本，让他们与家人团聚。而迎接他们的日本社会，给他们最多的是冷眼与排斥。日本统治者情愿他们死在异国他乡，将他们作为“英灵”供起来，远比他们活着回来说真话好，这样方便统治者继续欺骗其他国民，他们活着回来会揭露战争的残酷、丑恶，让“裸身皇帝”暴露在大众面前。日本军人活着回来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人的宽大胸怀，而这一切会揭穿统治者的谎言。许多前军人即便觉得自己有罪，也希望所有同案犯集体保持沉默，这样就可以将丑恶一直掩盖下去。当被俘释放老兵强调中国政府对他们非常人道时，很多日本人的看法是：在收容所不要劳动，每天只要学习2、3个小时，吃得好，又不干活，谁都会说这样的反省好。

似乎中国将这些战俘当“菩萨”一样供了起来，要“收买”他们回国策反。一个人恢复了良知，日本却反诬他们“被洗了脑”，日本皇军“竟然替中国说好话”。

前老兵们的真正转变，均发生在他们回国之后。

（6）1956年7月土屋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到他家乡山形县的上山站时，大约有四五百人前来迎接。迎接者挥舞着“祝归还（庆贺归国）”的旗帜，同时还有日本国旗。市长助理代表市长做了“慰劳演说”，然后让他们这些“归国军人”列队回家。一切与他当初当兵，有很多人送他前往中国时一样。

土屋在欢迎他的仪式上发言说：“作为关东军宪兵，对中国人民干了许多坏事，要深刻反省。”只因他有这样一个发言，事后他立刻被警告：“你被洗了脑，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在土屋看来，日本和平了，只是外表比以前富裕了，其他则与过去一样，丝毫没

有改变，唯一改变了的是自己。

土屋以前为军国主义卖力，平安回家并发表反战言论，这让他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他被视为危险分子，以前他跟踪别人；现在他被别人跟踪。因为他在多种场合揭露战争，揭露日军的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很多匿名者给他写信，称他“被中国人、被共产党人洗了脑”。

身在中国的“集团中人”

小岛龙男 1917 年生于东京，父亲经营着一家大米批发店，他中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1939 年 4 月毕业后进入了“北桦太石油会社”。[3] 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他没有去公司所在地上班，[4] 在东京当了 8 个月的公司职员后，于 12 月应征入伍，1939 年底开始在中国服役，1941 年 10 月升任少尉。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前为止，他主要在中国山东活动，指挥 150 人的部下在山东为非作歹。1945

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在掩埋被虐而死的中国人

从 1932 年到 1945 年，因“魔鬼部队”七三一的细菌实验而死的中国、朝鲜、苏联平民与战俘超过 10000 人。这其中，又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惨死在“试胆”的日本新兵手中的呢？这就是日本“解放亚洲”的实质！



年5月调到关东军司令部，[5]日本投降后他被押解到苏联。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950年7月18日，他与其他968名日本军人一起，被苏联转交给中国。

据他供述：新兵到中国后必须经历"试胆训练"，步枪部队是在步枪上装上55厘米的刺刀，然后对绑在树桩上的中国人猛刺。小岛属于机枪中队，因他们没有步枪，上级命令他们用55厘米的刺刀，直接刺向绑在树上的中国人。一次、两次、三次、刀刃都一插到底，中国人身体中喷出的鲜血让行刺者满手都是。中国人被刺的血肉模糊。

还有一次他带领部队扫荡时被游击队包围，日本军中的一个中队长被打死，为了报复，小岛率领日军将全村的中国百姓，不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死。[6]

汤浅谦1916年出生于东京，是一个医生的儿子，1941年3月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10月加入军队，同年升任中尉军医，1942年2月到中国山西。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依然留在山西为阎锡山的军队服务，1946年在中国结婚并育有3个子女，1949年太原解放后他继续在省立医院工作，1951年被逮捕关押。作为军医的汤浅与小川，永生难忘[2]的经历是将中国人放在手术台上，他们这些从日本新来的医生，以解剖中国人作为练习胆量、提高医术的手段。

据他本人供述，从他到中国之后直到日本战败时为止，他共参加过7次活人解剖，共杀死14名中国人。

1942年3月中旬，他刚到陆军医院一个半月，这时他首次参加了"活体解剖"。某日午饭后院长通知说："下午进行手术演习，全体人员1时到解剖室集合。"下午到达解剖室后，有两个双手被反绑、由持枪士兵看管的中国人被带了进来。周围的人在说笑，一个同事告诉他说，"八路全部该杀"。两个中国人被分别押上手术台后，被注射麻药，接着实习医生开始动刀"实习"。切开肚子，再缝合，反复多次。另外一个中国人被锯掉上肢，然后再缝合。到了下午4点，一个人已经死在了手术台上，而另外一个人仍在呼、呼喘气，院长向他的心脏注射了空气，没有效果；汤浅用双手掐他的脖子，依然没有断气，再来两个医生用绳子勒，还没有死，最后再注射麻醉，然后将他埋在了一个坑里。

富永正三出生于熊本县的一个破落大地主家庭。中学时他父母双亡，唯一一个照看他的祖母也在他毕业之前去世，后来他被大姐领养。小时候，他的最大感受就是孤独。凭借个人的努力，他最后考入东京大学，与其他几个人相比，他是一个自我奋斗的典型。儿时的不幸经历，并没有化为对有同样生活处境者的同情心，相反，他具有比其他人更加强烈的"变大"野心。1939年大学毕业后，他决定去中国满洲工作，之所以选择中国，也是因为那里的工资比日本国内高。1940年2月他加入熊

本步兵，1941年8月升任见习士官并被派往中国湖北，1943年成为中队长。他主要在湖北一带活动，1945年7月被换防到东北，一个月后遇到日本战败投降。他被苏联红军俘虏并被押解到苏联，1950年被送交中国政府之前，一直在苏联被强制劳动。引渡给中国方面之后，先被收容在抚顺，后因朝鲜战争升级，他被转移到哈尔滨。1951年3月，被告知美军被中国军队打败，他再被转回抚顺。

1941年9月，他亲身经历了“杀人练胆”。

在预定杀人练胆的前一天，“指导教官田中少尉把我们带到联队本部关押中国人的地方，那里地上铺着麦秆，好像是马厩。他指着关押在里面的中国人说：‘这是你们明天试手的材料。’那些人瘦弱的样子令人吃惊，问其缘故，原来是为了明天的计划，几天来几乎没有给他们饭吃。

“当我到达现场时，24名俘虏被反绑着双手，眼睛蒙着毛巾坐在那里。他们前面挖了一个长10米、宽2米、深3米多的大坑。联队长下令‘马上开始’，随即命令士兵拉起一个俘虏，不顺从就用脚踢，拖拽到土坑前。田中少尉对我说：‘人的头要这样砍’。他拔出军刀，用舀子从准备好的木桶中舀起水，浇在刀身的两侧，在俘虏的背后叉开双脚，弯下腰，军刀举向右上方，摆好姿势。军刀向下劈去，人头飞落出了一米多，从左右两侧颈动脉喷出两股血柱，人体翻落入坑中。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凄惨的情景，一切按顺序进行，我是第四人。”[7]

永富博道1916年出生于熊本县，家里经营着一家旅馆，13岁时随家人前往朝鲜，1934年考入国士馆专门学校（今国士馆大学）。他是六个人中罪孽最深重的一个。他与许多“右翼”人物相识，曾主动、多次拜访过头山满。1937年12月，他作为“爱国学生联盟”国士馆的代表来到南京，一路上他到处看到中国人的尸体。在南京，日本军官拉来了七八个中国人对他们说：“你们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同行的日本学生听到可以用自己的手法杀死中国人，就用在日本学到的柔道、空手道招式，对中国人乱打、猛踢，可如此这般也并没有将中国人杀死。最后日本军官抽出战刀向他们表演，一刀下去就将一个中国人的人头砍了下来。永富是剑道四段，他仿照军官的样，后来也砍下了一个中国人的人头。回到日本后，没等到学校毕业他就加入军队，1938年2月起在长江流域一带从事特务活动。

1941年4月他转入山西的日本军队，新兵训练结束的最后一课是刺杀绑在木桩上的中国人。日本投降之后，他继续为阎锡山军队卖命，1949年12月他在山西被捕。1946年结婚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当时也在中国，她们于1953年回日本。永富在太原战犯管理所被关押到1952年底，因罪恶深重且被捕后改造效果不大，于1956年6月被起诉，判处13年徒刑。后被转送到抚顺关押，1963年9月被释放回国，



当时47岁。[8]

三尾丰1913年11月出生在岐阜县和长野县交界的深山里，是一个贫苦人家的次子。21岁(1934)加入军队之前一直在家务农。加入军队的动机很单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1935年转入宪兵，宪兵的工作是抓捕"反日"的中国人，他当宪兵期间，抓捕并拷打了很多中国人。三尾在中国干宪兵一直干到日本投降，假如没有日本投降，或许他将一直干到退休。他一直将所有中国人都看成是潜在的抗日分子，动辄抓入宪兵队关押并拷打。

土屋芳雄1911年生，上学时学校教师不断地向他们灌输"开拓满洲"，20岁(1931年)那年他应征入伍。加入军队的朴素理由是：当兵一年半期满后，可以留在满洲工作，他要攒钱为家里盖房子。

与所有人一样，他入队两个月后的1932年2月，上司就交给他们六个中国人，让他们"练胆量"，老兵将三个中国人的头砍了下来，剩下的三个人留给新兵，让新兵刺杀。他毫不犹豫地将中国人刺死。

1933年土屋从一般军人转入宪兵，刚刚加入宪兵队，他就开始练习如何拷打中国人。将一个进城买东西的农民抓起来，双手从背后捆住再吊起来，脚上再绑上石头。打完了再用烙铁在身上烫，灌凉水，用针刺指尖。中国人被连续折磨了五天，日本人从他身上没有获得任何希望得到的口供，看到中国人已被摧残得没有人样，"考虑到放出去会影响日本的声誉"，最后让他成为斩首练习的对象，土屋亲眼看到该中国人的头被砍下来。

日本新兵以杀死、砍死中国人作为"练胆"手段；新入行的年轻军医拿中国人作为活体实验品"练刀"，前者是为了增加这些军人屠杀更多中国人的勇气；后者是为了提高日本军医的医术，以拯救更多在战场上负伤的日本军人。

有罪认识的萌生

战败前日本军人任意屠杀中国人，日本投降了，这下完了，自己落到了中国人手中。一想到自己的结局一定会像以往自己对待中国人那样，被俘日本军人将面临酷刑或入狱、枪毙，被俘日本人就不寒而栗。为了逃避惩罚，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隐瞒罪恶，再有就是将一切推给战争、推给上司。"自己是一个士兵，服从命令是

天职”。战争本身丑恶,自己当时是军人,将从事罪恶活动归因于“要服从命令”,让自己扮演无奈、无辜的角色。以前曾是屠杀中国人“勇武无比”的“帝国军人”;被俘后立刻变成了要偷生怕死的卑怯的胆小鬼,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保证自己能够活着回去。

但是,不但他们最担心的、被中国人集体杀戮的事情没有发生,而且从未有过任何酷刑及虐待,连体罚都没有。看管干部只让这些被俘的日本军人坦白交代罪行。最初他们基本上是避重就轻,不想真心地将自己的罪恶交代出来,而是要在所有罪行中拣出一个“能够使自己成为可以原谅的罪犯”的内容来写。[9]

小岛被苏联红军逮捕并带到西伯利亚强制劳动五年,1950 年 7 月由苏联转交给了中国,原本以为可以回日本的他,得知还要在中国继续坐牢,他对未来尤其感到不安。

在苏联,记忆中最深刻的内容是那里吃不饱,每天干苦活。虽然没有残酷使役,但也没有作为战犯进行坦白、调查。到了中国,所有人最害怕的是自己的罪行暴露,因为每个人的双手都沾满中国人的鲜血,每个人都罪孽深重。他们最大的恐惧是:如实交代的话,中国人会以它们作为断罪依据,或者说套取了他们口供后将他们杀掉。

小岛看到战犯管理所中正在修建烟囱,他立刻胡思乱想锅炉烟囱是为烧死这些日本战犯而建。小岛想自己必死无疑,因为他在军队中的时候,假如听说日本兵被捕或被杀,他们总是要杀死更多的中国人作为报复。[10]

中日两国对待俘虏的不同表现

左图是抗战期间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士兵,中国人的胸怀是将“强盗”也当人看;右图是被日本人抓住的中国人,身上血迹斑斑,日本人对待中国人比对畜生还恶劣。两张照片是两种现实的缩影,日本老兵在中国人的宽大中产生“有罪意识”不足为奇。






中国方面的“善待”让他们感觉“不可思议”。从苏联引渡给中国时，中国方面安排了干净的客车，派会讲流利日语的管理人员以及医生、护士迎接他们。

中国方面没有强制劳动，每天保证充足的主食及副食供应，没有暴力，没有任何侮辱，有病给治，中国方面严格依据国际法对待俘虏，而日本俘虏却认为，这是杀死之前让你活着。甚至将中国的这种对待看成是中国想用他们作为与日本政府、美国政府进行交易的筹码。前老兵们总是用原集团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国人。

被苏联转送到中国之后，他们吃上了五年来的首次大米饭，管饱不算，菜也有三四个。一次仅仅因为中国方面原因没有能提供大米饭，中国方面还向俘虏们解释："今天用馒头凑合一下，炊事员回去了，没法烧饭，从街上买了馒头。"

小岛将这些与日本人扣押中国人时的情景进行了对比。"我们所干的是舀起一碗浸泡在水中的剩饭放在那里，（中国人）爱吃不吃。刑讯拷问，吃喝拉撒都在原地。看没有口供了，就交给宪兵队'处分'（杀死）。"

以前小岛给抓来的中国人吃东西，有时甚至给吃“好东西”，目的是为了做“交易”，为了从中国人那里套取口供。看到被抓来的中国人有“利用价值”“使用价值”才给吃的，一旦认为没有口供、没有价值时，就立刻杀掉。在中国遇到反抗，就迁怒于所有中国人，有一次将一个村庄的男女老幼全部杀死。

小岛多次参与了在中国的“抓兔子”活动，1942 年 9 月起到年末，日本由于强壮劳动力大多走上战场，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将战争进行下去，日本军部下令各地军队强抓中国人、朝鲜人去日本干苦力。

“中国人被抓到日本，他们吃不饱，遭到日本人的任意殴打，患病后就被弃置等死。劳工们到了冬天也没有衣服，用水泥袋子裹在身上，打着哆嗦劳动，很多人就在思念自己的故乡、亲人中死去。”

劳工们的亲人很多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行踪。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世世代代的家园中和平地生活，仅仅因为日本需要战争奴隶他们就被强行掳走；仅仅因为日本人想过“人上人的日子”，中国人就在他们的烧杀掠抢中遭殃。

以礼相待日本战俘，别说日本俘虏“想不通”；看管日本战俘的中国管理人员更想不通。看守员王兴，家在承德的长城边，是抗日游击区，有一次日军扫荡，他家八口人被杀死了七口，他参加解放军就是为了报仇。1950 年他被调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看到日本军人气焰嚣张，他非常愤怒："想好好收拾'日本鬼子'，可上级要求对战犯'不许打骂''尊重人格'"。[11]

中国护士也对照顾日本人非常愤怒："他们杀了我的父母、兄弟，对这样的战犯为什么要照料？应该杀了他们！"[12]



汤浅生病给医治，他给一起被关押的日本人看病，甚至还得到了报酬。让汤浅彻底转变是在他看到一封中国人母亲的来信之后。通过中国检察官转来的信中说："汤浅，我就是被你杀害的人的母亲。宪兵队抓走了我儿子，我一直守候在宪兵队门前，第二天我儿子被一辆车拉走了，我拼命地追呀追呀，两只脚怎能追上四个轮子的汽车？后来听说儿子被送到了潞安陆军医院，活活的一个人被你们大卸八块了。我哭呀，哭呀。"

汤浅1946年在太原成婚，妻子1953年带着三个孩子回国，他是人夫、人父，换位后他才开始思考：如果自己死了，家庭成员将会何等悲伤。相反，很多中国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如何死的，死在何方。

让富永震撼的一件事是：他住的监房以前是日本军队用来关押中国人的。这里的水泥墙壁上到处都有刻画的痕迹，依稀可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坚决斗争"等字样。好像是用指尖蘸着鲜血书写的。[13]富永在这里看到了中国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现在他的地位是中国人的"阶下囚"，昔日日本军人不给中国人"生的机会"；现在日本军人的生命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他最怕中国人用以往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方式对待自己，随时将日本俘虏杀掉。

有一次富永主持"杀人练胆"活动，有一个新兵以自己是僧侣为由拒绝了。富永当时的想法是：今后决不提拔这样的士兵。可当富永被关押之后，每当他回想起那个僧侣新兵，他就感叹该兵"了不起"，原来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与集团抗争。他悔恨当初自己没有拒绝日本军队的"利诱"，假如他也拒绝日本军队的"提拔"利诱，他就不会造那么多的孽，战争结束后就可以立刻获得新生。他开始反思：并非除了拒绝追随集团之外就没有其他生路。拒绝集团的利诱，不指望在集团中"上升"，照样可以作为一个正常人、而不是作为"鬼"活着。

1956年8月21日，富永正三收到了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的通知书，乘船回国前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特意到天津来送行，宴会结束时的饯别辞让富永永生难忘："你们回国后的生活决不会轻松，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再次扛着枪到中国来。祝你们各位健康。"[14]

"别再扛着枪来中国！"这句话在朴素中蕴涵着深刻。老兵们回国后时常反问自己："日本人究竟扛着枪到中国去干什么了？""一新"后的日本人，就因为自己想过好日子，统治者宣传中国有很多宝藏、财富，用提拔、给他们"变大"机会鼓励他们到中国烧杀抢掠，中国人只要对他们的强盗行径不满，日本就派遣更多军人到中国镇压，

日本军人在中国杀人放火，干尽坏事竟然没有任何犯罪意识。

永富干的坏事太多，让他坦白的时候，他每次都将自己的罪行写出来，中国管理人员收到后并没有对他发火，总是说："永富，将自己做过的事好好想想。"这样的对话已经有多次，永富总觉得中国人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些什么，他有时很迷惑：他们希望获得什么呢？在中国管教人员看来，这不是认罪的态度，仅仅交代，好似流水账的说明，没有触及内心深处。

永富杀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他认为他自己是"国士"，在为天皇尽忠，他因此还获得过勋章。也就是说，他的勋章是建立在中国人鲜血之上的。后来他渐渐明白，中国人只要求他能够"换位思考"，也就是说，站在受害人的立场，受害人会如何想自己被日本人杀死一事。被害的中国人也有家人，他们在中国正常地生活，他们没招日本人，也没有惹日本人，可日本人却对他们怀有深仇大恨，不杀不罢休。日本人跨过大海跑到中国，破坏了他们的和平生活还不算，还要杀人、抢夺财产。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日本人究竟又获得了什么呢？

经过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一年多的关押之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看到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原山西军的军人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消息，他甚至认为这些报纸是有意为他准备的。想到自己罪大恶极，一定要被处死，他的生存欲望反而变得强烈了，另一方面，他想自己双手沾满鲜血，中国人不会饶恕他。想到横竖都是死，如果在审判、痛骂中死去，不如自己死在战犯管理所里。他因此准备了上吊的绳子，准备当晚自杀，可后来还是生的愿望占了上风。次日早晨，管理所所长让打开所有监房的门，全体人员在院子里集合，所长不点名地批评了"有人有自杀企图"。[15]

中国方面并不想处死这些日本战俘，在生与死的煎熬中，永富才真正感觉到人对生的欲望有多么强烈。同样是人，在日本人手里有枪、有刀的时候，日本人根本不会去思考中国人想什么，只当他们是虫子，是畜生，应立刻杀掉。现在日本战俘的地位与中国人完全调了个，可中国人并不因为手中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就把日本战俘怎么样。中国管理人员非常清楚日本战俘的强烈生存愿望，他们批评那些准备轻生的日本犯人。一直生活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中的日本人，中国人不冷不热的平等对待反而让他们"精神崩溃"。

三尾丰回忆：每个进入宪兵队的中国人都会被打得皮开肉绽。既吃不到饭又没有水喝的中国人总呻吟着要水喝，这时日本宪兵总要强调一句，"不要给水喝"。对于为什么不要给水喝，最初他也并不清楚理由，后来才知道，关东军参谋本部编写了一本《俘虏审讯要领》[16]，其中有"喊渴要水，多为自白前的痛苦之时"的"注意要领"，也就是说，不给中国人水喝，是因为他们没有自白的迹象。只有当这些被严

刑拷打的中国人要自白的时候,他们要水的要求才可以满足。

中国人没有任何企图的一件小事,加上平时的真诚、平等对待,让前日本宪兵“羞愧难当,悔不欲生”。

1954年3月,中国管理员(刘班长)面带微笑通知土屋去理发,土屋跟在中国管理员身后前往理发室。在他的《我们落入地狱》一书中他是这样记叙这次经历的:“那时我突然想到,我从来没有让中国人理过一次发,洗过一次澡。接着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将中国人夫妻处死,逼迫他80多岁老母卧轨自杀的情景。过去所犯罪行一下涌入脑海,恨不得一头撞到水泥墙上。刘班长依然微笑着在前面走着,我的感情如同决堤的洪水,自己究竟怎么办才好呢?觉得怎么都不行,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流,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眼前一片模糊。我茫然不知所措,感到全身乏力,摇晃着走到刘班长面前。我垮了下来,撑着两手,跪倒在地。

“‘52号,你怎么了?’刘班长关切地问道。

“‘我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对中国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做了很多坏事。’

“头贴在地上,泪流不止,鼻涕也往下淌,陷入一种半狂乱状态。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我的呜咽声。我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好像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哭喊了一阵,刘班长蹲在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我明白你的想法了,知道了,站起来吧,请站起来’。

“刘班长拿出手绢,连拉带抱地让我站了起来。”[17]

这件“小事”彻底颠覆了前日本宪兵的“纵向思维”,中国人善待日本俘虏,日本人当初以为中国人“另有图谋”;中国人对自己好是想利用自己。同时,他们又经常否定这个想法,一个囚犯,一个俘虏,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呢?对中国人犯下那么多罪行,砍下这些人的人头多少次都不过分。假如没有日本投降,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地位依然是日本“上”;中国“下”,可现在中国人并不因为战争胜利了,日本人成为了囚犯,就将日本人当畜生。土屋自己思想上的斗争,将他送入痛苦的思想煎熬之中。相比中国人只让日本战俘坦白交代,土屋自加入宪兵直到日本投降,14年来一直在齐齐哈尔,根据土屋自己交代,他直接杀死328名中国人,逮捕、拷打过1917人。

齐齐哈尔,这个冬天与他家乡同样寒冷的地方,同样贫穷,很多中国人、孩子都没有足够的御寒服装,可是这些并不能让日本人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贫困是因为他们“劣等”;而日本人贫困是因为上天对他们不公,让他们人多地少。日本人来中国,夺走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日本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而中国人无能。中国人懒惰,不会耕种,日本人要来中国当“人上人”。土屋



在日本投降前将妻小送回日本，而他则要“坚守到最后”，日本投降后他被苏联红军俘虏并带往苏联，在苏联经过四年劳动改造后被移交给中国。移交理由是：土屋所犯罪行都是在中国境内实施的，因此应由中国方面进行审判并处罚。

土屋当宪兵时骂中国人：“你这个支那狗，蝼蚁之辈。”抓来了中国人，除了拷打，就是关押在牢房中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而在中国的监狱中，他完全没有遇到任何让他恐惧的事情，中国人从未用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手段对他们。

在日本人的“洗脑”人生中，对某个人，尤其是“上”对“下”好的时候，都是因为“上”发现了“下”的利用价值。雇佣一个武士去杀人前，都要供给他好吃、好喝，让他享尽人生的最后一点美好时光。中国人不侮辱日本囚犯人格，日本战俘立刻会将“尊重”与自己的“利用价值”联系到一起。日本没有“平等待人”，“善待”的背后是另有“打算”。日本人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就是这些，中国人的对人方式完全超越了日本人的生活经验，这让日本战俘陷入了深深的思维困惑中，他们无法理解。

“集体无意识”的形成

小川武满1913年出生于中国旅顺，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他父亲毕业于九州帝国医科大学，后来成为陆军军医，官至陆军少将，他属于中等家庭。小川除了父亲去欧美留学的2年期间他回日本上小学外，直到他长到成人为止，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沈阳（当时的奉天）。名字中的“武”，说明他是军人的儿子；“满”表明他出生在满洲。他的哥哥、两个弟弟，均在战争中死去。

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时他是中学生，此后，课程中增加了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军事训练内容。1931年“九•一八”时他进入了满洲医科大学预科。因为满洲对日本来说是“前线”，他们每天都要学习“教育敕语”，“一旦有事，应义勇奉公，以扶助天长地久之皇运”。

1941年底日本向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让他这个在校生提前毕业，他加入军队并返回日本本土的新兵训练营中受训，结束了军人教育后，1943年3月被分配在中国石家庄的日本军人医院工作，10月起转到北京陆军医院直到日本投降。

根据小川回忆：“学生时代玩游戏，小学生被分成日军和俄军两个部分，进行奉天会战。用沙包相互投掷，根据打中的部位，判定‘战死’‘负伤’。女孩子扮护士，

将负伤的男孩放在担架上抬走。平时经常有夺军旗的游戏。”[18]

学校是这样教育这些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孩子们的:“日俄战争,如果没有日本对抗俄国,俄国就会占领整个满洲,进而占领朝鲜,是日本阻止了俄国南下。”

“中国土匪横行,社会混乱,到处是耀武扬威的军阀。军阀混战,民众是牺牲品,蒋介石也是军阀之一,中国人自己是无法建立秩序的。”

“中国人、朝鲜人,即使有民族主义,也没有对抗外敌的力量,日本人的使命,是在没有秩序的地方建立新秩序。”

小川武满生长在中国的日本人圈子里,他的经历跟直接来自本土的日本人略有不同。

一次,小川对一个中国的少年车夫说:“今天我来当车夫吧。”于是他穿上中国车夫的衣服,拉上一个日本人就跑了起来。将日本人拉到目的地之后,日本人下车分文不付,小川问他要钱,这个日本人立刻对他施以拳脚。这就是日本人希望在中国建立的“纵向秩序”。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大批日本人于 1947 年 11 月到 1948 年 6 月陆续回国,因以战犯嫌疑被关入监狱以及内地的一部分人依然还在中国,小川也没有立刻回国,他留下来为这些关押的日本人提供医疗服务。解放军 1949 年 2 月 3 日解放北平,他于 1948 年 12 月返回日本。他没有被中国关押的经历,他本人也没有说明是否亲自参与过实习军医的“人体解剖”,但他承认看到过中国人在自己挖的坑边被日本军人斩首,头颅落入坑中;听到中国人被杀前怒骂“日本鬼子”。回到日本后,他一直边行医边从事基督教工作,作为反战活动,他反对将靖国神社中的军人看成是“英灵”。

几乎每个去中国的旧军人都能回忆起“马贼之歌”,这是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娱乐生活贫乏,一首歌曲让他们难忘,而是因为这首歌歌颂“变大”,歌词中写道,“我要去那里,你也去吧,在狭小的日本已经住腻了”,它成为日本人的指引与憧憬。日本人按图索骥去了中国。

日本人要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不管这些广袤的领土属于谁,只因为日本人需要,中国人、朝鲜人就得“让给他们”。别人的固有国土,竟然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好地方,日本人才不管其他民族怎么想呢!虽然说日本人接受了中国的儒教,可他们将等级极端化,要用“上”“下”;“强”“弱”决定一切问题。“上”要占有,“下”就必须无条件地给予。日本人没有将中国的“仁”学去,中国的“仁”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对“下”要“慈”。

汤浅谦是这样回忆他刚到中国时的经历的:“1942 年 1 月末,我到中国山西太



原附近的潞安陆军医院赴任。途中看到街上的苦力，这时我也曾想过‘中国人也出人意料的勤劳呀’，看到这些与在日本接受的宣传不同的情景，也并没有激起对中国人的同情之情。有一次看到中国人和作为军官的我一起乘坐头等车厢时，我立刻觉得：‘岂有此理，中国人也……’”[19]

在他这个日本人看来，中国人是下等人，只有日本人才是上等人。“我乃帝国陆军军官”；而我的国家日本，是“亚洲盟主”。在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日本“最上”才“符合逻辑”。

汤浅谦坦承：“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惟有日本才是‘理想国家’，看不起中国人和朝鲜人，精神结构是‘唯我独尊’型。其实我们早已被军国主义洗了脑，引上了歧路而又没有察觉。只是当时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自发的思考。”[20]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每天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目的在于“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可日本军医将“救死扶伤”只限于“本集团”中的日本人，中国人是“集团外”中的“非人”，劣等民族，中国人只能给日本军医充当提高医术的“试验白鼠”。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平生活，可日本人却吹嘘自己“先知”“先觉”，要来中国“启发”中国人，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没有他们中国无法觉悟，不会发展。实际上他们在中国到处掠夺，中国人皱个眉头他们都说是“抗日”“侮日”，派军人来“膺惩”，战场上、医院里都是屠杀。日本要将中国变成“日本人的乐土”，“中国人的地狱”。在



齐齐哈尔的“魔鬼宪兵”土屋芳雄

土屋芳雄在齐齐哈尔时是人人欲除之而后快的“魔鬼宪兵”。类似他那样手段毒辣、心肠险恶的“魔鬼宪兵”遍布在整个中国的日本占领地区。战争结束后，经过苏军以及中国的战俘管理所的俘虏生涯，土屋认识到了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写出了一系列的悔罪之作，实现了从“魔鬼”到“人”的真正回归。

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日本是亚洲的“领导”，口头上是“五族共荣”，实际上是日本“最大”“最上”。

小岛龙男在东京九段中学读书时，同学中不少人是海、陆军将军的子女，他们看电影时坐特等席，每天有私家车接送上、下学，学校组织旅行时，总有两三个同学带上8毫米摄影机，拍摄后回校再放映欣赏，“人上人”的生活方式刺激着他要进入军队，他要在军队出人头地。小岛学俄语，也并非对俄国文学或社会主义有兴趣，只是想日本迟早要与苏联打起来，日本需要懂俄语的人，学好了俄语，能为自己今后“升官发财”创造机会。日本当时教授与学习俄语，都是为了向海外扩张。

富永正三是自我奋斗的典型之一，富永东京大学毕业后加入军队，与其他高学历者同样，一进入军队就比其他人的官阶高。

富永对自己首次杀中国人练胆是这样回忆的：“作为一个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我与其他高学历者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为见习士官，我的部下与士兵都是有战斗经历的‘勇士’，唯独我没有战斗经验，如果连一个俘虏都没有砍过，我无法当野战小队长，指挥部下。在做一个人与做野战小队长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在日本人的集团中，获得集团中的高位的依据是“功劳大小，能力高低”，富永毕业于东京大学，这表明他智力比一般军人“高”，他也因此一加入军队就可跳级当官，可他还需要战功。

为了在部下面前显示勇气，确立自己士官的稳固地位，富永要在“行动”上超越其他人。集团杀人，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要参与，作为“头”，必须多杀、猛杀才能博得喝彩。老兵将“杀人”勇气传染给“新兵”，“新兵”成为“老兵”后，再传给后来者。日本军队就是如此不断再生产“杀人勇气”的。

三尾丰揭露了日本人为了自己“立功”，不惜牺牲无辜中国人的经历。

“大连宪兵队里有一个邮件检查班，宪兵装扮成邮局职员，在邮局里查找可疑印刷品。1944年，一个宪兵认为一个投稿者的言论是针对日本人的，因此将他认定为反满抗日分子，将他送进了七三一部队。”

宪兵为了自己晋升而制造事件，宪兵土屋也同样。

土屋当宪兵的目的，依然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宪兵的月收入是一般上等兵的五倍。每月49日元（1931年日本一袋大米为7.39日元），他后来每月寄回家20日元。土屋加入宪兵后就一直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1937年底因为多次“立功”升为军曹，1939年娶了家乡女子为妻，并在中国获得了军方提供的住房。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规模的扩大，日本需要的军人也越来越多，而军队中晋升的速度也相对提高，日本军人之提升，就意味着他们梦想的生活改善，在这种诱惑面前，杀中



国人，尤其在“中国人劣等”已经在大脑中形成深深烙印的情况下，他们攀比谁杀的中国人多且全无任何犯罪感。杀人和立功、晋升联系起来，使他们杀人变本加厉，土屋后来成为齐齐哈尔的“魔鬼宪兵”。

日本将对外扩张侵略作为“国策”，土屋这样的人是实施该国策的最理想的“坯子”。出身贫困的生活背景使他可以忍受一切困苦，地位低下让他有一种强烈的、要在集团中建立功勋，出人头地的愿望。身体健康并且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让他从不怀疑上司的命令，以绝对服从，忠实完成作为信念。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介绍他如何变成“魔鬼宪兵”的书——《我们落入地狱——土屋芳雄宪兵少尉的个人史》。[21]

日本政府用“中国佬是劣等民族，只配卖拉面”来给全体国民“洗脑”。

作为穷人家的孩子，平时吃不饱，穿不暖，军队饭、肉管饱，还有钱拿，他当然愿意在这里长久呆下去。以前他只缺少机遇，现在他认为他什么都具备了，唯一就是不断立功，向上攀升，在天皇军队这个集团中，完成了集团布置的任务就可以成功。

老兵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战争前，他们都很年轻，分别生活在城市与乡村，加入军队后就想在中国立功、晋升。中产阶级的子女期望更高、更快上升；贫穷人家的子女希望当兵或当宪兵，这些都是为了获得相对多的收入，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补贴家用。在从事解剖活人，刺杀活人练胆的过程中，鼓励自己下决心干的只有一个：这样会确立自己在集团中的地位。好似以上每个军人都经历过“杀人练胆”那样，两个宪兵都有过捏造事件，以达到让自己立功升级的亲身经历。中国人可以成为七三一部队中的“圆木”“活体解剖”的对象，成为宪兵们上升的踏脚石更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军人在中国烧杀抢掠，这让所有中国人都变成了日本人的潜在敌人。日本派军队到中国，就是为了保证经济掠夺畅通无阻，杀人变成了他们的日常任务。表现出勇气是立功的基础，它必须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表现出来。杀人要争先；殴打、绑架中国人要表现出勇敢，上述丧尽天良的丑行到了日本投降后才停止。

以后几件事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反应。押解回中国后，他们对立情绪很严重，首先，恐惧自己在中国期间的行为暴露，怕被处罚。其次，他们在后来疏散的过程中，知道中国在朝鲜与美国打了起来，他们想中国打不赢美国。再次，中国管教干部对他们十分友善，不打不骂，没有进行过任何人身侮辱，吃住环境非常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当初他们关押中国人，关押地污秽不堪，给中国人吃的也是最差的，而且中国人被押进去后，都是非人待遇，以前关押中国人的人，现在被中国人关押，他们对同样立场但采取不同手段的中国人的行为不理解。



“敌人在本能寺里”

老兵们回国后的亲身体会是日本的社会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预言“日本迟早还会出事”，他们的“警世之言”来自他们与众不同的亲身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深刻认识，可这一肺腑之言在他人看来是“危言耸听”。

日本有一句著名的成语：“敌人在本能寺里。”

该成语来自结束织田信长称霸日本的一个故事。织田信长成为日本的实际支配者之后，他进入京都并夜宿本能寺，此前他下令部下明智光秀出征，可明智光秀却率领军队半路上“杀了个回马枪”，他在夜晚宣布“敌人藏在本能寺中”。接到明智光秀命令的武士奋勇攻击本能寺，假如武士们知道本能寺中居住着他们仰慕或者说视为榜样的织田信长，可以肯定明智光秀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说话只说一半，是日本领导人的一贯作风，明智光秀下令攻击敌人，但有意隐瞒“敌人”是谁，他就是要让部下不明真相，盲目追随并服从，让部下在无知、混乱中杀死织田信长。

“一新”之后，藩阀领导人标榜“富国强兵”，发展工业、提倡义务教育、推行兵役制等，这些都是“敌人在本能寺中”的翻版。藩阀领导人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文明开化”上来，而他们自己则埋头于让自己“变大”中。名为“辅弼天皇”的“忠臣”，可实际上他们才是国家的支配者，他们要在财富上追赶、超过以前的大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防止日本国内出现新的“下克上”而被推翻，藩阀领导人将周边国家视为日本“变大”的“富源”，鼓励“下”到外国去发泄精力，诱惑武士向海外扩张，由他们主宰“论功行赏”。普及教育的目的是让全民变成武士；发展工业则是让每个武士被枪炮武装。

政府用“日本是家族国家，天皇是最高家长，家长极为关心成员之‘变大’要求，家庭成员反抗家长是‘大逆不道’，对外扩张掠夺是让家‘变大’的有功行为”等来对国民洗脑，面对国内存在的大众普遍贫困，藩阀领导人反复灌输“老天不公”“外国压制”，用制造外来危机的方法转移国内视线，用不追随就驱逐来强化“内聚力”。

“富国强兵”口号下的日本工业发展严重畸形，一切都服从于军事工业，所有工业都是军工产业链中的一环，昔日带刀的武士今天扛着枪去占有领土，先获得廉价原材料，然后再垄断市场，扛枪武士通过强买、强卖让日本“变富”，“变大”完全建筑在对周边国家的掠夺之上。一般国民在对外扩张的利益链中仅仅获得了面包渣，

蛋糕和面包被藩阀统治者瓜分。日本的“教育普及”与“工业发展”这两个所谓“文明”指标，实际上是亚洲国家受害程度的温度计。也就是说，从日本受害国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教育越普及、工业越发展，周边国家所受日本之害越大，程度越深，两项“文明”指标实际上是亚洲国家的受害指数。

被俘老兵们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例。六名从中国被释放回国的前俘虏兵，最低文化水平是小学毕业，最高的毕业于日本著名学府东京大学。从他们各自所写的认罪坦白书就可以发现，他们每个人都能将个人经历用流畅文字书写下来，对后来思想上发生转变部分写得尤为深刻。儒家常用“知书达理”来说明受教育程度与辨别是非的关系，一般认为君子的“礼仪”“仁慈”与所受教育成正比，所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容易迷失自我，不会因为盲从而丧失“良知”与“良心”。可日本老兵最初的表现完全超越了中国的常识，六个人中的三个人都是大学毕业，与文盲比例高达 90% 的中国相比，日本兵的教育水准可谓相当高，可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非但没有与辨别是非能力挂钩，而且由于所受教育畸形，识字反成为便于接受“洗脑”的路径，“中国人是劣等人”，蔑视中国人的思想在他们内心深处扎根，形成了强烈的集体无意识。事实表明，他们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医生还是士兵，屠杀中国人好似游戏一般，杀人之前还谈笑嬉戏，“练胆”成为了“课程”，为今后屠杀更多的人积累经验。

蔑视中国人造成心理扭曲，残杀无辜视为“英勇”。即便他们来中国战场后发现一切与他们在日本所受宣传完全不一样，可他们依然效忠天皇，认为对外扩张侵略的战争是“圣战”，个人立功与日本进步同步。在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无辜百姓的过程中，他们完全丧失人性。教育普及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愚民政策”，日本统治者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发挥到了极限。

“文明开化”之实是走向野蛮，工业发展的结果是让杀人机器疯狂运转。日本将战车开进了中国领土，战舰驶入了中国领海，飞机在中国上空耀武扬威，科学的进步，带来的却是用化学、生物武器高效屠杀中国人，日本的“文明开化”只让中国受到更大、更多的伤害。强大、发展科技的目的不是为了造福人类，而是为了骑在“外”“下”的身上，让你无法翻身。

二战以日本“变大”欲望遭遇挫折而告终，以前的日本强盗成为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可中国人并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的老兵想自杀都被中国看守人员解救了下来，生病有人给看，吃的可口，住的卫生，平时不打不骂，尊重他们的人格，中国人的宽容以及仁慈让他们“无地自容”，羞愧得痛不欲生。在日本，他们也是社会底层，强烈的“变大”欲望让他们要在中国“奋勇立功”，将“变大立功”

建筑在屠杀无辜之上，仅仅为了在本集团内获得奖赏，就抛弃人性，变成禽兽。

老兵们被释放回日本时，日本已经摆脱了战后的贫困，老兵们回到家乡之初受到隆重欢迎，可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组织者主办这种“欢迎”，与其说是针对他们这些“归国者”，不如说是为了粉饰那些当年将他们送到国外的国家以及统治者的。“欢送”的另一面就是“驱赶”。当初“欢送”他们“出征”，将他们吹捧成为了国家和妻小的“勇士”，实际上是把他们送到中国去当强盗。亲身经历了战争，他们彻底明白了什么是谎言，经过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深知自己是“罪人”，在外国干了丑恶、残暴之事，完全可以被中国人千刀万剐也死有余辜，是中国人的宽广胸怀，同情他们“下”的地位，才让他们获得第二次生命，能够完整回家与家人团聚，可统治者竟然仍要将这些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声称是他们的外交努力让这些人平安返乡了，“欢迎”他们，无非是要宣传统治者以前正确，现在英明。老兵们依然是“摆布”对象，用以欺骗其他人。当他们在“欢迎仪式”上发表反战言论时，老兵们立刻变成了“害群之马”，成为必须隔离的“瘟疫”。他们自己发自内心、积极主动地洗心革面被斥责为“被洗了脑”，也就是说，只有回到战前思维才算“正常”。

历史不会重演，但是总会出现惊人的重复。将一切看得真切的老兵们坚信日本仍在“带病运转”，虽然他们不是预言家，可他们的预言在50年后成为了箴言。

战后的日本领导人依然是战前积极参与战争者，是所谓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为了将国民的注意力从清算战争责任上吸引开，他们宣称要将全力投入到帮助国民摆脱贫困上，从让“全民吃饱”到保证“全民就业”，一切都围绕着“变大”展开，丝毫没有摆脱战前的模式。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后，“日本人优秀”的陈滓再次被日本的文人们搅动了起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超越了战前，日本式“洗脑”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教育普及”“人均GDP”增加，再次被看成“发达指标”，人们忽视了教育的方式以及内容；经济发展中孰“大”孰“小”。随着日本经济“变大”“变强”，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冲突也不断升级，针对西方国家批评日本不断输出商品，日本文人一改以往“平身低头”的态度，开始公然批评西方，指摘西方的价值观培养懒汉，自由导致涣散，追求平等孕育出富贵病。日本学者梅原猛提出：日本自古以来就讲究“和”，早在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中，第一条就是“和为贵”，日本社会推崇“和”，集团、企业推崇“和”，日本希望与西方国家“和谐相处”，可西方国家出于傲慢并不愿意了解“和”为何？因此与日本冲突不断。假如果放弃“白人至上”，西方象当初日本虚心学习西方那样向东方，当然是向日本请教，接受了“大和”之“和”，不但可以解决各自国家国内面临的问题，还可以避免或缓和与日本的冲突。西方的自由、平等理念，在工业革命时代适用，日本也曾是





学生积极学习，而现在早已是“后工业革命”时代了。那些陈旧思想应该在工业大生产时代“抛弃”，取而带之的是“大和魂”。

日本文人呼吁输出“日本精神”“日本价值观”，乍一看似乎觉得不错，时代变了，思想也必须改变，不改变是僵化，可深入思考之后会发现，日本文人的宣传并非那么简单。梅原猛挖掘日本古代文明，后继者石原慎太郎则利用他有限的经济知识，开始对美国说“不”。与近代史上历次言论先行，行动后到的模式同样，石原对美国言行不恭后没多久，另外一个集团跟着就策划袭击美国了。

换个角度而言，后者又给了梅原、石原一个响亮的耳光。前者说输出日本之“和为贵”，可后者却要对美国“全武行”；日本政府宣传“日美同盟，亲如一家”；奥姆却策划在美国纽约地铁中释放毒气，杀死“该死的美国佬”。文人说高调鼓吹“和”之时恰恰是武士“背后一刀”之时，这似乎才是“面从腹背”的真正日本精神。

1995 年 3 月 20 日[22]日本爆发了“奥姆地铁投毒事件”，随着该犯罪集团罪行不断被揭露，他们曾策划袭击美国，要在美国纽约地铁中散布毒气的计划也被揭露出来。

中国人、韩国人乃至世界各国人都十分关心并渴望获得有关奥姆事件的答案，比如“奥姆为什么那么凶残？”“为什么要滥杀无辜？”“为什么不认罪？”“他们如何被洗脑？”等等。仅



小男子汉

照片中的这名男孩刚刚参加完学校举行的比赛，虽然浑身是泥，但眼神中露出的神色却坚毅且骄傲。这张照片同时表现出了一种武士道精神：只要赢了就好，脏点怕什么？回去后可以“清净”的！

在"奥姆"这个单一集团上寻找答案，等于将"奥姆"与日本社会割裂开来，因为即便说它是个怪胎也不可否认它存在于日本社会中。

今昔集团之比较 //////////

二战前，日本建立起了连希特勒都表示羡慕的国家体制，政府一声呼吁，全国上下就立刻响应，结果就能轻易地发动起一场对外侵略战争。经过日本战败投降，全国一心对外扩张侵略的组织体系也随之瓦解，日本有了新宪法，实现了多党制。教育上，再也没有了天皇敕语，言论、出版也相对自由，战前那样能够迅速形成凶恶集团的温床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可事情就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在日本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就是这些"不知道战争的一代"，他们不但组建了"奥姆"这样的凶残犯罪集团，而且他们对战争之热中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先辈。"奥姆"教徒的目标不单是要建立"奥姆真理国"，而且要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1941 年 12 月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当时也才打到夏威夷，可"奥姆"教徒心比天高，他们要袭击美国本土，在纽约人口密集的地铁中实施大量屠杀。

"奥姆"教主麻原彰晃原名松本智津夫，1955 年 3 月 2 日出生于熊本县农村，父亲是个编席工人，他是七个孩子中的老四。他先天性双目局部失明，无法正常生活，后进入盲校学习。1977 年高中毕业后的，他只身前往东京，希望考进入东京大学，落榜后他在千叶县的船桥市开设了针灸院，同时出售药品。1978 年结婚后，夫妻二人以经营诊所为生。1982 年他以桔皮为原料制成所谓"万能药"出售给患者，此举违反了日本的《药事法》，他因此被捕，被课以罚金 20 万日元并拘留 20 天，此后针灸院和药店倒闭。1984 年他在东京涩谷开办"瑜伽教室"[23]，该瑜伽教室后更名为"奥姆神仙会"。1986 年，松本率领信徒前往印度，声称在印度的喜马拉雅山获得了神的启示，他完成了"最终解脱"。1989 年 8 月，"奥姆"获得"宗教法人"资格。

到 1995 年止的短短 10 年间，"奥姆"能够从一个小团体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凶恶集团，其发展壮大速度与对外的攻击性，简直可以看成是神话。

在事后分析"奥姆集团"成因问题时，日本媒体以及"专家"，几乎一边倒地将焦点集中在"奥姆"的"洗脑"上。电视台记者深入到"奥姆"的各大据点中，拍摄到各据点中有用木版隔出的、只能供一个人进入的小屋，密闭单间里的"神器"只是一台录象、电视一体机。教徒结束了每天各自的工作返回教团后，主要的修道活动就是钻进入小屋，反复观看教团制作的麻原的讲话录象。教团抓住一切时间灌输，要么读小册子，要么听讲道，要么看录象。传媒以及"学者"都将"奥姆"能够成功

控制教徒的理由归结为“思想控制”。“奥姆”果真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将教徒加入教团前十几、或者几十年录入大脑中的内容彻底地抹去？然后再按照麻原的意志，将他希望的内容重新灌输了进去？

批评奥姆者以日本社会的“本我”自居，而麻原领导的邪教集团则是“非我”，批评者要让自己成为正义化身，同时让麻原等扮演邪恶代表。战后的日本教育难道就真的那么失败，轻易就在麻原的“洗脑”面前败下阵来？评论员们为什么不从日本社会本身中寻找答案呢？只说麻原“邪乎”，无非是为了否定日本社会本身“邪乎”。

战后日本虽然进行了教育改革，可那些都只是附丽在集体无意识之外、根本无法撼动日本固有部分的内容。教徒身上的“非我”，仅仅是通过镜子映照出的“本我”而已。批评者本身也同时具有麻原同样的基因。

日本是“纵向集团”社会，“强大者”永远正确，“下”只能在“忍耐”的夹缝中生存。“上”可以胡作非为、信口雌黄，“下”通常只能采取“忍”的态度保持“沉默”。在日本，“上”的“邪恶”可以包装成为“美好”；丑事、脏事都让“下”去牺牲承担。对“下”要求严厉，不允许丝毫的“脏”。这些教科书以外的现实内容，重复出现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中，它比任何教科书都更具影响力。“弱小”就应该受气、被欺；反之，“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为了免当“弱者”被欺，“下”的具有强烈的“变大”欲望，它或出于自私的动机，或来自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它是一种畸形的“积极向上”。

战后日本颁布了《和平宪法》，推行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些表面宣传搞得松本这个身有残疾的年轻人都心里直痒痒，他想努力学习考进东京大学，接着水到渠成地当上政治家，可这些都以屡受挫折而告终。他接着要生活，想挣钱，可稍有逾越，立刻就受到惩罚。在日本，象松本这样孤立无援处于“下”的“小人物”，凡事必须规规矩矩。“天网恢恢”只捞“小人物”，政治家、资本家等大人物，任何时候都可以冲破法网，扬长而去。他们从来不受规则约束，犯了法也会有“下”为他们顶罪，而且这种“牺牲”常被赞美为“忠勇”。没有人知道“顶罪者”“下手人”的真实心情，他们究竟是出于无奈进行了某种交易，还是真想表“忠”，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行动。总之，只有“强大”者有话语权。

麻原开设瑜珈教室后，吸引年轻人加入的口号就是“你有超能力”。宣传单上的照片是已经具有“超能力”的麻原，他可以“空中浮游”。麻原诱惑年轻人的口头禅是：“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通过训练获得超能力……”言下之意是，瑜珈教室可以将你的潜能挖掘出来，让奇迹出现。

仅仅说麻原善于欺骗，年轻人无知“上当受骗”，那是过低评价加入真理教中的

年轻人。现在虽无法对每个加入者的历程进行追踪，但他们对现实不满，希望通过加入教团来加速让自己“变大”是确切无疑的。他们对社会上提供的“变大”“空间”与“速度”不满，而麻原恰恰抓住了这种心理并保证提供，这样两者才“一拍即合”。1990 年 2 月“奥姆”组建了“真理党”，出资两亿日元，支持包括麻原在内的 25 名教团骨干分子参加日本众议院选举，这种实实在在的投入是其他集团无法提供的，也正是因为麻原敢并且愿意，这些人后来才成为奥姆的骨干并死心塌地为奥姆卖命。

奥姆将信徒分为两种，一种是“出家信徒”，还有一种是“在家信徒”。“出家”原指连家都抛弃了的“彻底无欲者”，可加入奥姆的“出家信徒”，实际上“变大”欲最强烈。对一般的年轻人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资产，“出家”加入奥姆，就是瞄准了“奥姆”的“论功行赏”。“奥姆”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最高奖赏，是组建自己的“奥姆真理国”。根据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麻原将成为“神圣法皇”，“真理国”下设大藏省、文部省、自治省、建设省、流通省、科技省、谍报省、防卫厅等，有这么多省部，就会有同样多的空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希望“立功”，进而获得该官位。

依照日本战后的新宪法，明治宪法中的“专制天皇”已经变成了“象征天皇”，新宪法宣传“人权”“平等”，可这些教育对教徒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教徒视麻原为“天皇”，无论在哪里，开口闭口称麻原是“至尊”“尊师”。他们只认麻原，粪土“奥姆”之外的所有权威。这同时也是日本集团的特点，谁给他们饭碗和机会，他们就服谁。“抬”麻原是为了保自己。麻原未来能出任“真理国”皇帝，那么在他手下的人当然也可以捞个一官半职。麻原不但是“法皇”，而且还是世袭的，他的子女可以继承，其他人的地位则必须是“论功行赏”。如此反社会的倒退，在教徒眼里“见怪不怪”，日本教科书上说的与现实社会中他们所看到的完全不同，自民党的政治家，有几个不是二世、三世？

对财富，麻原贪婪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出家信徒”加入教团时，必须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贡献给教团，麻原将能派上用场的继续用，不要的再出售，甚至连他们使用过、尚存部分余额的电话卡都要收缴。教团成员规定必须在内部食堂吃饭，而这里的食堂甚至很少提供肉食，只有在他们要外出“执行任务”，领到了“活动资金”之后，才能够在外面享受一顿美食，

一般的出家信徒每晚都要拿个铺盖随意找个地方睡觉，外出公干也必须乘最经济、便宜的电车，与此相反，麻原一家人过着帝王一般的生活，麻原出门乘坐最豪华的进口汽车，在外住宿也要住总统套房。年轻人每天劳作但没有收入；麻原和几个高级干部可以超常享受。教徒们对此熟视无睹，毫无怨言。之所以他们愿意“忍”，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甘心忍受。

“奥姆”的收入来源，从劳动密集的“拉面”店到高科技的电脑商店，总资产有10亿美元之多，每年的营业收入为25亿日元。麻原用手触摸教徒的额头都要收费，据说这样可从麻原那里获得能量，一次收费5万日元。甚至麻原用过的洗澡水都要作为商品出售，售价为每立升10万日元。科技长官村井秀夫发明了一种电极头套，据说戴上它可以接收来自麻原的脑电波，这个头套的月租金高达100-1000万日元。1995年3月20日后，警察在搜查山梨县的据点上九一色村时，搜出7亿现金，10公斤金条。

可麻原并非“一毛不拔”，对在教团基地内建立秘密实验室他从不吝啬，这些实验室不是利用科学造福人类，而是为了制造化学武器，“奥姆”要用科技武装自己，目的在于利用它消除异己，再占有更多的财富。奥姆还建立了医院，可医院的职能不是为了“救死扶伤”，而是要“合法杀人。奥姆将许多孤独并且有一定财产的老人诱骗到医院住院，然后投放药物造成他们神志不清，当教团获得了“将所有遗产捐献给教团”的遗嘱之后，就用各种手段将这些老人杀死，有财产的老人是教团瞄准了的“富源”。

这些都让人联想起“一新”后的日本政府，统治者们“不是在战争就是在准备战争”，他们用“让你‘变大’”来诱惑那些社会底层，对积极追随者赏；反对者罚。“一新”后的日本领导人，从明治时代的伊藤博文到昭和时代的近卫、山本五十六等，各个生活腐化，他们在风月场所一掷千金都被吹捧为“英雄豪迈”，相反，大部分国民生活贫困。统治者们从来不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源于他们自己的贪婪及压榨，只将此归结为“老天不公”“白人压制”，在对外战争中，收获巨大的是上层统治者以及政商，社会底层的百姓只能在追随中获得一个饭碗，战争让全民就业，男性上战场，女性进工厂。

象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该部队的主持人是石井四郎，1936年他还不过是关东军军医部的一名中佐，可他竟然能够从军部获得一年1000万日元的经费[24]，而当时日本陆军一个师团的经费也不过区区几百万日元。昭和天皇在经费上特别关照他，主要是因为日本陆军非常看好“生物武器”。[25]国际公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且日本在生产能力以及技术上均无法与欧美抗衡，日本因此要“独辟蹊径”，钻国际公约空子的同时，还要达到高效、大量屠杀的目的。

一方面利用伪科学来大挣其钱，另一方面将所学科学知识用在邪恶上。学习科学的年轻人对这种疯狂不但欣赏，还积极参与其中。一些所谓高才生，编造各种谎言，为出售上述伪科学商品推波助澜，宣传用语都是在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装扮下，堂而皇之地印刷在出版物上。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说谎“无耻”，也不会觉得受

骗上当者“无辜”。

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统治阶级对战胜国——美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前还在鼓励男性奋勇杀死“鬼畜英美”，可一投降就立刻改变战术，这次要让日本女性“挺身而出”。为了“愉悦”对手，统治集团下令建设“特别慰安设施”，专门让日本年轻女子去陪美国占领军睡觉。理由竟然也“高尚”：“为维护日本女子的贞操和纯净血统延续。”此前宣传“假如日本战败，男人全部都会被阉割；女子会被送入军中充当娼妇”。战败了，并没有美国大兵强征良家妇女，而是统治集团主动“送人上门”，“脏事”要“下”去干，任何时候都将“下”作为“摆布”对象，不把自己人当人。针对“上”发布的“密令”是，“皇族、华族、财阀家女子要竭力避免与美军有染”，也就是说，为了维护“上女”的“贞操”和“血缘”，不惜让“下女”充当美国占领军发泄性欲的盾牌，这样既可以“愉悦”美国占领军，还能避免“上女”被招惹。统治者要将“坏事”变成“好事”，明明是将女孩子推入火坑，还要将自己的“丑行”美化成“为贫困的日本年轻女子创造就业机会”。战争时让穷人男孩充当“人肉炸弹”；战败后让贫穷女孩充当“人肉工事”。内务省给她们送上“特别挺身队员”的美名，“赞美”她们是“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纵向”日本就是如此，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都是“强者”的一张嘴。

日本战败，占有“蛋糕”的统治者们还有老底子，可民众则瞬间连面包渣都没有了，“上”乘机“逼良为娼”。怂恿女孩上阵时，她们是为了国家的“挺身队员”；被“作践”时，她们是为了金钱不惜出卖色相的“贱女子”。每个女孩跟美军“冲锋”[26]一次的代价是100日元，这是当时一般工薪阶层平均月工资的两倍，可女孩本人却拿不到这么多，美军支付的“嫖资”，绝大部分被组织者、也就是政府说的“右翼”抽走，他们与保守政府、保守政治家暗中勾结，政府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他们则将“抽头”部分还原给保守政治家，用以维护保守政治。

“下”只有成为“上”运转中的一环时，才有可能“合理”“合法”地获得面包渣。无论战前想“变大”的老兵，还是战后想“变大”的松本（麻原），只有追随“大”才有可能获得“面包渣”。有人对麻原“胡萝卜加大棒”；麻原对教徒也同样是“诱惑加赏罚”。一方面允诺让教徒未来“升官发财”，另一方面将无法达到目的归结为“外”的压制，敌视奥姆之外的所有集团和成员，鼓励教徒杀之、掠夺之，而且这些都属于为了奥姆、为了自己的“英勇”行为。

进入“奥姆”之前，包括麻原在内的所有成员，每人都至少受到过12年的正规教育，可日本政府提供的教育在这里却成为从事邪恶的基础。奥姆从社会上招募优秀的理工科毕业生，这些人都是学习科学的尖子，他们具有相当的技能和头脑，他

们为了回报奥姆提供的“科研条件”，一方面竭尽全力为伪科学服务，另一方面将所学科学知识用在邪恶上，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超能力”，要在实验室合成生物武器。即使在被逮捕、被惩处之时，有些人依然对麻原的信任以及提供的条件大加赞美。

从电视上看，每个接受采访的教徒，从教团一般成员到重要干部，各个对人彬彬有礼，说话轻生细语，教徒中大学毕业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他们生活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中，乍一看，观众无论如何不会将他们充满稚气的形象与凶残行为联系起来。可就是这些在电视台大谈特谈自己教团对世界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他们的与众不同是冷酷杀人。无论对内部的所谓“叛徒”还是外部的“敌对者”，都极端残忍。

他们将内部的所谓“叛徒”丢入自制的大型微波炉中烧成黑炭，还有一种杀人，冠以实施“热水疗法”之名，将“异己”投入高温水槽中活活烫死，然后私下将尸体掩埋。仮谷正清，原是东京都目黑区公证所事务长，他的妹妹加入了奥姆，奥姆要求她将自己的财产“献出”，仮谷阻止并发现奥姆在此过程中使用了违法手段，奥姆因此对他恨之入骨，他们将仮谷绑架到上九一色村，注射了针剂之后将他杀害，尸体被焚烧。

奥姆作为一个宗教集团，他们在干国家无法干成的事情。不但要跟中国、苏联的国家机关，国家领导人打交道，还仇视美国。受和平教育，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年轻人为何那么热衷武斗，这些或许是留待今后要解决的谜。

---

[1] 注意比较本尼迪克特的"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

[2] 野田正彰著 朱春立译《战争与罪责》昆仑出版社。

[3]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内蒙向外蒙发动进攻，日本史书称这次战争为"诺门坎事件"。

[4] 日本称库页岛为"桦太"。1905年日俄战争后，被日军占领的"南库叶"作为战利品割让给日本。

[5] 此时日本策划单方面向苏联投降。

[6] 《战争与罪责》第118页。

[7] 《战争与罪责》第141页。斯诺称，野兽吃饱了，还不攻击其他动物，日本军人禽兽不如。

[8] 永富后来出版了一本《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真正的战争责任是什么？》（1968年）水曜社。

[9] 《战争与罪责》第102页。

[10] 同上书，第96页。

[11] 《战争与罪责》第100页。

[12] 同上书，第96页。

[13] 同上书，第143页。

[14] 《战争与罪责》第160页。

[15] 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有人给单独关押的政变军人送去了装好子弹的手枪，然后不说什么，离开现场送枪者在监房外等待“结果”。

[16] 《续、现代史资料六卷》。

[17] 野田正彰著 朱春立译《战争与罪责》昆仑出版社　第236页。

[18] 1941年日本对英、美宣战后，学校的游戏改成向罗斯福、丘吉尔扔东西，将英、美的国旗踩在脚下，每天的早操都是由同一首曲子伴奏，那首歌的歌词是：“一二三四，打败美国，打败英国”。

[19] 转引自 吉开那津子记录《抹杀不了的记忆》，日中出版社　第14页。

[20] 星彻著 叶世纯等译《日本老兵忏悔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第161页。

[21] 长冈澄夫，日中出版社。

[22] 这一年是日本投降五十周年，战后第二次社会党人主持内阁。

[23] 以赢利为目的的训练班。

[24] 相当于现在的500亿日元。

[25] 参考美国人谢尔顿哈里斯著《死亡工厂》 上海人民出版社。

[26] 避孕套的隐语是“冲锋一号”。



第十二章 日本人的“谎言”



组织之人的秘密

我第一次与上祐史浩[1]见面是在日本电视台的《广角镜》节目制作现场。一个曾与奥姆真理教打过官司的辩护律师曾对我说，“我们说不赢他们”，因此我对这次电视辩论感觉紧张。这次节目的论题是“奥姆真理教与地铁内散布毒气”，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决不能输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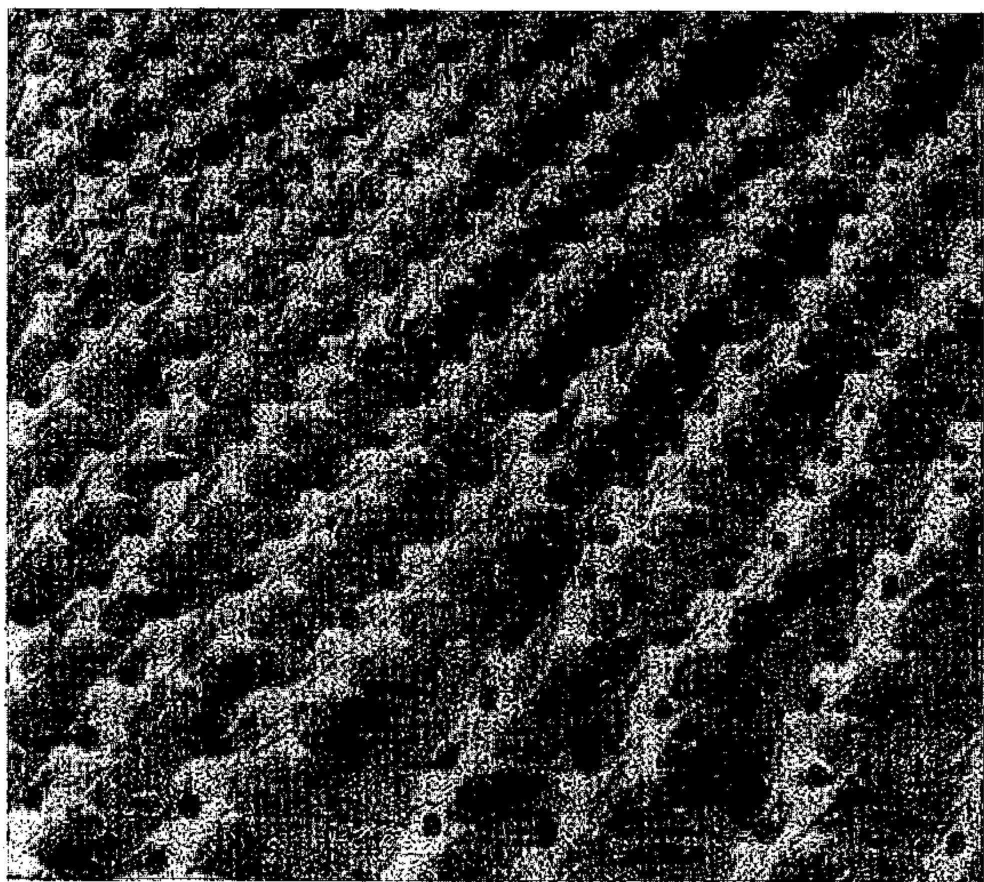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次辩论我们打了个平手。节目制作结束后，在大家闲谈的时候，我问上祐：“你从俄罗斯回来之后，是否觉得，哎，教团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制作节目时侃侃而谈的上祐，此时顿时语塞，他感叹道：我也是“组织之人”。

“组织之人？”此后我与上祐也多次见过面，可唯独他的这句表白让我终生难忘。[2]

何谓“组织之人”？如何看待“组织之人”？“组织之人”这个词通常用在什么场合？

上祐作为奥姆真理教的对外发言人，频繁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各类节目上，他不但可以对以擅长提刁钻问题的日本记者对答入流，而且英语也讲得很好，可以用英语与外国人直接交流。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他用英语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



二战期间接受军事训练的日本国民

日本政府将自己对外掠夺的战争称之为"圣战",用大和民族优秀无比来对国民进行"洗脑","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是日本要当亚洲乃至世界的老大。用"政府可以帮助你们'变大'"为诱惑,鼓励全体日本国民去当强盗。

在外国人记者俱乐部,记者们提问的焦点集中在奥姆真理教为什么囤积大量化工原料上。对此,上祐仍旧重复奥姆真理教的一贯说法:"因为尊师麻原预言世界将会爆发'最终战争',为了应付'最终战争'[3],我们准备了大量的化工原料。一旦'最终战争'爆发,我们不但要从事农业生产自救,还要对社会进行'救济'。"

针对上祐面不改色、似乎滴水不漏的回答,一个法国记者拿出自己潜入奥姆化学工场内部拍摄到的照片,愤然斥责上祐是一个"说谎者"。

从此之后,日本各大传媒不断引用法国记者的"You are a liar"这个表述,或做标题,或单辟一个栏目,大肆报道。

日本一家电视台专门派记者到上祐的弟弟家采访,问他是否看了电视或者报纸,请他对法国记者称他哥哥上祐是个"说谎者"谈下感想,并问他在与哥哥上祐在一起生活期间,是否觉得哥哥上祐是一个爱说谎的人。

上祐的弟弟拒绝在电视镜头前露面,他通过自家房门上的对讲机,非常平静地回答门外记者的提问,他回答说:"我哥哥本质上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但是,他现在是'组织之人',他的立场不一样了"。

他再次使用了"组织之人"(そしきのにんげん)这一说法,巧妙地回答了门外难缠的日本记者。在日语中,"组织之人"与"说谎者",实际上是同一个内容的两种表述。他一方面否认了哥哥上祐天生爱说谎;另一方面他承认哥哥上祐是在说谎。而这一切都为了他所在的组织—"奥姆真理教",在日本,属于某个特定组织(集团)的成员,为了组织杀人都是正当的,别说为了组织公然"说谎"了,这些都是"小菜一碟",它是对自己所属组织的"忠"的表现。谁都知道"说谎"是"老鼠过街"的行为,可为了自己所属集团,牺牲生命都应在所不惜,更何况为了组织利益说几句谎了,不为组织作为才是"胆小鬼"行为,是"组织"的"叛徒"。



在日本人看来，社会上存在不同利益的集团，集团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一个集团“大赚”，很可能是另外一个集团的“大赔”，因此，不同集团成员对利益的看法往往不一致，截然相反是经常发生的。将本集团利益视为最高利益，是集团对其成员最低要求，同时也是集团得以维系的关键。日本允许集团在“内外”具有双重标准，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集团成员不能受集团外价值观之左右，这样才叫“立场坚定”，也是组织对成员的要求。组织不承认超越本集团之外的、社会普遍认同的真、善、美。

美国说的“太平洋战争”，到了日本就变成了“大东亚战争”；中国说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到日本领导人口中就变成了“解放战争”。反法西斯联盟拍手称庆的“日本投降”，日本领导人视其为“终战”。这就是不同集团对于同一对象存在不同见解，有不同定义及表述的典型事例。

还比如“救济”，它也是“一新”之后的日本人常用的一个词。日本人称自己是“先觉者”，较其他亚洲国家的黄种人觉醒得早，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有超前、领先的觉悟，因此，“拯救”与“挽救”亚洲国民就变成他们的责任和使命。明明是扩张、侵略，日本人称中国人不理解日本人的“真意”，因此要派兵来镇压。将“屠杀”也说成是“救济”。

“奥姆真理教”也同样。教组麻原是“先知”；不入教追随属执迷不悟、顽固不化。社会上的“俗人”每天为各种欲望所累，需要教团成员前往“拯救”，“救济”是他们的责任。麻原预言 1997 年会爆发“最终战争”，在此之前要先让一些反对奥姆的人“最终解脱”。“最终解脱”的另外一个印度语表述是“泼啊”，而奥姆的隐语行话就是“杀了他”的意思。“将某人杀死”，变成是“帮助他实现最终解脱”的“救济”行为，而收购大量化工原料，目的在于制造更多杀人毒气，它同样是为了“救济”。

前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教职任专职电视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为国会议员的舛添要一，曾在他的书中严厉批评过一些“非组织之人”。

我在东大当教授时，如果给学生严格打分，那就会造成大量学生留级，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送分给学生。现明治大学的那位教授，因为对学生评分严格，致使不少学生留级。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学者理应如此，他做的是对的，但是，如果作为“组织之人”，这位明治大学教授是不合格的。也就是说，大学这个组织对教师的要求是：无所谓学生聪明还是傻，努力与否，让他们在大学混四年，然后礼送他们毕业走人。[4]

这是说有一个明治大学的教授，他属于"教授中的东郭先生"，他"迂腐"到了不明白自己属"组织之人"的地步。他给选他课的学生出题考试，发现很多人胡乱答题，结果他给这些学生打不及格分，为此学生向学校投诉教授，学校下令教授给学生及格分，可该教授"不识时务"，认为这样做违背了自己的学术良心，拒绝向校方压力屈服，教授最终只能选择辞职走人，教授为了"学术良心"而丢掉了饭碗。

舛添要一首先承认自己在东京大学当教授时是个"识时务"的"组织之人"，闭着眼睛判卷打分，让每个学生及格。在舛添要一看来，为了"学术良心"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这太不值得了！即便在东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名校，"二混子"学生多的是，可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它的方针是给所有学生都"亮绿灯"，放行毕业，而不是"亮红灯"让部分人不及格。让所有学生在学校混四年拿到毕业证走人，这是大学这个组织的一贯方针。一个身在"组织"之中的教授，竟然连组织的规矩都不清楚，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组织之人"。要良心而拒绝服从组织，这就是跟组织作对、唱反调。不可否认，明治大学教授是一个高尚、有自己信念的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不谙日本组织规矩"的蠢蛋，为了坚持"原则"而丢掉了饭碗。

舛添要一说的不错，"良心"与"良知"值几个钱？作为武士的后代，最应该清楚谁掏钱养武士。武士从领主那里获得"恩给"，在全世界还没有职业军人一说的时候，日本就有了领工资的职业军人，领主要你砍谁就应砍谁，哪有说要自我判断领主决定善恶之后才行动的?！是非判断不属于武士的行为，"无我"地服从组织行动才是"忠"，否则就只有被"废"当"浪士"一条路了。

上祐是"组织之人"，为了维护"组织利益"，奥姆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

像时钟一样准确运转的组织

《格鲁日记》1932年6月14日

拜会天皇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不断地跨越难关。实际上，每次克服了一个困难之后，回过头来再回想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它像最初想像地那么困难。担心，往往来自于对未来困难的不应有的畏惧。





昭和天皇签署日本国宪法及宪法文本

这张照片极具象征意义，天皇制保住了，作为交换，昭和天皇在美国制订的《和平宪法》上签字，《新宪法》从此生效。

十时二十分，皇室的仪仗队到达大使馆。无论是马车还是担任护卫的近卫骑兵，有了仪仗队执行起来就很容易了。大使馆员们穿上燕尾服拍照，在我们整队拍照的时候，礼宾部次长黑田伯爵迎面向我们走来。瓢泼大雨，让使者以及骑兵中队长帽子上的羽毛全都湿透了，但是，大雨并没有将刻意安排的、象生日蛋糕般精美的日程出现任何紊乱。十时三十五分出发。队列前后是近卫骑兵，中间是使馆馆员的马车。美国大使一人坐在华丽马车的后排，对面坐的是黑田伯爵。训练有素的警察让所有交通停下，无论是电车还是出租车中的乘客，包括来往的行人都向我们鞠躬行礼，我用挥舞礼帽的方式表示答谢。

当我们进入了美仑美奂的宫城之后，近卫兵们向我们行立正礼并奏乐，十时五十分，分毫不差，我们准时到达宫殿门口。礼宾部长官林男爵出来迎接我们，然后将我们引入休息室。休息室中早已有很多官员在等候，斋藤子爵也在其中。不一会，爱丽斯与爱露西以及大使馆的其他夫人们也到了。我们休息了大约十到十五分钟，

休息室异常华美，尤其是其中的屏风以及涂了漆的房门让人叹为观止。不久被带入天皇的房间，在门口行了礼之后，走一步行一次鞠躬礼，到天皇面前时再行一次鞠躬礼，共行了三次礼。

我向天皇致以问候。翻译是白鸟，他以外务省的发言人而闻名，他将我的英文翻译成日语，白鸟是说话不谨慎的人。我将委任状及招回前任大使的国书交给天

皇,天皇将日语的公文用一种高亢的声音朗读一遍之后,白鸟将其翻译成英文。上述过程结束之后,还有"握手"仪式,天皇向我问了两三个问题。我只听懂了白鸟翻译的四分之一的内容(白鸟知道我耳朵背,但是在天皇的面前不能大声说话),但是回答问题时,我只能设法让我的回答完整一些。天皇说等会还要见面,我赶忙向他一一介绍我们的馆员,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会见大厅。依照规定,还必须鞠躬三次,在退出时也要鞠躬三次。我们的馆员和我都三鞠躬后才退出,整个仪式,一切都像时钟一样准时并且庄严地进行。

天皇裕仁很年轻,听说只有三十一岁,留着小胡子,带着眼镜,说话时总带着微笑。当然他是身着军装接见我们。天皇、秩父宫、高松宫这三个兄弟长得非常像。

拜见天皇结束之后,爱丽斯、爱尔西和我,我们三个人去了皇后的房间,当然这里不必提出书面的正式问候书以及委任状,但是在这里也行了同样的礼。我将大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夫人们介绍给了皇后。皇后比其他的日本女性更像"日本人偶",虽然没有秩父宫妃那么可爱、漂亮,但是总是面带微笑。高木夫人担任翻译,依然是很小声音,许多内容我都没有听到,庆幸的是爱丽斯将所有内容转达给了我,假如没有她这样再次传达,我将无法回答皇后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我甚至觉得,如果要听到我有条理的回答,那么他们首先必须大声说话。耳朵背的确是一个缺点,但是在日本宫廷中这个问题尤甚。

我们原班人马原路返回大使馆。黑田伯爵、骑兵队长及大使馆员等回到大使官邸后,我用香槟在我的办公室中招待了他们,一切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因为回到官邸之后,我们必须更换晚礼服,这次我们将乘自己的汽车去皇宫出席午餐会,到再次出发时间为止,只有短暂的七分钟。我们在十二时二十分到达皇宫,在与秩父宫两殿下、斋藤子爵夫妇、牧野伯爵、林男爵、松平伯爵夫妇以及其他来宾交谈的过程中,天皇悄然而至。我将爱丽斯以及爱路西介绍给天皇后不久,我们一起步入宴会厅。

午餐比我想像得要简单,依然是在静谧中进行,天皇夫妇不断地用轻松的话题向我们提问。因为两个人都说日语,必须借助坐在饭桌对面、他们身后的翻译才可以进行交流。出席宴会者步入宴会大厅时,所有侍从都恭恭敬敬地低下了头,在天皇夫妇面前,无论是谁都要低头鞠躬,而且这种鞠躬远比欧洲宫廷中的要低,鞠躬的时间也长。

一起吃饭的大概有二十四到二十六人。秩父宫夫妇坐在餐桌的右侧,爱丽斯坐在天皇的左侧,内大臣枢密顾问牧野伯爵之间,我坐在皇后的右边,另一边是高



木夫人。爱尔西坐在礼宾部的两个官员之间。

菜与饮料都属上乘，小乐队隔着屏风在背后演奏着乐曲。在我看来这个房间真漂亮，接见大厅更华丽。宴会厅中的部分家具略显粗糙，还有很多重厚的帷帐。但是面前放置了一些矮小的松树和鲜花，这些比豪华的金屏风、餐桌上盛开的鲜花更吸引我的目光。爱丽斯与牧野谈话投机，通过牧野与皇后进行的对话也很有趣。牧野是一位真正的绅士，这么说来，出席午餐会的所有人士都是出色的绅士。我们与牧野就卡麦龙福布斯的前任，比尔卡什等交换了意见。

通过高木夫人，我与皇后的交谈从未间断，高木夫人后来声音越来越大，让我能够听到她的翻译。皇后似乎对所有事物都非常感兴趣，谈及我们的经历、旅行、以前的任地、喜欢的体育项目、家庭，从马尔莫拉海到黑海，到游泳穿越十九英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虽然是一点点，但是最终将我们的所有内容都问到了。午餐会结束后，分为不同的几个小组。天皇通过白鸟问了我土耳其的事情，皇后与爱丽斯和爱尔西交谈。两点整，林男爵准时走到我身边通告，我们在向天皇夫妇行礼之后，今天的午餐会结束了。

格鲁 1932 年 6 月 6 日到达东京，他的回忆录名为《使日十年》。因为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日美之间从此断绝了外交关系，他在出使日本的第十个年头作为“交换外交人员”返回了美国。他到任的前一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件”；赴任这一年，日本将中国“东三省”变成了“满洲国”，“五•一五事件”刚刚结束，“稳健”的海军内阁刚组建完毕不久。他出使日本的十年，正是日美关系非常微妙，内起青萍之末的十年。

从格鲁当天的日记内容可知，递交国书当日的、格鲁的最大感受，不是见到了作为国家元首的“现人神”天皇，而是对日本人彬彬有礼的态度，严格精确的行为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描绘当日日程安排时，他用了诸如“像生日蛋糕般精美的日程”“分毫不差地进入宫殿”“一切都像时钟一样准确并且庄严地进行”这样的表述，他在赞美日本人一丝不苟，精确得像一台精密的瑞士时钟等日本人特点时，不惜笔墨。



被故意"拨慢"的"时钟"

在这个星球上竟然有像日本这样的、可以撒出如此弥天大谎的国家。

美国国务卿赫尔

1941年12月7日下午2时5分，日本驻美国的野村、来栖两位大使来到了美国国务院。恰巧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国务卿赫尔打来电话。罗斯福的声调虽然很平静，但话说的很快：

"我接到报告说，日军攻击了珍珠港。"

赫尔问："你已经核实了那个报告吗？"

"还没有。"总统回答道。

赫尔向总统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大概是真的。然后他向总统建议，打算现在就见日本的两名大使，进而核实这个报告。

国务院法律顾问哈克罗斯和远东司长瓦伦丁都在赫尔的办公室里。赫尔对他们两人说："从总统那里接到未经证实的报告，说日本人攻击了珍珠港。日本大使来见我，我知道他们来见我的目的。他们是为拒绝11月26日美国的备忘录而来的。或许是来递交宣战通告的。我真不想见他们。"

赫尔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又一想，从总统那得到的报告还未得到证实，也有可能是误报，哪怕这种可能性很小，也应该通过接待来者确认一下。于是，他决定会见两位大使。

下午2时20分，野村、来栖两位大使走进了赫尔国务卿的办公室，赫尔对两位大使的态度很冷淡，连座位也没有让一下。

野村大使说："日本政府电令我们在下午1时将这个文件递交给贵国政府。可是，没想到译电用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晚了。"

野村边说边把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递给了赫尔。

赫尔问："为什么最初把会见时间定在下午1点？"

野村回答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这是根据政府的电令做的"。

赫尔摆出在看野村递给他的文件的架式。赫尔早已知道了这个文件的内容，然而他当然不能流露出来。赫尔读了两三页后问："这个文件是根据政府的电令提出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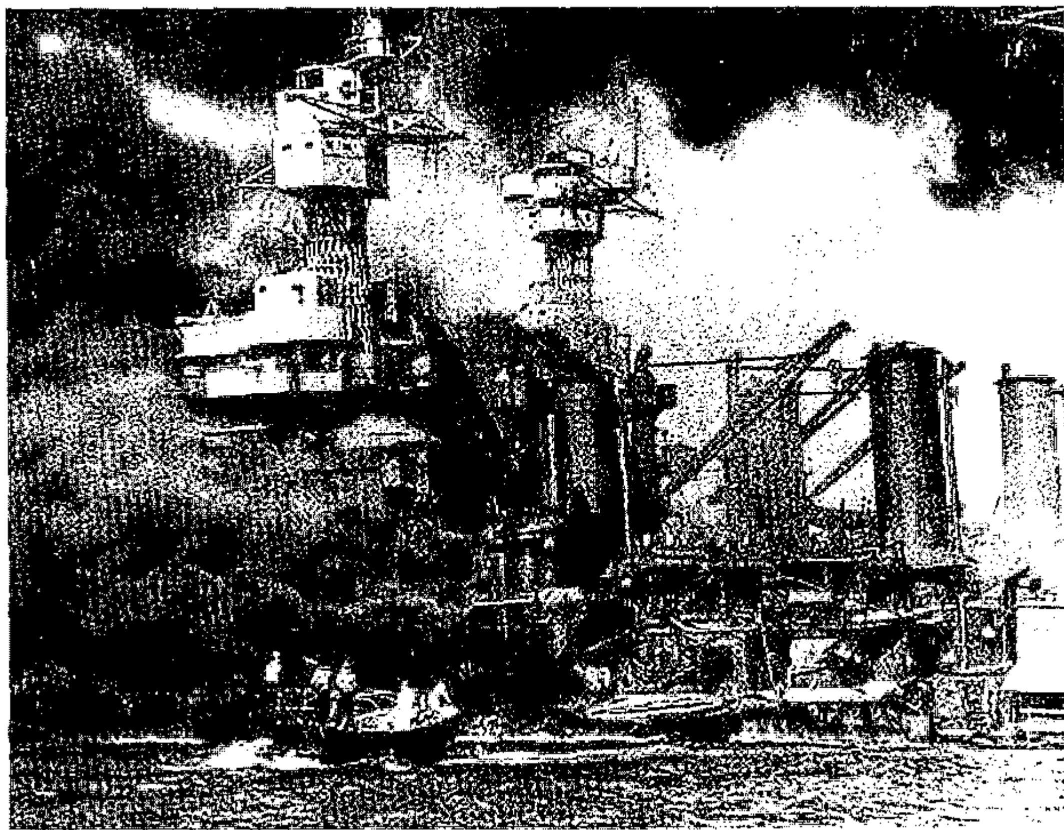
野村回答说："没错。"

赫尔看完这个文件，又面向野村，瞪着他说："直截了当地说，我在过去和你谈判的九个月期间，从未讲过一句谎话。这一点，如果你看看谈判记录，就会十分清楚。在我整个50年的公职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充满了无耻的虚伪和歪曲的文件。我至今做梦也想不出，在这个星球上竟有撒出如此弥天大谎和强词夺理的国家。"

野村好像还要说几句话，赫尔挥手制止了想要说点什么的野村，扬起下巴指着门的方向，要他们出去。

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两位大使默默地先后握了握赫尔的手，悄悄地走出了国务卿办公室。据《出使美国》记载，"野村大使辞别国务院时态度毅然，然而他的眼眶中却闪着泪花。"[5]

平时精确得像时钟一样的日本人这次却出了差错，而且是个不小的差错，约好1点会见美国国务卿赫尔，可他们临时通知，将时间改到了2点，推迟了一个小时。实际上，任何人都有可能做错事，日本人也会有偶尔不准时的时候，作为美国国务卿的赫尔，为此事苛求并大发脾气似乎太没有绅士风度，还是日本使节显得有涵养，赫尔发脾气他们也要压制住内心的兴奋。结果最重要，这次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人将所有细节都注意到了，而且没有出现丝毫差错，唯一不足就是野村晚到了一个小时，递交宣战书时，日本第一次空袭飞机已在返回航母途中，他们在40分钟前已将所携炸弹都倾泄在了珍珠港中的美国军舰上，远在日本东京的陆海军大本营、长门号舰艇上的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都知道了日本偷袭成功，他们庆功酒都已经喝完了，唯独美国人太麻木，日本飞机来投弹，夏威夷的美军竟误认为是演习；华盛顿的最高层在日本人通知后才"如梦初醒"。



偷袭珍珠港

偷袭珍珠港时，严格守时甚至到了苛刻地步的日本大使，在约好去见美国国务卿时竟然意外地"迟到"了。其实并非精准的"日本机械"出了问题，而是日本人人为地将它"拨慢"了，"先后"是非常有讲究滴！为了达到目的，手段以及道义都在其次。

“建前”（たてまえ）与“本音”（ほんね）的奥妙

“建前”（たてまえ）与“本音”（ほんね），这两个表述都是由两个汉字组合而成的表达，日本人称之为“熟语”，翻译成汉语就是“复合词”的意思，但是上述两个表述在汉语中并不存在，它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汉字表达，若翻译成中文，就是“表面”和“真心”的意思。

“建前”这个词最初来源于建筑房屋。日本多地震，自古以来建造房屋的主要材料是木头。建房时分工明确，有专门搭建框架的，还有在框架搭建好之后砌墙、安装门窗、建屋顶、铺塌塌米的。“建前”就是指一栋建筑完成之前的摸样，这时只能看见几个主要木柱构成的框架，是房屋还处在“有名无实”的阶段，有点像中国所说的“烂尾楼”。因此，该词后被转用于表示“假、大、虚、空”，有“虚名”但“名不副实”的现象、行为、事物等，都可以说是“建前”（たてまえ）。因它的引申义被频繁使用，当初来源于建筑的本义反而多被遗忘。

日本每年的“情人节”，都是未婚女孩送礼的季节。女孩子在购买礼品的过程中，会将礼品分为“义理”（ぎり）与“本命”（ほんめい）两个部分。对于何谓“义理”，日本的《大辞林》是这样解释的：（1）事物的正确之理、道理；（2）在人类社会中必须遵守的规范、道义；（3）人类交往中不得已的行为。

日文中有“义理的父亲”这一表述，翻译成中文就是“岳父”的意思。没有血缘关系、但有“道义”上义务的就是“义理”；“名义”上的“父亲”就是“岳父”。这时的“义理”，可以作“道义”“名分”解。在通常情况下，“义理”与“人情”（にんじょう）是近义词，表示社会上的约定俗成，作为个人来说，只能顺从，不可抗逆。

送出的众多礼物中，只有一个是“本命”（ほんめい），其他都属于“义理”（ぎり）、“人情”（にんじょう）。也就是说，除了一个是真心想送的之外，其他的都是碍于社会习俗、情面，不得不送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大量送出“义理”是为了混淆“本命”，让“真”隐藏于“伪”中。换言之，用“伪”掩盖“真”，让人“真假难辨”。“本命”（ほんめい）与“本音”（ほんね），都是以“本”打头，“本”是“真”，“命”是“真正的追求”，“音”是“真正的想法”。

在中国人看来，要么送，要么不送，碍于人情世故的“送礼”也是“送礼”，哪里

有送“义理”是为了掩盖、模糊“本命”那么复杂呢？可日本人喜欢这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鱼目混珠”才能凸显“珠”之珍贵，才能考验智慧，10个外包装相同的礼物，九个是“虚名”的“鱼目”，只有一个是“真心的”的“珠”。

对收礼者来说，辨别“真假”很重要。不能一收到“礼物”就想入非非，判断该礼物是“本命”还是“义理人情”，辨别“虚实”非常重要。当外包装明显华丽过礼物本身并且没有缘由时，收礼者应该警惕为何会收到“礼物”。仅仅是“空名”还是“别有用心”？“本命”“本音”涉及到送礼者的切身利益，它是对方的意志表示，换言之，只有涉及到送礼者的切身利益，才会有“本命”的真礼物送出。

日本人之对“外”，也好似日常生活中之送礼，无关者，既无“本命”更没有“义理人情”，存在利益关系之后，才会有“本命”与“义理”，也就是说，才会有“真假”到来。越涉及核心利益，越要用“义理”掩盖“本命”，越要用冠有虚名的东西掩盖“真”。听起来非常动听，看似精美华丽的东西，往往只是外包装，它是“伪”与“假”，是为了迷惑对方的“迷药”，否则干脆什么也没有。

在国家间的交往中，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对一个赤裸裸的利益进行豪华外包装，就是日本人常说的“大义名分”。近代日本要抢占资源、垄断市场，让日本人成为“人上人”，这是日本人的“本命”，从此开始“送礼”，你不要也得要，“掠夺”说成是“共荣”；“瓜分世界”包装成“建立世界新秩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大战之前日本都要“送”出“和平”大礼，用“和平烟幕”掩盖“战争”。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手段 //////////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署《防共协定》，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对华战争[6]，此后日本扩大解释《三国防共协定》[7]，要求德国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希特勒响应日本的要求，下令撤回军事顾问，终止对国民政府继续出售武器。日本还要利用德国压制苏联，不准苏联支持国民政府。为了日本，德国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武器市场，同时还失去了一个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德国与日本签署的《防共协定》，只方便了日本。

长江流域是英、美传统的势力范围，日本入侵造成英、美在华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害，对于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来说，德国期待日本能在亚洲牵制自己的欧洲对手英国；而日本要在英、美势力范围内扩张，也需要一个欧洲“盟友”。这无疑是两国后来越走越近的基础，但双方都期待对方先将“火烧大”，这样才能让自己在家门口“趁火打劫”收获大。



轴心国三罪魁

日本正式加入轴心国组织，标志着瓜分世界的组织架构完成，接着就是行动，发动世界大战，从此世界上出现了膨胀与遏制的两大作战集团，这也是对日本武士的战争总清算。此图从左到右依次为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这三人最后都得到了最可耻的下场。

1939年4月开始，日本在外蒙古与苏联红军交火。日本陆军的精锐关东军，实战中根本不是苏联的对手。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突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首相平沼于8月28日总辞职，接替者是陆军大将阿部信行。新内阁成立的次日，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年度预算成立之后，阿部下台，海军大将米内光政上台，日本用“旁观”来“窥伺机会”。1940年4月德国占领了挪威和丹麦，接着攻占了荷兰、比利时，6月14日攻占巴黎，22日法国投降，英国退出欧洲大陆。英、法、荷在欧洲陷入困境，东南亚殖民地变成了失去了保护的羔羊。日本自1895年统治台湾之后，就一直垂涎东南亚，而英、美怂恿日本“北进”。看到德国为日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日本再也按捺不住“不介入”了，迫不及待地要加入“轴心国”。

1940年6月24日近卫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发表“建立举国一致政治体制”的声明。7月16日，陆相畑俊六辞职，他将米内内阁引爆。1940年7月22日，以近卫为首相的新内阁成立，两个月后的9月27日，日、德两国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要与德国携手重建“世界新秩序”，在德国忙于欧洲战争的1940年、1941年，也是日本外交最繁忙的年份。日本9月刚与德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半年后的次年4月，就与苏联签署了“中立条约”。日本就剩与英国、美国没有签署条约了，从日本与德国、苏联签署条约的速度以及日本希望通过签署条约想要达到的目的就可以知道，日本不可能再与英、美签署一个与“三国同盟”相克的条约。英、美

一直要遏制日本扩张，正因为他们是日本扩张的对头，日本才选择了新的伙伴——德国。与德国“联姻”是“本命”；与英、美是敷衍的“建前”。

松冈1941年3月出访欧洲，当时日本驻英大使是重光，重光对英国首相丘吉尔称：“日本愿从中调停欧战”。他要丘吉尔提供专机，送他赴中立国瑞士与松冈见面，丘吉尔同意并且安排好了，可重光后来称这次“和平之旅”受到德国的阻挠，松冈无法成行，而他也就不能开展调解了，驻外大使要让外务大臣更改外交方针？这在“纵向”严厉的日本，属于“下”克“上”的行为。

松冈借道苏联返回日本时，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联大使斯坦因哈特会晤，而哈特本人与罗斯福总统是至交，松冈警告美国不可轻举妄动。松冈访欧期间，哈瓦德（哈瓦德新闻网的老板）曾发电报给松冈，表示愿意提供专机去罗马接他去美国，安排他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见面，可遭到松冈拒绝。

第三次近卫内阁的诈术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与苏联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大举入侵苏联，针对欧洲出现的最新国际形势，1941年7月2日上午10点，日本领导人在皇宫举行了决定日本历史命运的“御前会议”，会议审议了《适应形势发展的帝国国策纲要》。会议决定：进攻越南，不惜对英美宣战。

会议结束后，日本外务省立刻将纲要作为国家机密，于7月3日电传至日本驻美国、德国、苏联和意大利等国大使，严令只能大使阅览，口头传达给陆、海军武官，5天之后的7月8日，这份日本的绝密文件就被放到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办公桌上。美国截获并破译的日本绝密电报证实：日本对美谈判是“谎言”；未来对英、美宣战是“本音”。

日本认为自己文化特殊，复杂的日本假名、汉字外加日本人的充分表演，会让美国无法看透日本。为让美国觉得松冈过激，近卫稳健，近卫用总辞职、第三次内阁不让松冈再入阁的方式，“牺牲”了松冈，与美国继续谈判目的在于：在不激怒美国的情况下，抢占东南亚的战略要地，为今后全面入侵确保机场和军港。

日本是个“纵向国家”，凡事讲究“主从”，一旦决定了“主”，从属者必须全力辅助主导者。日本要“南进”，担当者是海军，因此，所有机器必须围绕海军来开动，为了保证达到目的，海军对陆军、政府提出的要求，后者必须全力以赴地积极配合[8]。无论战败后日本人如何说“政府被军部劫持”“政府是军部的傀儡”，可事实表明，政府是积极配合军部行动的帮凶。近卫内阁7月16日宣布总辞职，7月17日天皇

下令再组阁，18 日组成“第三次近卫内阁”，19 日日本政府向法国维希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法国在 7 月 24 日上午零点以前就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作出答复。

内阁改组，只将松冈一人“清除”出去，日本的既定方针丝毫没有改变，组织“斩杀”松冈，实际上是政府“阳动作战”[9] 的一部分。对于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只将松冈赶出内阁的原因，战前日本向美国的公开说明是：“这次内阁总辞职是为了把一个耍酒疯的同僚从宴会场上拖出去。”[10]

而近卫改组内阁后给野村大使的密电中却是这样说明的：鉴于美国强烈反对我国驻军[11]，我方的目的是通过更换占领地区、更换官员，解除美国的疑虑。”[12] 原任商工大臣的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转任外相，日本要向美国表演：从此之后外相与驻美大使都是海军出身的“稳健派”，一元体系有利于统一步调。

21 日下午，第三次近卫内阁召开了首次联络会议，新任外相就今后方针发言道：“我担心驻各国的大使、公使们会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国家政策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因此，我已发报通知他们说，既定方针不变。特别是向大岛（驻德大使）、建川（驻苏大使）、野村（驻美大使）、崛切（驻意大使）各位大使详细地转达了国家的政策，告诉他们一如既往地干。另外，也向驻京的德、意两国大使转告：尽管外相易人，但日本的态度不变。”

美国时间 7 月 21 日，美国方面破译了新外相丰田 7 月 19 日发给日本驻德国大使的电报，该电报佐证了丰田在联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内阁更替是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别无他意。日本的对美政策不变，并继续恪守三国同盟的原则。”

内阁改组、新内阁成立，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对外政策将发生任何改变，说“将耍酒疯者拖出了会场”，可拖出去的人是“装疯卖傻”，日本的华丽表演，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国已经截获并且破译了他们发给海外使领馆的电报。美国人同时破译了日本驻广东总领事 7 月 14 日发给外务省的密电。密电明确表示：“先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下一个目标是荷属东印度[13] 和新加坡，要彻底粉碎英、美两国的军事力量。”[14]

美国对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在扯谎了如指掌，美国佯装不知与日本周旋。7 月 21 日日本海军占领金兰湾，26 日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资产，8 月 1 日又宣布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在此之前的 7 月 29 日，荷属东印度政府作出决定，所有对日本出口都必须经过政府的特别许可。28、29 两天，日本军队在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登陆，完成了所谓“和平进驻”的任务。

对于日本人如何利用谈判施展“诈术”，苏联驻日本大使曾经如此告诫他的同行——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

1933年初，苏联外长利托维诺夫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大田为吉表示：苏联愿意出售中东铁路。5月日本回复苏联，满洲国愿意收买该铁路。6月开始在东京举行磋商。当时的外相内田康哉曾邀请苏联代表和满洲国代表在外务次官官邸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至广田任外相时，由他亲自斡旋，于1935年3月11日签订临时协议，3月23日签订正式协议。

《格鲁日记》1934年3月9日

我问大使对谈判的最后结果是否乐观。[15]他用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回答：“假如日本人有心避免和苏联打仗，就可以达成协议。”我对他说，这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为，假如日本人不妥协，苏联就要宣战。他答道：“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真意是，假如出售铁路一事不能达成协议，这个事实就将是一个重要迹象，表明日本人意在求战，并将以谈判失败为口实，使日本舆论确信有理由进行这场战争。日本人在公布的文件中已经泄露天机，扬言不论谈判成功与否，他们都要取得这条铁路。[16]

苏联人同时向他讲述了一个俄国寓言。[17]

“一个厨师发现猫在偷吃鱼，结果厨师开始对猫说教，猫一边听一边继续吃着鱼。”

苏联人强调：要借鉴日本的对外行动来理解这个寓言。

苏联人准确地把握住了日本人的行为特点，日本人喜欢事事占便宜，准备打仗抢夺的东西，就不会花钱买；而要买就说明暂时不想打仗。日本人想打仗时，一定会先开始谈判，要通过谈判为战争制造借口。谈判过程中会故意提出完全脱离常规的要求，有意造成谈判破裂，然后将破坏谈判的理由强加给谈判对手，以此煽动国民情绪。谈判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麻痹对方，让对方在冗长的谈判中丧失警惕。两条都被苏联人说中了，日本人通过向美国派遣的“和谈代表”，大肆散布“和平烟雾”，为了“和平”的表演，调子越高，就越临近表演收场，也就意味着越临近战争，一边谈判，一边不断派兵蚕食，抢占战略要地，为未来爆发的全面战争布局。

各司其职的“钟表”

带来战争的和平使者

野村吉三郎(1877-1964)出身于和歌山县,1898年毕业于海军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间,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这时美国的海军部长副部长是罗斯福,他就是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九事件”,野村率领海军进攻上海,在后来举行以“庆祝天皇生日”为名的庆祝日本战胜纪念仪式时,朝鲜青年向观礼台上投掷了炸弹[18],野村失去了一只眼睛。1933年他升任海军大将,1937年编入预备役,1939年起,他出任阿部内阁中的外务大臣。

1941年1月23日,在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提出偷袭珍珠港设想的半个月后,他作为日本新任驻美国大使赴美。日本报纸大肆宣传称,野村赴美标志着“日美关系新纪元”。美国方面也不甘示弱,在他抵达夏威夷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派遣两艘驱逐舰到港外迎接“和平使者”;2月6日野村到达美国旧金山时,当地鸣放19响礼炮迎接,各大报纸刊争相刊载消息,发表照片。



野村吉三郎(左)抵达夏威夷

美国人对野村的热烈欢迎并没有“软化”野村,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使者。在整个日本都对“土地”、“资源”的狂热追求中,仁义道德变成了获取最大国家利益的障碍。你相信使者前来商谈和平,那因为你是美国的“东郭先生”。



野村在美国的九个月时间里，与赫尔之间共进行过45次会谈，与罗斯福本人会谈九次，平均一个月见一次美国总统，五次会见美国国务卿，作为一个国家的大使，可以经常与所在国的总统、国务卿见面，完全是超常待遇。日本派遣野村，一是看中他英语好，还有他与罗斯福总统有一定交情，以朋友身份提出要求，美方不好拒绝。野村要利用“老朋友”之谊让罗斯福相信他；可他并未因为对方是老朋友，就将日本的真实意图泄露给罗斯福。

不过美国人知道“机器不会撒谎”，国务卿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依靠‘魔术’[19]破译的电报，我们能掌握日本外务大臣发给野村以及其他代表的训令的大部分内容。也能知道野村发回东京的关于同我（赫尔）会谈的报告。这些内容表明，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而另一方面却在推行其侵略计划。看着这些截收的电报，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在为反对自己主张的人作证。当然，我必须注意，不能给野村留下丝毫我已掌握这种特别情报的印象。我必须在我从野村或者从普通的外交人士那里听到的情报范围内与野村进行日美会谈。”[20]

自从1940年9月美国成功破译了日本的密码之后，日本发往各驻外使领馆以及使馆发回给日本政府的密电，就好似同时给美国人留了一份拷贝，都源源不断地漏进了美国人的口袋，日本人对此全然无知。有些所谓高度机密，甚至规定只能供大使本人阅读的文件，可这些也对美国人无任何密可保，日本人完全沉浸在虚妄的自我安慰与自我满足之中。他们自认为“表演”得十分逼真，没有任何破绽，而美国人已经完全被他们的“表演”所吸引。美国人的确在看他们的“精彩表演”，但将野村等作为马戏团中的小丑来看待。日本人明明是赤身裸体的皇帝，完全暴露在美国人面前，可还自我感觉良好地陶醉在没有被揭穿的“新衣”中。

8月9日，在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岛的阿金夏湾中的美国巡洋舰“奥格斯塔号”和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举行了大西洋会谈，双方于14日共同宣布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方针的《大西洋宪章》。双方保证不扩张领土、不侵略、民族自决、削减军备、建立全球安全保障体系等。

参加会谈的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于8月15日、比总统先一步回到了华盛顿，他带回一份依据美、英两国首脑在大西洋会议中取得一致意见的“对日声明”。韦尔斯与赫尔国务卿和远东问题专家研究了这个声明之后，感觉有些词句过于强硬，修改之后，赫尔决定请总统罗斯福本人将声明交给野村。

8月17日下午4时半，野村大使应美方之招来到了白宫。这天正好是周日，罗斯福告诉野村，他乘坐军舰去了大西洋，与丘吉尔举行了会谈，接着他将美国的对日本声明交给了野村大使。对于日本提出近卫访美并与罗斯福总统会见一事，

罗斯福装做认真考虑的样子说:“到檀香山去有困难,医生不允许我乘坐飞机。日本首相来旧金山或西雅图大概困难,那么,到朱诺(阿拉斯加的城市)怎么样?从日本到那里要多少天? 10月中旬前后的气候怎么样?”



8月28日,野村再次来到白宫,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近卫的信和针对8月17日美国建议的答复。近卫的信主要有两个内容:局势紧迫,希望早日开始举行会谈;地点希望在夏威夷。

对于近卫如此热中于“和谈”,罗斯福总统向野村提出了如下疑问。

“将军,近卫公爵的电报确实写得好,我深受感动。但是,就像在将军和赫尔国务卿谈得火热的时候,日本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一样,我怕当我和公爵举行会谈的时候,日本又进驻了泰国。”

野村:“不会的,总统,我确信决不会发生那种事。”

罗斯福:“我想和近卫首相会谈三天左右。”

野村:“那么,地点在夏威夷可以吗?”

罗斯福:“不,夏威夷不好。”[21]

野村或许“真”不知道日本方面为什么那么热中夏威夷,同时,日本方面传来的消息是正全力为近卫访美进行准备。

9月2日的“御前会议”决定:10月10日是对美谈判的最后期限。

近卫从“御前会议”会场出来之后,立刻打电话找到他正在美容店做美容的情人,要她立刻结束并派车将她接到伊藤博文的府邸,此时该府邸的主人是伊藤博文的儿子伊藤文吉,近卫计划在那里接待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为了表现他与美国“肝胆相照”,他提议每人只带一个助手前往,近卫的随行人员是他的私人秘书兼翻译牛场友彦。他同时通知格鲁,要他乘坐卸去外交牌照的汽车前往,这些“善意”提醒的目的,意在暗示日本国内形势严峻。现在日本全民都反美,近卫与美国谈判表明他顶住巨大压力,甚至不畏牺牲,日本的目的只有一个:竭尽全力避免对美战争。只有美国给予实际“让步”,日本国民才会喜欢美国,他这个亲美人士才至于被推翻,才能够继续为“日美友好”发挥作用。格鲁只带了翻译士曼,士曼从小生长在日本,居住时间长达23年之久。日本的总理大臣用私密方式会见一个国家的大使,无论是方式方法还是地点之选择,都是史无前例的。近卫将自己的情人介绍给格鲁时称:她是该府邸的女主人。让尊重私人隐私的西方人深入到日本领导人的最私密的空间,无非是要用“亲密无间”打动美国人。近卫用“真诚态度”表达出他的强

烈意愿:采取以往方式继续进行日美间谈判,只会空耗宝贵时间,恐怕花费一年半载的时间也不会有结果,为了尽快取得"突破",他愿亲自前往夏威夷,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直接会谈。"推心置腹""披沥胸襟""胸怀坦荡"等,一切都是近卫主导的"表演",近卫要用"戏剧高潮"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谈判上。一方面主张"毫无保留",另一方面他还留了一手,他并没告诉格鲁为什么要将谈判地点选在日本计划偷袭的夏威夷;也丝毫没有流露刚刚结束的"御前会议"以及"10 月 10 日"这一对美谈判的最后期限的问题。

晚宴在"极其诚挚、坦率的气氛中"进行了三个小时。近卫向格鲁保证,东条和及川两将军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近卫说:"我敢保证,如果能见到罗斯福总统,肯定能达成某些协议。而通常的外交途径则要花费一年的时间。"说了这番话诡秘的话后,他把脸转向土曼说:"日本的情况你清楚。我给你说几句话,请不要翻译给格鲁先生。你了解后,才能用你自己的信念使他相信我的诚意。你也清楚,我们不能把天皇也卷进这场争议中去。不过,一旦我与天皇达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协议,我便马上把情况上奏陛下。天皇将立刻下令,让陆军停止敌对行动。"

近卫反复说明东条和杉山两个将军已经同意他向美国提出的提议。东条甚至同意派一名大将陪他出席首脑会晤。"我与总统会谈时,陆军和海军将各有一名大将站在我身后。不瞒你说,军方有一小撮人反对谈判,但由于得到陆、海两军参谋总长的全力支持,我对取得进展充满信心,定能制服一切反对派。"近卫称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激进分子暗杀,"但如果能够实现和平,死也值得,对于个人之死,我是不大在乎的。"[22]

近卫有意透露:有陆军中佐计划在他乘船去夏威夷时,在从东京去横滨码头的途中将他炸死。[23]

近卫向美国提议的谈判日期是 10 月 10 日到 15 日,可 10 月 15 日近卫内阁总辞职,这是 10 月 10 日这一最后期限的五天之后。近卫下,东条上,是因为日本想留着近卫在战争开始后不久的某个时间,让近卫再次开始对美"和平谈判"。自"甲午战争"时开始,日本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与大国打一场"持久战"。

在推动军事机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军人与文官密切协作,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军人在幕后冷静备战,任何一个可能的细节都被考虑到;为保证军人偷袭取得更大战果,文官要将"和谈"表演到极致,这样才能保证军人偷袭取得更大战果。10 月 10 日之后战争机器启动预热,只等点燃导火索引爆炸药了。

近卫想去夏威夷谈判被罗斯福巧妙地拒绝,东条上任后日本又出新招。"和平"的声浪高过近卫。日本提出野村是前军人,对外交不甚熟悉,日本决定再派一个熟

悉外交且有娴熟谈判技巧的"外交家"前往华盛顿帮忙，日本派遣《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人来栖前往美国。来栖的夫人艾丽丝杰伊是美国人，出生在美国纽约，父母都是英国人。来栖的"美国背景"容易让美国方面感受到"亲近感"，这样也能进一步表示"日本的诚意"。尽管他出行属于高度机密，可来栖强调日本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已经事先得知了消息，要用暗杀手段破坏他成行。日本方面请求美国协助来栖乘飞机赴美，日本方面称：海军派专机送来栖到香港需要准备时间，因此要求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协助。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个快班飞机将在48小时内起飞，为了能让来栖大使赶上美国的这班飞机，格鲁大使专门给美国国务院远东部部长打了电话，说服泛美航空公司推迟两天起飞，这样，来栖从东京飞抵香港并终于登上了美国的这班飞机。

11月4日下午，来栖大使向东条辞行，深夜回家后才向夫人报告将前往美国。为了"避免遭到暗杀"，他夫人建议从东京乘火车前往横须贺途中，要他在陆军航空兵当飞行员的儿子陪同，据说这样是为了让新闻记者觉得他送他儿子出差。[24]

偷袭珍珠港前的日本空军士兵

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已经做好了一切充分的准备，罗斯福可不是中国的李鸿章，他对日本不诚实有两代人的认识，美国就是要让日本先开第一枪，不但要在道义上让日本成为一个失败者，而且要在后来的战争中彻底打败日本。



11月4日，日本在皇宫举行了陆、海军参议官联席会议，这是自明治三十六年(1903)创立军事参议院制以来首次破例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了对美发动战争的时间定为12月初。

次日的11月5日，手持和平橄榄枝的日本政府代表、前驻德国大使野村偕来栖与外务省秘书结城司次郎会晤，离开日本启程赴美。他是应野村的要求、日本政府为了"表达诚意"而派遣的另一位高级外交官，但他并没有带来任何具体方案。

11月22日，野村偕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会晤，赫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看着这两位外交官故作笑脸，装出一副谦恭而可亲的样子，总觉得有些可憎。"赫尔对来栖的看法异常严厉："我一开始就认为他是一个骗子。"

"我通过破译的电报知道日本的侵略计划，知道野村和来栖也掌握着同一情报，但却要用与他们相同的腔调谈话，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两个人恭恭敬敬地鞠躬后坐下，野村不时嗤嗤地窃笑，来栖也呲牙而笑。然而，就在这时，他们脑海中肯定萦回着这个念头：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如果不说声'yes'，日本政府就会在几天之内发动新的侵略，而这迟早将给美国带来战争灾难。"

"看来，来栖的为人与野村相反。他的表情、他的态度都是不可信赖的，无可尊敬的。我一开始就感觉此人是个骗子。派来栖来华盛顿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施加一切压力，使用所有说客手段强迫我们接受日本方面的条件；第二，这种做法一旦失败，他将利用会谈的方法把我们拖住，以便争取时间，让日本作好进攻准备。"

来栖在战后东京国际审判庭上被称为"谎言大使"。

外交人员[25]出动 /////////

为了确保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日本迫切需要了解珍珠港这个军港中的美军舰队的动向。外务省人员以及以前在夏威夷当地为日本服务的间谍网已经无法满足海军的需要，日本海军军令部[26]要直接派遣自己的情报人员。

吉川猛夫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是日本海军的现役情报分析人员，1940年5月他接到派遣命令，此后他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出发前突击学习。为了掩盖身份，他改名为森村，公开身份是日本外务省派驻夏威夷总领事馆的馆员。之所以改名为森村正，据说是外务省美国局的局长认为，这个名字发音难，外国人不好记，而吉川本人又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名字。

此后，外务省的职员名录中就多了一个名为森村正的职员，1941年3月27日，也就是野村到达美国华盛顿开始与美国"和谈"的一个半月之后，他到达了夏威夷。

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为止，他在檀香山日本领事馆工作了210天，发回了177份电报。

从踏上夏威夷的第二天起，他就开始了繁忙的“夏威夷旅游”。他每天头戴插着羽毛的夏威夷草帽，上着夏威夷衫，下穿绿色西装裤，乘着出租车开始在岛上到处兜风，当然，他最热心要“观光”的内容，是美军珍珠港基地。除了总领事喜多知道他的身份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使馆中也没有人干涉他的活动，他的联系代号是A。

到达夏威夷之前，他已经在海军军令部多次研究过珍珠港的沙盘，到达之后，他每天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当地报纸，不放过任何有用的消息。有一家名为“春潮楼”的日本酒馆，位于可以俯瞰珍珠港的一座小山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军港及里面的机场，从此森村多了一个好去处，既可以与这里的妓女泡在一起，又能从房间里利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珍珠港军港。他时而化装成甘蔗田的农民设法接近珍珠港；时而乔装成钓鱼爱好者到岸边钓鱼探测水深，当他发现瓦胡岛与各岛屿之间有飞机往返时，他装扮成一般乘客，乘飞机在天上侦察整个瓦胡岛。在这里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在外游弋的军舰会在周六返回，周日停泊在军港内。

9月，日本方面将珍珠港水域分为五个小水域，让吉川详细报告每个区域内的情况。军令部要制定作战计划，有无数的疑问需要解答。10月份之后，美日关系日益紧张，不但近卫来夏威夷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首脑会议没有了可能，而且日本赴美商船都受到美国的种种限制。经过野村与国务卿赫尔多方交涉，美国同意日本可以派遣商船到美国，但禁止装载货物，日本决心利用这次最后的机会。

10月15日，客轮“龙田丸”号驶离横滨港，23日驶抵檀香山。乔装成事务长的军令部少佐中岛凑，将一个纸卷递给了前来接船的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喜多，上面写满了要求吉川回答的问题，共97个。喜多将密信转交给吉川后，吉川对每一个问题都做了认真的回答。次日，吉川将答复交给了喜多，喜多将它藏在身上，转交给了小岛。

10月22日，日本“大洋丸”客轮由横滨启航，11月1日抵达檀香山。在这艘船上有3名伪装成船员的日本海军军官。一个是伪装成船上事务员的大本营航空参谋铃木英，他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少佐，这个飞行专家的父亲是陆军大将，叔叔是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船上还有装扮成随船医生的潜水学校教官前岛寿英中佐，乔装成见习驾驶员的特种袖珍潜艇指挥员松尾敬宇中佐。

这艘客轮驶离横滨港之后就故意偏离航线，没有走一般商船通常前往檀香山的路线，而是航行在通常航线以北很远的一条航线上，它是攻击夏威夷的机动部队的预定航线。这次航行实际上是为即将实施偷袭的日本舰队搜集航线上的气象、



航道、能否进行海上燃料补给、如何使用水上飞机、是否会遇到其他商船等情况进行调查。“大洋丸”离开檀香山返回横滨时，同样选择了北边的航线。就在这艘商船返回的次日，11 月 18 日，航行在横滨与西雅图之间的“冰川丸”也返回了横滨港。这艘船上同样有海军情报部的福岛荣吉少佐。他主要搜集北太平洋上的气象和海面情况的情报。

“机轴”的海军 //////////

1931 年“九•一八”、1937 年“七七事变”、1939 年“诺门坎战役”、1940 年“三国同盟”后日军“南进”，这时都是日本陆军唱主角。“三国同盟”前的内阁首相是海军大将米内，组阁时昭和天皇指名畑俊六出任陆军大臣，1940 年 6 月天皇决定成立新内阁，皇室策动畑俊六提出辞呈，结果他立刻提出辞呈，陆军以不再推荐继任陆军大臣的方式，将米内内阁引爆。

近卫组成第二次内阁时，海军大臣是吉田善吾，在“三国同盟”[27] 正式签署前的 9 月 4 日，他称病辞去了海军大臣职务，退出了内阁。日本史书上对他“破坏内阁一致”的原因并没有更多披露，陆军大臣辞职让米内内阁垮台；可海军大臣辞职，近卫内阁依然“健在”。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推荐了及川古志郎大将，9 月 15 日晚，在东京召开了海军首脑会议，会议集中了日本海军的所有将领，包括各军事参议官、各舰队司令长官、各镇守府司令官。会议一开始，海军大臣及川就强调会议必须取得结果。他发言道：“如果海军再继续反对‘三国同盟’，近卫内阁只有总辞职。对海军来说，实在负担不起致使内阁垮台的责任，所以我希望诸位最好表示赞成缔结同盟条约。”随后皇族伏见宫博恭亲王发言：“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

会场冷清，没有人敢发言，山本五十六发言道：“我绝对服从海军大臣，对大臣的处置也绝对无异议，但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八个月前我任次官的时候，按照政府的物资动员计划，其中 80% 的物资依赖英美势力范围供应，缔结‘三国同盟’后，我们将失去这一来源，希望知道今后之缺失将由谁来替代？”

当然不会有人来回答他的这一提问，会议后来以全体一致同意的结果草草结束。

陆军“红火”的时代山本很压抑，“右翼”时而扬言要将他与新桥艺妓之间的“恋情”作为丑闻抖出去；时而放出口风说要暗杀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天，他卸任海军次官，离开东京成为联合舰队长官。“三国同盟”之后，日本将国策定为“南进”，从此海军唱主角，1940 年 11 月，山本晋升为海军大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比较一年前之失落，山本还没打仗就先升了官，这样他

就更没有理由辜负“皇恩”了，天皇家族是日本最大的资本家，战争胜败，都要天皇家承担损益的大头。山本从天皇那里获得“恩给”，他要么放弃，要么追随，想拿钱就必须“出活”，山本选择了积极参与战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山本就没有珍珠港，而没有珍珠港，太平洋战争以何种形式爆发、在哪里打响第一枪等，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与野村同样，山本也是日本海军中屈指可数的英、美通，1919 年一战结束后，他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921 年回国。1923 年再次奉命到欧美考察，回国一年多之后，1925 年 12 月到 1928 年 3 月，他出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山本多次参加限制海军的国际会议，可日本海军却边“裁军”边不断壮大。可以说，他是日本海军发展壮大的见证人，参与其中让他熟知如何钻空子，将日本海军推向顶峰的是他；让日本海军化为废铁沉睡大海中的还是他。

1940 年 11 月 11 日午夜，英国地中海舰队所属空军突然袭击了意大利塔兰托港深处的海军基地，意大利海军当时共有六艘战舰，可经过这次空中打击，意大利一下损失了三艘军舰，海军即刻“溃不成军”。1940 年 11 月 15 日，日本《朝日新闻》迅速刊载了有关这次袭击的详细报道。利用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袭击停泊在港湾中的军舰，这让善于模仿的日本海军找到了榜样。

1941 年 1 月 7 日，山本五十六写信给海军大臣及川古治郎，提出了偷袭珍珠港的方案。他的方案立刻遭到海军内部的反对，然而反对意见并没有完全推翻他的方案，最后只是将他的计划变得更完善。偷袭珍珠港的最大难点在于：日本海军长途奔袭，途中被美军发现了怎么办？去了珍珠港，日本要袭击的目标——美国的军舰不在港内怎么办？

日本对中国清政府、对沙俄的两场战争，战争之初都没有制定彻底打败对方的计划，不是不想，而是受日本国力所限。日本毕竟是个小国，其国力只能保证短期战，国力决定日本的战术只能是瞬间给对手造成重大打击，在局势有利于自己时迅速寻求第三国充当中间人谈判。日本要先取得局部胜利获得立脚点，待脚跟站稳之后再进行下一场战争，德川家康就是如此取得天下的。这次针对美国也同样，日本仍采取偷袭战术，瞬间给美国造成巨大打击，让美国暂时休克的同时，日本陆军占领南方广大地区，然后将美国海军吸引到菲律宾一带进行决战，造成美国长途奔袭、日本乘机在途中埋伏袭击的态势。自身条件决定了日本的战略、战术，外交要保证战争“突然爆发”，军事要保证“突发战争”带来巨大战果。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进攻苏联，日本 7 月 2 日的“御前会议”决定“南进”，可对外却故意做出准备进攻苏联的架势，1941 年 7 月 13 日，关东军进行了一次前所

未有的总动员。由陆军大臣东条上奏昭和天皇，动员80万大军在中国东北集聚，9月在中国东北实施了名为“关特演”[28]的大演习，要让中国的东北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

由于美国已经了解日本的真正动机是“南进”，罗斯福总统因此装模做样地写信给近卫首相，警告日本不可“北进”。

就在陆军高调“阳动”的同时，海军这一未来战争的主角，也在全力投入有明确针对性的作战训练。九州的有明湾，因地形与珍珠港相似，海军航空兵在这里进行轰炸机空中投弹训练。特种潜艇在四国中城湾水域进行夜袭训练。依据作战计划，潜艇要在日出之前潜入珍珠港外，只要美军舰队出港迎战日本特混攻击舰队，这些潜艇就要对美国军舰发起突然攻击，它们的任务是阻止美国太平洋舰队出港。投掷鱼雷的飞机在鹿儿岛进行低空浅水鱼雷投放训练。因珍珠港内水深只有十几米，而空投鱼雷一般会下潜60米，如果不对空投方式以及鱼雷本身进行改进，对珍珠港实施的鱼雷攻击就会因为投掷鱼雷钻入海底而影响攻击效果。山本一方面要求空投飞机进行低空投掷训练，同时还对鱼雷提出改进建议，后来终于发明出在鱼雷上安装尾翼的浅水鱼雷，10月底，这种新型鱼雷出厂并开始试用。

日本前往夏威夷有南、北、中三条航线，北航线经由阿留申群岛，这是最不经济的一条航线，因此平时少有人走。冬季气候恶劣，风大浪高，就更没有人走，而这些“缺点”恰恰是日本海军求之不得的“优点”，没人走才便于日本舰队利用这条航线偷袭。中航线要经过中途岛，南航线经过马绍尔群岛。中、南两条航线最好航行，气候好，路途近，但商船多，而且中途岛还有美军驻守，特混舰队容易被飞机和潜艇发现，不利于偷袭。

北方航线有利于保密，但路途远，必须中途加油，可风大浪高令加油不易，日本海军为此也专门进行了研究和训练。为了保证北方航线万无一失，日本海军于10月专门派出两批四人，乔装成商人和水手，搭乘途径北航线的船只去夏威夷。了解气象、航道、海流情况，同时加强了对夏威夷广播和电讯的监听。

经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有针对性训练之后，日本海军终于要开始实战了。为了保密起见，参加特别攻击舰队的船只先后于11月17、18、19日，分别从不同地点出发，驶向日本千岛群岛中最靠近北海道且又是千岛群岛中最大的岛——择捉岛。另外一个由五艘潜艇组成的编队，则于19日离开九州，直接向珍珠港驶去。

特混舰队之所以选择择捉岛作为集结地，是因为这里的冬天来得早，11月就已经开始下雪了。岛上原本人员就稀少，过了鱼汛，这里更是既没有人也没有渔船，在这里集结不易走漏消息。军舰还没有入港，以演习为名的戒严已经于20日开始，

该岛被完全封锁，禁止所有人员以及船只出入，与外界的通讯也完全被切断，直到12月8日袭击珍珠港结束之后，严密封锁才被解除。军舰此后一艘接一艘地来了30多艘。当地居民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23日下午，所有舰艇到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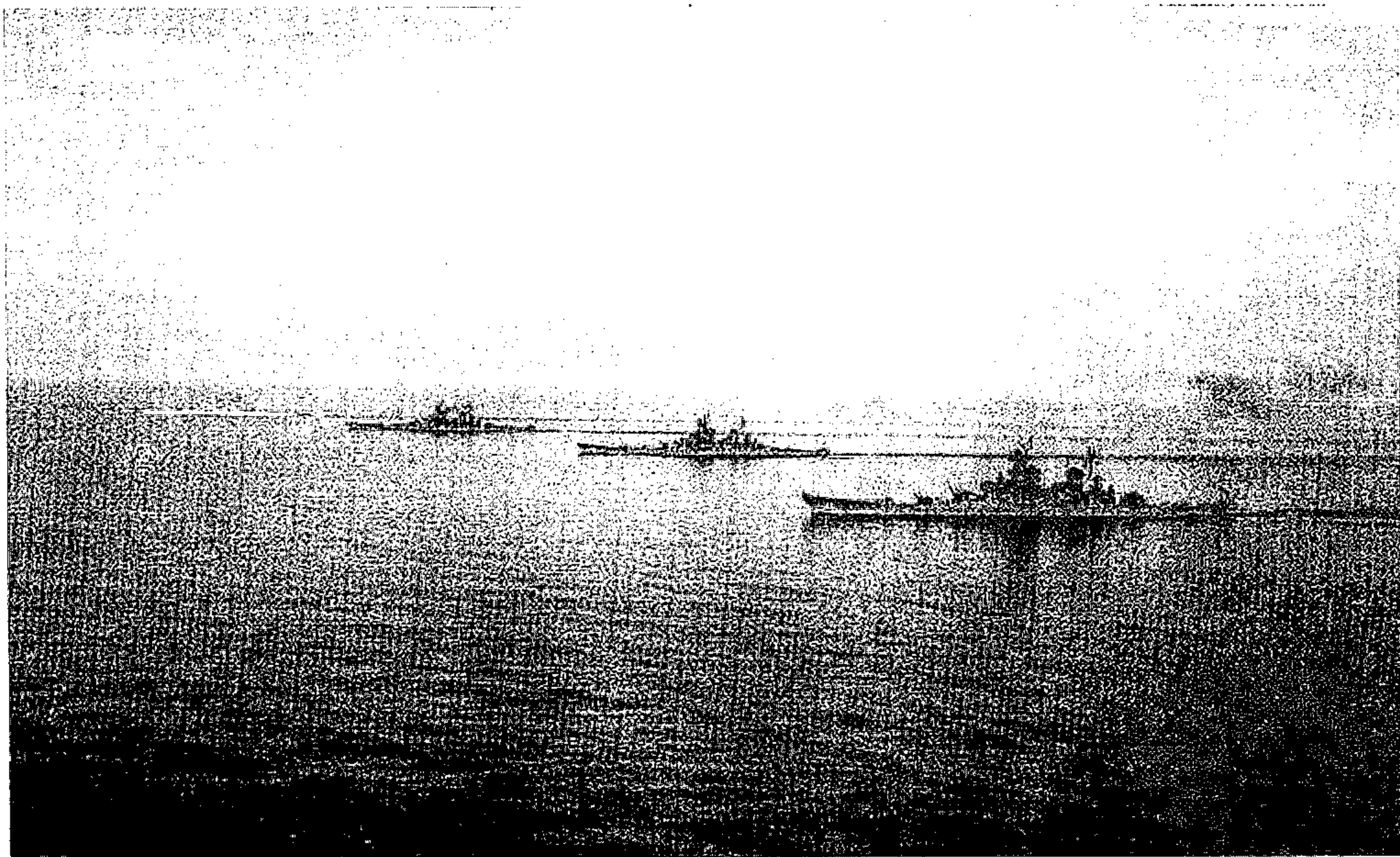
11月23日正好是日本的“新尝祭”，自1873年决定这一天为“新尝祭”以来，天皇每年这一天都要向天地神明奉献新谷，感谢丰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舰队也在这一天组织了遥拜仪式。

24日开了一整天的会，25日是离开日本前的最后一天，当天晚上，各舰艇上都举行了宴会，这一晚允许军人开怀畅饮。26日早上6时，按事先规定好的顺序，所有舰艇准时起锚出港。与此同时，陆军大部队也从上海出发，一只由四五十艘船组成的船队，沿中国海岸南下。

日本之所以要让太平洋战争在夏威夷及马来西亚等同时爆发，是因为日本军部认为，假如南进的第一枪由日本军人在南方突然打响，那么一定会引发美国对日本宣战，即便偷袭登陆成功，但是美国海军这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这样一来，美国

准备偷袭珍珠港的日本“特混舰队”

今天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的所有表演都被美国最高当局掌握得一清二楚，美国直到最后一分钟也不愿意成为破坏和平的罪魁，而日本武士则不管什么和平与道义，他们在对方的“麻痹”中窃笑，如今日本认为对美宣战是“愚策”，也就是说，破坏和平也坏不到哪里去，日本错在选择了美国这样的强大对手上。



海军会对日本本土或日本登陆部队构成威胁，因此，日本的首战必须要给美国太平洋舰队造成巨大打击，这样美国海军既无法与日本海军在海上作战，也无法有效地支援菲律宾的美国陆军。

不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日本的一切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偷袭夏威夷和进攻菲律宾两只大部队出发之后，赫尔在华盛顿向两名日本谈判代表递交了著名的《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南亚撤军。美国明知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始运转，但仍要求日本方面自己将转动的机器停下来。

“特混舰队”出发后，日本外务省打电报给野村、来栖两大使，要他们今后用直通电话与日本外务省联络，因为发电报费时、费事，使用电话时要求使用暗语。

在日本内海，伪装舰艇频频露面，电讯往来频繁，以制造日本海军仍在日本的假象。“特混舰队”在航行期间，实施24小时对空、对潜警戒并保持无线电静默。为了避免留下任何痕迹，船上的所有垃圾都被储存起来，空汽油桶则被砸扁堆在甲板上。

经过多次缜密研究，日本人将攻击船队的停泊地点都进行了精心的计算。日本人认为，距离夏威夷太远则出击路途长，这样会造成日军飞行员疲劳，可太近又容易被美军发现，而且属于美军反击的范围内，最后确定航母停泊距瓦胡岛以北200海里的海域，根据日军飞机的航速，从这里起飞到珍珠港需要两个小时。

偷袭时间与日军在马来西亚登陆同时，拂晓登陆有利于登陆成功。因为美国海军的特点是周六返回，因此周日港内军舰最多，还有就是这一天休息，人最麻痹大意。最后山本将攻击时间定为12月7日早上6点，这是飞机起飞时间，攻击时间为早上8点。

12月6-7日，“特混舰队”完成了最后一次加油，然后高速驶向瓦胡岛。

将“演出”进行到底

12月1日的“御前会议”决定：“向英、美、荷宣战！”向美国递交宣战书的时间为华盛顿时间7日下午1时、夏威夷时间7日上午7时30分、日本时间8日凌晨。为了避免美国怀疑日本电报业务量突然增加，日本将内容分为14部分，每隔一小时发出一部分。为了保证美国一定能够收到电文，日本专门租用了马凯公司与美国无线电公司两家电讯公司的线路。

12月2日，日本豪华邮轮“龙田丸”号（总吨位16955吨）作为第二次撤侨船，由横滨驶向美国洛杉矶。日本《朝日新闻》为此专门进行了特别报道。



该邮轮原定11月中旬启航，后来延期到20日，接着又再次推迟出发时间，最终拖到12月2日启航。12月2日出发以及特别报道，都是依据海军部的指示故意进行的。“龙田丸”驶离横滨四天后的12月6日，《东京晚报》再次报道说：“据外务省和递信省人士5日宣布，2日离开横滨去洛杉矶和巴拿马的“龙田丸”，拟决定按以下日程顺道在墨西哥停留；12月14日抵达洛杉矶，16日驶离洛杉矶；12月19日抵达曼萨尼略，22日驶离；12月26日抵达巴尔博亚，28日驶离。”[29]

在“龙田丸”启航之前，手枪被搬上了邮轮，它根本就没有驶入美国的计划，它计划在半路上调头，驶回日本。为了应对船上乘客发觉邮轮半路返航闹事，所以事先将枪支搬进了船舱。同时，为了避免乘客在船上收听无线电广播，日本海军人员要求船长将所有收音机的电子管取下。

“龙田丸”在驶向美国途中，当地时间上午10时，东京时间8日上午7时，邮轮上的收报员打电话向事务长报告，日本海军对美国、英国开战了。几乎就在同时，船长木村也收到了海军省的电令，命令“龙田丸”全速驶回日本。

12月5日早晨，东京车站迎来了来自横须贺海军水雷学校的学生。青年学生将水雷学校的三角旗换成大日本帝国海军的三角旗，在皇宫前的广场上与海军炮术学校的学生汇合。一部分学生后来专门被安排参观《朝日新闻》社，参观的目的无非是要报社对此加以报道。

下午放假自由活动，身着海军军服的“军人”遍布繁华大街银座一带，让海军走向街头的“参观活动”进行了两天，5日和6日，总共有近3000名海军军人走上了东京街头。街道上的大量日本水兵以及专门报道，都是为了制造日本海军无所事事的假象。

12月7日深夜到8日凌晨，是日本本土的陆、海军最紧张，也是最忙碌、漫长的一夜。大楼里的所有人都在彻夜上班，但为了避免让外界知道里面灯火通明，有人通宵达旦地在里面上班，事先就已准备好了厚厚的窗帘，当天早早就拉上了窗帘，不允许灯光泄露到外面。

从12月初起，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海军武官处就开始为日美战争爆发做最后准备，他们开始销毁密码、重要文件。最难处理的是密码机，为了保证在不被美方察觉的情况下“稳妥处理”，他们专门为摧毁密码机进行了一次预备演习，偷偷焚毁了军机保密柜，将密码机拆解，将其中能够捣毁的零件全部砸烂，然后抛弃在大使馆院里的杉树林中。与此同时，接连几天，将几乎所有机密文件都扔进了大使馆的焚烧炉中，只留下限于战争爆发当天使用的极少的文件。

12月2日，东乡外相电令日本驻华盛顿使馆，“除保留一套电报密码外，其余全

部销毁”，接报后使馆立即拆毁一台密码机，然后将不必要的文件和密码本等都投进焚烧炉。

就在“特混舰队”悄然逼近夏威夷之时，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陆军处武官新庄键吉在华盛顿去世，使馆定于12月5日为他举行葬礼，陆军武官们忙着“举行葬礼”。12月6日是星期六，7日是星期天。6日傍晚时分，日本使馆中的外交人员都去参加驻美国使馆一等秘书寺崎英成调往南美的“欢送会”。

东京的深夜，刚好是夏威夷日落之后，12月6日晚，先期单独出发的五艘日本海军潜艇已经按计划到达珍珠港外，在夜幕的掩护下潜艇浮出水面，从甲板上可以看见珍珠港内公路上汽车的灯光，从珍珠港灯火通明、没有进行灯火管制的和平景象上来看，美国没有任何进入战争前的紧张气氛，日本潜艇兴奋到了极点，立刻将所见通报给了“特混舰队”。接着，潜艇将自杀式袖珍潜艇施放，它们悄悄地向珍珠港入口处驶去。[30]

6日晚，美国最高领导人也过得非常轻松。罗斯福总统向昭和天皇发去了一封私人电报，要求他“为了人类”进行干预，“以防止世界遭受更多的死亡和破坏”。同时还对身边的人调侃道:“这是我这个凡夫俗子向上帝之子发出的最后音信。”接着开始继续集邮。[31]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也在享受周末，他在国家大剧院观看歌剧。

7日早，一部分日本外交官因在昨晚的宴会上喝得太多而在宿舍里睡觉;起大早的人跑到美国教堂里，“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弥撒”。

7日上午11时到达的907号电报指示:备忘录务必于7日下午1时面交美国国务卿。

对于这份电报为何没有在规定时间送达美国国务卿，日本方面战后的说辞基本上是在野村对赫尔说明的翻版。

“因为(外务省)电报指示‘绝对不能使用打字员，可能够译电的只有奥村一个人，因为他紧张过度，动作非常迟缓，而且时常出错。到了下午1时50分，电文才全部誊清’。”

在电报到达的时间问题上，美国方面的记录与日本没有太大差异。

罗斯福先于野村，在6日上午9时半就看到了备忘录的第902号电报。他向身边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说:“这意味着战争。”

7日上午10时，第903号电报被美国破译;30分钟后的上午10时半，赫尔、史蒂文森和诺克斯在国务卿办公室分析了远东军事形势，研究了将向国会提出的特别咨文。在他们讨论最热烈的时候，第907电报，既“下午1时递交备忘录”的电报

也被破译。美国国务卿与日本使馆的野村，几乎在同一时间接收并且阅读来自日本的“密电”。赫尔对军人们说：“接下去就是你们的事了。”

华盛顿时间下午2时20分，野村与来栖来到美国国务院，递交了日本的“宣战书”。

“组织之人”仍在继续

二战以日本最后投降而结束，美军进驻日本后开始组建远东军事法庭，要对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美国在审判过程中抛出的“文书炸弹”，其威力丝毫不亚于广岛的原子弹。在审判庭上，美国方面拿出了证明日本在“说谎”的关键证据：美国早在1940年开始就破译了日本的所有密码。日本人这时才恍然大悟：美国人不仅在武器装备上高出日本一筹，而且信息战能力远远超出了日本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的日本战犯

虽然在战场上已经完败，但这些发动战争的战犯们还在奢望能从法庭上讨得一丝便宜。有装疯的大川周明、一言不发的土肥原贤二、拒绝律师辩护的东条英机……总之，武士不怕死是谎言。





想像。日本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密码世界上最复杂并且无法破译；日本人这个特殊集团最擅长集团作战、最能保密，包括用阴谋欺骗对手。没想到日本人一直在美国人面前“裸奔”。

中途岛之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美军击落、甚至在珍珠港让日本“特攻舰队”打响第一枪，这些不再是日本的“阴谋”，而是美国人的“阴谋”。美国只公开了部分足以证明日本说谎的史料，这些解密档案足以让“谎言大使”来栖以及其他战犯在被告席上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无法抵赖。对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日本战犯仍在撒谎，可对太平洋战争，靠谎言是无论如何顶不下去了。

战犯们开始不约而同地诉说自己“无辜”，比如对美谈判代表野村，他强调自己“被非常信赖的海军欺骗了。”[32] 临去美国前，他专程访问了近卫，要求组织不能欺骗他，做为一个谈判代表，要“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可他太单纯，置友人的警告而不顾，最终被组织、被松冈、被日本海军出卖，他们这边打，那边让他去“和谈”。对于为何递交宣战诏书在实际攻击开始之后？野村的辩解是：“翻译电报花费了很多时间。”

美国公开的档案表明，美国情报部门早在华盛顿时间上午 10 点就收到电报并且翻译完毕，可日本比美国翻译得还慢，最初约好下午 1 点，实际上到了 2 点多才递交。野村开始透露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内部的细节。自己出身于海军，在外交官社会里只算个“外来户”，吃不开。在外务省没有根基，外交官欺负他；用“不协作”“不配合”来暗算他。而且大使馆内的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缺乏热情，对工作玩忽职守，不负责任，最基本的翻译技能也很差。

野村指责被海军“撤掉了梯子”，可海军也满是无奈，海军人物辩解：山本五十六、米内光政等海军高层，一直都反对亲德、过激的陆军。从 1938 年开始就一直反对“三国同盟”，不愿意加入到德国一方反对英、美，海军将领曾经“为了国家力排众论”。可到了 1940 年德国席卷欧洲之后，全国上下都为“不能错过机会”而疯狂，近卫、木户等成为了陆军的傀儡，一定要加入“三国同盟”，海军怕承担不起破坏内阁的责任，被动地被拖着走。海军透露的细节是：“南进”的积极推动者是陆军。

日本陆、海军之间争夺功劳、预算等非常激烈，某海军将领曾说：“宁愿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允许她嫁给陆军军人”，上面决定要对英、美宣战，对战胜没有把握，这话不能出自海军之口，那样的话更会被陆军看不起，对外宣战变成“面子”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是，海军将决定权交给了首相近卫。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最后让首相快下决心，因为举棋不定会让日本在“贫困中自杀”。日本每个月要消耗 40 万吨汽油，美国 1941 年 8 月开始对日本石油“禁运”，海军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

不得不提出“要打仗必须尽快”。如果拖到1942年，日本就“不战而败”了。[33]日本似乎只有战争一条路可以选择。

可对于东条是战争内阁的指责，东条的副官佐藤贤了在他的回忆录中为东条辩解说：“假如说当时的内阁是一条船的话，那么给船让东条来驾驶的时候已经驶到了瀑布的尽头，无论什么人在这个时候来驾驶，最终结果都会翻下去。”

对于“偷袭珍珠港”，山本五十六说：日本武士杀敌之前绝对不能在对方还在酣睡的时候就砍下别人的头颅，至少要先踢开对方的枕头，待对方醒来之后才能开始对杀。也就是说，山本五十六提议要给美国准备时间，偷袭道义上说不过去，可他的想法被政府阉割，外交人员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偷袭之后才向对方递交宣战书，结果造成了“国家羞耻”。

对于发动战争，昭和天皇战后发表谈话称：“明治时代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优秀人物辅弼天皇，可昭和时代军人跋扈，轻物质、重精神，结果一败涂地。”昭和天皇也变成了受害者。

透露出来的、天皇热爱和平的故事主要有以下两个。

1941年9月3日的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上，拟订了《帝国国策实行要领》，9月5日下午，近卫将其上奏给了天皇。天皇对战争和外交问题的顺序提出了疑问，近卫急忙将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叫来，近卫在旁边“侍立”。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与军令部总长[34]永野修身一同被昭和天皇召见。

天皇：“杉山，万一日美两国间发生什么问题，陆军在多长时间内能够解决问题？有把握吗？”

杉山：“仅就南洋方面，打算用三个月解决。”

天皇：“杉山，你曾是日华事变爆发时的陆军大臣，你别忘了，当时你就说过‘一个月左右解决问题’！可是，四年过去了，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杉山：“中国疆土辽阔，无法按预定的计划作战。”

天皇：“你说中国疆土辽阔，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有什么把握说三个月能解决问题？”

杉山低头不语，永野忙为他解围：“日美关系好比一个病人，是动手术好，还是不动手术好？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如果不动手术硬挺着，病人就可能要渐渐衰弱以至死亡。如果动手术，尽管要冒极大的危险，却还有治好的可能。”

这段对话既有说明天皇洞察秋毫，全面把握战争的一面，还可以解释为是陆海军要将国家拖上战车，天皇是一个无辜、无奈者的意思。

上述对话发生于1941年9月5日晚上，次日上午10时，在皇宫举行了决定日本



对美国宣战的"御前会议"。近卫首相、丰田外相、参谋总长杉山、军令部总长永野等先后发言说明原委，之后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对军人提问："尽管一再说要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打开局面，可是，在外交谈判失败的时候就必须开战，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人回答他的提问，会场上异常冷清，天皇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天皇开口说："两统帅部都没有答复，这让我非常遗憾"。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明治天皇在日俄战争前的御前会议上咏的一首和歌，大声朗读起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何缘无故起风波。"

天皇用它来宣布会议结束。

上述内容告诉外界：天皇热爱和平，可军人好战，他们让皇室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责任。

在日语中，"かた"有"肩膀""片面""模子"等几个意思，添加了动词词尾"る"之后，"かたる"变成了一个多义的动词，一个是"讲述"，还有一个是"欺骗"。"かた"与"ち"组合成"かたち"，意思是"形状"，而在"かた"后面加上"り"，就是"かたり"，它又是"かたる"的名词型，在"かたり"前面加上"物"就是"物语"，中文为"故事"的意思。"かたる"就是"将故事说得有模有样、有鼻子有眼"。能把事件的先后顺序、情节充分考虑好了之后，讲述得滴水不漏，让人听得陶醉，那就是"编故事"。

对美国"不宣而战"是"脏事""丑事"，而且后来日本战败投降了，那么这些就都是"下人""小人"干的，"下"应勇当"抹布"，将"上"的"不洁"抹干净。"埋汰"自己"纯洁'上'"，这才叫"牺牲"与"忠诚"。昭和天皇热爱和平、野村临危受命、山本五十六有武士气概，可一切都坏在了几个"小人"身上。"脏"的具体表现是：工作不认真、英文能力不强等，结果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声誉"。

为了编造日本历来"热爱和平"的"故事"，日本将几次大的对外战争都宣传为"外国阴谋"，日本是"受害者"，上当受骗。可说日本"上当受骗"等于说日本"愚蠢"，"优秀民族"怎么会"愚蠢"到连别人设的圈套都没看出来呢？说"中了外国的计"，等于将日本的能力与智慧完全抹杀，为此，还要再"编"故事。

为了对总"编故事"者进行"告诫"，日本还有一个成语是：编多了故事总会说漏了嘴用日语来说就是"語るに落ちる（かたるにおちる）"。

"我说的话全是假话"，这是个无人能说清楚的复杂命题，实际上就存在于日语的"かたる"这个词中。换言之，日语中的一个词就包含了这个深奥的哲学命题。"我在说"就是"我在编故事"。"我说的话全是假话"，告诉你的这句是真的，可它还是真假难辩。在日本人看来，岛国以大海为界，上天造成了日本"内外"有别，要让国民埋头追随，必须建立"内外"的双重是非标准，让所有日本人都成为"组织之人"。

有人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日本人最普通而又最具杀伤力的一句话是：你也算是日本人吗？言下之义是，不与统治者站在同一立场，就应该离开岛国，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

---

[1] 奥姆真理教的新闻发言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就职，后退职加入了奥姆真理教，在电视上以善强词夺理而引人注目。

[2] 有田芳生著《有田芳生之对决—奥姆真理教》 朝日新闻社 。

[3] 麻原预言的“最终战争”之时，恰恰是中国香港回归的1997年。

[4] 舛添要一著《日本是什么？日本人是什么？》 广济堂出版 1995年 第105页。

[5] 野村吉三郎著 《出使美国》 岩波书店 第409页。

[6] 此前日本驻华大使重光与宋子文约定要“肝胆相照”，彻底解决中日之间的“悬案”，就在此后不久发生了刺杀宋子文的事件，当天他们俩同乘一列火车从南京到上海。唯独这一天他们俩没有像往常那样，一同谈笑出站，重光葵的回忆录中称：他因睡过了头而被落在了后边，听到了枪声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此后不久爆发“七七事变”。

[7] 1937年意大利加入，变成了“三国”。

[8] 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时，二次近卫内阁中的商工大臣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取代松冈出任外相，陆军参谋本部的《机密日记》称：“陆军在这次更迭内阁中的发言权微乎其微。”表明南进的主角是海军，而不是陆军了。

[9] 陽動作戰（ようどうさくせん），日语中的一个专门名词，意为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为让对手判断失误，有意进行某种活动，将敌方的注意力吸引到该方向。但并没有“阴动”这一反义词。

[10] 实松让著 张焕利黄凤珍译《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 第141页。

[11] 美国一贯反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中国本土驻军，坚决反对日本进入印度支那。

[12] 参照松本重治著《近代日本的外交》朝日新闻社 第95页。战后日本人认为这是“翻译错误”。

[13] 印度尼西亚。

[14] 实松让著 张焕利黄凤珍译《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 第142页。

[15] 当时日本正在幕后策动满洲国与苏联交涉收购中东铁路问题。

[16] 约瑟夫·g·格鲁著《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3月） 第129页。

[17] 格鲁著《使日十年》石川欣一郎译 每日新闻社 第173页。

[18] 朝鲜青年义士尹奉吉装扮成日本侨民混入会场，大会开始后向观礼台上投掷了威力强大的水壶式炸弹，将白川义则陆军少将当场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炸飞。

[19] 美国人将自己破译日本密电的行动称为“魔术战争”。

[20] 《赫尔回忆录》第175页。

[21] 《赫尔回忆录》第390页。

[22] 约翰托兰著《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　第126—127页。

[23] 日本人喜欢阻止出行和来访。战后也曾阻止岸信介去美国，谢绝艾森豪威尔到访。

[24] 田中角荣1972年来中国，鸠山一郎1956年去苏联，都强调自己是冒着“被暗杀”的危险成行的。

[25] 日本人叫“间谍”为“忍者”，日语为“忍者（にんじゃ、しのびもの）”。其中有双重含义。一忍是要能够装扮成各种角色，从乞丐到云游僧，潜入“敌国”，从事刺探情报、破坏的任务。二忍是指被俘之后，一旦被抓住，被严刑拷打是肯定的，这时也要“忍”，决不供出任何自己所知信息。其他的几个表述是：“犬”，日语为“犬（いぬ）”，“回物”（派遣出去的人物），日语为“回し者（まわしもの）”，“间者”，日语为“間者（かんじゃ）”。

[26] 陆军有参谋部，海军为了与陆军区别，叫海军参谋部为“军令部”。昭和天皇常穿陆军元帅服，与陆军军人商谈要务，让海军感觉压力很大。

[27] 1940年9月27日在德国柏林签署。

[28] 关东军特别演习的简称。

[29] 儿岛襄著《开战前夜》 中央公论社 第314页。

[30] 珍珠港的第一枪不是日本飞机袭击美国军舰，而是美国军舰向潜入珍珠港附近的袖珍潜艇投掷炸弹。比日军飞机攻击珍珠港早一小时十分。

[31] 东京时间8日零时十五分，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紧急求见东乡外相，要将罗斯福的电报转送给昭和天皇。东乡以深夜为由拒绝他本人亲自前往，但答应由他转送。送走格鲁后，他立刻去见东条首相及昭和天皇。战后天皇说这封电报送达晚了。可东乡说绝对在珍珠港袭击开始之前送给了天皇。

[32] 野村临去美国前，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曾提醒他：“有些人很喜欢先让你爬上楼，然后从底下撤走梯子。”

[33] 1941年7月21日，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召开的首次联络会议上的讲话。

[34] 海军总参谋长，陆、海军争功心理很强，同一对象，用词都不一样。

结束语



1986年,我曾作为中国青年日语讲师代表团的一员访问过日本一个月,1989年再作为交换留学生去日本写硕士论文半年,作为日本培养中国日语教师课程中的一部分,两次赴日都是由日本政府出资,接待方两次都不厌其烦地专门安排前往广岛参观访问。这一行程安排的用意不言自明:去广岛看原子弹爆炸遗址。"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主办方通过实物及解说词反复向参观者灌输:日本是原子弹的唯一受害者。

大钟是日本广岛居民的平静生活的历史见证人,1945年8月6日9时16分之前,他们享受着和平的生活,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人外出上班,可天上的美国B-29轰炸机突然丢下了一颗炸弹,大钟在9时16分这一瞬间停摆了,以此为界,美国人、美国的原子弹将广岛变成了人间地狱。

美国人、美军是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人",他们邪恶地利用了科学,让日本成为了"唯一的一个原子弹受害国",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牺牲品。笃信佛教的日本人并没有说明孽果缘自何因。

在东京的九段下,还有一个"靖国神社",它的历史远比广岛"原子弹纪念馆"更悠久,主办者在此宣传另外一个战争结论。首次出国行程安排紧密,几乎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第二次属短期留学,人虽在东京,可满脑子都是北京的事,也没有时间去看看。1991年起自费去日本留学,某日偶然路过东京的九段下,在路边看到一个高大的"鸟居"(日本神社入口处的牌坊)耸立,这时突然想起这就是中日之间总爆发争议的"靖国神社",在好奇、想了解那段历史等多重心理的驱使下,下决心踏入看个究竟。

这里宣传的对外战争,主要自"甲午战争"始到二战结束时止的"五十年战争",前面宣传"皇军"勇猛出征;后面颂扬"皇军"奋勇防守,实物有对中、朝、俄等战争

中的“战利品”；还有针对英、美的“神风战斗机”“回天”[1]潜艇的模型等。配合实物的文字介绍称：引发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的“七七事变”是刘少奇领导的共产党的阴谋；“珍珠港事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设的圈套。日本武士50年间“打遍全世界”，先后对朝鲜、中国、沙俄、德国、苏联、法、荷、英、美发动过战争，日本武士将“昨日的盟友，今日的对手”这一俗语演绎到极限，这里既没有说明日本曾经策划过哪些阴谋，也没有介绍下如何策划阴谋。只说日本军人漂洋过海打到外国。

“靖国神社”中对战争的结论是：“日本今天的繁荣完全是英灵的牺牲换来的。”

“靖国神社”将日本陆、海军之“神勇”都歌颂了一个遍，可昭和天皇衷爱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防疫部队”，也就是“七三一部队”在“解放亚洲”中的“作为”却没有任何展示；有要“一亿总玉碎”，也就是全民都为天皇战死的鼓噪，却“遗漏”了天皇要派遣近卫去苏联见斯大林乞降的内容。日本人在宣传方面也往往具有日本武士的“传统”特点。武士喜欢挥刀“片”东西，一个完整的西瓜经过武士大刀一片立刻变成了半个，武士手拿“片”过的半个西瓜告诉你，这就是西瓜的本来形状。

佛教讲究“因果报应”，如果将“靖国神社”与广岛的“原子弹纪念馆”放在一起联展，效果及结论应该更具新意。美国投放原子弹是“灭绝”；天皇因此宣布投降却是“圣断”，日本学者总说日语中多见“非逻辑性”，大概也应该包括这类因果含混的结论吧。

“靖国神社”宣称“日本今天的繁荣与‘英灵’紧密相关”，那么中国今天之落后又和谁有关呢？日本要用中国领导人无能、国民劣等来掩盖中国落后与靖国神社中的“冤鬼”有关的事实。日本武士祸害中国50年，全民族不是赔款给日本鬼子，就是在颠沛流离中躲日本鬼子。笔者的父亲、叔叔就曾生活在和平的南京城，1937年年底日本进攻南京之前，笔者祖父全家逃离了南京，否则笔者家在那一代也就结束了。战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从日本那里获得任何战争赔偿，中国沉重无法起飞，而日本却轻松轻松飞了起来。日本丝毫不感谢中国，却感谢神社中的“冤鬼”，这些强盗入侵者，每个人都是中国军民奋勇保卫家园，用一颗颗复仇的子弹，用多条鲜活的生命将他们送回日本的“靖国神社”的。日本鬼子让我们无法建设国家，国民无法接受良好教育，甚至无法过上和平的日子。[2]

日本的御用文人总喜欢说自己“奇特”，是亚洲人中的“尤物”，将广岛的纪念馆与靖国神社比较之后，的确可以对日本得出一个结论：日本是一头怪兽，要么双头；要么一头两脑。广岛宣传日本是战争的“悲惨受害者”；可“靖国神社”却宣传“珍珠港大捷”。广岛痛斥“美军残虐”；“靖国神社”却宣传日本军人在塞班岛、冲绳英勇抵抗美军。这里告诉你“远东军事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言下之意是：战争应该以日本战胜而告终，由日本人主持“正义法庭”审判“白人”。自1894年开

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为止，1904、1914、1928、1931、1937、1941年，日本武士平均每六年对外发动一场大战，签署了《不战条约》，可日本称自己的对外战争是“自卫战”；签署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条约》，可日本发动“细菌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既是“圣断”，又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受难”，给武士以荣誉及赞美，目的在于让他们有朝一日再释放力量。

留日期间还看过日本的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写的《日本可以说不》，后来两个中国的年轻学子模仿上述著述写了《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中的一人还被日本邀请访日。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中国可以说不》被日本媒体恶意渲染成“中国要称霸”（至少本人的感受如此）。将两本《可以说不》比较之后感觉，两书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宣泄情绪”，欠缺冷静思考以及认真研究。

在日本生活，周围的环境很容易造成中国人“情绪化”，变成一个“愤青”。换言之，日本往往让你想冷静也无法冷静下来。在日本看电视，总看到中国人、朝鲜人在不断地流泪。他们都是前去日本讨公道的前“慰安妇”“强制劳动者”“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受害者”。这些战争受害者们来日本控告日本政府，可几乎个个败诉。电视画面及报纸上的照片反映自己同胞在流泪；而周围的日本人大多是一付冷漠的神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不激动？不让自己“情绪化”?！“受害者”的眼泪丝毫不能打动日本人，在日本传媒的恶意渲染下，这些“受害人”似乎不是来日本讨要公道，而是看中了日本政府的钱袋，日本法官判决受害人败诉是在维护日本国民的利益。因为只要判决日本政府败诉，最终损害的是日本纳税人的利益，法官变成为日本纳税人“捂紧钱袋”的英雄。

看到这类歪曲报道，假如你不义愤填膺，你就不是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太愤怒了！想立刻前往东京地方法庭，将法官痛打一顿。

从“甲午战争”后中国留学生开始到日本留学，中国人就开始“情绪化”！鲁迅当年在仙台医专就是一个“愤青”。看了一场日俄战争的记录片，“记录片事件”就改变了这个青年的一生。他最初抱着能为父亲那样的病人治病的朴素动机去日本留学并选择了学医，可“记录片事件”让他放弃了救治单个病人的最初理想，从此他立志拯救病态的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全民大众的思想医生。在现实面前，鲁迅是个充满悲情的角色，中国太大，人口众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多，开启民智方向不错，可真正实施起来却异常困难。可鲁迅宁愿成为中国的堂吉可德，明知道风车不可战胜，但还是义无返顾，单枪匹马地猛冲上去。留日学生中不乏“愤青”，有蒋介石、周恩来；还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这些人当初都是血性青年，可后来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不单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方向，还改变了众多中国人的人生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日本是中国无法绕过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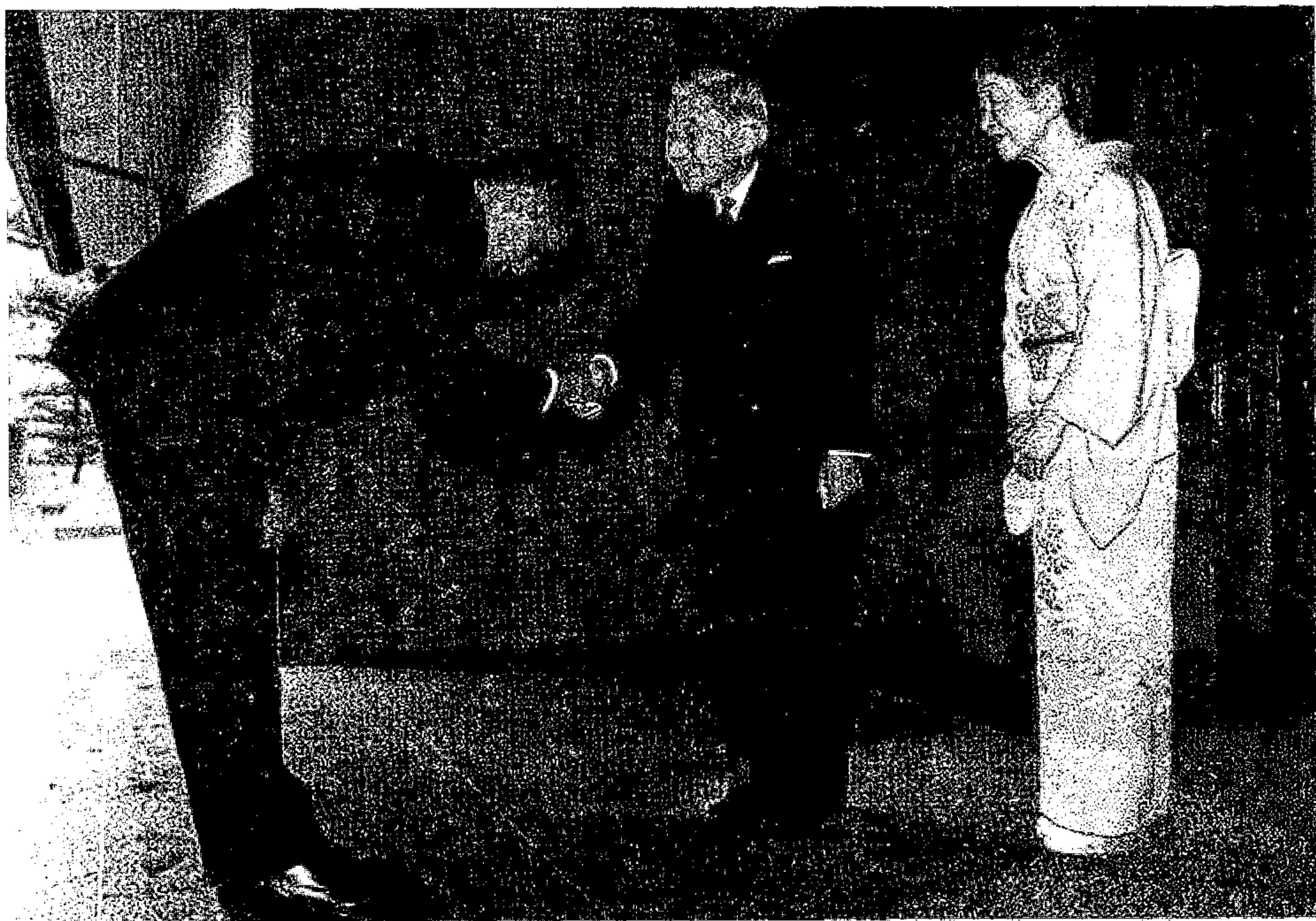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笔者当时正好也在日本，这时与日本的报纸、电视从业人员有过短暂接触。这些舆论精英们对左右日本的舆论，形成思想导向有极大影响力。“百闻不如一见”，深入之后才明白日本人为何批判自己的传媒“舆论操作”。

电视台、报纸主动邀请中国留学生进入演播室、编辑部座谈，可笔者置身其中后发现，中国留学生与日本组织者之间的立场及动机存在巨大差异。日本传媒让中国留学生加入，只想让留学生成为他们通盘大棋中的一个棋子，一旦发现留学生言论不适合他们的口味，报纸、电视可以随时弃之。日本的“言论自由”，是可以对外国任意“自由谈论”，同时，还是用不同方式充当传达日本政府声音的传声筒，日本政府制定好了大方针，各传媒用各自的方式图象、文字化而已。

日本政府的大方针是“诋毁中国”，无论是政府高官还是媒体精英，都围绕这一主题制作节目，对北京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的公式是：中国

奥巴马向日本天皇鞠躬

2009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见日本明仁天皇时，向后者鞠了一个近90度的大躬。这一举动顿时引起了日美两国舆论的轩然大波。日本媒体将之与60多年前麦克阿瑟傲慢对待昭和天皇的场景作津津有味的对比；美国新闻界则将总统的卑躬屈膝视为奇耻大辱。估计当事人奥巴马自己心里有数：为了国家的利益，给小日本带顶高帽子也是必要的。[3]



是“人治国家”;学生有政治野心想夺权。

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领导人说放弃赔偿,中国国民虽不满也服从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享尽了“人治国家”的好处,可日本彼时说好,此时说坏。中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困难条件下刚刚起步发展,日本却又关心起中国的“民主政治”来了,如果与近来抛出的“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思考,那么就不难理解日本为什么总是关心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田中角荣曾说过给每个中国家庭送一台日本产彩电,让丰田车遍布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道路,这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分崩离析,可后来日本并没有送给中国消费品,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也附带各种条件。

日本坩埚煎熬出中国“愤青”,而民族的进步与成熟需要冷静的思考。

大三时初次阅读日文版的《菊与刀》,当时的日语水平还不足以完全看懂书中的内容,但当时的感觉是美国学者了不起,对日本的认识以及剖析非常深刻。研究生阶段常视其为日本研究的《圣经》,无论是同学之间的日常争论还是撰写有关日本的小论文,不引用其中的关键词或者表述就似乎感觉“一盘好菜中没放盐”,到日本留学后的一段时间,都将它作为观察、比较日本的坐标,可随着观察的深入,却发现本尼迪克特的许多结论都是错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驻日本大使名赖肖尔,他与本尼迪克特不同,赖肖尔是生长在日本,日语非常流利的日本通。日本投降后,赖肖尔作为美国占领军的高级文职人员重返日本,他不但直接参与了日美之间的许多重大事件,而且离任回国后继续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出谋划策,60年代《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后,他作为美国驻日大使再次来到日本,卸任后去美国哈佛大学当教授,其间写了不少有关日本的著述。仅从著述上看,两人对日本的认识及见解都有偏差之处,可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说赖肖尔与本尼迪克特一样,因为赖肖尔是否故意出错尚无法定论。无论本尼迪克特还是赖肖尔,无论是真错还是假错,他们要利用自己的学识以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赖肖尔了解日本是“纵向社会”,他抓住了日本人在白种人面前自卑、在黄种人面前傲慢的这一心理,常给日本人“戴高帽”。对日本人来说,以前见到美国人就要“鞠大躬”;可现在是美国人对日本人“鞠大躬”,“吹捧”日本。当高帽来自白人,尤其是将日本彻底打败并且对日本实施长期占领的美国人时,日本人往往不能自持。在对日问题上,美国人故意出错的事例很多,“珍珠港”美国让日本打响第一枪;“中途岛”之战,美国人让日本舰队长途奔袭,主动将“肥肉”送到以逸待劳的美国海军口中,美国常常并且可以“故意出错”,非故意也可以在发现之时用改变日本来“强力纠错”,美国世界最强,日本只能对美国说“哈伊”,可中国不行,犯了错误会损失巨大。

国家利益之间的竞争好似围棋中之对弈,对手是不会将自己在对弈中什么时



候、基于什么原因落某个子的理由告诉你的。这与"中日围棋友谊赛"有重大区别。戴季陶早就说过中国之日本研究与日本之中国研究完全不对等,可这种"遗憾"至今依然还是停留在遗憾上。

中国之日本研究,批评者都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多学者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个案上,或者将外国报道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俯瞰森林或在森林中寻找路径,这些都是不能立刻"出成果"的事。不愿意深入比较研究,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行为规律以及各事件相互之间的联系,这是中国之日本研究的最大欠缺。

仅举一例。

1989年中国北京政治风波后,日本采取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对华举措。1989年6月7日,刚刚就任首相的宇野宗佑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言称:"必须认识到,日中关系和美中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我们曾经与中国有过战争关系,现在中国正处于混乱之中,我们应该敢于回避那些是非言论。"这与前任内阁主张"全面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对华态度截然不同。

在1989年7月于法国巴黎召开的巴黎峰会(新凯旋门峰会)上,日本对主张"对华经济制裁和发表谴责宣言的各国展开了积极的说服和斡旋。"

1990年5月7日,已经下野的前首相宇野宗佑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为此专门表示感谢,江泽民总书记说:"在去年的巴黎峰会上,宇野宗佑主张中国不应被孤立,我们非常赞赏。"[4]11月2日,日本决定恢复被冻结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并与中国交换了关于提供第一部分(356亿1100万日元)贷款的公文。"[5]

日本对美国,从最初积极怂恿、追随到突然转变,其中隐含了极大的自私动机,而中国却误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善意表示。

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皇军就跨过大海到中国来打"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在江西、延安,可日本军队的攻击对象却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占领的地方全是沿海发达地区和资源丰富地区。二战后日本自己不打了,可日本要怂恿美国人打。美国人似猛牛,50年代在朝鲜追打红旗;60年代在越南对着红旗猛冲。70年代美国改变亚洲政策,刚从越南撤军,随之出现了难民潮,美国呼吁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要集体拯救,共同分担,可日本立刻称自己"不能与美国一致",打仗可以"后方支援",接收难民则日本"人多地少"情况特殊。

北京政治风波后,日本突然转向,要与"美国盟友"背道而驰的真正原因也在这里。后来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召开,这次首脑会议上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待北京发生的风波,美国要求发达国家一致行动,除了对中国制裁之外,还有一项"共同行动"就是像当年接受越南难民那样,分摊接受"中国难民"。

日本躲在美国身后高叫"封杀共产主义",可此时却突然强调自己与中国的地缘与历史渊源,言外之音是中国离日本太近,贫困人口太多,真涌入日本,日本无法承受,"新国家利益"超越了"旧国家利益"。为了将国内外视线吸引开,日本让6月7日刚刚上台的日本首相爆出丑闻。马上要去欧洲参加发达国家首脑峰会的宇野,被揭露与酒吧间女子有染。约定好的包养金钱,宇野没有足数给她,是个言而无信的男人。

日本要让宇野变成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对情妇都无信义可言,更别说代表国家对整个发达国家了。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宇野首相最终成为了牺牲品。在他出席峰会期间,国内用大量的丑闻报道冲淡峰会,宇野的女性丑闻,实际上与日本的国家走向有因果关系。

自民党执政50年,自民党政治家在金钱、女性问题上干净者寥如晨星,为何只有宇野被揭露出来?而且是在关系日本国家走向的关键时刻?

早在"洋务运动"时代,辜鸿铭就曾提醒过张之洞:"外国报纸信不得,很多内容都是假的。"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有那么多血的教训,可这些并没有化为凡事应"刨根问底"的经验。中国研究日本,包括很多学者,都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日本报纸披露的表面内容上,没有对比日本政治史上的历次"政治丑闻",日本近代史上每每出现所谓"政治丑闻",发生时机往往很有选择,不单纯是事件本身或者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只有当领导人与国家利益面临孰轻孰重的选择时,执政的"武士"才会被"牺牲"。

不久前有中国人提出要"对日新思维",也就是说"不要纠缠以前",应该"展望未来",日本的"陈旧思维"被中国文人一包装变成了"新思维",中国告诫日本不应歪曲历史,日本统治者应该放弃自明治以来的、欺骗国民的态度和手段,这些才是日本最应该具有的"新思维"。

80年代,中国沿海一带的无良奸商与日本不法商人勾结,将日本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倒腾到中国来贩卖,挣黑心钱;现在贩卖者变成了"文化精英",他们推销日本的"精神垃圾"。实际上,这些谬论无论对中国和日本都是有害的。日本统治阶级自明治一新以来就一直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欺骗日本国民,将大量国家财富投放到对日本以及世界有害的战争机器上,他们只想通过掠夺让自己快富、暴富。

日本有些人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会威胁日本,朝鲜试射导弹也会威胁日本,这些都是为了他们花大钱从美国购买"导弹防御体系(TMD)"正名,日本保守党政治家此时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捞取回扣的富矿,可此举造成日本的劳动大众蒙受巨大损失,日本只有和平发展才符合日本以及全世界的利益。这是一个在日本留过学并且深爱日本、同情日本一般民众的留学生的忠告。

本人希望自己的著述能够为成为日本人的"新思维",同时为中国人了解日本

提供新的视角。

永远难忘初进大学门就成为我良好榜样的大学时代教师陆静华先生、俞先生，伊藤照之先生。研究生时代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的李德先生，日方主任教授林四郎先生一家，东京大学的池上嘉彦先生、山中桂一先生。感谢到日本后、在我最困难时全家人都尽力帮助我的田中宽、徐曼夫妇，日本国际交流服务公司的清水匡氏一家，东京的要紘一郎氏全家，保证人青木良郎氏全家，今井纯一郎氏一家，在日期间为我提供过免费住宿的东京电力公司。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东京大学，那里的众多教授永远都是值得我终身仿效的榜样。

写作期间，同济大学图书馆的韦建静女士、同济外语学院阅览室的各位管理员、广州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阅览室的廖买喜以及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林馆长，均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种种可能的便利；深圳滨江社区工作站的王洪洲先生、金梅英女士以及堂兄弟刘德宣、杨晓红夫妇，多次不辞劳苦，为我打印提供各种方便；香港同胞马加宁、朱建红夫妇，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为了出版此书，不但本人付出巨大，家庭成员也为此有巨大的付出。妻子、女儿既是读者又是批评家，姐姐刘辉、姐夫曹棣也曾提供他们的住房让我安心改稿，这里再次表示感谢。对张永椿编辑以及在本书制作过程中默默付出努力的所有人，表示由衷感谢。

---

[1] 日本设计制造的自杀式潜艇。

[2] 1938年2月，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在发表了一部涉及南京作战的小说，名为《活着的士兵》，无论书名还是其中内容都极具象征意义，"活着的士兵"或者"日本士兵"活着"，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可不是件好事，芥川在《桃太郎》小说中描写的鬼国故事，在石川的小说中，让"活着的士兵"演绎得淋漓尽致："眼前是一片富饶的大陆，里面的财富无穷无尽，而且可以尽情的拿。这一带居民们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都向日本士兵开放。大家可以像摘野果儿那样，随心所欲地任意采摘。"（石川达三著 唐卉译《活着的士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第20页）

[3] 本图选自AFP BBNews （法新社日本新闻网），http://www.afpbb.com/article/life-culture/life/2663709/4908730。

[4] 林振江著《首脑外交一以中日关系为研究视角》新华出版社117-118页。

[5] 日本货币太多，哪家银行不设法将货币贷给优良客户，哪家银行就要破产。给储户的年利率仅为0.1%。中国政府只要不从小泉政府那里借钱，就会让他立刻下台。

从“根子”上手术刀般彻底剖析日本民族性

研究日本历史、政治、外交、文化的必读之作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日本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纵向社会。公平这个词，并不存在于他们的字典中，唯一能让他们认可的，只有力量。从明治维新前天皇到平民之间的森严等级，再到近现代社会政坛、外交、战争、职场、生活等方面上的以大欺小，整个日本社会的秩序就建立在从小到大这个基础之上。

这种渗透日本社会各个角落的纵向关系，正是从“根子”上解密日本民族密码的钥匙。从中我们可以揭开日本历史上一系列谜团的答案，得知日本政坛黑幕之后的真相，找到侵华战争时日本侵略者的兽性之源，看透日本人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等劣行的本质，更可以知晓日本经济在二战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奥秘。总之，本书将会带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懂读透最真实的日本。

含章行文
322 人文馆 070



定价：36.80元